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国 / 外 / 马 / 克 / 思 / 主 / 义 / 与 / 后 / 马 / 克 / 思 / 主 / 义 / 系 / 列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任天石



# 自然的理由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原著 【美】詹姆斯·奥康纳  
翻译 唐正东 臧佩洪

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孙 辉  
装帧设计 赵 庆  
责任校对 冯晓哲

“不管是对海湾战争所隐含的内在逻辑的揭示，还是对体现在刚刚生长出的森林中的生产关系的阐释，《自然的理由》一书都不愧为一本学术力作。詹姆斯·奥康纳再一次证明了他是美国最有原创性的社会理论家。”

——麦克·戴维斯，《古英之城》一书的作者

“环境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正在展开一种对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它能极大地增强对话双方的力量。詹姆斯·奥康纳在这一对话领域已经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人物之一，他的这本新著，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深刻的方法，揭示了上述这两种运动是怎样走到一起来的。”

——唐纳德·伍斯特，堪萨斯大学

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的获得是以在自然环境和人类社区的自治权方面所付出的极大代价为前提的。在解读经济增长的这种令人困惑的遗产，以及减少它对我们的后代的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能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著名社会理论家詹姆斯·奥康纳揭示了政治、商业规则以及政府，与环境和社会变迁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在解读经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奥康纳指出，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对资本主义本身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本书中的这些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和案例研究，充分证明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解我们各自相异的环境和社会史，在从真实世界的角度给经济行为提供依据，在阐述和评估新的政治策略方面所具有的能力。

詹姆斯·奥康纳，哲学博士，《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一本社会主义生态学的期刊）的主编及合作创办人，“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心”（位于加州，圣塔·克鲁斯）主任。他目前已经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的社会学、经济学、环境问题研究的教席上退休了。

ISBN 7-305-03994-2



9 787305 039942 >

ISBN 7-305-03994-2/B·303

定价：40.00元



当代学术镜译丛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任天石

# 自然的理由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原著 【美】詹姆斯·奥康纳

翻译 唐正东 臧佩洪

南京大学出版社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Copyright © The Guilford Press 1997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terson Marsh Lt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书:10-2002-150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 (美)奥康纳著;  
唐正东,臧佩洪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ISBN 7-305-03994-2

I. 自... II. ①奥...②唐...③臧... III. 马克思  
主义-生态学-研究 IV. A811.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2488 号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自然的理由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 者 [美]詹姆斯·奥康纳

译 者 唐正东 臧佩洪

原书出版 The Guilford Press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mailto: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5 字数 438 千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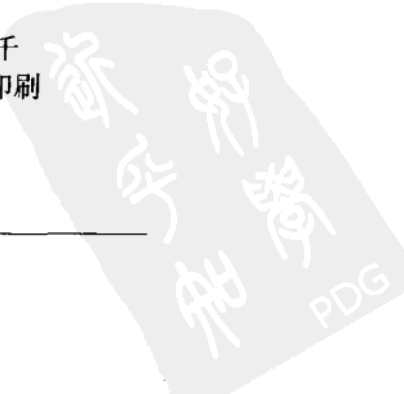
印 数 1-2000

ISBN 7-305-03994-2/B·303

定 价 40.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编委会

主 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任天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

任天石 许 钧 张一兵

张凤阳 周 宪 周晓虹

倪梁康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



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窠域外学术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



# 前 言

《自然的理由》一书由三个部分所组成。第一部分“历史与自然”，旨在对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思考方法作出阐述。我一方面试图绕开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伪科学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试图避免与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混乱观点混淆在一起。与此同时，我还试图使在这些论文中所发展出的方法，比统治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统治着（在社会科学内部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学科分工的那些方法论观点更具全面性和实践性。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与自然”，通过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及波兰尼的社会理论的视角，对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完整性”之间的矛盾作出研究。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通过危机而进行的积累以及技术、能源、空间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对资本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把自然界既当作水龙头又当作污水池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自然界是在下列意义上成为一个水龙头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以及再生产的资料 and 对象 [譬如，所有的人类物质产品] 都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从地球



上获得的。自然界在下列意义上是一个污水池：从根本上说，所有的人类产品，包括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那些不受欢迎的副产品，都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回归地球，根据熵的原理，即使是能源也不例外。）我把波兰尼有关“虚拟的”土地商品和劳动力商品的理论，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的分析之中。纵观整个第二部分，我在重点关注事物的交换价值的同时，对事物的使用价值的维度也做了重点研究，譬如，在关注工人所遭受的经济剥削的同时，也关注了工人所遭受的生物学维度上的剥削；在关注马克思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提出的、后来又由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充分阐述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经济障碍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积累所面临的外在性的自然和社会性障碍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VII 第三部分“社会主义与自然”，旨在以在第二部分中已经揭示出的资本的矛盾理论为基础，对一般层面的“新社会运动”以及具体层面的环境/生态运动作出理论上的阐述。我尤其对那些对世界经济危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矛盾，以及那些有可能造成激进的政治可能性或者说有可能造成“激进的绿色主义”的政治可能性的社会运动感兴趣。

对本书的主要前提作一个简短的说明，对读者来说也许是有益的。我一直以为，今天的这些激进的绿色（和绿色的激进）运动，可以说根源于20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根据来自69个国家的1700位科学家（包括仍然健在的196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99位科学家）在1992年发出的一份警告，“人类与自然界正处于一种冲突之中”。一方面，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中，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增加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理性的预计；另一方面，在上述同一时期内，过去的那种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性的规范形式，

在那些渴望参与新全球经济的分赃(以及使当地经济避免遭受投资冷淡、资本外逃和其他各种打击)的新自由派政府(和社区)的手里,已经部分地或者说全部地被解除了。就在国家(和社会)需要对资本作出更为严格和更为理性的规范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可生存性、社区的聚合性社会功能以及作为社会稳定性之基础的社会规范的时候——国家所具有的驾驭能力(以及社会的规范能力)却变得越来越受到威胁和失去作用。尽管很多非常重要的生态和社会问题正在以更为强有力的方式凸显出来,但过去的那些规范和约束形式已经被“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和“民主”(“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学”)所取代。总之,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在经济和地理的维度上已经变得更为复杂——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不同类型的事件对发生在其他地点的其他类型的事件的影响,变得更快和更具决定性——而政治及社会性的规范力却变得更为简单(和笨拙)了。

一种政治上的真空(我相信确实如此)已经在各种类型的人民党主义(左的、右的、中间的、种族主义的等等)以及地方主义的政治观点蜂拥而至的地方出现了。所有能够被想出来的地方管理模式及行为模式,都被用来应付各种类型的社会生态性和生态社会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有的是地区性的、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国际性的——有些则是系统性的。当然,在这种真空中也已经出现了新型的激进的绿色和绿色的激进的政治观点,正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政治观点对全球资本/新自由主义以及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地方主义都作了批判。这是一条很好的消息。

前面提到的那种基本矛盾(如果它确实如此的话)的出现,源自于20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时间中所发生的三种主要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变化。



第一种变化是在 20 世纪的前四分之三的时间内所出现的那些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的失败：首先是西方国家的阶级和解、社会民主以及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削弱；其次是东方国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巨大推动下）的变化；再次是南部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所发展起来的那些半自给自足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管理体系的瓦解与消亡。

第二种重要的变化与上述第一种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它就是资本的地区化和全球化，以及作为资本在政治/意识形态维度上的孪生兄弟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轮廓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它们对人类社会、社区以及自然界的健康发展所起的消极作用，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数以千万计的人所认识到）。这些轮廓（或者说方面）包括：地区性及全球性的市场对国家经济资源的不公平配置；这些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于出口（和进口）；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工业的私人化以及失范化；受全球资本控制或强有力影响的国际性机构对民族—国家权力的局部性霸占；各种类型的不平等的不断加大以及社会的边缘化现象。

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三种“古典性”管理体系的瓦解，以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再加上各种类型的环境/生态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成倍增加，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第三种、同时（从地球的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结构性变化的基础。这种变化就是众所周知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环境和生态运动——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向那些至今尚被贬低或被忽视的生活领域的扩展（为绿色地带、生态多样性、有毒废弃物的清除等等而进行的斗争）。

总之，上述这些具有辩证性的发展过程，已经削弱了民族

资本主义的利益以及具体国家的劳动力水平。它们加快了一种国际性的统治阶级的发展以及催生出了一一种国际性的政治精英及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它们成倍地增加了全球性的社会和环境/生态问题,同时也促进了一种新的劳动力的国际化,以及环境主义和生态学、女权主义、城市运动和(最后一个,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人权运动的发展(与其他类型的运动组合在一起)。它们使那些曾经能够有效地进行社会和环境/生态管理的民族国家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和部分地丧失反抗的能力,而此时,对于地球这个星球以及居住在上面的人们来说,更为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希望不是最不重要的),它们导致了一些有关社会及社会变化的新的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以及一些新的社会物质性实践活动,生态学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 目 录

前 言	1
-----	---

导 言	1
-----	---

第一部分 历史与自然	31
------------	----

第一章 文化、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48
--------------------	----

- 导言 48
- 生产力、生产关系 59
- 协作 64
- 协作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 66
- 文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68
- 自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73
- 自然、社会劳动、文化 77

第二章 什么是环境史以及环境史何以存在?	81
----------------------	----

- 导言 81
- 什么是环境史? 87



- 历史的历史性 95
- 不平衡的及联合的发展 103
- 结论 110

### 第三章 审视蒙特利湾的生态史及文化景观的三种方法 119

- 导论 119
- 自然造就文化? 120
- 文化造就自然? 126
- 作为中介的资本与阶级 130
- 地区性的历史与政治思想中的异常性 133
- 自然与资本的逻辑 141
- 结论 148

### 第四章 弗尔河流域(加州, 弗尔顿)建筑物的特点以及对自然界的建构情况(1860年~1990年): 一个手稿 158

- 导论 158
- 历史背景 159
- 进入弗尔河的入口处 161
- 劳动过程 162
- 对河流的修复 166
- 石灰和木材的生态影响 168
- 阐释 171

### 第五章 两个城市的故事: 芝加哥和洛杉矶 173

- 芝加哥 173
- 洛杉矶 187

<b>第二部分</b>	<b>资本主义与自然</b>	<b>193</b>
<b>第六章</b>	<b>对“生态危机”的一些考察</b>	<b>214</b>
<b>第七章</b>	<b>生产的条件与条件的生产</b>	<b>229</b>
	● 导言	229
	● 生产条件与国家	235
	● 生产条件与市民社会	243
<b>第八章</b>	<b>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b>	<b>253</b>
	● 导言	253
	● 两种类型的危机理论	257
	●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阐释	260
	●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作为危机依赖性制度的资本主义及其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的阐释	262
	● 走向一种对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释	264
	● 走向对充满危机的、具有危机依赖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向社会主义转型的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释	268
	● 有关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的附录	282
<b>第九章</b>	<b>资本主义积累与经济和生态的危机</b>	<b>285</b>
	● 资本主义积累	285
	● 资本主义积累与生态危机	289
	● 经济的及生态的危机	292

● 结论	295
<b>第十章 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与生态危机</b>	<b>300</b>
● 导言	300
● 不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	301
● 不平衡发展与污染	306
● 不平衡发展与资源的耗尽/衰竭	308
● 联合的发展：污染与资源的衰竭	315
● 结论	317
<b>第十一章 技术与生态学</b>	<b>320</b>
<b>第十二章 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 对海湾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b>	<b>338</b>
<b>第十三章 英国在谢德兰群岛的统治</b>	<b>362</b>
<b>第十四章 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b>	<b>374</b>
● 导论	374
● 环境政策及可持续性话语	378
● 需求危机：扩张与消费	382
● 成本危机：生产条件	387
● 应对成本危机	393
● 一轮普遍经济萧条的生态效应	395
● 南部国家的条件	397
● 政治可能性	399
<b>第三部分 社会主义与自然</b>	<b>405</b>



<b>第十五章</b>	<b>社会主义与生态学</b>	<b>422</b>
<b>第十六章</b>	<b>一种激进的绿色政治学存在于美国吗?</b>	<b>442</b>
<b>第十七章</b>	<b>平地政治学</b>	<b>467</b>
<b>第十八章</b>	<b>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b>	<b>474</b>
	<b>走向一种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b>	
<b>第十九章</b>	<b>生态运动与国家</b>	<b>485</b>
<b>第二十章</b>	<b>新全球化经济以及一种替代性方案</b>	<b>493</b>
<b>第二十一章</b>	<b>什么是生态学社会主义?</b>	<b>514</b>
	● 导论	<b>514</b>
	● 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交换价值/抽象劳动	<b>517</b>
	● 定量斗争/定性斗争	<b>521</b>
	● 什么是生态学社会主义?	<b>525</b>
	● 附录一 传统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 比较和对照	<b>531</b>
	● 附录二 生态学社会主义与生产性正义	<b>535</b>
		<b>539</b>
<b>索引</b>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美)奥唐纳著 唐正东 臧佩洪译

丛书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页数=567

SS号=11048131

出版日期=2003年01月第1版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尺寸=20cm

原书定价=40.00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格式=(美)詹姆斯·奥唐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内容提要=本书阐述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问题上的思考方法,“新社会运动”以及具体层面的环境/生态运动,当今资本主义与自然和社会世界之间的矛盾等问题。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前言

导言

## 第一部分 历史与自然

### 第一章 文化、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导言

生产力、生产关系

协作

协作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

文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自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自然、社会劳动、文化

### 第二章 什么是环境史以及环境史何以存在？

导言

什么是环境史？

历史的历史性

不平衡的及联合的发展

结论

### 第三章 审视蒙特利湾的生态史及文化景观的三种方法

导论

自然造就文化？

文化造就自然？

作为中介的资本与阶级

地区性的历史与政治思想中的异常性

自然与资本的逻辑

结论

### 第四章 弗尔河流域(加州、弗尔顿)建筑物的特点以及对自然界的建筑情况(1860 ~ 1990年)：一个手稿

导论

历史背景

进入弗尔河的入口处

劳动过程

对河流的修复

石灰和木材的生态影响

阐释

### 第五章 两个城市的故事：芝加哥和洛杉矶

芝加哥

洛杉矶

## 第二部分 资本主义与自然

### 第六章 对“生态危机”的一些考察

### 第七章 生产的条件与条件的生产

导言

生产条件与国家

生产条件与市民社会

### 第八章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导言

两种类型的危机理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阐释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作为危机依赖性制度的资本主义及其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的阐释

走向一种对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释

走向对充满危机的、具有危机依赖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向社会主义转型的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释

有关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的附录

### 第九章 资本主义积累与经济和生态的危机

资本主义积累

资本主义积累与生态危机

经济的及生态的危机

结论

### 第十章 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与生态危机

导言

不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

不平衡发展与污染

不平衡发展与资源的耗尽 / 衰竭

联合的发展：污染与资源的衰竭

结论

第十一章 技术与生态学

第十二章 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对海湾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十三章 英国在谢德兰群岛的统治

第十四章 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

导论

环境政策及可持续性话语

需求危机：扩张与消费

成本危机：生产条件

应对成本危机

一轮普遍经济萧条的生态效应

南部国家的条件

政治可能性

第三部分 社会主义与自然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与生态学

第十六章 一种激进的绿色政治学存在于美国吗？

第十七章 平地政治学

第十八章 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走向一种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

第十九章 生态运动与国家

第二十章 新全球化经济以及一种替代性方案

第二十一章 什么是生态社会主义？

导论

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交换价值/抽象劳动

定量斗争/定性斗争

什么是生态学社会主义？

附录一 传统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比较和对照

附录二 生态学社会主义与生产性正义

索引

附录页



# 导 言

1 何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生态的或者其他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在今日还有何用武之处？我的回答，如果套用黑格尔的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那就是，“密纳发的猫头鹰”“在天亮的时候却折起了它的翅膀”。这就是说，当世界经济真正凸显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那种模式（不仅仅是这种模式）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却被当作一种有致命缺陷的理论、一次失败的思想努力、一种类似于前苏联的那种并非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那样的东西而遭到拒斥。这是一个婴儿与洗澡水的陈旧话题，就好比因为一些教皇给恶毒和残忍的宗教法庭授予了圣权，来反对他们所指认的天主教會的敌人，就对基督教进行全面的拒斥一样（至于拒斥有组织的宗教则还涉及其他原因）。在思想开放的怀疑论者认可存在（或能够存在）一种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可信度首先应该被建立起来。

与自二战以来的其他任何时期相比,这项基础性的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更容易得到完成。尽管资本流通(尤其是生产性流通和金融)的全球化以及通信领域内的革命不仅在人类行为,而且在商业领域内,创造出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所难以想像的可能性,但事实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轮廓几乎都可以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所凸显出来的理论视域中被解读出来(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来说,情况就不是如此了,这本书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来说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但不具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来说,情况就不是如此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之处在于对阶级斗争的概念和事实的指认,其首要和主要的含义是指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劳动强加在工人阶级身上。全球劳工的生活水平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近一二个世纪内,这种劳动者与国家之间的争斗对劳工来说是很难获胜的,这是当今所有的身份政治学和地缘政治学都无法掩盖的一个事实。同时,全民福利国家(不管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正受到抨击,这也不再是什么秘密。今天,过度资本主义化的世界经济和被马克思称之为通过危机来完成的全球资本积累,已经使资本对劳动者的压榨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统治阶级来说,成了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劳动者至今尚未找到一种有效的反击方法,这说明,劳动者用来抵制全球资本权力(和诸如跨国银行、跨国公司这样的资本组织形式)的、有效的组织形式、策略和方法还没有被找到和付诸实施。如果马克思在世的话,他肯定会预言,总有一天,世界性的工人以及一定的社会阶级结构会被建构出来用以解决上述这种状况。目前正渐成气候的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其他一些由美国(一个至今仍在环境、妇女、教

育、福利、住房和城市服务领域制造麻烦的世界性国家)所操纵的全球资本机构的国际范围内的抵抗,可以被看成是这方面的一些早期例证。

这样说并不是想弱化摆在劳工和其他普通民众阶层面前的种种困难,这种困难是很大的,并且有时表现得很明显,有时却显得较为微妙和琐碎。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中,这种困难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得到了揭示。对于想构建组织化、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整体的劳动者来说,第一个困难是贫富两极的极端分化;第二个是越来越复杂化和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农民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全球性的储备劳动力的急增,也是这种困难之一。另外,资本的集中化和集约化速度的加快,国际帝国主义(新重商主义)之间的竞争的复活,金融资本不断增加的霸权和金融投机的公开化也都属于这一类的困难。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与资本之间的深刻矛盾除了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外,更多地表现在日趋多重化和交叉化的财政金融危机和政治文化危机上。当然,也像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确也有一套强有力的且行之有效的经济机制,使全球范围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正在不断地降低。

与其他人相比,那些意识到上述复杂事态的人对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姻持更多的怀疑态度。直到今日,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除了被看成是两个相对的或相互拒斥的概念之外,还很少被有机地联系起来。一位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说,“生态学者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而马克思……不喜欢自然界”<sup>1</sup>。其他批评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态学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及其审视角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样的指控是欠公平的。事实上,马克思在关于社会的观点

中包含有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方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学的理性生产为直接基础的思想。当然,马克思的观点中的确不包含把自然界不仅指认为生产力,而且指认为终极目的的所谓生态社会的思想。有人说,马克思的思想中缺乏对自然界之相联性、差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关注,这种指控也只是对了一半。一方面,马克思十分关注把总体上的劳动力生产过程和具体的商品生产过程统一起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生态规则性”的过程;另一方面,他对当时的一些重要的生态问题,如农业中土地的质量和数量问题(J·利比格对此作过著名的调查)的讨论也十分感兴趣。当然,这里也必须承认,马克思感兴趣的3 主要是生态理性农业的条件,譬如说,怎样增加土地的肥力,以恢复和增加农业生产力以面对由不断加快的都市化进程而带来的对食品和工业原材料的急剧扩大的需求。

绿党中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宣称,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连下面这种明显的事实都敢否定,即自然界(与人类劳动结合在一起)是物质财富之源。马克思会说,自然界(与劳动一起)只是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来源。不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来源。资本家只把自然界视为“自由商品”而不充分估量它对人类的慷慨赠予。这一简单的事实足以证明,在资本主义的实践中,自然界并没有被当成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生产力来看待。

我们的批评家可能会补充道:难道马克思没有对马尔萨斯以及自然稀缺性理论进行猛烈的攻击,并且对曾奉劝恩格斯根据能量的流变和转型来重构价值理论的普多林斯基的观点视而不见吗?<sup>2</sup> 难道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把“生产



力”的发展(这些同样是能置地球于死命的力量)视为其历史观理论的核心和突出内容吗?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视域聚焦在科学技术的不竭力量上,这不过是对资本着迷于生产和生产率的持续扩张这一事实的客观反映。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无疑没能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作出系统性的质询(譬如,根据其对个人和社会的真实用途对它们进行评判)。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生产力是能够把人类从自然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潜在力量,而自然界,在他看来,既促进又束缚了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更进一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难道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称为“第一矛盾”),而非建立在资本积累的外在限制,如工人和社区居民的健康和福利,有限的资源以及空间的局限性的基础之上的吗?后面这些因素不管是否是由资本对“生产条件”的无视所造成的,它们都客观存在着。根据迈克尔·雷德克里夫特的说法,对马克思来说,是财产关系和法律契约而非资源的可获得状况,影响着潜在资源的彻底利用问题(在本书的第8章中我们将还会讨论到这一观点)<sup>3</sup>。

对马克思的进一步攻击在延续着:尽管我们可以承认,马克思的确认为自然界是可以由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得到彻底改变的,但他预料到了在20世纪后期,这种“第二自然”将越来越统治人类的旨趣吗?没有。前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难道不是把工业化放在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而把环境保护置放在一个极其次要的位置上的吗?前苏联的统治意识形态的确曾把生态是“经济规划的基础”<sup>4</sup>的观点宣扬了20年,但这无非是言过其实的作秀而已。对土地的挚爱,地球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以及南部国家的土著居民和农民的生计问题,

<sup>4</sup> 这些政治生态学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

践中难道不是被遗忘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是，绝对是。其实，正像我们将看到的一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尽管的确存在着上述所论及的以及其他的一些理论空场，但在他们的视域中，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无疑是处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之中的；他们认知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意识到了建构一种能够清楚地阐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关系的理论的必要性；至少可以说，他们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

本书的第一部分，即“历史与自然”，论述的就是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或者说人类系统和自然界系统之间的辩证关系。我提出的是一种源自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解释观，我把它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与此同时，我还就如何通过指认自然和文化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使上述这种历史的传统解读模式得到加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部分中剩下的内容则是谈论环境史的。我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对环境史这一学科本身进行研究，同时也涉及对我所生活和工作的地区以及芝加哥和洛杉矶这两座城市（当然是以一种简短和派生的形式）的生态/环境史的研究。通过这些篇章的内容，我试图凸显出的是提出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的愿望，在当今激进的生态政治氛围中，这套方法不仅在理论上将很快被证明为（或多或少）具有正确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将是切实可行的。

正像我们将在第一章中看到的一样，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缺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尽管与前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唯心主义观点相比，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其在“唯物”维度上的两面性，或者说，由于它坚持认为“经验现实”是模棱两可的，并努力凸显社会关系与物质—技术关

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成功地论证了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自然界遭遇着不同的社会性建构,但是,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作为一种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该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者被置于边缘的地位(尽管这不是就马克思来说的,因为马克思的确曾清晰地论证过独立于人的自然过程对人类的生产活动起影响作用)。

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中,社会化了的人类物质生活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是以“人化自然”或创造一个“第二自然”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界的形态。“人类……只能是以改变自然物质之形式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劳动过程。”<sup>5</sup>这方面的明显例证有都市化、农业和林业的商业化以及温室气体效应等。而生态帝国主义现象以及欧洲的作物种类在世界范围内的无休止传播同样是对上述观点的一种例证。<sup>6</sup>其次,社会化了的人类物质生活通过“把人类加以自然化”而改变人类自身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人类变得习惯于在不断开拓和发展新的物质财富形式的名义下以自然规律的主人自居。“自然界的祛魅”,这种科学观念的所谓新的流行样式,就是上述这一点的最好例子。<sup>7</sup>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社会劳动在人类历史与自然界历史之间起着调节的作用。在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劳动是一种物质性的临界面。按照特殊功能或工作之间的分工,包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劳动被有效地加以组织起来。社会劳动有客观和主观两

种功能：组织起来（以及象征性地起调节作用）的社会劳动创造了一个我们由以生活和工作的客观世界；同时，它还有助于我们建构自己的主观意识世界，并以此来对新的和不同种类的人类物质活动的发展可能性产生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事实上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它的目的或目标，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知识水准。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这种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在生态学家那里或多或少地被遗忘了。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对生态科学抱有太大的理论关注，也没能认真对待显然是在不断兴起的全球生态敏感性问题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资本主义的运行周期以及对劳动的剥削问题被置放在了一个远远高于有机体的生命周期、能源的使用周期和自然界的开发方式的位置上。现在要问，仅仅用“生态科学”来取代人类通过社会劳动使自己自然化这样一种古典意义上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就可以真的被拯救了？应该说，生态科学的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性斗争的事实，已经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革新与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关键的问题是：自然界在这一理论中到底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才是合适的？我们应当把理查德·利沃汀（Richard Lewontin）和理查德·利维斯（Richard Levins）所说的自然系统中的“弱决定力量”向自然史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地带推进到多远？是否可以说，“只要人类存在着，自然界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之间始终处在一种相互决定的关系之中？”<sup>8</sup>或者，我们能否进一步说，自然界的历史是自然界的开发利用史和人类的阶级斗争史之间的一条纽带？这话如果反过来说是否也能成立？从目前关于

人类社会历史变迁中生态因素的重要性问题的研究资料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与恩格斯的技术决定论相异,但并不悖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sup>9</sup>。

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安娜·布拉姆维尔(Anna Bramwell)已经不再试图论证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与生态学家在人与自然界关系问题的观点之间具有思想的同质性,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类放在了一个太主动的和重要的位置上,而把自然界放在了一个太消极和被动的位<sup>6</sup>置上。<sup>10</sup>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19世纪的其他思想家)那里,自然界的所谓规律根本没有他们一般所理解的“规则”的含义。从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来看,自然界的所谓机遇性不仅**看起来**像是被统治性,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了一种“被统治性”<sup>11</sup>。科学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原则方面的不确定性和或然性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人类的物质活动在改变自然界的同时也使自然界的发展本身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sup>12</sup>

在人类的物质生活,以及人类的历史和人类意识的进步史中,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始终是一个能动的伙伴。生态科学和人们的生态意识的兴起与发展,就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由人类自身所推动的自然界的变化,反过来会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及其界限。森林的持续性、土壤形成的周期、特定种类人口的增长模式以及气候的变化,都是自然界之“弱规律性”,或者说自然界的无规律性、相对性和绝对自主性的明显例子。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确需要将自己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去,因为,自然界,不管是“第一”自然还是“第二”自然的历史,都将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反之亦然,这取决于具体的时代和环境的因素。在理解这一点时,我们

应当避免陷入经常与上述观点纠缠在一起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决定主义以及种族主义关于社会与政治变迁的解释模式。正像许多生态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说的,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其历史过程的无终点性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以盖然性为基础的“前趋性”。

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还需将内涵向内延伸,因为,人类在生物学维度上的变化以及社会化了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所调节和建构<sup>13</sup>,都将对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产生影响,正像它们在其他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影响力一样,这当然也是依赖于不同的时代和环境背景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样应努力避免陷入经常与上述决定论观点纠缠在一起的、在社会变化问题上的生物学决定主义和性别主义的解释模式。譬如,一方面,正像地中海流域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一样,气候的变化(不管是否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都制约着人类与自然界的<sup>14</sup>历史发展,可另一方面,语言的语法(以及人类的思维方式)却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漫长的成熟过程影响了社会组织<sup>15</sup>的范围与限度,等等。老年人以不同于青年人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达地县(美国佛罗里达州)与墨西哥城在自然和人文景观方面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这两个城市人口的不同年龄结构来解释。

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这两种理论之间仅仅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sup>15</sup>帕加罗河流域(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鲁斯县)荒废了的苹果园内正在出现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界言说自己的最好例证。在那里,本地的果种几乎彻底地排挤了所有的引进果种,在今天的开发商面前呈现出了一幅“原初自然界”的状况。<sup>16</sup>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要对这类事实感兴趣。而生态学家们对下列事实也应该加以关注:在弗尔河



(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弗尔顿)地区,红木、道格拉斯冷杉、月桂树、野生长春花属植物以及其他的树木和植物种类居然生长在一起,这种情况如果不从在19世纪的时候为了开发弗尔河流域的森林和石灰资源而在该地区大量引进雇佣工人以及相关的技术所产生的影响的角度来加以考虑,显然是无法加以解释的。<sup>17</sup>这些客观的事实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到底需要向生物学领域和客观自然界领域延伸到何种程度,这些似乎只是一些经验性的问题。要想真正克服和超越(扬弃)存在于历史理论和地理/生物学理论或假设之间的二元论现象,就必须对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性的历史和自然分析。这一类型的研究工作至今尚处在起步阶段,这本身就说明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少关心自然界,而大多数的生态学家和地理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更少关注。<sup>18</sup>

即使是对历史与自然界之间辩证关系的最好的阐释理论(它们中的大多数还有待写出来),也无力回答这样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自然界,如果可能的话,到底将变成什么样子?<sup>19</sup>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劳动将变成什么样子?换一个角度来说,自然界有可能成为什么样子?它是什么?它正在变成什么?人类有可能把它变成什么样子?在人类曾经建构起来可随后又荒废了的生态系统中,常春藤和长春花最初是由一些寂寞之士为了使地球的一些荒角变得文明起来而引入的,可后来它们却无休止地蔓延开来,还把一些当地的植物种类排挤了出去。现在要问,这些常春藤和长春花是否应该全部清除掉?是加以铲除还是加以控制?或者不管它,随它去?这虽然是个很小的例子,但它的清晰明了性足以比那些复杂得多的例子更能说明上述那个规范性的问题。就人类为了提高社会生产率而已经建构起来的

劳动过程而言,那些特定的生产技术和专门化劳动的形式,明摆着是既损害自然环境,又对劳动者本身及其所属的社区的发展构成破坏作用的,那么,这些东西应该不应该被“根除”?是彻底消除还是加以控制,或者随它去?无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凸显了上述那个规范性问题的重要性,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的。

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学之间的最重要的差异,显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前者信奉科学而后者不信奉科学。也不能说,与马克思主义相比,生态学对自然界格外地偏爱,或者说它对自然界应该成为什么这一问题的基本判断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应该说,上述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源自于对人类社会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很多生态学家认为,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是一种道德性的行为,它直接跟人类这一社群的生存紧密相关。一些政治生态学家把他们在自然系统中所“觅得”的所谓平等主义的合作范式界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范式是应有式的,或者说是一种把合乎需要的历史性范畴投射到自然界中去的理论努力,以此来抵御把像“竞争”这样的令人讨厌的范畴强加给自然界的8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他们自身的立场出发,似乎很满足于揭示自然界之“规律”的科学性的理论努力,并通过使用这种规律来不断推进人类自身的发展。当然,由于人类自身的发展无疑既依赖于生活本身的差异性和丰富多彩性,同时又对后者抱有一种欣赏的心境,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倒真的有可能变成“生态学的”。

本书的第二部分(“资本主义与自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与生态学的政治经济学维度(有时也兼顾其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维度)相关的核心问题进行了阐述。我

的论述重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财产关系、竞争、世界市场等等)降低或破坏包括环境在内的生产条件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中介环节:技术、矿物燃料能源、工作关系、资本自我扩张的机制以及国家。我将在这一部分中从颇为流行的危机理论的角度,对这些中介环节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另外,我还将从不平衡和联合发展的主题入手,对资本在空间维度上的表征进行研究,尤其将关注石油这种已经统治资本主义世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商品的政治维度(包括战争政治维度)的内容。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中,围绕着“资本主义能否持续发展下去”的问题所展开的一些争论将被汇总到一起。

很少有人会否认,在过去的200年间,北部国家(原来意义上的“第一世界”)已经享受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财富增长。可另一方面,大多数人想必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上述两个世纪中的这种增长已经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普遍减少以及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sup>20</sup>而南部国家(原来意义上的“第三世界”)无疑是这种穆斯塔法·托尔帕(Mustafa Tolba,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执行主任)所说的“全球性种族屠杀”的最大牺牲者,这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北部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它们的一些南部盟国进行生态掠夺的最终后果。<sup>21</sup>资本使北部国家战胜了贫穷,可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环境质量的下降,从这一角度来看,北部国家的经济、财富增长显然是一种矛盾性的事实。北部国家的高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全球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衰竭、可再生性资源的减少以及对全球民众生存权利的掠夺。

自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北部国家的财富增长导致了全球性的自然资源贫困以及南部国家(也包括北部的一些“内部殖民地”)的贫穷。在英国这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源

地,棉纺织业曾在制造业中占有绝对的比重。兰开郡,作为当时的纺织中心,也是一个重要的采煤区。1750年至1830年间,兰开郡的煤产量从3万5千吨一跃至40万吨(在英国煤产量中的比例从7%一跃至13%),这些煤主要用来满足新兴的机械化纺织厂、运河的挖掘、运河驳船的运行以及采煤业中的开采机的运作等不断扩大的能量需求。

在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于1769年给他的著名的蒸汽机申请专利之前,在现实中广泛使用的引擎是一种叫纽考门的发动机。这种发动机以无烟煤为燃料并且基本上能完全燃烧,所以相对较为干净。但是,这种发动机在技术上有缺陷,其燃烧过程对引擎的内部结构造成了损害。瓦特对这种纽考门发动机进行了改进,他首先把蒸汽机压缩在一个单独的机腔内,然后用气泵把蒸汽机压进机腔。瓦特的这种蒸汽机用一种便宜得多的硫烟煤作燃料就可以了,但这种煤却不能完全燃烧。其结果是,发动机内部的损害问题解决了,但却带来了厉害得多的污染问题。

瓦特和他的合作伙伴马休·伯尔顿(Mathew Boulton)所建立起来的产业,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几个产业之一。瓦特的蒸汽机以及它的模仿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地销售。以前在兰开郡的纺织厂和煤矿中广泛使用的几百台发动机,现在都闲置在冒着黑烟的肮脏的地方。由煤的不完全燃烧所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硫经过氧化转化成了硫酸,这一过程在英国潮湿的气候中完成得很快。作为结果,煤烟使农业的生产力明显降低,植物的种类明显减少。而酸雨(罗伯特·斯密在1872年出版的《空气与雨》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则在总体上降低了土地的肥力。煤烟同时还会遮掩阳光的照射,从而导致佝偻病或异常性骨质生长病的流行,这些儿童疾病都是由于缺乏维生素D而引起的。

除了由瓦特蒸汽机所导致的气体与颗粒的可怕混杂外，对煤的过分开采还导致了十分严重的水污染。当时在煤矿开采方面很有名的“兰开郡方式”，就是专门用来既快又多地（当然也是最能获利地）把煤从地下开采出来的。煤层在接近地面处被开采；许多的浅煤坑凹陷着，它们在被填埋之后就被废弃了。从煤矿中流出的污水，含有酸性物质、微颗粒、铁、含铁化合物以及对动植物都具有极强毒性的重金属浓缩物，它们对附近的河流和小溪都构成了污染。鱼的数量减少了十分之一，这虽然增加了（河流中的）植物量，却减少了其他生命体所需的氧气。瓦特的蒸汽机在经济领域中是一种胜利，可对生态领域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sup>22</sup>

煤和蒸汽机尽管极大地促进了英国（以及后来的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北部国家的工业却对环境和人们的物质和生活条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1760年以后，对外贸易成为英国工业增长的推动力量，而棉纺织品贸易在整个对外贸易中又起着推动的作用。在奴隶贸易废除以前，棉产品被用来与非洲的奴隶相交换，然后，这些奴隶被强迫出口到新大陆，去为英国和欧洲生产蔗糖、咖啡、烟草和其他的消费品（包括毒品），兰开郡的工厂所需要的原棉也是在那儿生产的。这种状况的结果是，在非洲和作为原材料供应地的新大陆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生态和人类悲剧。

在18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新英格兰和东部的谷物农场主担负着给城市居民提供粮食的使命，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他们经常滥用土地。到1850年的时候，那里的土地质量已经非常差，以至于农场主们甚至无法给他们的邻居，即“边界”地带的居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郊区的居民提供粮食。于是，早期的郊区居民不得不在他们上班的城里购买食物。

这使得城市的功能延伸到了农产品交易的层面。同时,新的城市也不断从杂砖乱石中拔地而起,譬如纽约城,就是从威切斯特县的一些采石场和售砖场中建造出来的。这种状况的结果是,空气中的一些有毒物质通过露水、雨水和雾对整个哈得逊河流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它们使树叶凋零、未成熟的水果早落、树木死亡。谷物、蔬菜和森林也同样遭殃<sup>23</sup>。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城市居民的生活是以牺牲自然界为代价的,他们直接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恶化。郊区的居民事实上也无法脱离干系,尽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一直想远离城市,想回归更为自然的外部环境中去。 10

上述这类事情其实是随处可见的。它们是对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或者说,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的一种说明。

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我扩张系统,其目的是无限增长,或者说钱滚钱。利润既是资本进行扩张的手段,又是其扩张的目的。每一个资本主义的机构和每一种资本主义的文化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赚钱和资本积累。经济增长还被指认为社会问题的重要的解决方法,它能消除贫困、失业、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分配等。由于新增的税收收入来自于资本的积累本身,因此,很少有政治家会反对资本的自我扩张。那些不致力于发展的公司会遭到银行家、证券市场以及竞争对手的严厉惩罚。而那些不愿或者不能够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而不断改变技能和居住地的工人则必然会掉队,按最好的说,会失业,按最差的说,则会无家可归,甚至被送进监狱。

另一方面,自然界却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森林资源已经处在其顶点的状态;淡水资源受到地理和气候条件的限制;矿物燃料和矿石的储量是由自然法则所决定的。自然界



虽说在限制人类生产的同时,对人类来说远不是吝啬的,它的确给人类生产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但是,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却是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的。

上述这些陈述的寓意以及它们试图凸显的基本理论观点是:如果对过去的两个世纪能够作出理性和民主的生态和经济规划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资本主义说不定就根本不存在了。当然,在1750年、1850年和1950年,这样的规划在政治上都是无法想像的,即使是在1990年代,它在政治上也是难以置信的,但它无疑有可能把经济发展的轨道推进到理性的生态学方向。

上述这些陈述的另一个寓意是:我们的先辈留给我们的是一笔模糊的遗产。一方面,我们中的有些人生活在工业高度发达、商品极度丰裕的国家,可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被贬损了的自然界,拥挤的城市以及处处感到孤独、异化和被剥削的人群。我们的先辈跟魔鬼订下了契约,我们现在正在吞下这些契约的恶果,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变的话,那么,我们的后代将遭遇更糟糕的命运。一旦立足于这一视角来观察问题,那么,问题的关键便成了“我们想要与亿万未出生的、他们在当今的市场以及政府的委员会中还没来得及捞到发言机会的人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可能会说,“确保他们不被生出来”。而对于一个生态学社会主义者来说,其回答的关键显然是,确保那些已经生出来的人不沦落为物质上和环境上的贫穷者。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并进而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所承受的一切后果,既有已经过去的人的行为所造成的,也有还活着的人的行为所造成的,至少是由部分活着的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是人在决定着投资和技术的优先性、资本的流动、国际性的借贷和政府的预算政策。这样,

问题便成了我们试图与工业至上论者、商人、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主管、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家的高级决策层之间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说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对方法的探求”，而第二部分是对这种方法的阐述以及把它运用到对资本主义和自然界之关系问题的分析中去，那么，本书的第三部分则是另一种探求和运用：对存在于生态及相关运动中的激进倾向的探求及评估，以及把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运用到对上述这些运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分析中去。绿色和平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曾对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问题进行过探讨，在这一部分的一开始，我首先对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方法进行了审视。然后，我对美国环境运动（当然是广义地）中存在的一些在我看来是很激进的倾向或主题进行了探讨。接着，我对旧金山湾地区成功地把人类共同性与地缘政治、文化多元主义及生物地区主义结合起来的方法进行了阐述，并以此为基础对一句著名的绿色和平运动的口号，即“全球性的思考，地方性的行动”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在对新社会运动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简要的说明之后，我花了两章的篇幅来阐明传统社会主义与所谓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以此来结束本部分的内容。贯穿这一部分的核心内容是我对美国的激进绿色运动及其相关趋势的分析，附带也涉及对那些过度发展国家及南部落后国家的情况的分析。

我是以对一些客观事实的列举来开始本部分的论述的。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工作，或者在极不卫生和极不安全的场所工作，而得到的工资又少得可怜；他们生活在受到污染的和拥挤的城市中，或者生活在缺乏耕地、饮用水、燃料和饲料的穷乡僻壤；他们遭受着各种各样的压迫和剥

削。经济和生态的灾难在南部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资源”在那些显得更为缺乏。导致这种状况的首要的和主要的原因在于，财产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不合理、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上的不合理以及普遍的贫穷，而这些国家中的妇女和儿童则是这些灾难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正因为如此，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已有几千万人开始批判性地看待当地的首领和官吏、地主和农场主、银行家、跨国公司以及其他权力集团的作用问题，并开始对政府的货币、税收、支出、投资、技术以及出口政策提出质疑。几万个非政府组织和无数个非正式团体在致力于追求环境和社会的正义。

在南部国家，目前已经出现了被生态经济学家贾安·马丁尼茨·艾略尔(Juan Martinez Alier)称为“穷人的生态主义”(或者“内罗德尼克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北部国家，在最近兴起的“环境的正义与受毒害”运动之前，人们更多地把环境的问题跟环境本身的舒适性联系在一起，而很少想到这还是一个人们在经济上的生存问题。一些学者根据资本把自然界既当作水龙头又当作污水池来看待的情况，勾画出了环境运动在南部国家和北部国家中的不同模式：在南部国家，环境运动的最重要的主题是资源的耗尽与衰竭(尽管在南部国家的许多城市中，城市污染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北部国家中的大多数城市)；在北部国家，环境运动的核心主题是污染的问题(虽然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北部国家的农、林、渔业以及其他的一些行业在许多方面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眼下，以前的三种国家主义发展模式(东方的国家社会主义，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南部国家的民族主义)已经被跨国资本及其代理人所摧毁，或者说正在受到其猛烈的打击，因此，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使环境运动转变成促进激进的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有人可能会把这与后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及其研究主题即“后工业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确，从“选择性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激进民主”的角度出发是可以对上述问题作出很好的阐明的。<sup>24</sup>后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再把传统的工人阶级视为历史转型的法定代表。他们不再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这只是一种幻想而已），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主义”。在“后工业社会”（北部国家）中，“新社会运动”正在为“激进的民主”而努力奋斗。

这些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值得仔细的推敲，特别是他们在后现代主义的视域中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及这些著作中所包含的政治学内涵所作的阅读更值得注意。<sup>25</sup>我在这里只想指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为马克思语境中的“生产条件”（劳动力、经济基础、自然界等等，尽管它们并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出来的，但在马克思那里却都被当作商品来看待）而进行斗争的观点得到了重新的界定，阶级斗争的观点也被扩展出了人类自我认知的理论视域——最起码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威胁，并不只是一个利润和积累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与自然环境（人类的生活资料以及人类生活本身）的可生存性问题。资本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斗争（“成本”与“效率”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是相互对立的）有两个主要的“时刻”。第一个“时刻”是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起来的保护生产条件（或者，说得更彻底一点，即人类生活资料）免受进一步毁坏（这种毁坏是由资本内在的鲁莽性及无限扩张性所引起的）的斗争。这包括降低各种风险的需求和愿望。这种斗争的实质是：到底是把“自然界”当作资本增殖的手段来利用，还是把它当作市民社会的再生产以及整个人类和其他生命体的再生产的媒介来使用。第二个“时刻”是与资本和国家在重构生产条件的过程时所实施的政策和规划的斗争，即跟生产条件

变化的形式与内容的斗争。“新社会斗争”必须应对生产条件的被损害,同时,还要应对容易导致危机的生产条件的重构问题。上述这两个斗争的“时刻”发生在国家政权之外,但也有可能发生在国家政权之内并且是反对国家政权的。譬如,要求实现激进式民主,其实就是要求在生产条件的供给与重  
 13 构过程中实行民主化,这在最终的意义上其实就是要求国家的民主化,或者要求对社会劳动的分工进行管理<sup>26</sup>。

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地点的特定性”、个人身体的“有机性”、一块独特的草地或一个独特的物种、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的位置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关注。正像卡罗·卡伯尼(Carlo Carboni)所说的,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新社会因素都在推动着特殊性的挑战。这是由资本和国家所履行的政策、计划及其他东西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在生产条件的转型过程中把人们有效地整合起来。这种特定性(差异性)一方面体现了集体和阶级之间的固有联系的断裂,另一方面,它是对社会整体性中的那些新型的微观网络和以社会公民为基础的那种有机整体性中的普遍性联系的揭示。”<sup>27</sup>

“差异性”一词已经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魔性概念,它被认为是用来驱逐“整体性”概念的。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整体性”是“极权主义者”的代名词。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深思熟虑中,作为新社会运动之思想基础的“地点的特定性”被指认为使任何形式的普遍性要求都成为不可能,<sup>28</sup>或者说,至少使游离于对“地点的特定性”的普遍认同感

之外的任何普遍性的政治要求都成为不可能。这不仅与资产阶级革命所倡导的反对特权的普遍性权利观点相对立,而且也跟传统的工人阶级革命所追求的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来对抗财产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普遍性要求相对立的。当然,通过我们在本书中关于生产条件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新社会运动中的确也潜藏着一种普遍性的政治要求,具体地说就是国家、家庭和社区的民主化要求。事实上,对于致力于捍卫特定地点的自足性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来说,除非其努力的目标是民主化国家的建立,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大众化官僚政治”的建立,与此同时还能把工人运动有效地统一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协作性劳动观念的基础之上,这种观念使我们能把社会劳动的统一性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否则的话,上述这些不同的社会运动要想使自己的主张普遍化,即在保持其各自的差异性的同时又能在政治上胜出对手,是绝对不可能的。<sup>29</sup>

另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自由骑手问题”、“理性选择”和“社会选择”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前提的)的影响下,提出或者说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当下为生产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与过去的那种为劳动工资、劳动时间和工作条件所进行的斗争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为,对于现在来说,生产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公共”的了,干净的空气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城市空间和教育设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这里的问题是,对于身在其中的个人来说,以反对空气污染(或资本主义式的城市重建、学校中的种族主义陋习)为目的的社会运动并不能收到直接的效益,正因为如此,正像克劳斯·奥弗所说的,大众对社会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抵触情绪与对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的愤怒所构成的恶性循环,其实是根源于不能很好地把个人和



集体的行动在个人和组织都获益的前提下有效地统一起来。有些人也许会以社会运动的过程本身已经改变了“个体性”的定义为由,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的确,工会从本质上讲只是与“自由骑手”相对立的一种机制(譬如,如果一个工人想要以低于工会所规定的工资水平来出卖他的劳动力,那他就会受到工会的惩戒和处罚);更进一步,“自由骑手”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在社会抗争的目的是抗争者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来保护所谓的“公共性”,而不是为了实现建立民主化国家这样的特定的政治(和普遍性)目标。

同样,与“公共性”问题相联但又超越于个体与组织的关系之外的,还有一个组织与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新社会运动在生产条件方面的斗争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自设视域中一般被指认为非阶级性的或者多元阶级性的。“我们的社会中客观存在着的社会转型过程不可能是阶级斗争……它只是一个非阶级性的话题。”<sup>30</sup>尤其是为生产条件(与生产过程本身相比)而进行的斗争,更容易被解读为一个非阶级性的话题,这种斗争的主体也往往把他们自己视为一个非阶级性的因素。这不仅是因为像清洁的空气、人口拥挤等问题已经跨越了阶级属性,而且是因为斗争中所呈现出来的地点的特殊性以及“人民”的特殊性,也就是说,是因为斗争的目的在于决定生产条件事实上将成为何种类型的使用价值。不过,对所有这些类型的斗争来说,事实上是存在着一种阶级性的维度的,譬如,学生在学校里课程负担过重,城市的改建变成了“穷人的迁移”,在受排挤的少数民族和穷人居住的社区的有毒废弃物的排放问题,失业者和穷人不能很方便地进入“自然保护区”等等。与那些工薪阶层和富裕人士相比,大多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问题对穷人,尤其是那些受排挤的少数民族来说尤为突出。



总而言之,凡是与生产条件相关的问题都是阶级性的问题(并且,还不仅仅是个阶级性的问题)。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问一下,谁在反对以改善生产条件为目的的公众斗争?答案显然是资本,是它在极力抵制普遍的公众健康计划、使人获得解放的教育、为保护自然而控制投资、在儿童保护方面的足够的资金支持,以及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计划和组织方面的自主性或实质参与性的愿望。资本本身到底支持什么样的新社会运动及理论要求?即使有的话,那也是非常少的。劳动者反对什么样的新社会运动呢?在许多场合,他们所反对的是对男性霸权和白人霸权的意识形态构成威胁的东西,正像他们在其他场合反对对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机会构成威胁的东西一样。由此,以生产条件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斗争就不仅仅是一种阶级斗争,而且还是反抗上述这些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活动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为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及生活本身)而展开的斗争决不仅仅是一种阶级性问题的原因。如果认可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为“激进民主”所做的斗争就无疑更是一种面向国家之民主化的斗争,一种要求政府机构在生产条件的供给方面做到民主化管理的斗争。新社会运动一旦缺失了上述这种理论视域,就极有可能停留在地方性的或单一主题性的斗争水平上,而这在其试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将导致对其自身的解构。 15

最后,我想指出,本论文集在理论上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劳动者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是能够而且是必然要建立起来,或者说,不管是传统劳工运动中的经济主义,还是新社会运动中的“单一性斗争”,单凭它们自身,其实都是无法带来激烈的社会变动的。劳动者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一旦缺失,那么,“生态学的国际货币基金主义”就会将其独断性的意志强加进对全球生态、全球“都市化”以及全

球劳动力等问题的解决之中。

在我看来,所谓的“激进的绿色计划”其实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乌托邦,虽然其中的确有许多理想主义的成分有待于付诸实施。在全球范围内,有成千上万的、甚至是几百万人已经开始在不同的地方实施这项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就已经进行了(无疑还将再次进行)把红色(激进)运动与绿色运动结合起来的有益的尝试。在英国,到目前为止,劳工主义仍然在捍卫着与生态学(自然环境、都市化及其他问题)很少有关系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关系的那种白白消耗时间的行动准则,而英国的绿色运动者也仍然对工人党的主张持怀疑的态度。不过,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激进的绿色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却在不断地发展。在意大利,绿色主义的选民已经放弃了政治倾向上的居中或右倾的原则立场,同样,传统的共产主义者也已经把他们自己解构进了一种新的左倾或右倾的政治立场之中。在法国以及一些低地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红色(激进)主义者和绿色主义者被一种在外人看来是极其不可理喻的方式组合成了绿色的激进主义和激进的绿色主义的政治组织。在南部的一些国家,由于生态问题比北部的一些国家更多地与经济的复兴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在那里,左倾的生态学倾向,或者说“穷人的环境主义”主张,似乎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数以千计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以及几十个政党正在推进一些在思想渊源上既与生态学又与传统的政治左派相关的行动计划。很显然,激进的生态学正在变成一种大家都认可的、并且正为之努力工作的重要力量,大家都在捍卫着这种力量并努力使之不断发展下去。

## 注 释

1. 安纳·布拉姆维尔：《20世纪的生态学：一种历史的考察》（纽黑文，康涅狄格：耶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2. 贾安·马蒂尼茨·艾略尔：《生态经济学：能源、环境和社会》（牛津：巴塞·布莱克威尔，1987年版），第62页。“马克思并没有根据人类生态学来系统阐述能源和物质的流变问题，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上，即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人们是怎样接  
16  
纳不同的社会形式的。譬如，原始社会中的人们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条件，而资本主义阶段的人们则用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获得的工资来购买可供消费的商品。其实，只要我们对生产力或生产能力作适当的界定，在人类生存条件问题上的生态学观点是能够很容易地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当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做这项工作。尽管在生态学的理论路径与社会系统再生产之研究的理论路径之间的确存在着表面上的相似性，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已经分离了很长的时间，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用的概念中，与本书的主题较为对接的是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或者说是商品之可通约性的幻像性的揭示。这在纽拉斯（Nuerath）的例子中就是指下列事实，即我们事实上是无法在煤的使用量和劳动力的工作时间之间找到一个可通约的计量单位的。”（参见本书第5页）。同时可参见恩格斯就普多林斯基问题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1846—1895）》，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42年版，第29卷，第409—411页，第182和第183封信）。也可参见布拉姆维尔的书，第86页。

3. 迈克尔·雷德克里夫特：《发展与环境危机：在红与绿之间二者择一》（伦敦和纽约：梅休，1984年版），第7—8页。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马克思对自然资源的稀缺在利润率和经济稳定性维度上的作用的确作过理论上的思考，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将谈到这一点。

4. 格利高利·库松：《生物圈与政治》（莫斯科：前进出版社，1979年版），第2章。

5. 《资本论》第1卷（纽约：兰登书屋，现代图书馆书系，1936年版，第50页）。也可参见尼尔·史密斯：“自然界的生产”，载于《不平等发展：自然界、资本以及空间的生产》（牛津、英国，剑桥、麻省：布来

克威尔,1984年版);迈克尔·杜福特、戴安·佩隆:“自然的概念”,载于《资本竞技场》,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3年版;费茨西蒙:“自然界的事情”,载于《相对极》,第21卷(1989年),第2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伦敦,国际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5卷,第39—40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自然界本身是一种历史性的产物,其形式是由人类的劳动活动所创造的。

6. 阿尔弗雷特·克劳斯比:《生态帝国主义:欧洲在900年—1900年之间的生物种类之扩张》(剑桥、英国,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7. 约翰·德斯蒙德·贝纳:《历史中的科学》(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7年版)。

8. 马萨·普雷纳特:《生物学与马克思主义》(伦敦:劳伦斯/威夏特,1938年版),第44页。此段文字实际上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9. K·P·莫斯雷,与本书作者的个人通信,1989年6月22日。莫斯雷同时还提到了马维·哈里斯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派的文化唯物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试图对社会变迁作出生态学的分析。在这里,雷斯利·怀特的著作特别值得一提。我们只有通过对这些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的仔细、认真的分析,才能对生态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种真正的阐释,这一任务显然超越了本导言所能涉及的范围。像维纳·吉尔·卡特和汤姆·戴尔合著的《中桅帆与文明》(诺曼:奥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对文明衰落过程中的生态问题进行了分析;里查德·威尔基森的《贫困与进步:经济发展的生态学模式》(伦敦:梅休,1973年版)一书对20世纪的历史发展作出了生态学的分析,这些都属于非常值得关注的著作。

10. 安娜·布拉姆维尔编:《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威斯特普,康乃狄格州:格林伍德出版社,1977年版)。布拉姆维尔在前面注释1所标明的著作中对霍华德·帕森斯的观点曾做过批评。

11. 同上书,第33页,引自恩格斯的话。

17 12. 马丁·奥康纳:“相互依存与不确定性:对生产理论的一种批评”,载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1989年第3期。

13. 参见菲利普·艾雷斯:《童年的世纪》(纽约:那普夫,1962年版)。同时可参见卡洛林·莫迁特:《生态革命:新英格兰的自然、性别和科学》,(凯佩尔·希尔:北卡罗林那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此书试图把生态史与生产和再生产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理查德·利希曼的“通过人的本性来生产人的本性”一文(载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4期,1990年)则对人的本性的社会化自我建构特征进行了阐述。

14. 诺姆·乔姆斯基:《语言与心灵》(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1972年版)。

15. 布拉姆维尔曾批评一些随笔作家在《红色与绿色:一种新型的环境政治学》(琼·威斯顿主编,伦敦:布罗托出版社,1986年版)中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接管生态学,我以为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

16. 布汤·高顿:《蒙特利湾地区:自然历史与文化印迹》(加州:布克斯伍德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114页。

17. 巴巴拉·劳伦斯:“自然界的建构及其本质:对加利福尼亚州弗尔顿的弗尔河地区的一种历史生态学研究”,此文系作者向1989年4月在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召开的环境史协会的年会所提交的论文。

18. 聚集在《相对极》杂志周围的一个由激进的地理学家所组成的组织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外。

19. 约翰·艾利:“卢卡奇对自然概念的阐释”,载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1期,1988年秋季号,第116页。

20. 人类的许多非传染性疾病同样与人类在生活条件方面的改变有关,人体基因无法适应这种变化,而这事实上正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后果。参见托马斯·麦克考文:《人类疾病的起源》(牛津,英国/纽约:巴塞·布莱克威尔,1988年版)。

21. 引自琼·史特伍德,“联合国的可怕的环境诊断”,载于《旧金山编年史》,1990年6月6日。

22. 马休·奥斯鹏:《工业化荒地的起源: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兰卡斯特的煤的开采及使用》,未发表手稿,1990年6月11日。

23. 约翰·史梯尔高:《边界地带:美国郊区的起源(1820—1939)》(纽黑文,康乃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4页。

24. 最深刻的后马克思主义著作当属阿内斯托·拉克劳和钱托·莫弗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面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伦敦：维索，1985年版）。在美国本土，米歇尔·阿尔贝特等人所著的《理论的自由化》（波士顿：南部终点出版社，1986年版）也是一本很好的书。在由马克思主义者所转变出来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方面，鲁道夫·巴赫劳也许是个最知名的人物，他曾经写道：“我已经完成了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我完成了从阶级性维度向大众性维度的转变……阶级斗争与避免生态危机之间几乎没有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在本质上只是工业社会内部的争斗。”（米歇尔·克劳：“巴赫劳论生态学”，载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0期，1986年夏季号，第172页）。克劳评论道：“并不只是巴赫劳持这样的观点，他们所反映的事实上是环境运动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第179页）。

25. 譬如，拉克劳和莫弗就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所提出的讨论意见，实际上已经与马克思的资本和历史发展理论的内容及精神实质背道而驰了。

26. 詹姆斯·奥康纳：“美国的民主运动”，载于《资本主义国家》第7期，1978年。值得指出的，在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与社会劳动分工相关的论述，“理论家”们大多纠缠于工业活  
18 动中的分工，以及家庭中的劳动分工。理论上的这种缺席或沉默意味着后马克思主义至少在局部上是一种回流的无政府主义、人民党一无政府主义、社会共享主义或自由主义。

27. 与本书作者在1987年10月的一次交谈。

28. 这一观点以及紧接其后的一个观点是克劳斯·奥弗在与本书作者的一次交谈中提出的。

29. “此处争论的话题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具有多重的社会身份，而不是像现在通常所讲的，由于生产条件与资本的生产和赢利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因而，这些社会身份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一致性。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确具有多重身份，但就本质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就了我们在身份上的单一性。历史的狡计就在于把上述这种理论上的单一性变为现实。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斗争对资本积累来说也许是一种无意识的制约力量，而它在意识形态上却并不反对

资本主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环境保护主义者意识到他们正在使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过程变得更为社会化。后马克思主义者不想在我们所具有的相互游离的社会身份中寻找一种统一性。但是,即使为了在不同的社会运动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我们也必须去建构社会身份维度上的某种统一性。我们的斗争一旦缺乏一种共同认可的目标,或者某种共同的理解,任何形式的对话都将不可能发生。如果我们不能在斗争的条件及目标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我们何以能说新社会运动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我们首先必须为获得一种能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的共同语言而斗争。资本主义通过商品交换把劳动的社会本性抽象化了,它把我们所共同拥有的合作式劳动抽象化了,因而导致了我们在身份上的分裂。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在于无法把对社会劳动的统一性的理论阐释向前推进一步。”(大卫·皮尔乐与本书作者在1989年11月的一次交谈。)

30. 克劳斯·奥弗:“小组讨论”,载于《斯堪的那维亚政治学研究》,第10卷(1987年),第3期,第234页。



## 历史与自然

事实上,在所有的流行观念中,环境问题是  
对一种激进社会意识的界定与凸显。

——威廉姆·艾普曼·威廉姆斯

那些坚持认为环境的破坏与马克思主义无  
关的人,不过是在证明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  
与在客观现实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毫无联系。

——艾顿·弗斯特-卡特

那些在书名上标有“自然”字样的流行书  
籍,里面往往会配有不少独特的自然物的照片,  
像湖泊、不同种类的鱼以及各种动物的栖息地  
等。在这些照片或图画的旁边往往还伴有各种  
文字的注解和说明,以引起读者对这种独特之  
物的想像。照片本身当然是无法言说其自身  
的,因此,它自己是无法就它所反映的事物引发  
争论以及提出自己的观点的。一张海鸟被困于  
一大片油污之中的照片并不一定能引发一场反

对在近海进行石油开采的争论。读者从伦理和审美的角度出发,也许能从这张照片中读出悲惨与不幸,并引起他们的愤怒或者耸耸肩表示难以理喻,在这种情况下,引发一场以反对在近海进行石油开采或要求进行安全的近海石油开采为主题的讨论倒是可能的,但对其他一些读者来说,他们对这张照片也许漠不关心。换一个例子来说,假设我现在看到一张即将死去的鱼的照片,在我读到用来说明这张照片的文字之前,我是无法确定自己的感觉的,因为,假如我读到这样的文字,“这条鱼死于附近的某某化工厂排出的有毒污水”,我当然会感到愤怒,但如果我读到“这条鱼是因为年龄太老而即将死去的”,我也许会感觉无所谓。所以,照片本身是不会就它所反映的人或物发表意见的。

不管是用照片来说明文字,还是用文字来注解照片,照片和文字本身其实都在默默地但又十分迫切地渴望被认知。一张照片会对你说:“看,这是一棵非常独特的树,你会了解它的。如果你不了解它,没关系,这张照片会帮助你认识一棵具 20 体的树,只要你能看它。”当你试图描述一棵独特的树或者树的不同种类时,一张照片往往会胜过千言万语,但是,在把握自然界中的“树”这一范畴的方面,照片就无能为力了,因为,“树”这一范畴存在于人的思维中,它独立于任何具体的真实的树或树的种类。

上述这种范畴上的理解是以思维的抽象力为前提的,这种抽象预设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并不仅仅是对照片的或好或坏的替代,而是需要对之加以理解和争论的,也就是说,在它的视域中,世界并不是一个客观对象,而是一种观念。语言是以句法为基础的,因而它是评判与争论的必要工具;与此相反,照片则往往用来帮助认识过程的推进,在这方面,它比语言要强得多。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对自然的观念的论述；它并不对自然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感兴趣。它是对“树”这一范畴的阐释，而不是对在这个世界上的某某地方所存在的一些独特的树或树的不同种类的描述。这牵涉到对“资本”和“劳动”的理解问题。在第二部分中，具体的人是被当作工业资本、土地资本、劳动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因素的化身来看待的。在我们的言谈语境中，自然、资本、劳动、社会生产关系等只不过是一些符号或象征。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束缚在语言形式、艺术想像、神秘符号或宗教仪式之中，如果没有一个理论上的中介的界人，我们事实上是无法认知任何事情的”<sup>1</sup>。我们这里所使用的理论中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的语言和隐喻。这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成思想范畴的语词和隐喻，是“意义的承载者”，它们是讨论性的、争辩性的、自我否定性的。

我们（我们美国人中的大多数？）思考或想像自然的思维方式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生长过程。因此，要想理解我们关于自然的观念，就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的诞生过程。

《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根据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前后次序，列出了“自然”这一概念的各种不同含义。“自然”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语中的“**nasci**”，是“出生”的意思。该词典中列出的第一个定义是“一个事物的基本性质”或“本质”。譬如，“一场争论的本质”或者“一个人的本质”。当然，对自然概念的这种前亚里士多德式的定义，是有一种逻辑上的缺陷的。如果我们问，自然本身的本质是什么，答案仍然是“自然”，这就成了同义反复了。亚里士多德超越了这种同义反复，把自然概念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个过程的内在发展趋势”。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定义把“自然”建构成了“导致事物变化的某种内在的东西”。一个事物的“自然”就是它的“泰勒斯”（telos），是一种命运或者即将降临的东西。自然不是

事之所是,而是它将会成为什么,是一种可能性。

自然概念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定义分别是“种类”或“类型”、以及“物质世界的整体”(或规范整个世界的力量)。这些都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启蒙维度上的自然概念。它们有多种表达方式,如“什么东西存在着”、“存在着的所有事物”、“客观事物的整体”,以及“物质世界自身”等。在这种维度上,自然是一种事物的集合体,它是一种像商品一样可以被拆分,同时又能以新的形式加以组合的东西。在欧洲社会自15世纪至18世纪的向工业资本主义的漫长转型过程中,对自然的这种定义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自然”越来越被解读为一个被动的、惰性的概念,它仅仅是“事物的堆积”,“自然”被经验主义化了。在这种解读视域的极端处,“自然”成了一件“事物”或一台“机器”。雷奥纳多·达·维西认为,只要对鸟的翅膀作简单的机械式复制,他就能制造出一台飞行器。哥白尼的宇宙观经常被比作一台时钟;哈维,这位发现了血液循环原理的医学家,把人体中的心脏比作为一台机械冲床;伽利略则写道:“宇宙之书是由数学的语言写成的。”<sup>21</sup>

对“宇宙之书”概念的这种革命性阐释是与在自然问题上的工具主义思路相一致的,在这种思路中,自然被看成是某种为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东西。自然当且仅当它有用的时候,它才是有价值的:加拿大政府的前内阁部长菲利普·伽格略迪在1987年曾说过这样的话——“上帝把那些树放在那边不是为了被欣赏的,他们之所以被放在那边,就是为了被砍伐。”<sup>2</sup>

《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中关于自然概念的最后一种解释是“人的初始状态”和“自然景观”,这种理解出现于18世纪并在19世纪流行起来。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概念,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把自己界定为对关于人类和自然界的工具启蒙主义阐释的一种反驳。在人们的关注视域中,对自然的体

验替代了关于自然的知识,情感替代了思想,身体替代了头脑。启蒙运动偏爱头脑而排斥身体(“我思,故我在”),浪漫主义所偏爱的则是情感而不是思想(“我感觉,所以我存在”)。浪漫主义是一场文学化和艺术化的运动,它渐渐地激活了19世纪的人们们的社会情感,并且事实上也渗透进了今日老百姓的日常意识中间——至少在周末和假期是如此。

渐渐地,“自然”概念被解读成了“荒野”、“原始”、“乡土气”、“孩子气”。贯穿上述这些概念的一条主线是,“自然”被视为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对自然的这种理解是与由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人们对都市生活的厌倦以及渴望回归想像中的乡间田园生活的情感相联系在一起。像亨利·戴维·托索、约翰·默尔、温德尔·贝雷的著作,以及像“荒野”这样的概念,都是浪漫主义情感的一种表达。

有些作家试图把对自然的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阐释统一起来。劳夫·瓦尔多·艾默生曾这样写道:“我们这个哥白尼式的地球是一个力量的大工厂或商店,里面有旋转的星球、运行节奏以及潮汐。”这里所使用的术语是“力量的商店”。在浪漫主义的术语中,这被称为“能量之浪漫”(“romance of energy”),能量被置放在机械的/科学的和亚里士多德式的双重理论界面上来加以解读。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浪漫主义的范畴中存在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强烈情感。譬如,对那些生态主义的哲学家来说,人类只是整个生命世界的一部分,它决不是与自然界相分离的。当然,必须指出的,对世界或统一体的这种理解是唯心主义的(这些概念最初只是由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们所使用的),而不是实践的或唯物主义的。<sup>3</sup>

对上述两种自然概念的解读不仅应当在《韦伯斯特新世

界词典》的维度上加以展开,而且应当沿着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线索来加以深入的讨论。

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1500年~1800年),自然概念的主导内涵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原来的那种有机整体的含义逐渐被“事物之堆积”的含义所取代。自然越来越被看作为一种机械性的结构体,就像其他任何一种机械一样,它是能够被拆分的,同时又能用多种方式把它重新组合起来。自然成了一种由各自独立的因素所组成的东西。这种新的科学主义的自然概念标志了非人类的、或者说外在的自然界的各种因素从理论上被割裂了出去。

其次,在这一时期关于自然概念的主导思路中,外在自然与人化自然被严格地区分开了。这种区分具体表现为,我们把自然与文化、自然与历史、农村与城市、人之外的物质与人类精神等当成了相互对立的几组概念,从根本上说,这反映了对物质存在与人类文化之间关系的一种割裂。应该说,城市以及与此相联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是这种二元论思维的始作俑者。

西方思想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二元论,即把人类个体自身的自然存在分裂成头脑与身体、理性与感性、思想与情感等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这种二元论思想在今天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生物学与心理学、艺术与科学、哲学与心理分析学的二元对立。

上述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最终也延伸到了人类的社会本性问题上,社会性的人也被分裂开来。社会被解读为是由独立的个人所组成的。在社会科学中,这被称之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情况其实正好相反。“个人”(individual)的意思是“不可分割”(indivisible),即个人是被放在组织或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的。在资本主义

的条件下,“个人”(individual)概念的主导内涵演变成了“独立的存在物”(independent entity)。个体被游离于他或她的社会属性之外,而这种社会属性在社会学的维度上恰恰是“主体之建构”的重要基础。

上述这些理论上的割裂(或意识形态上的二元论)在科学、政治理论、心理学以及其他思想领域均有体现。它们在今天仍然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并进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制约着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外在自然被解读为是由作为其构成要素的各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并且是与人类相分离的;人类自身的精神与肉体、组成社会(同样也被社会所决定)的个人之间被认为是相互分裂的。这样所理解的社会无疑是与外在自然和社会中除人之外的其他部分相分离的。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自然的这种解读是与商品市场的发展、劳动与土地的商品化、物理/生物性的客体从其所在的环境中游离出来、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单子化、劳动者个人被当作“生产要素”来看待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反,作为与上述自然观念相对立的、对自然概念的浪漫主义理解,则主要存在于理论的、概念的,而不是客观实践的层面上,当然,娱乐或休闲性的实践不在此列。

现在,让我们把在自然观念上的革命性转变与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客观社会性实践方面的革命性转变放在一起加以考虑。自然在观念领域的二元化、分裂、或者说碎片化,是与客观物质性的和社会性的变迁互为因果的。伴随自然观念之变迁的,是被马克思称为“原始”或最初的积累的那种实践过程。原始积累其实就是人与外在自然之间、以及人与外在自然界内部诸因素之间的分离,具体地说,就是公有土地和公共财产的被打破和被重组,富人夺取公共财物,美洲新大陆



上的奴隶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人与自然界或土地的真正意义上的分离。这种强劲的社会变迁粗暴地把人与外在自然分割开来,并推进了土地的商品化历程。原始积累通过把劳动者转变成无生产资料的单纯的劳动者,推动了传统社会组织的消亡,迫使他们(更重要的、同时也更有历史意义的是,也迫使其后代)不得不通过出卖其劳动力来谋求生存。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把个人从人伦关系中抽离出来,使社会单子化。于是,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而这两者同时又都与情感或感情相分离。现在,人们只能指望妇女在家庭生活中营造一些情感因素了。与此同时,在这些工厂中,那些人之外的自然要素(正像劳动者个人的生产能力一样)也被相互割裂开来、被拆分、以及以新的和变化了的方式来加以重组,以此来生产更多的能适应异在性市场的商品。

起初来源于“原始积累”、后来也源自于竞争性积累的自然界的商品化和资本化,抛开了土地使用方面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束缚,并建构起了对生态具有潜在破坏作用的生产方法。这是因为,上述这种原始积累的过程在把人们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中解脱出来的同时,也把人们从在中世纪的时候所发展出来的社会约束性中解脱了出来。正像在自然界的利用问题上抛开社会关系会导致潜在的生态破坏一样,在人力资源的使用上抛开约束性会导致对人类健康和福利的潜在的破坏。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原始积累本身最终引导出了以抵制对劳动力和自然的剥削和毁损为内容的劳工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客观条件。

总而言之,由笛卡尔、培根以及其他科学家、由霍布斯、洛克以及其他的政治哲学家、由亚当·斯密以及其他经济学家(从1500年到1800年的“伟大的头脑”)所带来的关于自然

概念的革命性观点,是与资本主义的客观社会性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革命性转变,即自然(包括人这一自然物)的商品化和资本化过程同时发生的。土地和劳动逐渐演变成了具有“设定价格”(即地租和工资)的“设定商品”,并且最终成为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与此同时,对自然的富有意味的浪漫主义解释也在与对自然的工具主义或启蒙主义解释的对抗中不断发展起来。快速的工业化、都市化以及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不仅造就了人与自然界的分离,而且,具有矛盾意味的是,它也造就了对自然保护的更大和更为普遍的关注,也就是说,对自然界的浪漫主义和伤感式的关注恰恰是以自然界本身现实发生的客观异化过程为前提条件的。

与“自然”概念相比,“环境”概念有一个更为特殊的内涵。《牛津英语词典》(简称为 OED)对“环境”的定义是:“一个人或一个社区能够在其中生活、工作、发展等的氛围或条件,尤其是指自然条件,或者是指某件事情存在着或正在起着作用;影响动植物生活的外在条件。再者,与生命之可能性维度相关的自然条件。”这一定义中的关键词是“条件”,其意思是指“作为使其他某种东西得以实现其自身或被授予某种权利的前提而存在的一种东西”。如果我们把“其他某种东西得以实现其自身”定位为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那么,很显然,环境就是那种作为前提而存在的必需之物。人类是依赖于“对生命构成影响的外在条件”,即环境或“自然”的。有些条件显然比其他一些条件更适合于某些劳动形式或生命存在。对蒙特利湾的农业和旅游业来说,地区性的气候无疑是个先决条件。这一地区没有真正像样的港口,因为没有有一个真正的深水港,而这对于一个港口来说是必需的条件。

对环境的上述定义是很静态的,事实上,环境本身总在变化之中。像风、雨、腐蚀等自然力量,土壤中微生物的作用以

及植物种类在分布上的变迁,都是人类生活条件的变化的例证。1955年发生在圣·劳伦索河(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斯塔·克鲁斯)流域的那场大水,形成了一个自然冲积堤,它不但保护了这一流域的冲积平原,而且事实上还使该平原上的不动产数量逐渐增多。

与此相类似的是,当我们人类为了物质生产的需要而从环境中不断索取“资源”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也在改变环境。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包括我们人类在内,能够只利用环境而不改变环境。

在东部的森林地带与西部的平原地带之间,即中西部的广阔草原地区,在温暖的阳光下曾经生长着许多野草和野花。可现在,这些都几乎不复存在了。当地的黑土地正是因为太肥沃了,所以,它也就无法长久地保持原样。在短短几十年中,那些对土地如饥似渴的移民把这些天然的草原改造成了玉米种植区,以至于在今日的主要生态种类中,天然草原是最稀罕的一种。在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曾经有142 000 000英亩的天然草原,可现在差不多都被翻耕到了地下。素有“草原之州”美称的伊利诺州,现在所拥有的天然草原还不足原来的万分之一。整个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sup>4</sup>

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生态学”被解释为“生物学的一 25  
个分支,它研究的是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与它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它研究的是具有一个特定栖息地或属于一个特定种类的生物。”“人类生态学”则是“以人类和他们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

支”。应该说,《牛津英语词典》对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之间的区分是有点武断的。一方面,我们在利用外界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然界,因此,我们人类改变了外在环境中“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与它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说,生态学可以被看成是人类生态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当外在自然界中的生物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人类和他们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也会发生变化。从这一角度看,人类生态学又是生态学的一部分。在一个维度上,生态学隶属于人类生态学,可在另一个维度上,人类生态学又隶属于生态学。这说明,在人类的生产过程和自然界的生产过程,或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存在着某些辩证的关系。

环境历史学家总是试图去理解一个特定的地方或区域的环境是怎样和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或是去研究它在过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从相互作用,而不是孤立的角度研究了人类活动的变化与自然系统的转型之间的关系。自然界的历史与人类的发展史被视为一个整体过程的两个方面:他们相互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相互决定的。所以,即使不说是所有场合,但至少可以说是在许多或大多数场合,要想在自然界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之间划出一条简单的因果之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他们互为前提,并且又都是对方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

伯顿·戈登(Burton Gordon)在《蒙特利湾地区:自然界的历史与文化印迹》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要想弄清自然系统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作用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困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可能的)。从圣塔·克鲁斯沿着海岸线向北走,有一个名叫安纳·努弗的半岛和岛屿

区,它曾经是奥龙印第安部落的地盘。考古学家在印第安人的贝冢中发现了少许鲍鱼的贝壳。在今日的安纳·努弗,鲍鱼当然是非常平常的,但戈登认为这一考古发现是非常奇特的,对此,他提供了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纯粹历史性的解释;第二种是纯粹自然性的解释;第三种是既是历史性的又是自然性的解释。历史性的解释是,鲍鱼的贝壳在当时的印第安部落中是作为流通手段在长途的商贸活动中广泛使用的,所以,它不像蛤、贻贝的贝壳以及其他贝壳一样被随意的扔掉。自然性的解释是,几个世纪的蚀化作用使岛屿脱离了与其相邻的半岛而独立存在,同时也形成了很多露出地面的岩石,这为鲍鱼的繁殖提供了很好的场所,鲍鱼的数量也因此而不断地增加。现在的鲍鱼数量比过去增加了很多,其原因正在于此。第三种解释是,虽然印第安人不断地捕杀海獭(在前西班牙统治时期,这种海洋动物在该地区是非常多的),但在与鲍鱼的自然竞争中,海獭还是赢了,这就是鲍鱼在当时之所以很稀少的原因。安纳·努弗岛屿区鲍鱼的数量在今天非常得多,这一事实不管是由多少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所促成的,但有一种解释显然是可能(或极有可能)的,即它是由历史的、自然的以及自然—历史的过程所共同建构起来的。 26

在上述论述中,我使用了“人类活动”、“人类生产过程”和“人类系统”的概念来描述我们人类这一物种对自然界其他物种的依赖和影响关系。更具体地说,人类历史与自然界(或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最广义的层面上就是人类的物质活动本身。草地、田野、森林、海岸线、集中的商店区、山谷、大气层、海洋等等,或多或少地都是一种人化自然物,人类运用技术、机器或工具、原材料,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下,有计划和有意图地创造出了这些人化自然物(自然界中的其余部分当然是由自然界本身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而创

造出来的)。在这种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活动本身协调、整合,同时也改变了人类文化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就人类文化过程与自然发展过程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而言,人类活动给这一过程提供了动力。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把劳动或人类物质活动置放在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的原因。

自然史或多或少地是人类劳动史的一部分。在生产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彻底的历史主义解读语境中,劳动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由有产者或统治阶级所组织的劳动过程,不仅创造出了物质财富,而且也创造出了剩余的财富。这样,自然史在上述解读维度上就成了人类的一个集团剥削另一个集团的历史。由于这种剥削的历史同时也是劳动者进行斗争(以及其他社会斗争)的历史,因此,自然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劳动者的斗争(以及其他斗争)的历史。

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组织形式中,劳动者总是按照与特定的财富或权力的形式相一致的组织原则而被组织起来的。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劳动者就是奴隶,剩余财富的生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支撑高贵的文化、政治以及战争的。在欧洲的封建社会,劳动者就是农奴。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主要是为工资而工作的工人。上述三种劳动的基本组织形式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具有不同的生态效果。

古罗马在公元前二世纪和公元前一世纪期间不断地拓展疆域,在这种拓展过程中它从被征服民族和被打败的军队中获得了大量的奴隶。这些奴隶大多被用在大牧场(或大庄园)中看管动物。与此同时,大批的自由农被剥夺了土地,沦为罗马城中的无产者。财产关系上的这种变化,同时也是劳动形式上的一种变化,对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像公元410年罗马沦陷后由于人力的缺乏而催生的农民的农奴化对



环境的影响一样)。农业从一种可持续性的、混合的以及多种经营式的耕作系统转变成了大农场式的农业,这使得土壤不再能得到保护,它不断地遭到破坏,并且,山林被砍伐,旱、涝灾害也周而复始的出现,这直接导致了不止一种文化的消失。

在欧洲的封建时代,农奴制的劳动形式导致了很独特的土地使用和生态变化的模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农奴是比较优秀的耕作者;而在庄园主或地主的土地上,他们的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剩余财富是用来支撑土地贵族和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的,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劳动是很粗劣的,这使得庄园主在生态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农奴在他们自家的土地上发展出了综合性的农作物耕作体系,有代表性的是法国的农民,他们使这种农作物的精耕模式变得非常出名。公有土地在当时也是有的,它主要用来放牧。在早期的封建时代,当肉类和谷物的生产只是为了地方性的市场交换或直接用来消费的时候,在一些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公共财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随着长距离的市场交换行为在12世纪的重新出现,特别是在16世纪,由来自新大陆的大量金银的不断涌入而推动的经济繁荣,使原来的那种公共财物很快地消失,并让位给了对土地的综合利用有破坏作用、但对圈地运动却有促进作用的产品的生产。与此潮流不相和谐的,其实倒不是人口的膨胀问题,而是土地和公共所有物的传统规范体系的断裂、市场的竞争、劳动者的无产化以及农业雇佣工人的出现等问题。

奴隶劳动建构的是自然的一种模式,农奴劳动建构的则是另一种。这种界划当然是比较公式化的。更为典型的是在财产关系和劳动形式方面的复合形式。印度尼西亚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荷兰的殖民地。与它的竞争对手即英国不同,荷



兰始终保持着商业(而不是工业)强国的地位,这在其殖民地政策中也是有所反映的,譬如,对英国制造的产品排斥就是一个例子。而这又是以荷兰人拒绝把印度尼西亚的地区性经济纳入货币市场经济的轨道为前提条件的(这正好与英国在其殖民地上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的对比)。荷兰人在殖民地上推行一种独特的劳动模式,它引导殖民者们把大量的原材料和粮食出口到国外,却不从国外进口相应的东西。在19世纪的世界商品市场上,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原材料和粮食几乎到处可见。其结果是导致了一种独特的生态状况。对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者来说,印尼人凭借其劳动力密集型的、高效的农业系统是足以养活其自身的(印度尼西亚至今仍然是粮食的公顷单位产量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

上述这些分析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或生态史(包括文化形态史)的研究进行有效的修正成为可能。当然,就前者而言,在英语世界过去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严肃的研究少得可怜。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早期,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 究新著的确一阵风式地出版了不少(一般来说,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是其中的最重要的著作),但之后这一课题的研究又沉静了下来(惟一的例外是德雷克·塞耶尔的杰出著作《抽象的暴力:历史唯物主义的 分析基础》在1987年的出版)。

即使是在骚动不安的20世纪60和70年代,当历史唯物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一理论是离奇和过时的。学界的一个普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有用的和闪光的观点已经在很久之前就被主流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兼并了。当然,在最近几年中,一些主要的左派学者已经开始运用现代人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成就来修正唯物主义的观

念。女权主义者也在此列。譬如,按照艾略尔·塞乐(Ariel Salleh)的说法,真正对文化和自然的关系起整合作用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妇女的劳动。<sup>5</sup>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远远没有消失,而且还在不断繁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埃尔默·阿尔特弗塔(Elmar Altvater)、恩雷克·利夫(Enrique Leff)、贾安·马蒂尼茨-艾略尔(Juan Martinez-Alier)、艾雷·利比茨(Alain Lipietz)、马丁·奥康纳(Martin O'Connor)、特德·伯顿(Ted Benton)、爱伦·鲁迪(Alan Rudy)等人的著作已经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书的第一章《文化、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是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学改革而写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样,环境史的问题也一直受到关注。第二章,“什么是环境史以及环境史何以存在?”,我在其中坚持了如下的观点:环境史问题应当被视为资本主义时代所凸显出的各种历史问题之发展的顶点。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是“审视蒙特利湾的生态史及文化景观的三种方法”和“弗尔河流域(加州,弗尔顿)建筑物的特点以及对自然界的建构情况(1860~1990年):一个手稿”(与巴巴拉·劳伦斯合著),这两部分内容来自于设在圣塔·克鲁斯的“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心关于地区性生态史的研究项目,这一“中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的编辑单位。第五章的标题是“两个城市的故事:芝加哥和洛杉矶”,它由两段评论所组成,第一段评论是围绕威廉·克劳纳的《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大西部》一书而展开的,该评论是由一份激进的地理杂志即《相对极》(Antipode)来组织的。第二段评论则是围绕麦克·戴维斯的《石英之城:洞察洛杉矶城的未来》一书而展开的。我以为,这两段文字是值得在此重新刊印出来的,因为,环境史的问题无疑包括了对城市的文化景观、形状

与轮廓的历史发展的比较性的研究,而很少有城市能像 19 世纪晚期的芝加哥和 20 世纪下半叶的洛杉矶那样,既富有多样性又充满了内在的激情。

#### 注 释

1.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花园城,纽约:达鲍得,1953 年版),第 43 页。

2. 引自《地球与铠甲》(多伦多,加拿大),1987 年 7 月 21 日。

3. 这种观念当然是承认人必须呼吸树所生产出来的氧气,必须喝由自然界的再循环所提供的水,人的生活必须符合重力原理,以及其他一些客观事实,如果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当然也是唯物主义的。

4. 约翰·麦迪逊:“对草原的赞美”,见《旧金山的审查员与编年史》,第 26 期,1992 年 7 月。

5. 艾略尔·塞乐:《“本质主义”与生态—女权主义》,见《竞技场》第 94 期,1991 年。

## 第一章

29

# 文化、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 导言

在 1989 年,即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之际,马克思主义曾被视为已经死亡和已经被埋葬了。意识形态的流行观念来来去去,不过,有一点却是很奇怪的:宣告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之不复存在的,正是那些在很长一段时期中自称是拥护并且非常强烈地捍卫这一理论的人,正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那些政党官僚们。这就是 1989 年之后所发生的一切。这足以与下列事件相类比:罗马教皇给天主教徒们做最后的一次宗教仪式,或者艾伦·格林斯潘向美国国会解释说,“市场体系”弊大于利,并号召推行工业的国有化。

这些自我“扫地出门”的官僚和(思想)卫

士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许多严重的缺陷。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西方人把他们的理论的消亡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消亡,这只是徒劳地给自己壮壮胆而已。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在所有已经非共产主义化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只有古巴才真正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即无产阶级在劳动者中占大多数。当卡斯特罗在1959年取得政权时,古巴劳动者中的绝大多数(至少三分之二,甚至可能更多)是雇佣工人。而在1917年的俄国,在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群,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在俄国,大约有2500万个家庭,而雇佣工人只有三四百万)。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例外,这个国家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时,其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仅次于古巴。这与其说是一个历史逻辑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问题。在大多数的东欧国家,共产主义是由苏联红军强加给它们的,但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者则是通过军事政变取得政权的。在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意味着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向工业经济模式的转型这一漫长而又血腥的过程。无产阶级革命意味着产生一个雇佣劳动者阶级。尽管马克思在其晚年的确相信俄国在其农村公社和米尔组织(贾安·马蒂尼茨·艾略尔称之为“粗野的社会主义”)之传统的基础上具有直接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米尔”是沙俄时代农村中的一种村社组织——译者注),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其实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深层的规范性要素并没有关系……。

.....

与此同时,在“铁幕”的另一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在过去的四分之三世纪中,有意回避阶级和政治权力的问

题,把理论视点固定在那些在前苏联被禁止的问题上,如异化、具体化、资本拜物教等。卢卡奇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所获得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正处在物化之中,这一观点相继被阿多诺、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以及其他一些批判理论家所采纳。他们这些人对具体的社会和国家的批判是马克思当年对商品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的一种逻辑上的自然延续。在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和80年代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一个时间上的中断期,这一现象或多或少可以证明批判理论家的一个主要观点,即后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强迫人们接受了对世界的沉默和被动的态度。今天,各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过时之物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范式不断繁荣起来。德里达说他在20世纪90年代将要写一本颂扬马克思主义的书,并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即如果一个人根本就不想去试图了解“总体性”,那他是根本不可能真正解读“总体性”的。这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界倒是一个不小的震动。

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提供对其历史研究方法的系统说明。尽管有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但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中确实不存在类似于基督教中的“十诫”的那种东西。唯物主义的观念总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它是正在探寻其自身之定义的一种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学界在这一问题上有几百种不同的观点,但很少能达成共识的原因。

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创始人以及现在的坚持者不能从《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的始源性著作中梳理出其方法的清晰轮廓,这的确是个谜。可能性的解释当然有很多种:他们有很多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在他们看来根本没有必要提供出一种完整的解释;亚洲的、古代的

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历史都还没有来得及解读。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么一种解释：他们在其有生之年无法得到足以用来证明或者否证他们的主要观点的那些历史性的资料。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纳德·米克(Ronald Meek)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方法论的解读就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佐证。米克认为,当马克思在研究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过程时,他事实上还没有获得足够多的历史资料,尽管这些资料对当代人来说是完全可以获得。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被迫使用了一个小技巧:他把社会想像成是由自食其力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构成的,然后再去追问当这个社会中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或处于一方压迫另一方的状态时将会在逻辑上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人能够宣称他是在充分研究了足够的历史资料后,才得出研究上述转变过程的唯物主义方法的。马克思当时只能假设出一种独立的商品生产模式(以及商业资本主义),只有到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以后的现在,我们才能真正从历史资料的角度来认识它。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它面对的审视对象是历史的延续、变迁及转型的过程,即世俗性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以及令人可敬又可畏的社会和政治动荡、革命以及反革命的过程。唯物主义观念就是用来研究历史变迁中的延续性以及历史延续中的变化与转型的一种方法。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社会阶段的内部是怎样和为什么会孕育着潜在的社会政治危机和断裂的?在社会转型时期或对现存的权力和特权机制的痛苦的重建时期,社会政治危机又是怎么被孕育起来的?反过来,在一个社会危机时代的内部是怎样和为什么会孕育出潜在的社会常规和延续性态势的?唯物主义方法中的辩证法特征就是源自于上述这两个方面的统一的。历史过程的连



续性被置放在历史之断裂性的维度上来加以解读；历史过程的断裂性则被置放在历史的常规性的维度上来加以解读。这类似于个性发展理论既在青春期危机的维度上来解读个人的成长历程，又反过来在个人的持续性成长过程的维度上来解读青春期危机的问题。青春期的内在冲突到底是什么？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的社会内在冲突又是什么？这种内在冲突在一个维度上的解决是怎样依赖于它在另一个维度上的解决的？那些包含着旧社会形式的要素，但从总体上又被视为具有新质的新社会形式，是怎样从旧社会形式的废墟和残骸中生长出来的？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不可能是什么内容。对马克思来说，无论是历史的延续还是变迁，都不是由某个绝对理念或绝对理想的展开而导致的。人类的奋斗目标并不是一些终极性的伦理目的，如“真理”或“正义”。理念的确驱动着生命之运动。社会存在必须是有意义的。人类也的确相信某些社会实践活动是无意义的。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一些实践活动被指认为是人性的，而另一些则被认为是非人性的。历史过程的参与者声称他们正努力使这样或那样的理想变为现实。去质询这些人的真诚性，那是很愚蠢的。领袖们往往相信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即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这个或那个神圣的历史逻辑或历史目标之内涵的显现。

这种主张在为领袖赢得民众的支持方面是有效果的，其思想依据是他或她仅仅是这个或那个绝对理想的化身。事实上，没有哪个领导者是仅仅在特殊的物质利益的维度上来履行其职责的。即使是那些最麻木的商业工会主义者，在“劳动节”的讲演中也会大谈“劳工权利”的问题，而且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政治和宗教的领袖们通常被称为

上帝的“选民”，其原因正在于此：他们是那些世俗的或精神的绝对理想或终极渴望的具体化。由此，那些成功者便俨然以超人自居，而那些失败的人则往往被当作幻想家被简单地撇开。还有一些人，在他们被迫在由其自身所发动的运动所导致的新的矛盾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或已经被投入了监狱）。这里所说的矛盾包括当某种运动被制度化或官僚主义化时所出现的矛盾。耶稣、林肯、甘地以及马丁·路德·金之所以尊奉为殉道者，并且在其死后还广为被人尊敬，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逃避了自身的成功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凯撒、拿破仑就没这么幸运，希特勒就更差了。包括这些人在内的所有历史人物，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都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作为某个抽象历史范畴的人格化，不管是致力于在一个国家中实现人人都生而平等的理念，还是致力于使某个民族能够统治其他民族，其实都没有什么主体性或自由意志可言。他或她充其量只是自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绝对理想的工具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把自己打扮成绝对理念之化身的领袖们的主体性，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往往会变得杀气腾腾。耶稣不仅相信有一个救世主将来拯救世界，而且还相信他就是这个救世主。列宁相信一个工人阶级国家的建成是必然的，但同时也相信他就是这种必然性之实现的中介。林肯要不是相信他就是《独立宣言》中所阐明的那种理念的人格化，就有可能把美国内战搞成别的样子了。没有哪个殉道者是仅仅为追求物质利益而死的。在这一意义上，所有伟大的领导者都是活的矛盾体，矛盾体的两个方面都会对他们的声誉构成长久的影响。当然，如果他们被谋杀或英年早逝的话，那倒是可以对他们作盖棺定论的。

马克思的历史观念是对具体性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批

判,它相信,“抽象”是独立于那些运用抽象观念以及在抽象观念的名义下进行活动的人的生活过程的。<sup>1</sup>当领导者把观念从过去的语境中抽离出来,置放进现在的语境,并使之服务于一个想像出的重要未来时,观念就是“活着的”。把观念说成是继续存在的,当然,它也是会终止的,这已经是一种具体化了的言说行为。人的生存不可能脱离从过去延续下来的观念(即所谓的“包袱”、“萦绕在人们头脑中的幽灵”)。不过,任何一种渴望或观念的意义依赖于谁拥有这种观念以及它存在于什么样的社会语境中。当印度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的军队,变成一个亚帝国主义的力量时,甘地所倡导的那种不抵抗主义就是一种很离奇的想法了。当美国南部诸州已开始经历重建的阵痛时,林肯的总统权力的推行就有可能与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的主张一样困难重重了。

不同的观念或范畴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在欧洲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这一范畴具有洛克式的意义;而在已经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范畴具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意义。在今日的自由民主社会中,“民主”一词意味着由公民选举其代表的民主程序;而在古代的雅典,则意味着由人民来进行直接的管理或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词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意味着“共和主义者”。在今日美国,“民主党员”意味着“自由”,而“共和党员”则意味着“保守”。19世纪时候的“自由”概念在今日就是“保守”的意思。在20世纪后期,一个“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的共产党原来的意思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此,把一个概念的形式与内容、现象与实质、意识形态的外表与理论自身区别开来就显得完全有必要了。观念(或精神)看起来是纯

私人的,但决定这些观念之意义,或这些观念的内涵之意义的,却是社会的结构。

上述分析启示我们,马克思在建构一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理论时,其实并没有对唯心主义作太多的贬损。谁不知道观念有时候会延续几个世纪,有些伦理观念,如“正义”、“真理”和“美”,还会延续上千年?马克思的观点其实应该是:那些靠绝对观念,如罗马式的荣耀,基督教式的虔诚,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或美国式的对幸福的追逐,来鼓动人民或国家的历史人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在具体的实践中,唯心主义的思路往往会导致失望(如公民权利)和恐怖(纳粹主义),或者会导致一出滑稽戏(“开始的时候是一出悲剧,接着就是一出滑稽戏”)。克林顿总统在海地的军事行动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在这个国家“恢复民主”,而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却是维持本地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只不过是把该国的警察力量从塞得洛斯将军(General Cedras)及其死党的手中夺过来,交给那些对美国及其盟国亲近的人的手中,然后,再使这个国家“IMF”化(使这个国家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译注),这与克林顿当初为使其行动合法化而向世界宣称的那种目的是截然相反的。还有什么比至上权力像踩在香蕉皮上那样地滑走的现象更具有悲喜剧意味的呢?

历史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伟人与凡人为实现绝对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历程,这种绝对目标其实是永远也不可达的,这些历史人物一旦失败了,即使他们侥幸逃过了谋杀者的子弹,那也会被放逐到各自的厄尔巴岛(介于意大利本土与科西嘉岛之间的小岛,此处泛指流放地的意思——译注)去。历史之所以看起来是非理性的,它受一些不可预测的迂回曲折所支配,一些明明是不正常的事情却显得很正

常,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经济因素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的观点被证明是非常错误的,其原因也在于此。如果历史并没有沿着一些人所期望或预期的道路前进,那么,错误不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恰恰在于那些喜欢挖苦别人的人。在这些人看来,历史的当事人是虚伪的,他们仅仅把绝对观念理解成了物质(经济)利益的替代物。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正像对其他事情的分析一样)旨在解读如下事实:为什么物质性或世俗性的利益争斗往往是在高尚观念的名义下来进行的,而这些高尚观念又是真的被人们所感受到或相信的?波士顿的爱国者们就茶叶税一事鼓动起了数以百计的人,甘地为了一个盐税的事情就鼓动起了数百万人,但是,无论是在“自由之子”还是在甘地的头脑中,其实有比这更大的想法。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追随者肯定会少得可怜。只有那些最讲实际的人才会只从金钱中寻求激情。在西方国家承认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是独立国家的时候,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压抑感。但是,如果塞尔维亚的领导人(他们本身是抵抗纳粹的以及克罗地亚人的种族主义政策的)能够鼓动起他们的具有种族特色的民族主义热情的话,那还不至于在波斯尼亚人中出现恐怖的情绪。当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们宣称已经掌握了制约革命运动和社会变迁的钥匙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则对英雄史观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以及为什么它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错误的等问题作出了解释。卡斯特罗就是这种英雄人物的典型例子,他领导了 34  
冷战氛围中的国家独立运动,这种运动首先是在民族自决、其次在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名义下,同时又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在第一层意义上,卡斯特罗在古巴首次建立

了一个真正的国家；在第二层意义上，他给自己找了麻烦，他或许从来就不想，或许不能相信（至于到底是哪种情况就不清楚了）古巴的工人阶级能够自己管理好自己。

对马克思来说，历史并不是普遍理念不断实现自身的过程。确切地说，它是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在普遍理念的名义下所进行的权力争斗的过程，历史在展示自身内容的过程中为什么多半会变得很糟糕，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解放者最终变成了专制者，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当海地的反对法国统治的革命成功的时候，领导这场革命的黑人领袖们就试图复辟奴隶制。在美国，工人在长达150年的时间中都是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的。然而，不仅那些领袖们，而且连他们的追随者们都非常相信唯心主义哲学，这些追随者经常把唯心主义的观念转变成一些连他们的领袖都无法预期的计划或目标。不管这些是不是导致伟人最终往往只是一个泥足巨人或历史过程中总存在有许多非理性的迂回曲折的主要原因，唯心主义观念的持续性无疑意味着历史过程被标上了某种连续性或逻辑性的标志，这在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社会转型和快速发展面前是很容易被驳倒的。<sup>2</sup>

难道人类自身不内含有一种追求“自由”和“正义”的天性？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英雄主义的主题难道不会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重现？也许马克思会对此作肯定的回答，但他对这种英雄式主题之不断重现的解释必将是建立在如下的基础上的：在统治阶级努力把符合自身利益要求的理想或历史观说成是普遍性东西的同时，阶级斗争和阶级社会一直都存在着。他或许还会指出，上述这些主题其实只局限于西方国家，在亚洲，最重要的主题多半是“秩序”、“责任”以及“尊敬”这类东西。更进一步，马克思尽管没有明



说,但他显然已经提醒了我们,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无疑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运用统治阶级思想的唯心主义形式的。这在西方国家是很明显的,在那里,自进入现代社会之初开始,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工人以及其他阶层的人们,一直都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名义下进行斗争的,而这些范畴最初只是晚期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理想。这在南美国家也是一样,那里的民族独立运动经常采用一些殖民地政权的言语和理想。当然,在古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前,这种情况是不太明显的,那时的手艺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直接原因是物质利益上的被剥削,而内在的本质则是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代表权。

自雅典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西方社会的公开性的政治实践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形式或理想,而不是内容(即物质性的社会活动)。除萨缪尔·高普斯(Samuel Gompers)以外,没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他惟一需要的就是“更多”(“more”)。这种“更多”毫无疑问是由公平或社会正义的理想来赋予其合法性的(可曾见过被剥削阶级试图要求得到比剥削阶级所拥有的“更多”的东西?)。这里的关键是,正义、真理、自由、民主这些理想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实践意义,不同的社会组织在各自不同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形式中,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对这些范畴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对英国的贵族来说,自由意味着从国王的专制独裁中挣脱出来,而对英国的农奴来说,自由则意味着不受限制地获取和积累土地。上述这两种理解与自由这一范畴在今日西方社会中的内涵都是不同的,其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的语境已经根本不同了。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在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中，“物质生活”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第一个过程由人类与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之间的技术关系，或者说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展开的对自然界的开发与利用关系所构成的。这方面的例子有钢铁制造、土地耕作以及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发展等。第二个过程是由技术关系所由以构建的社会关系，或者说作为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之基础的社会组织关系所构成的。这方面的例子有美国南北战争以前的奴隶制耕作方式、俄国的村社组织以及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工人的那种社会关系之体现的雇佣劳动形式。简而言之，“根据马克思的解释……人进入到与自然的关系之中，目的是为了从自然界中获得物质生存条件，当人在将自身从自然界中剥离出来的时候，他也就进入了与其他人的社会关系之中。”<sup>3</sup>

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般都把包括工业技术、机械和工具以及工人的技能在内的技术关系定义为“生产力”。广义地说，生产力是对社会发展中的物质力量或潜在的生产能力的一种说明。而人们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所构建的社会关系通常被称为“生产关系”。一般来说，生产关系的内涵是指包括社会产品的占有关系在内的财产占有形式和权力占有关系。

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变迁与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中，生产力(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因素而存在的。生产力因素，尤其是像工业技术的水平与类型这样的因素，在

马克思那里是不称其为问题的。(20世纪6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以及其他一些学者,试图以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把劳动管理与工业技术看成是劳动控制之形式的观点为基础,修正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的上述这点缺陷)。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者说由生产资料的占有阶级或统治阶级所实施的不同的强迫劳动方式、剩余产品的剥夺、分配和使用方式)中具有不同的动因,但无论如何,这种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累积过程。在最终的意义上,这一过程被看成是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每一个社会都继承和利用了从以前的时代所延续下来的科学知识和生产力状况,包括有关自然界本身的生产能力的知识的积累。就整个历史过程来看,生产力被视为对生产关系起(“归根到底”)决定作用的东西。当社会生活中的物质性内容(生产 36 力)起来反抗这些内容由以组织起来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之局限性时,危机就出现了。旧的生产关系或者被一扫而尽,或者被改革,或者被置放在一个社会管理的更高层次上来加以重新建构(当代的综合性大企业或综合性大学中的科学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与此相反,生产关系则不是一种历史性的累积因素,而是从属于历史过程中的渐进式变化和周期性的革命性转型的(虽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合性,旧的生产关系形式可能被重新发掘出来并置放进新的内涵,譬如,在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门中,21世纪的技术水平和19世纪的劳动关系的并存是相当普遍的)。

上述这种在历史变迁与发展问题上或多或少带有普遍性的观点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源自于各种不同角度的批判。<sup>4</sup> 这些批判和挑战中的一部分内容可以概括为下列这种简单而又粗浅的思路:在上述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中,“文化”和“自然”的线索是缺失的

(或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这是经得起辩论的)。因此,关于历史变迁与发展的唯物主义观念就不仅要立足于对工业技术、劳动分工、财产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的研究,而且还要立足于对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的研究,这些形式就跟狭义的生产力范畴一样,也是累积性的。对人类生活方式的主体性建构、人化自然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是独立的历史性存在。“第二自然”并不因为其“第二”性,就少一些“自然”的特性。文化形式也是累积性的,或者说是能在变化中展示其延续性的(这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能力”之积累、个体化、规范和价值的普遍化、文化和地方性传统的保留等思想的前提——这些思想都是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面对自然和文化的历史性累积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这两个因素都有可能内含于社会劳动或劳动分工之中,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还必须研究社会劳动作用于自然与文化的方式问题。

一方面,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和资本拜物教的理论之外,并不存在一种关于文化、语言、主体间性和伦理的理论。<sup>5</sup> 我们知道,在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生产方式中,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其实都是与文化规范问题融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从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的工人身上看出这一点,在这些人的实践活动中,手工技术和文化技能是充分地融合在一起的。日本的资本占有和工厂管理体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体制与美国的相应体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强调责任、秩序和荣耀,这些概念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物质资料占有阶级或统治阶级的强迫劳动和劳动控制的模式也是一样。今天,在

信奉“阶级合作主义”的欧洲,高失业率和相对高工资的结合迫使工人去“工作”;而在美国和其他一些白人移民国家,低失业率和相对较低工资的结合则显得更为灵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中占主导地位,劳动力市场在这些国家也是比较“自由”的。 37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具有两种维度。一是客观性的维度,因为它是由自然界所提供的(或通过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得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对象所构成的。二是主观性的维度,因为它除了包含有总体上的活劳动力之外,还包含着劳动力的不同组合或协作方式,而这些方式不仅受技术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

生产关系也同样具有双重维度。它是客观的,因为它的发展是以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一些发展规律为基础的。譬如,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每一个国家或文化系统中,都存在着一种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下降趋势(因为日常消费品的价值含量在下降);存在着大额资本通过跨国集团公司的形式进行重组的趋势;存在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生产关系同时也是主观的,因为它所内含的财富范畴同时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并且,它所具有的建构特定的剥削方式(强迫劳动以及剩余劳动的剥夺方式等)的方法是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的。譬如,日本式的那种钟情于责任感的工作模式在美国的公司中可能就会像对牛弹琴一样,而美国式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工作热情的调动方式在日本的公司中也许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有些人类学家认为,人力资源本身是文化意义上的,因为,在他们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或有用的之前,他们首先是被置放在文化的层面上来加以定义的。

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或只在很弱的

意义上具有)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或“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马克思本人很少对自然界本身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虽然他的确也意识到了受经济规定性制约的自然发展过程的重要性,并认为它对人类生产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但他更多地是把自然界当作人类劳动的外在对象来考虑的。正像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就像一台机器一样起着作用”,“地球的外观、地球上的气候、植物、动物以及人类自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些都源自于人类的活动;而在同一历史时期,德国的那些没有人类涉足的自然界所发生的变化却是小得可怜”<sup>6</sup>。就表面现象来说,这无疑是对的,但恩格斯显然弱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通过劳动活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自然界本身也在改变和重构自己,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和自然界本身的力量相互统一在一起的发展过程。实际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跟地球上物质和能量的热力学原理、化学循环的运作以及动植物的生态分布等问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在山区和冲积平原地区财富占有体制上的不同,比较一下在金属加工企业和石油化工企业中的劳动控制体系的不同,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总而言之,社会劳动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与文化和自然界、语言和主体间性、生态学(包括生态学的语言和语言的生态学)之间是一种调节与反调节的关系。(一方面,生态科学本身在不断的变化,譬如,那种认为自然系统具有无序性的“演进”理论现在已经走下坡路了,这种理论曾经改变了作为物质生产、国家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理论基础的生态原则;另一方面,乔姆斯基、索绪尔、维特根斯坦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所谓的“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sup>7</sup>)正因为如此,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既是文化的又是自然的。

## 协 作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变迁与发展的阐释中,文化与自然的范畴之所以被忽略或被弱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协作(cooperation)的主题在它需要被全面理解的时候,却被加以了单方面的处理。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中,不管是协作的文化形式,还是自然系统的“协作”内涵,都不在其中占重要地位,因而也很难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有什么文化与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譬如,当马克思主义在解释生产方式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型的时候,就没有对文化及生态变迁的历史作用问题作出阐释。在对欧洲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历程的阐释中,马克思主义对由基督教改革运动和反基督教改革运动所引起的文化变迁,及由过时的农业耕作、能源开发和建筑的方法所导致的生态变化和破坏都加以了弱化或忽略。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种有时被称为“技术决定论”的理论倾向,它把协作模式归因于“技术的必然性”。在这种观点看来,决定一个具体的协作模式之性质的,是现有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技术水平以及自然条件。与此相反,那些受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他们拒绝恩格斯和列宁的技术拜物教观点)则从现有“权力关系”的起源的角度来推导出协作模式的性质。恩格斯也许会说,一个钢铁企业中的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模式是由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而卢卡奇则会说,劳动者的分工和生产关系模式是由在一个工厂中“建构共识”或趋向合法性的需要所决定的。需要指出



的是,上述这两种立场都是单面性的:第一种立场关注的是**劳动的分工与专业化**,而第二种立场关注的则是**劳动者的分工与单面化**。

一个是把协作看成生产力,另一个是把协作看成是生产关系。在恩格斯的观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间有一条鸿沟,价值规律与技术必然性在这条鸿沟的一边,而权力因素则在这条鸿沟的另一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受韦伯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

事实上,任何一个既定的协作模式既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因而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不知道权力因素的起源,那就不可能真正明确一种既定的技术关系的内容;同样,如果不知道技术因素(包括技术水平)的起源,那也不可能对权力关系有真正的了解。不同的控制类型(个人的、合法的、专制的等等)是与相应的技术和劳动分工类型相一致的;同样,不同的技术和劳动者的分工的类型也是与相应的控制形式相一致的。

更进一步,同时也与当下的讨论更直接相关的是,协作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文化规范和生态(自然)样式的基础上的。理查德·比尔纳基(Richard Biernacki)在《劳动的组合:1640至1914年间的德国和英国》一书中指出,劳动作为一种商品,其本质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语境中是不同的。在信奉《圣经》的地区,劳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新教劳动伦理所决定的。在农业地区,则是由水力循环的情况所决定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技术必然性和权力关系同时都对劳动关系(劳动分工和劳动者的分工)起决定作用。这样,虽然协作模式是被决定的,但却是被四重因素所决定的。技术、财产、权力、文化规范,以及由此而展开的自然、生物、化学过程都以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方式积淀在特定的协作模式之中。



协作范畴是一个明显的介入点,从此出发,我们可以深入到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加以修正的计划之中,以此来有效地清理文化、社会劳动与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劳动在这种辩证关系中是被视为调节因素的。(解构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把文化视为调节自然和劳动的因素;而绿色主义者和彻底的生态主义者则把自然视为调节文化和劳动的因素。)在这种修正中,社会劳动仍然保持着它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中心范畴的地位,但作为日常生活之规范和意义的现代人类学维度上的文化范畴,以及作为一种自主(往往是不可预测的)生产力的现代生态学维度上的自然范畴,都对社会劳动范畴进行了质疑和丰富。

### 协作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

关于物质存在之双重本质的传统阐释忽略了协作的问题。马克思虽然在其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涉及主体的问题,但他却是把协作视为最基本的生产力要素的(一种“社会劳动的自然力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阐明了由欧洲早期的工业资产阶级所带来的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导致了生产过程中的协作模式的变迁。家庭式的生产体系(譬如把产品发放出去进行加工的生产体系)转变成了作坊制的生产体系或查利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早期工业”体系。这种变化虽然没有涉及技术关系(工具、技术和原材料),但的确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即在同一个工作场所且受同一个雇主或其代理人管制的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协作所产生的生产力。这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所能发现的有关生产关系的变革导致新型生产力,特别是工厂 40

中的协作形式的形成的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资本论》中从“协作”章到“机器和大工业”章,所阐述的都是劳动生产力通过协作而不断增长的过程。一个多世纪之后(正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预料的),交换价值变成了是由科学技术所决定的,这是以科学家之间、企业之间、企业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以及其他一些领域内的具有复杂的层面和形式的协作为前提的。

古代奴隶制度及中世纪封建制度中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同样也导致了协作方式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西班牙银矿中出现的大规模奴隶群之间的协作是第一种类型的例子,而在庄园的道路建设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劳动中所出现的契约农之间的协作则属于后一种类型的例子。现实生活中的协作方式的明显变化,能够增加生产力或剩余劳动量,但它无疑是由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所导致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在社会革命的年代,生产关系领域内的变化是能够带来协作方式(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总体生产力水平的变化的。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对生产关系的革命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模式之转型进行历史—理论研究的学说,在这一问题上都保持了沉默。

协作本身既有量的维度又有质的维度。量的维度指的是协作的规模,譬如说劳动组织的大小,或者就今天的情况来说,科学家之间进行国际化协作的程度。质的维度指的是用历史的、具体的方式把劳动活动和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组织起来的力量的形式,以及反抗这种力量的形式。上述那种生产关系(部分地或全部地)决定生产力(协作方式)的理论假设,所涉及的只是劳动关系的质的方面而不是量的方面。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就协作的规模而言,罗马银矿中的协作

比一个封建庄园中的协作要大得多,而封建庄园中的协作往往又要比一个资本主义早期工业企业中的协作大得多。但就协作的质的维度而言,上述三种形式中把联合劳动组织起来的力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产过程中直接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同的。协作所产生的力量,作为一种生产力,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增大(就像科学技术所能产生的力量一样)。

### 文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任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首先必须迈出的一步是,对协作和劳动关系模式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然后再迈出第二步,即建构一种能够阐明文化与自然界对所有或统治阶级的力量产生影响或起促进作用的方式,所有者或统治阶级的这种力量正是把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因素联合起来并对之施加强制作用的力量。

马克思本人把“文化”视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视为与社会的基础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这一意义上,他无疑是前人类学的。这种“缺陷”导致了他对协作方式,以及由此而涉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身的理论研究是不完全的。<sup>41</sup>

在任何一种社会形式中,生产关系都是三方面的:首先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其次是剥削阶级内部的关系;再次是被剥削阶级内部的社会关系。换一种说法,第一个层面指的是强迫劳动的方式以及剥削剩余劳动量的方式;第二个层面指的是剩余劳动产品在剥削阶级内部的分配和利用方式;第三个层面指的是被剥削阶级在生产过程中进

行协作的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在历史的变迁与发展的问题上偏爱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或者说阶级斗争。而剥削阶级以及被剥削阶级内部的关系,在马克思本人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的大多数学者的视域中,其理论重要性显然被低估了。就剥削阶级内部的关系而言,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宗教和经济都是由各自的统治阶级的喜好所决定的,但他并未提供一个清晰的答案。路易·阿尔都塞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用一种(本质主义的)决定论来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行为来对立(前者被界定为剥削方式,后者则被界定为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行为表达出来的上层建筑形式)。就古代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中的剥削阶级内部的关系而言,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中,即使在描述性理论的层面上,也很少涉及这部分内容。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马克思认为,大规模生产中的社会化机制必然会教育工人阶级,以使他们在经济危机或社会困境时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对现代的读者来说,要想真正把由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劳动关系这种军事般的组织体系所产生出的对工人来说的训练和教育功能,与资本主义企业中由技术必然性所决定的工人之间的训练有素的协作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简而言之,对马克思来说,作为技术因素而存在的生产协作被简单地看成了与社会控制或统治力量相对立的东西。

当阿尔都塞这位结构主义者(“老左派”的代表)致力于研究剥削阶级的内部关系的时候,一些自发形成的“新左派”开始了对被剥削阶级内部关系的研究。史蒂文·马格林(Steven Marglin)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述“老板们做了些什么”的著名文章中,试图用左派韦伯主义的权力理论弥补被

剥削阶级内部关系研究方面的缺陷。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劳动关系或协作模式的建立,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为了建构对劳动的控制力量,技术效率方面的原因只占次要的地位。戴维·诺布尔(David Noble)也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强迫劳动和统治工人的模式与技术效率的最大化之间的不完全一致性。迈克尔·伯劳沃(Michael Burowoy)则论证了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生产的一致性”,是以工人之间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譬如自我欺骗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作为假想前提的。

简而言之,当作为老左派的阿尔都塞致力于解析剥削阶级内部的社会关系时,新左派理论家们致力于对被剥削阶级,即雇佣劳动阶级内部的社会(劳动)关系的研究。这些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劳动关系或协作方式不再被认为是由技术必然性单方面所决定的。当然,劳动关系也并不因此就是由权力因素单方面决定的,因为,工厂中对自然对象的占有与开发之不断增加的社会科学性与技术性维度上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新左派已经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可以这么说,当老左派用(资本主义)工厂的模式来界定社会形态的时候,新左派则用(阶级)社会的模式对工厂作了界定。<sup>42</sup>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新左派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却不是太大胆了,而是太小心了。不仅韦伯式/福柯式的统治/权力形式从“外面”被输入到劳动关系之中(就像它过去曾经历过的一样),而且,所有类型的文化实践对劳动关系及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其他社会关系都起干预的作用。再进一步,政治与文化的实践活动不仅从上面,而且也从下面输入到工作场所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劳动关系既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及文化的斗争的内容,也是其生成的语境。可以这么说,某些

技术上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存在着保持劳动价格的稳定与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劳动者进行统治,以及把社会的文化实践活动当作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看待的方法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存在的。因此,劳动关系(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作模式)的决定性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如果对文化的主导与变化模式、法律体系的作用、管理者控制劳动者的意识形态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不甚了解,对上述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决定的方式(譬如,通过对比欧洲的阶级合作主义、日本的集体主义以及美国的个人主义的生产模式,人们就能够发现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决定的方式)不甚了解,就根本不可能把握协作的具体形式(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内在劳动力市场”、管理性的官僚机构、共同决定的体系、劳动力市场法规的功能等等因素的类型与范围)。应该说,在一个生产力日益呈现出社会性本质的时代,一些主要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能力,不仅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而且与特定的文化把科学技术的力量动员与利用起来的能力直接相关。日本的那种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对一种新型的生产过程理念的扩散与传播来说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类型;美国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体制对于新技术的发明与发展来说是一种理想的类型;而欧洲的阶级合作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就新技术的有效开发来说是一种理想的类型。

上述这些论述把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作或劳动关系问题置放进了一个全新的解读视域之中。由此,在累积性的技术与生产力决定论方面的一些论点也就必须加以修正。在劳动关系问题上,马克思除了使用一些简单的取悦于人的军事性隐喻外,没有并且也不可能对这种关系进行理论论述,这是不奇怪的。列宁简单地因袭了恩格斯的那个具有致命错误性的假设,即劳动关系是由技术因素所决定的,因而



认为社会主义具有类似于数学上的那种泰勒级数式(Taylorism)的功能,这同样是不奇怪的。同时,即使是在过去30年中对劳动问题的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即哈维·布雷弗曼(Harve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也没有作出比马克思本人的劳动社会学观点更深入的理论研究,这应该说也是不奇怪的。 43

上述这种分析对于正确评价“阿尔都塞主义”在剥削阶级内部关系问题上的解答思路同样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文化并不是一件只与剩余产品相伴而生的东西,它是日常生活的经纬线,不仅从上而下(譬如用来把美国经济中的某些部分组织起来的“青年文化”,以及“各阶级合作主义的文化”),而且也从下而上(譬如抗议和抵抗的模式、网络、工会文化以及狂欢节等)地被注入到工作场所之中。各种历史的、具体的、偶然的文化实践都被拼装进了(过去也是如此)以各种形式维持劳动价格稳定的体系之中。

既然文化是历史之一束,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文化来理解历史的,既然社会历史(和其他东西一样)是文化的历史,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没能领悟社会历史或现代人类学的真实意蕴,马克思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

作为结论,我们可以说,生产力始终只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因素多元决定的。社会力量,作为一个整体,在劳动关系中以一种简洁或浓缩性的形式存在着,而劳动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种最为丰富且在社会性维度上最具有“浓缩”性的社会关系。这种情况在娱乐界和体育界也许是最典型的,人们付了钱去观看劳动关系(或其中的一部分)的具体表



现。文化与劳动之间的关联性在这里是最直接明了的(譬如,把棒球和足球的文化与历史作个对比,就可以发现文化与劳动之间的不同关联)。

## 自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马克思是在一种“前人类学”(preanthropological)的阶段进行话语言说的,在这种阶段,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历史尚处在不发达的状态。这一思路不仅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具有充分的历史性(或文化性)的,而且也意味着他对一般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具体性的协作模式的理论分析必然是不完全的和有缺陷的。

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维度上也很不彻底。马克思是在生态时代之前进行写作的。他对化学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生物学的兴趣。塞戈·波多林斯基(Sergei Podolinsky)是第一位生态社会学家,他认为在价值理论中应体现具体的客观自然界的因素,可马克思却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观点。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积累、竞争、经济危机、资本的集中与垄断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理论阐述中,自然界(自然系统)内部的生态与物质联系以及它们对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虽不能说被完全忽略了,但也确实被相对地轻视了。事实上,处在工业和社会劳动的分工(以及劳动者的各种社会分工)情境中的工作场所的内部以及工作场所之间的协作方式,无处不充斥着生物学的、自然的以及化学的特性。我们<sup>44</sup>知道,超过一定年龄的男性以及任何年龄的女性都是不可能参加“核心棒球联合会”或“全国足球联合会”的。对前

者的排除是一个自然性的事实,而对后者的排除尽管主要是一个自然性的事实,但同时还是一个文化性的事实。

自然系统(气候和地质的力量、化学反应、食物链等等)是生态科学的研究主题,正像它是从文化性和实践性的本质维度来定位的当代生态性的一个理论基础一样。荒原的概念已不再变得可怕,把原始森林彻底砍完的想法在很多领域已变得不能被接受。马克思(作为一个研究变化与潜藏着的危险之间的辩证法的理论家)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以使我们关注上述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相关的)社会事实。尽管自然系统(包括大气层本身的构成在内)之具体形式往往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结果,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构成自然系统的化学、生物和物理的过程是独立于人类系统而自主运作的。这是一些自主性的生产力(就像它们同时也是一些自主性的生产条件一样)。人类可以通过石化产品加快(自然系统中的)增长周期,可以通过改变化工生产中的空气构成控制化学反应的过程,但这些增长周期和化学反应仍然是建立在自然界本身的内在发展趋向或者说“弱”规律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那些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者,至今仍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之中,而且还内在于生产关系之中。“自然”的生产关系意味着自然条件或自然过程(不管是否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的一定形式,与任何其他因素相比,对任何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的发展,提供更为多样的可能性。对马匹和家禽的拥有权是以拥有足以养活这些动物的一定数量的(在数量上与日俱减)土地为前提的。在没有很好的内陆或沿海的输水系统的地区,封建的生产关系会繁荣起来,譬如,在法国的内地,“货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是意味着“税收”,而不是

“价格”。英国之所以没有经历严格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不仅是由于其主导性的个人主义文化(这可以追溯到13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其内陆及沿海输水系统的发展程度(及由此而带来的经商机会)。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商业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很早就发展了起来。在巴西的罗道尼亚(Rondonia),由于热带雨林气候对土壤条件的破坏,使那里既不适合于小范围的农作物耕作,也不适合于大范围的牲畜放牧。在早期的英国和法国,生铁铸造业只具有很小的规模,这是因为这些铸造厂必须紧挨着树木或森林,而对这些东西的小规模的所有权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美国的钢铁工业被彻底地资本化,部分原因在于那些钢铁企业往往位于很远的铁矿和煤田之间,因而负担着高额运输费用。当自然资源被用完,或者被毁坏的时候,现存的财产关系往往就会发生变化,同时,生产力的本质也会发生变化。在加利福尼亚州中部海岸的爱普托斯河地区(Aptos Creek),大量原始森林的被砍伐导致了相对发达的资本化的木材工业的发展。在圣塔·克鲁斯山附近的地区,对森林的自由砍伐给小私有业主的果园和葡萄园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45 关于“自然的”生产关系的例子是很多的。在公海上,一条船的船长(很久以前他也许是这条船的部分拥有者,现在他可能只是一个雇员,或者也可能是一个小股东)拥有(以及需要)或多或少的绝对权力。一架民航客机的机长同样如此。小规模财产所有制对哥斯达黎加来说要比对其他的中美洲国家显得更为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根源那里的地形特征。在革命前的古巴,烟草和咖啡种植业被打上了小规模所有制的烙印,就前者而言,部分是因为对技术性手工劳动者的需要,就后者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优良的山区土壤。与此相反,蔗糖种植业却与中等或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所

有制联系在一起,这部分是因为蔗糖生长在绵延起伏的平原地区,部分是因为(与此种作物的特定的本性相关)这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性工人。大多数的城市都是在河流的交汇处和天然港口地区发展起来的,因为只有在这些地区,中、长途的商业活动才是可能的,这些城市很快就成了手工业工人、工匠、商人、银行家及其他一些人的集中地。

不仅是生产关系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体现出自然性的特征(电子学的革命大大加速了银行资本的集中化),而且,生产力也是如此。很显然,自然系统(或自然过程)的特征是内在于采矿业、农业、渔业等领域中的协作方式之中的,这就使得马克思有必要修正他的生产过程的概念。自然界不仅是生产过程的“合作者”(正像马克思多次看到的一样),而且还是一个自主的合作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忽略了这一层内涵)。自然系统的特征同时内嵌在建筑和交通行业的协作模式之中。建筑物是需要空间的,这就限制了在建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作为生产力的)协作的种类(在那些建造高层建筑的建筑公司内部及公司之间的劳动分工是相当复杂并且具有很强的时间选择性的,其原因在于空间的限制以及此工种的危险性)。交通行业是以某种对包括领空在内的空间资源的全国性使用为前提条件的。在任何一种制造业中,劳动关系都是从属于许多不同的和复杂的自然过程的,从冶金术中的化学过程到切屑工艺中的物理过程等等。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人类的身体,甚至人类的心灵本身的特征,使某些协作方式在生产过程中成为可能,并把某些协作方式排除在外,同时也使某些协作方式在生产过程中成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反之亦然。人类的劳动不仅建构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之上,而文化规范与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家居什物在被出售的时候总是被说成是“很有用的”,公司也总把它的工作环境说成是“有人情味的”。在具体事例的研究中,只有立足于对文化与劳动之间的内部联系的辩证研究才可能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46 社会劳动同时也被赋予了自然的特征,反之亦然。人类的劳动不仅建立在阶级权力、维持商品价格稳定的努力以及文化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立在自然系统的基础之上,而自然系统反过来也被社会劳动所调节。资本内嵌于自然过程之中,改变着自然界的规律及可能的发展趋势,或者在创建一种先前不存在的自然界之新形式或新关系的意义上改变着自然界。譬如,把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结合起来,结果发现了一种能杀死自身的有毒废料的有机体。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根据社会化原则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劳动中,文化与自然的因素是相互并存和相互融合的。从物质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文化生态学和生态文化学的客观存在。不过,这里依然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在总体性的物质生活和具体的劳动关系中,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到底是什么?在生产过程中,一定的文化实践与一定的自然(物理)过程结合起来,却会导致像切尔诺贝利和伯普尔(Bhopal)这样的事件。

在这两个事件中,文化实践的结果是物理和化学的规律失去了控制(可以这么说)。换一个角度来说,物理与化学规律的确呈现了出来,但劳动关系的文化特征却同样也失去了控制。这些灾难既是自然性的又是社会性的,正像在城镇周围发生的地震灾害不仅是一种自然灾害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性灾害一样,城镇本来就不应该在這些地区建立起来。

文化与自然维度上的不确定性,共同决定了劳动关系或协作方式中的不确定性。譬如,工人的怠工和“故意死扣规章而减少生产”(work-to-rule)的现象在不同的种族和民族文化背景中是很不相同的,自然界的“惊奇”或“神秘”性在不同的生态和物质生产过程中同样也是有很大差异的。随着千年纪元的临近,全球化资本加大和加深了对人文和自然的控制,社会劳动(社会劳动的分工和劳动者的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人们至今尚未发现一种与帝国主义的(发达的与欠发达的)旧有模式或其转型模式相类似的、有关当今之全球化资本的既定模式,以阐发这种资本的力量。当今的世界经济变得非常复杂。我们现在已经明确的是,作为资本全球化的结果,一方面,文化关系内在于劳动、劳动关系以及其他领域中的方式,另一方面,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关系内在于劳动过程之中的方式,正在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化。“生产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灾难”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加快,“灾难”的原因也越来越多。“十二步计划”(twelve-step programs)的阶段所出现的酒精中毒、对油料运输车的结构方面的外界干预、超级油轮设计方面的缺陷、公司之间在石油的开采和分配方面的竞争、自然和物质系统的复杂性,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似乎就导致了“艾克松·弗德茨”(Exxon Valdez)灾难的出现。持“社会危机化”观点的理论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了思想的前台。这个世界似乎不仅跟劳动和社



会越来越相异化,而且也跟资本越来越相异化,世界越来越具体了。于是,现代虚无主义、右翼人民党主义以及其他一些非理性或亚理性的思维方式便不断地涌现出来。

理论及实践模式的选择是以对劳动关系中的协作的文化和自然形式之间的内部关系进行深入的关注为前提的。一种单一的生态学文化所导致的是单纯的绿色政治;单一的文化生态学导致单纯的红色政治,即退回到自然界的人性化(自然界的被支配性)的主题上面。因此,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在物质性和政治性的维度上扬弃绿色政治和红色政治。

#### 注 释

1. 参见德雷克·塞耶:《抽象的暴力》(牛津:巴塞·布莱克威尔,1987年版),此书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观点。

2. 马克思曾经对在历史的延续性与变化问题上的另外一种理论进行了批判。这种理论认为,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关键性的方面是由自然界所能提供的物质可能性和局限性所决定的,我们必须依赖于自然界来谋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马克思的历史范畴对这种在历史研究问题上的“被动的唯物主义”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有时候,这种观点被称为“环境决定论”,在19世纪的时候,它与英雄史观非常尴尬地并存着,这是与当时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主义(居住在南美的有色人种被认为是懒惰的,原因是当地气候很热或者是因为当地自然物产太丰富了)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今天,这种观点也跟绿色主义运动联系在了一起。譬如,绿色主义运动中就有这样一种观点:人们应该根据特定的生物圈所提出的生态要求来建构自己的物质生活。这是一种有明确的建构意图和实践用意的观点。当然,正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抽象的观点,因为,人们已经具有了一定(或许多)的社会生活的组织模式,如果他们失去了这些模式,他们很快就会失去拥有任何一种生活模式的可能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其“主动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目的,不仅在于批判历史唯心主义,而



且也在于批判历史研究中的被动的唯物主义。

3. 爱伦·伍德、尼尔·伍德：《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和古代的政治理论》（牛津：巴塞·布莱克威尔，1978年版），第59页。

4. 譬如，雷斯尼克（S. Resnick）和沃尔夫（R. Wolff）在《知识与阶级：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批判》（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以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观点为基础提出了如下的观点：资本的利润和运动规律是由自然、政治和文化条件“多元决定”的。

5. 这种主张从属于历史变迁与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文学以及其他的一些理论，其实是很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政治文化理论，以反殖民主义的观点、卢卡奇的具体化理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等等为思想基础，在内容上也是很丰富的。阿尔都塞其实是根据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来对文化（被定义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问题作出阐释的。

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54年版），第306页。

7. 乔姆斯基在1995年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一种主流的观点（包括许多左派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内）认为并不存在人性，而只存在文化、历史、环境等等。这种观点好比把一个胚胎说成了一个等待喂食的人或一只等待喂食的小鸟，从本质上说，这种观点完全是缺乏根据的。在我们认知事物的任何一个领域（感官认识、语言及其他方面），这种观点都是明显错误的。逻辑学告诉我们，外延和内涵的复杂性决定所获得的结果的丰富性。一个空无的有机体最终必然演变成一些无形状的、一无用处的变形虫。就语言问题来说，随着它的不断发展，语言之内在的本质结构和原则必将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在这种凸显过程中，当然包含着少许的变化，人类的语言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所取得的。”

## 第二章

# 什么是环境史以及 环境史何以存在？

### 导言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重要的人物、重要的日子以及“历史”事件的积累这样一些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往事背后，存在着一种明确的逻辑性。每个人都按照他或她个人的经验和经历来说现在与过去。历史学家是一些职业的讲故事者，他们一头扎进那些可获得的叙述性素材（这些东西在历史过程中是常有的）之中，然后，根据他们所选择的讲述故事的具体逻辑来把人物与事件安排出来给人听。对马克思来说，路易·波拿巴是一个笑料，而对法国上层阶级来说，他是一个英雄和悲剧式的人物。对反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来说，冷战是一次善与恶之间的战争，对地缘政治性的历史学家来说，

它是对帝国的一次猛烈打击,对圣地尼斯塔斯人(Sandinistas)来说,它是美国人干预中美洲革命的一个借口,等等。

哈顿·怀特(Hayden White)的论文集《形式的内容》是一部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文献。怀特把他在该书中所做的复杂而又精致的论述简要地概括为,一个历史学家一旦选择了一种叙事模式,那么,不管其所叙述的内容被安排得多么井然有序(譬如,事件1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件3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也不管对特定的人物或事件多么地强调,他或她所写的内容或素材其实或多或少地都是被预先决定的。叙事模式本身决定了什么样的“真实事件”(怀特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什么样的“真实事件”则不能扮演重要角色。

怀特的“真实事件”概念说明后现代主义受超越唯心主义的信念所累。这一术语在怀特的著作中出现过很多次,但既没有被定义,也没有被质询。就像葡萄干掉进布丁之中一样,“真实事件”概念只是一头扎进了怀特的叙事之中。虽然他以及其他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可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脱离了相关的“理想事件”(我的用语)的思路,“真实事件”(譬如物质性的或社会经济性的事件)其实不可能真正出现——也就是说,认可一种话语行动的存在,认可在概念内涵的分享问题上的新的转向,以及在主体间性的形式或“个体”的社会结构问题上的崭新的观点——但其思想本质依然如此。尽管从语言的角度来通达物质世界,的确是人类所能获得的唯一的认识之路,人们对这个世界之意义的探索也始终是语言性的,但物质世界本身无疑仍然是客观存在的。换一个角度来说,后现代主义者总是倾向于忽视或弱化“真实事件”与“理想事件”之间的结合方式,即物质活动由以组织起来的社会化方式、这种社会化组织方式的意义以及与物质活动交织在一起的主体间性问题,这样,编史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他们的理

论中就成了盲点。再进一步,后现代主义者虽然对用来“讲述故事”的特定叙事模式之类型和结构看得很重,但他们事实上并没有提供用来阐明叙事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的方法。

尽管有上述这种理论空场,后现代主义仍然坚持认为它对如下的现象作出了解释:为什么每一代人或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要重写历史,为什么在每一个既定的时代,历史学家们都会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争论不休(正像有些人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可能知道“真正”发生过的事件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会发生)。后现代主义的逻辑是,历史故事的内容随着时间的发展必然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代它是有不同的内容的,因为讲故事的人已经变了,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每个人都是磨他或她自己的斧头、煨他们自己的炖锅,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政治与文化的兴趣和观察角度以及各自不同的叙事方法。更进一步,每一个人对“真正的”斧头和“真正的”炖锅到底是什么样子,它们(话语、自然物体也是一样)对使用者、对外界旁观者、对身处西藏的某个人、对后世子孙等等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等问题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后现代主义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因而最终走向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走向了相对主义和观点上的武断,甚至站到了虚无主义的边缘:首先,后现代主义者对真实事件与叙事模式背后的社会结构视而不见,也就是说,他们忽略了决定或影响事物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的结构因素(从这里所引导出的是理论分析的抽象性和层次性问题)。其次,他们没能特别关注典型(相对于非典型而言)故事的意义,历史素材在这种典型故事的相关语境中是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的(这样就避免或减少了在选择好的语境或框架中事物所可能具有的意义的复杂性)。再次,他们漠视了以结构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学,漠视了对主观性以及抵

制性文化的研究,而这些东西恰恰是能够在结构与过程,或结构与意义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的。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至少已经部分地摆脱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陷阱。对历史的书写和重新书写——把以前的那些模糊不清的研究死角加以阐明,对那些早就被忘却或被禁锢的声音的发现,对流行与时尚的解释,对“伟人”的重新评价,对主体性(或人格)的历史性建构等等——都遵循着一定的基本逻辑,至少就过去二三百年的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来说是如此。<sup>1</sup>

对历史写作之内在逻辑的解析,应该把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而不是把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具体叙事模式作为研究对象。广义地说,现代西方的历史书写从政治、法律与宪政的历史开始,在19世纪的中后期转向经济的历史,在20世纪中期转向了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直到在20世纪晚期以环境的历史而告终。编史工作的这种谱系在内在逻辑上是紧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而来的:在第一个阶段,政治、法律及宪政方面的改良与革命,建构了私有财产、财产所有权、公民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框架;在第二个阶段,部分地由政治改良与革命所推动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技术革命,开创了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历史发展(经济斗争、市场的发展、财政、竞争等等)的可能性;第三个阶段,随着土地、劳动等虚拟商品、社会生活、文化、大众社会、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社会斗争等因素的商品化,以及对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起促进作用的多种族社会的发展,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文化获得了发展;第四个阶段,在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以及经济和社会/文化必然性的框架内,发展出了自然的资本化,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然,以及为这种自然所展开的各种斗争。这在另一个角度上也导引出了环境的历史——最新的并且也许也是最后一种历史的

类型。

实际上,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结构转型至少已经用一种粗略的逻辑,书写了其自身的历史叙事,这种历史叙事与发生在政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整体的社会与文化、环境或“自然”领域(包括客观环境或必然性与主观愿望或主体意志之间的矛盾这一普遍性的主题在内)所发生的变化,是相对应的。

结构性的变化并不直接引起历史书写方面的新的类型:社会冲突与社会斗争在其中起中介的作用。特定的结构性变化导致社会斗争的特定类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与文化的、环境的类型的依次排列。不过,虽然社会冲突与斗争的新的类型,是历史主题的不断更新以及对资本主义历史的批判性阅读方式的不断更新的大致原因,但其深层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性的变迁——资本主义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与自然相联系的方式的维度上不断地展示自己。由此,任何一种对这一整体性主题的阐述都必须既对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又对这些变化之间的中介,即社会斗争,再加上对编史工作的新的类型的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并不是一个步伐一致的单线性前进过程。正像作为历史学家之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譬如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的及联合性的发展过程一样,在编史工作中,像不平衡发展、联合性的发展等这样一些概念也已经开始得以运用。由此,历史的每一种新的模式(在最好的状态下)都是先前模式的一种激活、扬弃以及激进化。如果说,资本主义历史中的各个不同阶段可以用社会斗争的各种不同形式(譬如政治斗争、资本内部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社会及文化领域的斗争、在自然界问题上所进行的斗争)来标明的话,那么,这些斗争的具体表现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也是不平衡的。每一个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一种类型,

显然都有其自身的历史。譬如,资产阶级一般都有这样的想法:作为各种反抗运动的结果,自己夺取了权力和理性,可这是无充分根据或多少有点背信弃义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这种感觉在不同的国家也是各不相同的。充分发展与不充分发展之间的辩证法同样也导致了不同的民族历史。譬如,帝国主义、帝国这样一些范畴一般都出现在最主要的工业国家的历史叙事之中,而不可能出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叙事之中。在反历史或反对叙事的流行时尚中,一些社会主义的传统凸显了出来。在美国,历史从政治的历史一下“跳”到了弗里德里克·杰克逊·图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环境主义的”历史。作为一个其身后紧跟着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威廉·爱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等人的重要人物,图纳对美国的西部发展史进行了重构。在这种西部发展史中包含有很多环境史的内容,并且还建构起了作为环境史之核心内容的争斗—征服式的殖民化的解读路径。<sup>2</sup>上面所勾画出来的那种以“阶段理论”为基础的编史学,是从特定地区或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和联合性的发展形态中抽象出来的,同时也是从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国家之间的不同关系中抽象出来的。 51

社会斗争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后发性的斗争往往对以前的斗争作渐进式的扬弃。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年代,“环境”的主题一点都没有被涉及,而在当今的环境斗争中,却总是涉及政治的主题。19世纪的劳工斗争很少涉及环境的问题,可当今的劳工斗争却把环境的维度看得越来越重要。同样,就种族和性别问题所展开的早期文化斗争在环境问题上或多或少都是保持沉默的。今天,环境问题上的种族主义,或者说为了环境的正义而展开的斗争,以及试图对有关环境的破坏、阶级、种族、性别等主题进行扬



弃的经济—女权主义斗争已经显示出了力量。我们在所关注的问题和所取得的经验的维度上建构起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话关系：过去的社会背景积淀在当今所写的历史叙事之中，而现在的历史叙事，由于其在所关注的问题上的推进，以及其认识过程处于后来者的状态，因此，能够看到一些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被遮蔽了的东西，由此而使历史书写得以激活。在这种对话关系中，未来也是被包含在其中的，因为现在的历史书写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影响着未来世界的改变。譬如，现在对环境史的重视就可能影响未来的历史学家所居住的那个自然界的具休样式。

沿着这一线索，我们可以发现，环境的历史可以被视为先前存在过的各种历史类型的一个发展顶点——假设我们把体现在当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中的环境性维度，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历史都包括在内。环境的历史其实远非现在的不少历史学家所仍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而是（或者说应该是）当今编年史中的一个中心内容。环境历史学家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指出：“一个想把历史置放在其原初的语境之中，并使历史能够具有意义的历史学家，就必须成为一个环境历史学家。”<sup>3</sup>

## 什么是环境史？

把环境史视为先前各种历史类型的发展顶点的观点，可能并不像其表面所显现出来的那么过分。许多环境历史学家用他们所能想像出来的最宽泛的术语来定义其所研究的领域。唐纳德·伍斯特（Donald Worster）说：“环境史的主要目标是能够深化我们在下列问题上的理解水平：随着时间的流

逝,人类的活动是如何受到其所处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影响的,以及反过来,他们又是怎样影响自然环境的,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sup>4</sup>

按照伍斯特的说法,环境历史学家面临着三个层面的问题:一、“理解在过去的时间中已经有机体化以及发挥着自己的功能的自然界本身”,包括人类有机体在内。二、“引入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的理论视域。在这一视域中,我们关注的是劳动与劳动工具、从劳动过程中生发出来的社会关系、人们从自然资源中把产品生产出来的各种不同的方式。”三、“这是一个纯粹精神的或学理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中,人类的认知力、伦理、法律、神话以及其他一些人类意义之表达样式,都成了人类个体或组织与自然所进行的对话的一部分。”<sup>5</sup> 上述三个层面的区分只具有理论分析的意义:“……虽然为了分类的目的,我们努力把上述三种环境研究的层次区分开来,但事实上它们共同构成一种动态性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自然、社会与经济组织、思想与愿望是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这一整体随着自然界的变化、人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它们构建了一种贯穿古今的辩证法关系。”<sup>6</sup>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阐明这一点,那就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类通过改造、破坏或者其他方式作用于他们所置身于其中的环境,反过来会对他们自身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环境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限制或允许人类的活动,这反过来会对环境自身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这一问题以一种三位一体的形式,即自然、劳动(劳动工具、劳动活动等等)、文化三者组合在一起的形式凸显了出来。在这三种因素中,到底哪一项应当加以特别地重视?

换一种不同的说法,环境史研究的是人类力量是如何塑造和改变“自然”以及如何建构人工环境和空间结构的,自然

与文化环境是如何既促进又限制人类的物质活动的,反过来,人类的活动是如何既促进又限制“自然的系统”以及文化的发展的。从这一角度看,环境历史学家的方法是直接攻击惟一的总体性社会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的。其实,这两种方法都是能动的唯物主义的。环境历史学家们手举着一面镜子面对着这个世界,努力想把世界是怎样形成并塑造自然界的,以及怎样塑造其本身内容的过程直接地反映出来。世界是通过社会化的劳动(技术和社会劳动的分工、权力与劳动者的社会性分工)来完成上述这些任务的,这种社会劳动对物质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起调节的作用。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写成的有关环境史的文献中,“人类的作用力”或“人类的力量”变成了“人类的物质性力量”或“物质活动”,劳动被看成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力量。自然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劳动的历史。

上述这些审视世界以及审视历史写作的方法都是很有意义的,当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环境史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发展得最快的历史研究领域。对人类的物质力量、文化、自然之辩证关系的更好的和更深刻的研究正在不断的涌现。现在,每年都要召开很多次有关环境问题的研讨会,越来越多的有关环境史的学术论文被提交。地方性环境史的研究正在对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好古主义(antiquarianism)基本思路提出挑战。人类组织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不对称和矛盾关系,都已成了生态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并且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和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家手中被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政治学家们已经开始对霍布斯、卢梭、杰斐逊、潘恩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哲学家思想中的“自然”观念进行研究。对索罗(Thoreau)、缪尔(Muir)、平乔特(Pinchot)等环境保护主义者和自然资源保护

主义者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在过去的十年中，“女性与自然”的主题在南部国家与北部国家中的历史学家、经济—女权主义者、人类学家和环境主义者手中受到了非常强烈的但又是截然相反的对待。在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墨西哥、巴西、非洲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与地区，新“世界环境史”以及对当下环境问题的新的总体的和具体的研究工作正在展开。对人类个体的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清洁”和“节食”的意义以及在环境的维度上来加以定位的村庄与城镇的历史性研究工作也正在进行。以前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研究的“人体系统”的问题，在当前的有关环境影响的主导报告中，成了环境史领域中的一个非常具有实践性特征的研究课题，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地增强。自然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界限很早之前就已经被突破了。社会科学家们正以一种更为认真的态度和更为系统的方法，对被称之为水龙头和污水池的“自然”（以及被称为水龙头的“资本”）进行研究。一些人文学者对“自然”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意义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它们为什么要被建构出来，这些不同的建构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冲突，以及它们将向何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环境保护和对历史文化景点的保护与恢复的观念正在不断地被人们所接受。经济地理学在基本思路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从原来的环境决定论逐渐转向了对马克思所说的“能动的唯物主义”（active materialism）方法的接纳。文化研究对以前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自然”的理论框架进行了解构。今天，生态学成了自然科学中最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在大众读者群中，有关自然界的著作越来越受欢迎，人们对温室效应、臭氧层、环境对人类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等问题的关注也正在逐年上升。

与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史的研究相比，环境史的研究

无论在方法还是在研究主题上都要广泛得多。环境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包括：能源的利用与衰竭的历史；大气、气候甚至在人的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的变化；某种特定生物体的数量及其无机性的“身体”；生物带、分水岭、生态系统、生态区域、分界线、边缘、生态走廊、生物的镶嵌式的分布等。在他们的研究视域中，环境是作为资源、一种温和宜人的东西、经过社会化建构了的空间以及人类智力的反映来看待的。他们根据城市与偏僻乡村之间的关系来书写城市的历史，反之亦然。他们研究了森林、湖泊、河流、海岸线（得到保护或没有得到保护的）以及所有的各种人造景观。这些环境历史学家还对城市的公园、建筑物的风格、郊区的森林带和林阴路、街道的模式、斑马线、废弃的军事基地、工业区等进行了广为深入的研究。<sup>7</sup>

54 在公园内玩耍的孩子所发出的声音、用生态性的壁龛来作为置放物品的空间的作法所产生的生态影响、从停车场驶向中心街道的车流所发出的烦人的噪声、大型客机起飞时所发出的巨大声响、公园在发展邻里关系的维度上具有何种意义——所有这些都属于“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有著作专门对一些特定的生存空间进行了描述，这些空间像农家后园一样狭小和不被重视、像原始的红木林一样令人可畏。总体上说，任何一样东西都处在环境历史之中。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仍然受到人类物质活动的影响，同时，它也影响着人类的物质活动本身。

简而言之，环境史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这个星球上所居住的人、以及所有受到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所影响，同时，其本身又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产过程起促进或限制作用的其他各种生物以及无机物的历史发展过程。它的研究主题其实就是人类与其“周围事物”（字典上对环境的

定义就是如此)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对人类(“社会”、“经济”)本身的社会关系进行彻底的研究,如果不对存在于自然界本身之中的生物的、化学的和物理的联系(对自然界的发展起改变、阻碍或促进的作用)作很好的研究,就无法对人类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作真正的解读,因此,不管是对哪一种实践用途来说,环境史的研究范围都是无止境的。我们今天的环境事实上已经被无数代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改变过了。既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结构与过程决定了环境的利用方式及可能产生的影响,那么,从理论上说,环境史就是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的兼容(和扬弃)。自然史不仅以生物学、土壤科学等为理论前提,而且也以政治和法律的历史(譬如,对财产关系和财富本身的界定的历史过程,对何种自然物将会丰盛、何种自然物不可能丰盛,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经济史(譬如,资本对自然界的非生态性利用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史(譬如,审美的历史、具体历史阶段的社会鉴赏力、被认为是芳香的植物的种类、什么样的东西被认为是“美”和“丑”的等等)为理论前提。有人也许会再加上一个“伦理史”的维度。在一个世纪或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那些向庭院耕种者推销种子和球茎的商人对他们的顾客说,一个打扮得非常漂亮同时又维护得很好的庭院,是家庭道德、讲究清洁以及受人尊敬的生活模式的标志。从总体上说,环境史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同时也是惟一真正的“普遍的”或总体的历史。<sup>8</sup>

当然,环境史的研究也是有具体的理论关注点的。在不同的条件下这种理论关注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譬如,分水岭、本地物种与外来物种之间的交替性活跃或两者之间的辩证演变、农业土壤的变化等等。环境历史学家在特定的时期研究特定的对象——譬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西部的水坝建



设所起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北海海滩出现污染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中美洲海岸平原地区所实施的农业的单一性种植模式的内在矛盾问题。

55 尽管环境史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文化、物质生活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但这种研究无疑是受到所研究的地点或地区的特殊性的限制的。当然,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某个地区的历史是无法与其他地区的历史相脱节的,因此,从总体上说,每一种环境史都是与其他的环境史联系在一起的。某个地方的文化地理情况(森林地带、林阴地带)是与该地区的农业发展史(在某个地方用化学的方法促进农业的单一性种植以增加当地居民的主要粮食的产量)、交通路线的构型(当地居民上下班所使用的行车道)、生物的保护(当地的森林带和公路对野生动物及人类所产生的影响)、审美的倾向(郊区的发展模式、立体交叉式公路和“主要街道”的特征)、资源的衰竭(通过砍伐森林来促进当地的木材加工业及为建造牧场主的住宅提供木材)、空气和水的污染(由当地的汽车和所排放的污水所导致的)联系在一起的。

环境史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是一种总体的和普遍性的历史,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具体的地方性的历史。由此,环境史也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危险:一是由于其超时代性而带来的枯燥乏味的危险(即“具体特性的死亡”、“世界的丰富性的终结”、“把地球看成是宇宙飞船式的刚化的东西”);二是由于其可能演变为对这个或那个地方的这种或那种环境变化所作的文摘式的记录而导致的琐碎性的危险,环境史由此可能成为任何一种东西的历史,因而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空洞的历史。不管是超时代性还是把理论关注点误导入琐碎的细节,尽管的确都是一种理论研究中的危险,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最起码大多数的环境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生



态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一些学者都愿意去冒这个危险。不然的话,一方面,我们怎么去发展整体性的范畴,另一方面,怎么去发展有关我们周围环境中的边界、角落、后院的小径的一些知识?我们有什么办法去解读被称为“全球性自然”的生态样式的粘结性问题?特定的与总体的、独特的与具体的、具体的与总体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对环境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sup>9</sup>换一种说法,伍斯特所说的环境史研究的庞大计划及其总体上的可能性,其实并不要求一种相应的总体性的方法,环境史研究并不致力于获得那种“总体性的和排他性的真理”,而是立足于“具体性”或事物的共性基础上的、独特的历史主题或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由此也立足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一个事物与所有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的方式之上。环境历史学一直是一个很宽松的研究领域,它往往会无批判地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汲取一些东西,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从人类物质活动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中汲取某些东西。在它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对于真正阐明“自然的历史”来说是非常关键的。这里的问题是,由于所有的历史性关系都同时具有不可化简的社会性、社会—物质性、物质—社会性、物质性(自然性),因而,历史学家必须在所有这些抽象的层面(以及它们的各种中介层面)上,来准确地勾画出经济力量以及其他的一些力量为什么以及怎么依赖于环境的;自然界是如何既促进又限制人类的物质活动的;环境的变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化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要想对环境史的丰富内涵作出正确的解读,我们就必须把它置放进最近二三个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编年史的谱系中。以“西方”的历史为例,在环境史的书写模式之前依次出现过以下三种主要的历史书写模式: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

第一种资本主义的历史是政治史。第一批现代历史学家是政治历史学家,他们对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中的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巩固及与此相联的政治斗争,以及宪政、法律及其他政治领域内的改良与革命进行了研究(包括他们所提出的在以白人殖民者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倡导反殖民化观点的这种“颠倒”的、镜像式的思路)。唐纳德·伍斯特说,“在那些过去的日子里,每一个人都知道政治是唯一重要的主题,民族—国家是唯一重要的领域。个人被假定有权调查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共谋关系、法律被批准通过、立法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斗争以及外交官之间的谈判等事项。那段年代久远的、自我确信的历史其实离我们并不十分久远——也就是一个世纪或至多两个世纪之遥。”<sup>10</sup>

早期的许多政治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或政治和法律的理论家;他们从不把理论阐述与对历史客体的评判割裂开来。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描述而且还试图对民族—国家(根据伍斯特的说法,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民族—国家在民众的可接受度上达到了顶峰)、以及帮助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法律领域内的斗争、制度、气候等因素进行了阐释与评判(往往是赞美性的评判),资本主义的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正是在这种民族—国家中得以兴起和繁荣的。

这些在最广义的政治与法律维度上来界定的新型权力关系,为工业革命及19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构架。用文献来记录下这些新型权力关系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们使那些新冒出来的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充分地意识到无论是在专制统治时期、君主立宪制时期,还是在自由民主制度兴起的时期,由改良与革命所导致的那些新型的并且似乎也是永恒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

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历史书写模式是经济史,它研究的是在物质生产和技术、分配、交换等领域内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广义地说,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扩张问题。经济史的第一种书写模式把“政治经济学”当作自己的主题,这在根源上讲是来自于重商主义时代试图建构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观念的理论努力。后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立足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与重商主义的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一客观现实,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经济理论的研究融合在了一起,由此,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了经济史学家以及理论家的形象。不管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分析对象的理论性的历史著作。沿着19世纪的历史发展线索,经济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主题包括社会化工业劳动中的分工的发展、国内及国际贸易、技术方面的变化以及工业资本主义领域中的一些新的范畴:工资、成本、价格、利润。对工人斗争的早期历史书写也是存在的,但这主要限于劳动市场及工厂的范围内(在人类本身的再生产领域,即家庭、共同体、种族等领域内,斗争史的研究成了后来的社会历史学家的研究主题)。经济史与政治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更为丰满或更为强劲的资本主义物质力量得以发展、国际贸易真正建构起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得以

充分展开之前,民族—国家必须兴起以及得到发展,财产/法律关系必须得到改革或者加以废除(这些都是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出现的一些新的历史语境、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些新变化以及大规模生产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等等因素直接相关的)。尤其是随着马克思《资本论》的出现,新兴的工业和金融阶级对生产力所具有的不断超越自身的发展趋势更为关注,与此同时,他们也比以前更为关注竞争的发展、国际贸易的重要性、经济危机的作用以及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的恒定趋势,所有这些东西都被认为与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一种与人相异在的力量或脱离社会的自我控制的力量维度上,成了一种“自然化”的东西或者说被塑造成了一种“第二自然”(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市场经济的观点以及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理论在这一意义上就具有了反讽的意味)。

资本主义历史书写的第三种模式是社会与文化史,它研究的是在社会与文化的结构与过程领域所发生的革命性变革——广义地说,就是消费主义的兴起(即人类的需要在商品的形式上得以满足这一普遍化的趋势)以及大众社会的形成(即劳动的工资形式的普遍性及“大众工人”的出现)。<sup>11</sup> 社会与文化生活(家庭、社团、种族等)的商品化或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方式的发展,促进了由劳动产品的商品化所引起的社会文化过程中的这种革命性变革的完成。

虽然政治与经济的历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的赞美,但社会/文化的历史书写模式(以及后来的环境史的书写模式)却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是因为(由女性、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等)推动的社会和文化斗争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斗争往往是由财富的占有集团“自上而上”发动的、反对旧的政权体制、重商主义、由国家所支持

的垄断以及专制性的经济规范的斗争)。唐纳德·伍斯特指出,“在一段时期以前……作为‘逝去了的政治’而存在的历史开始失去其存在的依据,历史学家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是由行使国家权力的少数伟大人物完全控制或是由这些人来加以总结的观点表示了怀疑。学者们开始对普通人的生活与思想这一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历史层面进行解蔽,并试图‘从下而上’地重构历史。”<sup>12</sup>在这一段论述中,伍斯特跳过了经济史的阶段,他同时也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从政治史的书写模式向社会史的书写模式的过渡,是由近年来的更为开明的历史学家所建构出来的某种“路径的修改”,它反映的是特定的社会斗争(如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等)的不断发展这一客观现实。就其所表达的意思来说,这条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不过,在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及文化斗争的背后,蕴含着的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结构。“自下而上的历史”的确反映了社会及文化斗争的发展,但就像社会斗争本身一样(“自下而上的历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历史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政治/法律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及其所导致的生产方式的大规模扩张、市场竞争、国际贸易、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劳动及土地的商品化之间构成了互为因果关系。波兰尼(Polanyi)把劳动、土地这一类商品称为“虚拟的商品”,马克思则称之为“生产条件”,这里的意思是说,尽管劳动与土地是被当作商品来对待的,但它们其实并不是按照价值规律来被生产出来的。波兰尼指出,劳动与土地的普遍商品化导致了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以新兴的无产阶级为主要阶级的阶级社会。社会的价值及规范逐渐服从于或者说内嵌于市场力量之中。在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那里,这种分析线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这么说,马克思、波兰尼及其他批判理论家为资本主义社会及文化

58

的分析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他们没能充分地揭示建立在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生活,即以劳动的工资形式及人类需要之满足的商品形式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方式的真正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阐明了资本主义状态下的社会斗争是怎样采用以及为什么会采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不仅发生在市场交换领域,而且也发生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资本各部分之间的斗争、在“竞争性积累”的过程中一个领域中的所有资本与其他领域中的所有资本之间的斗争的形式。差不多100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以及其他的社会/文化历史学家(譬如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男、女同性恋历史学家、地方性的历史学家)把社会再生产、社团、文化生活(包括“传统的”生活方式向社会生活的工资和商品形式演变的过程)领域内的以及这些领域相互之间的社会斗争,也包括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原有的社会斗争的范畴之中。历史学家及历史—社会科学家研究出了人类需要之商品化的内在逻辑,或者说社会及文化的关系及机构的商品化的后果。他们把注意力最后集中到了消费主义上面,即汽车的普及化、郊区的发展、居住、工作及娱乐地点的极其分散等等。百货商店、商业购物区、大众传媒、电视以及其他一些主要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活的表现形式,都成了历史学家仔细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事实上都是从种族文化及其他的文化形式中转型而来的,而后者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最后,当今的文化研究有一个非常基础性的理论前提(虽然没有被明确地说出来),那就是,雇佣劳动及消费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其实只是一个更为普遍的过程,即移民和城市化过程的一个方面。随着从乡村、贫穷地区及贫穷国家向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尤其是资本主义化的城市的移民过程的推进,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也在不



断地加剧。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及 90 年代……社会民主 59  
主义势力的衰退,上述这种无产阶级化—移民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导致了“种族”的混合、少数民族及其他种族组织的持续的增加)成倍地增加了社会控制及文化、政治身份之确认方面的问题,这使得现在的“身份政治学”经常与“地缘政治学”结合在一起。

置于这种“历史之历史性”的语境中,“环境史的观念……在 1970 年”(伍斯特语)的出现应该说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情。它主要源自于环境保护运动(环境史的书写模式只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以及全球性的、多方面的环境危机,正是这种危机导致了为自然界而进行的各种斗争。在这种主要原因的背后,蕴含着的是—种结构性的原因: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资本的积累、社会生活及文化的商品化促成了(或者说这些东西是以一种我们尚未加以系统研究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发挥作用的)对一种新的自然,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式的“第二自然”的建构。这里包含了作为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的自然与作为消费资料及消费对象的自然之间的分离。就像在它之前就已被投入市场的土地一样,自然也被资本化了,它也适用于金融市场的各种规则。湖泊、海岸、森林、生态系统等都变成了“财产”。它们虽然没有“真实的价格”,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工程师们正在给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面、甚至整个生态系统标注价格,用来作为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投资业绩”的一部分。更进一步,自然界按照资本的要求被加以重构,譬如,通过生物工程技术来建构出的工厂化森林(factory forests)等。在社会及文化生活被商品化(这也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它是自二次大战之后开始的)之前,对自然的这种重构及其各种表现形式无疑是不可想像的。



唐纳德·伍斯特根据历史学家所发现的“在不同历史时代都起作用的基本力量”，对从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环境史的转变历程进行了阐述。<sup>13</sup>在他看来，首先，强有力的人物是能够对历史起控制作用的；后来，“阶级、性别、种族、社会等级等隐藏着的层面”被不断地揭示出来；最后，“作为历史过程的动因及存在形式的地球本身”被凸显了出来。这种阐释似乎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对象——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化的自然及与此相关的环境危机。伍斯特的阐述假定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变的东西，历史的书写遵循的是历史过程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家们不断地发现导致历史变化的更为深刻的动力。这些动力——政治及政治领导权、阶级和社会斗争以及“自然的系统”——一直没有被置放在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维度上来加以质询。

伍斯特提出了这样一种鲜明的观点：历史学家的理论视域都是限于一个国家内部的。这种观点对环境史的书写模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后者无疑是跨越地区、国家、大陆的边界的。<sup>14</sup>这意味着资本的全球化既是环境的变化与运动的前提，又是环境历史学家的新的理论关注点的首要决定因素。伍斯特虽然在别的地方也曾谈到过环境对资本主义农业的作用（譬如，与土壤中的矿物质和化学成分联系在一起的单一性的农业种植模式），但在这一段论述中，他似乎忘记了资本主义化的自然界的发展问题。这样，当他在解释环境史出现的原因时，便走向了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运动以及与此紧密相联的“文化的评价与革新”和“道德性的目的”的运动。<sup>15</sup>在伍斯特对环境史的阐释中所缺乏的，是一种理论自我反思的层面，或者说是把环境史的书写当作环境运动的一部分来对待的思维层面（任何一个试图用后面的东西来解

释前面的东西的人,都必须具备迂回论证的能力,而伍斯特显然缺乏这种能力)。伍斯特的阐释中同时也缺乏对资本主义化的自然的发展与20世纪60~90年代的新的全球化经济的困境中所生发出来的环境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的研究。那些土地、矿产资源、河道以及其他相类似的东西,为什么会被用来为石化产品、纸张及纸质产品、高技术装备及其他一些产品的生产服务,而这些产品的生产只是为了导致其他商品的生产;为什么其他一些土地和资源却被用来生产消费品;为什么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则对资本化的工业企业具有较小的约束力,或者说这些规则很难在这些企业中得到贯彻;为什么那些把消费品工业或大众消费模式当作攻击目标的环境运动,往往会无果而终;金融资本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对自然产生毁灭性的作用;普通农场的规模为什么正变得越来越大——对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解答,其实都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前提的。

环境历史学家所探讨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化的第二自然的本质,而且还包括这种第二自然是怎么产生的、它为什么会出現等问题,这当然是以这些环境历史学家采纳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社会经济学的方法论为前提的。他们正在推进一种经济的和政治的阶级(更广义地说是文化的阶级)的形成,这种阶级非常关心为什么他们在经济、政治及社会领域内的革命会对环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是为绿色主义运动、追求环境正义的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把自然界当作人类的身体来看待”的社会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sup>16</sup>

总体上说,在通常的阐释模式看来,当那些一直被压制或一直没有浮出水面的新的社会斗争力量开始出现在社会或公众意识的表层的时候,新的历史书写的模式也就会随之而出现。因此,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被视为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不

断增长的民主化力量的一种反映。的确,在资产阶级革命与政治史、经济斗争与经济史、社会文化斗争与社会文化史、环境斗争与环境史之间,无疑是存在着一种非常紧密的联系的。<sup>17</sup>换句话说,这种新的持续性的历史书写,包括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的总体趋势,其关键点在于它们(以及自下而上的视角本身)都是各自的社会斗争的一部分。但是,通常的阐释模式尽管具有把新的编年史与历史斗争联系起来优点,并进而抨击了在历史进步、社会一致性及其他方面的简单神话式的思维模式,但它事实上对上述这一点却阐释得很少。对社会斗争及作为其内在要素的编年史的深层阐释,应当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中去寻找,即到作为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的总和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去寻找,到环境是被持续性地革新了,或者是被更加资本主义化了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找。

61

### 不平衡的及联合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及环境的结构及态势的不平衡的和联合性的发展过程。正像詹姆斯(C. L. R. James)在《黑色的雅各宾派》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海地革命的发生,在政治维度上可以被看成是法国革命的逻辑完成。美国的宪政体制在19世纪曾在很多的拉丁美洲国家被复制。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则并没有在全球得到推广,在南部国家出现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包括这些地区的“欠发达状态”)阻碍了这种推广的进程。今天,软件开发的真正中心也许是在印度,而不是在加州的硅谷,而真正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形式也许是在像洛杉矶这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大都市。同

样,资本主义的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在大多数的南美国家都姗姗来迟。美国的流行文化在当今世界上是一种普遍性的商品,也许还是惟一的普遍商品。现代主义潮流希望业已废除的旧的精神信仰及实践在东京、迈阿密、开罗及其他的一些城市与地区以一些新的形式得以重现。

与此相类似,历史书写模式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和单线式的,而是复杂的和辩证的。历史学家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出现而简单地抛弃政治性的历史书写模式。随着资本与雇佣劳动、自由民主制度的多元政治、以及在工业化的力量、国家管理、福利制度、公共官僚政治、行政法等因素之间的激烈冲突的发展,政治史的书写转向了一种新的形式。经济史的书写模式也没有随着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及文化的出现而消失了,它的范围被扩大了,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电的时代和电子时代)、大众零售及大众消费、经济政策上的凯恩斯革命等等都被包括在里面。社会及文化的历史学家也随着特定的资本主义化的自然的形成,而把其方法及理论视域扩展了开来,使其能对荒野、保守主义及保护主义、文化及都市景观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内涵和意义作出阐释。

不管是在“真实的历史”(“真实事件”)还是在历史书写中,任何的变化都是具有(同时也必将永远具有)连续性的。不平衡及联合的发展意味着,任何一种历史书写模式都将在后来所出现的新的历史书写模式的方法及视域内获得新生——政治史在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历史书写中;经济史在社会和环境史(以及修改后的政治史)的书写模式中;<sup>18</sup> 社会及文化史在环境史(及修改后的政治、经济史)的语境中得以新生。罗伯特·韦布(Robert Wiebe)的《自我约束:美国民主的文化史考察》一书就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阐释美国的民

主问题的,他把美国的民主(与其他东西一起)解读为美国白人追求团结一致性的一种方式。经济史学家埃里克·霍伯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著作也是如此,他把对资本主义社会及文化的深度理解带进了经济史的书写之中,而在过去的大多数经济史著作中这种情况是没有的。(相反,自马克思的

62 《资本论》出版以来,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工业革命期间在英语国家兴起的消费主义潮流的重要意义,直到最近才由于社会及文化性的历史书写方法的发展才真正地得以重视。以前在狭义的维度上加以定位的经济史(譬如,阿什顿(T. S. Ashton)的《工业革命》中所说的那种经济史),现在不仅被文化史而且也被环境史加以了丰富。直到最近才有了一部关于在经济上具有有效性但在生态上却具有破坏性的瓦特蒸汽机的历史描述。(我们不得不在两个世纪之后才弄明白在当时兰开夏郡的人民那里是十分显然的一些事实!)同样,当今的环境史学家也已经开始重写欧洲的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他们对迄今受到忽视的生态破坏的反作用问题加以了强调,修正了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及经济快速增长问题上的传统观点(强调了过去被工业资本粗鲁地忽视的工业资本所带来的反面事实或它的社会成本问题),并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内在矛盾(通过把波兰尼式的理论主题引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编年史理论)。

这样,随着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新“阶段”的辩证揭示,历史书写的模式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方向。当然,这也是一个对旧的历史书写模式不断吸收和扬弃的累积性的过程。今天,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二三个世纪以前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与政治革命的情景,而且也包括由资本主义市场不断增长的霸权、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新的符号性政治以及环境主义的政治所带来的政治领域内的变化。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及环境的历史书写同样也遵循着这一条道路。实际上,环境史是通过如下的方式来使自己成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历史的“完成”的:譬如,把政治史的内涵加以扩大,使其能够把环境斗争的政治包含在内;把经济史的内涵加以扩大,使其能把为了资源的保护及环境的愉悦而进行的斗争包含在内;把文化史加以激进化,使其能把为了土地和空间、人类精神状况及其他一些东西的本真意义而进行的斗争也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历史书写的每一种类型既从它本身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也从它的“对手”的领域内吸收营养,这条“食物链”的顶端就是环境史。历史书写的每一种类型同时还根据具体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以及统治性的观点和社会力量)而加以重写。下面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18世纪所进行的法律变革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建构起了土地领域内的财产权,进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中,这一点却被忽视或低估了。虽然当这些法律被颁布的时候,当时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它们所具有的重要经济意义,但今天,当全球化的资本在南部国家的“正在成长的市场经济”中建构对财产权、贸易等的法律统治的过程中碰到困境的时候,上述这种18世纪的法律变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在不断地得到重新审视和高度评价。

从理论上说,与现实实践中的资本积累以及它沿着政治—经济—社会—物理/生物这么一条普遍性的次序来展开自己的过程相呼应,历史的书写也在吸收和扬弃的基础上表现为一种积累的过程。历史的每一个领域,从理论上说,会变得更为充实和复杂,更具有贯通性和跨学科性。

随着对历史书写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历史学家们也变 63



得越来越专注于某一个具体的领域或主题。这是与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对自然的利用的领域出现的越来越专门化的趋势相呼应的。任何一个参加美国历史协会(或地区性和地方性的历史学家协会)的年度讨论会的学者,其实都意识到这已经成了今日历史书写的发展的障碍。历史学专家们在这个或那个领域或主题上所拥有的专门化知识的积累,真的是很令人敬畏的。另一方面,杰出的历史学家在他或她的专门领域中的才华,表现为对这个历史学家所圈定和所要阐释的“真实事件”提供从更多的方法论角度来切入的研究和更为深刻的理解。差不多60年以前,詹姆斯(C. L. R. James)的《黑色的雅各宾派》和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这两本著作,在其所呈现出来的解读思路中,没有同时也不可能对那些在现在的文化及生态史研究中相当普及的文化和生态问题进行阐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戴尔·托米西(Dale Tomich)的那本名著,即《蔗糖流通中的奴隶制》,这一著作以俄罗斯的一种自我封闭的社会模式为对象,对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主题(同时也内含了地理和自然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19世纪所写的有关法国革命的著作中,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涉及对具体的文化和环境(以及经济)主题的研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这一类研究甚至更少。现在,环境历史学家们正在对华盛顿、杰弗逊、汤姆·潘恩(Tom Paine)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和文化思路中的生态维度,以及它们对美国革命的重要性进行深刻的解析。

总之,每一种类型的历史书写由于与先前的历史书写模式相结合(往往是扬弃对方),因而,在其变化过程中呈现出相当的连续性。但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文化及自然结构的展开过程中,“真实事件”获得了相当大的改变,因



而,每一种类型的历史书写在其发展的连续性中同时也是具有变化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展了政治史的范围;资本主义社会拓宽了经济(和政治)史的视域;资本主义化的自然则正在对社会(及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书写产生革命性的影响。<sup>19</sup>

现实历史及历史书写模式的不平衡发展,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及环境的主题是可能在“它们该出现的时期”之前出现的(正像它们在过去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和法律的历史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年代之前就出现了,而经济的历史也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出现的。文化史出现于文艺复兴的年代,环境的主题在“环境时代”之前的许多历史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

当然,上述这些历史在典型的意义上并不是前面所论及的依次排列的历史书写的四种模式的一部分,它们也不能被整合进这种系列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它们是异常性的。其次,就三个世纪之前的政治/法律变迁而言,主要的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从晚期封建主义向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问题,譬如,专制主义时代的统治问题。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经济史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工业革命及其后果,而很少得益于有关农业经济及商业活动的当代阐释。现代社会早期(公元 1500 64 年~1800 年)的那种高雅文化的历史在当代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及文化史中差不多已经没有什么印迹了。最后,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早期的环境论述所涉及的实际上更多的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而不是关于自然界本身。斯坦利·杰文(Stanley Jevon)在 1865 年出版的《煤的问题》一书,探讨的只是煤矿开采对英国工业及英帝国的重要性,而不是它的生态影响问题。

当历史学家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主题“在它们该出现的时期之前”引入历史书写中来的时候,这些主

题更多地是作为背景或理论舞台的布景,而不是作为自主或半自主的历史过程或动力来发挥功能的。这些主题往往以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段时期内,政治并不是作为斗争与和解、革命与改良的过程,而是作为伟大人物展开其命运的舞台来看待的。早期经济史没有也不可能对内在于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动力问题进行探讨,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直到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显示出它的自主的、似自然性的特征。高雅文化史在开始的阶段是瞧不起文化的自主性问题的,因为在当时,文化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教会及王权制度的,而我们知道,文化的自主性在现在则是文化研究中的“十诫”之一。第一代环境史把自然假定为一个具有确定性的背景,而不是一个与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发生辩证关系的东西。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1893年)以及爱伦·邱吉尔·塞波(Ellen Churchill Semple)的《美国历史和它的地理传统》(1903年)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气候和土地对人类居住环境的影响上,而不是相反。爱德华·福克斯(Edward Fox)的《地理视角中的历史:法国的另一面》虽然是一部具有很强的地理色彩的政治史著作,但它在环境本身的主题上却仍然是空缺的。马克·布劳赫(Marc Bloch)作为纯粹的环境或地理决定论的反对者,在《法国农村史》一书中,在强调地理因素在从中世纪晚期到法国革命的历史中对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没忘记强调生产关系和权力的重要性(“地理因素对人类所创造的环境的类别起限制作用”)。费尔南德·布劳德(Fernand Braudel)作为一个支持地理因素只具有可能性作用的学者,把上述这一著作指认为迈向还自然以其原有的主动性面貌的重要一步。在最近的很多著作中,“把自然当作主题内容来看待”的

观点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譬如,埃利诺·麦尔维尔(Elinor G. K. Melville)的《羊灾:征服墨西哥的环境后果》一书,就把生物学与历史学、经济学与政治学以及各种文化史的线索结合了起来。<sup>20</sup>

## 结 论

后现代主义的确有一个重要的教训可以吸取。历史书写就是讲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形式的内容”就是故事本身的形式。面对一些既定的素材,历史学家们可以就任何一种历史性的“真实事件”编出很多不同的故事。但是,正像每一个故事形式都内含着一定的逻辑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叙事 65 中同样也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当然,这是一个未完成的叙事,在不同的叙事者那里,它会有不同的内容,譬如,在一个金融家、一个工会活动家、一个艾滋病患者、一个刚从柬埔寨过来的新移民那里,叙事的内容就会完全不同。在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多元文化国家,也许有多少不同的民众,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叙事。当然,每一个有关美国的故事,只要它差不多能够成立,就能够反映或体现资本主义积累和发展的“深层逻辑”,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对这个或那个特定的资本形式的体现。只要看一下威廉·阿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加百列·科尔柯(Gabriel Kolko)、乔伊斯·科尔柯(Joyce Kolko)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就可以看出上述这一点。不过,除非是把那些被认为能够构成一个整体的各种相关的历史书写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总体性的历史书写形式,否则,总体性的历史就是不存在的。威廉·克劳纳(William Cronon)的《自然的大都会》一书讲述了一个有关芝加哥及其

周围(向北至“大博览会”地区)城镇的故事;一个总体性的故事还需包括对同一时期的纽约、圣·路易斯及美国西部进行研究的著作——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历史及具体的美国城市的历史中,芝加哥的历史只是其中的“片断”。“每一件事情都依赖于其他的事情”,这不仅在历史学中是一句箴言,而且也适用于生态学。

环境史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它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革命性变迁的角度来加以认识,也可以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及环境的历史书写的角度来加以认识。在这一意义上,环境史是资本主义时代所有历史书写模式的一个顶峰(或者,谦虚一点讲,它是存在于资本主义时代所有的历史书写中的一根看不见的链条)。<sup>21</sup>同时,正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历史学家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各自忽视了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一样,环境历史学家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不仅忽视了生态科学,而且还忽视了整个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不过,从当今那些最主要的环境历史学家——唐纳德·伍斯特、理查德·怀特、卡罗里·默切特(Carolyn Merchant)、威廉·克劳纳、斯蒂芬·皮尼(Stephen Pyne)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历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文化研究以及生态科学的内容正在越来越多地充斥于环境史的内容之中。环境史正在越来越被置于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由此它也正在变得更为激进。

正像马克思对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以及政治的和经济的理论进行了扬弃,历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试图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历史进行扬弃一样,环境历史学家对以前的三种主要的历史书写模式以及整个人类科学所采取的也是兼容和扬弃的态度。在本质上,我们不能说环境历史学家是站在过

去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历史学家的肩膀上的(尽管看起来的确是如此)。如果把思路再向前推进一步,那么,环境史发展的最后结果实际上**就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当然是更广泛的、更深刻的、把更多东西包括在里面的。在这一意义上,环境史是至今所有的编年史的逻辑发展的一个顶峰。

用下面的话来结束这段论述:可以这样确信,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根据新的问题、新的技术和资源等,以及根据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书写本身的革命性发展(正是现在的环境史书写促成了这种发展),来对现在的历史书写模式加以重新解释,甚至进行革命性的改造。环境史是不断地否定和重构自身的,正像它对其他三种历史书写模式的扬弃一样。这其他的三种历史书写模式实际上也是随着环境史及生态科学的发展而不断转变其自身的。就环境史的否定性和扬弃性是可被理解的这一点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的是,环境历史学家必须努力地去理解它。如果全球化资本最终获得了胜利,如果未来的人们仅仅把自然理解为“自然式的资本”(正像人类被理解为“人力资本”、社区被理解为“社区资本”一样),那么,环境史最终将转变为简单而又纯粹的资本主义化的自然的历史。对这种趋势的任何形式的抵抗都将日渐式微,并且也会被历史学家所弱化或遗忘。这个世界将变成技术依赖性 & 技术的具体化不断增强的历史,而不是人类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对人类社会关系起调节作用,反过来也一样)的历史。如果绿色主义者、激进的绿色主义者(red greens)、绿色的激进主义者(green reds)、女权主义者、土著居民、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工人及“穷人中的环境主义者”所从事的与全球化资本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一种远景?一种近期的可能性?),那么,将来的环境史就会呈现出另外一副样子。我们的未来是否会成为简单而又纯粹的资本

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关键在于现在的环境历史学家(实际上是所有的历史学家)是怎样理解和践行他们的理论的。(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越是被看成劳动、财产、剥削及社会斗争的历史的结果,我们的未来就越有可能是可持续性的、公正的及具有社会正义性的。

### 注 释

1. 一种不同意见: 保罗·巴乐(Paul Buhle)提醒我说,“历史本身从对集体性神话的辨析中凸显出来是从维柯开始的,如果没有他在收集民间传说方面的不懈努力,以及如果没有博姆(Boehme)在恢复辩证法方面的同样重要的努力,历史就将成为……一个枯燥无味的话题。你所提出的那种总体性的叙述(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生态的历史)是很好的。但是,你说历史是一个科学性的过程,它跟神话、浪漫主义等因素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是完全超越于阶级偏见的,这种观念本身潜在地包含着辩证法的缺失。”(私人通信,1996年11月)。

2. 同上。

3. 唐纳德·休斯:“作为世界历史之叙事主题的生态学和发展问题”,《环境史评论》1995年春季号(第19卷),第1期,第9页。在休斯对环境史的定义中,生态学不只是被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内容,而是被视为其“主要论题”(“世界历史的新叙事模式必须把生态过程当作其主要的论题”,[同上,第9页])。在另一页上,休斯写道,“我们需要达及的是一种把生态过程作为其内在组织原则的世界历史”(同上,第10页)。

4. 唐纳德·伍斯特主编:《地球的末日:有关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附录:对环境史的研究”,第290—291页。这是一种历史学家的定义。另一种定义是:“自然世界的重要性、它对人类所具有的客观性作用以及人类对它(自然世界)产生影响的具体方式……是我们的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威廉·克劳纳:“故事出现的地方:自然、历史与叙事”,《美国历史学报》,第



78期,1992年3月4日,第1349页)。有两位社会科学家对“政治生态学”作了如下的定义:“政治生态学……是社会科学所提出的一系列中心问题的历史性派生物,这些中心问题是有关从生物—文化—政治的复调式角度来观察的人类社会,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化了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它建构起了一个各种学科能在此交汇的共同的言谈语境”(詹姆斯·格林伯格、托马斯·派克:“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1页。)

5. 伍斯特:“对环境史的研究”,如前所引,第293页。

6. 同上。伍斯特对人类学家及其他学者对这种“整体”的不同的研究所做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我对他试图把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和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合并起来的努力并不认同。在我看来,哈里斯的“技术—环境体系”的范畴并不能被概括为一种游离于劳动组织或社会组织之外的、财产或文化体制的转化形式。我以为,把马克思“生态化”是可能的,但把哈里斯“马克思化”是不可能的。最后一点评论:在伍斯特对文化的阐述(同上,第302页)中,他通常所具有的那种对主题的深刻分析让位给了毫无意义的闲谈。我相信这是因为伍斯特没能看到,正是文化才提供了协作方式、标准化的规则等因素,这些东西一旦被引入生产或劳动过程,其本身就会成为生产力。伍斯特的思路没有完成从“相互作用”的模式向辩证法模式的转变,在其所从事的开创性工作中,大部分都带有二元论的痕迹。自然与文化是被割裂开来的:文化允许人们在自然界的束缚之下进行生活;而劳动本身则又游离于这种阐释思路之外,即人类好像生活在一种自然与文化的平衡状态之中,人类的物质活动似乎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作用的。

7. 伍斯特把“人造环境或人工环境”排除在了环境史之外。尽管这种排除“看起来可能有点武断,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区分(自然物与人造物之间的区分)是值得保留的,因为它能够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作用力,并不是它们中间的所有东西都是源自于人类的。有些东西保持着自身的自为性和自我延续性。人造环境全部都是文化的体现物……不过,当我们面对森林、河流这样的对象时,我们所碰到的则是一种不是源自于我们人类的自主性力量。这些力量对人类



生活构成重大影响,并刺激人类生活产生相应的反应、抵御以及使人类产生特定的奢望”(同上引文,第292—293页)

地理学家也许会对这种区分提出质询。譬如,城市的空间对人类的生活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也就是说,城市空间不仅是人类所建造出来的,它本身也会建构人类的具体样态。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能动唯物主义的理论探讨中,那种“不是源自于我们人类的自主性力量”是被承认的;当然,这些力量中的大部分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已经被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印迹。海洋、空气、土壤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塑造自身”,而且也被人类活动所塑造,当然,这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也是依赖于所处的环境的。

8. “……我们把对人类往事的研究视为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系统性关系之研究的一部分,这种作法无疑给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对事物整体的研究创造了极大的机会,职业历史学家所急需的正是这种系统性的思路”(威廉·克劳纳:“环境史的用途”,参见《环境史评论》1993年秋季号(第17卷),第3期,第4页)。不过,克劳纳指出,尽管现在已经有很多关于自然的理念以及经济与自然之关联性的研究,但真正把这种理念与文化、经济结合起来,并把自然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的理论研究却很少(参见“预言的方式与生产的方式:把自然放进历史之中”,《美国史学报》,1990年3月(第76卷),第4期,第1124页)。由此,他对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方法和研究领域的环境史持怀疑的态度,并强调了“故事叙说中的单一性”。在克劳纳看来,找回过去处于缺失状态的文化—经济之联结的办法,是把内含在工厂和经济系统中的并且具体化为资本的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拉出来加以深入的研究。这些东西有时被称为“社会资本”、有时被称为“社团资本”或者“文化资本”。

格林伯格和派克认为,“主要有两种理论思潮对政治生态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是政治经济学和生态学分析的思潮,前者坚持把权力的分配关系与生产活动联系起来,后者则对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做了广泛的研究”(同前引文,第1页)。

9. “特定的”是指个别的(人或种类等等),在这里,“个别的”是指不再可分的最小分析单位。“具体的”是指作为个体的人与其他个体所共有的一些东西(出生、生命、死亡;阶级、性别、社团等等);“独特的”

是指把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或其他的个体区分开来的东西；“总体的”或“整体的”是由“特定的”所组成的，它自身同时也建构了“具体的”。

10. 伍斯特,同前引文,第289页。在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和环境学的研究中,同样也存在着各自的发展逻辑,这种逻辑大致类似于历史的四种类型之间的发展过程。以社会科学为例,它开端于“道德科学”(人类科学在18世纪的代名词),但在19世纪晚期,与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相一致,经济学也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分离了出来。“文化社会学”在20世纪的中后期得到了发展。环境研究在20世纪晚期得到了发展。

11. 参见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积累的危机》(牛津与纽约:巴塞·布莱克威尔,1983年版)。

12. 同前引文。当然,在后面的一段文字中,伍斯特提到了“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历史”(同前引文,第290页),在这里,他把经济和社会变化与资本主义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所实现的转型之间的次序颠倒了过来。威廉·克劳纳在从环境运动的角度阐释环境史的书写模式的兴起的时候,同样也没有从自然本身的资本化的角度来界定环境运动的内涵(“环境史的用途”,同前引文,第2页)。

13. 同上。

14. 同上。斯蒂芬·多弗斯(Stephen Dovers)从“对现代人类社会的生态可持续性的不断上升的关注程度”的角度,对环境史的起源作出了阐释(“可持续性与‘实用主义’的环境史: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笔记”,《环境史评论》,1994年秋季号(第18卷),第3期,第22页)。多弗斯的这种解释明显地忽略了特定的资本主义化的自然的发展过程,因而转向了环境史的实用主义观点。“这种历史观……旨在对环境管理作出积极的和实用性的贡献,旨在谋求生态的可持续性”(同上,第21页)。这种观点显然与真正的环境史所具有的深刻的批判性内涵不相符合,它把环境史这一研究领域引向了资本主义理性化进程的婢女般的地位。

15. 同前引文,第290页。

16. 我在这里忽略了生态科学这一重要的主题,生态史是建立在

69 它的基础之上的,当然,生态史也反过来对它起影响和修正的作用。在我看来,生态科学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顶峰,正像环境史的书写模式是过去的历史书写模式发展的一个顶峰一样——生态学是这么一门科学,它必须把贯穿在所有的科学分析层面的个人主义或原子主义方法论与有机论或有机主义的方法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还要包含比其他的科学更多的分析层面,因为这些科学是仅仅限定在具体的、特定的分析层次上的。其他的科学当然也应该是辩证的,但与生态科学相比,它们被限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因此,只有生态科学才是真正的辩证科学。

阿伦·鲁迪就我的上述观点作了如下评论:“这里所缺失的是‘自然史’的历史发展线索,‘科学’是怎么成为对‘自然系统’或‘自然史’的一种研究的。这实际上是退回到了18世纪的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和林内尔( Linnaeus)的水平,成了殖民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正像“自然主义者”(汉伯特、达尔文等)对自然界的历史、物种的差异性、进化及地理关系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为欧洲的帝国梦想及使命服务一样。伍斯特的《自然的系统》、克劳本伯格(Kloppenber)的《第一颗种子》、赫格特(Hecht)和科克伯恩(Cockburn)的《森林的命运》、克罗斯比(Crosby)的《生态帝国主义》等著作表明,殖民主义与拓展性的探索既适用于发展生态农业,也适用于工商业的剥削以及全球的工业化。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都通过自然史的语言来加以书写或凸显出来——包括阶级、性别、种族、社会的优势/劣势群体的自然史过程在内”(与本书作者的私人通信,1995年10月)。

17. 杰·摩尔(Jay Moore)说,“(美国的)人民党主义与进步党主义造就了查利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的那种经济史;萧条时代的工会斗争与社会主义运动造就了劳工史;民权运动及整个60年代的状况造就了……新社会运动对政治及职业的关注,这种新社会运动首先是以社会史,其次是以文化史,而现在则是以环境史的面目表现出来的”(私人通信,1995年6月)。

18. 杰弗里·埃尔顿(Jeffrey Elton)曾经说过,“如果我碰到一位历史学家,他居然不相信伟人的存在,尤其是政治活动中的伟人的存在,那我就感到自己碰到了——一个非常差劲的历史学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常

常会忘却“伟人”的存在,这说明现在的历史书写模式已经偏离了有多远,也说明了历史书写是多么紧密地依赖于社会科学。同样,历史学家们也没有找到把“伟人”与他们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的方式。约翰·缪尔(John Muir)在环境主义的发展中到底具有怎样的重要性?或者,近年来对毛泽东个人生活情况的披露与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评价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联?

19. 马克思自己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关注的是政治与经济。在20世纪上半叶,一些特定的文化主题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卢卡奇、批判理论等)。今天,环境的主题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核心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在19世纪,政治史尚在致力于发展一种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与斗争理论(这种理论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经相当的普及),这主要是因为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资本主义的阶级与社会发展在生态维度上是非常低效率的。在19世纪,由于同样的原因,消费及消费主义的主题在经济史中是缺失的,环境史在当时还很难说已经存在。今天,随着文化和环境的主题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生态的主题(资本的逻辑)已被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可在很多人那里,这还只是一个附属的内容(这是一个当世界经济仍在模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明的那种经济模型的时候所出现的理论错误)。《资本论》中“协作”一章的内容长期以来在那些对《资本论》的重要的研读性著作中都是被忽视的,直到最近这种状况才得到了改变: 70现在,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其他批判传统的学者,正在对协作的文化形式及其在工厂中的意义、生态系统(“自然”的协作)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20. 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的地理学所具有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主要是没能把自然当作一种自主性的因素来看待。新的环境历史学在不退回到旧的环境决定论观点的前提下,重新把自然界定为一种自主性的力量。

21. 罗伯特·扬(Robert Young)在“传记:人类科学中的基础性学科”(《自由协会》,1988年第11期)一文中,在有关传记的问题上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环境史的大部分就是对地点、区域及资源所作的传记)。

审视蒙特利湾的生态史及  
文化景观的三种方法

## 导 论

粗看起来,蒙特利湾北部地区的峡谷断断续续、蜿蜒迂回,跟东部及南部的海岸地带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地质状况给人的感觉是,它肯定会对当地丰富的文化史内容起决定的作用。从本·洛蒙德(Ben Lomond)山脉的后部沿着东南方向眺望像薄煎饼一样平坦的帕加罗(Pajaro)和塞里纳斯(Salinas)河冲积平原,以及被称为蒙特利半岛的那个花岗岩小山,似乎真的可以证实上述这种观点。简单地说,“自然造就文化”就是这种观点的内容。<sup>1</sup>

当然,也有人从很多不同的文化曾经被移植进蒙特利湾地区这一历史事实出发,得出了对上述观点的不同评价:该地区的历史,包括其生态史在内,就一些主要的方面而言其实是

一种文化的产物。就土地的状况被人类活动所规范这一点而言,上述这一观点可以被简单地表述为“文化造就自然”。<sup>2</sup>我在这里想对上述这两种观点都进行一番审察,因为我相信,这两种不加批判就阐述出来的观点都是有问题的。其原因在于,这两种观点在对作为人类物质活动之前提的环境(生态系统、环境的舒适、空间的内涵及精神的状况、人造的环境)进行阐释时忘记一个关键性的观点。文化、劳动、自然这三者之间客观存在着的统一性在蒙特利湾的那些前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化社区(包括太平洋海岸地区、西班牙、墨西哥、早期的北欧、南斯拉夫、意大利、中国及日本的移民社区)中是相当普遍的。当然,在资本主义化的社区,包括今天蒙特利湾的那些社区,资本、雇佣劳动、技术、金融、竞争以及世界市场都对自然和文化起调节和转型的作用,反过来,自然和文化有时对人类活动起促进作用,有时则起限制作用。由于某些政治观点,包括那些展望未来的观点,有的时候既与环境决定论又与文化决定论联系在一起——绿色生态地区主义(green bioregionalism)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幻想式政治观,因此,我也<sup>72</sup>想对这些观点及政治思想有所涉及,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有关蒙特利湾地区及其可能性未来的新的思路。

## 自然造就文化?

蒙特利湾的地形与生态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地区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北部与南部的交界区,红杉树及棕榈树一起出现在同一条城市街区中。北圣塔·克鲁斯县包括圣·洛伦草河的冲积平原(文化维度上的“市中心”);六至七个海洋斜坡,与再往下去的那些后来生成的海洋斜坡相比,这些斜坡的特



征不太明显；北部海岸的一些直接通往海洋的河道，以及其他的一些通往被圣·洛伦草河、索库尔河和阿普托斯河截断的那些峡谷的河道；很多的干谷（美国人给那些由较少的河流与小溪所形成的小峡谷所起的美名）。在东南方向，有一些冲积平原，它们是由帕加罗和塞里纳斯河所形成的；一个半世纪以前，这里被沼泽和湖泊所覆盖，那种宽广的优质地层现在成了农业发展的优良条件。卡斯特罗维尔（Castroville）被称为“世界上的洋蓍之都”；吉尔劳（Gilroy）以其大蒜节而著名；瓦特森维尔（Watsonville）的草莓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塞里纳斯（Salinas）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色拉竞技场”的中心。在南面，有一些很大的海边沙丘，蒙特利半岛的南部海岸线也在那儿，那里的已被修复的砖坯建筑物、捕鱼人的码头、罐头加工厂的马路等都吸引了很多的旅游者来此地追忆过去的美好时光。<sup>3</sup>

不需要什么职业的制图专家，人们就可以发现，圣塔·克鲁斯，这个位于蒙特利湾顶端的美国人小镇，远离被从新西班牙来的第一代欧洲移民称为加利福尼亚布道团的天然的南北通道和西班牙帝国主义的圣殿的那些地区。西班牙人既为了皈依上帝，也为了皈依金钱，在加利福尼亚州来回地穿梭，但总是绕开了圣塔·克鲁斯，沿着塞里纳斯和帕加罗河南下，然后向东转向圣·乔斯，再向北一直到旧金山和索诺玛。<sup>4</sup>

蒙特利湾的独特地理状况，其主要的冲积平原，以及它那多变的气候，经常被认为是导致蒙特利，这个位于海湾底端的西班牙人的要塞，成为西班牙帝国主义者加州北部的最重要的军事前哨的原因，也被认为导致了圣塔·克鲁斯，这个位于海湾顶端且一直相对孤立的地方，两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成了那些试图逃离城市的堕落世界、旧世界以及亚洲的贫困世界的人，为了追求一种新的生活而一心向往的地方。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逃避现实观念被旅游业以一种新的形式承继下



来,上至蒙特利,下至圣塔·克鲁斯,都有旅游者的足迹(今天,旅游业是该地区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获利性的行业)。圣塔·克鲁斯的相对孤立性也有可能使19世纪中后期的那些拓荒性的美国及德国资本主义者,更为容易地对圣塔·克鲁斯山脉及蒙特利湾北部边缘的丰富的资源进行开发,他们的这种开发活动或多或少地逃避了公众的注视及国家的约束。据说,在西班牙殖民期间,圣塔·克鲁斯的布道团由于与其他的布道团,譬如卡梅尔布道团(靠近蒙特利的要塞)相比,具有很大的孤立性,因而也获得了相对大得多的自主性。 73

无可争议的是,由于第一条贯通加利福尼亚南北的铁路绕过了圣塔·克鲁斯这个城市,因而,它的全方位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克·希恩的德国移民(在19世纪后期,他所涉足的商业领域比这一地区的其他任何人都要多),凭着他在生意场上的天赋和对金钱的贪婪,建造了第一条连接圣塔·克鲁斯与瓦特森维尔的铁路,这才把圣塔·克鲁斯融进了加利福尼亚早期资本主义的赚钱体系之中。对圣塔·克鲁斯来说,这决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这个地方缺乏天然的港口,却有着很丰富的天然资源有待于开发。这些资源包括水力、森林、石灰石、混凝土材料(砾石和沙子)。事实上,从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这一地区繁荣起来的木材、石灰、鞣革、爆破器材、混凝土等工业都是建立在这些资源的基础上的。

在铁路建成以前,从圣塔·克鲁斯山到圣·乔斯只能依靠一条很难走的陆地通道(这条路现在被称为旧圣·乔斯路),或者不得不依赖海洋船只来把货物运出或运进这一地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区的经济前景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要的一个集市位于索库尔路、旧圣·乔斯路和华夫路在索库尔镇的一个交叉路口。人与物从东西两个方向汇集到这个十字路口,然后

赶乘公共马车前往圣·乔斯,或从海路前往旧金山赶集和游玩。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这个十字路口居然是个主要的商业集市:这里居住的都是些体力工人和小零售商。索库尔河(它是蜿蜒曲折的峡谷中的一部分)一旦发生洪水,这个地方就会被淹没。这一客观事实说明了当资本主义掌握了对土地的控制权的时候,地理决定论是没有多少解释力量的。

不过,仍有许多现象在诱使你从客观地理及气候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地区的历史。许多地方,譬如乔克河、查普洛营、悉普雷斯角等,其地名就是根据当地的地质、动植物的名称而起的。(可实际上,更多的地方,譬如,艾文斯营、中国城、考维尔牧场、卡斯特罗维尔、克拉克斯营、以及克雷奇顿峡谷,它们的名称是根据特定的组织和财产拥有者的名字来起的。<sup>5</sup>)人们很容易作这样的联想:正因为海洋的斜地提供了很好的景观,所以,当地的房屋都建在高处;正因为沿海的河流与小溪之间的峡谷中盛产红杉木,所以才造就了当地的木材及混凝土粒料的生产;正因为有大量的鞣栎木,才有了鞣革工业的存在;正因为有马德隆(Madrone)及其他的坚硬的木材,才有了当地的火药的生产;圣·劳伦草河为当地提供了水力资源;无数的泉水和溪流为当地人提供了饮用水;正因为这一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的孤立性,才推动建成了第一条、第二条、乃至第三条铁路以及那个足以停泊海洋船只的大码头。谁都不会怀疑由塞里纳斯山谷的热气流所形成的凉凉的雾给这一地区带来不少麻烦,而温暖的阳光则促进了洋蓟、莴苣及球芽甘蓝的生长;同样,当地的沙丘推动了玻璃及水泥业的发展;当地的独特地貌、海滩、气候、海洋以及山脉吸引了许多旅游观光者。当时的西班牙人难道还会在蒙特利这一花岗石岬角地之外的地方构筑他们的军事要塞吗?

74 这种思路,在其纯粹的形式上,被称为“环境决定论”。它

凸显了这样一种观点：地质的和气候的因素通过各种方式促成或阻止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可能性，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的主要内涵，包括其生态系统以及被改变或人工建造的景观的历史，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rick Jackson Turner)说，由于美国西部的辽阔性以及它与那些可恶的以阶级分工为基础的东部城市相距甚远，再加上美国西部地区处于整个国家的边缘，因此，民主文化在这一地区可能获得新生。虽然特纳的观点长期以来都受到批判，但处在美国边界周围的这些地形、气候以及对生活的理解方式事实上一直特别强烈地保留在西部人的头脑中。在圣塔·克鲁斯，当当地人沿着1号公路北上的时候，他们把这叫做“沿着海岸北上”；当他们朝东南方向向蒙特利行驶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在“沿着海湾向下并绕着海湾走”；当他们沿着17号公路到圣·乔斯去上班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在“爬过那座山”；当他们在9号公路上循着圣·劳伦草河开车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在“沿着山谷北上”。在瓦特森维尔，即差不多是这一地区的中心的地方，当地人把在152号公路上开车北上称作“跨过了那个关口”。在蒙特利，当地人把沿着海岸向下到比格苏去称为“向南跑一趟”。

对大多数在蒙特利湾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说，虽然家庭供暖设备、空调以及其他的现代化的生活舒适用品已经使他们与气候及季节的变化保持了一段距离，但在头脑中却仍然保持着一些地理意识(关于山丘、峡谷、公路上的转向、水区的边缘等的概念图)。当然，当冬季雨水过量的时候，河水就会冲过堤岸，一些住在峡谷深处的夏季临时搭建的木房子里的人就会被泥石流所埋没。如果雨下得太少，草坪就会变黄，周围的邻居就会给人以生活在沙漠中的感觉。如果太平

洋的水面突然间上升几英寸或一英尺,那些建造在旧河床上的城镇的中心地带就会遭受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打击。在圣塔·克鲁斯西部的克里夫路上,每当冬季的暴风雨季节,猛烈的风和雨会迫使人们联想到人类离控制自然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自然界正以不受我们所控制其他方式存在着。之所以用“迫使”这一概念,是因为正像历史学家圣迪·利东反复指出的,在受到地震、洪水、火灾等的打击之后,总有那么一种强有力的趋势在诱使当地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进入到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之中:人类对自然界行使着真正的统治权。

有一些绿色主义者对环境决定论是如此地钟爱,以至于把理论研究的重点从对过去与现在的探索,转移到了对我们的未来情景的计划与规范的问题上。他们把圣塔·克鲁斯山或蒙特利湾地区定位为“生态区域”。在公开性的会议上,他们讨论在这一地区建构一种建立在其独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基础之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他们所断定的当地土著人在一万年之前所具有的生活方式很类似。其中有一个人,他对圣塔·克鲁斯山的熟悉程度只是跟古石器时代的人差不多,可他已经开始对这整个地区进行规划,以便为一个生态区域性的未来作准备了。但令此人束手无策的是,他目前还无法确定圣塔·克鲁斯山的西坡和西南坡(这两个山坡上的水是流入蒙特利湾北面的海洋的)是否应该包括在他所界定的生态区域之中。另有一些人则对下列问题拿不定主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曾经改道或者说彻底改变了十二次、在其冲积平原上现在已经盛产着水果及蔬菜的帕加罗和塞里纳斯河,能否被恰当地称为一个生态区、或者它仅仅是在更广义的、更一般性的维度上所界定的北加利福尼亚生态区中的一条河流。客观地说,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有效地发展生态性的经济与社会区域(蒙特利湾月牙形地区的劳动分工、科学

技术及现有的文化形式),怎样有效地理解与开发各个生态区之间的边缘及重叠部分,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

## 文化造就自然?

这第二种思维方式是由那些既想对蒙特利湾地区的人类与生态史作出解释(他们想把政治置放在这种解释之上),但又不同意前面所述的那种自然主义解释观的学者所提出的。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地区的文化,更确切地说是文化群,是(也许应该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理论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不同的文化类型是怎样决定自然景观的。

没有人会怀疑蒙特利湾地区具有丰富的文化史资源,正像该地区拥有非常独特和丰富的地形及气候类型一样。生活在蒙特利湾的斜地、山坡、冲积平原上的当地人,曾经开辟出了许多复杂的贸易通道来穿过圣塔·克鲁斯山脊,用当地的石块来制造工具,从山泉中引出水源,他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打猎、捕鱼。这是该地区的第一种文化或文化群类型——正像有多少条河流也许就会有多种奥龙文化(Ohlone cultures)一样,这种文化群中的所有内容对该地区的生态景观都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譬如,燃烧草地的文化对生态景观就有很大的影响。<sup>6</sup> 西班牙布道团的文化属于第二种类型。从文化上驱使那些未开化的印第安人改变信仰,转而信奉我们的耶稣基督,以此来拯救他们的心灵,这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它不仅对西班牙统治时期的社会历史,而且也对这一时期的自然景观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有关布道团的官方或教会的历史记载中都有关于这一点的描述。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西班牙人所引入的几千头牛对圣塔·克

鲁斯和蒙特利地区的天然草地的野蛮践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随后,他们又在这一地区宽广而又蜿蜒的草地上引进了欧洲的那种季节性草坪。<sup>7</sup>

接下来要谈及的是墨西哥的或加利福尼亚的文化。当时的美国艺术家把男人想像为一种野性贵族的形象,他们在马背上或宗教节日中度过其一生,<sup>8</sup> 有点类似于墨西哥或过去的西班牙骑士的味道。加利福尼亚妇女的形象类似于传统绘画中的那种戴着美丽的纱巾,穿着长长的服装,坐在树阴下闲谈的妇女。这些老套的形象,就跟旧式的银盘绘画中的颜色一样,应该说,并不是完全不准确的。同样,下面这种观点也是不无道理的:由新西班牙人引入蒙特利湾地区、并且曾经是西班牙统治阶级的特权性标志的牧场文化,对这一地区的社会与生态景观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对西班牙和墨西哥社区的自然景观及人造环境的作用进行文化维度上的解释,在蒙特利地区是相当流行的,在当时,蒙特利与其说是一个经济中心,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中心,而如今那些被修复的砖墙已经成了吸引旅游者一个重要资源。

再后来便是美国人——伐木工人、制革工人、商人、劳工及其他一些人——的到来,这些人信奉普罗米修斯,相信自然决定论的神话以及只有通过勤奋劳作才能获得利润的观点。<sup>9</sup> 这种文化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圣塔·克鲁斯,以及在相对较轻的程度上,在帕加罗山谷的中心即瓦德森维尔占有支配的地位。我们现在从圣塔·克鲁斯(绿色主义者称之为“冲积平原”)市中心的建筑物的风格中仍可看出这一点,“安尼斯皇后”和“史蒂克·伊斯特雷克”是模仿哥特式教堂的风格,“东正教复兴”学校及一些商业建筑物是模仿迪考艺术(Art Deco)和布道团办公楼的风格。在工会街的南半边,即在现在的高德维尔工业区和标示第一块海洋斜地的那个悬



崖之间,很多 19 世纪后期及 20 世纪早期的美国式建筑都面向北方,很少有阳光能够透进他们的起居室或前厅。这些房屋的窗子都相对较小,内屋也很暗,明显地模仿了新英格兰人的过冬方式,这种设计显然没有考虑城市的阳光及温暖的气候的因素,从这种人造景观上不难看出一些文化决定论的特征。

华人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蒙特利湾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从事那些最危险的工作,当他们在挖掘铁路隧道以及在制造炸药的最危险的工种上劳动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伤残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sup>10</sup>当然,华人也经营一些违法的行业,如赌博、鸦片馆、妓院等。美国人的新教信仰使他们不可能从他们的同胞身上榨取利润,因此,他们即使出现在那些违法行业中,至多也只是其中的消费者,而不可能是制造者。华人妇女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只是在妓院里工作的性奴,这种妓院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城(在具体位置上经常会变动)中很常见。这种情况从文化的维度上也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它所反映的是白人的种族主义、华工的低下地位以及华人妇女的更为低下的社会地位。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一地区的华人是怎样对当地的一些边边角角的资源进行利用与开发的,用圣迪·利东的话说就是“在边缘上工作”的,<sup>11</sup>那么,文化决定论中的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就会被凸显出来。中国文化强调“适应和使用每一种谋生方式”,并对服从、责任与“深思”(类似于创造性的思考)看得很重。这种文化价值观使他们的生产方式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他们对捕鱼、干货加工、周边地区的农作物生产、废品回收等行业都非常在行,并且也有很好的获利。<sup>12</sup>当然,对这种处于“边缘”的文化与手工技术的状况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种族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社会与政治两个维度上把华人边缘化并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男人、妇女以及儿童或者坐着船、或者坐着马车、或者骑着马,从许多其他的“旧世界”及亚洲文化系统中来到这里。帕加罗山谷以及普鲁纳德勒山区的克罗地亚人,往往是整个大家族一起来到这里,他们在果树和农作物的种植及收获方面相互帮助。也有一些是来自长期遭受干旱和尘暴困扰的地区的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来自于苏格兰—爱尔兰),这些人往往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他们开始时只种植一些果树,后来则把果树园变成了可以维持生计的农场,这种生产方式是与他们希望独立以及追求一种与世脱离的感觉相一致的。<sup>13</sup>另有些爱尔兰人,就像其他的一些人一样,想要通过一种捷径来获得金钱,就像当初发现第一批金矿一样,当然,他们也种植一些土豆;法国人,传承了他们的制酒传统,并且第一次把制酒商业化;西西里人擅长于使用兰帕罗网(Lampara net),他们的团队作业模式对一个外行人来说是很难想像的,他们主宰了蒙特利湾地区的沙丁鱼工业。<sup>14</sup>日本人以园艺种植、浆果采集、海洋潜水以及加工和出售鱼类制品见长;来自于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农场工人,他们的那种抵抗性的文化是他们在农业区所进行的那些主要的罢工活动的思想基础;来自于新英格兰、葡萄牙(主要是亚速尔群岛)以及挪威的捕鲸者,同样也都具有其各自独特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来自其他许多地方的人也一样。所有这些人群或多或少地都具有其独特的工作方式,他们把这种工作方式与当地的环境结合在了一起,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工作方式与其在老家时的工作方式相比,是非常相似的或者说基本相似的。<sup>15</sup>

由此,不同的民族都找到了他们所熟悉的那种自然模式,他们把各自的文化都移植到了蒙特利湾地区,在当地的自然景观上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些民族或种族的群体创造了蒙特利湾地区的环境与社会

史。因此,正像一些环境决定论者从这一地区的地形及气候的角度解读其历史过程时,努力倡导一种生态地区主义或地缘政治学一样,一些文化决定论者把这一地区的历史解读为不同种族的价值观、规范及行为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斗争的结果——他们强调文化真理的相对性、强调对占统治地位的北欧男性文化之“独白式的权力”的解构,强调身份政治学,强调文化的多元性。

上述两种观察地方性历史的方法论明显地蕴含着不同的政治思路。一个是强调自然的力量,另一个则是强调权力的本质。一些信奉第一种观点的人积极地宣传一种地缘政治学,而一些支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则推崇建立在文化与种族的基础上的归属政治学。绿色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白人男子比较偏爱生态地区主义,而当地的许多墨西哥人以及其他人种则推崇文化民族主义或者说文化多元主义以及选择性的政治学,但从历史上看,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北欧人的声音所压住。<sup>16</sup>

### 作为中介的资本与阶级

不管是捍卫地缘政治学还是捍卫身份政治学的人,都在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探讨基本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当今这个不管是地区性景观、生态系统,还是文化实践都日益受到全球化资本与金融市场之规律的制约的时候,上述这两种政治学却都对以社会经济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学观点持压制与责难的态度。社会规律似乎只是为了起补偿作用才运作起来的。当资本把工业技术和劳动分工从旧的文化形态中剥离出来的时候,种族的或身份的政治学就更为卖

力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与此相类似,当自然界被人化,当生产过程更多地依赖于技术、化肥、进口的水源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而不是那些上帝所赐予的纯洁之物的时候,地缘政治学便更加积极地宣扬自己的观点。

恰恰是在当文化、劳动、自然被资本运作的规律所建构和扭曲的时候,当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范围  
78 内被再生产出来的时候,阶级政治学的观点却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难以找到听众。那些“旧式”的观点,不管是生态学的,还是文化方面的,似乎越来越普及,现实好像在退化,或者更准确地说,现实好像在一种理想化的自然和文化“保护主义”的维度上不断地得以再现。<sup>17</sup>上述两种政治观点由于躲避了资本和经济阶级的话题,把其各自的理论视域局限在“自然”和“文化”的方面,因而事实上没能真正对他们所努力探寻的内容,即“真实的发展”作出研究,就像当地的那些主张进步的政治家们所做的那样。

今天,帕加罗山谷地区的罐头加工厂的命运实际上是由位于伦敦的那些国际性联合大企业的总部所决定的;<sup>18</sup>土地被租借给跨国性的农业大公司用以生产草莓;当地的银行被那些地区性或国家性的金融机构所吞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对自己进行了重组以便能更好地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输送“人力资本”;当地的旅馆业更加依赖于在“山那边”的西利考山谷工作的人数的不断增多;连锁性的打折店取代了地方性的自主经营的商店;财富与权力越来越赤裸裸地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当地那些主张进步的人士为了寻求绿色主义者及文化多元主义者在选票上的支持,因而非常害怕说出“剥削”这个词。随着全球资本对地区性的经济、社会及生态的重构,政治领袖们小心翼翼地回避阶级政治的话题,正像圣塔·克鲁斯

山上的那些登山者小心翼翼地避开有毒的橡树及刺人的荨麻一样。

随着资本越来越把一个地区及当地的人民视为一种文化维度上的资本,视为新的商品或新的获取利润的中心,当今的那些有关自然与文化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怀旧。<sup>19</sup>对某种过去不曾有过(也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时代的怀旧是这样的一种理论主题,它能够把致力于探求自然与文化史的这种或那种维度以及探求每一个地区的独特特征的那些地区性机构统一起来。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区,在农业、旅游业及其他一些行业中,劳资之间、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裂痕在不断地加大。尽管这一切在地方性的政治活动中被粉饰掉了,但这种分裂无疑已经深深地烙印在居住环境、都市景观及商业景观之中。当地的那些“主张进步的政治学”所关注的是土地的使用与环境的舒适、服务于穷人、年老体弱者及病人的社会慈善事业以及种族、性别等问题——至于劳工问题则很少被关注。

在我们这样一个与马克思当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很相似的时代中,谁真正从对阶级政治主题的压制中获得了好处?“老鼯鼠们”(比喻那些看不到时代的变迁而固守传统观点的人——译注)可能会说是小资产阶级。今天,我们还得把“新中产阶级”即薪水阶层和专业人士包括在里面,正是这种“新中产阶级”与老的中产阶级一道,组成了管理各种自然与文化组织、种族集会以及有关历史保护、博物馆展览方面的主要力量。

每当我们认为某些事情是与应该怎样看待蒙特利湾地区的景观一样是无关紧要之事的时候,我们也许就是在遮蔽那个与政治相关的爆炸性主题了。地方性和地区性的政治学中所缺失的,是那种受该地区的人类物质活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影响的文化与自然史的主题。资本与劳动在文

化与自然建构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学主题。

79

## 地区性的历史与政治思想中的异常性

在地区性的历史(和政治)言说中,二元论往往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它尽管在过去的历史中表现得不是很厉害,因而在影响力上也微乎其微,但现在它却把文化—自然的关系神秘化和复杂化了。今天,资本越来越紧地抓住文化与自然,并在它们身上深深地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在“资源”、土地、空间及“文化资本”上的消费主义和盈—亏式言说模式,以及在自然/文化的保护主义维度上的苍白无力的言说。可是,资本与劳动以及它们对地形、河流、邻里、种族、性别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却很少被历史学家,社区、环境或劳工方面的活动家,区域规划的设计者以及政治策略的制定者们在政治的维度上加以认真的考虑。<sup>20</sup>

上述这种异常性说明了在从一棵果树到一种人格类型的所有生活领域内,有一些东西是不正确的。一个园艺学家知道,如果不给一棵树进行嫁接,如果一棵好的葡萄树生出了坏的果实,那么肯定是有些东西出了问题了。一位好的心理治疗医生知道,当她在—个病人所说的话与他的说话方式之间发现某些差异性时,那就可以断定这个病人是真的出问题了。当果树上的果实是坏的,当人们感觉到焦虑并做出一些愚蠢或残忍的举动时,这实际上就是果树或家庭被导向困境的一种危机信号。当然,这种信号同时也会催生转型的机会,不管是向一种新葡萄树、一个健康家庭,还是向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公平的社会转型。

今天,在主张把文化因素置于环境因素之上,或者反过来,主张把环境因素置于文化因素之上的人中间,在具体观点上也是有很大的出入的,这种情况决不限于蒙特利湾地区。那种能够把握住上述两个层面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每个层面内部的各种关系的历史书写模式,目前尚处于开始的阶段,现在活跃着的那些政治家们对这种起步阶段的历史书写模式并不十分感兴趣。有一个例外能够反证上述观点。那些保护本地居民之权利的人,总感觉他们在历史言说方面是右倾的,导致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很多人都相信在一个土著社区中,文化、自然和物质活动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对土著居民加以浪漫化或理想化,维护其权利的主张似乎总是能够解决在我们对现实存在的文化与自然的认知与文化与自然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之间的冲突。这里存在着某种类型的内聚力,一种所有事物都能找到其合适位置的感觉。<sup>21</sup>这种感觉使我们对正在做的事情感到很舒服,比起涉足于帕加罗山谷地区的纯粹的土地政治问题或者圣塔·克鲁斯地区的身份政治问题,做现在我们正在做的那些事情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自信。

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在这一地区是随处可见的,整个地区被清楚地划分为“居住的”、“商业的”、“轻工业的”、“娱乐的”、“历史遗迹保护的”、“自然之恢复的”以及其他一些区域。譬如,有很多的标志可以告诉登山者,国家公园的开放时间是上午6点至日落,也就是说,国家公园的时间有一半是属于人类之历史的,有一半则是属于上帝的。这种不规范的现象也存在于“大牧场国家公园”中,这个古老的牛奶场是作为一处历史遗迹来保护的,其中的一个部分被称为历史古迹保护区,另一个部分被称为自然景观恢复区,好像历史的部



分,即农场的建筑物及其景观,就不是自然的了,而自然的部分,即那些平顶的山头以及瓦尔德河的冲积平原和河滩,就像不曾被人类的实践无数次的修改过一样。再看看当地大学的校园:一边是明确地竖立着自然保护的牌子,而另一边则是教室的景观——“文化”被用红木做成的讲台保卫着。

这种二元论是如此的普及,以至于我们常常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譬如,位于爱普托斯(在圣塔·克鲁斯与帕加罗山谷之间)的尼森·马克斯(Nisene Marks)国家森林公园中的情况就是如此。马克斯家族把这块土地捐献给了国家公园,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应当让这块轮廓分明的森林“返回到它的自然状态”,好像人类的各种生态和文化印迹,伐木、窄轨铁路以及木材加工厂等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轻易地抹掉一样。如果你仔细观察爱普托斯河的下游流域,在森林公园的边界之内,你会在河岸边发现一处非常独特的树木及植物带,这完全是因为由弗雷德里克·希恩(Frederick Hihn)、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及其他一些人所种植的大面积的树林所起的生态作用的缘故。<sup>22</sup>这个公园的一位管理人曾招募了一些童子军对那些埋在山崩及灌木丛底下的过去的木材加工厂的遗迹进行挖掘,结果虽然的确发现了一些过去的景观,但也招来了其上司的严厉批评,因为他违背了试图不仅从字面上而且从比喻的意义上把历史一直埋在地下的马克斯家族的意愿。<sup>23</sup>

与此相似的是发生在雷肯这个小镇的事情。这是一个座落于圣·劳伦斯河山谷旁边的一个小镇,它过去曾是一个石灰生产的中心,现在则是一个复杂的处于交迭状态的“生态群落”,不过已明显地带有人类活动后被遗弃的痕迹(甚至在几年之前我们还能在红木林中看到果树的存在)。这里的公园管理者被命令把七座被视为危险之物的旧石灰窑移走。然



而,公园管理者只是把它们掩盖了起来而已。它们现在的位置正好在那些希望“返回自然”的旅游者所使用的停车场的下面。

这种历史—自然的二元论,在有些人看来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核心内容,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科技及资本主义革命的产物,它现在已经遍及了每一个角落,尽管有时是以转换了的形式出现的。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UCSC)以前被人称为“红木林中的大学”,但自从对火的管理被对火的控制所代替以后,红木林就处在人类的控制之下了。那些小树林以及那些第二轮生长出来的树木,很像某种公园,也许,UCSC 现在更应该被称作“在大学中的红木林”。

兰乔·利夫吉奥(Rancho Refugio)位于圣塔·克鲁斯的西部边界,它以前是墨西哥人的转让地,现在是这个城市最西面的居住区域,它正被计划变成一条“绿色地带”,即某种类型的城市中的荒野地区。靠近西部大街的底部,在第一个海洋斜地上,有一处被称为“望楼”的公寓群,我们以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几个月。这种像公文柜式的公寓是专给工人与学生使用的。我们的那套房子在二楼,从那里能直接观望在两条河的交汇处上面的陡峭悬崖,“望楼”一词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在我们房子的下面,是一条计划中的绿色带,它看起来很像是自然而成的,没有明显的结构造型,两条古老的小路沿着两条河流的两侧延伸开去,任何一个想要克服艰难并追逐财产权这一神圣权利的人,都可以沿着这两条小路一直往深处走。在远处,你可以发现某种看起来像塌方似的东西,几条古老的牛群曾经走过的小路在此交错,这些小路都通向位于几条河流的交汇处的那些清凉的水源。再往远处看,是一片蜿蜒的草地,非常适合于放牧。

这条计划中的绿色地带是许多种动物的家园:我们可以

发现或听到有角的猫头鹰、一般的鹰、各种海鸟、鹿、郊狼、狗、猫、鸚鵡等动物在一起生活,有些动物以捕食其他动物为生,而有些动物则在一些独特的地方安全地生活着。你如果想确证一条食物链的存在,那么,你将发现,其中的一个源头就是生活在“望楼”的公寓里的居民所抛弃的垃圾。实际上,这里的景观有点像一个没有围墙的动物园。对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动物的生活状况的任何一种合理的解释,都必须以这一地区的住房发展、人口变化、土地价值及其在上面的投资、金融资本、银行利润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历史发展为前提,正像必须以对生活在山谷之上的西部大街附近的住户及其他人是怎样把大自然当作藏污纳垢之地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为前提一样。这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界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的问题,虽然它们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以及它们与作为古老的兰乔·利夫吉奥镇的一部分的这个天然动物园之间到底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至今还尚不清晰。在圣塔·克鲁斯市政中心最近的一次关于是否应该将财产税提高几个美元,以便能够筹措奖金来为这条绿色地带购置更多的土地的辩论中,似乎没有人关注到上述这些知识的缺乏问题。

有不少人的确是关注蒙特利湾的问题,尤其是它的“海洋资源”问题的。福特·奥德(Fort Ord),这个位于塞里纳斯山谷下游和蒙特利半岛之间的一个地区,将被改造成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个分部,一个从事海洋研究(以及其他一些实用研究)的中心。它的建立不仅是为了创新知识,而且也是为了增加联邦资金、发展新的产业以及获得新的利润。蒙特利湾本身也成了自然界的政治经济学的最好例证。它虽然在当地或多或少地仍被认为是一个“自然的”景观,但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它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水族馆。我不是说在蒙特利湾的岸边有一个水族馆,虽然那里确实有一个——它

是蒙特利湾旅游业中的一个著名景点,由环境保护主义者、军队—工业联合体的注册会员、亿万富翁戴维·帕克德(David Packard)捐资兴建。我指的是在蒙特利湾中的每一件东西,事实上都已经被人类的行为所修改或加以控制,包括对某些行为加以禁止的法律,如禁止捕鲸的法律在内。

这甚至对于海底峡谷来说也是正确的。早期西班牙人的航船为了避免登陆时可能具有的危险,往往会从蒙特利湾的“沸水”中带走很多的淡水。海洋科学家最近的发现证明,这里的水是来自于帕加罗和塞里纳斯水域的。两个世纪之前,淡水层受到压力的作用,沿着垂直的地震层带上升到海湾的表面。冰冷的水流在地震的滑动和压缩的作用下穿过在它上面的水层。这种冷水中含有铁、锰以及大量的细菌。由此,一个适应于冷水的动物社区(蠕虫以及具有奇特外形的蛤等)就在海面底下建立起来了。但是,人类所进行的大量农业劳动以及在海岸边上的其他活动,却导致了能够进入海湾地区的淡水数量的减少,这也许就是现在已经无法再看到淡水层中的沸水现象的原因。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与两个世纪以前的情况相比,那个冷水区域中的生物量以及生物的种类已经大为减少(甚至可能已经完全改变了生物的类型)。<sup>24</sup>

人类的劳动,首先是组织和技术形式的展开,在渔民们的 82  
原始社区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但它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却使海湾中的某些物种消失了,最典型的要数沙丁鱼了。伐木、农业开发、城市建设以及人类的其他一些活动,在地方性、地区性、世界性市场以及国家的财政预算和政策的交叉影响下,已经使河流和水道被淤泥所堵塞,从而把鲑鱼及铁头真鱒鱼产卵所需的砂砾性河底掩埋掉了,并且也毁坏了河道边用来遮阳的树木以及动物用来产卵的水池,这使得海湾中鲑属类鱼的数量大为减少。对人类活动的限制,譬如对海獭的保护,现

在的确已经开始起作用了,海獭过去经常要在海滩上度过很少的时间,直至它们懂得人类正在尽其所能地得到它们的皮为止。今天,海獭跟另一种被保护的动物海狮已经成了这个海湾中的统治者。海獭,这种曾经被人类灭绝的动物,现在却反过来使蛤鱼和鲍鱼的数量大为减少,人类现在只能抓到很少的蛤鱼和鲍鱼了。海狮则沿着渔船所经过的路线捕捉蛙鱼(有些海狮被发现死在海滩,这是否是被渔民射杀的?)。那些不起眼的贻贝不在乎人类如何行动,始终在那儿存在着。这些贻贝不断地被海水冲刷着,在这个海湾地区,你可以找到不少能够在浅潮时收获贻贝的地方,贻贝的确是一种既可口又容易得到的盘中之物。海獭不喜欢贻贝,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更喜欢蛤鱼和鲍鱼。

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海洋生物区的转型作用,以及各类物种,譬如海草,和自然界中的其他形式在它们自身所具有的类似于资本积累规律的“运动规律”的支配下发生转变的观点,我们的确可以写出一部蒙特利湾中的海洋生物的经济史。那些经常把建设一个新蒙特利湾保护区挂在嘴边的人,却闭口不谈这样的自然史的内容。蒙特利湾的海岸线和登陆点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同样也存在着问题:在沙滩上进行开采作业、用旅游业的收入来养护海滩、把沙滩当作垃圾填埋场、河道的转向以及其他许多由人类的活动所导致的变化都是如此,人类的这种活动是由追逐利润的资本或政府和私人组织为了娱乐业的发展或者出于所谓的保护目的而组织起来的。那些主管这个海湾的保护工作的人,既不关心也不知道这一地区的真正的经济学问题,除非已经影响到他们的财政收入和影响到他们把这个海湾转变成一个新的“利润中心”的计划的时候。

爱尔克豪沼泽地的看护者也是如此。这个沼泽地位于圣

塔·克鲁斯东南 20 分钟车程的地方,它是太平洋海岸最重要的候鸟栖息地,在候鸟迁徙的季节你可以在那儿发现很多种类的鸟。爱尔克豪沼泽地简直就是一个潮汐的博物馆、海上的公园或者说是一个水的园地,人类曾无数次地改变它的面积、海水的入口处、淡水的质量和数量、盐滩以及港口等,并且还驱赶水生贝壳类动物以及捕杀鲨鱼当作一项运动,而所有这些都是与当今的商业和娱乐业的需要相一致的。地球科学家加里·格利哥斯(Gary Griggs)和他同伴们用图表清楚地描述出了海岸本身所发生过的主要变化。<sup>25</sup> 圣塔·克鲁斯小船港,是一个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专为娱乐船只和当地的渔船服务的港口,现在却被填进了沙子,目的只是为凯比托罗镇建一个朝南的海滩,也就是说是为了把圣塔·克鲁斯的海滩扩大开来,但这样一来,无疑就增加了凯比托罗海滩地区遭受洪水灾害以及洪水对财产的破坏的危险。港口没有了,凯比特罗镇就在外围建起了一个防洪堤,并往里面填沙子。为了获得生产水泥以及在海岸边发展公寓式建筑所需的沙子,人们大量地挖掘沙丘,由此而带来了沙丘上的生物种类的变化。沙丘性植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减少了。<sup>26</sup> 蒙特利湾沙滩上的海洋贝壳见证了本地物种的大量消失以及来自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量“外来”物种的被引入的过程。<sup>27</sup>

塞里纳斯河在很久以前就从它原来的河道中分离出来了,帕加罗河被河堤驯服了,圣·劳伦斯河也同样被管制住了。今天,河边的植物与那些生活在河边营地中的未经政府部门注册的工人共同生存在一起,这些工人大多是来自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的受经济困境或政治动乱所迫而来到这里的。我曾经见过一张一个世纪以前或许更早的时候所拍摄的圣塔·克鲁斯地区的照片。照片上没有树。这也就意味着那些曾经延伸到河流和溪谷中的红木树在很早以前就被砍光

了。海岸边曾经有一块草地,奥龙人曾经在 10 个世纪的时间里把这里的青草当作燃料。早年的西班牙人、墨西哥人以及美国人也曾在这儿放牧,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却是在草地上长出了橡树,当地的生态被改变了,也许这是一种永久的改变。红木林被砍伐,木材被加工之后用于出口,同时也用于在冲积平原上建造房屋和商业场所。原来的树木被移植到了市中心:那儿种植了许多新的树木,有外来的观赏植物,也有本地的树种。红木林的确在这儿又重新生根了。几年之后,当你从海洋斜地的制高点俯视圣塔·克鲁斯城的时候,也许会发现整个城市都被掩盖在树木和灌木丛中间了。这种独特的“文化”景观看上去也许真的会很“自然”了。

### 自然与资本的逻辑

除非某种特定的人类协作的文化形式被移植进工厂,并由此而转变成一种生产力,否则,文化本身是不可能给任何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同样,除非人类劳动被运用于,或被融合于森林、草地、河流、矿藏、田野、海洋之中,并使它们转变成一种生产力,否则,自然本身是不可能给人类提供什么东西的。劳动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媒介,这就是说,劳动把这两者在生产的维度上拉到了一起,并使之能生产出人类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从这一角度看,对历史与自然景观的文化解释与环境主义解释之间的二元论就不存在了。当我们在观察任何一种自然景观或研究任何一种生态系统时,我们会发现,自然与文化方面的任何一种微小的变化,所涉及的决不仅仅是某个单独的方面,而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即文化、劳动与自然。依然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奥龙人虽然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非常



优越的自然环境中,但他们为了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却不得不每年劳动4至6个月。而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北欧人在靠近奥龙人的渔场的附近,有一个专门生产炸药的很大的工厂区,他们的工作需要很多的硬质树木、石灰以及其他一些当地资源。显然,前者的劳动中所融入的是他们的部落文化,而后者的劳动中所融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思维及文化模式,他们分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改造着自然界,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两者都视为文化生产力。 84

有一个时期,迁移到这一地区来的人把源自于不同的地形、资源及气候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工作方式移植到了这里,使得这些移民地区原来的文化或工作方式逐渐模仿起了这些外来的文化,并使自身与它们越来越相似。早期的那些北欧新教移民出于获利或控制外部环境(也许是对荒野的害怕)的目的,联合起来夷平了那些原生性的红木森林(对他们来说,这些原生性的森林象征着疏远与他性)。不过,如果没有不断增长的对木材的市场需求,以用来建造足以容纳移民者的城市和乡镇(包括这一地区的乡镇在内),那么,要想把这一地区的峡谷与山林中的树木都砍伐掉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还有什么比把旅游者所谓的加利福尼亚人对快乐的热爱,与能够使几千头牲畜在上面自由的吃草的一望无际的草地相比较更对人有触动力的呢?或者把前者与在普鲁纳德尔地区的山坡上散居着的那些从长期遭受干旱和尘暴的地区移民过来的、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的状况作个对比,同样也能触动人的思想。从当事人本身的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上述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思路都是“理性”的。今天,除很少的几个特例之外,原来的文化、劳动、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已经成为历史了:红木林不再象征着“他性”;仅仅用于放牧的土地事实上已经消失了,或者说它已经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加以了重构。原



来的只是为了生存的农场主及其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现在让位给了商业性的耕作文化。

在过去,土地是按照源自于各种文化及工作方式的那些特定的模式来建构的。与此同时,文化也不得不屈从于当地自然界本身的变化: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完美匹配是很少见的。新英格兰人及其他北欧移民在来美国之前从未砍伐过红木树;西班牙人在来美国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优质牧场;中国人在来美国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干燥的夏季时光;西西里人和热那亚人在来这里之前也从未有过如此好的捕鱼条件。那些从遭受干旱和尘暴的地区来的移民,不得不学会他们所居住的峡谷和丘陵地区的局部气候的一些规律。新移民必须改变他们过去的生活和劳动方式,以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中的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以及对自己不利的因素。文化与自然并不是相互独立地建构出其自身的逻辑的。事实上,自然与文化本身在一批一批的移民所带来的当地技术以及他们所付出的艰苦劳动的作用下,以各种相互联系的方式发生着变化以及被改变着。

当然,需要指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不管是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是那些熟悉的景观,迟早都会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市场、金融以及生产过程的全球化侵蚀着古老的文化以及本土的环境。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自然与文化,包括时空观念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最终都将在利润的驱动下被生产和开发出来。今天,土地和劳动都变成了虚拟的商品,它们具有设定的价格(“地租”和“工资”),被当作一种还没有生产得很充分的商品来看待。劳动的工资形式以及人类需要之满足的商品形式事实上已经很普遍。高速公路、成片的住宅区、商业购物中心以及其他的“无处不在的地理”特征,在蒙特利湾这个月牙形的地区以及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或多或少地都能看

到。当然,对自然与文化的资本主义化所作的文化与政治维度的抵抗同样也是很普遍的:保护主义是这种抵抗的理论内核。今天,各种有组织的团体为了保护这种或者那种文化实践、历史遗产、环境的亲善性、物种或者生态系统而在不懈的努力,这是与那些希望保留“始源性文化”和“第一自然”的自在内容的当地居民的愿望和期盼相一致的(同时也与一些专家关于一个地区在历史过程中的这个或那个时期的总体形象的判断,以及对某些物种的生活状态、建筑物、自然景观等的审美角度直接相关的,这些专家的观点受到保护主义者的拥护,但也遭到其他人的批判)。

从蒙特利湾地区的自然的商品化和财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的行为”态势。在早期的新英格兰人时期,商业性的捕熊使散居在山区的定居者得到了食物和住所。自我管理的劳动、地方性的货物贸易以及为维持基本生存而进行的生产活动是当时的一般情况。今天,熊已经看不见了,取而代之是拖着黯淡眼神的海獭,它们被当成纪念品卖给那些来自于劳工阶层的旅游者。以前,房屋是按照购买者的要求而建造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根据投资商的要求而建造起来的系列性的、半统一性的公寓群。两个世纪以前,在基本生存资料的生产、地区性贸易以及一些非常抢手的东西的长途贸易(卖给奥龙人的鲍鱼壳、卖给俄国人的海獭皮、卖给那些生活在寒冷气候和阴暗地方的人的鲸鱼油)的形式方面,存在着各种文化及自然维度上的多样性。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消费者、商品的生产以及一个由无数商品所构成的世界市场(贝壳成了旅游纪念品、海獭和鲸鱼成了被保护的對象——为了居住环境的舒适以及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之用)。在过去的日子里,最重要的是人类的生存,是基本的日用品,而在20世纪90年代,最

重要的则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用越来越低廉的成本生产出更多、更新的消费品,其目的在于能够降低人力资源以及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成本。

过去的那种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文化价值、技术水平、劳动方式以及“第一自然”之间或多或少都是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的——自从第一条铁路在这一地区建造起来,自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化的伐木和石灰生产业在这一地区出现,自从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业被移入帕加罗山谷地区,自从“旅游业的巨子们”(弗雷德里克·希恩、弗雷德·施沃顿、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把自然界舒适怡人的故事加以理性化,自从蒙特利湾地区著名的沙丁鱼加工业被提升到机械化的水平上,自从这一地区与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句话,自从资本主义化的财富取代原来的社区性和自足性的财富的时候起,上述这种统一性就开始瓦解了。这一瓦解的过程开端于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在19世纪80年代得到了加速。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经济萧条以及由此而来的美国的第一次主要的海外冒险(在加勒比海地区、夏威夷以及菲律宾),扩大了对当地生产的黑色炸药的需求,由此也帮助资本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来自于加州北部地区的木材业、波特兰水泥(指普通的硅酸盐水泥——译注)以及其他产品的竞争,再加上白人种族主义者为了防止工人阶级的联盟而把劳工分割开来的作法,都强化了资本在这一地区的统治。

86 在20世纪,文化与技术水平、协作方式、生产工具和技术、自然界的形式以及自然景观的样态之间的统一性以一种更快的速度在消失着。当然,这不是一种直线的过程。勿宁说,它是一种对文化技艺、技术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力的不平衡的、联合的分解过程。西西里人的捕鱼技术极大地

减少了蒙特利湾中的沙丁鱼的数量；挪威人的捕鲸技术使捕鲸上升到了工业化的水平，从而也极大地减少了游入蒙特利湾的鲸群的数量；北欧人的伐木技术使处在最为遥远以及最难以砍伐的地段的红木林也遭到了砍伐；这种以劳动的过程和技术、工业的资金筹集以及独特的种族印迹的退化为方向的发展过程事实上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虽然早期的工业和铁路建造往往是由本地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但现在，银行成了国家的、甚至国际的，全球金融市场对地方性工业的建构以及资源配置方面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当地的生意人和居民所能想像的程度。技术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从独特的种族或民族的文化形式和技艺中游离了出来。一个位于伦敦的跨国性联合企业在帕加罗山谷的土地使用问题上拥有生杀大权。<sup>28</sup> 尽管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种植浆果的技术创造了本地的草莓产业，<sup>29</sup> 但现在，这种“魔鬼般的水果”早已用标准化的技术和化学药品来加以种植了，而这些种植者的祖先以前是来自于三个大陆的。第一个主要的石灰工厂是由一个欧洲家庭的后裔建造和运行起来的，这个家庭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以石灰生产的技术而著名的；<sup>30</sup> 而现在，采石的工作已经由机器来完成了，燃烧的工序是在高技术的熔炉中完成的。在19世纪50年代，传统的伐木技术让位给了锯床；在19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资本运作深入到了那普托斯河流域的最深处（当然，它仍然必须依靠伐木工人的个人技术），工人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砍伐、搬运以及锯开那些原生性的红木树。今天，在这一地区的每一个角落，树木的砍伐与搬运、木材的加工与制造都在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进行着。在蒙特利的罐头加工厂中，沙丁鱼加工过程的机械化导致了这一行业的更高层次的资本化，同时也结束了中国人与日本人传统的手工杀鱼技术的统治地位。<sup>31</sup> 在普鲁纳德尔丘陵地区居住的苏格兰—爱尔兰

兰居民的个人主义传统,曾经是各种类型的维持生计的农业耕作在其中得以发展的文化形式,现在则只是存在于这种耕作模式的一些生态性遗迹之中了:在20世纪90年代,农场与果园被混合在了一起,在其中劳作的工人自称是“美国人”,可他们的祖先却来自于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与过去的情况不同,现在,没有哪一个种族能够垄断那种低资金投入的有机蔬菜的生产:在圣塔·克鲁斯的农贸市场,来自于欧洲、日本、中国以及墨西哥的移民的后代,有男的,也有女的,一个挨着一个地在出售着他们的产品。在差不多每一个部门中,市场以及标准化的技术需求、融资方式、劳动管理模式等已经取代了旧式的那种文化与劳动之间的更为紧密的联合体形式。

同样,自然系统也被转换成了一种使用对象,这种转换在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它是一种以一定的文化、生产和生态进步水平为前提的协作劳动的方式)来临之前是不可想像的。无霜的西红柿、冰冻的硬花球花椰菜、机械化的耕作、农业生产中化学药品的普及、林场以及后现代性的建筑结构等,都与地方性资源的提供或当地的建筑传统没有任何关系——那些不再“拥有”第一自然之形式(以及特定的种族文化之成果)的商品事实上已经数不胜数了。

资本主义的独特的时/空统一体把生产从原来的文化与自然形式中脱离了出来。圣塔·克鲁斯海滨的木板路,作为西海岸最后一个对外开放的娱乐场所,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但现在,这里所提供的娱乐项目以及来此参观的游客都发生了变化。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参观这条木板路时,这条路上有一座“快乐屋”,你的孩子们只要愿意扮演两派不同的角色,就可以在此尽情地游玩,并且,直到1963年,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咸水游泳池,泳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跳水。今天,这里的场地在使用上都更具

“效率”(即更能获利)了:可以跳水的游泳池和那座快乐屋都已经不见了。你可以去骑马或者玩电子游戏机,但每一分每一秒都得你自己掏钱。休闲活动被标准化了。文化景观同样也标准化了:重新修建的圣塔·克鲁斯码头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私生子;这个城市的北太平洋大道(市中心)模仿了卡梅尔村庄的一些特征;即使是瓦特森维尔,这个墨西哥文化的最后堡垒,也计划对它的市中心进行档次上的提升。虽然在蒙特利、爱普托斯、开比托罗、瓦特森维尔以及圣塔·克鲁斯,人们依然能感觉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不同,但这种差异性更多地与他们的财富及收入水平相关,而不是指他们的种族文化和独特的环境或自然景观之间的差异。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一方面,特定的文化与自然构型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特定的劳动分工形式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联,已经衰退,或者说已经被打破,或者说已经被遗忘很长时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代性的、商品化的自然与文化形式,这些形式是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而不是“古时的”那种社区性的发展)以及雇佣劳动形式的世界化的一种反映。与此相对应,出现了一大批文化与自然的保护主义组织,它们试图保护、恢复或牢牢地记住这种或那种传统的文化实践与景观——其中的大部分都游离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劳动分工以及当今社会所生产的商品的类型之外。

## 结 论

上述这种思维方式使我们免于费力地去为环境决定论和纯粹的地缘政治学、或者文化决定论和纯粹的身份政治学进行辩护。传统的二元论观点主要致力于对绿色带、国家公园、



种族节假日等形式的坚持。在物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消除了。上述这种过程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正像与此同时出现的自然景观以及各种不同的“协作文化”一样。从这里至少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可能存在一种与失业、低工资、无家可归、贫困、不公平以及社会腐败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阶级政治学,它能够言说地区性环境以及政治身份等问题。

一种对蒙特利湾的生态和社会史以及今日在这一地区所进行的政治争论及基本政治构型的总体性描述,至少从原则上说是可能的,这种描述无疑是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海洋和土壤科学、艺术、文学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描述对于文化生活、生产活动的健康而又可持续性的重构以及生态的复兴来说,同样也是非常必须的。许多当地的文物工作者,还有一些对历史事实情有独钟的杰出的业余历史学家,事实上已经提供了这种描述所需的原始素材。那个从蒙特利一直延伸到圣塔·克鲁斯的著名的月牙形地带,成了那些对古老种族文化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的景观和遗迹,以及对这一地区今日的经济形态感兴趣的男男女女的“乐园”,他们致力于揭开这一地区的秘密,解构各种神话,以及用一种对把这一地区建设得更为公平和正义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来重构它的过去。虽然我们缺乏掌握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现实思考的方法论的多面手,但我们拥有很多在海狮、海岸线、红木林、火灾控制、水力循环、农业、城市设计、环境保护、各种种族传统以及其他许多研究领域内的专家。

当然,问题的关键点并不仅仅在于理解过去,同时还在于能够改变未来。但是,在现有的这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专家中,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少的人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自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是一个规范



性的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对以下这些问题的回答:劳动将成为什么样子?劳动者应该为了什么而工作?社会的财产关系及权力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第一,劳动是为了私人或国家的财产而工作的,这些财产本身有一个民主化的问题,在很多场合甚至是一个在最低限度上符合公众意愿的问题。第二,没有人能拥有一种把握环境、社会和政治的可能性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文化的、物质或经济的、自然的产品之本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以一种对我们是什么、我们如何构想和利用周围的环境以及文化积淀、后者又是如何利用我们的等问题的有机的理解为前提的。那些专家们都埋头于对这个地方的社会史、那个地方的自然史、其他某个地方的经济史的研究,他们中没有人知道这一地区的真正的生态史内容(就这些词的本真的意义而言),这样,他们就回避了上述这些专门史之间的相互交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定的自然、审美及认识方面的相互作用这样一些困难的问题。

最后,这还是一个有关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资本主义越来越把人们从生产资料、生产对象及周围环境中分离出来,并在自由市场和竞争的名义下把社会和经济世界自然化。雇佣劳动成了一种对田野中的土壤和水之间的区别,以及工厂中的物理和化学反应之间的区别毫不在意的劳动;一个地方的居民也不再对通过辨认空气中的味道,通过观察风的方向来确定气候感兴趣。这是一种对社会经济存在与第二自然之间的各种不同的相互作用形式的故意无视。自然成了在哈利·考威尔国家公园中的一次散步;文化成了对圣塔·克鲁斯的“麦克佛森艺术和历史中心”的一次参观;劳动成了在标<sup>89</sup>有“私有财物,请勿带人”的标记的高墙内的一种活动。

与此直接相关,这是一个有关我们的教育体制的问题,高

等教育机构也不例外,因为,在那里,交叉性的科学与艺术研究相当缺乏。尽管现在出现了在“交叉性学科研究”的名义下把各门学科组合在一起的努力,但知识的专门化(思维的单一模式)对我们的思维无疑构成了严重的破坏,正像在田野中、在高技术的工厂中以及在快餐店中的劳动对我们的身体所造成的损害一样。在一个到处都在模仿全球化资本模式的世界中,人类的文化成了“人力资本”和“社区资本”,生态、环境及自然景观成了“自然资本”,在这个具有超乎寻常的能量和权力的整体化的世界中,那些本来试图启发人们的思维的教育机构往往也会导致一些故意的无知。如果不对我们的知识生产模式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这种改革又是以对那些管理教育的及其他的机构的权力关系的深层次改革为前提的),那么,就只能由资本来愉快地回答“劳动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一问题了。劳动就将成为为生产、利润和积累服务的劳动(在周末和节假日,自然和文化的保护主义才会出现)。这同时也是对第二个问题,即自然和文化应成为什么样子的回答,因为,在各自不同但又都十分重要的维度上,这两者都是由资本和雇佣劳动所建构起来的。

蒙特利湾地区的水力循环、持续性的行为、气候的变化等等,以及这一地区的持久的、象征性的种族特征,对于理解对这一地区的自然景观的命运以及该地区人民的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不过,更为正确的是,那些偏爱自然界和地缘政治学的生态地区主义者,以及那些偏爱种族性和身份政治学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正在冒着如下的危险:一方面,忽视地缘与身份之间的辩证性的相互作用关系;另一方面,忽视劳动分工、竞争与世界市场之间的辩证作用关系,并由此而遮蔽经济和社会阶级在这一问题中的核心地位。事实上,现在也

许是一个重新建构阶级政治学以及它与地缘政治学和身份政治学的结合方式的很好的时机,这种建构当然决不仅仅在我们对过去的解释语境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对未来的展望以及未来政治学的语境中。

### 注 释

1. 马文·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为一门文化科学而进行的斗争》(纽约:兰登书屋,1979年版)。“自然造就文化”的观点尽管是对哈里斯的历史理论的过分简单化的概括,但它的确抓住了哈里斯运用于特定的时代与地点的分析方法中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譬如,哈里斯根据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那些几万年来一直是受偏爱的捕获物种的更新世大动物群的减少或彻底灭绝”,来对农业发展的问題进行了阐释(第87页)。另外,在哈里斯看来,“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欧洲封建的生产方式所置立其上的自然资源的减少”(第111页)。

2. 哈里斯(同上,第9章)对他称为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中的 90 “文化唯心主义”策略进行了批判性的评注。譬如,“一套流行的关于社会文化因果关系的心理学理论总是从这样的一种假定开始,即设想每个社会都有某种民族性格,某种样式的人格,或者其他的一些特定范围内的人格类型……心理人类学者与文化唯物主义者(哈里斯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之间发生研究策略上的冲突,原因在于当心理人类学者不能把客位的基础结构包含到造成人格丛结的因果链条中去的时候,或当他们进而主张结构和基础结构的变化是由某种特定样式的或基本的人格类型或民族性格的存在所预先决定的时候……”(第259—260页)。

3. 马瑟·诺库纳斯(Martha K. Norkunas):《公共记忆的政治:加州蒙特利地区的旅游、历史与种族》(阿尔伯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 我在本章的这里及其他地方所阐述的观点,源自于我在圣迪·利东(Sandy Lydon)在开布雷劳学院(Cabrillo College)的地方史讲座以

及他有关“自然与文化史”的不可分割性的公开讲座(劳顿·尼尔森社区中心, 圣塔·克鲁斯, 1994年9月20日)上的听课笔记。圣塔·克鲁斯的“孤立性”是利东非常喜爱的一个论题, 不过, 他的观点也受到了一些人, 譬如当地作家杰弗里·邓恩(Geoffrey Dunn)的反对。邓恩说, “我以为利东过分夸大了圣塔·克鲁斯在19世纪的‘孤立性’。虽然圣塔·克鲁斯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中心, 但它无疑是与西班牙和墨西哥的政治经济生活以及后来的美国西部开发联系在一起的……山是大的, 海湾是深的, 但我们这个地方并不是个孤岛, 它从来就不曾是个孤岛”(未发表稿, 1994年)。

5. 唐纳德·托马斯·克拉克(Donald Thomas Clark): 《圣塔·克鲁斯的地名: 一本地理学的词典》(加州, 圣塔·克鲁斯: 圣塔·克鲁斯历史协会, 1986年版)。

6. 梅尔考姆·马格林(Malcolm Margolin): 《奥龙方式: 旧金山—蒙特利湾地区的印第安人的生活》(伯克利, 加州: 希迪书系, 1978年版); 戈登, 同前引文, 第21—48页。

7. 同上, 第48—55页。

8. 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把加利福尼亚人描述为“为粗野的舞蹈而生的骄傲的、懒惰的人群”。一位早期到达此地的美国人说他看到了“加利福尼亚人画着一种单调的、古怪的面色, 在一种狂野的、动物般的兴奋中跳舞和相互谩骂。”

9. 在古希腊神话中, 普罗米修斯是一位为了造福人类而从天堂中盗出火种的英雄。不管是普罗米修斯还是当时美国文化中的神话特性, 在下列这段文字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1905年6月5日, 一支建造海岸铁路的队伍开进了瓦德尔·布鲁夫地区, 开始了征服这一海岸荒野地区的不懈努力。无数吨的石头堆放在乡村道路上已经很长时间了。而要想建铁路, 就必须把这些石头搬走。维德·特鲁姆博和他的队伍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这条海岸铁路的建造是一个由多项工程组成的宏大计划, 其目的在于通过把圣塔·克鲁斯与旧金山连接起来, 以促进该地区的恢复及商业的发展。这项工程最终没能改变其失败的命运, 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要想克服像瓦德尔·布鲁夫这样的障碍是很困难的”(弗兰克·麦克雷里: “一条建不成的铁路”, 参见《瓦德尔·

布鲁夫：一条拥有戏剧性历史的美丽小河》(未标明日期))。

10. 圣迪·利东(Sandy Lydon):《中国黄金:蒙特利湾地区的华人》(开比托劳,加州:开比托劳出版公司,1985年版),此书中随处可见有关这种情况的论述。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史的最好论述。 91

11. 同上,第501、504页。

12. 戈登(Gordon)这样写道:“中国的风俗习惯被引进了,但改变的地方却很少”(同前引文,第59页)。中国的文化与手工技术在“边缘”地带发挥着很好的作用,这里的“边缘”概念,不仅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说的,而且就其文字本身的意义来说也是如此,譬如,他们在海边就工作得很好,他们有长期收集和加工海产品的经验(同上;或参见利东(Lydon):同前引文,第488页)。“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人那样充分地利用自己所能得到、生产或加工出来的东西,他们真的一点也不浪费。所以,当第一批华人移居蒙特利湾地区——大约1851年前后在保德·罗伯斯湾定居——的时候,作为经验丰富的渔民……,他们必定非常高兴地看到有如此丰富及多种多样的资源可以使他们大展才能。保德·罗伯斯地区的华人,跟早期移居蒙特利湾地区的其他人种不一样,他们都是整个家庭一起来的……”(迈克尔·肯尼思·赫普(Michael Kenneth Hemp):《罐头加工厂中的道路:一条能看得见海洋风景的老路之历史》,(肯纳奥赫,夏威夷:历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13. 普鲁纳德勒地区有着几百个能够独立维持生计的农场,里面有水果树、奶牛、马群以及蔬菜地(戈登:同前引文,第100—101页)。

14. “在差不多漆黑一片的大海上开网捕鱼是需要勇气、技术和团队合作的水平的,其困难对一个外行人来说是很难想像的。虽然在谈到这些捕鱼者时经常会提到‘意大利人’,但就捕鱼的能力和技艺而言,真正在蒙特利捕鱼业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那些来自于靠近帕雷玛的海边城市的人……如果碰到特别大的捕获物,像那种难于被带回的特别大的鱼,那么,它们就会在相互之间非常友好的(西西里人的)渔船之间被平分,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赫普,同前引文,第79页)。

当然,在这一点上也不尽相同: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一群来自于意大利热那亚的渔民以及他们的家庭定居在圣塔·克鲁斯,他们基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里瓦·特雷高索(Riva Trigoso)的较小的渔业社区。“那些热那亚人从他们的家乡带来了兰帕罗网的使用技术……他们很快就把这种捕鱼方法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结合了起来。当浅海的捕鱼业开始衰退(由于过量捕鱼)的时候,他们就采用新的方法,尤其是葡萄牙人的长网捕鱼术,到深海中去捕鱼。虽然这些热那亚人是具有很强烈的团队协作精神的,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他们的捕鱼都是具有商业目的的,他们所捕获的鱼是运往圣塔·克鲁斯之外的旧金山的集市上去的,在那里再转乘火车运往其他地方。因此,我认为,在这些热那亚人之间是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的,而且与日俱增。他们每个家庭都有一只渔船,当他们的儿子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这个家庭就要增加另外的渔船。虽然说在家庭之间的确也存在着一些协作关系,但主要的协作是在家庭内部。这种捕鱼群体之间的凝聚力主要是建立在独立的语言与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妇女之间的协作(助产士、照料小孩、帮别人治病等等)关系之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捕鱼活动的基础上的”(杜恩(Dunn):与本书作者的私人通信,1995年8月)。

15. 当地的历史学家仍然有必要对日常生活(譬如家务劳动、教育等等)范围内的妇女对蒙特利湾地区的环境起影响作用的方式进行研究。

16. 这两种文化趋势(我强调它们是两种“趋势”)虽然共存着,但两者之间是很不安宁的,有时甚至是对抗性的,具体的例子可参见弗兰克·巴迪克(Frank Bardacke):《杰出的自由主义者与伟大的蓝色苍鹭:帕加罗山谷地区的土地、劳动与政治》(圣塔·克鲁斯,加州: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心,1994年版)。

17.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卡洛斯·吉茨伯格(Carlos Ginzburg)的文化决定论观点的批判与此处的论述是有关系的。“吉茨伯格的阐释中所缺失的,是对在每一种文化史中都占重要地位的‘意义’之流变的研究——譬如,那些曾在一定的文化中起核心主导作用的风俗或信仰,在一种改变了的条件下,被零散化或边缘化了,如果它们被要求去解释那些更为深层的发展过程,这些发展过程有可能与它们的路径相一致,但也有可能是不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会丧失其意义……在社会生活中,越是古老的、久远的东西往往是越零碎的东



西,它们之所以仍然保留着,是因为它们已经变成了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杰克·高迪(Jack Goody)曾经这样评论道,某些菜肴被保持了下来,这不能从它们的象征意义的角度去解释,而是因为人们对它们根本就不在意,就像一颗简单的钉子被保持下来是因为人们对它根本就不在意一样……语词和神话,不像那些客观使用着的具体物质,它们无非是意义的表达者,它们的内容总是服从于意义的解构过程的……这些东西与具体物之间的惟一不同在于,其本身内部总包含有这样一种趋势,即某种类型的意义阐释总会随着另一种意义阐释的进入而使自身失去合法性,后一种意义阐释往往是跟前一种阐释相矛盾的”(佩里·安德森:《约定的视域》,(伦敦:新左派书系,1992年版)第224—225页)。

18. 巴迪克:同前引文,第5章。

19. 譬如,诺库纳斯(Norkunas)的观点就是如此,参见前面所引的著作。

20. 历史学家圣迪·利东(Sandy Lydon)在其讲演和著作中所表达的观点与环境决定论相类似,虽然他有时候(这种情况非常少)的确承认文化、世界经济及政治共同起着(有时强、有时弱的)某种作用(譬如,圣迪·利东:“致力于对蒙特利湾地区及其历史的重新发现”,《圣塔·克鲁斯县史志》,1994年第1期)。

21. “根据传统的观点,土地与劳动是不能分离的;劳动是生活的一部分,土地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活和自然构成了一个内在相联的整体。由此,土地与亲属关系、邻里关系、手艺以及信仰维系在一起,与部落和庙宇、村庄、行会及教堂维系在一起”(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57年版,第178页)。

22. “伐木工人的出现给蔬菜行业造成了负面影响。直到第二轮生长起来的红木树在山谷的下游地区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在河岸边生长的树木才与那些常绿树混杂在了一起”(圣迪·利东:《尼森·马克斯国家公园中的森林》,(圣塔·克鲁斯,加州:圣塔·克鲁斯山自然史协会,未注明出版日期)。

23. 迈克尔·梅瑟(Michael Meuser):“马克斯家族在森林中:尼森·马克斯国家森林公园中的生产的意义及意义的生产”(获奖论文,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1992年6月2日),第15—16页。



24. 加里·格林(Gary Greene), 莫斯·兰丁海洋实验室主任, 1993年9月7日在圣塔·克鲁斯的鲁德·尼森社区中心所做的演讲。深水摄影照片显示, 在这一海底区域至少已经有6种不同的蛤。不过, 与本书作者共同主持过“雷肯的生态群落”课程的当地自然学家弗雷德·马克佩森(Fred Mcpherson)对此提出了异议: “远海(深水)的和岸边的生态系统并不是一个整体, 它们虽然同属于一个海洋系统, 但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稍微受到影响了的前后相继的状态之中”(1993年7月3日的信)。但问题是, 什么是生态系统? 什么是前后相继性? (参见路德维格·特普尔(Ludwig Trepl): “生态学中的有机主义与还原主义: 技术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内涵”, 载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 第5期, 1994年12月。)

25. 加里·格利哥斯、劳伦特·萨佛(Lauret Savoy): 《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海岸边》(杜海姆: 杜克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93 26. 戈登(Gordon): 同前引文, 第5章。

27. 赫尔达·胡佛·麦克里(Hulda Hoover Mclean): 《蒙特利湾地区随潮汐漂流的贝壳》(圣塔·克鲁斯, 加州: 圣塔·克鲁斯博物馆协会, 1992年版)。

28. 巴迪克: 同前引文, 第5章。

29. 尼虹·巴克(Nihon Bunk): 《日本文化: 帕加罗山谷的一百年》(瓦特森维尔, 加州: 帕加罗艺术委员会, 1992年版)。

30. 鲍勃·皮瓦西克(Bob Piwarzyk): “波高尼普的石灰窑”(手稿, 未注明日期)。

31. “自从引入机械化的杀鱼机之后, 传统上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完成的手工杀鱼过程逐渐地变得不再那么具有独特的民族特性”, 赫普(Hemp), 同前引文, 第89页。

## 第四章

94

弗尔河流域(加州,弗尔顿)  
建筑物的特点以及对自然界的  
建构情况(1860年~1990年):  
一个手稿\*

### 导 论

**弗尔河的景观。**这里所阐述的是一条小河及其整个流域的自然史过程及其历史性特征,这条小河位于加州蒙特利湾地区的圣塔·克鲁斯山脉。

**古老的“桥”：弗尔河。**这里所采用的是“生态史”的叙述方式——其目的在于研究人类劳动,或物质生产是如何依赖于地理、气候及其他的自然形式和力量的;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造成了什么样的生态转型;人类在“自然界”问题上的经验和意识是如何相应的发生变化的。

---

\* 此文是与巴巴拉·劳伦斯(Barbara Laurence)合作完成的。

崭新的“桥”: 弗尔河。生态史所体现的是人类劳动、生态科学以及生态意识本身的历史性本质。

河流: 一个特写镜头。生态史的首要理论前提是: 自然史不过是人类劳动与自然界本身的系统相结合的历史。当然,我们将把我们的论述继续往前推进……

## 历史背景

95 运货车。在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的前 25 年中,西圣塔·克鲁斯县的工业经济主要是建立在向旧金山、圣·乔斯以及加州北部和南部的一些快速发展的城市输出建筑材料的基础上的。

红木。通过对原始红木的加工而获得的木材及其他许多木制品,被广泛地运用于建筑业中,它们是最为获利的输出产品。

窑门。其次重要的是石灰的生产与输出,建筑业所需要的灰泥和熟石膏,铁路隧道、矿井、采石场在爆破时所需要的黑炸药以及皮革制造等行业都需要石灰。

红木树被砍伐后所剩下的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第一批红木林已经彻底消失。

弗尔河流域的石灰窑。其本身就依赖于用红木当作燃料的石灰工业,也已经急剧衰落了。

考威尔采石场。那些主要的石灰石采石场中的大多数,以及那些更小一些的采石场,都已经被放弃了。

榛子。石灰行业和火药行业用来制作桶箍的榛子灌木变得越来越少。

鞣皮橡树。可以给当地的鞣皮制革厂生产鞣酸的鞣皮橡树,同样也变得越来越少。

**弗尔河上的廊桥。**山里的铁路和桥梁都已经废而不用了。

**天然的“桥梁”。**与此同时,西圣塔·克鲁斯县还在输出其他的一些主要资源——其凉爽的夏季气候、沙滩、阳光、海洋以及山区的风景——这些构成了当地旅游业的基础。

**河流。**圣塔·克鲁斯的河流与小溪同样也是当地旅游业的基础。从旧金山、圣·乔斯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来的观光客,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当地经济的一个要素。

**木板路。**西圣塔·克鲁斯县在耗尽了它的原材料后,便逐渐专注于旅游业,并于此而与附近的那些城市区别开来,这些附近的城市本身就是用圣塔·克鲁斯山区的红木和石灰石构建起来的。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旅游业就变成了一种主要的输出性行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弗尔河流域的窑。**在19世纪的时候,在沸尔顿的弗尔河地区,石灰生产和桶的加工制造是当地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沸尔顿位于从圣塔·克鲁斯冲积平原沿圣·劳伦斯河北上6英里的地方。弗尔河的起点是本·罗蒙德山的顶端,它在沸尔顿这个地方融入圣·劳伦斯河。

**蓝色的悬崖。**石灰厂大多建在沸尔顿以北两英里的那些陡峭悬崖的边缘,这些陡峭的悬崖是由优质的碳酸盐钙或石灰石所构成的。这些石灰厂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在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时期曾临时地关闭过,后来又重新开办了起来。在1919年,这些工厂被永久地关闭了。

**枫树叶。**今天,弗尔河流域已经成了圣塔·克鲁斯县最美丽的几个观光点之一。它已经成了当地旅游经济的一部分——主要是当地的那些周末旅游者会到此一游。同时,它也是用来说明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的相互结合或相互融合的极好的实例。

**弗尔河风光。**这一流域有许多的岩石,不过都很小。这

一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史状况相对来说都很简单。其自然史和河边的生态状况也是一样。弗尔河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系统相互影响和相互改变之方式的一个实验场。

**蘑菇。**弗尔河对许多不同类型的旅游者都有吸引力。对有些旅游者来说,这一流域是圣塔·克鲁斯山的自然景观的一部分。

**桶的加工制造。**对其他一些旅游者来说,弗尔河是圣塔·克鲁斯经济与社会史的一部分——一种工业的考古学,传统的桶的加工制造当然包括在其中。

**各种景观的集中地。**不过,这一流域与其说是人类历史性的,还不如说是自然性的。它是自然系统与人类的物质活动相互结合或相互融合的结果。

### 进入弗尔河的入口处

**公园的入口。**弗尔河是一种“第二自然”或“人化自然界”。这可以从公园的入口处清晰地看出。这里所呈现出的是一派乡村的以及有秩序的自然景观,它舒适怡人,且具有安全感,因此很有吸引力。那种在我们看来意味着文明的安全感,从双向车道上就可以反映出来,它体现出了官方的权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秩序。

**停车点。**那个肮脏的停车点以及相关旅游设施的缺乏,反映出弗尔河地区还处于欠发达的状况——这说明,来此观光的人所希望得到的是一种浪漫式的自然、一种“没有被人类之手所触摸过的”自然,以及对城市生活的一种解脱。

**标志物及通道。**那些受过训练的讲解员引导着登山者穿

过弗尔河地区。两条最受欢迎的登山路线的讲解员,分别来自于圣塔·克鲁斯山脉自然历史协会和圣塔·克鲁斯博物馆。历史协会的讲解员所关注的重点是工业化时期的一些遗迹;而那些跟着圣塔·克鲁斯博物馆的讲解员的人则关注这一流域的植物种类的多样性。

**标志物及通道:** 一个特写。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两个组都计划在同一时间登山。由于在停车点已经被告知了这里的一些具体情况,一个观光客建议把两组登山队伍并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使每一个人都能分享到历史线路和自然线路的讲解员的知识——可惜这个建议没能得到响应。“自然”线路的讲解员解释说,她的小组将会在整个流域的范围内蹀躞,以便对这里的植物进行观察;“历史”线路的讲解员则说,她的队伍将不会在别的地方耽搁时间,而会直接登山,以便去发现那些古老的工业化的遗迹。这就是把历史与自然结合起来的实际努力所得出的后果! 西方式的二元论思维从来没有停止过。

**弗尔河公园的标记牌。** 这个用来标示公园的标记牌无意中成了历史与自然的双重象征。“6 a.m.”,是在用时钟来计量人类活动的年代用来说明标准时间的方式。“日落”,则是用来说明自然时间的,这种方式是从用人类的活动来计量时间的前资本主义时代所延续下来的。

\* P97 - 102 在原书上是照片,本中文译本未采用这些照片。——译者

## 劳动过程

**红木及含酸液的植物。** 19 世纪的木材和石灰加工业导致了弗尔河流域的生态转型——正像造成了加州北部和中部

103 海岸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一样。这里的论述是从这一流域的原始生态状况出发的。大地震、陆地的移动、岩浆的喷发以及气候的重要变化,构成了一幅弗尔河流域的宏大生态画卷。

**花岗石和红木树。**这是一个在经济上具有关联性的生态事实。河流岸边的花岗石和岩石把土壤固定住了。这便使得那些根部很窄的红木树得以生长。这种呈现出有机契合性的自然景观——花岗石帮助了红木树的生长——是由石灰加工业构建起来的。

**红木树的树根。**红木树及其他种类的树木被砍伐,然后由运货车把它们运送到有窑的地方,并被当作石灰窑的燃料来使用。自然界提供了廉价的以及容易得到的燃料。

**采石场:蓝色的悬崖。**弗尔河流域的石灰大理石的形成是由碳酸盐钙层的压缩所导致的,而后者是由古代的海底化石所形成的。这些被压缩了的物质被岩浆加热到极其高的温度之后,便会形成一种水晶状的岩石,从这种岩石中就能生产出优质的石灰。蓝色的悬崖是山体被炸裂之后的结果。它有300英尺高,这里是这一地区三个最大的石灰采石场之一。

**贮藏炸药的船舱。**来自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劳工,其中的有些人不过是合同工,从这只船上带着炸药爬上悬崖。

**被置放在窑的上方的老式矿车。**劳工们把石灰石(每块都有人的头那么大)装满矿车,这种矿车是由自身的重力所推动的,它在窑的上面沿着固定的路线滑行。

**铁轨。**矿车沿着一条很窄的铁轨从采石场的顶部下滑至窑场。

**早期的窑。**这一地区早期的石灰生产者都是自食其力的,他们所建造和使用的是只能用来烧制陶罐的窑。但是,自从引进雇佣工人之后,要想保证这些劳动力处在忙碌的状态,并由此而被充分地剥削,就必须要有三个窑的同时存在。其中的一



个用于烧制,第二个用于冷却,第三个用于重新装进新的材料。

**以前的窑。**19世纪后期,加州所用的石灰的20%至40%是由这些窑所提供的。其中的大多数或者被转口到旧金山,或者就在当地使用。

**圣塔·克鲁斯城:长镜头。**于是,弗尔河帮助构建了附近的城市,包括圣塔·克鲁斯在内。圣塔·克鲁斯城发展出了具有典型性的城市的社会结构、价值及氛围。城市化导致了一种逃脱或者说“返回自然界”的社会需要或愿望。“返回自然界”当然包括返回弗尔河在内。

**建筑物。**圣塔·克鲁斯以输出建筑材料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帮助建构起了足以养活城市人口的物质基础。由此,西圣塔·克鲁斯县对自身环境的舒适性的社会需求也在不断增大。圣塔·克鲁斯和弗尔河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正像过去出现过的情况一样。

**以前的窑。**弗尔河流域的石灰厂在1919年的时候就被弃用了,这根源来自于波特兰水泥的竞争、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导致的劳工短缺,以及红木林的耗尽。劳动条件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独特类型的窑(在技术上非常落后)在那个时候会被使用,以及为什么会在上述那个时期被关闭。

**窑的通道。**1930年之后,由于劳工运动以及劳动条件在总体上的提高,因此,在美国,像这样的窑已经根本无法吸引劳工了。低工资以及恶劣的劳动条件——包括酷热、经常性的烧伤和跌倒、硫磺的味道、恶劣的通风条件以及来自于采石场的那种爆炸的噪音——确实太可怕了。 104

**窑的内部/蓝色的忧伤。**今天,这些窑所唤起的是一种忧伤的情绪,就像面对18世纪英国前浪漫主义的那些残存的城堡时所产生的情感一样。

从上面看窑。它看起来像一座已经被自然界改造过的大人物的坟墓。自然界实实在在地但又是悄悄地在软化着历史。

**拱壁(Buttress)**。石灰在经过燃烧之后会把杂质分离出来,所得到的产品会被铲进桶中,并装到运货车上。

**仓库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仓库,它横跨了整个填河区。那些空的和已经装满了的石灰桶在被运货车运出山谷之前,要在这儿保持干燥。这些石灰桶会被运到弗尔顿,然后再运到圣塔·克鲁斯的码头上。在铁路开通之后,同时也会运到那些等在那儿的货物车厢内。

**铲子**。在燃烧之后,工人们会把那些带有杂质的、剩下来的石头——包括用来建造拱道的石头——从窑的前门铲出去。

**桶板槽**。在窑的下面建有一个桶板槽。制桶工人用红木来做桶的板,用榛子树来作箍。木材被浸泡在槽中,以便能够被弯曲成桶板。

**树桩**。原始红木被劈开之后,其树桩部分的纤维质能够燃烧很长时间并能产生很大的热量,因而被当作燃料来使用。大约80考德(cord在英文中是一个木材堆的体积单位,它是4英尺×4英尺×8英尺=128立方英尺——译注)的木材被剩下来了。每一次持续大约三天时间的烧制过程需要大约70考德的木材。

**堆积起来的矿石渣**。紧靠着由石灰厂而下的那条溪流,美国梧桐和常春藤在高高的矿石渣堆或者一些垃圾堆上长了出来,这些垃圾堆由在往窑里装货以及在窑里的东西被烧制完了之后运出来的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组成的。这些矿石渣被用来填埋窑旁边的那些小溪流,以使用来建造运货车能够通行的道路。

**挡土墙。**三条挡土墙支撑着那条能够使运货车驶离石灰厂的道路。之所以要建三条挡土墙,那是因为这样的设计最能使山坡得以固定。

**河流被填埋起来。**当两条支流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南面的那条支流就会被填埋掉,以便能够建造出一条货物通道。地下的侵蚀力已经从下面侵蚀掉了这条道路。

**河流中的废石。**在石灰厂的下面,河流被当成了堆放废弃物的场所,那里被堆满了各种自然的和历史的废弃物。

**运货车通行的道路。**那些被扔进河里的石头,后来被用来铺设让运货车通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现在成了观光客通行的主要道路。到这里来登山的一代人已经调转了历史的方向——他们使这个安全的、吸引人的地方成了让人步行的地方。

## 对河流的修复

**红木林。**在石灰厂被关闭之后,许多人进入了弗尔河流域。

**树林中的金属。**附近的居民在这一流域寻找废旧金属、木材、红木树的树疤、柴火、浆果、蘑菇以及蕨类植物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嬉皮士们在这一地区利用剩下的木材和砖头建造营房。 105

**河流的风景。**当地人在河中钓鱼,把原来的窑场当成练习射击的地方。小孩在河流边玩耍,在采石场上爬来爬去(有些小孩掉下来受了伤,有两个小孩因此而死亡了)。1972 年,公园管理部门把弗尔河也纳入了其管辖范围之内。

**修复后的河流,鱼在其中产卵的池塘。**20 世纪 70 年代

中叶,达维·霍普(Dave Hope),这位圣塔·克鲁斯的居民以及地方官员,组织了对其中的一条支流的修复,鲑鱼和铁头鱼以前是在这条支流中产卵的。伐木工人在这之前已经把树冠去掉了,而鱼正是需要这样的树冠所产生的树阴来生产它们的后代的。道路建设和塌方所导致的淤泥,盖住了由砾石所建构起来的河床,而这种河床同样也是鱼产卵所需要的。

**修复后的河流,鱼在其中产卵的池塘。**现在让我们进入修复河流的劳动的层面。从技术方面来讲,这些修复河流的行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他们对水进行了导流,使它能保持一种快速的流动状态;同时,他们还在静水区域建造出了一些鱼能在其中产卵的池塘,这些池塘里的水一直保持流动状态,以始终不让它们成为一潭死水。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尽管河流看起来“很自然”,但事实上,它是根据一定的自然界的美学规律而人为地建构起来的。

**河流中的石块。**这条“被建构起来的”的河流具有一种很“古典的”形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逻辑与表情或感情之间的平衡。其逻辑性表现在对那些鱼儿(在产卵期间)在洄游过程中可以用来稍事休息的石块的设计上,这种设计是以石块和岩石在遭受暴风雨的时候所具有的承受能力为基础的。其感情性表现在对那些就地可得的自然材料——岩石、石料及木材——的使用上。这些对河流进行修复的人具有这样一种观念:自然界应该是宁静的、吸引人的,而不应该是一种奇异的、可怕的荒原地带。

**河流:一个特写。**自然界被建构成了那些寻求逃逸的都市人所希望看到的那种样子——那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曾经被想像成的样子。

**修复后的河流。**一种独特的自然,它类似于英国浪漫主义时代所倡导的那种景观——怡人的和安全的旷野。但是,

在这种修复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生物圈形态的理解却是非常简单化的：它仅仅被设计成了供鱼儿洄游的场所。而其他的生物种类——海藻、昆虫、鸟类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

**修复后的河流/被砍倒的树木。**与此同时，那些被砍倒的树木顺着河流漂流而下，很容易损坏那些上面所提到的供鱼儿歇脚的石块。当今的历史与过去的自然界，以及当今的自然界与过去的历史，被无情地绑在了一起。

**修复后的河流。**在河流的转弯处，一些木头、砾石和岩石被置放在那儿，用以防止河堤的腐蚀。它们在河流中起了一种导向的作用，使船只能够避开浅滩，而这种方式看起来又显得很自然化。

**石块/索链。**有一根索链把这些石块固定住了。

**石头/很细的金属线。**一根用来把石头固定住的很细的金属线在水中若隐若现。自然界本身把人类试图把自然界改造得更自然化的努力凸显了出来。

## 石灰和木材的生态影响

**弗尔河的景观。**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修复河流和管理公园这两种各自独立的作用力的影响下，弗尔河流域的生态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弗尔河的景观。**弗尔河地区的生态条件的状况可以用来解释这一地区的窑的分布设计、木材加工和石灰加工业的操作方式，以及石灰厂的关闭时间等等。 106

**弗尔河的景观。**这些因素反过来又能解释对这一流域的工业化利用所产生的生态影响的类型及时间。在某种尚不被

人所知以及根本无法真正知晓的层面上,弗尔河流域的自然史是距今130年之前到距今70年之前的这段时间内的劳动史,正像它是这同一时间段中的自然系统本身的历史一样。

**弗尔河的景观。**工业化阶段从根本上说对弗尔河流域的生态是起破坏作用的。根据在这一流域的生态状况的研究方面惟一一位知名学者的观点,“在伐木业和采矿业时期……大量的生物消失了”。

**弗尔河的景观。**这位学者继续说道:“植被的大量毁坏……增加了土壤的蚀化、改变了区域性的小气候,并导致了一种以植物种类的减少和分布上的简单化为特征的、几乎是同一性的新的植物产地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持续性的反应。”

**弗尔河的景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生物状态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一流域……内部的能量存在于生物量与能源积累的统一体中,这个统一体所获得的能源比它所释放的能量要多。每年都在积累起来的森林植被以及森林中的落叶在不断地吸收着太阳所释放出的能量。”

**花卉。**于是,这一流域开始变得具有更多的生态多样性。原始红木林消失之后,更多的植物开始生长出来。

**弗尔河的景观。**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了比以前更多种类的蕨类植物、开花植物以及灌木丛。季节性的雨水及其蚀化作用同样也改变了河流本身。人类劳动对生态多样性的有意和无意的重构,是一个具有生态意义的事实,当地的都市人之所以选择弗尔河作为其逃逸城市生活的理想场所,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蓝色的花卉。**弗尔河今天的这种生态状况同时也是公园管理部门的努力的结果。公园管理部门(以及一些志愿者)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修缮了道路、建造了桥梁以及采取了

其他的一些保养和改进的措施。现在,这一流域真像一个花园。这一花园的管理者根据他们的意图或者根据不同花卉的作用,来决定种植什么样的花卉,以及不种植什么样的花卉。

**蕨类植物。**在这一流域的原本曾被毁坏过的地方,蕨类植物、加利福尼亚掌叶铁线蕨、开蓝色铃状花的植物、忍冬属植物、荷花、野生玫瑰、黑莓、山莓以及其他的一些植物都在茂盛地生长着。

**红木。**红木林的情况也是如此,现在,红木树的数量已经很多,尽管它们也许不可能达到当初的那种原始林的规模。红木树之所以很遍及的一个原因是,当红木树的冠很高很厚的时候,其他种类的植物和蕨类植物就无法生长了。那些依赖于阳光的蕨类树木以及金背蕨类植物可能会消失。

**榛木。**不过,榛木树却在这里重新出现了,桃花娘科植物以及豌豆属植物在河流的附近和道路的两侧茂盛地生长着。那些在浓阴地区也能生长的剑状蕨类植物,有可能存活下来。

**鞣皮橡树。**鞣皮橡树越来越茂盛。

107

**枫树叶。**大叶子的枫树也是如此,它们生长在密集的灌木丛中,这些灌木丛大多生长在“蓝色悬崖”的底部和河边的空旷处的石灰碎石中。

**蘑菇。**弗尔河流域对菌类植物采集者来说曾经是个理想的场所。现在,政府禁止观光客采摘蘑菇以及移动蕨类植物和其他植物——这实际上是做出了一种新的公园管理的决定。由于要对野生植物进行保护,因此,我们想要占有这些东西的愿望事实上是不可能在这些野生植物本身上面体现出来的,我们恐怕只能对着这些东西的照片想像一下占有欲了。

**瓢虫。**这些成群结队的瓢虫来自于何方,它们在迁移的路上是怎么选择弗尔河作为歇脚点的,以及它们为什么突然会在2月中旬随着温暖的急流离开这里,所有这些至今仍是



个谜。

**常春藤。**常春藤有很多种别名,包括“男人的脚印”。工人们种植它们的目的是想把其周围环境搞得更人性化一点,也许也是为了对腐蚀和灰尘的控制。

**长春花。**这些长春花以及上面提到的那种常春藤目前的状况,遮蔽了当初种植它们的那些人的经历,这些人好像有意要淡化他们自身的历史所具有的棱角。在这里,人类仍然统治着自然界这句话,只是在这些引进的植物物种统治着本土性植物的意义上才有意义。

**地下水渗出所成的坑。**在石灰厂的下面,水不断地从地下小泉孔或地下水的渗透孔中冒出来。当河流的上游部分被堵塞的时候,在砾石下面的水仍能保持新鲜,并能不断地更新自己。其原因之一就是有这样地下水的不断渗出。至于它的真实的经济史状况则不被人所知。

**河流。**石头、蕨类植物、光线以及水在这条支流中的组合,构建出了一幅浪漫主义的自然画卷,对于那些如饥似渴的具有思乡情绪的都市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 阐 释

**弗尔河风光。**卡尔·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过程不仅创造了可用来满足需要的物质,而且也创造了与这种物质相匹配的消费需要。本文所做的研究其实是上述观点的一种变体。弗尔河流域所生产出的石灰对加州的城市化进程,包括圣塔·克鲁斯和弗尔顿的城市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城市生活又建构出了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向自然界的逃逸和回归的社会需求。

**弗尔河风光。**当地的那些都市人以及其他的观光客所寻求的自然界,包括弗尔河在内,已不再是荒野了,不过仍然是不发达的地区或者说还很具有自然味道。

**弗尔河风光。**或者,换一种说法,弗尔河流域是那些处在想像中的都市人想要看到的那种自然界的一个典型。这样,我们的理论论述圈就可以完整了:弗尔河在下列双重意义上满足了其自身的需求:一是,帮助建设起了城市化的核心地带;二是,至今仍保持着自然界的外观和感觉,那些寻求从城市生活中逃逸出来的都市观光客在参观“大自然”的时候所希望看到的正是这种东西。

**河流边的仓库里所发出的灯光。**弗尔河仅仅表现出“纯自然界”的样子。事实上,在这一流域,历史与自然以各种方式组合在了一起,就像在河床边的那个仓库里所发出的那种讨厌的光一样。 108

**奇异的弗尔河。**这一地带有很多奇异的东西,譬如,有些窑的门框是被钉在森林的落叶层上的。

**水槽。**我们在这一流域所看到、听到、闻到的,以及我们在道路上走的时候所感觉到的那种安全感,就其本身来说,既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又与自然界自身的规律相关。

**运货车。**劳动力的供应和劳动条件、森林的枯竭、原材料生产中的技术变化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所有这些都对构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弗尔河的自然景观起着作用。

**红木树的桩。**但是,西方的二元论——短视行为——遮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这种自然历史与历史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生态史的研究对历史与自然之间的意识形态壁垒起着解构的作用,并建构起了一种从历史和自然的双重维度来解读现在的新的视域,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 第五章

# 两个城市的故事： 芝加哥与洛杉矶

## 芝加哥

把《相对极》(Antipode)这本激进地理期刊的整个一期都用来刊登以“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大西部”为题的专题讨论文章,这对于巩固威廉·克劳纳(William Cronon)在全国环境历史学界的领导地位来说,的确是一个好的策划(正像他们在好莱坞所说的那样)。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次失败的努力。11个激进学者,其中的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对克劳纳的散文体风格和叙述的能力、他的不辞辛劳的研究及其对研究课题的热情、他乐于从事对19世纪下半叶芝加哥和内陆荒僻地区之间发生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关系的方式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话题进行研究的热情加以了称

赞。不过,除了二三个人之外,其余的撰稿人都对克劳纳的理论天真及其由此而带来的没能做到一个作者应该着手去做(或应该已经做到)的事情进行了指责。这些批评意见,往往是不宽容的,有时甚至是刻薄的,它在数量上要比对克劳纳的赞成意见超过二到三成。但这还不是这本专题论文集之所以失败的真实原因。正像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公平与效率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事情。其真实原因在于,克劳纳在他的“答复”中没有认可他的批评者对他所提出的批评意见中的任何一个观点。他也许会说:“如果在写作我的著作之前,我已经读到了这本论文集集中的每一篇论文,那么,我所写出来的著作依然会与此相同。”当一个好的学者不能从别人那里学到任何东西的时候,一定是某些地方出了问题了。

这里不单单是学者们的不同兴趣及个人自我主义在作祟的问题。克劳纳的批评者之所以要把矛头对准他,至少有以下三个其他的理由:一是克劳纳自己其实并没有很好地弄清楚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到底是什么,这自然会导致给这本专题论文集写稿的理论家的反感。二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们既没有对他们的方法作出很好的解释,也没有说明他们的研究为什么会得出比克劳纳的结论更好的理论成果。<sup>1</sup>(他们这些人提出批评意见的形式往往是非常不礼貌的,因此,只有那些非常有耐心和智慧的学者才能从他或她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议论中梳理出有价值的批评思路。)三是即使这些撰稿人以非常有用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了成功的解释,我仍然感到,克劳纳极有可能还是抵制那些批评意见,因为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声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他也不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10

克劳纳“猜想”他的那些批评者们之所以会觉得《自然的大都会》这本书具有严重的缺陷,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这些人

对这本书抱有了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不是就他本人在这本书中的“表现”来发表意见。但是，克劳纳好像对这种“表现”到底是什么，以及他的读者们有权希望看到的和没权希望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他的叙述（“故事”）明显地是希望给人以一种理论性的思考，但这种理论到底有多深以及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理论，这些都不清楚。有三四位批评者指责这本书没能对芝加哥地区性发展的动力问题进行阐释。是什么驱动着这个城市对自然界构成如此大的毁坏？当然，克劳纳的初衷也许并不是为了解释地区性的发展本身，而是为了解释这种发展对自然界所产生的作用。在这本书中，克劳纳说，他的意图在于描述“芝加哥与大西部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尤其是对这个大城市和它的内陆腹地地区所经历的经济与生态方面的转型进行研究。克劳纳的确是把芝加哥的商人、中产阶级、投资者、支持者及其他人当作这个城市变迁的关键人物来看待的，尽管他可能已经、或者可能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理论主张来凸显。同时，在答复凯洛林·默切特（Carolyn Merchant）对他关于大西部生态转型的解释本身就具有不完整性的指责时，克劳纳也说过，他是有意弱化这部分内容的，因为他已经在早些时候的一本论述新英格兰环境史的著作中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克劳纳对芝加哥的生态转型问题也没有做太多的阐释，不管是在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维度上还是在文化景观的凸显的维度上。默切特说，“克劳纳没能通过详细地描述江湖中所流出的污水、烟雾等东西的回流，或者排向农村和河流中的污物垃圾，来完成对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圈的论述。”

也许，克劳纳在他的“答复”中的确阐明了他的真实目的。他说，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研究一个大城市的发展历程（这种发展是与自然系统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自然系统使得这种发展成为可能）……来探寻人们把自己从其

“依赖于生存的自然世界中异化出去的各种方式”。拉尔夫·桑德斯(Ralph Saunders)和萨利·马斯顿(Sallie Marston)补充道：“克劳纳所论述的是，芝加哥是怎样在其周围的自然世界遭毁坏的同时，或者更为重要的是，怎样以其周围的自然世界的毁坏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对克劳纳来说是足够公平的了。我们仅需补充这样一点，“与此同时，遗忘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对自然界丰富资源的依赖性——以及自然界(第一自然)遭毁坏的状况”。但问题是，如果脱离了另一种与此相并行的研究，脱离了对人们从生产资料、他们的劳动及劳动产品、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从自然界)中异化出来的方式的研究，克劳纳的这种理论目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所有上述这些研究在克劳纳的理论中是找不到的。这也就意味着，克劳纳的目的只是对芝加哥及内陆地区的发展动态对自然界(和人类，就人类把自身从自然界中异化出来而言)所产生的作用进行研究，而不是对这种动态本身进行研究。克劳纳说，他没打算“给这本书的读者提供一个关于都市化、地区变迁、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全面叙述”。尽管商人、铁路、市场等的确是他的论述中心，但克劳纳声称：“我从没有说过交通、贸易、市场或商品活动是芝加哥这一城市获得发展的惟一决定因素……我只是说，这些 111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我们在芝加哥这一城市与内陆地区的关系问题上学到了很多。”克劳纳的这一说法也是公正的。不过，他的这种解释并没有真正地解释什么东西，只是把一种因素或许多因素中的一部分从其他因素中游离了出来，而没有说明其他因素是什么，以及这些其他因素是怎样与前面那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的。

克劳纳说，他的“理论视域是定位在进出芝加哥的道路上的，这些道路把芝加哥这一人类社区与自然世界联系在了

一起,事实上,芝加哥已经是这种自然世界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了”:运输与铁路。铁路这一话题往往给人以非常简单的假象,克劳纳对它的理论定位也许会把他的读者引向一个错误的理论方向。运输是一种生产性的资本,可惜在专题讨论中没有人提及它。(即使是像在超市的收银台边把顾客所买的杂物装进袋子里这样一种“纯粹”的交换劳动,也有一种生产性的要素。)铁路被加以建造决不只是出于某一种原因,这种原因上的多重性使得对铁路的叙述变得复杂起来。铁路加强了芝加哥及内陆地区的力量,并使得大规模的肉类工业遍布整个乡村地区;它还是剩余资本的输出通道,就像它是形成美国这样一个跨大陆的帝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样。与建造州际高速公路和空中穿梭航线的情况一样,在建造铁路的过程中,政治的和军事方面的考虑与经济方面的动机混合在了一起。现在甚至难以想像,如果当初不用铁路来取代航路,芝加哥这一城市与内陆地区之间是否会有非常重大的区别。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克劳纳显然对铁路本身倾注了过多的注意力,而没能很好地把铁路作为减少资本的周转时间以及加快历史发展的手段来进行研究(虽然他对提高铁路运行效率所需的时间方面的管理与训练的研究本身是非常出色的)。

克劳纳写下了这么一段清晰明了的话:“我们……现在知道的是,通过抓住现实中的一个部分,把它安排进一种必然性的结果中,虽然所有的证据也许会证明相反的结论,但我们要把这种结果塑造成似乎是一个完整的结论,叙述性的作品就是由此而来的。”克劳纳还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这样一个问题:现实中的一个部分是如何决定在现实历史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什么东西应该抽出来进行详细的研究以及什么东西则可以弃之不顾的取舍标准的?克劳纳的标准多半是指向有形性的事物的,譬如铁路及其所载的货物,是指向使用价



值而不是交换价值的。就像他仅关注进出城市的路线,而不关注资本积累的方式一样。这也许是克劳纳的批评者对他的理论目的和方法之间的关系感到困惑的另一个原因。

《自然的大都会》一书是否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的叙述,还是它同时也提出了“为什么”的问题?我以为这两者都有,但又都浅尝辄止,所以克劳纳在上述两个方面的论述都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他事实上并不十分清楚他所设定的理论假设是什么,这些理论假设应该怎样加以论证,还有哪些反面的例子应当找到,他希望解决的是什么样的理论困惑——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否被重构了,或者以前的叙述是否被修改了。这样的理论空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尤其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是致力于在批判“资产阶级理论”及其方法的形式下发展自己的理论观点的(克劳纳的批评者们回避了这种说法)。

克劳纳之所以抵制他的批评者们,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理论目的和方法没有被阐述清楚(由此而带来了他的批评者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有权去批评什么),而且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家们本身也没有对他们自己的方法阐释清楚(这反过来也激怒了这位《自然的大都会》的作者)。克劳纳说,他的批评者们之所以感到不满意,是因为他没有写出一本这些人希望他写出的书,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流通和资本积累的理论来分析芝加哥和大西部的发展动力的书。玛丽·贝思·普达波(Mary Beth Pudup)抱怨说,“克劳纳唯一的理论关注点就是流通……商人用的轮子成了使芝加哥获得发展的惟一因素。”菲利普·斯克雷顿(Phillip Scranton)说:“工业发展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对市场交换的变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可在克劳纳的论述中,由于缺失了对同样重要的生产过程的深入剖析,因此,它弱化了很大一部分论述。”

克劳纳忽视了两位批评者所说的“生产的首要性”和第

三位批评者所说的“生产关系”，这到底带来了什么后果？我们暂且假设他的这本书不单单是为了描述地区性发展所起的作用的，而且也是为了解释这种发展本身的。批评者们就克劳纳应该做什么以及他们希望他已经做了什么等问题畅谈了很多建议，可就克劳纳应该怎样去完成他们希望他所做的事却谈得很少。同时，他们也没有说明，如果克劳纳写的真的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么，他们的这种新的方法会使他可能获得什么样的不同的结论。<sup>2</sup>

布雷恩·佩奇(Brian Page)和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用一种对经济发展的市场维度的阐释，对上述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他们正确地指出，那些提出意见的人很少能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决定市场扩张的因素？批评者们正确地指出了“资本积累是首要的动力”，但他们如果能够对此作一下解释，也许就能增加说服克劳纳的力量。他们没有说明，市场是在当把货币资本预付给工人以换取他们的劳动力的时候形成的，也是在当货币资本与能量、设备、原材料等相交换的时候，在资本主义的阶级内部形成起来的。不管是克劳纳还是他的批评者，都没有真正对上述两种类型的市场进行区分。这样，谷物、肉类、木材是可变资本中的关键性因素(对固定资本来说要次要一点)这一事实的经济学意义，在克劳纳和他的批评者那里都被遮蔽了。同时，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把积累率与剩余价值率、利润率以及资本的有机构成联系起来。<sup>3</sup>

佩奇和沃克(以及其他的撰稿人)应该把芝加哥发展的“动因”解释得更好一些。有些批评者把“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和“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这两个范畴混同起来使用。可我们知道，马克思是把“扩大再生产”(“经济增长”)范畴当作一个启发式的范畴来使用的，他

没有用其他更多的范畴。资本积累(发展)既是一个量的过程又是一个质的过程。马克思所使用的所有范畴都既是经济学的又是社会学的。譬如,(对雇佣工人的)剥削率是资本压迫雇佣劳动的一种显示器,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利润率危机的趋势在数量上的显现。发生在芝加哥城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导致经济和生态上的后果。租金参与总利润的分配同样也会在经济和生态方面产生影响,这一问题在克劳纳和他的批评者那里都没有被提及。佩奇和沃克强调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资本积累本身是既以产品的革新又以过程的革新为前提的(虽然他们俩都忽视了这一叙述的社会学维度的内涵)。在经济困难时期,当个体资本努力降低单位劳动(和其他的)成本,努力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或者从竞争对手那儿夺取市场份额,以及通过获得其他资本或与其他资本合并来与最为强大的或最诡计多端的资本分割少量利润的时候,上述这种观点的确是很正确的。不过,对任何一种在“发展动因”问题上的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来说都必不可少的经济危机的主题,在这个专题讨论的所有参加者那里都不曾出现过。“通过危机来进行积累”的观点从消费需求下降的角度对资本货物(指生产工业品所需的生产资料——译注)市场的扩大进行了解释,即当最终的市场处于疲软或即将崩溃的时候,资本家往往是通过降低成本来维持或恢复一定的利润水平。大多数重要的通过降低成本而进行的市场内部的变革,都出现在或被推广于经济萧条或经济滞胀时期。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危机是指经济的、技术的,以及社会变化方面(包括总体上的社会阶级的构成以及具体的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方面的变化)的危机。由于在19世纪下半叶,资本始终处于危机之中(正像它本身必须依赖于危机一样),因此,危机理论的缺失使克劳纳的《自然的大都会》一书以及那些地理学家对克

113

劳纳这本书的反思的论文的实用性都大大降低了。

批评者们对克劳纳的最主要的抱怨是他忽视了如两位地理学家所说的,工业“在因果链中的首要性”(或生产性资本)。沃克在其论文的导言中说,“对这种因果链中的首要性问题的讨论是解读芝加哥快速发展历程的基础”。普德波补充说,在19世纪末的时候,“商业活动已经更为普遍地服从于工业生产的需要”。在19世纪下半叶,工业资本是否真的主导了商业资本,如果是的话,这又意味着什么?那些批评者的问题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对上述这种“主导”意味着什么进行说明,从这一点上看,克劳纳对他们所发起的攻击感到愤怒也就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主导”实际上意味着商人们失去了在贸易活动中享有的垄断权,并进而失去了在一场一方受益导致另一方受损的游戏中贱买贵卖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为了获得货币资本、信用、劳动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他们不得不相互竞争,同时也与工业资本相竞争。商人对工业资本家的服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商品资本在一个可确认的商人阶层手里,而生产性资本则在工业资本家手里)意味着商人阶层从社会总利润中所分得的份额,是与他们自身所投资的资本量、其资本的有机构成以及平均利润率相一致的。克劳纳的大多数批评者只是在这些问题上绕圈子,而没能直接面对这些问题。只有霍德沃斯(Holdsworth)一人讨论到了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在当时已经很普遍的竞争的内涵,不过,他仅仅是从商人与直接生产者相比所拥有的特权的角度来谈这些问题的(“伴随着运输工具的变化,芝加哥的商人……毫不留情地抓住了货物的供应源,以至于能够控制生产者们所能得到的价格。生产者们——几乎总是处在从大城市来的购买者的支配之下……很少有力量来回应那个遥远而又不熟悉的芝加哥城”)。同样,也没有哪个批评者提出以下这个重要的问

题,即(假设的)那种商人对工业资本的服从是怎样改变了大西部生态转型的模式?是不是因为有了这种服从而使一块草地消失了,或者是不是因为没有这种服从,而使这块草地没有消失? 114

到1900年的时候,芝加哥已经发展出一系列的生产“进口—替代品”和资本货物的工业企业,它是当时世界上拥有工厂数量最多的一个城市。有两位批评者相信不管是谷物贸易还是木材贸易,都与“这个城市的工业力量的积蓄”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事实上还不构成充足的理由,以至于可以拒斥克劳纳的那种把商人及其他类似的阶层视为这个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的理论思路。英国在19世纪早期拥有数千个工厂,可直到19世纪晚期,商业资本才真正服从于工业资本,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种服从也只是部分地服从。在当今的三大经济强国即美国、日本、德国,已经出现了非常重要的新商业主义的特征。现代工业从总体上把商人变成盲目的商品资本的人格化,这种情况只有在教科书中才会出现。如果真想了解芝加哥的商人是否、在哪些方面以及在什么时候从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维度上服从于工业资本家的,那就必须去研究商人之间的竞争的内涵和类型、当商人之间发生竞争的时候原材料价格方面的变动、以及劳资关系、资本的各部门之间以及国家权力的形态(及其他因素)方面的变化。这一话题如果脱离了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内涵以及美国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其中的位置的研究,也许是无法真正加以讨论的。其实,威廉·威廉斯(William A. Williams)的论文倒是值得认真注意的(它被克劳纳及其批评者都忽视了),该论文指出,大西部丰富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类的技术水平的发展,使得西部地区拥有大量的过剩农场,因此,大西部的农民是主要的扩张主义力量。在美国,真正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是实业

家和工人，农民和银行家则要逊色得多，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贸易保护主义者。美国直到 1913 年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关税上升到了其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是否就意味着工业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真正强有力的工业资本是寻求自由贸易及投资的无限制性的，它并不害怕国外资本的竞争。当美国的农民从不断扩大的欧洲市场中获利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美国的工业提供了一把保护伞。美国的工业给工人们提供了廉价的原材料和食物，尤其是在 1876 年的“大和解”之后，美国的南部成了这些东西的供应地，而农民们则享受着被生产过剩的危机所加强的不断扩大的市场。这些东西都是历史之冰山所显现出来的一小部分，正像它的大部分内容一样，在这次的专题论文集中都是看不到的。

克劳纳的批评者们也指责他忽略了对劳动和阶级斗争的研究。但是，他们都没有说明应该怎样把这些议题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融入克劳纳的叙述之中。佩奇和沃克指出了克劳纳“对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力量进行了弱化”，但没有说明自然界的丰富性、人类的劳动以及工业技术这三种因素在大西部是怎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默切特抱怨说，克劳纳没有“阐释人类的力量或非人类的因素对市场组织的抵制”的情况，可他自己也没有说明关于这种“抵制”的阐释可能会怎样改变克劳纳所得出的结论。当霍德沃斯声称“大草原、水牛分布区以及北部的松木林的转型是无异议的和从未受到过质疑”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其叙述的方式不曾有多大的改变。斯克雷顿补充道，克劳纳没有描述农民、铁路、搬运工以及商人之间的相互斗争，可他自己也把劳资之间的斗争几乎遗忘了。这样的批评又会有什么效果呢？它们能改变克劳纳的结论吗？所有这些批评者中没有一个人对手工工人和



资本主义化的技术工人所进行的防御性斗争的方式进行研究,而正是这种斗争才迫使工业转向批量性的生产模式,转向一种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对劳动的包容,没有这种包容,工业资本也就无法牢固地建构其自身。这一过程是与商人资本的臣服过程相联系在一起,而没有哪个批评者对这种联系的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克劳纳的批评者们甚至不曾提及这一点。

在这个专题论文集的作者中,没有人对克劳纳的下列观点提出质疑:大西部所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生态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双向度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芝加哥的发展。有些人对克劳纳把城市与内陆之间的关系局限在芝加哥与大西部之间的关系上的作法提出了质疑。正像我在上面所提到过的一样,一本论述自然的大都会的著作应该把一个地区置放在世界经济的总体框架中来加以研究。但是,那些希望克劳纳扩大其理论视域的批评者却没有说明这到底应该怎样做。在他们的论述中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谈及不平衡的和联合性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其实,研究者理应去探寻在运输、土地改良及其他领域的投资对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成本的影响问题。(同样,伴随着美国人的占有而产生的生态方面的变迁也间接地提高了原材料的生产成本,这就是所谓的“资本的第二重矛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19世纪的时候,在原材料生产地区的投资提高了工业资本的利润率,由此而引来了在这些地区的土地、基础设施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新一轮的投资潮,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提高。北部国家的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的、均衡性的工业化经济,是以南部国家的专门化的、零碎化的及原材料出口性的经济模式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地方的)发展导致了(另一个地方的)欠发展,反之亦



然。在美国,这种情况集中地体现在南部各州,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专题论文集中竟然没有人问及上述这种模式(稍作修改)是否同样也适用于对大西部的研究。

我相信,这部论文集的许多不存偏见的、想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历史学家那儿学到一点东西的读者,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不是全部)批评者所热衷的,其实不是阐明19世纪下半叶芝加哥与内陆地区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是提出抨击性的观点本身。这些批评者看起来好像更擅长于布道而不是教育。克劳纳骂他们对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核心论题的自然并不太感兴趣,应该说他骂得是对的。他们确实严厉地批评了许多的观点,但真正的要害性的观点往往却被忽视了;被他们驳得体无完肤的只是对手的一些枝节性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克劳纳在他的“答复”中对他的批评者进行坚决抵制的原因之一。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明显地反对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解释。正像许多专题论文集的撰稿人所指出的那样,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无疑是克劳纳忽视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核心和灵魂的强迫劳动以及剩余价值的生产,即劳动的被剥削性(以及与这种剥削相关联的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主题)。克劳纳的观点具有双重性的错误,他忽视了作为生产过程之要件或因素的劳动,同时也没能把劳动当作一种劳动的运动过程来看作。克劳纳无意于否认现实,但我以为,他其实并不真正相信在规范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劳动是处于被剥削状态的,而他的批评者们倒是的确认识到了这一点。

克劳纳不想被他的批评者们所提出的那些麻烦的问题纠缠住,他想脱离由这种争论所设下的陷阱。首先,他申明,像“资本的逻辑”这样的用语在他的语境中只是修辞性的。其

次,他坚持认为他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只不过在他的论述中没有采纳这种理论而已,尽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因而也无从谈论起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他的论述的问题(虽然他“有时会被卡尔·马克思所说服”)。克劳纳的观点使我想起了那些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想理解整体性,因而也就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否能够对这种整体性进行研究。譬如,克劳纳的批评者们要求他对工业、农业以及其他行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出解释(虽然他们没有告诉读者他们所谓的“力”和“关系”指的是什么),可克劳纳好像把他们的要求理解成了对“工厂产量”的更为详细的研究。“我以一些(批量生产的)制造品为例来进行研究……其他东西可以以此类推”,很显然,他完全没有抓住批评者的理论要点。另一个例子是:克劳纳对地理学家们对他过于偏重“分配”的指责进行了反指责。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分配是指财富和收入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获得利润是指卖出东西;运输工具是一种生产性(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的形式。第三,克劳纳指出,他的那些批评者们相信,他们所支持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理论”,可实际上,“他们自己的理论”中包含(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扬弃”)了他的那种市场驱动下的发展以及生态转型的理论。这不是一个或者/或者的判断,而是一个相加的命题,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行话来说就是“生产与获利之间的矛盾统一”。那些批评者们显然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一点,不过,这似乎还不足以构成克劳纳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明明不懂,可偏要装懂的充足理由。

虽然从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撰稿人的预设目标,即对克劳纳及其他的环境历史学家进行教育这一点来说,这本专题论文集无疑是失败的(最主要的是编辑上的失败,连那些重复性的内容以及包括编辑者本人在内的有些撰稿人的那种刻薄

的语调也没有删除),但从以下的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本成功之作:它能够促使部分读者更好地认清他们自己的理论范畴、他们在历史书写中的位置以及在书写某一个地方的历史时兼顾其他地方的历史的必要性。克劳纳能够触及有关芝加哥和大西部的话题,这一点的确受到了每个人的称赞。可都市的历史并不是(或者说必将不是)与此相同的,尤其是当包括理论历史学家在内的历史学家们读到克劳纳的下面这句话的时候:“如果理论和学术论文就是意味着抛弃普通读者的话,那么,我决不愿意对这样的祭坛顶礼膜拜”(这说明,克劳纳尽管认识到牢固的理论基础是必需的,但在其理论生活的当下阶段,他还没有获得一种方法以使其提出自己的理论基础)。他与其把事情做得更糟,还不如去读读《资本论》这一理论史上的经典作品。

117

## 洛 杉 矶

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石英之城》一书的每一个章节,都充斥着社会或政治斗争的内容。该书一开头就来了一个文学性和电影语言般的提问:洛杉矶今天是阳光灿烂还是乌云密布?现在这个时候在洛杉矶是晌午还是傍晚?紧接而来的便是处于竞争关系中的经济权力中心与政治权力中心之间的斗争;富裕的白人房产所有者与欠富裕的有色人种之间的斗争;警察对劳工与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暴力镇压;最后是民粹主义者与主要由西班牙人所组成的激进天主教徒以及教堂首领之间的斗争。这本书本身是由两大章所组成的,开头的一章描述的是一个名叫雷诺·德·利奥(Llano del Rio)的乌托邦社区的古怪故事,后面的一章则是对一个名叫福塔

纳(Fontana)的“梦的弃园”的可怕描述。

麦克·戴维斯笔下的这个种族主义的和充满斗争的洛杉矶从一种恐怖的维度上来说,的确充满着诱惑。我很难想像还会有哪一本书能与这本广受赞誉的有关暴力之旅的著作相媲美。《石英之城》具有自己独特的叙述风格,除非美国的左派彻底完蛋了,否则,它肯定会吸引很多的模仿者。更进一步,美国的左派应当给予麦克·戴维斯一种终生的俸禄,以表彰这位优秀的城市传记作家,并且还要请他去写写波士顿、丹佛、底特律以及其他的一些美国城市,他同样可以通过对这些荒野西部中的集散地和以前的公司相对集中的城市中的人民及文化景观的深入研究,来洞察这些城市的未来。

在这本书中,罗伯特·莫劳(Robert Morrow)的那些有关洛杉矶文化景点的无人的黑白照片差不多可以说是物尽所值的。戴维斯的文字阐释这些照片,正像后者同样也是对前者的一种说明一样。这些照片不可思议地驱使着那些非常看重它们的人去进行抽象的和理论思考。

不过,戴维斯关于拉·拉·兰德(La La Land)的剖析模式使其免于在这一主题上进行清晰的理论性研究。在戴维斯的书的索引中,过去的以及现在的一些城市理论家——杰登斯(Geddes)、芒福德(Mumford)、雅各布斯(Jacobs)、布克勤(Bookchin)——的名字都不曾出现。那些非常著名的研究水和空间的理论家的名字,如惠特福吉尔(Wittfogel)、伍斯特(Worster)、列非弗尔(Lefebvre)以及哈维(Harvey),在戴维斯的索引中也没有出现,尽管在他的叙述中,水和空间都是核心的部分。戴维斯的这本书对“新社会运动”也没有多少用处,虽然它的确谈到了住所方面的斗争、为未被注册登记的工人以及政治避难者谋求权利的斗争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总而言之,戴维斯是坐在凳子上想飞行起来,多亏了他在所论

述的主题方面的知识以及文学方面的天赋、他对愤怒、讽刺、荒谬等的辨别力以及他对普通大众的同情，才使他或多或少地能够顺利地达到其理论目的。

118 读者们自然可以从自身的角度，从戴维斯的叙述中获取理论上的经验教训。对这部分读者来说，戴维斯所叙述的是洛杉矶盆地及附近地区的自然界所发生的非常壮观的转型，以及一种局部性的新环境或者说第二自然的形成。那些组织起这种转型的人物，即土地、水、不动产、储蓄以及信贷方面的巨头们，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也改变了其自身。他们跻身于富有的统治阶级的行列，这些人为了拯救文化的秉性，非常愿意在经济上赞助艺术、博物馆、大学及其他的一些高雅文化形式，而这些东西在今天的洛杉矶市镇议员们看来（决非偶然地）是必须由政府通过各种补助的形式来维持的。当然，在荒野西部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上述这种转型是非常腐败、愚蠢和可恶的，归根到底，在生态和经济的维度上也是愚不可及的，各种内在矛盾以与不动产、积蓄、信贷资金及财富的增长相似的速度不断地积累起来。

麦克·戴维斯虽然生动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但洛杉矶还是魔术般地从荒漠中成长起来。康斯托克(Comstock)矿脉和丰富的银含量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第一家投资中心的形成。铁路在空旷之地上的建造使洛杉矶成为一个重要的农业以及后来的制造业中心。直到20世纪30年代，洛杉矶的繁荣是建立在石油和土地的基础上的（纵观洛杉矶的历史可以看出，资本在这里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土地的投机与发展以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的发展而使自己获得建构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这一地区的造船业和新兴的战争工业带来的极大的繁荣，战后的发展以及冷战时期的科学技术给这一地区的土地开发及有固定地租收入的阶层的

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生机(直到今日,最大的利益集团仍然是有固定地租收入的阶层,储蓄与信贷的利润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令人惊奇的是,好莱坞在戴维斯的叙述中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把郊区的那些位于边远地带的土地加以细分后出售,在当时是一种主要的获利活动;洛杉矶的自然环境从根本上说是适合于消费主义的。这里有大量的空地,足够使白人能够不断地迁移到新的边远地带,以使他们能够逃避种族问题(过去所谓的“边远地区问题”的新形态)以及拖延他们作为公民和人类的一员所必须肩负的责任——结果导致了在大城市集中的地区种族主义不断蔓延开来的现象。那些迁入此地的白人劳动者以及中产阶级迫不及待地寻求着由南加州的那些寻梦者、好莱坞以及土地开发商所建构起来的逃避(责任)的幻觉。

银矿和石油、土地和水、阳光和海洋、沙滩和海浪对任何一种有关这块安乐之地的历史的可能性解释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曾经盛产柑橘类水果的山谷地带,干旱是引发土地投机的重要因素。像洪水、山崩、地震、甚至飓风这样一些词汇,与洛杉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戴维斯的书中出现过不至一次。换句话说,生态的因素的确是作为一种主要的因素而出现的,不过,它往往只是含蓄性的,有时候,它以一种被动的姿态出现(作为历史发展的机遇或者局限性的自然界),有时候,它又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出现(作为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独立的决定性因素的自然系统)。在戴维斯书中的有些地方,空旷之地是某种有待克服的东西,而阳光则是一种令人惬意之物;而在该书的其他地方,空旷之地和阳光则是一种把来自东部的移居者吸引到此地的东西,尽管这里的难以忍受的烟雾不时地把他们驱赶回东部。当然,有



一点则是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都被表达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生态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联性。洛杉矶的历史生态学与生态历史学是同一个总体性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119 洛杉矶最终被内在的矛盾所消耗，同时也被贪婪和愚蠢耗尽了发展的力量。可开发利用的土地的消失，改变了权力的结构，引发了对能用于大规模土地转型的大型资本的需求，即洛杉矶的资本越来越走向垄断化。当在这片荒凉之地上一下子冒出来很多依赖于从外地输入的水源的居住群的时候，生态的危机也就出现了：水源的缺乏、缺少污水处理设施、交通堵塞、污染等。再加上一些社会危机——未能解决的种族与劳动关系的问题——所有这些危机开始阻碍这个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公共的空地被毁坏了；清洁的空气变成了被污染的空气；沙滩正在受到污水和废弃油料的侵袭。户外的空地变得越来越拥挤；高速公路成天交通堵塞；私人的隐居之处往往紧挨着不受欢迎的邻居；不受限制地接纳新来者催生的是大型的第三世界移民的血汗工厂；给杰弗逊那一代人（或者至少是利维顿那一代人）追求独立提供保障的柑橘园变成了贫瘠的工业化的边缘地带。

从理论的维度上说，麦克·戴维斯所描述的是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在洛杉矶的表现形式。对空气、土地和水资源的无节制的开发，最终孕育着不得不把运输和职工上下班的交通费用、健康保险、教育以及其他的各种私人 and 国家的经济活动的费用抬高到一个临界点的危险。洛杉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是个未知数——如果你相信洛杉矶媒体上所说的那些可怕的故事终将发生的话。当然，戴维斯本人并没有直接地说出这种矛盾，他也没有以一种令人感兴趣的方式对洛杉矶的社会运动问题作出阐释，这种社会运动试图从人类的生



存和生活条件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的阐释。如果他真这样做了,那么,更多的关于洛杉矶之未来的思想将会在他的这本优秀著作中被“挖掘”出来,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大量的有价值的思想只是隐含在他的这本书中。

### 注 释

1. 例外也是有的,这在文本中已经加以了注明。不过,即使是像艾伦·普雷德(Allen Pred)这样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非常专业化的批评意见的学者(在他看来,克劳纳把作为与先前的自然和人类发展史相伴随的人类活动的媒介的自然景观,与作为这种活动的结果的自然景观的构型合并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把凝聚在产品中的人类生产活动中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与这种产品本身合并在了一起),也没有清楚地说明,如果克劳纳贯彻了他的方法,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2. 这里似乎有两个例外。默切特说,“克劳纳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市场的批判仅仅限于其生态成本的方面。”佩奇(Page)和沃克(Walker)说,把理论视点定位在资本积累和与此相关的工农业领域中的技术变迁上,会更好地解释生态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

3. 当然,这只是在积累的问题上比佩奇和沃克所提出的观点前进了一小步。即使在艰难的年代,人们总还是需要替代性的物品的,总还是需要基本的食品以及住所的,其他一些东西也是一样。利润率和积累率越高(在对19世纪下半叶的芝加哥的论述中,没有人提起过这一话题),工资货物及资本货物市场的发展就会越快。如果存在规模性经济(包括外向性的经济在内),就像芝加哥在鼎盛时期的状况一样,那么,利润率和积累率就会加速提高。这意味着,不仅市场在扩大,而且这种扩大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是与物质生产的能力和利润的增长处于同样的速度之上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并不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的趋势,也不存在成本方面的危机(譬如,外向性成本的增加等)。

## 第二部分

# 资本主义与自然

佛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以及其他人都必须问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的社会生活告诉我们，在应该节制利润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把利润推至最大化时，“利润的最大化”到底还意味着什么？

——钱德劳·马萨法(Chandra Muzaffar)

可持续性通常是作为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来看待的，但它事实上远不止这些。它最终是一个社会的价值指向问题，不是技术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指向，它是从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的意义上来说的。

——斯蒂芬·维德曼(Stephen Viederman)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像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一样)并不具有明显的生态思维的痕迹。马克思把他自己的著作，包括对资产阶级“原始积累”观的猛烈的抨击在内，当成是

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批判。由于意识形态的本质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自然主义”,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批判把“自然的稀缺性”当成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来看待的马尔萨斯、李嘉图以及其他相类似的思想家的观点。任何一种把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的危机当成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的观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花招而已。

当然,马克思对那些把生产过程中的剥削方式自然化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并没有遮蔽他对自然系统在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重要性的重视。他非常清楚“劳动不是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sup>1</sup>他注意到了各种自然过程在谷物、酒类、木材、陶器加工业以及其他工业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也注意到了不同的工业活动中的劳动过程与自然过程是不相同的,因此,在不同的工业活动中,自然过程在资本周转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最后,他注意到,资本的再生产在总体上是与根据其自然属性或者说根据其使用价值来定位的价值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相对比例紧密联系在一起。总而言之,自然的因素在使用价值中占有重要的分量,不过,只有劳动才创造交换价值,或剩余价值。<sup>2</sup>当然,与自然界本身独特的物理和生物属性相对应,它在资本的周转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确是起一定的作用的(本书的第八章将对此进行论述,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自然界在经济危机中就是起一定作用的)。<sup>3</sup> 122

马克思没有对能源经济学投注足够的理论注意力。今天,除了那些最为保守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之外,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就像所有的生产一样)是建立在能源的流动与转换的基础之上的。尼古拉斯·乔治斯库·劳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 的名字通常与能源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不过,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 许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经济思想家也帮助发现和发展了这种理论思维的线索。<sup>4</sup>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能源形式是矿物燃料, 它是一种不可再生性的资源——这一点对亿万尚未出生(由此, 在当今的矿物燃料和其他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交易市场上没能表明自己的观点) 的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 矿物燃料无疑是促进劳动生产率、利润及工资的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就像当今的计算机正在代替很多的人类脑力劳动一样, 从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一直到今天, 矿物燃料已经取代了人类的很多体力劳动。

19 世纪末, 当有迹象表明英国将会用完其所拥有的廉价煤的时候, 英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统治者逐渐地把目光转向了“黑色黄金”即石油的经济潜力。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当权者把精力放在了对石油储量的勘探、开发与垄断上, 并试图以此来获得他们的经济未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人千方百计地试图对波斯湾、罗马尼亚和克里米亚(Crimean) 的石油加以控制, 日本人在二战中的战争策略是摧毁美国人的舰队, 以利于开通一条从日本通往东南亚石油储存地的海上通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新的发现以及新的技术的运用使很多新的石油储藏得到了开发, 石油产量大大提高了, 这使得原油价格或多或少地得到了稳步的下降(欧佩克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某些表现除外)。今天,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以及战争机器都是建立在石油的基础之上的。尽管石油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利润的扩大所作的确切的贡献也许很难加以计算, 但要想说出哪一种单一的产品比石油更好地降低了劳动成本(譬如, 在电力生产和运输行业), 或者有哪一种产品能作为这么多的新产品的基

(譬如塑料、化肥),那也是很困难的。

资本主义生产(其实是所有的生产形式)不仅以能源为基础,而且也以非常复杂的自然或生态系统为基础。主流的生态经济学家们虽然已经阐明了矿物燃料及其他非再生性资源的耗尽,将导致像土壤这样的可再生性资源的非可持续性利用,并且还会把再生性的资源转变成非再生性的资源,但至今很少有经济学家去研究以生态学的“生物学本质”为基础的经济理论。这一点其实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建立在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而且对土地、水资源、空气、野生动物等等,以及整个生态系统都会产生破坏性的作用,而这又会反过来限制未来的资本主义积累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区域。由此可见,传统的那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的和纯粹历史的解释,由于忽视了能源的主题以及生态学的“生物学本性”——就像纯粹的自然主义解释一样——显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方面的局限性。<sup>5</sup> 123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不是“生态经济学家”,但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及人类本性的破坏作用。他们由以出发的一个理论前提是:自然(或“生产的外部条件”)仅仅是资本的出发点,而不是其归宿。恩格斯说,“当一个资本家为了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后果。一个工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sup>6</sup>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给物质生产和市民社会所带来的很多独特的环境问题都进行了界定。他们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导致了资源的消耗与枯竭、大量的废弃物以及严重的污染。恩格斯对由森林毁坏及其带来的洪水泛滥和土壤质量的下降

所表现出来的自然资源的退化作了如下的概括：“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所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sup>7</sup>

与此相类似，马克思对以资本主义的机制所建构起来的造林业中所包含的矛盾进行了准确的界定。“很长的生产周期……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长，使森林种植业成为一种对私有化生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并不适合的行业……文明以及工业的发展已经在总体上显现为一种破坏森林的活跃力量，以至于与此相比，所有在森林的保护和生产的的名义下所做的事情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sup>8</sup> 马克思同样也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资本主义农业（就像造林业一样）对自然界和人类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水平以及联合性的程度，而与此同时，它逐渐损害了财富的原始资源，即土地和劳动者。”<sup>9</sup> 在马克思看来，都市化和农业的商业化联合成了一种力量，它破坏了“人与土壤之间的物质循环，即阻止了被人以食物和衣服的形式消费了的东西重新返回土壤之中；这样，它就破坏了土壤保持持久肥力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也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一些废弃物排放和污染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恩格斯对英国的污染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注意到了空气中的甲烷气体是由有机废弃物的腐烂而导致的，水污染是由工业污染所导致的，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生活条件导致了疾病的流行。<sup>10</sup>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企业“扩大了对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废弃物的利用”，因为，“原材料价格的提升自然会刺激对废弃产品的开发和利用”<sup>11</sup>。当马克思在持有这种观点的时候，他实

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回收再利用理论的萌芽思想。

在上述所引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威廉·凯普(K. William Kapp)在20世纪30年代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成本理论<sup>12</sup>以及生态成本理论<sup>13</sup>的雏形。当然,以下的结论应该说是公正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是研究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动荡问题的重要理论家,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问题视为其资本主义的积累与社会经济转型理论中的**中心问题**。他们低估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枯竭以及自然界的退化的厉害程度。他们两人也没能准确地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以及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方面的能力(这些措施往往是无效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两人没有正确地理解,为了保持总体上的利润率,资本的集中化过程在许多情况下必然带来一些“消极性的外在因素”的内在化。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他们两人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社会运动在自由民主的以及其他的现代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意义,以及这些运动在预防对自然界的破坏和重建已经破坏了的自然界方面所担负的重要角色(像日本的马莫托(Myamoto)和墨西哥的里夫(Leff)等现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那样)。马莫托强调指出了民主制度对社会和生态成本的确定,以及对于围绕着生态问题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来说的重要性。里夫则特别强调了社会运动在迫使资本消除污染和偿付自然界所给予的惩罚方面的核心作用。<sup>14</sup>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革命家,而是两位主流思想家,那么,他们必定将被视为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而不可能是生物种类的保护主义者或生态学家。他们在美国的理论对手将是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吉夫特·平考特(Gifford Pinchot)以及世界银行的环境管理者们,而不是亨利·戴



维·索罗(Henry David Thoreau)和约翰·穆尔(John Muir)。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与黑克尔(Haeckel)和斯坦纳(Steiner)的生物有机论或波多林斯基(Podolinski)的能量经济学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学术思想上的关联性。不管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生态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异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确也曾说过,历史过程中的社会“仅仅是自然的占有者、拥有其使用权的人……他们必须把它以一种改进了的形态传递给他们的后代”。恩格斯的有些话语的确也显示出他已经“以一种环境主义的意识预见到了生态科学的出现”<sup>15</sup>,但他们的观点只是有关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伦理主张,它强调的是人类控制自然界的能力,而不是自然界自身系统的自主性和不可预料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然界本身的生产问题)<sup>16</sup>。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没有把自然界视为一种消费资源,这就使他们游离于环境伦理学与价值学,以及自然界的情感价值(与交换价值相对,约翰·穆尔所关注的就是这一领域)的理论视域之外。他们对科学抱有彻底的信仰。“特别是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sup>17</sup>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最彻底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也许就是最彻底的自然资源的保护主义观点。<sup>18</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留下只是一种生态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朴素遗产,不管是对生态系统的分析,还是对热力学系统以及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的分析,都没有被融入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经济危机的理论之中(只

有一个例外,本书第八章将对此加以说明)。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已经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共享了一种荣誉,这种荣誉指认的是对资本主义对自然界所构成的全球性破坏所进行的界定和分析。确实,这一领域内的很多问题都已经得到了界定,有关这些问题的描述也已经写了出来,其文献之多超过了一个人一生所能阅读和吸收的限度。所谓“描述”就是指记录下事件发生的内容、地点、时间、方式以及所指向的主体。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是,对全球环境退化的原因的系统分析到目前为止仍然很少见。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非社会主义者,通常都把这种“原因”公式化地理解为:共同的贪婪、对利润的追逐、对资源及市场的不加限制的竞争、建立在把成本向自然系统及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的转移之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反生态性的贷款及投资(包括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工业化的思路)。<sup>19</sup>但是,目前还没有对导致生态破坏的“原因”从总体上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以及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和生态危机的趋势和倾向性、资本积累与社会运动和政治学之间的复杂的内在联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

我以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缺乏一种对有关“生态危机”的意识形态阐释与社会—科学性阐释的系统说明。第二,任何一种“原因”的理论都必须建立在资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通过经济危机而实现的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基础之上。第三,这种理论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条件”的阐述之上,按照波兰尼的说法,它应当包括那些虽然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出来,但却是被当作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即“虚拟的商品”。马克思界定了三种不同的条件:“个人条件”或人的劳动能力(“人力资本”)、“外在性的条件”或广义的环

126 境(“自然资本”)、“一般性的公共条件”或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城市的空间——我们也许可以再加上一个“社会条件”,就社会有可能被资本化(“社会资本”)而言,这是说得通的。既然根据价值规律,生产条件并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出来的,那么,国家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劳动、土地、原材料及其他市场的获得、利用及退出的方式的影响和规范上。对生态破坏的社会—科学性阐释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经济危机,与生产条件和国家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所形成的方式。

生态困惑的很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在这一部分中得到了说明。本书的这个第二部分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或那个方面已经开始研究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的一些思想家的观点。除了鲁道夫·巴赫劳(Rudolph Bahro)、默里·布克琴(Murray Bookchin)、范德纳·雪瓦(Vandana Shiva)、曼纽尔·萨克雷斯坦(Manual Sacristan)等左翼思想家,以及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黑泽尔·亨德森(Hazel Henderson)等一些在政治观点上更多地属于主流学派的思想家(前面提到过的专题论文集的政治经济学撰稿人艾略尔、凯普、里夫等人除外)所作出的开拓性的、有时当然也是想像性的工作之外,还有许多的各具特点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研究。在美国,这包括20世纪70年代巴里·康门纳(Barry Commoner)的既具有影响力又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以及马特·伊德尔(Matt Edel)、巴里·威斯伯格(Barry Weisberg)的著作。<sup>20</sup>其他与此相关的重要著作所涉及的是对异化劳动、消费主义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关系、“生产的单调性”的危害、在生态上具有危害性的技术的起因与后果、资本主义的具有危害性的劳动方式以及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工业结构和工业场所、资源枯竭和污染等问题

的激进的地理学阐释。<sup>21</sup>

其实,理论研究所涉及到的领域还远不止这些,除此之外,还有对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联合性的发展以及环境退化问题的重要研究。<sup>22</sup>在这些研究中,有一项研究是具有很开放的视野的,那就是对西部非洲的撒希尔(West African Sahel)地区的干旱、新殖民经济以及政治结构(及其他因素)之间相互联结起来的方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饥饿及生态灾难问题的研究。<sup>23</sup>与此相似的论述拉丁美洲、亚洲及中东地区的著作也已经出现,譬如,把德·杰弗里(de Janvry)的断离性积累(disarticulated accumulation)理论运用到对中美洲的生态和经济危机与民族斗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方面。<sup>24</sup>行文至此,同样也值得一提的是在激进政治生态学领域内的不断增多的理论文献,譬如,对大型水坝的经济学分析、对核力量的政治学分析以及对政府管理、环境政策对分配的影响、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论的起源(见本书第三部分的论述)等问题的理论分析。<sup>25</sup>

导致缺乏对资本主义和自然问题之全面论述的第二点原因,是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及资产阶级发展理论的弱化或破产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理论真空,一个连接地带,而对于这一地带中的具有开放头脑的人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到来应该是一件受欢迎的事情。就总体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及政府机构的观点,艾略尔说,“资源的枯竭和废弃物的排放是客观存在的,对经济学的生态学批判质疑了市场本身准确地评估上述这种影响的能力。生态学批判指出,经济学出于一种短视的行为,内含着把废弃物和越来越有限的资源移置给子孙后代的理论思路,在它的内容中并不包含有建立在几代人之间的相互谅解之基础上的资源配置的思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遭遇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本体论困

127

境,即如何面对我们的后代。”有时候,政府机构的观点会越过界限进入到一种生态种族主义的层次,加勒特·哈丁斯(Garret Hardins)决不是惟一的持这种观点的家伙。在檀香山的东西方研究中心,有一次讲座的题目居然是“怎样把环境从穷人那里拯救出来”。亨利·布雷克(Henry Breck),这位“国家资源保护协会”的理事,在《时代周刊》<sup>26</sup>上撰文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建立一支生态警察力量,用来保护全球的雨林资源以及氧气资源,使之免受第三世界穷人们的破坏。按照布雷克的说法,第三世界的穷人在砍伐森林的时候,根本缺乏对未来的考虑。

问题是,怎样才能建构出一种资本主义的理论,使之能帮助我们清晰地思考全球环境被破坏的问题?我们需要这样的理论,它能够既对系统性的经济力量,又对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运动作出恰当的思考,它能够在社会的运动与变迁以及人们的日常经验领域展开生态科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的理论思考。不过,我们需要的这种理论首先必须能够以一种足以阐明和发展生态性的及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生态性的及其他类型的矛盾作出界定。这的确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情。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理论也许是很关键性的一种理论思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第一重矛盾”,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而且还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即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过程。对劳动的剥削仅仅意味着阶级斗争及经济危机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之中——这种危机有时候被称为“资本的生产过剩”。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对经济危机的探讨,其焦点在于内在于资本维持商品价格稳定的过程之中的矛盾,简而言之,就是在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其实是很重要的,譬如,当资本主义体制在

运行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价值的维度知道这种资本主义体制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为什么能够运行起来(当它无法运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维度知道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它,我们还可以弄清楚是否应当把劳动时间配置在生产资本货物的工业活动还是应当配置在生产消费货物的工业活动之中。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价值是服从于交换价值的(“生产的目的是利润,而不是使用”),因此,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使用价值只扮演第二号的角色。

在任何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阐释中,使用价值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一定是与交换价值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上的。劳动力都是在独特的自然和文化形态中把自己呈现给资本的。马克思所说的“存在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中的自然因素”的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虚拟的交换价值的观点也一样。在城市空间的问题上作定点的分析显然是十分必要的。那种只从总体上对加拿大的“森林危机”所作的统计学分析已经被证明没有太多的用处,在我们能够知道到底是否存在着一种所谓的森林危机之前,定点性的实证知识是必须要获得的。<sup>27</sup>从总体上说,当我们把理论目光从国外贸易、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经过资本和消费品市场,转向劳动力市场、原材料市场、废弃物市场等等的时候,我们的研究重点就必须要从事物的交换价值的维度转向其使用价值的维度。我们越是在理论上接近使用价值,在实践中,我们就越能够接近真实的实践语境以及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们。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损害和毁坏自身的生产条件(即生产条件的危机)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即为重构生产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联系的原因。女权主义、有关职业健康和安

128



所追求的,远不止是为了捍卫劳动能力、外部自然界及城市的生活条件,当然,这些的确也是它们的目的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出,把资本及其条件的理论与社会运动及社会政治斗争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是有可能的。

20世纪70年代早期,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及局部危机的时代。从那时开始,三大资本圈就缩小了规模,到别处去寻找资源,重新建构新的发展动力。除此之外,还对自身进行了重组,使自身现代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在今天已经成了一项必须遵循的准则。与此相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国际性劳动分工领域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经济危机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被转移到了南部国家、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以及北部国家中的穷人那里。通过这种经济危机,资本的积累获得了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通过忽视、损害或毁坏资本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条件,即通过在总体上对南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穷人欠下一笔“生态债”来完成的。譬如,资本通过掠夺或毁坏像森林、水、土壤这样的自然资源而把更多的成本转嫁到别人头上。在南部国家,这些自然资源是其农业经济得以维持的基础。处在激烈竞争状态中的汽车工业,为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经常激烈地反对那些有关汽车尾气排放的严格规定。在某些工业中,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时候,资本不仅迫使我们承受其经济危机的代价,而且也开始迫使我们承受它本身。中美洲国家的棉花种植业就是一个有关农药的生产怎样既有害于资本及其利润,又有害于自然界和人类的很好的例子。<sup>28</sup>

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自然界的被破坏将抬高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资本要素的成本”。这种情况发生的形式有很多:地租的提高、为购买更加遥远的地方的木材而支付的费用的增大、各种类型的“流水线效应”即一些资本使另外一些资本



承受损失等等。再进一步,在特定的条件下,自然界的被破坏会使得资本周转时间放慢,与此同时,对劳动的剥削率将降低,因为,与劳动有关的各种事故及疾病将使资本不得不拿出社会产品中的很大的一部分来支付健康维护方面的费用。

再进一步,当资本破坏了它自身的生产和积累条件,并由此而潜在地破坏了它自身的利润的时候,它同时也建构起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这样,正像前面所指出的,现在所要面对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对资本与它的条件之间的系统性关系进行分析,而且还要把资本当作一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来进行分析。同时,我们还要把理论视域面向下列这种可能性,即新社会运动,尤其是全球性的环境主义运动,可能会抬高资本的成本,使资本变得更加不灵活以及会使利润率受到影响。环境的恶化使资本必须拿出很大一部分非生产性的开支来用于环境的保护和清洁。举个例子来说,清除酸雨所需的费用就是大得惊人的。如果再加上对其他一些易被忽视的生产条件的修复或重整的费用——解决城市交通堵塞、高租金、城市中的犯罪现象和由于精神紧张而导致的疾病、不断上升的健康保险费用、对糟糕透顶的教育体制及基本设施进行重构的费用——所有这些费用加在一起,肯定是个天文数字。情况确实像黑兹尔·亨德森(Hazel Henderson)曾经说过的那样,在美国,所有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将会花掉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的国民生产总值。 129

当然,不管是“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的重要性都不能强调得太过分。在台湾,土地的缺乏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社区和环境压力,并促使了一系列工业和基础设施工程的停建,尤其是在石化行业,过多的工程加剧了土地的紧张,导致了在土地价格方面的更大的投机(当工业用地的拥有者等待着土地价格的再次飚升的时候,这些土地的使用率实际上是很低

的)。有限的可燃气体及煤炭资源将要被用完。已被缩减了的农业用地现在已经负担过重,严重影响了农业的效率,尽管(或正是由于)化学药品在农业中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一句话,台湾经济的“成功”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源自于对其生产条件的忽视和毁坏的。这种情况导致了工业布局的非中心化,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更多的海外生产基础,以及为了把耕地转换成工业用地而松懈了对土地的管理。

总而言之,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之中蕴含着的,不仅是资本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也是资本的不充分发展的危机。危机不仅来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需要的层面,而且也来自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成本的层面。在有关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棉花危机”的文章中,马克思本人曾经谈到过这种理论观点,但他并没有对资本周转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内部,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系统性的经济和社会联系进行梳理(虽然,正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马克思注意到了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因此,很显然,关于传统的资本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与资本的不充分发展的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问题必须加以提出;另外,自然界和人类的受损与资本的受损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应当被提出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必须在理论上面对生产条件的问题,正像资本和包括工人为了健康及相关的问题而进行的斗争在内的新社会运动必然在实践上面对这个问题一样。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今日我们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是对自然的“社会主义式的重建”——包括我们自身的“自然”在内。

本书的第六章“对‘生态危机’的一些考察”,通过对“生态(或环境)危机”这一使用率颇高的概念的一些内涵的探讨,对自然的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介绍。第七章

“生产的条件与条件的生产”，对“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其目的在于对“生产条件”的生产力维度和生产关系维度的内涵进行界定。有关“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这一命题的基本思想都集中在第八章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录）。 130

第九章“资本主义积累与经济和生态的危机”，对“资本通过经济危机而获得积累”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环境来说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同时也揭穿了对花在环境拯救上的费用之不断增多进行大加指责的所谓主流观点的真面目。第十章“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与生态危机”，通过一些空间上的例子，对资本主义积累以及环境的恶化和毁坏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在第十一章“技术与生态学”中，我从批判社会学及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立场出发，对技术和生态学这两个范畴进行了研讨。第十二和第十三章“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对海湾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英国在谢德兰群岛（Shetland）的统治”，分别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及政府机构所努力寻求的在政治上把“石油战”和谢德兰群岛的环境恶化的现象加以合法化的视角出发，对石油这种支撑世界经济运行的“黑色黄金”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即第十四章“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广阔视角出发，对“可持续性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

#### 注 释

1. 《资本论》第一卷（纽约：兰登书屋，现代图书馆版，1936年），第50页。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有些观点得益于保尔·伯克特（Paul Burkett）给我看的他自己的一篇论文：“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观的一种批判”，手稿，1997年6月。

2. 同上，第227页。

3. “在经济的第一重神秘性即剩余价值形成的神秘机制，与另一重神秘性即游离于生态系统之外的事物的隐性成本（马克思对这一点也不表示怀疑）之间是否能够建立起某种类比性的关系？生态成本这一概念的理论地位是否不应该与剩余价值概念的理论地位相提并论？”参见吉恩·保尔·迪里格（Jean Paul Deleage），“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3期，1989年11月。迪里格是当今许多试图对价值理论进行修改以使它能够把商品交换价值中的某些生态成本的概念包括在内的生态经济学家之一。马克思对这些理论努力的反应也许是：他会同意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生态成本在价格决定中应该起一定的作用，但他显然会反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应当把生态成本包括在价格中的作法。其理由是，劳动与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的分离（也就是说，由资本家阶级所推行的生产资料方面的私有财产的垄断权），使生产的自然条件仅仅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进行价值定位。

- 131 4. 参见尼古拉斯·乔治斯库·劳根：《熵的法则与经济过程》（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对能源经济学的经典性历史阐释可参见贾安·马蒂尼茨·艾略尔（Juan Martinez Alier）：《生态经济学》（牛津：巴塞尔·布莱克威尔，1987年版）。也可参见艾略尔的文章，“生态经济学与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2期，1989年夏季号，以及埃尔玛·阿尔塔维托（Elmar Altvater）：“时间与空间的生态和经济形式”，见《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3期，1989年11月。马丁·奥康纳（Martin O'Connor）在能源经济学的基本界定方面提出了下列观点：“热力学在分析社会/人类行为的特殊性方面无法提供必要的区分标准……热力学作为一种言说/科学，已经反映和包含了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前提……热力学无法脱离其“社会性的解读语境”而单独存在……很显然，对有些热力学的早期研究者来说，他们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从一定量的燃料中能够‘抽取’出多少量的劳动（譬如，蒸汽机的效率极限）。如果没有像效率、控制、生产力等先入为主的概念，那么，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热力学也就极有可能不会出现。”

(私人通信,1989年)。也可参见马丁·奥康纳:“依存性和不确定性:生产理论的一种批判”,见《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3期,1989年11月。

5. 恩雷克·里夫(Enrique Leff)试图把经济的和历史的阐释与种族植物学(ethnobotanical studies)结合起来,但他忽视了能源理论(参见《绿色生产:走向一种环境的理性》,纽约:加尔福特出版社,1995年版)。同时可参见玛丽亚·佩劳·加西亚(Maria-Pilar Garcia G.)、贾安·马蒂尼茨·艾略尔以及劳里·安·斯拉普(Lori Ann Thrupp)有关里夫的上述著作的书评,见《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3期,1989年11月。

6. 参见“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368页。

7. 同上,第365—366页。

8. 《资本论》第2卷(纽约:文蒂奇,1981年版),第321—322页。

9. 《资本论》第1卷(纽约:文蒂奇,1977年版),第638页。

10.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844—1845年),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75年版。

11. 《资本论》第3卷(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67年版),第101页。

12. 参见威廉·凯普:《私人企业的社会成本》(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以及《社会成本、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破坏》(兰海姆,马里兰州:美国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同时可参见弗兰克·贝肯巴赫(Frank Beckenbach):“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成本”,见《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3期,1989年11月。

13. 迪里格:同前引文;贝肯巴赫:同前引文。

14. 里夫:同前引文。

15. 汤姆·蒙格(Tom Mongar):“马克思主义和环境论”(提交给第七次社会主义学者年会的论文,纽约,1989年4月2日),第2页。

16. 参见马丁·奥康纳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3期上的文章,同前引文。

17.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同前引文,第75页。

18. 虽然蒂姆·卢克(Tim Luke)在“深刻的生态学之梦想”(《泰勒斯》,第76期,1986年夏季号)一文中论证说,浪漫主义的那种深刻的生态学版本其实不过是一种伪装起来的超人类中心主义观点。

19. 凯祖希罗·乌塔(Kazuhiro Ueta):“当今中国的污染控制政策中的困境”,参见《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3期,1989年11月。

20. 巴里·康门纳:《封闭的圆圈:自然、人类与技术》(纽约:那普夫,1971年版);马特·伊德尔:《经济与环境》(恩格伍德·克里夫,新泽西:普伦蒂斯豪尔,1973年版);巴里·威斯伯格:《无法修复: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波士顿:贝肯出版社1971年版)。

21. 参见本·阿格尔(Ben Agger):《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传统的及当代的资源》(圣塔·蒙尼卡,加州:古德伊尔出版社1987年版);阿伦·施纳伯格(Alan Schnaiberg):《环境:从过剩到缺乏》(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康门纳:同前引文;温迪·乔弗金(Wendy Chavkin):《双重揭露:妇女在工作和家庭中的健康危险》(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其主编的杂志《健康服务的国际刊物》;《相对极》杂志的很多期的内容。与此相关并且也是十分重要的,还有许多对特殊的环境问题的理论研究,这些问题大多与独特的工业企业的运行联系在一起,譬如,可参见切布佐·诺基(Chibuzo Nwoke):《第三世界的矿产与全球的价格定位:一种新的理论》(伦敦:泽德书系1989年版);迈克尔·坦泽:《对资源的竞争:在矿物及燃料方面的持续性斗争》(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0年版);皮特·诺(Petter Nore)和特利萨·特纳(Terisa Turner):《石油与阶级斗争》(伦敦:泽德书系1980年版);约翰·凯斯(John Keyes):《太阳的阴谋》(杜波斯·弗里,纽约:摩根与摩根,1975年版);罗伯特·范·顿伯什(Robert van den-Bosch):《农药的阴谋》(戈登城,纽约:达伯得,1980年版);派特·罗·莫尼(Pat Roy Mooney):《地球的种子: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资源?》(旧金山:食品与政策发展协会,1980年版);迈克尔·佩雷曼(Michael Perelman):《在一个饥饿的世界中被利润所驱使着的农业:农业中的资本与危机》(蒙特克雷尔,新泽西:阿伦赫德,奥斯姆,1977年版);戴维·威尔(David Weir)和马克·沙辟罗(Mark Schapiro):《毒药的流通:饥饿世界中的农药与人类》(旧金山:食品与政策发展协会,1981



年版)。除此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弗兰西斯·摩尔·莱普(Frances Moore Lappe)和约瑟夫·考里斯(Joseph Collins):《食物的首要性:超越稀缺性的神话》(波士顿:豪格顿·米夫林,1977年版)。

22. 参见迈克尔·雷德克里夫特(Michael Redclift):《发展与环境危机:选择红色道路还是绿色道路》(伦敦:梅休,1984年版)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对矛盾的探寻》(纽约:梅休,1987年版);威廉·穆道奇(William W. Murdoch):《国家的贫困:饥饿与人口的政治经济学》(巴尔的摩: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有关半干旱地区的资源退化问题,可参见迈克尔·瓦茨(Michael Watts):《静静的暴力》(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本·威斯纳(Ben Wisner):《非洲的权力与需求》(伦敦:阿尔斯凯,1988年版)。有关热带地区的森林砍伐现象,可参见约翰·布劳德(John O. Browder)编辑的《拉丁美洲的零碎的土地》(布尔德,科罗拉多:威斯特维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苏珊娜·赫克特(Susanna Hecht)和亚历山大·科克伯恩(Alexander Cockburn):《森林的命运》(纽约:新左派书系,1989年版)。同时也可参见《消失的森林:森林砍伐的人为后果,一份提交给国际人道主义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伦敦,泽德书系,1986年版)。有关大型水坝的环境影响问题,可参见克劳德·艾尔维雷斯(Claude Alvares)和雷梅希·比劳雷(Ramesh Billorey):《在纳马达河上建造大坝:印度最大的人为的环境灾难》(佩囊,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网络书系,1988年版)。

23. 理查德·弗兰柯(Richard Franke)和巴巴拉·查森(Barbara Chasin):《饥饿的原因:西部非洲撒希尔地区的生态破坏及发展困境》(蒙特克莱尔,新泽西:阿伦赫德,奥斯姆,1981年版)。

24. 阿雷恩·德·杰弗里(Alain de Janvry):《拉丁美洲的农业问题与改革运动》(巴尔的摩: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丹尼尔·费伯(Daniel Faber):“帝国主义与中美洲的自然危机”,见《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1期,1988年夏季号。

25. 可分别参见达维·埃利奥特(Dave Elliott):《核力量的政治学》(伦敦:普鲁托出版社,1978年版);查里斯·诺布尔(Charles Noble):《活跃的自由主义;OSHA的兴起与衰落》(宾西法尼亚:坦普尔



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安德鲁·萨斯茨(Andrew Szasz):《生态民粹主义:有毒的废弃物和追求环境正义的运动》(明尼阿波罗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休·斯特雷顿(Hugh Stretton):《资本主义、  
133 社会主义与环境》(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马丁·赖尔(Martin Ryle):《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伦敦:雷迪斯,1988年版);鲁西娜·凯斯特琳娜(Luciana Castellina):“‘红色’为什么必须同时也是‘绿色’的”,见《世界范围中的社会主义》,第56期,1986年;安德雷·高茨(Andre Gorz):《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波士顿:南部终点出版社,1980年版);同时需要提及的是对环境问题上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其中最著名的是纳林达·辛(Narindar Singh):《经济学与生态学的危机》(德尔希: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还有对环境政策之意识形态性的批判的理论,参见弗兰西斯·桑德巴赫(Francis Sandbach):《环境、意识形态与政策》(蒙特克莱尔,新泽西:阿伦赫德,奥斯姆,1980年版);也可参见埃尔玛·阿尔特维塔(Elmar Altvatar):“走向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生态批判”,见《市场的未来:一篇关于“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垮台之后的货币与自然的规范问题的论文》(伦敦:新左派书系,1993年版)。

26. 参见《时代周刊》,1988年12月5日。

27. 皮尔勒(Peerla):同前引文。

28. 斯威泽(Swezey)和费伯(Faber),同前引文。

## 第六章

135

## 对“生态危机”的一些考察

三十年前,格哈德·马修(Gerhard Masur)曾经这样写道:“危机的观念正在穿透人类活动的各种不同的领域。”<sup>1</sup> 尽管很难理解马修为什么没有把生态学包含在他所说的这些领域之中,但无论如何,他的这种评论是恰当的。现在,“全球环境危机”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大多数文化人的心目中,这一观念的核心视域也已经转向了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这一主题的严肃的讨论上面。20世纪60年代后期,“生物学家劳德·阿什贝(Lord Ashby),时任皇家环境污染问题常务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本身就是英国政府关注环境污染问题的一种体现)的主席,他说,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种单一性的危机,而是一段关键性的时期,或者说危机期,一系列的自然系统在工业污染物的冲击下,再加上一些核心资源的耗尽,因而面临着崩溃的危险。”<sup>2</sup>1990年,马斯塔法·托尔贝(Mustafa Tolba),这位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执行主席,把

全球变暖、臭氧层消耗以及生态多样性的消失这三大问题指认为对自然世界来说的三大最主要的“威胁”。<sup>3</sup> 与托尔贝所警告的“全球性自杀”相类似,迈克尔·索勒(Michael Soule),这位保护主义生物学的创始人指出,除非马上采取行动来拯救世界范围内的雨林资源,否则的话,一场生态“灾难”就将来临。<sup>4</sup>

环境主义的论文一般都包括像“受威胁的物种”、“危险中的动物栖息地”、“消失中的森林”这样的范畴。“危险”、“险境”、“冒险”、“紧急情况”等词汇重新出现在生态学家和环境主义者的词汇表中。新闻工作者对各种各样的环境事件都做过报导,从石油泄漏到核事故,无一例外。“环境危机”一词在他们的语境中具有典型的客观性内涵,其意思来源于“危机”一词在 2500 年前的希腊人那里所具有的含义,这种含义在今天的医学实践中仍然较为普遍地使用着,即一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它能决定这个病人是死还是活,或者能决定这种疾病是否会向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疾病转移。

“危机”概念的这种希腊式定义同时也是一种“文本”,它包含着对某种疾病的发展过程的强烈的主观判断或有争议性的估计。对“环境污染”这一范畴的内涵的理解就是一个例子。136 奥斯瓦尔多·桑克尔(Oswaldo Sunkel)和乔斯·利尔(Jose Leal)为这一范畴给出了一个客观性的定义:“滥用环境的同化性功能,把环境当成垃圾和废弃物的填埋场。环境的同化性功能的确可以被视为一种可再生性和可修复性的资源,但如果对这种功能肆意滥用,那么,随着生态系统的崩溃,环境的这种功能也将彻底消失。”<sup>5</sup> 与此相反的是,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冒险与文化》一书中指出,自然的危机并不能解释污染范畴的全部内涵,具体社区中的人们对他们自己关于污染的理解提出了质疑,并发展出了一些新的思想敏感点,它们与在科学的维度上的那些可计算性的危险相距甚远。

我们同意把“危机”概念定义为一种可争议性的估计,譬如对一片森林的发展问题的有争议性的估计,但我们并不走向道格拉斯式的那种极端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应该说,当没有人知道森林的砍伐是否建立在可持续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时候,森林的危机就是客观存在着的,所谓可持续性是指,尽管有来自于外部世界的侵扰,譬如大规模的木材砍伐,但森林这一生态系统依然保持着它的生物再生产能力。对危机的这种理解非常强烈地突出了人类自身的判断,不管是来自于科学家的还是其他人的。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两个生态学家在两个不同的动物栖息地研究同一类物种的情况,但他们在能够决定这一物种是死还是活的转折点,以及这一转折点的后果方面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三点:第一,物种通常是可根据可获得性资源而散居开来的(“群性散居”)。在某一个栖息地,某一类物种彻底死光之后,同类物种在这一地区会很快地重新聚集起来,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其原因在于这一栖息地只适合于某类特定的物种。大多数的物种并不是“自我毁灭”的,而是由于对外界的气候变化及天敌类物种等等情况的反应和预见能力很弱。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所讨论的这些物种将永远不可能与其栖息地达成某种“平衡”性的关系,而只可能处在某种持久性的“危机”状态。第二,不管是物种本身还是某一类物种的数量,其实都没有单一性的模式,因为,由于可得到的营养物的质量等方面的原因,物种的栖息地(在一定意义上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各不相同的。第三,尽管地域性通常被视为具有危机防范性的一种机制,但由于生态学知识往往是与特定的地点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地域”(以及外界的侵扰对它的影响)很有可能是被错误地作了界定,或者是很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被认识的。在生态学家们

看来,从总体上说,植物生长的机制要比动物生长的机制来得更为难于理解,其原因是,要想对后者的年龄特征(从中可以预测某种动物的生存或发育的情况)进行推算要相对容易得多。所以,植物生态学家往往会研究植物的散居性模式,而动物生态学家则会去研究某一动物物种的生长机制。

19世纪的历史学家经常用“危机”这一概念来标示一个民族或者它的人民的命运中的某种转折点、某个做决定的时刻,或者某一群人的意志真正受到考验的时刻。在这些意义上,乔治·布什打击伊拉克的战争就可以称作为一种危机,一个美国在海外展示其力量以及“恢复在越南战争中丧失的信誉”的转折点。与此相类似,你可以作这样的想像:未来的一位总统很有根据地说,他或她拥有某种“正确的东西”,理由是,这位总统通过诉诸于“软能源的道路”,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减慢全球变暖速度的大规模运动,或者说结束了对矿物燃料的依赖性。作为一个主观性的范畴,“危机”概念理应包括当人们事实上已经无法接受那些过去曾习以为常的规范性的东西的时候的那种历史性的事态。在这一维度上,“危机”的内涵是非常宽泛的,它包括经济和政治上的,以及生态上的那些不稳定时期;<sup>6</sup> 个体维度上的焦虑与不安(譬如家庭体系的衰退)以及对任何严肃的绿色政治运动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社会心理资源感到焦虑与不安;全球性生态毁灭的可能性以及对大规模的政治辩论和对失去控制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政治约束的要求的展望。

危机(包括生态危机在内)范畴的最重要的内涵,应该是“转折点”以及“做决定的时刻”。这方面的例子是,在阶级社会中,当没人知道或者没有人能够知道哪一个阶级或组织能够成功地把自已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的时候,不同的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或者这些阶级之间以及这些阶级内部的斗争关系。“危机”在这一维度上的内涵能够加以扩展,譬如,可以扩展到富

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斗争(“环境的舒适性”与“穷人的环境主义主张”之间的斗争)、某一具体的国家中经济和政治上的对手之间的斗争、绿色主义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在寻求对自然、社区和个人生活的保护,以及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财富和权力结构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相互之间的斗争等。

任何一个有用的环境危机范畴都必然拥有主观性的维度,因为,对该范畴的客观性定义往往(总是?)包含有一系列的未经仔细研究的假设。譬如,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申明:“政府又把60种动植物列入了濒危及受威胁的物种的名单之中……从而把此类物种的总数提高到了883种。其中的764种被界定为“濒危”的或处于灭绝边缘的物种。剩下的119种被列入了“受威胁”的物种之行列,它们极有可能演变成濒危物种。”<sup>7</sup> 这些“濒危”的物种目前是否处于危机的状态,或者说,它们在目前是否正在“受威胁”?或者,这两者是否都是危机的程度的显示?上述观点所假定的时间跨度有多大,与生态科学家经过艰苦的劳动而获得的成果相比,由上述数据所反映出来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官方的统计”?

有许多的例子可以用来补充说明“生态危机”既是一种科学的阐释,在更大的程度上又是一个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性的范畴。譬如,1987年的《纽约时报》中有一个标题这样写道:“世界把危险的警告转嫁给了荒野”。<sup>8</sup> 这一则新闻的内容是这样的:“在现在所剩下的荒野地带中,至少有一半的地区并不因为其恶劣的自然条件而具有自我保护性。它们正在悄悄地消失……隶属于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北极圈内的那些荒野地区,已经受到了石油、煤气及矿物开采活动的严重威胁……在非洲和南美洲,巨大的人口压力正在迅速地销蚀着荒野地带。”这一则新闻还告诉我们,根据提交给第四次世界荒野大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目前已经确定的荒野地区中,只

有不到 20% 的地带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在所有的有关“荒野”正处在“危险”之中或正“受到威胁”的论述中，最典型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概念都缺乏（或只具有很弱的）科学依据。荒野不是一个物种，也不是一个生态系统，而是建立在已经延续了 200 多年、并且已经建构得非常完善的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式的“热爱自然”的感性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性的思想建构。当政府涉足对“荒野地区”的设计，尤其是当政府开始管理这些地区，并把它们凸显为一种迈克尔·弗劳姆（Michael Frome）所说的“快餐式的荒野”<sup>9</sup> 的时候，“荒野”概念便演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范畴。由此，上述《纽约时报》中的那则新闻便不再仅仅是对一种生态事实的说明，它同时至少还是对一种政治和文化情境的说明。

下面一个例子同样也是对“生态危机”观念之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的具体说明。“湿地，这种水鸟及其他鸟类的重要栖息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就全国范围来讲，每年都有超过 45 万英亩的湿地在消失；也就是说，推土机每天都在推掉 1200 英亩的湿地。在加利福尼亚州，每年冬天都有大约 1400 万只野鸭和野鹅来此定居，可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情况相比，现在只有不到 4% 的湿地幸存着……一个注重实实在在的重建而不是政治上的花言巧语的全国性的非赢利性组织，认识到了对幸存下来的这些湿地加以保护的必要性，并大规模地开进了加利福尼亚。”<sup>10</sup> 这种阐释明显地把作为政治性概念的“生态危机”当成了一个科学性的概念来对待（譬如，“重要的栖息地”）。生态学模式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要素在这里明显的缺失了：一个世纪以前到底有多少只野鸭和野鹅在冬季的时候到加利福尼亚的湿地来定居？现在所剩下的 4% 的湿地是否足够用来维持 1400 万只鸟类的活动？如果不能的话，它们会不会改变其在内陆的迁移路线？这一类型的问题



还很多。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上述提到的这个环境组织(“全国性的非赢利性组织”)把湿地购买下来的目的,在于把这一问题严格地凸显为一个生态性的或技术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文化和政治上的问题。

一个物种是否在消失,一种生态系统是否在被破坏,一块荒野或湿地是否在受到威胁,这些的确都是生态学的问题,但同时也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文化上的问题。这一事实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生态危机可以被界定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譬如,那些试图保护生态系统或“荒野”的环境主义者,与那些被投资和获取利润的动力所驱动的资本主义的促进者之间的斗争中的转折点,即当还没有人知道哪一方将会获胜的情况之下的某一时刻或时间。第二,这种转折点首先以及在最主要的意义上是一种政治上的转折点,因为,人们在此时还不知道对湿地或物种的毁坏是否已经超过了它们可能被拯救的边际点。由此,那些对环保有兴趣的个人和组织,介入或者不介入围绕这些东西的斗争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效果,这还不是很清楚(在纯粹的“危机”状态下,个人的行动在促进对湿地或特定物种的保护方面无疑是能够起实实在在的作用的)。

一旦我们接受“危机”的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性特征,那么,我们就能够开始对处于危险状态的特殊的物质利益问题进行界定。根据这一线索,所谓的科学观点也很明显地必须从在科学家与卷入这场斗争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进行评价。

以下两个例子是对这一点的说明。《纽约时报》上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广告,它们提醒人们关注全球变暖的事实,以及如果地球继续变暖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将必须采取的那些调整性措施的意义。然而,当我们了解到是那些核动力工业

在支付着这些广告的费用,它们对降低我们现在对矿物燃料  
139 的依赖以便能够增加我们对核动力的需求所抱有极大的兴趣,当我们了解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广告的怀疑之心便会油然而生。

第二个例子取自于有关氟氯烷烃类物质(CFCs)所带来的臭氧层消耗的故事。罗伯特·瓦特森(Robert Watson)博士,NASA 臭氧层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在1987年10月曾说过,氟氯烷烃类物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扮演了破坏臭氧层的角色。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谢伍德·洛兰德(F. Sherwood Rowland)博士,这位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曾警告过臭氧层正面临着危险的人,同样是在1987年10月,说过这样的话:那种假定在南极洲正在出现的情况不会扩散到温带地区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甚至是莽撞的”。还是在同一个月,马克·马可发兰德(Mack McFarland)博士,这位杜邦公司(世界上最大的氟氯烷烃类物质生产厂家之一)的科学家,却这样说道:在南极洲出现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出现的。这些难道只是科学观点上的不同吗?是否还是与此相联的利益方面的不同?或者兼而有之?

一旦我们开始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思考生态危机问题,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概念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趋势联系在一起。加拿大的森林业和世界范围内的捕鱼业是这方面的两个例子。许多加拿大人都非常关心“森林危机”的问题。对一些生态学家来说,“森林危机”意味着加拿大的木材、纸张及纸浆工业不再能够在一种可持续性产出的基础上从森林中获益。对那些把森林视为加拿大的国家特征之有机组成部分的人来说,“森林危机”意味着光秃秃的土地的那种非常丑陋的景观以及这种景观所具有的一切象征意义。对于纸张及纸浆加工工业来说,这种“危机”意味着所需木材的短缺。就当今

世界对纸张及纸浆产品的现有需求程度而言,森林危机意味着对工业的经济活力的一种威胁。

或者换一种说法,一旦工业面临不确定性或经济的困境,它就可能去寻求更为便宜的木材。而要获得这些木材,工业的管理者就必须使用那些在环境维度上得不到支持的方法去砍伐树木,而这便造成了生态学家所理解的那种“危机”。纸浆工厂所能获得的木材不仅依赖于树木的再生性循环,而且也依赖于获得这些树木的成本:树木离工厂有多远,有没有通达这些树木的道路,纸浆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等等。不管在木材的供应及再生性方面的自然条件到底如何,从经济的维度上说,木材的确是有短缺(或过剩)的时候的。

就渔业方面的情况而言,“尽管专家们说,这方面的资料统计异常的困难,但现在的一种普遍被人接受的观点认为,当今世界的渔业正处于可怕的状态……在一次联合国的会议上,科学家、工业专家及政府官员一致认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显示,对鱼类的过度捕捞及对鱼的栖息地的破坏已经导致了海洋渔业资源的令人可怕的下滑。”<sup>11</sup>对环境的这种“威胁”从范围上讲是全球性的,“它涉及到依赖于渔业的那些国家的未来的食品生产和经济的稳定性”。一些主要的食用鱼的捕捞量在近几年内已经严重的下降。“世界粮农组织”1993年的报告显示,全球17个主要的渔业区中的9个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其中的4个被认为在商业上已无利可图,另外的5个则正在被“满负荷开发”或“过度开发”)。问题最严重的那些鱼类物种“不仅在商业维度上,而且在生物学维度正在走向绝种”。气候模式、水温及含盐量的变化;捕鱼船队的发展;更为有效的技术;把幼鱼也一起杀死的捕鱼方式;对海边的鱼类产卵地的破坏;无视区域性渔业协定的捕鱼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上述困境的主要原因。这种“危

机”对于渔业生产、鱼类出口国以及那些国民主要从鱼类中摄取蛋白质的国家来说,影响尤为明显。至于从鱼类在各种自然及人工因素的作用下,能否从目前所遭受的冲击中恢复过来的能力的角度来看,上述这种情况是否真的是一种“生态危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澳大利亚生物学家玛丽·哈伍德(Mary Harwood)说:“我们知道,在现在的情况下,要想在鱼群自身生产能力的自我反弹意味着什么、什么才是安全捕鱼的最大极限等问题上得出明智的结论,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戴维·皮特说,“鱼类凭借着自身的自然因素,根本不可能存活到足以让人计算其数目的地步”,“正像许多人不在意地谈到的那样,现在仍然有数目相当可观的鱼分布在超过全球水域70%的地方”。虽然从全球渔业生产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正在慢慢积累起来的经济危机,但这到底是否是一种像有些科学家所说的生态危机,显然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然首先并且最主要的是从潜在的交换价值的角度来定位的,因此,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从自然性维度上来理解的危机范畴,毫无疑问地会与从经济维度上来理解的危机范畴相互混淆起来,这两者经常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一个地区的“生态危机”同时也是该地区经济困境的一种反映,正像同时也反映了该地区不同的资本集团之间的斗争一样。“旧金山湾的状况问题目前仍在争论不休,就像医生们正在对一个疑难病例进行争论一样,这些专家至今仍然没能在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生病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旧金山湾)或许正在‘生病’,或许好得很,这要看你问的是哪一个专家……科学观点上的分歧往往与地理分界线相对应,这一点都不令人感到奇怪。在北部的人看来,这个海湾真的出问题了;可在缺水的南部的人看来,一切都好得很。”<sup>12</sup>这

一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生态危机的定义中隐含着主观性的因素,即对问题所出现的过程的不同评价,同时也充分地说明了金钱与权力对危机是否真的存在的讨论所具有的影响力。

看起来,“生态危机”似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定义。有些人根本否认危机的存在,并坚持认为,未来将以一种或多或少可以被预见的方式从当下的状态中生发出来。戴维·皮特这样写道:“有关全球环境正受到威胁的报告往往是在散布一些怀疑论的情绪,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样一些科学家,在他们看来,人类在复杂现象上的知识太有限了,以至于根本无法为匆匆作出启示性结论的作法进行辩护。”<sup>13</sup>环境保护是那些“环境怪人们”的行动所推动出来的,许多担心环境保护之商业成本的经济学家,都在怒斥这种“危机”的观念。经济学家托马斯·摩尔(Thomas Gale Moore)说,“这些极端的环境主义者通过对即将来临的灾难的渲染,获得了公众的注意力、来自于社会大众的财力上的支持,以及在很多情况下,获得了他们在政策方面的目的。媒体非常清楚,有关即将来临的厄运的故事是报纸的卖点,它们能够吸引读者。科学家们非常了解,对灾难的恐惧会带来对研究计划的支持……一个科学家,如果他想说明那种所谓的灾难是很小的,或者说已经被过分地强调了,那么,他的研究计划不仅会招致其同伴的敌意,而且也不太可能得到财力上的支持。”<sup>14</sup>在提醒他的读者注意以下这一事实,即“发达国家之间的主要贸易摩擦实际上是围绕着大量的剩余物资(而不是因为物资短缺)而展开的”之后,摩尔,这位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对所谓的酸雨、全球变暖等恐吓性的言论进行了揭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摩尔在反驳过程中所运用的,正是被他加以斥责的那些环境保护主义的科学家所利用的统计数据。为了证明在环境破坏的危险性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

性,摩尔阐述了他自己的一系列“科学的”研究,好像这些研究的结果就是确定的似的。

那些非常胆怯或小心翼翼,对到底是否存在着一种危机拿不定主意的人,的确是存在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坚信,环境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它呼唤着人们采取快速而又果断的行动来阻止一些灾难的发生。前面所谈到的围绕着大气臭氧层耗尽的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那些曾经提出警告说,臭氧层的保护作用正在被氟氯烷烃类物质不断地消耗掉的人,在遭到政府机构的多年数落之后,终于在1987年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一年中,40个国家同意了把全球氟氯烷烃类物质的使用程度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上的协议,并计划到1999年,把氟氯烷烃类物质的消耗降低一半。在早期的科学讨论中,臭氧层的消耗程度与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之间是作过一定的区分的。有些科学家指出,如果原因没有被真正地找到,那么,任何的惊慌都是没有(或者很少有)理由的。这意味着,有关某种生态问题的统计学数据,与对这一问题的科学理解相比,显然要次要得多。到1987年的时候,有关氯气是否是破坏臭氧层之保护作用的一个因素的问题已经不再争论了,取而代之是对这一因素到底起多大的破坏作用的争论。持绿色主义观点的人认为,虽然臭氧层的损耗主要是由于非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但氯气的生产应该被立即禁止,因为“任何一种很小的力量都是一种力量”,并且,这也是人类惟一能够加以控制的因素。与此相反,一些科学家(其中有一部分人是从“化学用品生产商协会”得到财政支持的)则认为,如果人类在导致臭氧层的损耗方面起10%的作用的话,那么,氯气的生产根本没必要全部加以禁止,而只需要砍掉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一些科学家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说,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的臭氧层的危机或许有,但也或许没



有,这需要更多的事实来加以佐证;而环境主义者从这些同样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却是,氟氯烷烃类物质应当立即地加以禁止使用,也就是说,危机是明摆着的,人类必须采取迅速的行动。1987年的蒙特利尔协议其实是一种调和的产物,它把自然界的均衡与商业利润方面的均衡调和了起来。

那些得到公认的思想领袖们其实很清楚,对危机的讨论本身也在制造着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另外一些人——那些小心翼翼地说谎者——浮出了水面。他们尽管事实上是承认危机的存在的,但在口头上却矢口否认这一点。还有一些人,他们是相信危机的存在的,但他们在公开场合所愿望承认的,比他们在私下里所持有的观点要弱得多。同时也有一些这样的伪君子,他们在私下里对危机的观点大加斥责,可在行动上却是一副高度紧张的样子,其目的在于通过制造一种危险的气氛,来鼓动社会大众的意见和行动,以利于其自身利益的获得。与此相反,资本家们往往会利用通过宣传等途径而建立起来的公众关系网,来贬损有关危机的言说(“绿色的污垢”),来鼓吹企业对绿色技术及产品的认同,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害怕那些“真正的”危机的经济成本问题的。

当然,那种在危机问题上的真正的奥威尔式的言说(乔治·奥威尔是英国20世纪的一名作家——译注),可能源自于政治性的机构之中。政治阶级对危机谈论得越少,危机就越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是否低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而那些不掌握权力的人是否又高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在权力网之中的人通常会比在这种权力网之外的人掌握更多的关于危机的信息(即使信息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他们应该更具有掌握真相的条件。虽然那些掌握了很多知识的人对否定性的力量也作了夸张地处理,但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有时候会故意地通过制造



一种“危机”的局面,来鼓动社会大众对政府的军事、经济及其他政策的支持,如果不是这样,社会大众可能不会支持这些政策。

现在作个总结:在“危机”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其根源在于不同的物质利益、社会经济及政治方面的斗争与冲突、对所存在的危机的不同估价、极有可能存在的对危机的意识形态建构以及以下这一事实:在危机发生期间,个人完全可能在如何解决这种危机的问题上持不同的观点,因为,从根本上说,没有人知道或者说没有人能够知道这种危机的最终结局。这最后的一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一名环境主义的(以及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战士,并积极投身到为实现一个具有生态理性及生态情感的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中去的最好理由。

#### 注 释

1. “历史中的危机”,参见《思想史词典》(纽约:斯克雷伯纳斯,1968年版),第595页。

2. 菲利普·劳(Philip D. Lowe)和迈克尔·沃伯斯(Michael W. Worboys):“生态学和意识形态”,参见巴特尔(F. H. Buttel)和纽贝(H. Newby)主编的《发达社会的乡村社会学》(蒙特克莱尔,新泽西:阿兰赫德,奥斯姆,1980年版),第433—434页。与我在下面所要展开的论述相类似,这篇文章的两位作者继续写道:“当然,另外一些人,譬如时任《自然》杂志编辑的约翰·马道克斯对此类危机的存在提出了质疑,他不相信存在着这种‘死亡的命运’。有意思的是,阿什贝本人……随后就指出,‘这种危机是一种政治性的而不是生态性的崩溃’。”

3. 琼·斯图尔特(Jon Stewart)摘自《旧金山编年史》,1990年6月6日。

4. 引自鲍勃·霍尔姆斯(Bob Holmes):“它们以多快的速度在走

向灭绝?”,参见《科学笔记》,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1992年冬季号,第3页。

5. 奥斯瓦尔多·桑克尔和乔斯·利尔:“发展视域中的经济学与环境”,见《国际社会科学学报》,第109期,1986年,第419页。

6. 有一个例子(参见《纽约时报》,1987年10月29日):“能源部的研究报告说,要想真正了解在某些特定的、普通农作物能够承受的核事故的状态下,核反应堆对外界产生影响的模式,是有很大的困难的。这份报告同时得出结论说,核反应堆在事故的状态下控制放射性物质之释放的能力是‘根本无法确定的’。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作为不确定性而存在的“危机”,它根源于不具备足够的技术性知识。

7. 《旧金山编年史》,1986年2月1日。

8. 《纽约时报》,1987年9月12日。

9. 迈克尔·弗劳姆:《重新绿化国家公园》(塔克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 《旧金山编年史》,1987年9月11日。

11. 戴维·皮特(David E. Pitt):《纽约时报》,1993年8月3日。

除非另外注明,这里所引的资料均源自于皮特的文章。

12. 《旧金山编年史》,1988年1月4日。

13. 《纽约时报》,1993年8月3日。

14. 托马斯·戈勒·摩尔:“环境怪人们对危机的凭空虚构”,见《旧金山编年史》,1992年9月14日。

## 导言

我们暂且可以把资本主义化的自然界定义为这样一种东西：它并不是作为一种商品生产出来的，但却被当作一种商品来对待。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卡尔·波兰尼，当然，它同样可以归功于卡尔·马克思。波兰尼把“劳动”和“土地”视为假装的或者虚拟的商品。“人在劳动的名义下，自然界在土地的名义下，被建构成可以出售的东西……存在着劳动的市场以及土地的市场，在这两种市场中，供应和需求分别是由工资和地租来加以调节的；劳动与土地是为了被出售才被生产出来的，这种虚构一直被维持着。”<sup>1</sup> 土地和劳动其实并不是在市场的力量或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被当作一种商品而生产出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把土地

和劳动当作商品的观点,意味着这两者都被当成了某种劳动产品来看待,而一种抽象的价值就附加在这种劳动产品上面。<sup>2</sup>

大体上说,马克思的“生产条件”概念可以被解读为与波兰尼的“劳动与土地”范畴相似的意思。之所以说是“大体上”,那是因为马克思有时候是在一种更为宽广的意义上使用“生产的物质条件”这一范畴的,它包括“资本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sup>3</sup>,同时也因为马克思所确认的是三种,而不是两种“生产条件”。他把工人的劳动力称为“生产的个人条件”。土地被视为“自然条件”或“外在的物质条件”。物质性的基础结构,即“交通与运输的设施”,则被视为“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sup>4</sup>

劳动力、“个人条件”这些范畴的虚拟性本质是很明显的。劳动力并不是为了在市场上出售而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它是一种虚拟的商品。劳动力也无法与其所有者相分离,进而也无法在市场上自由地流通。工人的劳动力、他们的身体及精神方面的健康状况、他们的社会化及技术方面的合格化的程度与水平、他们应付劳动关系之压力的能力等等,其实都是统一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则与此相反,在它们看来,没有任何一种本质性的或核心的“自我”能够游离于劳动力的商品化线索之外。<sup>5</sup> 其实,不管劳动力市场试图想把人类打扮成什么样子,人类作为社会生产的力量,始终既是一种生物有机体,又是一种社会有机体。 145

由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并不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劳动力的价格不应当根据交换价值来进行阐释。严格地说,劳动力根本上就没有什么交换价值(真正被市场所决定的,只是所消费的价值内容,而不是消费量的大小)。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劳动力将会以虚拟商品的形式出现,更没有证据表明它将会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方式得到默认或支持的前提下被再生产出来。这是因为劳动者不仅是雇佣劳动

之交换活动的客体,同时也是这种活动的主体,既是劳动(物质生产)本身的客体,又是它的主体。只有当劳动者本身把劳动力当成商品来看待的时候,劳动力才可能有某种价值。如果劳动者并不允许把他们的劳动力作如此的对待,那么,劳动力所负载的那种虚拟的价值就会被彻底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对其劳动力进行自我评估。这种“对自身价值的自我维持”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不仅依赖于经济、生产率、利润率等因素的变动模式,而且也依赖于阶级斗争、女权主义斗争、民族主义斗争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把生产的第二种条件界定为“**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或“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及运输方面的设施”。<sup>6</sup> 有许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这里的“一般条件”范畴作出过阐释。<sup>7</sup> 大多数的理论家把自然的和社会的基础设施(譬如,公路、教育等)以及一些人造的场所视为“一般条件”中的主要内容。我们也可以把“社区性资本”,即由资本来支撑的社区生活的文化特征加在里面。基础设施是把土地、资源及劳动力统一在资本之上的前提条件。城市及其他的人造空间使资本能够以特定的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把“生产要素”统一起来。洛金(Lojkin)对“一般条件”的定义应该说是最宽泛的:在他看来,“一般条件”是指“这样一些极其重要的因素,它们能代替在发达资本主义形态的再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各种所谓的必要条件。它们是……**集体性消费的资料……物质流通的工具**(譬如交通运输工具)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上的集中化”。<sup>8</sup> 希尔施(Hirsch)的看法则与此不同,他认为,“生产的‘**一般物质性**’条件是从较为狭义的角度来说,它包括公路、河道等,而对资本而言的生产的‘**一般**’条件从最为广义的角度来说,应当把劳动力(譬如健康服务)、教育等因素也包括在里面。”<sup>9</sup> 曼德尔(Mandel)对“一般条件”的定义与希尔施

的定义很相似。他对“具体生产过程的总体性—技术性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工具、邮政服务等)、这同一种生产过程的总体性—社会性前提条件的提供……以及那些对经济生产来说必不可少的脑力劳动形式的持续的再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区分。<sup>10</sup>这与本书作者在《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中所提出的社会投资及社会消费的范畴所要表达的意思很相似。洛金在对总体的或公共的生产条件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也许是最首尾一致的,因为,在他那里,这一概念既包括了总体上的空间的管理,也包括了对具体的都市空间的管理问题。

都市里的那些自然性的以及社会性的基础设施、空间、社区资本(这至今仍是一个不常被使用的概念)实际上也都是虚拟的商品。从根本上说,它们并不是为了要在市场上出售而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办公楼所用的空间、商住房所占的土地等除外),它们不能在市场上自由地流通,因为它们或者是有特定地点性的,或者是有特定社区的文化属性的。同时,严格地说,就像劳动力一样,这种“一般条件”也是不具备交换价值的。公共性的交通和运输并不直接地由市场力量或价值规律所支配。再者,又是与劳动力一样,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基础设施及(城市)空间将会以商品的形式被人所获得。最后,基础设施及城市空间的价值不仅依赖于市场需求,而且也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不同的派别或集团的权力、从总的方面来说的阶级斗争以及从具体的角度来说的各种都市运动的基础之上的。

生产的第三种条件在马克思那里被称为“外在的物质条件”<sup>11</sup>或“自然条件”<sup>12</sup>。“外在的物质条件在经济学上被分成两大类,一是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财富……二是作为劳动工具的自然财富。”前者包括“肥沃的土地、渔业资源丰富的水域等”;后者包括“瀑布、可用于航行的河流、树木、金属、煤

等”。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还把外在的物质条件指称为“进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中的自然因素”。这些条件或自然因素可以根据自然界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在与投入这种生产过程的劳动时间的多少或者资本数量的大小无关的前提下所起的作用的情况,来对之进行界定。优越的自然条件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而不是增加)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但这反过来又会增加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生产(许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在马克思的时代,有关自然条件或外在条件的理论阐述,是建立在自然界的稀缺性或自然的有限性的观念之基础上的。今天,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能源经济学正在复活的年代,而且,生态经济学家们对外在条件的讨论除了建立在经济学的理论视域上之外,还深入到了生态系统在生态方面的生存性、温室效应的经济学意义、海岸线及分水岭的稳定性、为了地租而进行的资源开发所具有的后果、土地及水资源的质量和农业生产率、预防酸雨的经济成本以及其他一系列相类似的问题域之中。在今天的经济学理论中,有关“自然条件”方面的话题正在越来越变成一个重要的话题,与马克思时代相比,这一话题在今天要显得重要得多,这源自于国家的及全球性的公司和银行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对“第二自然”的资本化。

市场以其对待劳动力和公共性生产条件的方式,把外在的或自然的条件设定为虚拟的商品。今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以其痛苦的和近乎疯狂的独创性,试图给清洁的空气、诱人的风景及其他的一些怡人的环境、荒野地带,甚至雨林贴上价格的标签。不过,不管资本在多大程度上被运用于土壤和水资源的利用、海岸线及矿山的开发,它们仍然是由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把它们创造出来并不是为了让它们在世界市场上被



出售。因此,严格地说,就像个人条件及一般条件一样,外在性的条件没有交换价值。同样,与个人条件和一般条件的情况一样,地皮、土壤、水及其他的自然因素也并不因为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以恰当的数量和质量、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把自身呈现给资本。虽然从理论上讲,地租对自然因素会起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地租本身从主要的方面来讲也只能从土地所有权与工业资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sup>13</sup>其实,就像教育、福利、都市空间及其他的生产条件是一种政治性的话题一样,自然资源的配置的整个计划也是一个政治的话题。最后,外在自然界的“价值”不仅以市场需求和地租状况为基础,而且以总体上的阶级斗争以及具体的环境斗争为基础,这种环境斗争是围绕着自然界能否以一种合法的方式被加以利用而展开的。

“条件”一词最早可以溯源自古希腊语中,在那里,它被赋予了一种非常“客观的”内涵及意义。马克思使用这一词,可能是因为他有意要在一种优先的层面上来探讨劳动力、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自然界的问题。事实上,在其对资本的理论阐述中,马克思有时会取消自然界所具有的那种主动的、自主性的地位(他在描述自然界的状况时会使用一些隐喻,如“竞争”、“协作”等等)。当然,马克思也赋予了劳动力、基础、空间这样一些范畴客观性的理论特征。对马克思来说,上述范畴的客观性,就像资本主义积累条件的理论一样,有时候甚至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的理解更具客观性。不管上述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可以确定的是,任何一种对生产条件的阐释都不能忽视外在自然界具有其自身的、自主性的“规律”或发展原则这一事实;不能忽视劳动力既是交换和劳动的客体又是其主体的事实;不能忽视空间场所及基础设施除了直接地被政治和市场所建构之外,还独立地完

成对资本的地理维度上的配置。<sup>14</sup>由此,“生产条件”的概念必须被主体化以及应该被赋予一种历史意义,也就是说,它不应该被界定在像马克思本人以及那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很强的决定论的模式之上。

## 生产条件与国家

148 马克思尽管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但他却没能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就像波兰尼对“土地和劳动”问题所作的系统研究一样)。马克思著作中提到上述三种生产条件的段落似乎更像是一种事后的思考。他更多地阐述了劳动力供应的条件,而不是一般性的、外在的生产条件。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即使是对“个人条件”的阐述,也是隶属于对当时的“原始积累”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描述,隶属于对资本主义积累以及后备劳动力的理论研究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关基础设施的供应条件的论述是很少见的,至于对空间、都市及其他一些问题的阐述,则根本没有。那些散见于各处的有关“外在的物质条件”的评论则可以被视为是马克思的如下理论,即自然物质的稀缺性导致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的观点的一种补充,<sup>15</sup>不过,马克思在“土地”问题上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地租理论上。更进一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除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本身之外,我们很难找到有关围绕着生产条件的供应而组织起来的社会斗争的论述。

从根本上说,这种理论空场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劳动力、土地以及自然资源是十分丰富并且是现成可得的。只是在资本主义晚期的集约型发展

阶段,即资本和市场获得了深化、劳动实现了对资本的实质上的从属的阶段,生产条件的问题才成为一种系统性的而不是零散性的问题。不管导致上述理论空场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对生产条件问题进行理论阐述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资本、国家及社会运动已经在实践中对这些条件进行了阐述一样。

站在阐述这一问题的理论出发点上,我们必须注意到,生产条件不仅是指生产力,而且也包括生产关系。生产条件是在一定的财产、法律及社会关系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或使之变得可以让人得到的),而这些关系或许可能,但也或许不可能与作为生产力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相一致。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对教育和健康(打个比方)的忽视、对社会的基础结构及自然环境的忽视,会导致对这个社会的生产能力的破坏,从而也间接地导致资本之生产力的减弱,也就是说,导致经济危机(参见第8章)。

生产条件的生产和(从许多方面来讲的)分配是不受市场(或价值规律)的制约的。肯定存在着某种独立的或“相对自主性”的东西,是它在促使着人类劳动力、自然界、社会的基础结构以及空间等因素,以资本所希望得到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在资本看来是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把自身呈现给资本。这种因素不是别的,而是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它创造出了这些条件,并且(或者)控制了对劳动力、土地及原材料的获得和使用的权利,以及参与和退出被马克思称为“生产条件”的那些虚拟商品的交易活动的权力。正像波兰尼所说的,国家对生产条件方面的虚拟市场(以及总体上的那种更大的市场)进行控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对劳动力、土地或人民以及自然界的剥夺是无止境的。由此而及,如

149 果生产条件的再生产遭到了忽视,它们的生产能力受到了损害或者破坏,并导致了对资本的生产力的损坏,那么,最直接的原因应当归咎于国家机构及其政策,而不是资本本身。

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国家机构和政策的问题已经从两种不同的总体思路上加予以了研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对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与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探讨。受韦伯、劳威(Lowi)、奥菲(Offe)等人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对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派别中的确存在着方法论和主题上的很多交叉之处,但有一种趋势则是非常强烈的,即第一个流派越来越走向“经济学”化,而第二个流派则越来越走向“社会学”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国家政策在保证生产条件以商品的形式而存在,以及确保这些条件不断地以这种方式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中的重要性。一个经济学家这样写道:“国家的功能就是去寻求资本家的共同利益,它是不可能通过个别资本家的行动来获得的(也许还会对它构成损害)。”<sup>16</sup>资本的共同利益就是要获得生产条件,这是个体资本不管是在单独的状态还是在合并起来的状态中都无法完成的使命。“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而是劳动力的存在条件的再生产。”<sup>17</sup>自然与公共条件的情况也是如此。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就是劳动力、都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环境条件的存在能够在政治上获得保证。

事实上,国家或许可能,但也或许不可能把生产条件生产出来(譬如,比较一下由国家建造的高速公路和那种由自然所生成的矿产储藏)。即使“一般条件(以及在更宽的视域中的个人及外在条件)的生产是国家的一种独特的和基本的功能”,<sup>18</sup>也不能就此而认为所有的条件都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就一般条件而言,“资本本身往往创造了其中的很大一部

分”<sup>19</sup>。家庭(以及教育体系)在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中扮演了大部分的十分必要的角色。“自然体系”再生产出许多像土壤、植物这样的自然的或外在的条件。因此,生产条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应该是它们与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关系,而不是它们到底是由私人创造出来的还是由国家创造出来的这样的问题。

当然——这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介入使生产条件的供应形式发生了某些变化,因为,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是一种在资本周转之外的非赢利性的活动”<sup>20</sup>。更进一步,不管生产条件的创造者是国家、家庭、社区或者资本本身,国家都毫无例外地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对其创造过程进行控制;国家同时还对个体资本获得、使用以及退出生产条件的情况进行控制。家庭、劳动、教育、健康、福利政策以及刑法体系等因素对劳动市场上劳动力的表现形式进行规范。有关自然资源、农场、公园、水、土地及其他相关因素的政策对资本进入外在自然界的行为了进行了控制。而城市法规、城市中的分区制、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局部区域性的规划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则对资本进入到都市基础设施和空间领域中去的行为进行了控制。考虑到与生产条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国家机构和政策在范围方面是很广泛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或许)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建立金融、财政政策之外,国家的所有国内功能都以复杂的方式与生产的三种条件中的一种或几种因素联系在一起。 150

生产条件的供应以及/或者对资本获得这些条件的管理往往是非常官僚主义化的。在劳动、环境、城市问题等方面的政策服从于公众的监视及它本身的可被阐释清楚的程度。它们往往根据规范性的民主程序来使这些政策获得法律上的通过,并且由一个(从理论上说是)非私人性的国家机构来把它

们实现出来。在理想化的状态下,这些政策就既会被公众认为是“合法”的,又会被资本家认为是“生产性的”。站在生产条件的这种政治化的视域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这些生产条件被忽视了,如果它们的生产性能力遭到了破坏,那么,将会出现的就不仅是资本的经济危机问题了,而且还是国家的立法危机或者执政的党和政府的政治危机问题。

由于生产条件的供应和管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因此,上述这种可能性经常会被低估。国家政策往往会产生复杂的、预想不到的后果。一个政策很可能以牺牲资本总体的利益为代价来使个别资本获益,或者是以牺牲个别资本的利益为代价来使各种资本派别获得好处。一些企业会以别的企业受损,或者以环境为代价而受到帮助和支持。<sup>21</sup>一些地区可能会以别的地区受到损失为代价而得到实惠。国家也可能会一只手硬、一只手软。

我们可以用以下两个总的标题来概括上述这些问题:资本的内在矛盾及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由国家生产或管理的各种生产条件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sup>22</sup>

从总体上说,资本内部的确存在着很多的矛盾,这些矛盾对国家在制定有关生产条件的供应方面的政策时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第一种矛盾是存在于个体资本的利益与总体资本的利益之间的矛盾。譬如,个体资本往往会把自然资源商品化,而不从总体资本之利益的角度把它们当作以劳动力的再生产为目的的集体性的消费资源来使用。公共土地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二种矛盾是存在于个体资本的利益或资本派别的利益内部的矛盾。在城市的改造计划中,金融资本、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能得到它们想要的那块份额吗?能源政策会向土地资本或工业资本倾斜吗?(土地资本战胜工业资本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些试图在国内建立垄断



地位的国内石油生产商对中东石油的胜利。)是那些小的资本还是那些大的资本将会从国家政策中受惠?从典型的情况来看,最大的资本肯定会得益最多。1989年发生的阿拉斯加石油溢出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阿拉斯加州环境保护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扩大对石油工业的清洁工序的重要性的宣传,可这一努力却被工业资本所具有的政治力量推入了困境,工业资本无视对生产设备的维护,有些设备早该需要清除油污了,可没人理睬,不仅如此,连那支只有20人的紧急事件处理小组也被解散了。与此相类似,在美国国会(受到了大石油公司的影响)的推动下,美国海岸管理署在1986年修改了双层油轮的达标要求(在“威廉王子海湾”曾经溢出过石油的单层油轮的造价要便宜得多)。地方性的渔业和旅游业缺乏足够的政治力量来阻止那些经常被称为犯罪性的玩忽职守的事情的发生。 151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是否向消费品工业或资本货物工业倾斜?譬如,工资政策是根据维持消费开支的需要还是根据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来制定的?其他的矛盾还包括不同的地区性资本联合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之间以及技术含量低的和技术含量高的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矛盾的最终结局如何,将在政治的维度上决定或影响劳动力市场、资源、城市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政策的制定,这些政策显然是与生产条件的供应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个体资本和总体资本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往往也会发生冲突。譬如,美国农业部很多年来都几乎把其全部的财政预算用于支持农民和农业商人,这些人的行为的确可以带来眼前的利润,但从长远利益来说却导致了土地的毁坏和水的盐碱化。

就生产条件本身而言,在其内部以及相互之间其实也是



存在着系统性的矛盾的。对“生产条件”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应当置放在总体资本的内在关系的层面,而且还应当置放在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的内在关系的理论层面上。政治体制对一个国家所具有的保护或重建生产条件的能力来说,具有独立的影响作用,譬如,就外在性的生产条件而言,“生态领域内的破坏、危机和危险在时间跨度上已经绵延了上千年,可当代的民主制度在时间的地平线上只局限于二至三个法治化的时期。这么一点点时间甚至还不足以用来有效地规划工业发展的未来。”<sup>23</sup>政府机构在生产条件的发展过程中同样也起关键性的决定作用。戴维·比瑟姆(David Beetham)这样写道:

“任何一种根据相互竞争的官僚机构的利益来解释政策的观点,如果脱离了对这些机构所置身于其中的政治结构的审视……脱离了对管制上述这些不同利益的表达方式以及对这些官僚机构之间的竞争过程起规范作用的那些习俗的理解,显然是不完整的……官僚机构拥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越完善,这套机构就越会把其中的精英人物牢牢套住。这些文化是精心制作的那些规则的具体化,这些规则制约着管理行为的实施方式,同时也体现了某种关于这个世界的更大的假设,这种假设把它们自身的限度投射到那些被认为是可能的或可被接受的政策的范围上。”<sup>24</sup>

因此,官僚政治的政策是“不同的官僚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妥协的结果,是管理机构强加的那些限定的结果,是那些共同的文化假设的发展倾向性的结果……利益的因素与某种

既定的管理机构联合了起来,其结果是,处在官僚政治之中的 152  
管理体制的特点,不仅系统地影响了政策的执行,而且也影响了  
政策的内容,影响了由共同的文化和信仰所凸显出来的政策  
的表达形式。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了过来,管理  
手段的特性决定了政策的目的或目标。”<sup>25</sup>

于是,试图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政策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  
之间建立起某种固定的联系的功能主义的国家理论,就必须  
高度关注以下这一事实:资本主义的国家是在正式的民主政  
治体制中建构起来的一种官僚政治的国家,因此,它具有“相  
对自主性”,换句话说,它是从属于其本身的内在趋势及矛盾  
的。更具体地说,生产的三种条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被  
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是被国家生产出来的,  
而且/或者是被国家管理着的。

生产条件可以被界定为“生产力”或“生产的社会关系”。  
如果被界定为一种“力量”,那么,很显然,从生产条件在其中  
被生产、组织及管理的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界定是  
有局限性的。如果被界定为一种“关系”,那么,从它们作为  
一种“力量”而获得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界定显然也是有局  
限性的。一定类型的正规教育、公共健康、土地使用、交通模  
式、海外石油开发、水资源的分配等等,是在某种特定的官僚  
政治关系中被建构起来的,而这反过来又界定和限制了教育、  
公共健康以及其他一些活动的类型。这种关系可能与生产条  
件在其既定的质量和数量的状态下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过  
程相一致,但也有可能不相一致。换句话说,假定在资本和国  
家的内部,各种利益处于破碎化的状态,那么,生产条件的力  
量性维度与社会关系维度之间的矛盾就会加深。譬如,非传  
染性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性或文化性的原因而产生  
出来的,而不是由遗传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sup>26</sup>内地城市中的

教育及都市改造政策,新兴的矿业城市中的健康及资源政策,以及处在国际性大都市之边缘的那些地区的农业及城市政策(这里只举这三个例子),可能是一致的,但可能也是不一致的。

## 生产条件与市民社会

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一个官僚性的国家,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性的国家。生产条件的供应以及/或者资本对这些生产条件的获得途径不仅被官僚化了,而且也被政治化了。由此,对国家政策的功能主义阐释就有必要更进一步地调整自己,使其理论能重视以下这一事实:官僚性的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得以运行的,它身上还负载着意识形态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冲突与妥协。<sup>27</sup>这意味着国家之保护资本家的集体利益(譬如,对生产条件的获取)的功能“不是通过一种不间断的过程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冲突与斗争,通过渐进性的变化与突发性的行动的交叉来实现的”<sup>28</sup>。这种一般性的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斗争(如上所述),而且也适用于市民社会内部以及发生在市民社会中的各种运动之间的斗争,同时也适用于资本与国家之间的斗争。生产条件的生产理论中的更为复杂的地方,在于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复杂的斗争:女权主义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土著居民的斗争等等。

来自于加拿大“大湖地区”的一份有关各种冲突的调查,应该说是在外在性生产条件方面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份调查显示:“在该地区所发生的28次渔业冲突中(这个数据得到了该调查结果的使用者本人以及制定相应的规章制

度的政府部门的确认),运动性渔业(指把钓鱼当作一项体育运动——译注)与商业性渔业之间的冲突占了18次,运动性渔业与本地居民的渔业活动之间的冲突占了5次,商业性渔业与本地居民的渔业活动之间的冲突占了2次,商业性渔业中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冲突占了2次,还有1次是在大湖公园当局与商业性渔业之间发生的冲突。”<sup>29</sup>除此之外,在运动性渔业、商业性渔业与本地居民的渔业之间发生的三角性冲突有2次。

马克思在其理论著作中把市民社会解读为一种阶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人以及社会组织都只是资本范畴的人格化。譬如,银行家是银行资本的人格化,工人是可变资本的人格化,以此类推。由此,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譬如无产阶级化、资本家和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等)的规律之基础上的。与此相反,许多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市民社会是由国家所建构起来的。像米切尔·曼(Michael Mann)这样的左翼韦伯主义者甚至认为,“社会”只不过是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名称而已。在这些观点看来,市民社会的发展所遵循的是国家发展(譬如,福利体制下的职员阶层的形成)的规律,而不是资本的发展规律(至少在起初的意义上是如此)。

当然,市民社会不可能被归属在资本的结构或者国家的结构之中。它也依据其自身的、通常是无法让人理解的社会行为的逻辑而获得发展。譬如,尽管可以说,妇女运动如果离开了妇女的无产阶级化、强奸罪方面中的国家政策、青少年的正义感、关于流产的法律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就无法真正地被人理解,但是,从这一运动身上也能够看到其本身所具有的自主运动性、它的组织形式以及各种文化主题的相互作用等等。其他的社会运动也一样,包括传统的工人运动以及像和平运

动、都市运动、生态运动这样的“新社会运动”在内。

归根到底,对特定的生产条件的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条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过程之间的联系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社会、政治及官僚化过程的作用力的总和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冲突。这种发生在资本、国家和市民社会内部及相互之间的斗争,将会以一种非常复杂的、往往也是人所不知的、有时候甚至是根本不可能被人知道的方式,影响国家对生产条件的生产和/或者管理。譬如,在社区、城市管理当局、建筑公司、电气事业公司以及依赖于电和气的工业公司之间的斗争,往往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当时的人们根本无法对之加以分析——直到事件发生的许多年之后,这样的分析才有可能(譬如,在加州的汉福德,有一个以煤为燃料的同时生产电能和热能的工厂,它给“阿姆斯特朗橡胶公司”的一个橡胶生产厂供应蒸气,同时又把电能卖给一个垄断性的公用事业公司,即“大西洋电气公司”,这里所存在的斗争就是很复杂的)。土地、水及其他资源的演变和利用情况多半是许多不同的方面相互之间进行斗争的一种不自觉的结果。由此,在资本与其条件之间所出现的一致或协调的情况,更多的是一种例外,而不是一种规律之所然。或者说,这样的一致性可能是由许许多多的社会及意识形态力量相互作用而成的,这种作用力是如此的多样化,以至于我们今天还无法真正理解它们。或者(正像我们将在第8章中加以说明的那样),它还有待于通过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以凸显。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南部各州所实施的旨在重新构建劳动力市场、城市的基础设施、土地的生产率以及总体上的生产条件的那些“新分配计划”,就是一些很好的例子。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与其生产条

件之间的关系是由社会经济及政治领域内的斗争、意识形态以及官僚政治的现实这三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在市民社会和社会运动内部,以及在这些运动和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斗争,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平台上展开的。最为重要的是,国家对劳动及土地的所有权(商品市场上的所有权更是如此)的限制其实只是在长期激烈的斗争之后才建立起来的。社会内部的各党派之争引发了家庭主义的价值观念、传统以及宗教的回归,并使它们能为其自身对一般性的、外在的以及个体的生产条件的获得和使用方式找到合理的辩护。就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而言,其基本的意识形态前提是建立在以下这一事实之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果想维持其合法性,就必须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来行使自己的职能,或者必须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必须使自己同时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换一种说法,围绕着生产条件的生产而进行的斗争通常被视为比在工厂中所发生的斗争更为正统,围绕着市场所发生的斗争则更不用说了(指更不具有正统性——译注)。其实,国家机构是不可能公开地以资本或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为基础来合法地行使其职能的,它必须把自己建立在“一般利益”或福利的基础之上。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计划的制定者并不仅仅是资本利益的人格化,其本身还是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公民观念以及资本本身所限制的政治主体。在阿拉斯加的汤加斯国家森林公园中所发生的阻止砍伐那些年代久远的树木的斗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批评家们说,汤加斯森林公园在木材管理方面的状况充分地说明了森林署……已经完全丧失了其肩上所担负着的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管理和保护好公共森林的责任感,再没有别的什么地方能比在这里更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失败了。”<sup>30</sup>



当然,在对“全体人民的利益”的内涵的理解方面的确还是有很普遍的争论的。对环境主义者来说,这一范畴意味着为了现在的人们及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保护那些年代久远的森林;而对于木材界的业内人士来说,这一范畴的内涵是工作机会、利润、税收以及“经济增长”。于是,有关生产条件的争论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转向了对“一般利益”这一范畴的内涵的争论,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一般利益”这一范畴是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 20 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自由企业”以及“个人主义式的自由”等语境中被建构起来的。

- 155 国家生产出了,或者说管理着获得、使用以及脱离包括“环境”在内的生产条件的整个过程。当然,即使是(或者说特别是)在最好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没有理由相信国家在劳动力的供应条件、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环境等方面的政策,会以一种面向总体资本的再生产的方式而被建构起来。存在于不同种类的资本之间、国家及市民社会内部以及资本、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各种冲突,使在资本及其条件的关系问题上的任何功能主义理论成为不可能。<sup>31</sup>资本主义的生产及其有利可图性将会大成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由马克思所发现,其后又由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加以发展的那种资本的内在矛盾的缘故。个别资本简直无法以恰当的方式把作为首要的以及最为特殊的使用价值而存在的生产条件,转化为交换价值。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条件——以及生命本身的条件。资本在以后的日子里仍有可能对其自身的生产条件进行有计划地损害或破坏,国家如果仍然按照现在的这个样子发展下去,那么,必将仍然无法对这些生产条件进行理性地保护和重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以下这一点都是非常明确的:环境破坏的问题不应该仅



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与自然界的危机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当然,正是这个国家——如果能处在市民社会的民主化控制之下——将会成为重建自然界,以及重建我们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基礎。

### 注 释

1.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44年版),第131页。“生产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这一过程被建构在市场交换的内在机制之上,那么,人和自然界就必然会被带入到市场交换的轨道中间;他们必然会受制于供应和需求的规律,即被当作商品来对待,当作一种为了出售而被生产出来的物品来对待”(第130页)。

2. 迈克尔·雷波威茨(Michael Lebowitz):“资本的单面性”,见《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2年冬季号(第14卷),第4期。

3. 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伦敦:劳伦斯与威夏特,1943年版)。

4. 卡洛斯·卡伯尼(Carlos Carboni)用“社会再生产条件”的范畴去概括马克思的“生产条件”概念(与本书作者的私人通信,1988年)。我在这里则仍旧使用“生产条件”的概念,因为,我想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及基本理论来重新阐释一些问题,同时也因为我的讨论仅限于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危机态势,而不是把整个社会形态的社会性再生产过程全都包括在里面。

5. “……如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得以维持,那么,对劳动所拥有的权力就决不可能被理解为对自我的本质特征的建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的本质特征就是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被买卖,那么,这个人就必将丧失任何一种自由的外表,沦为市场力量之相互作用的某种结果。在把他作为一个人的本质属性出售给别人的过程中,他所完成的是与他自身——他真正的自我——相异化的过程。由此,当我们在界定任何一种在市场中可以被交换的东西的时候,就必须把它与真正的个人选择(即个人作为自我而存在的核心本质)区 156

分开来,自由主义观点对上述这种作法当然是不可能听之任之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每一个个人所具有的任何一种精神及身体方面的力量、任何一种能力和感受性,如果它在市场上被买卖……那么,就必须被界定为是与其‘自我’相异化的,这时候的所谓‘自我’只能被理解为那些异化了的属性的所有者,如果说这种情况仍然是游离于商品化的逻辑之外的话,那只不过是一种主观上的认定……通过这种方式,即使当一个人在出售其私人属性的时候,他也可以假装说,他并没有在被出售,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体制也因此而维系着其人性尊严的外表。在这里,那些被肢解、被交付给其他人来进行统治的,其实不是‘我’,而只是‘我的东西’”(理查德·里奇特曼:“通过人性的方式来进行人性的再生产”,见《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1990年第4期,第36—37页)。

6. 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25页。

7. 参阅梅里奥·匹安塔(Mario Pianta):“生产的条件:一个注释”,见《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1989年第3期。在这一问题上最为彻底的观点是梅里诺·弗林(Marino Folin)提出的,参见其论文:“公共事业、公共工程及社会化的固定资本: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条件’的资本主义生产”,见《都市及地区性研究国际学报》,1979年9月(第3卷),第3期。

8. 引自匹安塔:同前引文,第131页。

9. 希尔施(J. Hirsch):“国家机器与社会再生产”,参见约翰·霍劳威(Hohn Holloway)和苏尔·皮克西奥托(Sol Picciotto)主编的《国家与资本》(伦敦:E·阿尔诺德,1978年版),第92页。

10. 引自匹安塔:同前引文,第131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纽约:兰道姆,现代图书馆版,1936年),第562页。

12.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8年版),第2卷,第515页。

13. 当资本被投入在非常肥沃的土地、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地区,同时又不存在地主阶级的竞争的条件下,它所能获得的“超额利润”不

属于此处所谈论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些“超额利润”实际上假设了资本对土地的垄断权,而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这种由特定的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权力是必须被当作问题来提出来的。

14. 分别可参见唐纳德·伍斯特(Donald Worster):《自然系统:生态学之根》(戈登城,纽约:达布戴,1979年版);哈利·克里弗(Harry Cleaver):《对资本的政治学阅读》(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戴维·哈威(David Harvey):《意识与城市化经验》(巴尔的摩,马里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亨利·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和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al Castells)的著作中,“都市”这一范畴也被“主体化”了。

15. 迈克尔·佩雷曼(Michael Perelman):“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的理论家的马克思”,见《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1993年6月(第4卷),第2期。

16. 休·莫斯利(Hugh Mosely):“资本与国家:西德的新正统国家理论”,参见《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2年春季号(第14卷),第1期,第25页。

17. 阿波·奥米鲁迪(Aboo T. Aumeerruddy)、布鲁纳·劳迪尔(Bruno Lautier)、罗曼·托塔加达(Roman G. Tortajada):“劳动力与国家”,参见《资本与阶级》,第6期,1978年秋季号,第50页。

18. 弗林(Folin):同前引文,第51页。

19. 希尔施:同前引文,第91页。

20. 匹安塔:同前引文,第130页。

21. “汤加斯国家森林公园,由一群被常绿植物所覆盖的小岛所组成,葱翠的山谷几乎环抱着500英里长的阿拉斯加狭长地带。然而,在这一地区,森林署在伐木计划上所投入的每一美元中,有98美分的钱是被浪费的。批评家们说,汤加斯的木材管理方面的情况充分地证明了森林署所花的大部分钱实际上是在促成对环境和纳税人有害的行为。这些批评家说,这样的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了为全社会的利益而保护和管理公共森林的责任感,这种失败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确凿的证据”(蒂莫西·埃刚:“葱翠的阿拉斯加森林中的伐木业 157使公司获利,但使美国受损”,见《纽约时报》,1989年5月28日);同时

也参见“补助金在损害环境：批评家在正式讲话之前的言说”，见《纽约时报》，1997年6月23日）。

22. 资本及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是第8章所要探讨的主题。

23. 阿里克斯·德米罗维克(Alex Demirovic)：与本书作者的私人通信，1994年5月。

24. 戴维·比瑟姆：《官僚统治》(明尼阿波罗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25. 同上，第52页。

26. 托马斯·麦克凯恩(Thomas McKeown)：《人类疾病的起源》(牛津：巴塞·布莱克威尔，1988年版)。

27. “福利”、“足够的教育”、“公共健康”等观念之所以具有很长的历史，其实是与“个人条件”的供应直接相关的。那种明显地带有哈罗德·哥登斯(Harold Geddes)以及弗兰克·利奥德·怀特(Frank Lloyd Wright)的思想印迹，受到无政府主义观念的影响，并且反对勒·考布西尔(Le Corbusier)的整体主义观念的城市设计与规划的历史，是与“一般的、共同的条件”的供应情况相关的(彼得·霍尔：《明天的城市：对20世纪城市设计与规划的一种理性的历史分析》，牛津：巴塞·布莱克威尔，1988年版)。最后，围绕着自然观念所展开的斗争的历史，譬如基督教的启蒙观念与异教徒的浪漫主义观念之间的斗争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外在条件”的供应情况相关的(伍斯特：同前引文)。

28. 莫斯利：同前引文，第26页。

29. 托马斯·威伦斯(Thomas Whillans)和弗克雷特·贝克斯(Fikret Berks)：“利用与滥用，斗争与和谐：处于转型状态中的大湖地区的渔业”，参见《选择》，1983年(第13卷)，第3期，第10—19页。

30. 埃刚：同前引文。

31. “对国家政策问题上的机械主义观点的排斥，使我们能够看出，这种观点是想把国家政策的制定当成一个只能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分析来加以阐释的开放性的过程。希尔施的观点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希尔施在阐明了‘一般性生产条件’的供应是国家的一个基本功能的观点之后，强调指出，仅从这一点出发，既不能断定国家在某个历史时刻的‘基础设施的供应’的具体目的必然是什么，也不能断定国家机

器到底能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希尔施:同前引文,第91页)。由此,希尔施得出结论说,“试图给基础设施下一个经验性和终极性的定义,是没有意义的,正像给以社会过程及阶级力量的平衡为基础的国家所提供的‘一般条件’下个定义是无意义的一样。”(同上,第92页)。“由此,国家与资本、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特殊要求之间的矛盾便有了多种可能的发展空间。”希尔施继续说,“由于这些‘一般性的社会生产条件’并不能主动地适应于资本积累,因此,当资本积累过程达到了这些条件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时,危机就会公开地爆发”(同上,第74页)。“按照这种思路,国家政策的发展无非是资本积累过程以及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具体的联合方式的一种连带结果;于是,这些作为连带结果而存在的‘一般性的生产条件’的发展是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直接相关的”(梅里奥·匹安塔:《国家投资与城市重建:以图林(Turin)为例(1960—1978)》,博士论文,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1983年,第82—83页)。

## 导 言

本章所要阐述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资本的生产过剩及经济危机、以及由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新整合进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性，以及由此而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性的形式中去的过程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这种阐释为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供了出发点，这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生产不足与经济危机之间的矛盾、以及由危机所导致的把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重新整合进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性以及由此而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性的形式之中的过程。

资本的生产过剩与资本的生产不足这两个

过程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可以相互弥补或相互补偿,并以此而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出一种相对稳定的外表(详见本章的附录)。在新的全球化经济的视域中对上述两个过程的联合发展性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认清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劳工及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会衰落以及“新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兴起(可参见本书的导言)。正像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传统的劳工运动实践的阐明一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要阐明的是新社会运动的实践。尽管生态学与自然;身体的政治学、女权主义和家庭;都市运动及其他的一些相关主题往往是被置放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来加以讨论的,但是,本章中的话语言说则是明确地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出发的,其目的也明确地在于引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相关人士的理论兴趣。应该说,这些人的理论研究都是在一种社会性及科学性的言谈空间中进行的,他们的理论研究是几乎不可能与那些就资本在(后)现代世界中与自然(包括人类本身的自然属性)的利用与滥用问题所展开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相吻合的。当然,这里对政治经济性或“科学”性言说的强调是一种战术上的,而不是战略上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那些自主性的社会关系以及许多的非资本主义者或反资本主义者,组成了“市民社会”,因此,对这种“市民社会”的研究就必须置放在其自身的实践和理论术语上来进行。换句话说,社会的和集体性的行为并不能仅仅被解读为本章中所要讨论的那些有机整体性力量的产物(可参见本书的第三部分)。

1944年,卡尔·波兰尼出版了他的那本重要著作——《大转型》,在这本书中,他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市场与经济关系的发展对其自身的社会及环境条件所构成的损害或毁坏的程度。<sup>1</sup>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早期,生态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以及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主题重新被介绍



进了西方思想之中。这种作法所产生的结果是很复杂的并且往往也是非常难以捉摸的。在由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罗马俱乐部的技术统治主义、浪漫性的极端生态主义以及联合国的世界同一论<sup>2</sup>等观点所构成的陈旧及晦暗的思想星空中,波兰尼的著作犹如一道划过的闪电。因为,在上述这些观点中,阶级剥削、通过危机来进行的资本主义积累、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的及联合性的发展、民族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许多相关的主题都处于缺失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上述这些对资本主义、自然及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模式必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它们没能把理论关注点集中在资本主义独特的稀缺性所具有的理论意义的问题上,也就是说,没能关注资本自我设置障碍(或限定性)的过程,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资本在使人类无产阶级化、劳动力的异化、劳动力的利用以及外在自然及“都市”的资本化等方面所采取的形式是自我破坏性的。<sup>3</sup>在对“增长的极限”的辨析问题上,通常的研究往往是依据“资源的稀缺性”、“生态的脆弱性”、“工业技术的有害性”、“有些文化价值所具有的破坏性”、“与普通百姓有关的一些悲剧”、“人口过剩”、“浪费性的消费方式”、“生产的单调性”等因素来进行的,这种研究不是忽视就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界及资本主义积累与发展之形式问题上的历史生成性理论。

这一点也用不着奇怪,因为马克思本人在他的理论阐述中的确较少地涉及资本由于对其自身的社会及环境条件的损害,因而导致资本的成本及花销的增大,从而威胁到资本获得利润的能力,也就是说,带来了经济危机的潜在威胁的问题,马克思对资本由于上述原因而导致的对其自身的发展所构成的限制的程度问题谈得较少。同样,马克思对围绕着生产条件的供应而展开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斗争对资本的成本、花费

及变化性(灵活性)的影响问题也谈得很少,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涉及。另外,马克思除了在不同的工业部门所具有的不同经济规律性,对资本的周转与再生产所起的作用的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以及他在地租问题上所做的一些扩展性讨论(譬如,就土地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原材料与工业生产之间的物质的和经济的联系等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之外,对生产条件的物质维度与社会维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没有展开理论分析。当然,对马克思来说,至少有以下三点是可以被确认的:第一,生产条件或“自然条件”的短缺(“歉收”)会引发经济危机。<sup>4</sup> 第二,在一种更为总体性的视域中,马克思相信,尽管有些妨碍生产的因素的确是外在于生产方式的(譬如,“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是由身体条件所决定的”)<sup>5</sup>,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妨碍性因素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把自己表现出来。<sup>6</sup> 换句话说,有些妨碍性因素是“一般性的”社会都具有的,它们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专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是那些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把自己表现出来的妨碍性因素。第三,马克思相信,资本降低了自然的价值,譬如,资本主义的农业对土壤是有害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无论是从身体的角度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工人都是有害的,这种剥削方式还对社区产生破坏作用。

总而言之,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的农业(以此为例)毁坏了土壤的质量。他还认为歉收最终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虽然他的确说过,一种理性的农业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相融的),<sup>7</sup> 他从来没有考虑以下的这种可能性:对生态具有破坏作用的那些农业耕作方式会提高资本的各种要素的成本,这一点反过来又预示着一种独特类型的经济危机,即资本的生产不足的危机的来临。<sup>8</sup> 换句话说,马克思没能把多方面的因素统一起来,并且阐明“自然性的妨碍因素”有可能是由资本

化所导致的,即“第二重”的资本化的自然。<sup>9</sup> 马克思虽然作出了暗示,但始终没有发展出如下的观念: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在危机及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理论。

## 两种类型的危机理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向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论,其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sup>10</sup> 这种矛盾的一个特定形式是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或被剥削)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的生产与周转之间的矛盾中的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来自于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转型的最直接目标。这种社会转型具体体现在政治制度、国家及生产和交换过程的转变上。

与此相反,在经济危机及向社会主义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sup>11</sup>理论,其出发点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或者说“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sup>12</sup>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对生产条件的三种不同类型作出了界定。第一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sup>13</sup>,或者说是进入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中的自然要素。第二种是“生产的个人条件”,它指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第三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譬如“运输工具”。<sup>14</sup>

今天,“外在的物质条件”被置放在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大气中臭氧含量的足够性、海岸线及分水岭的稳定性、土地、空气及水资源的质量等问题的语境中来加以讨论。“劳动力”被置放在劳动者的身体及精神状况、劳动者社会化的程度及类型、劳动关系的异己性及劳动者克服这种异化的能

力、作为社会生产力及总体性的生物有机体的人类自身等问题的语境中来加以讨论。“公共的条件”被置放在了“社会资本”、“基础结构”及其他一些因素(包括最近才有人提出的“社区资本”)的语境中来加以讨论。暗含在“外在的物质条件”、“劳动力”及“公共的条件”这些范畴之中的,是空间及“社会环境”的范畴。因此,我们把“都市空间”(“都市的资本化了的自然”)以及其他的空间形式包括在生产条件的范畴之中,这些空间形式规范着人们与“环境”<sup>15</sup>之间的关系,同时,其本身也被这种关系所规范,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环境的形成。简而言之,生产条件包括商品化或资本化了的物质和社会行为,当然,商品的生产、分配与交换(严格意义上的)本身除外。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之间的这种特定形式的矛盾,同时也存在于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新社会运动”或包括生产内部的斗争在内的社会斗争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上述这种生产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有毒废弃物的生产与排放、自然资源及都市空间的利用等问题而展开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社会关系(譬如,作为社会关系之结构性体现的国家与家庭,以及就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新斗争”而言的生产关系本身),构成了社会转型的直接目的。这种转型最直接地体现在生产条件(譬如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土地的使用模式以及教育等)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客观过程,和生产过程本身之中,这当然也是就发生在资本主义工厂内部的新斗争而言的。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危机是以“实现维度上的危机”,或者说资本的生产过剩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的。而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中,经济危机则是以“流动性危机”(“liquidity crisis”),或者说资本的生产不足的形式表现自身的。在传统的理论中,经济危机是一口“大锅”,资本在其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重新整合,以使这两者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更为社会化。譬如,通过合并而获利、具有预示性的规划、公司的网络化运行、民族化、利润共享的模式等等。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经济危机虽然也是一口“大锅”,但资本在其中重组的却是生产的条件,是为了让各种生产条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更为社会化的特征,譬如,可持续性生产的森林、垦荒、对区域性土地的使用和资源的规划、人口政策、健康政策、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有毒废弃物排放的管理等等。

在传统的理论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更为社会化的形式的发展,被认为是向社会主义(生产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生产条件的更为社会化的供应模式的发展同样也被认为是向(生态学)社会主义转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但“生态学社会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模式的想像在内容上是有很大不同的。第一,从生产条件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斗争具有很强烈的、独特的、有时也是“浪漫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维度,因而,它们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第二,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的很多技术、劳动形式以及物质发展过程本身的意识形态,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问题,而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总而言之,“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有两条,而不是一条,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有两种趋势都能够导致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程度的增加(虽然从具体的历史过程来看,也许有相反的情况发生)。

##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充满危机的 资本主义制度的阐释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的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矛盾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而且还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对工人的剥削为基础)。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过程,资本家在这一过程中从工人阶级身上所榨取的不仅是社会必要劳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而且还有剩余劳动。其他任何事情也都一样<sup>16</sup>,任何一种既定数量的剩余价值(或任何一种既定的剥削率)的创造,都将导致商品的市场需求的一定程度的不足。或者,反过来说,任何一种商品的市场需求的不足,都是以一定数量的剩余价值的创造或某种既定的剥削率为前提的。再进一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数量越大,或者说剥削率越高,那么,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市场上使自身获得实现的难度就越大。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在于,那种购买剩余劳动产品所需的额外的商品需求源自于何处?人们对这一问题往往会这样回答:这种需求源自于资本家阶级的消费、与预付工资及消费需求的变化无关的资本投资、由这些新的投资所创造出的市场、由于企业、消费行为及政府信用的扩大而导致的新的投资、消费及政府开支、从其他资本或其他国家的资本所夺取过来的市场份额。当然,对价值实现问题(即维持一定水平的商品需求总量,并使之足以能在不导致经济危机及不使固定资本贬值的前提下,保证一定的利润率水平)的这种“解决方法”,其实会带来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的潜在“问题”。资本主义的



消费是对剩余价值的非生产性的使用,资本在以尽快出卖商品为目的的流通领域中的运用也是如此。新的资本投资可能会比新的消费需求发展得更快,或者说,新的资本投资的发展是独立于新的消费需求的发展的,但不管怎样,这都会使在将来出现比例失调的危机或更为严重的价值之实现性危机的可能性加大。尽管一种发育良好的信用制度会不受工资增长之情况的影响而独立地完成扩大商品需求的功能,但这种建立在消费信用或抵押信用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工资增长速度的基础之上的消费需求的扩大,无疑会把潜在的资本生产过剩的危机转型为资本的生产不足的危机。更有甚者,信用体系的任何一种扩大,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会带来债务、金融投机以及金融结构的不稳定,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体制的危机。从别的资本那里夺取市场份额,意味着(市场的)集中以及资本的集中,而这将会使价值的实现问题在以后的日子里变得更加糟糕。或者,由于弱小资本的被破坏,因而,社会的不安定性将会凸显出来。与此同时,还可能会出现政治上的不稳定、国际间的残酷竞争、保护主义以及战争等等。总而言之,经济危机除了传统的“实现性的危机”之外,还会以其他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譬如流动性危机、金融危机或金融崩溃、国家的财政危机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趋势。当然,不管历史性的危机呈现出什么样的特殊形式(上述所列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决非仅此而已),不管这些危机的发展过程以及解决方案是什么,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如下这个以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状况为基础的理论前提: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



##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作为危机 依赖性制度的资本主义及其 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的阐释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不仅充满了危机,而且还是依赖于危机而存在的。资本通过危机而进行积累,这就像一种经济必然性的机制一样在起着作用。危机给资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能够对自身进行重新整合,使自身理性化,以便使它能重新获得剥削劳动以及资本积累的能力。资本往往会采用两种一般性的、同时也是相互依赖的方法,通过调整自身来利用危机,并以一种有利于资本自身利益的方式去解决这种危机。第一种方法是对生产力开始调整,第二种方法是对生产关系加以调整。不管是哪一个方面的调整,都需要或者说都是以个体资本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国家内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新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协作形式为前提的。协作性或规划性的程度越高,由此而导致的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程度也就越大,同时,对商品及资本的拜物教,或者说资本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性”特征的颠覆就越彻底。由此,危机在本质上就创造出了一种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可能性。

那些一直努力地在维持或恢复利润的资本,由于经济危机而在生产力方面所做的调整(譬如通过技术改进来降低单位成本、增加生产的灵活性等),在以下这些方面都能起到系统性的作用: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使购买原料的费用更便宜或使这些原料的利用更有效、缩短生产和流通的周期,等等。不管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以增加利润为目的

的、对生产力因素的重新调整是其必然的结果。再者,由危机所引发的对生产力因素的调整,意味着或者说是以生产关系的更为社会化的形式(譬如,生产过程中的更为直接的协作方式<sup>17</sup>)为前提的。在今天,生产力方面的调整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的例子有很多,譬如,由计算机控制的、灵活性的生产系统以及机器人技术等,这些都是与在工作场所以及利益共享方面的“有创造性的团队作战”及其他的协作形式的发展相联系在一起。当然,人类的协作无疑是最大的生产力。科学事业,或者说理论及实践知识的社会生产过程,几乎已经完全地变成了一种协作性的事业,<sup>18</sup>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危机所导致的结果。

资本重构自身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由危机所导致的以下领域内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来完成的:资本内部及资本之间、国家内部、国家与资本之间(其目的在于增强对生产、投资、市场等过程的控制,譬如规划性更强的机构的设置)。从历史上看,规划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民族主义、财政政策的调控、预示性的计划),从政治的维度上讲,当然也包括法西斯主义、新理想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管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以增强对劳动力、原料供应及其他因素的控制为目的的生产关系的重组是其必然的结果。再进一步,由危机所导致的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暗含着或者说是以生产力方面的更多的社会化形式(譬如,更为直接的协作方式)为前提的。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在今天的表现包括高科技资本之间“战略性协定”、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强力干预、通过接管和合并而形成的资本集中。这些变化分别意味着高科技秘密的共享或技术人员的社会化、新的金融控制形式以及管理体制和生产体制的重构。

## 走向一种对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不管是人类的劳动力、外在自然界还是基础设施(包括这一范畴在空间和时间双重维度上的内容),都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而被生产出来的,尽管在资本眼里,这些生产条件只不过是商品或商品化的资本。正是由于一方面,这些生产条件不是为了资本而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可另一方面,它们又好像就是为了资本而被买卖和利用的,所以,这些条件的供应(质的和量的方面、时间和空间的方面)就必然会由国家来进行管理,并把它们当作国家的所有物。虽然自然的资本化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本进入生产条件的领域(譬如,人造林的建设、经过基因选择了的物种、私人的邮政服务以及以证书为目的的教育等),但国家会把自身置于资本与自然之间(或者说对之进行调整),这种作法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政治化。这意味着,资本是否能够以其所需的质量和数量要求、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获得原料、所需的技术性劳动力以及有用的空间及基础设施的构型,要取决于以下这些因素:资本的政治力量、对生产条件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进行挑战(譬如,在把土地当作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的问题上的斗争)的社会运动的力量、对生产条件的使用及界定问题上的斗争进行调节或审查的政府机构(譬如,对城市进行分区制管理的委员会)的作用等等。<sup>19</sup>除了那些管理货币、法律与次序以及某些外交事务(即与涉足国外的原料及劳动力资源没有明显的联系的那些

165

外交事务)的政府部门之外,每一个政府机构以及每一种政党的行为都可被视为资本与自然(包括人类本身以及空间在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产物。简而言之,资本在积累过程中是否会碰到“外在性的障碍”(包括以就生产条件的界定及使用所展开的新社会运动的形式而出现的外在性障碍,即处在内在的或特殊的与外在的或一般的障碍之间的“社会性的障碍”)<sup>20</sup>、这些“外在性的障碍”是否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经济危机是否会以有利于资本的方式,还是会以不利于资本的方式得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首先是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其次才是社会经济的问题。这是因为,(正像我们在第7章中所说的那样),生产条件(与生产过程本身不同)在本质上已经被政治化了,通达自然界的途径被各种斗争所中介,外在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政治身份及主体性处于缺失的状态。<sup>21</sup>劳动力(以及所在的社团)也只是围绕着他们自身的福利条件以及广义上的社会环境而展开斗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阐释,主要聚焦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通过损害或破坏,而不是再生产其自身的条件(这里的“条件”是从社会的和物质的双重维度上来加以界定的),而具有的自我毁灭的力量。这种阐释着重分析的是对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的自我扩张的过程、国家对生产条件的供应的管理、围绕着资本对生产条件的利用与滥用而进行的社会斗争等问题。对其中的主要问题——资本通过破坏其自身的生产条件,是否给自己设置了发展的障碍或限制?——的回答,不仅需要站在交换价值的维度上,而且还需要站在特定的使用价值的维度上。这是因为,生产条件不是作为商品而被生产出来的,因此,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就必然是“个案式的”,譬如,个人的身体就是一个独特的“个案”。对第二个问题——资本为什么会

损害其自身的条件?——的回答,必须立足于对资本的自我扩张理论、资本所具有的趋向于否定个案性原则的普遍化趋势、它在劳动力所有权、外在自然及空间等方面的缺乏、以及由此而来的(在没有国家或垄断集团的资本主义计划的前提下)资本在阻止自己损害其自身的条件方面的无能等问题的研究。第三个问题——那些反对损害生产条件的社会斗争(这些社会斗争对自然的资本化进行抵制,譬如就环境、公共健康、职业健康及安全、城市问题等所展开的社会运动)为什么有可能会损害资本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则需要放在围绕着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维度来界定的条件而展开的斗争的理论层面上来加以回答。 166

有关资本主义的积累损害或破坏了资本本身的条件,并由此而威胁到其自身利润的获得及其生产和积累更多的资本的能力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大气变暖无疑会对人类构成破坏作用,它摧毁人们的住所,破坏业已获得的利益,更不要说对其他物种所构成的破坏作用了。酸雨对森林、湖泊及建筑物构成破坏,由此对人们的利益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地下水的盐化、有毒的废弃物以及土壤的蚀失对自然界构成了破坏,从而也降低了自然界的可利用性。农药的生产在破坏自然界的同时,也损害了人们的利益。城市资本对“城市改造工程”的操纵,损害了城市自身的条件,从而也破坏了人们的利益,譬如,人们将不得不承受拥挤的交通和高价的地租等。<sup>22</sup>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及美国的那些自然条件比较落后的州的情况。在这些州中,教育、福利、卫生保健以及其他领域内的物化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sup>23</sup>上述这种思维视角同样也适用于对“生产的个人条件……劳动力”的分析,因为,资本对那些已经建构起来的社区及家庭生活模式构成了破坏,它引进了那种对人的创造性技能有损害作用的劳动关系,并

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有害的社会环境。立足于这样的角度,我们当然可以把“稀缺性”这一概念引进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之中。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费用一旦持续上升,我们还可以引入资本的生产不足之可能性的思路。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资本主义的劳动与家庭关系所需要的维持健康的费用;吸食毒品及使吸毒者恢复健康的费用;为了补救遭到破坏的社会环境而花掉的费用(如警察和离婚的费用);用来阻止对环境的进一步破坏以及整理或修复那些在过去已经遭到破坏的生态遗迹所需的庞大费用;发明、发展以及生产那些可以作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生产对象、消费对象的替代品的东西(有“自然性的”,也有人工的)所需的费用;偿付给石油巨头和能源公司的那些巨额费用,譬如地租和垄断利润;处理垃圾所需要的费用;为解决拥挤的城市空间而额外所需的费用;第三世界的政府、农民和工人为了应对生态及发展方面的双重危机而不得不花掉的费用等等。没有人统计过,为了弥补那些遭到破坏或已经失去的生产条件、为了修复这些条件以及发展出相关的替代品,所需的总费用到底有多少(至于在这些总费用中,有多少真正地落在了资本的头上,就更没人去统计了)。有理由相信,用于保护或重建生产条件的总支出,也许会在社会的总产出中占有二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份额——从自身不断扩张的资本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都是非生产性的开支。这些非生产性的支出(以及那些预期在将来所要花去的费用)能否与当今世界普遍盛行的信用及借贷体制联系起来?能否与虚设资本的增长联系起来?能否与国家的财政危机联系起来?能否与生产的国际化联系起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把信用/借贷的结构解读为资本生产过剩的结果。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把这种现象解读为资本的生产不足以及对所创造出的资本的非生产



性利用的结果。这些不同的理论倾向之间是一种相互加强还是一种相互抵消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抱理论偏见的话，那么，<sup>167</sup>很显然，这一问题非常值得加以认真地研究。

### 走向对充满危机的、具有危机依赖性的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向社会主义转型的 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释

不管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能够发展出一种理论，来解释由危机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条件的建立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由危机所导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由削减成本、增加劳动强度、对资本结构进行重组等方面的需要所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向更具社会性的形式转型的趋势。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就像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样），资本主义不仅是充满危机的，而且也是具有危机依赖性的。由危机所导致的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不管这种危机本身是源自于资本的生产过剩、资本的生产不足，还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有），同样也是由削减成本、降低地租、增加灵活性等等，以及对条件本身的重组（譬如，可以通过预防性卫生保健的发展、重新植树造林、对城市空间的重新规划以及其他各种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方式）的需要所决定的。

资本（在国家的帮助下）经常会采用两种一般性的、同时也是相辅相成的方式，来改变自身的条件，以应对处境危机，并且以有利于资本利益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危机：一种是在生产力条件方面的变化，另一种是条件的再生产的社会关系方



面的变化。不管是哪个方面的变化,都需要或者说都是以资本与资本之间以及每个资本的内部、资本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新的协作形式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人类与自然之间、人类个体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更具社会性的管理形式为前提的。这种更深层次的协作会使原来就已经被政治化的生产条件更具政治性,从而对资本这种客观存在所具有的“天然性”的表象进行颠覆。由此,我们可以说,危机在本质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使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图景显得更为清晰。

由危机所导致的生产力这种条件方面的变化,其目的在于维持或恢复利润的水平(譬如,通过技术革新来降低人口拥挤所付出的代价,在原料的利用方面增加灵活性等等)。这种变化的确对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使原料更容易获得以及其他各种降低成本和增加灵活性的措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管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对生产条件的重组,始终是这种危机所能导致的必然结果。更进一步,由危机所导致的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意味着,或者说是以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更加社会化的社会关系形式(譬如,在生产条件领域内的更为直接的协作形式)为前提的。生产条件在今天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对农作物害虫的综合性处理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以农民之间的更为有效的协作为前提,而且以培训及教育计划之间的更为密切的协作为前提。<sup>24</sup>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与艾滋病有关的预防性的卫生保健技术,以及与此相关的社区关系朝着更为协作的方向的发展。

重构(生产条件)的第二种形式,是由危机所导致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以对生产条

件实施更为有效的控制,即增加对之的计划性为目的。从历史上看,计划曾有过多种形式,譬如城市及区域性的交通及健康计划、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计划等等<sup>25</sup>。不管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以增强对生产条件的控制为目的的这种社会关系的重构同样也是其必然的结果。再进一步,由危机所导致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预示着或者说是以作为生产力的生产条件的更为社会化的形式为前提的。这种变化在今天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有计划地”对付城市的烟雾,这是以各种协会和组织联合起来(政治性地协作起来)使各种协作性的、但又是很麻烦的降低烟雾的措施得以合法化为前提的。<sup>26</sup>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回收利用局”的重建计划,水资源政策方面的许多的新的技术性的变化都是以此为前提的。<sup>27</sup>

简而言之,危机有力地促使了资本与国家对生产条件实施更为有力的控制或更为有效的计划(对资本本身的生产与流通也起同样的作用)。我们几乎可以确信,全球资本主义这种新的体制的第一次主要的危机,将会给那些新的具有国际性计划的机构(譬如,那些已经存在于国际性银行业中的机构)带来机遇。危机会促进可变动性的计划以及有计划的变动性的新形式的出现,这些新形式将加大一种更具变动性的资本主义与一种更具计划性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其程度要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国家机构(渐渐地变成了国际性的机构)在生产条件的供应方面的核心作用,而对生产及流通过程的重建的阐释强得多。危机迫使资本及国家面对其自身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后来被移置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环境的维度之中(从直接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中被移出了两次),在那里,它们被赋予了更为社会化的生产条件形式,这些生产条件有从物质性的角度来界定的,也有从社会性

的角度来界定的(譬如,在城市的再发展、教育改革、环境计划以及其他的生产条件的供应形式方面的政治上的两党关系)。当然,在生产条件的维度(生产本身的维度上也一样)上,技术与权力无疑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政治协作的新形式所凸显出的,只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初始前提。再者,除了在一种非常抽象的层次上之外,“社会主义的来临”是不可能具有先验性根据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当资本主义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而转向生产条件的供应方面的更为社会化的形式时,它是自我解构或者说自我颠覆的。这种说法(就像当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一样)是以下列观点为前提的:任何一种既定的作为生产条件的技术和劳动关系,都是与不止一种的把这些条件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相一致的,同样,这些社会关系中的任何一种既定形式,也都是与不止一种的作为生产条件的技术和劳动关系形式相一致的。因此,社会关系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力量之间的“一致性”就被界定为是非常松散的和易变的。在危机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从根本上说,未来是不明确的),存在着一种双向的奋争,它不仅要使生产力维度上的新的生产条件适合于生产关系维度上的新的生产条件,而且还要反过来,使后者适合于前者。当然,使生产力维度上的生产条件适合于更为社会化的形式,这决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存在一种向社会主义发生自我转变的“自然”趋势。譬如,城市的规划机制,也许可以说成是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向社会主义所迈出的一步,但仅此而已。的确,这是朝向生产条件的供应的更为社会化的形式迈出了一步,并从而至少使社会主义变得更加让人能够理解。地区性的交通网络、卫生保健服务以及生态区域性的水资源分配(以此为例)或许可以,但或许不可以被视为向社会主义迈出了一步,不过,它们显然是向生产条件的供应的更为社会化的形式迈

出了一步。

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范围内,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新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式几乎是数不胜数的。当今的世界性危机似乎会导致更多类型的社会形式,同时也需要许多附加的社会形式,这些社会形式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维度上的,而且也是生产条件维度上的,虽然这些社会形式的制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内容是很令人费解的,并且往往也是相互矛盾的,虽然这些形式不应该被认为是不可逆的(譬如,私有化历程的回潮以及对规章制度的解构等等)。上述观点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其理论意义显然受到了低估。当然,可以想像,我们正处于一种漫漫征途之中,在这里会出现许多种不同的、但又是殊途同归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马克思的观点与其说是错了,还不如说有一半是正确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建构”的过程似乎正让位于新型的“社会主义重构”的过程,这种重构是对人类本身与包括社会环境在内的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的重构——一种保护至上主义的政治观点(参见第20章)。以下的这种观点至少可以说是有可能成立的:在“第一世界”,社会主义的重构将被视为首先是希望得到的,其次是必须的;在原有的“第二世界”,同样首先是希望得到的,其次是必须的;在“第三世界”则首先是必须的,其次才是希望得到的。而下面的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更有道理:大气变暖、臭氧层减少、生物的多样性受到威胁、酸雨以及海洋的污染,将会使物质和社会生活的重构的更为社会化的形式成为绝对必不可少的。

把阐述的思路再扩展一些,我们就可以发现,工人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转向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式,譬如,集体性的讨价还价等。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推测,当今的女权主义、环境运动以及其他的新社会运动,正在“推

170 动”着资本和国家转向更为社会化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形式。对劳动的剥削(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或者说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导致了一种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会将自身转化为一种资本的“社会障碍物”的劳工运动。对自然的利用(包括对人类生物体本身的利用)会导致一种环境运动(环境主义、公共健康运动、职业健康和运动以及围绕着性别政治而组织起来的妇女运动等等),这种环境运动也有可能成为资本的“社会障碍物”。在20世纪80年代的尼加拉瓜,经济和生态危机的联合作用,以及旧体制内部的政治独裁,最后所导致的既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又是一次对生态发展的广泛的规划。

就像在资本的短期状况以及长远前途问题上一样,要想对最为广义意义上的环境主义运动作出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政治性阐释,就必须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譬如,酸雨会对生态和经济都构成破坏作用。环境主义运动要求对环境进行清理和恢复,并对自然界进行保护。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许会使利润得以恢复或者使政府花的环境清洁方面的费用得到降低,这与资本的短期或中期需要或许是一致的,但或许是不一致的。在政治性的社会环境运动的任何一种系统性的计划中,都蕴含着某些计划,这些计划阻止资本达及它的自我扩张的最大极限,这与那些处于特定语境中的资本的需要或许是一致的,但或许是不一致的。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对环境的破坏能够导致许多以对环境的恢复为宗旨的新型行业的诞生。试想一下湖泊疏浚机、森林清洁机、使土壤恢复元气的人、致力于恢复空气质量的人以及那些与酸雨作战的人们就可以了”。<sup>28</sup>这些高技术类型的解决方法,除非能够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并同时能够“解决”从传统的资本生产过剩中生发出来的任何一种实现维度上的问题,否则,它就将是对

剩余价值的一种很大的耗费。对社会环境的修复与重建需要一大笔信用货币,这无疑会把矛盾移置到金融与财政领域,其移置的方式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与资本的生产与流通之间的传统性矛盾被移置到今天的金融与财政领域中去的方式是相同的。

上述这种由技术所驱动的对生产条件的重构(包括由技术所驱动的对劳动力的供应条件的重构),对总体资本或个体性资本的短期或长远利益来说,或许是起作用的,但或许是不起作用的。其结果要依赖于其他的对危机的防范与解决措施、这些措施之间的结合情况以及它们与广义的自然危机之间的接合情况。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其结果将依赖于劳工运动、环境运动、社会连带主义运动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运动之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的程度。这些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管理上的问题。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由危机所导致的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都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国家控制、大型资本集团内部的更多的计划性以及一个在管理或组织方面更具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资本主义,即一个更少具有似自然性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将更具有政治性,它们将会被合法化——资本主义的具体化过程在其中将更显清晰。受到危机冲击的资本把更多的成本外化,为了流通领域中的价值的实现而对技术和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利用,以及与此相类似的其他因素组合在一起,迟早将导致“自然的反抗”,即以终止对生态的破坏为宗旨的强有力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在当今的危机时期,不管对其原因作出如何的理论阐释,资本总是试图缩短生产和流通的周期,这无疑会使环境主义的实践、健康及安全的实践等方面的情况变得更糟。因此,资本的重构会加深、而不是解决生态的困境。正像资本对其自身的市场



(譬如,获得性利润)的破坏一样,剩余价值的生产越是加大,资本对其自身的生产性利润的损害(譬如,增加成本和降低资本的灵活性)越是加剧,剩余价值的生产就越是建立在对广义的自然界的破坏性利用的基础之上。正像生产过剩的危机蕴含着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一样,生产不足的危机所蕴含的是对生产条件的重构。同样,正像对生产力的重构意味着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形式一样(反之亦然),对生产条件的重构意味着一种双向的作用——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力维度上的生产条件形式,以及更为社会化的社会关系形式,生产条件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被再生产出来的。简而言之,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形式、生产力形式以及生产条件形式总合在一起,便内含着一种转向社会主义形态的可能性。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由危机所导致的,这不仅是由于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是由于力量/关系与其条件之间的矛盾。因此,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同样,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由危机所导致的重新整合和重构(它们是以更为社会化的形式为发展方向的)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参见表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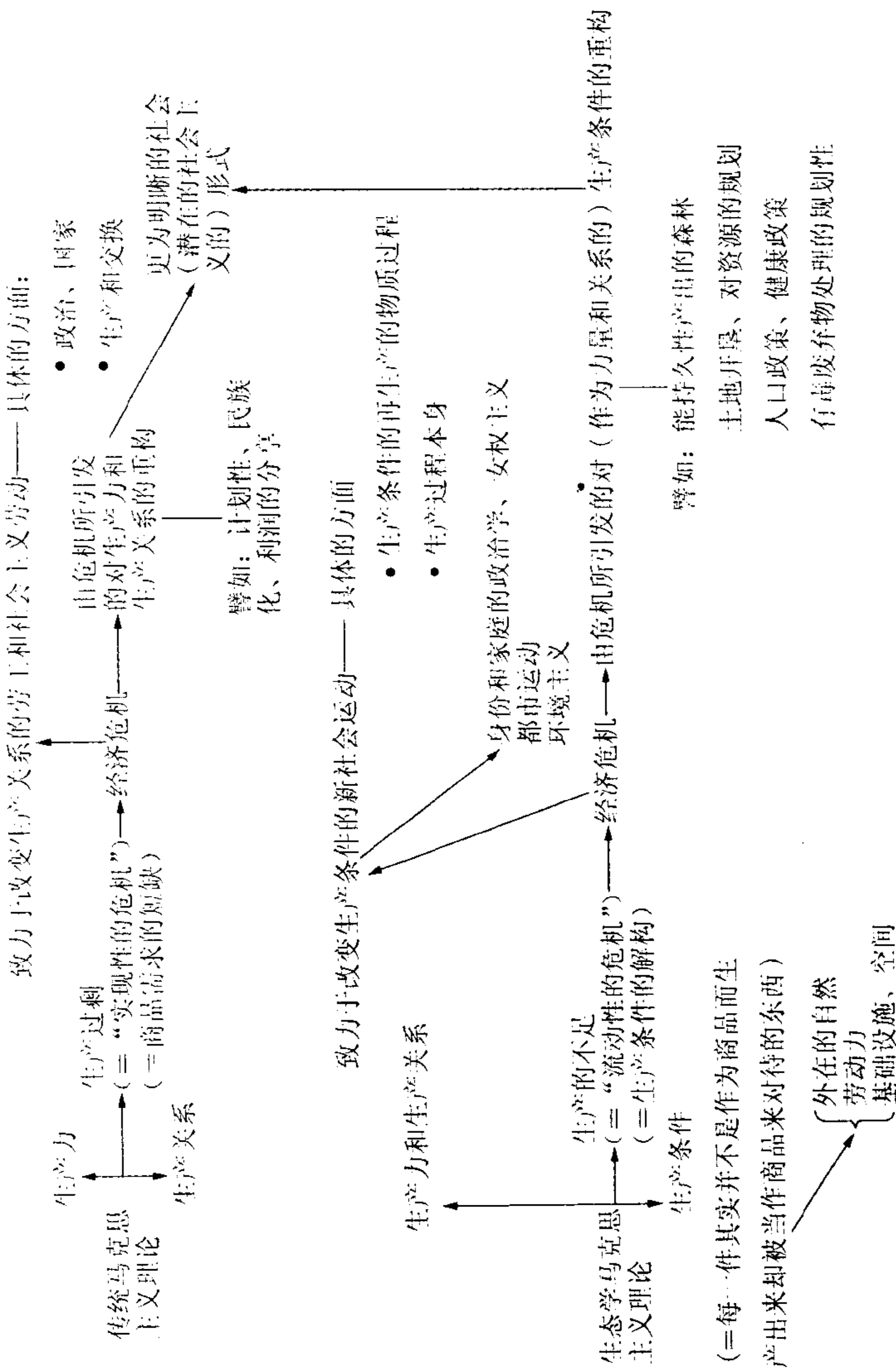


表 8.1 资本主义的第一重和第二重矛盾。此图由雅考夫·加勒 (Yaakov Garb) 所画。

## 171 注 释

1.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57年版）。波兰尼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而不是对劳动的剥削问题。

2. 譬如在环境及发展问题上成立一个世界委员会的观点，参见《我们共同的未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 在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方面最接近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要数阿兰·施纳伯格（Alan Schnaiberg）的著作：《环境：从过剩到稀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是一本原创性的和很有利用价值的著作。与此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自然的资本化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参见利劳德·蒂姆伯雷克（Lloyd Timberlake）和乔恩·廷克（Jon Tinker）：“政治斗争的环境起源”，见《社会主义评论》，1985年11—12月（第15卷），第6期）。

4. 在歉收的情况下，“原料的价值增加，原料的**量**则减少……用于原料的部分必须增加，剩下用于**劳动**的部分就减少，因此就不能吸收和以前相同的劳动量。第一是**物质上不可能**……第二是因为产品中必须有比原来更大的一部分用于原料……再生产不能按原有规模重新进行。一部分**固定资本**要闲置起来，一部分工人被抛到街头。利润率会下降，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相比增加了……以利润率和劳动剥削率不变为根据事先规定的固定提成——利息、地租——仍旧不变，有一部分不能支付。于是，危机便发生了……产品的价格还会上涨。如果这种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加入其他生产领域，那么这种产品的涨价会使其他领域的再生产遭到同样的破坏”（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8年版，第515—516页）。

5. “除了在社会生产的形式上所获得的发展程度的大小不同之外，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是由身体条件所决定的”（《资本论》第1卷，纽约：兰道姆出版社，现代图书馆系列，1936年版）。在《剩余价值理论》（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8年版，第3卷，第449页）中，马克思指出，

存在绝对剩余价值的前提条件是“土地的自然肥沃性”。

6. 迈克尔·雷伯威茨(Michael Lebowitz):“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一般性因素与特殊性因素”,《政治经济学研究》,第7期,1982年冬季号。雷伯威茨把劳动力的供应及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方面的情况包括在“一般性”的妨碍因素之中。当然,他没有在劳动力本身的供应与受过训练的雇佣劳动的供应之间作出区分。至于自然资源,他没有在“自然”本身就具有的稀缺性与由资本在把自然资本化的过程中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那种稀缺性或由生态运动在政治的维度上所创造出来的那种稀缺性之间作出区分。

7.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62年版),第119页、792页。

8. 我们由此而可以对两种不同类型的稀缺性作出区分:第一,源自于以传统的、资本的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经济危机的那种稀缺性,即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社会性的稀缺;第二,源自于另外一种经济危机的稀缺性,这种经济危机是以由对自然的或一般性的生产条件的资本化处理所导致的匮乏为基础的。这两种稀缺性在最终的意义上都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然,第二种类型的稀缺并不是因为像“歉收”这样的原因,而是应当归咎于由资本化所导致的“歉收”现象,把“歉收”看作是采矿业对土地的占用(而不是对土地进行真正地耕作)、地下水被污染等因素所导致的结果。

9. 有两点理由可以解释马克思为什么对某些特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不感兴趣,这些理论除了资本的生产与周转之间的矛盾之外,还给予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其他方面特殊的理论地位。第一个原因是,他反对任何一种通过把资本中所蕴含的经济矛盾“自然化”,从而使这些经济矛盾得以具体化的理论。他与马尔萨斯的争论,尤其是他对任何一种或者说所有的对社会现象的自然主义解释观的拒斥,使他不走向“把多方面的因素统一起来”。第二个原因是,在19世纪下半叶,要想证明是资本本身自我设置出了生产条件的被损害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斗争等妨碍性的因素,应该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自然界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资本化,也就是说,正是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性条件,才使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今

天成为可能。

10. 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有争议的范畴的研究方面,代表目前研究水平的著作是:德雷克·塞耶(Derek Sayer):《抽象的暴力: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基础》(牛津:巴塞·布莱克威尔,1987年版)和罗伯特·马罗托(Robert Marotto):“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博士论文,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1984年)。

174 11. 据我所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本·阿格尔(Ben Agger)使用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传统的及当代的资源》,圣塔·蒙尼卡,加州:古德伊尔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339页)。阿格尔的关注焦点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他的主题思想是,那些为了维持经济及社会的稳定性而不断增长的消费行为,是真正损害环境的因素,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本章可以被视为是对阿格尔的那些往往是非常有力量的观点的一种批判。

12. 卡罗·卡伯尼(Carlo Carboni)也使用“社会再生产关系”这种说法。我本人之所以要使用“生产条件”这一范畴,其原因在于,我试图运用马克思本人的术语来重新阐释这一问题,同时也因为我想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资本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危机性趋势的问题上,而不想把它扩展到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即整个社会形式的再生产的过程上面。这意味着我将沿着马克思的理论方向,把“生产条件”置放在“客观性”的维度中来加以解读。

13. 外在的物质条件包括“作为生存资料的自然财富”以及“作为劳动工具的自然财富”(《资本论》第1卷,同前引文,第562页)。

14. 卡尔·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哈蒙德茨沃斯,英国:企鹅书店,1973年版),第533页。也可参见马雷纳·弗林(Marino Folin):“公共事业、公共工程及社会化的固定资本:‘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的资本主义生产”,见《都市与区域研究国际学报》,1979年9月(第3卷),第3期。

15.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是在空间结构及资本的妨碍性因素的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位前卫性人物(可参见其著作:《对资本的限制》,牛津:巴塞·布莱克威尔,1982年版),在与他的一次交谈中,本书

作者被“允许”将都市及其他的空间形式阐释为一种“生产条件”。

16. 以下的论述对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有意采取了一种“斯密式的”简单化处理,即忽略了马克思对斯密的批判,也就是说,忽略了马克思的如下观点: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不是剥削率的下降,才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我在下面的这些论述显然不是为了评论马克思对资本拜物教或者斯密本人的批判的观点。我之所以把资本主义的矛盾置放在最为简单的维度内来加以研究,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是为了准备就由危机所导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问题进行一场讨论;第二,是为了制定一种标准,通过这种标准,我们可以对“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非传统的”、或者说“第二重的”的资本主义矛盾进行比较,这后一种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建立在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本身所导致的外在自然及人类本身的自然(指人的类本质内容——译注)的稀缺性之基础上的。

17. “协作”(譬如“劳动关系”)既是一种生产力,又是一种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它在“文化”、“技术必然性”及“权力”的视域中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参见第1章)。

18. 戴维·奈特(David Knight):《科学时代》(牛津:巴塞·布来克威尔,1986年版)。

19. 从这样的角度来阐释这一问题,既避免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学派”的功能主义观点,又躲开了不以物质关系和客观存在为基础的韦伯主义的国家理论。

20. 如果我们假定(a)外在的自然已经被彻底地商品化或资本化,(b)在“生态学”或“环境主义”的名义下所组织起来的新社会运动源自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关系,譬如,源自于新中产阶级或工薪阶层(这是美国传统的环境主义主张的主要支撑力量)的兴起,那么,所谓外在性的障碍也可以被解释为内在的障碍。 175

21. “从资本积累及确保资本能够获得积累所需要的国家行为的角度来看,外在的自然和一般的自然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整体之中的内在差别。不过,从社会的及生态学的行为和政治冲突的角度来看,这种差别的意义并不在这种整体所具有的意义之下。其原因是,劳动力是为争取其本身的健康以及广义上的社会兴旺的(自然)条件而进行的斗

争的主体力量,而‘融入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中的自然要素’则是这些斗争的目标”(罗伯特·马罗托:1992年10月与本书作者的通信)。

22. “经济学家和企业界的领袖们说,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地区正面临着如此严重的交通拥挤现象,以至于整个州的经济活力正处于危险的边缘”(《纽约时报》,1988年4月5日)。

23. “如果学校不能把这些在数量上不断增多的人教育好,并有效地使他们成为生产性的劳动者及市民,那么,经济的稳定性就将受到威胁”(爱德华·费斯克(Edward B. Fiske):“美国的企业把眼光转向了未来的劳动者”,见《国际先驱论坛报》,第20—21期,1988年2月)。费斯克在这里所指的是那些少数民族,他们在人口数量上占今天美国人口的17%,这一数字有望在2020年上升为三分之一。在美国,卫生保健的费用在1965年的时候,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到2000年的时候,有望上升到15% (“卫生保健已经成了这个国家在经济上的一个顽疾”,见《旧金山编年史》,1988年3月14日)。

24. 有报道说,著名的IPM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分公司通过降低成本和增加产值,来增加利润。它所依赖的是新的培训和教育计划、农业耕作方法之间的协作等(桑德拉·波斯特尔:“印度尼西亚走出了单调的农药生产的模式”,见《世界观察》,1988年1—2月号,第4页)。

25. 譬如,德国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有组织的协作,成功地使许多外在性的或社会性的成本得到了内部消化。这一过程并没有导致对利润的重大损害,因为,联邦德国生产着如此多的高质量且受到世界市场欢迎的产品,以至于保护或重构生产条件的成本可以在保持工业具有竞争力的前提下被消化掉。

26. 克里斯托弗·达吉特(Christopher J. Daggett):“烟雾、烟雾、还是烟雾”,见《纽约时报》,1988年1月23日。

27. 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圈中,生产条件的不足所导致的危机会带来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形式及生产关系形式的观念是不稀奇的。施奈伯格(Schnaiberg)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对资源的加大利用和不断增长的环境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对经济的增长起限制作用,从而使在资源的使用、污染水平的控制等方面的计划性变得非常的重要。他把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立法及控制政策视为环境的计划

性的开端(施奈伯格,同前引文)。

由不利的生产条件(如成本)所导致的危机会带来更为社会化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观点,在如下的一些著作中就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如威尔金森(R. G. Wilkinson):《贫困与进步:经济发展的一种生态学分析》(纽约:普雷格,1973年版),该书认为,划时代性的技术变化往往是由生态稀缺性所导致的;桑克尔和利尔(O. Sunkel and J. Leal):“发展视域中的经济学与环境”(《国际社会科学学报》,第109期,1986年,第413页),该文认为,由于资源的自然生产率的下降,因此,资源的衰竭与稀缺会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由此便需要新的能源资源以及技术方面的帮助(即更为有效的计划性)。

28. 索尔·兰道(Saul Landau):与本书作者的通信,1994年11月。

29. 詹姆斯·奥康纳:“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一种理论上的简要阐释”,见《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1期,1988年秋季号。 177

30. 或者,在一种更为复杂的模式中,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所起的作用。

31. 弗兰克·贝肯巴赫(Frank Beckenbach):“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成本”,见《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3期,1989年11月。

## 有关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的附录

176

在与国内外学界同仁的讨论中,下列问题凸显了出来: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与第二重矛盾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各自对利润的变化所发生的影响是相互结合的,还是相互抵消的?

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可以简单地作如下的概述:剥削率既是一个社会学的范畴,又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它所反映的是资本对劳动所拥有的社会及政治性的权力,以及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走向实现维度上的危机,即资本的生产过剩的



危机的趋势。如果资本对劳动行使很多的权力,剥削率就将上升,面临实现维度上的危机的风险也将加大;由此,对一种庞大的信用体制、侵略性的市场销售、持续性的技术革新以及激烈的竞争的需求也将增强。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是内在于这种体制的;它与生产的条件(不管是经济维度上的还是社会政治维度上的生产条件)没有什么关系。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则需要一种更为复杂的术语来进行分析,这些术语实际上内含在使用价值这一范畴之中<sup>29</sup>:消费部分所占的份额及其价值内容,固定资本的大小及其价值内涵、“自然性因素进入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领域所付出的代价”、作为剩余价值之扣除的地租以及所有的各种“消极性的外在因素”(譬如,城市拥挤所付出的成本,这些成本会进入到个体资本的成本之中)。

在这第二重的矛盾中,没有哪个单一的范畴能像剥削率这一范畴在第一重矛盾中所起的作用那样,<sup>30</sup>起到了一种理论上的核心作用(这是为什么当今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社会运动的原因之一)。当然,上述的所有范畴都既是社会政治性的,又是经济性的(譬如,绝对地租标示了土地资本对工业资本所拥有的权力;拥挤的成本反映了为城市及地区性交通体系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水资源的成本反映的是生态运动对资本所拥有的权力;等等。)之所以要列出这些事例,旨在说明,单纯从经济的维度来对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进行阐释,甚至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单纯从经济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所作出的解释更具非法性。

177 第一重矛盾是从需求的角度对资本构成冲击的。当个体资本为了维持或者恢复利润,把成本降低的时候,其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市场对商品的需求也会下降,从而真正获得的利润也会下降。第二重矛盾是从成本的角度对资本构成冲击的。

当个体资本为了维持或恢复利润而降低成本——譬如，当它们把成本外化到生产条件（自然界、劳动力或城市）上面去的时候，其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抬高其他资本的成本（最起码是抬高了资本总体的成本），由此，生产性利润就会降低。第一重矛盾在一种实现性危机中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彰显自己；第二重矛盾则把自身展现为一种流动性的危机。在第一种情况下，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方面才存在问题；在第二种情况下，价值及剩余价值的实现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恰恰是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

出现第二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之所以是“自我摧残性”的，那是因为，当私人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sup>31</sup>的时候，健康和教育的成本、城市交通的成本、房屋及商业性的租金、以及从自然界中榨取资本要素所要付出的代价都将会上升。在这一意义上，当今的资本和国家作为能为资本的未来积累提供本质构架的一种新的管理形式，可以被视为是自相矛盾的。个体资本继续以任何一种可能的方式把成本降低下来；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无意间抬高了资本总体的成本，同时，正像第一重矛盾所凸显的那样，也威胁到它们自身的市场。今天，资本所面临的不仅是成本的上升，而且还有市场需求的疲软，也就是说，资本同时面临着第一重和第二重的矛盾。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不仅受到生产方法及生产过程的变革的困扰，而且还受着市场扩张的困扰？这是否意味着不仅生产条件存在着恶化的趋势，而且工资及薪金收入的合理的结构也会恶化，就像信用体制的膨胀所具有的危险性一样？这是否意味着不仅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理论的崩溃，而且也是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的失败？

资本主义积累与经济  
和生态的危机

## 资本主义积累

与“生态危机”相比，“经济危机”的含义（至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是非常明确的。它是指资本的货币、生产或商品的流通过程的中断，或者更一般地说，是指资本总体的再生产与积累的中断和停止。经济危机意味着某种“转折点”，它反映了经济的增长开始转向某种衰退（或者说萧条、滞胀的阶段）。同时，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一个“做决定的时刻”。个体资本在这种时刻会下定决心寻求对生产、技术及市场的重构（过度资本主义化的那些企业和商业部门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就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困扰），而劳工及社会运动在这种时刻会寻求更为有效的形式来进行有组织的斗争

及政治上的干预(这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其实也是很突出的,只是没有资本的重组那样被很多人所知晓)。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关键是要找出资本主义积累、经济危机以及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世界”的债务,使南部国家的生态条件变得更糟;不断退化的生态条件扩大和加深了贫困(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债务的原因,贫困其实已经很普遍了),同时也导致了政治上的反抗,这两者反过来又加重了债务危机。

资本主义积累是建立在对劳动的剥削以及剩余价值(利润)的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剩余价值有两种来源:绝对的和相对的。绝对剩余价值来自于个体资本(简单地说就是公司或企业)强迫其工人以超过与其工资相应的劳动时间或劳动量的形式所进行的超额劳动。当然,剩余价值的最主要的来源是相对剩余价值,它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通过技术革新的机制以及资本主义竞争的方式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机制的运行方式是这样的:当一个公司引进了一种技术革新,从而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单位劳动成本的时候,它便获得了一种被称为“技术租金”的额外收入。当这种技术革新被其他的公司所采纳的时候,那个进行技术革新的公司便会失去其优势,从而,技术租金也会被“竞争掉”。技术进步在整个经济领域中的推广所起到的(意想不到的)作用,是在一个广泛的领域内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在产品、劳动或资本市场等领域)相互竞争的那些公司在采用了新的技术之后,尽管所剥削的劳动时间要少得多,但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却能够和以前一样。假定其他东西保持不变(譬如价格),所获得的平均利润率就会增加。如果价格下跌,工人在利润中所占的份额就会比以前减少;如果工人被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并获得了比以前高的工资或比以前短的劳动时间,那么,工人在利润中所占的份

179

额就将比以前增大。这后一种可能性与美国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至25年间(即所谓的黄金时期)内所发生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一阶段,工资及利润的增长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是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单位劳动成本的降低相对应的。

在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理论模式中,马克思把生产性资本(能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分成两个部分或“部类”。一个部分(第Ⅱ部类)是为最终的消费而生产消费品的。另一个部分(第Ⅰ部类)是生产资本货物的,或者说是生产用于生产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中的其他商品的那些商品的。假定其他条件保护不变,用于两个部类的生产的资本货物的质量越好,劳动生产率就将越高(或单位劳动成本就将越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生产出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就将越大。(假设某种经济体系只生产消费品,那么,其生产率获得发展的空间就会很小,或者说根本没有。)假定资本货物的质量是一个固定量,资本货物的生产与消费品的生产之间的比率越大,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能力就越大(这里的“生产”依然是从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生产的角度来界定的)。与此相类似,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因素”(资本货物和消费品的生产各自都需要像能源、原料、土地、水等自然资源)越便宜,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就会越大(这也是以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为前提的)。

在消费品市场上,第Ⅱ部类中的个体资本是卖方,工人及终极产品的其他消费者是买方。在资本货物和原料市场上,第Ⅰ部类中的个体资本是卖方,而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中的资本则是买方。第Ⅱ部类的市场是由消费需求所支配的,而原料、燃料、机械、生产技术等第Ⅰ部类的市场则是由两个部类中的个体资本对利润的需求度所支配的。两个部类中的个体资本在第一,只具备很少或根本不具备超过市场需求的生

产能力,从而使**获得性利润**受到威胁的时候;第二,当市场或生产的条件不太令人满意,生产性的利润受到威胁,从而个体资本需要**更为便宜**的材料和能源以及**更好的**机器等条件来削减成本,以利于维持或恢复利润的时候,都会增加对第I部类产品的需求。在经济衰退或经济缓慢增长时期,某些特定的资本对上述这些技术及设置的需求可能会停滞或减弱,但在这种时期,对更为便宜或更为有效的生产设备和**技术的需求** 180 往往会增长。

主流经济学家把第II部类的资本对第I部类的产品的需求称为“派生性需求”,其意思是说,这种需求是由对终极产品的消费需求的增长情况所决定的。(根据“加速器”的理论模型,要想生产很多的床垫,就必须有很多的**生产床垫的机器**。如果对床垫的消费需求增加了,那么,床垫生产商对生产床垫的**机器的需求**也会增加。)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与此相反的东西却显得更为正确:对消费品的需求是由对资本货物的需求,或者说对利润的需求所“派生”出来的。一般而言,消费者收入(以及由此而来的需求)的增长率是由利润和积累的增长率所决定的——消费者的需求在经济增长模式中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和易变的。在经济缓慢增长或经济衰退的时期,劳动者(消费者)的收入从根本上说是停滞不前的或者是下降的,在第I部类的工业部门中工作的那些劳动者的收入是个例外,这些工业部门被在更为便宜的能源、更好的机器、更为先进的技术以及一条龙式服务等方面的大大增加的定单所激活——两大部类的资本对上述这些东西的订购,其目的在于通过降低成本来维持或恢复利润。在不断扩大的第I部类的工业部门中,不管是就业率还是工资的水平,都得到了增长,这无疑会刺激对第II部类产品的消费需求。因此,对某些部门来说的坏年头,对其他部门来说恰恰是好年头——马克思所说



的“通过危机来进行的积累”就是由此而来的。

简而言之,第Ⅰ部类的“作用”在于为其自身以及第Ⅱ部类的剩余价值及利润的扩大再生产提供资料。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秘密在于拥有一个在经济上具有革新性、灵活性、具有成本意识以及不受限制的资本货物的生产部门(尤其是“知识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之所以必须是革新性的、灵活性的以及具有成本意识的,是因为技术进步、利润以及经济增长这三者作为一个总体,是建立在第Ⅰ部类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必须是不受限制的,是因为固守成规以及由环境、消费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所强加的那种高成本,会妨碍技术的革新以及新的生产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推广。

## 资本主义积累与生态危机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既是经济活动的手段,又是其目的。利润之所以是手段,那是因为,它们驱动着货币资本不断地扩张,并努力使新的股份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进行运转,同时,还能给不断扩大的贷款进行担保。利润之所以是经济活动的目的,那是因为,不管是管理部门还是股东,其目的都在于创造更多的利润。管理部门试图使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最大化;股东们则希望资本的总利润与配股分红之间的某些结合能够最大化。个体资本用利润来获取更多的利润,这实际上就成了“货币的自我增殖”。这是“资本的自我扩张”的一层含义。

181 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严格的限制性。此外,由于资本低估自然界的存在价值,因此,它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触及到生态维度上的局限性。当然,自



然系统是依据许多非常不同的原则而被建构起来的(或者说自我建构起来的)。就像生物和物理系统、水力循环系统、热/能源系统、土壤系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等等一样,在生产曲线的某些点上,自然界的生产能力是自我限定性的——这是有待于资本去克服的一个“障碍”。不过,幸亏作为劳动者的人类从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中分离(异化)了出来,才使得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再生产,与以前的生产模式相比更少地受制于源自于特定地方或地区的独特的自然条件的危机。资本能够不依赖于任何独特的自然条件而进行运转;用加里·斯尼德(Gary Snyder)的话来说,资本“把它的经济支撑体系拓展到如此广泛的地步,以至于它足以毁坏整个生态系统,可它至今仍在不断地拓展”。

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积累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或不断降低的把工人阶级再生产出来的成本的基础上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一定的雇佣劳动量能够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料。如果经济在不断的增长,对原料的需求就将不断地增长(假定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其结果是:原料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从而在商品的价值中占据更大的份额(换句话说,个体资本必须用其利润中的更大的部分去购买更多的原料)。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源的需求的增加以及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会提高平均成本,从而抑制利润率和积累的增长。于是,个体资本(单独或者与其他资本联合在一起)便会通过向设备、技术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来发现新的矿物及矿物燃料的储存以及可耕作的土地等等,并试图通过这些来克服上面所提到的那些“瓶颈”。原料及能源的相对昂贵,也能刺激个体资本对它们进行回收再利用,或者使用替代品,或者使既定量的材料或燃料的使用效率更高。这后

一种方法被认为是资本用来防止由利润的危机(这是由对原材料的高耗费所导致的,美国内战期间在英国所发生的棉花危机就是一个例子)所导致的普遍性危机的最主要的方法。随着历史的发展,工业资本已经找到了多种方法,来提高对铁、铝、锡以及其他材料的使用效率;除了一小部分例外之外,资源开采的成本已经下降了;用来生产既定量的电力所需要的能源量已经降低了。

与此相反,如果在原材料方面出现反方向的发展趋向(在更为有效的生产和使用水平的前提下,付出比以前更低的平均成本),那么,成本和价格就会下降,平均利润率就会上升,原材料开发和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sup>1</sup>原料的便宜带来了资源的快速耗费和衰竭的危险,这并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便宜,而是因为,当它们相对便宜的时候,利润率就会相对地上升,从而对资源的需求以及积累的过程就会相对地加快。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形成了:高利润率导致了高积累率,高积累率反过来又导致了对原料的更大的需求;对原料的更高水平的开发导致了生产成本的降低,而生产成本的降低  
182 又会使本来就很高的利润和积累率变得更高。简而言之,如果原料很便宜,那么,积累率以及资源的耗费和衰竭程度就会相对较高;而如果原料的价格很贵,那么,资本的投资就将被用来把它们成本降低下来,或者发展出某种方法以使它们的使用效率更高。

不管原料、能源以及其他“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因素”的成本是高的且是不断增长的,还是低的且是不断下降的,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都依赖于第 I 部类(资本货物行业)中的投资的扩大(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说)。第 I 部类的增长越快,生产率、利润以及经济总体的平均增长率就越高。反过来,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资源的耗费及

衰竭率就越高,同时,那些多余的副产品(污染)就越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事实上,某种既定的经济增长率也有可能导致比以前更高的耗费率及污染率。这是因为,第I部类,这个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也是最有害于自然界的。在1987—1988年度中,美国的石油冶炼及煤产品、化学产品、原生金属以及纸张和纸浆产品(所有的资本货物),在全部工业产品中占了22%的份额,这些行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占全部就业机会的13%,所使用的能源占全部能源使用的78%,在有害物排放中占了88%。<sup>2</sup>其中,仅化学工业就占据了58%的有害污染量。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及臭氧层的消失、酸雨、海洋污染、森林砍伐、能源及金属矿藏量的衰竭、土壤流失以及其他一些主要的生态变化,都是近两个或者更多的世纪以来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前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而这种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第I部类工业的发展与扩张的结果。

## 经济的及生态的危机

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经济危机以资本流通的中断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把自己凸显为一种资本“有待克服的障碍”。“资本本身”是最大的障碍。(马克思)这意味着(与其他的许多事情相结合),资本的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对商品的有效需求(资本的实现)的增长速度,这就会阻碍资本的积累或者把经济推向衰退或萧条。

资本主义同时又是危机—依赖性的;这种体制需要一种周期性的危机的存在。其原因在于,经济危机是一种强有力的、必不可少的惩戒性机制。在繁荣时期,个体资本可以通过

降低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生产更好的产品等方式来超越竞争对手；在危机和困难时期，降低成本、增加灵活性、解雇在职员工、以相同或更低的价格生产新型的和质量更高的产品，对个体资本、工业或整个经济体系来说，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

183 经济危机导致生态危机，不过，其方式和类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伴随着资本积累而来的“标准的”生态恶化是不尽相同的。从总体上说，经济危机是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譬如，剥削率的增强）联系在一起，由此，也是与对工人的经济上和生理上的压榨的增强、成本外化力度的加大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恶化程度的加剧联系在一起。经济危机与成本削减同时还会在刺激那些先前已被禁止的对环境具有危害性的技术（如曾在美国西南部的部分地区使用过的 DDT）的复活的同时，刺激那些更新的现代技术的出现，从而导致生态恶化的新的形式（譬如，高科技污染）。再者，经济危机还与降低资本流通时间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这反过来会使得企业更加不关注工人的健康、所出售商品的环境及卫生影响、城市条件及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存在等等。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一定程度以及一定类型的生态问题；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生态问题在程度及类型上是与此不同的。生态问题的这两种类型，在任何时刻都是结合在一起（以不平衡的方式）以及相互并存的。

另一方面，生态危机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由资本自身所导致的生态问题——由“规范化的”市场力量、高额的地租、为交通拥挤所付出的成本以及能源成本的加大等因素所导致的原材料的短缺，会带来对利润的损害以及/或者通货膨胀的危险。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对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是很好的例子。

再进一步,由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环境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以下事实的基础上的:社会运动、政治斗争以及国家政策对生态和经济的变化与转型起干预的作用。环境运动(以及劳工、城市及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在危机的时期为保护生产条件(或生活条件)、重构生产条件或者帮助决定这些条件该怎样加以重构而进行斗争——有可能会提高成本以及减少资本的灵活性或自由性等意想不到的后果,从而危及或损害资本主义的积累。

我们可以对上述观点作如下的概括: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而言会导致一定类型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与部分相异、部分相似的生态问题(当然是具有不同厉害程度的)联系在一起;资本的外在性障碍表现在稀缺资源、城市空间、健康及训练有素的雇佣劳动者以及其他一些生产条件方面,它们有可能会使成本增加,从而对利润构成威胁;最后,以保护生活条件、森林、土壤质量、环境的舒适、卫生条件以及城市空间等等为目的的环境运动及其他社会运动,也有可能提高成本,并使资本缺乏灵活性(参见图9.1)。

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包括环境及社会运动对这种问题所作出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问题。这是一种——在生产、市场关系、社会运动以及政治的维度上——存在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趋势和倾向性之间的相互决定的关系。资本在损害或破坏其自身的生产条件的时候,便会走向自我否定。在这一意义上,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由自身所导致的,并且,环境的和社会经济的革新运动是这同一种总体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些没有涉及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当它在运行的时候)以及资本主义无法在其中进行运转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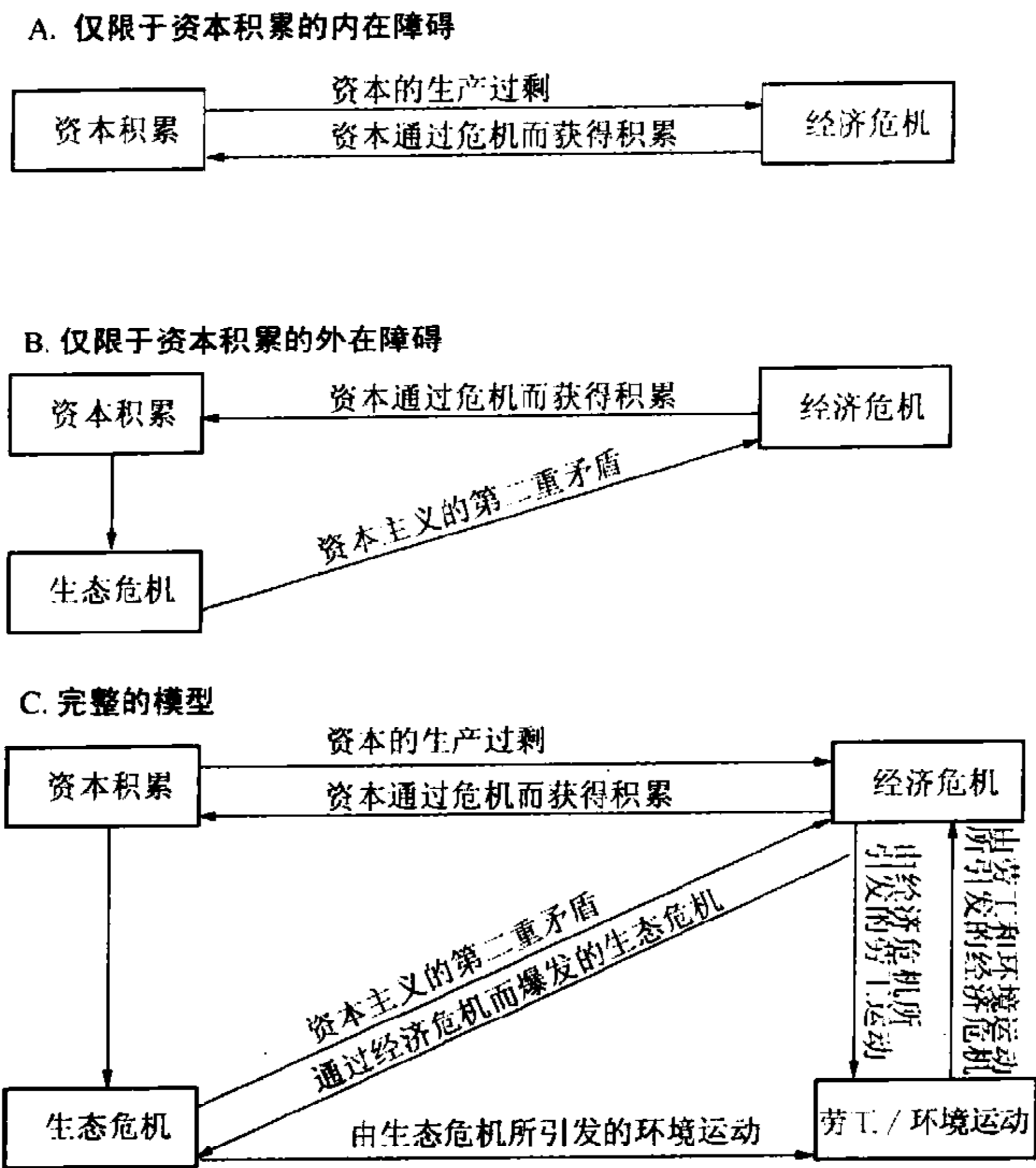


图 9.1 危机的结构

(当它不能运行的时候)的环境政策,和那些没有在总体上涉及生产条件的问题以及没有在具体的层面上涉及生态学的问题的经济政策,都将可能是失败的,或者甚至会对环境条件的恶化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 论

自然界是资本的出发点,但往往并不是其归宿之点。

自然界对经济来说既是一个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不过,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自然界作为一个水龙头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资本化了;而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则或多或少地被非资本化了。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

很显然,水龙头是资源衰竭的一个隐喻;污水池是污染的一个隐喻。当然,衰竭与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非常复杂的(参见第10章),我们暂时把这一问题放一放。我的最终观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是两种(而不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衰竭以及两种不同类型的污染。存在着两种打开水龙头的办法以及两种利用污水池的办法(可以这么说),因此,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态危机。

这种观点是建立在下列前提之基础上的:资本是通过经济危机而进行积累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积累并不是先导致好的年头,然后再导致坏的年头,而是在所有的时期,或者说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同时导致好的境况和坏的境况。这就意味着,处在经济困境中的资本主义的公司、企业和部门,不得不通过技术革新、削减成本、加快速度等方式,以及通过对消费品的更新换代的投资,来维持或恢复利润。它们无法通过出售更多的同类商品或以更快的速度出售商品,来更多地赚钱,因为,(很显然)它们所面对的是市场需求的缓慢增长、停滞或者下降。由此,那些对自然资源低耗费的高技术的和其他的许多资本货物行业,以及服务业便不断发展起来,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终极产品市场已经非常强大,或者正在不断地扩张,而是因为它们很弱小,或者说是在不断地紧缩。其结果是,高技术资本货物部门的经济活动不断地走向扩大——譬如,硅谷中的大部分非军事企业的兴起,首先是由于美国其他地区的其他行业正处于困境之中。



虽然这样做有把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过分简单化的嫌疑,但我们仍然认为,资本通过危机进行积累的过程对自然界有两种不同的影响。处于困境中的企业或部门为了省钱而无视环境的清洁与保护。它们同时还会重新引入像 DDT 这样的被禁之物。尽管由于生产总量的下降,这些企业所造成的污染可能会降低,但由于产品的单位污染量的增加,因此,污染总量仍会上升。在自然界的开发方面,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企业更不可能从生态的角度去关注开发、开采和操作过程中的技术,以及土地的使用等问题。因为,在经济缓慢增长或停滞阶段,这些企业或部门所需要的不是能源、金属或工业原料本身,而只是便宜的能源、便宜的金属等等,在开发这些东西的过程中自然会比正常的情况下更少地关心环境保护的问题。另一方面,处于困境中的企业或部门几乎可以肯定会更有效率地使用那些必需的能源和原材料。

186 只有通过实证的研究才能透过水龙头和污水池的隐喻,认清那些发现自身已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公司、企业和部门所面临的新的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那些正在不断扩张的工业或经济部门所面临的问题是不相同的。对后者来说,显然并不存在市场需求的问题(直到出现生产过剩的可靠信号)。但是,生态问题是与新技术、生产及需求的快速增长联系在一起。为了迎合不断扩大的市场,资源的消耗将会加快,能源及原材料的使用效率相对来说就不会被看得太重。尽管这些工业部门事实上是有能力不让自然界这个污水池被塞满,或者说是有能力让它保持清洁的,但除非社会运动和立法机构强迫它们做,否则,它们是没有兴趣做这些事情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社会运动中,只有反抗有毒害物质的社会斗争才多少取得了一点真正的成功,这要归功于以下这些因素:这种社会斗

争所倡导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政治路线、就有毒物质的处理成本问题而展开的富有战斗性的区域性斗争的作用、新的立法及规章制度的建立以及由此而来的有些部门的资本为了摆脱资源短缺状况而把兴趣转向别的方面。

简而言之,有些行业或部门对削减成本是很热衷的;这无疑会给那些资本货物行业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处于困境中的工业部门可能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使用自然界这个水龙头和污水池,而处于快速增长状态的工业部门则会以其他方式来利用自然界(这与对环境的损害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生态问题及危机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种),这样,就这一问题所提出的政治要求以及在政策方面的变革当然也应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不是一种)。

上述观点意味着,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的机会。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拥有一种能够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作出阐释的经济危机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些经济危机理论)。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危机理论都能使我们勇敢地面对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作为结语,我想奉劝那些有进取心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经济学家们要充分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洞察力,同时我也想敦促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强有力的方法去对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作出阐释——去帮助那些自以为是的资本转向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方向。

#### 注 释

1. 哈罗德·巴尼特(Harold Barnett)和钱德勒·莫尔斯(Chandler

Morse)在《稀缺与增长》(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一书中曾经作出了这样的估计:在1870年~1900年至1957年间,美国的耗取自然资源的行业(除了森林业之外)就出现过这样的反方向发展。根据这本著名的著作,耗取自然资源的商品的单位成本与不耗取自然资源的商品的单位成本相比,随着时间的发展是有可能不断上升的。森林业在这里仍然是个例外,那里的情况正好相反。

2. 迈克尔·雷纳(Michael Renner):“拯救地球,创造就业机会”,见《世界瞭望》,1992年1—2月(第5卷),第1期,第13页。

## 第十章

# 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与生态危机

187

### 导言

没有人曾经系统地研究过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对自然的和人类的生态学所产生的影响。以我之见,导致这种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当环境主义者和生态学家们开始谈论“世界生态危机”的时候,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等院校中已经或多或少地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如此的话,我们又多了一个密纳发的猫头鹰在黎明时候折起其翅膀的例子。或者说,又多了一个在泼洗澡水(前苏联以及所有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把婴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起泼掉的例子。我们的确已经在全球的许多地方就生态条件问题进行过很多新的研究,正像我们已经熟知像“资本主

义社会形态”、“生产方式”、“不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这样一些非常传统的观点一样(上述最后一个概念差不多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些“一试即灵”的总体性概念(顺便说一句,那些后现代主义者居然从没有想过要去否定这些概念)的引导下,我们的确也能武断地得出一些临时性的结论。<sup>1</sup> 不过,在把这些概念运用到当前的研究主题(全球生态学)上来之前,我们至少有必要对“不平衡的发展”以及“联合的发展”这两个概念的显著特征作个简要的概述。(“生产方式”的含义在本书第1章中已经提到过了。)

## 不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

不平衡发展这一范畴通常是在政治经济的和社会经济的维度上来加以界定的(分别对应于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阶级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性生成的工业、农业、矿业、银行、商业、消费业、健康、劳动关系以及政治结构等等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状况。不平衡发展这一研究主题是非常庞大的,我们在这里只能举二三个例子来说明资源开发及污染在全球的分布情况。一个例子是“发展”与“欠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欠发展本身的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一点首先是由保尔·巴伦(Paul Baran)在20世纪50年代作出理论概括的,安德鲁·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以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本书作者在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这些范畴是用来描述诸如原料供应地区(“第三世界”)与对产品的生产加以垄断的地区(“第一世界”、“核心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二元性或对立性关系的。

或者说,它们是用来阐释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个新殖民主义世界中的生产及财富和贫困(包括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分布情况的。再或者说,它们是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在当时没能发展出资本和雇佣劳动形式,以及那些在当时的(现在仍然是)北美国家很普遍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统治形式的问题的。从另外一个理论层次来看,不平衡发展也可被解读为作为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的基础的城市与乡村(帝国主义力量/殖民地;中心地区/周边地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sup>2</sup>没有人能比费德尔·卡斯特罗更能形象地理解这一点,卡斯特罗把革命之前的哈瓦纳比作古巴的“瘦小的身体上的一个膨胀起来的头”。

**联合的发展**这一范畴也许可以被解读为那些“发展了的”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与那些“欠发展”地区(或城镇和乡村)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之间的一种独特的结合——社会经济或政治生活的新、旧形态的混合(所谓“旧的形态”是指在过去的某段时间内历史性生成的那些社会经济及政治形式)。在今天,这种联合的发展的最重要的例子也许就是“新全球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中,资本(总是迷恋于利润的最大增值)把发达的技术、工业化的管理、劳动的分工与低工资和/或者对劳动的超额剥削结合在了一起。实际上,这里所体现的是19世纪的劳动条件及政治形式与21世纪的技术之间的结合,或者说,是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一种新的统一体中结合了起来,这种新的统一体是由全球的银行业提供经济支持,由全球的跨国公司所组织起来的。

更具体地说,不平衡发展意味着工业、金融以及商业资本在某些领域要比其他领域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积累,结合成更大的集团或联合体,以及拥有更大的政治力量。在过去(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如此——尽管每隔10年,其程度都会

明显减弱),资本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及日本的一些地区。譬如,1900年,世界上12个人口的主要集中地同时也是主要的工业中心(伦敦、纽约、巴黎、柏林、芝加哥、维也纳、东京、圣·彼德堡、费城、曼彻斯特、伯明翰和莫斯科)。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工业化地区的“内陆地区”是依赖于并且受这些工业中心所剥削的。自近代以来的第一种剥削形式,是通过榨取农业的剩余价值来从经济上支持工业化,养活城市的人口(包括快速增长的无产阶级)以及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如果把全球比作一个大“都市”,那么,其“内陆地区”,即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那些矿产及农业地区,是被那些工业(帝国主义的)强国所支配并且被融进其经济体系之中的。正像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指出的,工业化地区所建构起来的这些外部环境,最终导致了资本的流动性。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这些内陆地带或周边地区通过各种改革性的或革命性的方案,使自身从政治上被更好地组织了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周边地区从总体上来说越来越不再仅仅把自己当作农业剩余价值的提供者,而是更多地作为工业核心地区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的工厂和其他设备的人力资源供应者来发挥作用。国内及国际间的劳动力迁移的复杂模式,导致了农村人口的相对减少和城市及工业化地区人口的快速增加。不少周边地区仍然是原料的供应地,但有些周边地区变成了核心地区剩余产品的有利可图的交易市场,而所有这些地区或多或少地都变成了北部国家剩余资本的重要的输出地。

随着世界市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很长一段时期的中断,民族主义的工业化计划在南部国家纷纷启动,这就是所谓的“替代进口的工业化”(ISI)。当然,一方面,随着ISI的衰落,另一方面,随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工业(生产性)资本



的全球化,南部许多过去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都发展起了一种从属性的、输出性的工业化模式。位于亚洲东北部的一些国家则发展起了半自动化的工业化模式,东南亚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这些地区,国家调动起了人们对民族和种族的确认感,在促使国内市场不断增长的同时,组织起了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这“相对独立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标准化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

一种长期的、至今仍是不全面的联合的发展的过程目前仍在进行之中。到2000年,12个最大的人口中心城市将会是:墨西哥城、圣保罗、上海、东京—横滨、纽约、北京、里约热内卢、孟买、加尔各答、雅加达、洛杉矶、汉城,从这一顺序可以看出,南部国家的工业化速度是如何快速赶上第一世界的速度的。当然,这一估计不应被解释为中心—周边关系的彻底颠倒:尽管存在着联合的发展以及全球的工业化,但七个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今天虽然在人口数量上还不到世界人口的15%,可在消费量上却超过全球消费总量的40%。(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生产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粮食,可消费的粮食却只占全球粮食总量的四分之一。)同时,到2000年,三个最主要的工业资本的集中地将会是东京—横滨、纽约和洛杉矶——它们都在第一世界。

不平衡发展虽然与诸如土壤、森林、矿产、气候等自然资源在全球的分布状况相关联,但并不是受这些因素所决定的。有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北美)变成了工业强国,有些(中非)则没有。而有些工业强国(日本)的资源(尤其是能源)是很贫乏的。因此,工业资本的不平衡分布首先并且最主要地应当在社会经济及政治经济的维度上来加以解释。 190

从经济的维度上看,工业资本在所有权及控制力方面的集中化和集结性趋势与空间上的集中化趋势之间存在着一种

历史性的关联。费伯斯(D. K. Forbes)说：“降低资本、劳动力及商品的周转成本的需要，最先促成了生产场所在城镇和城市中的集中。”<sup>3</sup> 反过来，资本的联合以及城市化进程又加快了金融市场、大众消费品市场的发展以及对那些可获得的劳动力资源的共享。大规模的生产体制以及外向性的规模经济的存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譬如，当许多个体资本使用同一种物质性的基础设施，以及当这种规模经济的那些有机组成部分和备用的部分都能本土化的时候，生产成本自然就会降低。再进一步，工业资本得到“联合”的地区利润率便会有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那些寻求资金输出的金融资本“自然地”会把眼光投向大城市中的银行、证券业以及金融市场。在内陆地区所形成的那些金融资本往往也会转向那些大的银行或工业中心。那些大的工业、财政及商业地区一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从农业和农村经济中榨取利润的（“不平等交换”），在许多国家，这进一步导致了后者的欠发展。上述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特例，还不如说是普遍的规律。

不平衡发展（正像上面所阐述的）会以两种普遍的形式否定自身：第一，工业资本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迟早会导致交通、劳动力及其他成本的增加；第二，在原料供应地会形成在数量上不断增加的商品化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以及顺从于“现代性”的政府。由于空间的局限性会导致地租的上升，由于人口拥挤的成本会不断地增加，以及由于资本使用的模式和基础设施使用的模式和类型会变得越来越僵硬（譬如，有些人已经把底特律称为一种“合成的商品”），因此，一种推动力会油然而生。与此同时，劳动者的集中会加强工会和劳动者在当地政府中的力量。另外，一种“地理位置上的惰性”也会被发展起来，它会阻挠资本在地理位置上的扩散，尤其是当本地的建筑工人、地主、银行家、资本家以及普通劳动者组成联盟来确保当地

经济的生存与发展的时候,更是如此。当然,在某种程度上,随着能够降低交通、运输的成本、能使设备小型化等等的新技术的出现,一种“推动”生产的扩散与非中心化的力量也将会发展起来。由于新技术会使资本越来越具有灵活性,会使它在实践中有能力适应更具偶然性的情况(譬如,不管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得到的劳动力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结构)。与此同时,工业资本会被推向更为传统的非工业化地区,因为,世界范围内农业的资本化以及“全球民众的被圈入”导致了劳动力的剩余以及潜在的市场。那些反对民主化的政府对开放劳动力、环境及其他市场的承诺也给了工业资本一种“推动力”。

### 不平衡发展与污染

191

以下的讨论所涉及的内容是:(1)不平衡发展与不同形式的污染;(2)不平衡发展与资源的枯竭;(3)联合的发展与污染和资源的枯竭;(4)作为污染之间接后果的资源枯竭的方式;(5)与上面第四点正好相反,作为资源枯竭之间接后果的污染的方式。对这一研究主题的上述这种处理方式是尝试性的和启发性的,而不是终极性的或定论性的。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最糟糕的人类和生态灾难通常发生在南部国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内陆殖民地”。生态恶化的人类牺牲品往往是那些乡村的穷人——那些只有很少土地以及根本没有土地的人,生态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以及城市中的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的人,再加上北部的那些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穷人。这方面的例子有:非洲撒哈拉沙漠周边的那些半沙漠地区的土壤肥力的衰竭,导致了大量的贫困和饥饿人口;以色列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导

致了它们的快速衰竭以及盐碱化,巴勒斯坦人人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也许以色列人最终也会为此而付出代价)。有关污染对被压迫民众所产生的影响的例子有:美国的印第安人在铀的开采中所受的毒害;从墨西哥来的农场工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正在因为农药的毒害而生病和死亡;墨西哥城(1984年11月)的8万桶液化气的大爆炸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印度波帕尔市的卡比德联合工厂生产农药用的甲基异氰酸酯的泄漏(这些有毒物质是从地下储藏罐中泄漏出来的,这个只有五年历史的工厂位于这个城市的贫民区的中心),造成了几千人的死亡以及更多的人的受伤。“自然灾害”对穷人及无法得到帮助的人的打击要远远大于对那些富人的打击,这方面的例子有:1985年发生在墨西哥城和哥伦比亚的地震,导致了几千人的死亡,而其中大部分是穷人,他们的政府还无法保护他们免受火山喷发所可能造成的灾害;密西西比河以及其他河流的泛滥,往往对那些居住在河的沿岸或者河边地上的穷苦的黑人的打击,要远远大于对那些居住在高地上的富裕的白人的打击。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自然”是生产的出发点,但通常不是其归宿之点。当然,工业、市政及日常生活的**废弃物**,与工业、市政及日常生活所造成的**污染**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废弃物尽管也有潜在的毒害性,但由于其程度很弱,因此能够自然地、被自然界所吸收,而不至于对生态系统或人类构成威胁,这就像吸烟所产生的烟雾能够从门中排放出去一样。或者,即使废弃物在数量上很多,譬如庄稼收割之后的残余部分,但它们能够很容易地被自然界所吸收,而不至于产生有害的影响。

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如果废弃物在空间上变得特别的集中,那么,它们迟早会变成污染;在有些情况下,自然界的

再循环是不可能发生的。从 11 世纪开始就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城乡之间的隔离,可能是自古代以来就有的那种自然界的再循环的最主要的障碍物。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资本不平衡发展的程度越高,工业、日常生活及城市污染在空间上的集中度就将越高,一定量的不同种类的废弃物也将更有可能转变为危险的污染物。在美国,城市中最大的空气及噪音污染源是汽车;最大的水污染源(除农业以外)是大工业区的市政下水道,工业生产以及相关的活动,甚至所居住的人口在这些地区都非常的密集(大约 40% 的水污染源来自于美国工业用水的排放)。在空间上高度集中的电子工业(譬如,硅谷)把大量的废弃产品转变成了有毒污染物,其原因仅仅在于这些废弃物在地理位置上太集中了。有关不平衡发展对污染所产生的影响的另一个例子,可以在化学及石化工业所走过的历程中找到。根据环境保护署的统计,美国有大约 6 千家工厂在生产有毒的化学品。其中的大多数都集中在劳工社区,尤其是在那些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或者黑人劳工的社区。这些工厂的泄漏物和废弃物在空间上非常集中,它们已被证明对人类和自然系统构成了威胁。上述事实所具有的意义是很清楚的:只要把工业、人口及任何其他东西的非中心化视为同一件事情(它从来都不曾如此),那么,一些危险性的污染就将自动地转变成无毒害性废弃物。

### 不平衡发展与资源的耗尽/衰竭

最早对不平衡发展与自然界的毁坏进行理论阐述的,是马克思。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乡之间的分离(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劳动分工)有一种不断扩大的必然趋势,这种

分离扰乱了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基本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说,扰乱了被人类和动物所消费的那些东西向土壤的回归。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分工的这种形式与保持土壤肥力所需要的自然条件是相抵触的。历史可能会证明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是正确的。不平衡发展不仅是工业生产、商业、人口等因素在发达地区的集中,而且也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和原材料的集中榨取,这同时也会使这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的新陈代谢”遭到破坏。

在大多数的欠发达地区,现在已经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专门化的农业体系,在最为极端的地方,所形成的是单一性的农业耕作模式,或者,把耕种的农作物的类型集中在某种或某几种可供出口的产品上。完全可以这么说,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集中在北部国家及南部国家的工业区的那些平衡的和有机统一的工业体系,需要或者说是以南部国家的那些不平衡的、专门化的以及零碎式的经济为前提的。这些事实至少可以指认 19 世纪全球经济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全球经济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发展也是与此相符合的。

从资源衰竭的角度来看,不平衡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之一(譬如,单一性农业耕作模式的不受约束的扩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对土壤肥力的破坏。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蔗糖生产在巴西东北部地区的不受约束的扩展,毁坏了当地的土壤,并把这一地区推向了赤贫的状态,事实上,这一地区从未真正地在这种贫困中恢复过来。当代的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非洲撒哈拉沙漠周边的那些半沙漠地区的状况。这些地区在过去大多属于法国在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所属地,在以下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地区的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农作物种类集中在可供出口的产品上、出口性农业对生存性农业的反作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土地的生态条件的更加恶化、可供放牧



的土地的不断减少。其后果是牲口的过度放牧以及挨饿。在干旱的年头,(老谋深算的)法国统治政府给牲口挖井——这使得这些井周围的自然环境由于牲口的过分集中而被毁坏。这种作法使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力量越来越脆弱,使大批的民众陷入贫困之中,这些民众以前是拥有一套以农民和牧民之间的交换为基础的、具有内在统一性和规范性的生存性经济体系的。那时,牧民被允许在农民收割完庄稼的农田里放牧他们的牲畜,而这些牲畜的粪便则是所有农作物的肥料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以原材料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模式,也是集中在某种或者某些农作物品种上,它们在出口业务繁忙的时候很少会关注对土壤的管理问题——那些政府太急于赚取外汇了——只是在后来,当生产率下降以及贫困出现的时候,才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中美洲的情况就是如此。

不平衡发展所产生的第二种影响,是森林的砍伐。在当代,这方面的最著名的例子是热带雨林以及生活在这些雨林中的动植物的快速消失。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殖民主义以及盲目的经济扩张的观点的支持下,这个世界上的大量森林惨遭砍伐。在美国,原始森林所遭到的破坏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同草原、草原生物(德克萨斯州的最后一片真正的草原现在也受到社会发展的威胁)以及野生动物一样,差不多已经消失了。造成森林被砍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它们都与工业、商业及国际资本输出在19世纪的快速增长联系在一起。其中的一个次要的原因是为了追求出口而对雨林地区的木材资源(如硬木)进行直接的开发(也有例外的,譬如缅甸的硬柚木林就是一个例外,这种树木的价值太高了,以至于英国女皇下令严禁对它们进行不加控制地商业性开发)。另外一个,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把森林所占的土地腾空出来,以便在



上面进行农牧业生产,这些生产自然是以向工业国、工业化地区或城市地区的出口为价值导向的。空旷的森林地(譬如,在美国或缅甸,英国人砍光了低地地区的森林,以便腾出空间来使农民能够进行出口性农业的生产),对于确保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提供廉价的原料和食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森林砍伐,以及由此而必然导致的旱灾、水灾、河流的淤塞,是资本主义在黄金时期所面临的最致命的问题。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大量的旱涝灾害以及饥饿现象并存于这种黄金时期之中。简而言之,由于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取代了农业—林业间的有机体系、能够持久地或可持续性产出的森林业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尊重(对生物多样性的定义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因而导致了全球大部分森林植被的被砍伐。只是在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欧洲,才由于对森林的管理而防止了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可能发生的森林毁坏现象(从19世纪早期开始,出现了一种给阿尔卑斯山重新森林化的尝试)。

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第三种影响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矿物燃料的快速开采。在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联合作用下,再加上能源垄断集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能源的开采速度已经远远快于在把自然界不仅当作物质生产的出发点,而且当作归宿之点的前提下所可能具有的开采速度,也就是说,已经远远快于在那种能够对作为能源之来源的市政废弃物、风力和太阳能等因素加以关注的状态中所可能具有的对矿物能源的开采速度。帝国主义、石油垄断集团以及目光短浅的国家政策共同构成了抵制理性的能源政策的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每年要有相当于6百万吨的煤被填埋掉(如果不算在电力和钢铁生产中所用的能源,那么,这一数目大约相当于英国工业所需能源的一半)。在美国,已建

成的和正在计划兴建中的废弃能源再利用工厂总共只有 120 家。95% 的市政废弃物被填埋掉了——每年大约有 1 亿 5 千万吨,或者说每人每天大约有 4 磅的固体废弃物被填埋掉了。这些废弃物所内含的能量大约相当于 5 千 6 百万吨的煤或 2 亿 2 千 5 百万桶的石油所产生的能量。

日本以及西欧各国(其程度要稍微差一点)就要仔细得多。日本的市政废弃物被填埋的比例已经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42% 下降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 32%。在日本,能源、土地以及资本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对能源的保护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样一来,不平衡发展对能源衰竭所产生的某些影响就得到了减弱。由此,(上述这些地区)在过去的 100 年中能源需求的成倍增长——虽然煤的开采的历史已经有大约 800 年的时间,但 1940 年至 1980 年间所开采的煤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煤的总储藏量的 50%——对矿物燃料的耗尽与衰竭所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以下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所抵消了: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的集中、自然空间的有限性以及国家的计划性。

不平衡发展的生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不仅体现在土壤的恶化与流失、森林砍伐、旱灾和干旱化、以及矿产资源的衰竭等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对那些以劳动力输出为特征的原材料供应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上。这些地区的民众纷纷到正在发展的或已经工业化的地区去寻求工作。在工业资本集中的那些地区,农田、丘陵和山地同样也遭到了忽视;劳动力的短缺使传统的土地耕作无法正常进行;资金的缺乏导致无法进行农作物品种的改进;赤贫现象在此基础上就出现了。葡萄牙北部地区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那里的男性劳动力都到工业化的欧洲或里斯本地区去找工作了。意大利伦巴第地区的丘陵与山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正在不

断地被沙漠化。

195 在那些既专门从事出口性农业又专门从事出口性矿物生产的国家或地区所发生的情况,应该说,是不平衡发展和自然恶化的更为复杂一点的类型。在这些地区,由矿渣、废弃物以及矿产机械所产生的烟雾所带来的污染,导致了农业的减产和土地质量的恶化。譬如,加拿大的弗尔考布雷奇公司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伯瑙地区有不少的镍矿,当地农民抱怨说,这些镍矿所产生的烟雾对当地的土壤和农作物的产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而由森林砍伐(资源枯竭的一种类型)所导致的旱涝灾害则会对增加水的污染及其他形式的污染产生影响。

非洲生态学家凯雷史托斯·朱玛(Calestous Juma)对许多贫穷的原材料供应地区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概括:第一,南部国家快速增长的出口性农业把生存性农业推向了那些边缘性的、更为贫瘠的土地。海地的情况可能是“最糟糕的了”,在那里,从事生存性农业生产的农民拥挤在那些贫瘠的山坡上,而商业性农业则霸占了那些最好的峡谷中的土地。出口性农业使土地集中在那些农产品商人的手里。第二,南部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越来越糟糕(譬如,与工业产品的价格相比,原料的价格不断地下降),这意味着南部的那些国家为了得到一定数量的进口商品,不得不出口越来越多的原料。第三,上述情况也意味着生产出口农作物的那些土地的开发程度会越来越大,同时还会在这些土地上使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以及把更多的人类劳动力投入到这些土地上。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更为严重的职业健康问题(农业工人受到化学药品毒害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出口性的农业区域,大多数的化学产品是在这些区域被使用的)。第四,出口性农作物生产的扩张会导致更为严重的森林砍伐,同时也会导致那些肥沃的土地从穷人手里流向富人手里,这就迫使那些没有土

地的以及只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转向更为边缘的那些生态条件很差的地区。第五,具体到某个特定的不发达国家,尤其是在非洲,越来越多的资源是在城市地区被消耗掉的。第六,为了维持城市工人阶级的社会次序而实行的压低食物价格的政策,迫使那些从事地方性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不断地扩大生产的规模——由此而导致了环境的更加恶化。第七,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可怕的社会变化——譬如,这种或那种类型的慢性病或寄生性感染疾病的死灰复燃。集约性的农业体系已经加快了疟疾和血吸虫病的流行速度。总之,在不平衡发展的前提下,世界资本主义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场灾难。

因此,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在工业化地区会导致大量的污染,而在原料供应地,则会带来对土地、土壤、植物等等的大量毁坏。同时,它还会导致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过剩(在过度无产阶级化以及贫困现象的普及化的意义上),并进而加速自然条件的恶化进程(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农业越来越变成能源—集约性的农业)。从世界经济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困境时期,不管是出口性农业还是生存性农业的生产者,都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维持他们的收入水平,而这会把自然条件推向更接近于其生态极限的状态。 196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南部国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原料供应地区的土地和资源,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以及资本积累的媒介,被输出到那些工业化的地区,可在这些工业化的地区,它们恰恰是以废弃物和污染物的形式来表现自身的。对下面这种可能性加以思考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从直接或间接的角度来看,导致工业污染的那些自然因素,原本应该是以原料供应地区的肥沃的土壤、矿物燃料、矿产、森林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南部国家的土壤衰竭、森林的毁灭等等,以

及污染和贫困的普及化现象构建了一个单一性的历史过程——“一个重要的事实”。

## 联合的发展：污染与资源的衰竭

联合的发展意味着资本寻求以最为获利的方式把各种社会经济形式联合起来。其存在的方式至少有以下两种相互并存的形式：第一，南部国家农村中的那些没有土地和只有少量土地的人向城市的迁移，以及从南部国家向北部国家的迁移——这同时也是不平衡发展的一个特征。第二，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相关的资本和技术向那些拥有廉价的且受过训练的劳动力以及很大的市场潜力的国家的输出，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非常乐意压制工会组织，并且还会对环境保护的规定熟视无睹。在美国，政府非常鼓励资本通过区域化和全球化来实行联合的发展。1986年5月，“联邦法院颁布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允许美国的跨国公司自由地在海外扩展其工厂，而不必顾及这些工厂对当地居民可能造成的危害……该法院的法官同时还传递出了这样一个清晰的信号：其他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把子公司、合作伙伴以及各种经济和技术的协议隐藏起来的办法，来彻底逃避因在全球各地从事有毒害性的生产实践而必须担负的责任。”<sup>4</sup>

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下，廉价劳动力、非法移民以及那些没有工作许可证的工人纷纷涌向那些传统的工业化地区；每个人的工资都不断地下跌；工作条件越来越恶化；工会软弱无力；职业性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不断地涌现，环境条件愈趋恶化。与此同时，乡村地区被剥夺了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强劳动力，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这导致了更多的土地的荒芜以及总

体生态状况的恶化。意大利伦巴第的乡村地区以及葡萄牙北部地区的情况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土耳其的部分乡村地区以及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部分地区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如此。

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下，那些输出去的资本在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廉价）的地区形成了新的工业化区域以及对农业进行了资本化的改造。北部国家的污染被“出口”到了南部国家。在北部国家被禁止的那些危险性的化学物品，在南部国家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中找到了出路。更为陈旧以及更具剥削性的劳动关系形式被加以使用；职业健康和安全的问題遭到忽视；城市—工业化的地区因居住条件、废弃物的处理、交通以及其他的各种问题而处于失控的状态。 197

南部国家的城市空气污染状况（譬如安卡拉、曼谷、孟买、布宜诺斯艾利斯、开罗、加尔各答、马尼拉、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汉城以及德黑兰）与那些发达国家中的大城市相比，要差得多。发动机所排放出的气体是最大的污染源。通过燃烧木材、动物的粪便以及木炭来煮饭和取暖，也会加重污染的程度。有些城市正遭受着热量倒转的困扰，它们缺乏良好的空气流通。韩国的汉城，这座拥有8百万人口的城市，由于大量硫化物的排放而正受着热量倒转的困扰，这些硫化物源自于汽车的尾气、家庭用的煤炉所排放出的煤气以及许多高层建筑和工厂把C号油当作加热的燃料来使用。

当发达的管理模式、资金筹措的方式和技术在出口型地区与更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联合起来的时候，伴随着生态的恶化，联合的发展会加重不平衡发展的程度。所谓的“绿色革命”就是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南部国家在绿色革命的口号下对农业的资本化，意味着农民“挑选‘最好的’种子，模式化地种植尽可能多的土地，以及使用化学肥料。把农业归



结为这样一种简单的模式,会使农作物极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袭,同时也会使土壤极易遭到毁坏……这种简化的农业模式使化学肥料和农药成为必需之物,它们把这种农业模式内在的脆弱性掩盖了起来。”<sup>5</sup> 那些依赖于大量的水和化肥的高产种子,与那些“自然的”种子相比,对疾病的抵抗力要弱得多,而对旱涝环境的敏感性却要强得多。

简而言之,联合的发展意味着污染的出口以及危险性产品的出口——既有生产资料的因素又有消费资料的因素。从北部国家转移到南部国家去的,不仅仅是资本和技术,而且还有一连串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比作资本积累的一个竞技场,在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语境中,联合的发展的两种形式都出现在了这个世界中,那么,我们就可以作出下面这些尝试性的假设:第一,南部国家的那些低工资的、未组织起来的工人,以及北部国家的那些非常软弱的工会组织,是无法抵抗环境的毁坏以及对劳动者健康的伤害的。第二,高技术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了“社会成本”、异化性以及剥削率,并进而导致利润率的增加、资源的使用与破坏的速度的加大,以及各种形式的污染率的增大。其结果必然是一种生态破坏与人类本身的破坏之间的循环往复的螺旋型上升过程。

## 结 论

在这个地球的某些特定的国家与地区,存在着一些非常独特的自然界遭到毁坏的模式。因此,要想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生态毁坏现象的原因作出阐释,就必须立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哪种普遍性的理论,不管这种理论



有多么得深奥,能够对特定地区与国家的独特性作出界定。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积累的模式与程度、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与结构、所使用的技术的类型、不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在任何一个特定地区的表现形式,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所产生的作用,是必须加以认真考虑的。波多黎各过去是,现在在某种相对较小的程度上仍然是有关不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的共同作用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存在着土壤的恶化与流失、森林的砍伐、空气和水的污染、公共健康及城市污水方面的问题、石油的泄漏、有毒废弃物的危害以及农药中毒等等现象。不平衡发展已经导致了許多自然资源的毁坏;联合的发展在这基础上又增加了污染、有毒废弃物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当资本的不平衡发展和联合的发展实现了自身联合的时候,工业化地区的超污染现象与原料供应地区的土地和资源的超破坏现象之间就会构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资源的耗尽和枯竭与污染之间也构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是资本“用外在的方式拯救自身”这一普遍化过程的一个必然结果。

由此,耗尽/衰竭与污染都不是独立的问题。通过全球性的资本积累,这个世界上的自然资源被耗尽了,转化成了垃圾,并且往往还是危险性的垃圾。那种意想不到的副产品——污染——也正在使资源不断地被耗尽/衰竭。严格地说,利润率与积累率越高,耗尽/衰竭的程度也就越大,从而也会间接地导致污染率的增大。譬如,石油的开采与生产耗费着矿物燃料资源;石油被转化成对人类和自然界有危害的石化产品。铀的开采不仅耗费了资源,而且还对矿工及其他人的身体健康构成了损害,同时还会间接地导致更大的污染(譬如,由核电站的泄漏所产生的污染)。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利润率与积累率越高,直接污染率也会更大,

自然资源的间接性的耗费与衰竭的程度同样也会更高。

### 注 释

1. 对这一问题的现在这种阐述方式是单方面的,从而也是有局限性的。本文没有说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自然的和人类的生态境况的解构为什么是一种自我解构——即这种解构为什么会导导致成本增加、劳动和资本的灵活性降低等这样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本文也没有论及对生态恶化的社会的和政治性的抵抗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一问题几乎都是与贫困、社会运动和社会活动以及民族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因素本身对资本的成本、资本的灵活性等等都有强有力的、独立的影响作用。

199 2. 这一章的阐述是建立在一种简单的发展/欠发展的理论模式之基础上的。有关相互依赖性的发展以及相互脱节性的积累的更为复杂且更为具体的理论模式,可参见丹尼尔·费伯(Daniel Faber):“中美洲的相互依赖性的发展、相互脱节性的积累和生态危机”,见《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1期,1988年秋季号。

3. 费伯斯:《欠发展的地理学:一种批判性的考察》(伦敦:克鲁姆·赫尔姆,1984年版),第130页。

4. 拉里·伊维雷斯特(Larry Everest):“更多的波帕尔人”,参见《自然》,1986年6月21日。

5. 弗兰西斯·摩尔·拉佩(Frances Moore Lappe)和约瑟夫·柯林斯(Joesph Collins):《食物是首要的:超越稀缺的神话》(波士顿:豪格顿·米夫林,1977年版),第164页。

# 第十一章

## 技术与生态学

200

自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主流观点一直认为科学技术、私有财产以及市场经济一起造就了两类自由:摆脱未知的、不可控制的自然的暴虐的自由;以理性方式利用、操控自然来增进“国家福利”的自由。据说技术不仅可以使我们免于自然的暴戾而且还慷慨地授予我们富裕的生活。结果必然就是,一旦自然的奥秘臣服于科学理智和资本主义合理性,人类也就从终生艰辛枯燥的劳作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马克思本人也因创设了进步理念而被称作为“启蒙运动的真正继承人”。

这一观点已受到了批判理论学派的挑战,他们反驳说科学技术已变成了压制的工具,而不是解放的手段。启蒙运动关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还受到了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挑战,他们虽同意说劳动(在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上)和自然的未来有赖于技术的未来,但是他们认为许

多——如果不是大多数——资本主义技术实际上是一种压迫、剥削和破坏力量。从此批判观点看来,资本主义技术并没有将人类从自然的盲目力量和苦役的强制下解放出来,相反它使自然退化并使人类的命运变得岌岌可危,——而不是变得更安全或更易控制。核武器和核能源、无数有毒的化学制品、生物工程技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矿物燃料的燃烧以及其他一些危险的技术和技术应用,这一切看来都在威胁着这个星球本身的生存。机器人技术、计算机、数控机械工具、卫星通讯、新材料技术、“绿色革命”以及其他一些技术,它们增强了社会控制,减少了社会必要劳动,但也在威胁着工作环境,并导致了失业和就业不充分,增加了社会和物质的不平等,加剧了这个星球上许多地区的贫困和痛苦。

201 曾被普遍认作为善的科学技术就此失去了它的保护伞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在批评者们看来,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往好处说最多可以算作一种好坏掺半之事,如往坏处说,则可以用阶级关系、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来对其加以解读。他们认为,由政治所决定的这种科学分层体系已使那些隐含有对自然的破坏作用的学科凌驾于那些对这种破坏作用作出系统化阐释的学科之上了。农业生态学、生物保护学、流行病学、历史生态学、文化地理学、生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批判的社会理论(还有其他一些)——所有这些对于拯救自然都是十分重要的——都面临着资金和人员不足的问题。农民的知识以及民间的知识被官方学术圈低估了。然而,尽管对科学和技术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的怀疑日益增长,许多重要的环境主义者、以及实际上所有的社区和政府的决策者都还对全球性的生态和经济问题的技术性解决存有信心。最重要的例子就是那个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它认为环境的恢复、经济的增长以及贫困的缓和都有一些技术性的解决办法。<sup>1</sup>

同时,一些“新社会运动”也对现代技术的生态效应以及西方科学的基础和运用提出了质疑。在世界范围内,在减少资源(消耗)或清洁生产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各种社会运动都在努力清除有害技术;阻止那些具有潜在危险的技术的引入;发展一些替代技术;并给过去有害技术的受害者作一些补偿。<sup>2</sup> 这些运动倾向于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之内或之外来进行运作,但是它们却往往忽视主导性社会观念与替代性社会观念之间的区分。他们的要求是“对技术的社会控制”(巴里·孔门勒尔)或“决策的基层民主化”(玛丽·克拉克)。<sup>3</sup>

要定位技术的生态与人类学后果,就必须对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能作一简要的评述。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技术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的内涵和功能。<sup>4</sup>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在目前有关技术的生态及环境维度的阐释文献中,有很多只是对这一论题作了简单化的和单向度的阐释。

资本主义技术的最重要的经济功能就是使工作场所中的单位劳动时间在生产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增值。提高劳动生产率直接地或间接地降低了:生活消费品的生产成本、消费者购物篮中的价值含量、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其他条件保持不变)还增强了对劳动的剥削,提高了利润率,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积累。

处于市场繁荣时期和处于市场需求停滞或收缩时期的生产技术的样式和形态是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在经济扩张时期,新技术倾向于提高产出;在停滞或收缩时期,则降低成本。于是,在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技术对于自然肯定就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因为,技术改造的类型会有不同的倾向(参见第九章)。<sup>5</sup>

通过这种生产技术的改造(即所谓革新过程)来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经济机制是很隐晦的。当个别资本引进那些降 202

低成本(提高生产率)的技术时,他们似乎就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因为他们可以比他们的竞争者进行更为便宜的生产,所以与其成本相关联的收入肯定就会更高。然而,这些收入并不是“利润”而是经济租金的一种形式,这称为“技术租金”。这是些仅归个别资本所有的金钱,因为他们拥有一种其他一些与其竞争的资本目前还得不到的有价资源。

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就像某些资本会竭力试图借助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来超越其他的资本一样,其他的资本也会受经济损失的驱使而尽力模仿或者努力赶超那些革新资本。当相互竞争的资本都引入了相同的或者改进了的革新时,“租金”就消失了;现在成本就普遍减低了;而且那些原先在这个革新过程中领先的资本也就失去了他们的所谓的利润。然而,对于所有的资本来说,现在就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来生产相同的商品了。该产业的全国生产率从整体上(或者,简而言之,整个经济总体的水平)得到了提高。如果这种革新是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消费品产业之中的,那么消费者购物篮的价值含量(或社会必要劳动)的降低会比较小。如果这种革新是发生在一个给众多消费品产业提供机器、技术以及与此相类似的资本货物的产业中,那么消费品平均生产成本的降低就会比较大。在后一种情况下,货币工资就可以在不对工人的生活水平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形下被降低。在某些条件下,货币工资和利润还可以同时提高。马克思称之为“相对剩余价值”量的增加如何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进行分配取决于许多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工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上所进行的斗争。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中的工人还或多或少与资本平等地分享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成果。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美国(其他的工业经济模式也越来越趋向于此),相对来说,更多的生产

率成果被资本以利息、租金和利润的形式独占了。

技术改造的第二个经济功能是降低提取原材料和燃料的成本,以及/或者是提高原材料和燃料的使用效率。第一种情形可以用新的采矿技术来加以说明,这使得产业资本可以用较低的价格来购得一定量的原材料。第二种情形的一个例子是,为了应付20世纪70年代的二次“原油危机”,美国产业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提高了石油的使用效率。

资本主义技术的第三个经济功能是开发新的消费品——包括那些替代现有消费品的产品,借此来扩张潜在的消费市场。当技术被设计和定位成用于创造新的或改进型的消费品时,如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资本的周转时间将会缩短,而利润率将会提高。总而言之,新的生产和原材料技术增加潜在利润;消费品革新使资本得以在市场上实现这些潜在利润。 203

这三个经济功能是与技术的社会和政治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以先进的通讯和其他一些系统为基础的现代“技术社会”中,“工具理性”已普遍化了,而且技术本身也具体化了。<sup>6</sup>技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如此的复杂,因而越发必须对此问题从整体上构建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

不过,某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或许还是有其普遍适用性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有两个过程是同时发生的。第一个涉及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第二个则涉及交换价值的生产。第一个过程是一个“劳动过程”,这是工人、技术人员以及其他一些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人员同由自然提供的原材料之间的关系。例如小麦收割、金属塑造以及灌装牛奶等。第二个过程是“价值分配过程”,这是一种资本从工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关系。换言之,在生产中,人们通过使用或改变自然要素生产出商品;而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独占了由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财富。

剩余财富的生产以及资本对它的榨取以资本主义管理方



式对劳动力的有效操纵和控制为前提。操纵和控制的方法依劳动力的数量和技能、产业类型以及其他许多因素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然而,有一条概括如果不是全部也肯定是可以适用于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一方面,技术通过使劳动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来生产财富,即它在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技术合作方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技术在工人相互之间以及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造成了区分,这也就使资本借“专门化”这个手段分化和控制了工人,从而实现了对劳动力的统治。资本主义生产预设了工人以及工作之间的区分、劳动者以及劳动的专门化。<sup>7</sup> 资本主义技术的设计、定型以及采用不仅是为了调整和控制生产,而且也是为了调整和控制劳动阶级的。

虽然技术的设计者和拥有者通过采用技术革新来统治劳动者或生产剩余财物的方式并没有一个普适性的历史过程,但是,资本却一直在努力试图借管理之便而对生产施加愈益强劲的控制,也就是说,把劳动筹划和劳动实施、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以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分离开来。<sup>8</sup>

工人与工会、公民与社团以及环保主义者(还有其他那些关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产品的人类学和环境论后果的人),已经对资本主义加诸生产和劳动阶级的垄断力量展开了抗争。而这种抗争的结果取决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经济等各种因素间的复杂关联。可以举两个极端的例子,在瑞典,劳资协同经营法规赋予了工人在引入新技术过程中的某种发言权,而且地方当局规定,在养鱼场劳动中要降低磷和氮的使用量。但是,在尼日利亚,工人以及一些有生态意识的社团则不论是对制造业中还是渔业中的生产技术、产品、污染、或者劳动条件一般都没有发言权。

对技术如何凸显社会关系(反之亦然)的这种简短分析,

应该能够使那些狭隘地解释技术变化或纯粹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这些变化的人有所保留了,并且这还应使那些对资本主义技术是否必然有害的问题争论不休的人有所警觉了。技术对生活方式和人类的生存有害,难道只是因为这个星球也许不再能够承受原材料的开采或吸纳有害废物了吗?<sup>9</sup> 技术的破坏性仅仅与生产水平有关吗? 或者,技术真的正在使人类的行为或本性朝着脆弱的方向演变吗? 这些问题展示了“科技难题”在理论上的困境。单是生产过程中技术和社会的不确定性就足以使研究者们和理论家们感到十分为难了。<sup>10</sup>

可以肯定的是,自然是资本的前提,但并不必然是它的目的之所在。<sup>11</sup> 资本从环境中攫取了“资本的自然因素”而将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多余的副产品”抛回自然。绝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产技术将会是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这时,资本或许就会减少浪费、循环利用副产品、有效地使用能源、保护土质和森林等等,如若不然,他们将面临牢狱之灾。从工业资本主义的一开始起,它对技术的选择就是以其对成本和销售额而不是环境的影响为基础的。200年前,由詹姆斯·瓦特所发明的蒸汽机推动了工业革命,因为它有效地燃烧了硫磺含量高的烟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也产生了惊人的污染。现在,这些并非源自自然本身并且破坏了可贵的生活方式的化学品,因为没有相应法规的制约,还将在生产中被继续使用。除非工人和社团对那些可恶的公司发起挑战,职业健康和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就仍将戕害劳动者。

因而,生态斗争和环境立法有助于规范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禁绝有害技术、阻止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技术的引入以及发展生态上合理的替代技术,所有这些社会运动与现存生

产技术和生产过程的总体格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回到了这个主题:社会和政治斗争是理解资本所采用技术的类型及其对人和自然的影响的关键。与资本在工厂中对技术的那种配置和运用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及利润——相比,也许技术本身不应受到更多的指责。对墨西哥工业的一项研究表明,对工人的那种身心盘剥,其根源在于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义本性,而不在于技术。<sup>12</sup>在加利福尼亚,短锄引起了后背损伤,但是研究者发现,从本质上来说,这项农业技术既是一种生产工具,同时也是一种劳动控制工具。<sup>13</sup>装配线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辛苦的劳作常常并非源自生产线本身,而是因为工人的分工是高度专门化和极端狭窄的,而且还因为公司还让生产线飞快运转或者保持着很高的噪音,这就使得工人们无法相互交谈,——从本质上来说,决定性因素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技术。在石化产业这个被看作对环境最具破坏性的工业门类中,技术也具有作为控制劳动的手段的功能。关于石化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塑料制品对金属产品的替代,传统的解释是以可获得廉价能源、较高的工资水平、以及用石化产品和其他一些合成制品来取代短缺的金属原料的技术能力来作为佐证的。塑料制品轻盈耐用,具有可塑性,而且加工后还可以衍生出众多新的化学和物理特性。然而,这之中还存有一个别具意味的因素:化学过程和合成产品并不需要工人手工去为成品准备原材料。这种以某种连续流程为基础的生产便使资本摆脱了对劳工的手和心灵的依赖,而这在金属产品的生产和装配中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对化学制品和塑料制品的使用,或多或少就是因为,在过去,金属产业工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劳动阶级中组织得最好并且最具战斗性的部分。因此,化学制品和塑料制品技术,就其功能而言,就不仅仅是技

术意义上的生产目标和手段,而且也是控制劳动手段。

而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更高层面上,核技术——所有技术中最危险的一种,其功能也不仅仅是使“决定权掌握在雇主和他们所雇用的专家们的手中”,它还“加强了对投资和生产的集中控制……并使消费停留于被动状态之中”。<sup>14</sup>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密集型技术,如核技术所典型反映出的,要比劳动密集型技术具有更大的生态危害性,这种技术类型现在已成为一种普遍原则,因为它们使大资本对劳动拥有更为直接的控制力。间接地,核技术也已作为一种国家安全体制而在起作用,通过运用这一体制也就控制了政治领域。因此资本的技术成分的增长趋势不仅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且也是出于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实际上,那些反对诸如核能这样一些技术的人不承认国家和法人有制造与使用这些会危害生活方式的设备的“权力”。反核运动或明或暗地拒斥资本在能源生产和分配上的集中控制权,并且拒绝资本为扩张核设备的生产而在投资和出口战略上所享有的控制权。

消费技术以及它们对于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活的影响引发了一些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理论问题。同生产技术一样,消费技术或者产品更新也都不仅具有社会经济意义,而且也有社会政治意义。作为消费社会的基础,需求满足的商品形式本身就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大众意识之中。<sup>15</sup>与生产技术一样,我们同样很难预测:消费品的革新在生态上是否比以往的或现存的产品具有更多的或更少的危害性。然而,有一个一般原则或许有助于澄清现在正考虑的这个问题。消费需求之构成(一般家庭购物篮中所购之消费品)的经济原因和生态后果,同总体的消费支出及消费支出增长率的经济原因和生态后果相比,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的。这一区分在反消费主义的环境论者的话语中常常被混淆了。

相对来说,对非耐用品的消费需求构成是变动不定的。例如,消费者的环境意识就刺激了可循环使用的纸产品、可回收的瓶子、有机农产品以及其他一些绿色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相反,对耐用品的消费需求构成则是固定的。在高档超市中,没有化学污染的农产品很容易卖出去,然而,廉价的有化学污染的电冰箱却仍在生产。<sup>16</sup>汽车制造商如不在固定资本上花费数十亿美元是不可能将污染型的车辆改型为没有污染的型号的。而且,对汽车的需求是由有着复杂的地理分布的劳动力市场决定的,他们的工作场所、居住地以及娱乐场所所在地是相互分离的。<sup>17</sup>更进一步来讲,在作为主导性的社会价值观——个人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中,汽车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sup>18</sup>

而在另一方面,通常都认为消费支出的增长与污染/资源损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个人的“消费选择”决定的。关键的变量在于总的工资和报酬的增长率,因而,即在于消费者收入的增长率,而这是由利润率和资本的积累率决定的。利润率越高,则积累、就业、消费者的收入和支出的速率就越快。因为资本主义经营者竭力使每一劳动小时(或单位劳动时间)的生产增值最大化,这样,活劳动就有被从生产中排斥出去的趋势,资本预付给工人和雇工的总的工资和报酬就有降低的趋势。换言之(用这种简单的经济学模式来说),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最大化,既提高了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利润)的潜力,又降低了通过扩大消费市场来实现这些利润的潜能。事实上,市场这一问题常常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过程的转折点。脆弱的市场引导着单个资本尽力越来越快地销售消费品,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间,并以此来维持利润。这样,消费主义社会的普遍化以及生态上的破坏和浪费就与之如影相随了。

然而,问题还要复杂得多,自大型跨国公司(TNC)出现以来,大部分的生产需要成千上万的供货商,这些供货商位于不同国家之中,各自在其专业化的工厂里生产出许多的消费品和零部件。跨国公司——资本如今的主要组织形式——已能从容应对未来变数,它们可以从市场中撤出销售不畅的过时消费品并用新的消费产品去加以替代。像服装、包装食品这些产品以及电子类消费品等常常只有很短的有效的物理或文化生命力。物理上内在的短周期扩张了消费品的替换需求。文化上内在的短周期不仅以扩张市场的需要为基础,而且也是出于在不断变化的产品类型和时尚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需要。替换需求的增长并非源自物质上的损耗和毁坏,而是由于“文化上的损耗和毁坏”。风格、类型以及时尚的变化还带来了新的广告技术的需要,例如用于图形设计和编辑的机器。如果不能赋予商品以这种强制性的短周期,或者不能用更为复杂而昂贵的商品来替代那些简单而便宜的设计,那么资本在市场上就会用新包装来推广旧产品,而这就需要更多的自然资源并产生更多的废弃物和污染。<sup>19</sup>总而言之,不管打着什么样的绿色消费品的幌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存有这样一种内在趋势,即商品消费率的增长趋势,而其伴生物也就是所有的生态恶果,其金融根基则是一个不断扩展的庞大、复杂而脆弱的信用体系,或者用保罗·巴里恩和保罗·斯威茨 25 年前的话来讲就是一种巨大的“销售努力”。

上述理论线索的推演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技术——并非仅指在工作场所、社区以及整个社会中的劳动关系和权力——对于生活方式常常是破坏性的。巴里·孔门勒尔对生产和消费中所引进和使用的那些具有负生态效应的技术的著名论述,在现代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至少建立起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经验关联。<sup>20</sup>这意味着,这些技术——据



说其功用是作为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手段——在下述意义上也许是自我否定的：它们对于自然的破坏性后果间接地拉动了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产生了经济危害，——更不用说它们还在生产和财产关系上造成了社会的和政治的对立。<sup>21</sup> 因为破坏了自己的生产条件，资本有自毁根基的倾向。这种观点显然是有着充分的根据的：例如，汽车的生态后果影响了城市的生产条件和盈利能力；酸雨则对旅游业及其他一些相关产业的利润产生了不利影响；杀虫剂在农业中的反复使用则在降低利润的同时还破坏了土壤的品质<sup>22</sup>；机械收割机使土壤板结并降低了耕地的生产力等等。这个清单似乎可以无穷无尽地开列下去。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自然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什么会在自然和资本这两方面进入一个长时段的调整期。缩减有毒废物的技术、太阳能电池、农业中对害虫的综合整治、“新林业”技术、能把阳光转换成杀虫射线的杀虫剂以及其他许多新的技术，随着目前资本全球周转方式的转型已被提到了经济的和政治的议程上来了。

208 这一长期的生态和经济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调整时期，它潜在地也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契机。正如早先已指出的那样，社会运动实际上正在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提出挑战。考虑到技术在对劳动和社会的统治以及资本的积累中的核心作用，就如何应对这些社会运动而言，任务是十分繁重的。用新的技术和社会机制来代替那些具有生态学和人类学危害性的技术，进而以此来提升生活世界，这就是工人、技术人员、消费者以及各种社区对生产进行自我组织和管理的目标（还有其他一些目标），实际上，这正是一项民主的和革



命的任务。(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之中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技术的功能就是直接地或间接地阻止工人、消费者以及社区进行技术的设计、构建和使用。这种用作分化和征服工人、社区、地区和国家的技术是资本的一种防御堡垒。就许多现存技术——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的功能而言,它们与其说是就此击溃了还不如说是阻止了社会自我组织的大众形式,而且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所看到的那样,技术的选择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非常宏观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民主……只有就它可把(技术)问题置于有见地的大众的控制之下这个意义上来说才是真实可信的”<sup>23</sup>。坦率说来,在实践中对技术的任何抨击都必须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财产以及权力关系的一种抨击。弗朗西斯·桑德巴赫说道:“不良技术的每一发展变化都有赖于同资本主义的某种斗争。”<sup>24</sup> 各类替代技术运动也许都有这样一种潜在然而却是危险的可能性:他们会偏离正题转而以一种技术统治论的和实证化的方式来思考这个世界,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力量是伟大的。<sup>25</sup> 不仅技术本身,而且依据阶级、种族、性别等而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所作的那种流行的划分,以及管理机构、国家、国际官僚机构的民主化等等,都很成问题。<sup>26</sup>

很显然,反对“坏的技术”与追求“好的(替代)技术”的斗争必须联合起来。同迫使资本内化其外在成本,或者,与在资本外化成本时对其加以惩罚(如罚款)这种斗争相比,反对“坏的技术”的斗争要更为复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技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当今反对“坏的技术”的斗争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发生在工作场所和社区之中,例如,“知情权”和“节约资源”运动;第二种是指在现存机制之外发展替代技术的运动。前者努力阻止那些具有内在危险性的东西的出现;后者则限于在现存权力结构之

外来发展一些替代品,因而(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这实施起来要容易些,比如大资本对太阳能的采用。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好的技术”可能会威胁到工厂或办公室中的社会科层结构。因此,用好的技术来代替坏的技术意味着需要用社会互助关系来代替那些使社会退化、疲软、危险的劳动关系。再则,离开了这种替代技术运动,我们也就不会知道那些好的技术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 209 注 释

1.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我们的共同未来》(Our Common Future),(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

2. 参见A·K·古普塔(Anil K. Gupta)，“在重负下生存的南亚：对农业调整与革新风险的一种社会—生态学考察”；维诺德·费阿斯鲁(Vinod Vyasulu)，“论在环境的维度上具有正确性和自我依赖性的技术选择：对印度经验的反思”；理查德·列维斯(Richard Levins)，“古巴的生态农业斗争”，刊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1990年10月,第5期。

最近在美国兴起的追求可靠技术的活动包含有：反有毒物品全国运动、绿色运动、西南再生计划、清洁水源行动计划、地球之友、美国劳工通讯以及其他许多组织,它们看来已在所有这些阵线上展开行动了。切利斯·格兰丁(《何时技术有害：进步的人类学后果》),(纽约:明日出版社,1990),正在发起一场旨在联合下列团体的斗争：如全国辐射幸存者联合会、美国石棉受害者、邓肯防护联盟以及许多其他团体。刊于《新选择》(New Options),第67卷(1990年5月28日),第1页。

3. 巴里·孔门勒尔(Barry Commoner),《与地球言归于好》,纽约:万神书店,1990年;玛丽·克拉克(Mary Clark),《阿里阿德涅的线团》(Ariadne's Thread)(英国巴森斯托克:麦克米兰,1989年)。

4. 龙根·温纳(Langon Winner)正确地说：“我们的整个生活现在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技术的中介。你再也不能把社会与技术、政治与技

术或文化与技术分离开来。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受到了技术的设计与定型抉择的极大影响。”(引自《新选择》,见前引书);(另可参见:《鲸鱼与反应堆:在一个高技术时代对限度的追寻》)(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6年)。然而,技术的设计与定型也受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的制约。因此,像运输和通讯这些技术,其功能就依资本组织以及它们在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中的作用而定,它们既是社会、政治以及文化这些因素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应该注意到,关于社会成本或消极衍生物的理论 and 关于资本主义技术的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其所采用的技术相对来说是良性的,那么即使产生了巨量的消极衍生物(同落到单个资本自身头上即资本的内部成本相比是巨量的),它对自然的不良影响仍然会很少。一个以农业生态学技术为基础的农场就可以将其所有“废物”倾倒在“公用地”上而不会对“公用地”产生任何危害。在此典型个案中,这个农场用不着去消化或处理它自己的这种实际上对“公用地”可能还有好处的“废物”。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所采用的技术是致命性的,那细微的衍生物(同落到单个资本自身头上的成本相比是细微的)也会对自然和人类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例如,核工厂的微量泄漏物。简而言之,社会成本与技术问题虽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正如我们在此所表明的,它们在概念上还是可以被区分开来的。

5. 经济萧条时期的成本削减倾向于导致单位生产污染量的提高,这就会增加总的污染量。大卫·彼拉(David Peera)也作过一个相关论述:“环境保护主义运动致力于减少制浆厂有毒废物的排放量,如减少单位生产的排放量。在经济繁荣时期,单位生产的排放量是可以被降下来的,然而,由于总生产量在绝对值上的增加,有毒废物的总量还是会增加。一个制浆厂的肮脏程度不仅是某种排放标准的函数,还要看是处于经济扩张还是经济收缩时期。因此,环境保护主义运动仅仅努力降低排放标准还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考虑(就像他们做的那样)改变生产过程。这样就成了零排放或清洁生产运动。” 210

6. 参见安德鲁·梵伯格(Andrew Feenberg)、“技术批判理论”,莱斯·列维多(Les Levidow)、英斯特拉·金(Ynestra King)、安德鲁·梵伯格(Andrew Feenberg)以及罗伯特·马洛特(Robert Marotto)的讨论,

“太阳能的内在涵义：太阳能资本状态下的社会与保存”，均见之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1990年10月，第5期。

7. 这种双重过程始终是相互矛盾的。例如，萨维·诺保(Savid Noble)在其《生产的力量：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历史过程》(纽约：肯洛夫，1984年)一书中就已指出，数控机器领域中最有效率的技术就已偏离了控制工人这一立场，转而倾向于采用那种被老板们确认为最有“效率”的技术。

8. 关于这个问题的经典研究是哈里·布莱夫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二十世纪的工作退化》(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近几年来许多对劳动过程和工作关系的研究也已强调了劳动控制在意识形态管理中的重要性(例如，参见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制造共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的变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年；理查德·爱德华(Richard Edwards)，《竞争地域：20世纪工作场所的变形》，纽约：基础书店，1979年；以及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积累的危机》，奥斯福德：巴塞爾·布莱克威尔，1984年，第5章)。

9. 关于这一主题，最著名的著作仍然是孔门勒尔的，见前引书，1971年。“社会成本”与技术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在概念上还是可以把它们区别对待的(参见弗兰克·贝肯巴赫(Frank Beckenbach)，“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成本”，《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1989年，第3期)。

10. 马丁·奥康纳(Martin O'Connor)，“相互依赖性和不确定性：对生产理论的一个批判”，《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1989年，第3期。

11. 迈克尔·莱布维奇(Michael Lebowitz)，“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政治经济学研究》，1982年冬季号第7期，第12页；吉恩·保尔·迪里格(Jean-Paul Deleage)，“政治经济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1989年，第3期。

12. 亚萨·克瑞斯丁·劳莱尔(Asa Cristina Laurell)与玛格瑞达·马左尔茨(Margarita Marquez)，《墨西哥的劳动浪费：生产过程与健康》(墨西哥，D. F.：艾迪森耐斯时代出版社，1983年)。

13. 道格拉斯·默里(Douglas Murray),“短把锄具的废止:社会冲突与国家政策在加利福尼亚农业中的一个案例”,《社会问题》,第30卷(1982年10月),第1期。

14. 弗朗西斯·桑德巴赫(Francis Sandbach),《环境、意识形态与政策》(蒙特卡罗,N.J.:亚伦希尔德,奥斯曼,1980年),引自B·马丁(B. Martin),“软能源,硬政治”,《潜流》(Undercurrents),1978年,第27期(4—5月)。

15. 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满足的限度》(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6年)。

16. 在“环境合理”的产品上所展开的淘金热正方兴未艾,(根据民意调查)它受到了四分之三的美国消费大众的支持。美国杜邦公司的氟利昂产品分部数年前受到指责说化学成分破坏了臭氧层,而现在,他们正着手于设计一些生产无氯的“环境友好的电冰箱”的工厂。一旦那些没有化学污染的电冰箱、电动汽车、节能洗衣机和干燥机进入了市场,耐用消费品需求目前的这种缓慢增长趋势也许就会受到极大的刺激,从而复兴福特式的积累模式。

17. 贝肯巴赫(Beckenbach)更为详尽地讨论了社会再生产现代模 211  
式的生态学意义(前引书,第78—81页)。另可参见罗伯特·沙里夫(Robert Schaeffer),“汽车病”(Car Sick),刊于《绿色和平》(Greenpeace),1990年,第5—6月期。

18.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前引书,第6章。

19. 亚伦·萨尔伯格(Allan Schaiberg),《环境:从剩余到匮乏》,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89页。

20. 巴里·孔门勒尔(Barry Commoner),前引书,1971年。

21. 大卫·皮耶拉(David Peera)写道:“在一给定的时间范围内,如在一个纸浆厂的整个资本的贬值期内,技术革新也许会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生产过程的这些生态后果也许反而增加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要我们把治疗人类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所受伤害以及治理自然如被污染的河流等所需的全部社会劳动考虑在内。因此,从长远来讲,修复生产条件的社会必要劳动就成了积累的一个障碍。”然而,“我们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意识:‘清洁生产’对于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以及更重要的,对于劳动过程,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清洁生产是否是更为资本密集型的?在一个清洁生产过程中劳动是否更为易于控制?环保主义运动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

22. 希恩·斯威泽(Sean Swezey)以及丹尼尔·法贝尔(Daniel Faber),“尼加拉瓜脱节性的积累、农业出口以及生态危机:以棉花为例”,《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1998年,第1期。

23. 约翰·S·德里泽克(John S. Dryzek),“和谐社会的环境政治学”,此文是为“和谐社会政治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之生态学专题学术讨论会所做的准备,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会议,1990年8月30日—1990年9月2日,旧金山。

24. 桑德巴赫(Sandbach),前引书,第143页;费阿斯鲁(Vyasulu),前引书。

25. 梵伯格(Feenberg),前引书,以及英斯特拉·金(Ynestra King)、莱斯·列维多(Les Levidow)和马洛特(Marotto)的前引书,《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1990年,第5期。安德鲁·梵伯格写道:“担心生态运动会偏离进技术统治论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忧虑。不仅如此,零增长政策、反技术意识形态、向巫术或前现代魔法倒退、以及对我们在各自特定处境下都已遭遇到了的计算机技术和技术进步一无所知这样一种普遍的麻木心态,等等,所有这些现象也使我感到担忧。”梵伯格的论文试图构建这样一种框架:不是把技术看成为敌人,而是把它当作为斗争中的一个潜在的同盟者,——只要生态运动能摆脱资本主义式的技术种类,或者资本主义式的技术制度化方式和技术分类方式。

26. 古普塔(Gupta),前引书;费阿斯鲁(Vyasulu),前引书。现在,以科学为基础的最先进的技术是生物工程。

## 第十二章

212

# 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 对海湾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世界经济的持续停滞以及其他能源的替代作用放慢了对石油制品需求的增长速度……共产主义联盟……已经解体了……这一解体加速了石油产业的私有化趋势，因为国有制已被贴上了失败的标签，而私人所有制则被吹捧为今后的惟一方式。所有这些因素的结果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包括那些前共产主义联盟中的国家，已经以一种 20 世纪 50 年代来从未有过的规模向国际石油公司开放了，而开放条件则倒退回石油公司的统治年代。

——迈克尔·坦策尔(Michael Tanzer)，“国际石油产业：最近的变化及其对墨西哥的影响”  
(《每月评论》，1994 年 9 月，第 2 页)

已有三代或四代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和其他一些激进社会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对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劳动问题作过理论阐述了。有一种观



点(这也是我赞成的)认为,在自由民主社会中实际上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它对应于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它对应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据说,真实的或经验的国家(以及它的政府)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功能。第一个是以各种方式推进资本的积累(例如,提供基层组织结构,某种有益的免税机制,各类补助金等等)。第二个功能是为国家本身提供政治合法性(例如,以匿名投票方式所进行的定期选举、言论自由、一人一票的投票规则等等),以及,尤其是为国家的经济政策(例如,削减资本盈利的税收以造就“经济增长”(使富人更富),给资本以补助金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提高利润等)提供政治合法性。

本书作者在《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积累的危机》这两本书中提出争论说,国家的所谓积累和合法性功能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即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取消另一个的倾向,或者说,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典型实现方式是:在其中,这两个功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得到“满足”。以此看来,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多数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都是趋于无效的;而且,同它们要解决的问题相比,在其转嫁矛盾的过程中,它们所带来的问题更多。具有那种会受到商业阶层赞许的明确目标和效应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很少的,而其目标和效应会被劳动阶层视作为完全有益的情况就更少了。注意,我在对国家、经济和社会(以及它们的矛盾)的这种理论分析中用了像“典型”、“趋于”和“至少”等等这样一些词汇来加以定性。这是因为对积累和合法性功能的矛盾定律来说,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例外。其一就是货币和金融政策,在当代世界中,这些政策的目标毋宁说是扩大生产和增加就业,还不如说是防止通货膨胀,因此它们是金融资本的利益的直接反映。其二是“法

律与秩序政策”，它是相当明确地站在资本主义财产所有者这一边而不是自食其力的财产所有者和无产者这一边的。

第三个例外似乎就应是“能源政策”了，尤其是石油政策。在此，可以很典型地看出政府是如何惟石油垄断资本的号令是从的了，这也就若隐若现地暗示出了石油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政府对石油在其“生命周期”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毁灭性的生态恶果的置若罔闻与漠不关心，也正是在此得到了典型的体现，而石油生态恶果比任何一种其他的单个商品所产生的影响都要广泛且更具破坏性。这并不是因为政府无力去合法化其石油政策（这几乎始终是一种要进行巧取豪夺的政策）；相反，这是因为这种合法性有变得脆弱而公开化的趋向，——宛如一种事后确认。

由石油垄断资本和资产阶级操纵并为其利益服务的这些石油政策，就其取得合法性的企图而言，是一目了然的。关于这个问题，其中一个例子将主要放在本章来讨论（另一个例子则在下一章讨论）。在1991年，美国曾试图使其在中东的地区性事务中的大规模军事干预行为合法化，而其途径就是借助于那个明显是自私的“新世界秩序”学说。（在第二个例子中，英国政府则为其（受石油垄断资本驱使的）北海石油过度开采政策寻求合法性，而在此过程中，谢德兰群岛却面目全非了。）这两项研究都有力地说明了，石油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而且，石油垄断资本一般都得到了他们所想得到的东西，常常还受到其政府百分之百的支持。

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美国同伊拉克的战争这一问题上，和平运动主义者分为两个思想派别。关于这场战争，其中一个派别持一种经济理论，另一派则持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强调了海湾石油的控制、石油以及石油收入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参议员、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

214 席班尼特·约翰逊于1991年2月说：“同伊拉克的战争是因为石油。”政治理论则突出了中东政治的紧迫性、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作用、以及国家政府安全的必要性，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抑制共产主义”与击溃民族解放斗争而建立起来的。乔治·布什总统说，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巩固形成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从政治层面来讲，经济理论认为，要重构国家和世界经济，美国资本主义就必须发生根本的变化——尤其是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消费需求以及巨额投资的倾向等等在类型和模式上的变化。在此经济结构中，帝国主义式的“资源竞争”和战争都将不再可取和可能了。政治理论认为，未来若要避免帝国主义式的危险，在总统和议会改革，以及从根本上缩小五角大楼和军工复合体的作用这些问题上，要走的路还很长。因此，一方面，这两种理论在需要废止军工复合体并从根本上改变联邦预算的倾向性这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另一方面，在经济理论强调投资决策民主化和造就绿色经济替代物的重要性时，政治理论则强调白宫需要有一位持改革立场的民主党党员，——他将有助于这个国家对“国家安全”重新进行定义。

初看起来，这两种理论是相互排斥的，但实际上它们是互为补充的。两者都有属于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和事实。但是，这两者都是部分真理，是在理论和历史的不同抽象层次上对同一事件的两种解释方式。

之所以有这两种理论的原因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规则并不自动确认政治规则。资本主义国家是“相对自主的”，这是欧洲以及北美资产阶级争取从形式上明确区分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一漫长斗争过程的结果。就经济角度而言，它所采取的形式是在君主财富与公共资金、君主土地与公共领地、君主实体与私人企业之间作出

区分。就政治角度而言,它所采取的形式是自由主义。从那以后,资本就必须从政治上把自己组织起来以获得和维持其政治权力。如果说还得提醒什么人注意这一基本事实的话,那么会被想到的就只有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的美国产业联盟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了,这个团体想把联邦权力直接交付到政治上由罗纳德·里根领导的资产阶级的

手中去。

但是石油这个例子却很特殊。炼油是规模最大的产业部门,而且石油产业的人均销售额和利润额在所有列入《全球财富 500 强》的企业中也是最高的。而那些在战略重要性上稍逊一筹的产业部门则不得不为其在联邦政府中的权力而展开争斗。他们必须控制联邦管理机构并使其中立化,或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寻求 N·普兰查斯所说的那种“避难所”。或者说,他们所享有的权力是否定性的:即对政府的政策采取不合作态度,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发动罢工。然而,石油和能源资本——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产业协会、管理委员会以及避难所——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却拥有一种特权地位。在美国 215 和欧洲,“能源问题”并没有被看作为一个国际贸易问题,而是被看作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sup>1</sup>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石油是资本、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价值的实现的奥秘所在,并且一般来说,它也是资本流通的奥秘所在。矿物燃料能源曾经推动了工业革命,并且还在推动着今天的采矿业、农业、工业和商业。矿物燃料,尤其是石油,使资本摆脱了对人力的依赖,因此,它们是用以对抗劳工运动的强有力的武器。以石油为基础的塑料制品则使资本摆脱了对资本主义历史上一个最不妥协的劳动者阶层——金属产业工人——的依赖。就提高劳动生产力以及随之所带来的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而言,石油要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商

品。电力,这个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商品,也主要是由石油和煤炭生产出来的。而且,石油还推动了一个巨大的汽车市场,催生了汽车文化,更不用说还创造了无数其他的商品市场,这就使资本在市场中的实现得以可能了。

石油财富不仅是资本价值生产和实现的关键因素,它还是世界范围的资本流通的一个重要因子。石油是名副其实的“黑色黄金”,有些人还认为在旧的黄金标准解体之后,在全世界所通行的就是一种石油标准。总而言之,离开了石油,就不会有生产力、市场、利润等,也就不会有用来支撑起世界金融体系的石油美元,也就不会有五角大楼。资本主义也就不会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了。任何其他商品都不可能具有这种功能,即便计算机也不行。这就是为什么石油与美国资本主义,以及石油与美国帝国主义长期以来被看作为同义词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石油经济学和石油政治学始终是美国历史上互为因果的两个肮脏层面的原因。

在这个横贯整个大陆的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帝国里,就其内外政策而言,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充裕、稳定而廉价的石油供给以及巨额的石油收入对于经济繁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商品具有石油这样的经济奇效。

超过25%的世界石油产量(包括每年1000亿加仑汽油)是被美国消费的。该国几乎50%的石油补给都是进口的,而其中有一半多是来自中东(到战争前为止,从伊拉克本国进口的就从1980年的0%上升到了7%)。<sup>2</sup>世界生产的另两个发动机即日本和德国的原油绝大多数也是从这个地区进口的,该地区蕴藏的石油占了世界已知石油储量的三分之二(在1980年时还只是59%)。<sup>3</sup>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中东在石油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以每年一百多万桶的速度递增——“世界现在又像1980年时那样依赖于波斯湾地区

了”。<sup>4</sup>到2000年时,这种依赖性会变得更大。<sup>5</sup>因此,如果说北部国家的繁荣对波斯湾地区原油的依赖性要超过任何其他一种经济因素,这决不是夸大其词。当布什政府决定采取“自由市场解决办法”而继续忽视能源保护和发展替代能源时,这种说法就显得更为真实可靠了。

其次,美国和世界经济有赖于稳定的石油供应。可靠的石油生产和进口使得石油价格的波动维持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因此,这有助于稳定美国的贸易平衡。平稳的石油输入还意味着石油美元的平稳流动,而这有助于稳定美国的支付平衡,并弥补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而稳定的石油生产则以一个安全的、友好的、政治稳定的中东为其前提。 216

第三,美国需要廉价石油,而海湾地区的石油,除了20世纪70年代因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努力而使石油价格在1973年涨了四倍以及1979年使其又翻了一倍以外,一直都是很便宜的。海湾地区的石油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都是廉价的,一方面是因为其品质高开采成本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那里发现石油时起,西方国家就在这一地区享有政治霸权。当英国在海湾地区行使政治权力时,那“七个姐妹公司”则在油田上施行其霸权。南加州、德士古、埃克森与美孚这四个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管理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南加州、德士古、海湾、埃克森、美孚、壳牌与英国石油这七个公司在伊朗统治着伊朗财团(Iranian Consortium);而海湾与英国石油这两个公司则在科威特垄断着科威特石油公司。

然而,这些垄断公司的行为看起来却并不像一个垄断者的行为。它们并不限制生产以求贵卖石油,相反,它们却在全世界扩张石油的生产和市场。因此,在欧佩克(OPEC)出现以前的几十年时间中,原油的价格呈平稳下降状,只是幅度有



些变化而已，——这一切都说明了廉价石油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在西方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原油价格之间的那种几乎完全成反比的关系衬托下，这已成了昭然若揭的事实了。

到了20世纪70年代时，西方帝国主义对海湾石油的控制开始减弱。英国的权力与影响衰退了。美国当时并没有冲进来填补这个真空地带，因为它在越南还脱不开手，因此，它相反地是试图通过政治代理人来实现其统治，例如伊朗的君主政治。只是在“赎罪日战争”之后，当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欧佩克(OPEC)对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施加压力之后(并且只是在“地球日”和对“有限资源”发起了一轮新的广泛讨论之后)，吉米·卡特总统所领导的美国政府才给予其在海湾地区“生死攸关的”利益以强烈关注。“石油安全”在美国政治中成为一个支配性的主题；美国改进了它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世界(石油)生产的扩张，能源的储备，以及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经济不景气所导致的石油价格的下降趋势贯穿于整个80年代。虽然美国的石油利益集团希望有一个较高的石油价格，但美国的银行和工业企业却持一种“充足供应的观点”，即希望价格较低。而击败伊拉克也许就可以被看作为是20世纪90年代——一直都期望这是个经济坚挺时期——维持较低石油价格的这一计划的一个最后冲刺。

第四，对于美国金融的良性循环来说，大量的石油收入——石油美元——已经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大部分石油是以美元来标价的，而且大多数的石油财富也是投资于西方世界的，或者是通过美国、英国及一些海外银行来周转的。从原则上来讲，石油收入帮助美元维持了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而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使美国经济继续呈现出强劲的外观。通常都以美元来为石油定价这一事实还有助于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在世界



前十家最大的银行都是日本银行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其实力。

实际上,同80年代相比,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美元的量更为巨大,因为这时的石油价格还比较高,而到了80年代,石油价格下降了,而且日本和欧洲货币也充斥进美国的外贸和联邦赤字中来了。然而,到了90年代,德国的投资方向向东转向了他们自己的后院中去了,日本则关注于他们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利益了。而由这所带来的众所周知的结果就是,德国的资本短缺和较高的利息率,进而投入美国的资本在20世纪90年代缩减了50%还要多。此外,美国的贸易赤字也变得越来越棘手了,这部分是起因于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的前半期在海外的生产工厂投资过滥——那时美元还非常强劲。今天,疲软美元就导致美国的出口同以往相比减少了,因为现在大陆工厂中生产的商品相对来说较少是面向海外市场的。这就意味着对于美国金融来说石油美元具有了比乍看之下更大的重要性(在美国中央银行于1988年花费了500亿美元来维持海湾到西方的石油通道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在此政治经济局面下,对石油收入的控制以及石油美元的功用在全球金融稳定性中就具有了一种新的重要性。<sup>6</sup>

美国从伊拉克1958年革命时起就对其激进民族主义持反对态度。在伊朗国王于1975年夺走伊拉克的海湾港口通道时,美国就在背后支持了伊朗国王。而当戴维营协定将埃及从中东地区的领导地位上拉下来以后,萨达姆·侯赛因就努力来占据这个权力真空,这使得美国十分忧虑。在伊拉克攻击伊朗时,里根政府暗中支持伊拉克以反对那个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国家,即进行原教旨主义革命的伊朗,但是在伊拉克与伊朗讲和之后,这种支持也就结束了。到1988年时,伊拉克为实现其在中东地区的野心大大增强了陆海空三军的力量,而美国则着手寻求降低萨达姆威望的途径。

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吞并,既被广泛地看作为是对石油的自由流淌和石油收入的一个威胁,也被普遍看作为是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和权力的一个挑战。伊拉克和科威特合在一起,其石油储备就翻了一番,这就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以及以色列构成了威胁。因为那些酋长和国王们——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同盟者们在政治上的稳定对于石油供应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以色列的安全对于西方在海湾地区的帝国主义事业的安全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出,这对于美国政界与商界人士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冲击。

伊拉克也试图为其占领科威特的行为寻找理由,说后者是对伊拉克进行经济侵略的罪魁祸首——这是一个在阿拉伯世界被广泛认可的说法。除了伊拉克的海湾通道问题以及伊拉克在两伊战争期间对科威特所负下的债务的偿还条款问题外,1989年~1990年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石油的价格问题。

1985年以后,尤其是在1989年~1990年间,决定石油价格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在1981年到达顶点以后,原油价格逐年平稳下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985年,在该年10月召开的一轮欧佩克(OPEC)会议上各方未能就新的出口配额达成共识。此后,沙特阿拉伯在1985年~1986年间的日产量从3200桶上升到了4700桶。<sup>7</sup>

石油价格从27美元每桶剧跌至15美元每桶,最终达到了7美元每桶这样一个低价。有消息来源说沙特阿拉伯的目的就是削弱伊朗经济并强化伊拉克的战争努力。另一种说法则指出沙特阿拉伯想惩罚欧佩克中那些超出其官方配额进行生产的成员。<sup>8</sup>还有一个理由也许是沙特阿拉伯想放缓其他石油生产国的石油勘探和生产的发展速度以保护海湾市场。于是,沙特阿拉伯1987年缩减其产量到日产4000桶,不料到

了1988年,它又回过来将其日产量膨胀到5100桶。

伊拉克、美国以及美国在海湾的“小伙伴”三方在1989年~1990年间围绕着石油价格所展开的斗争的结果,已经预示了战争本身的结局:伊拉克明显是输家。由于石油的过度生产以及石油低价,在1989年5月的阿拉伯峰会上,萨达姆·侯赛因就把其敌意全部集中到了他的南方邻居的身上了。到1990年7月时,经过该年上半年疯狂的石油市场倾销后,萨达姆事实上就减少产量这一问题赢得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形式上的同意。但是,科威特,这个在欧佩克配额问题上弄虚作假的主要嫌疑犯,明显没有遵守约定的诚意。21美元一桶这一受各方认同的价格底线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沙特阿拉伯1990年6月是按13美元一桶这种价格出售原油的。另外,单是沙特阿拉伯的生产能力就大大地超出了需求,而且,科威特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生产能力也都超出了他们各自的欧佩克出口配额。<sup>9</sup>而相反,伊拉克却没有任何超额生产能力;萨达姆只有通过强制欧佩克限制生产提高价格来增加其石油收入。因受美国的逼迫,科威特继续违反欧佩克配额,据报道说,每桶石油价格每下跌1美元,伊拉克每年的损失总数就达10亿美元。<sup>10</sup>

1990年7月31日,虽然科威特似乎是愿意安抚一下伊拉克的,但是由于美国的坚持,科威特还是突然中断了进一步的谈判,任何一种或许会增强伊拉克地区权力的谈判条件,美国都加以反对。<sup>11</sup>

在围绕石油价格的争斗中,美国旗帜鲜明地维护其在海湾地区以自我为中心的战略利益。布什(以及科威特)对伊拉克的经济侵略需要从两个层面上来加以理解。首先,美国及其小伙伴知道伊拉克没有多余的生产能力,因此需要较高的石油价格来增加收入。而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却相反。从更深的层面来说，伊拉克，因为其石油/人口比例相对来说比较均衡，所以把其大部分石油收入投资到军事、经济发展以及国内社会福利中去了。因此，可以把伊拉克描画成一个重商主义的食利者国家，它有借助于限制生产而推高石油价格并以此来提高地租和垄断商业利润的强烈动机。

相反，海湾的那些酋长国和王国的石油/人口比例却很高，并且他们的大部分石油收入都投资到西方去了——以科威特为例，它在战略上就会顾忌对华盛顿和白宫的政治影响。

219 在1986年和1988年，科威特从国外投资中取得的收益实际上要超过其石油收入。同科威特一样，沙特阿拉伯在西方资本主义成长产业中的投资也很多，例如德士古公司的炼油厂及其美国东部地区的加油站有一半的股份就是属于它的。沙特阿拉伯还计划在亚洲投建一些炼油厂，亚洲石油需求的增长远远超过欧洲和美国。“沙特阿拉伯一直都渴望把自己从一个纯粹的原油生产者转换成一个完全综合性的国际力量，如在原油生产、运输、提炼以及零售等方面。”<sup>12</sup>

这样，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利益就同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类似了，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十分希望西方世界能很好地得到石油和货币的滋润，为此他们就扩张生产并维护石油低价：“在沙特阿拉伯同伊拉克与伊朗这样一些国家的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前者石油储量丰富并偏好石油低价以使世界继续依赖于石油，而后者则希望获得高额（石油）收入用于刺激发展。”<sup>13</sup>美国资本也受益于（石油）低价——尽管这会对其国内高成本的（石油）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当剩余石油收入重新又回流进美国经济中来时，这种受益就更是明显了。总之，伊拉克作为一个石油势力主体的客观利益同美国海湾地区“同盟者”的利益是正好相反的。<sup>14</sup>

关于海湾战争的这种经济理论,值得称道的地方很多。然而,经济理论仅仅是真相的一半,而且是“背景性的”一半真相。同这种经济逻辑大致平行,还存在着一种政治逻辑,布什的政治动机同美国的经济动机是相伴并存的。

关于这场战争的这种政治理论,一方面充分认识到了中东政治学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强制性”予以充分的关注。首先,伊拉克显然相信,它对科威特所采取的行动,向东为阿拉伯世界防御了伊朗人,向西则抵制了以色列人,这会为其从如果不是全部也会是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那里赢得支持。<sup>15</sup>在伊拉克看来,只有当一个阿拉伯国家能够形成对以色列的某种军事优势,特别是对其形成某种可靠的军事威慑时,以色列才不会再在是否允许紧靠其边界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个问题上持不合作态度了。于是,萨达姆·侯赛因把科威特1989年~1990年间的“经济侵略”不仅看成为是反阿拉伯的,而且也看成为是亲以色列的。他的错误在于,明显夸大了阿拉伯世界中的亲伊拉克和反伊朗、反以色列情绪,同时他还低估了美国在保卫以色列及其石油生产附庸国这个问题上所作的承诺。

其次,从美国政治的未来这个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这样一种动态结构:帝国总统制、五角大楼与国家安全机构、军事工业复合体以及美国普遍的冷战文化氛围。政治论据也就是所谓的“新世界秩序”——不是定义为世界中的新秩序,而是定义为由新世界(即美国)来排序的世界——,这实际上是由美国在二战后为了抑制共产主义和第三世界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旧的世界秩序”,为的是让美国能够毫无障碍地获得原材料、劳动力、投资渠道以及南部国家中的市场。由此看来,所谓“新世界秩序”仅仅是一种“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在经济理论把地缘政治学定义

220

为关于石油的地质政治学时，政治理论却把地缘政治学定义为关于附庸国、亲善政府以及势力圈的地理政治学。

政治理论是从美国始于一战的全球野心和在二战结束时构建的政治态势出发的，二战结束时，美国承袭了同盟国和轴心国中那些衰落了的和被打垮了的帝国的大部分霸权。用不着认真探讨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那时制定的国内政策是反对改革的，而全球政策则以抵制共产主义的名义走上了扩张的道路。美国在扮演了世界警察这一角色以后，国内改革实际上就被搁置一边了。国家安全体系体现为国家机构中的统治性机关。五角大楼在朝鲜战争和越战期间极度膨胀了；总统制变成了一种帝国总统制；军事工业复合体变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驱动力量；而冷战和核威慑则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尽管分别于1949年和1959年“丢掉了”中国和古巴，美国的权威还是被成功地嵌入了世界的其余部分。在那些已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中，美国往往支持那些最为反动的政治势力，例如在希腊、菲律宾、危地马拉和伊朗等。朝鲜就是个典型事例：美国人站在南方那些曾经同日本侵略者合作的朝鲜人一边，来反对那些曾领导过抵抗日本侵略斗争的北朝鲜人。与此同时，在正经历着非殖民化浪潮的亚洲和非洲，美国又把自己打扮成反殖民势力的朋友。但对于那些胆敢实践激进民族主义的国家，例如印度和加纳，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却又转而反对那些民族主义者。

但是，美国在越南和东南亚的败退构成了对这个由美国来主宰的世界秩序的一种解构威胁。1968年的春季攻势意味着美国世界霸权政策的“可信性”可能已开始破产了。水门事件，中央情报局在宗教委员会中的渗透的曝光，日益加剧的“越战综合症”，南部非洲阵营中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法



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最后垮台,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在英国和欧洲的得势,以及欧洲共产主义的抬头等等威胁都带来了难以修复的“信用危机”,并使国家安全体系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在拉德杰尔·R·福特总统和吉米·卡特总统的软弱统治下,20世纪70年代成为一个政治混乱时期,那时,在国家安全管理者和统治精英中弥漫着一种沮丧情绪。此时,虽出现了一个政治真空(麦戈文<sup>①</sup>曾试图去填补这一真空),然而由于那些新的社会运动过分关注个别政治问题,政治上也没有什么鼓舞人心的地方,因此无法填补这一虚空。罗纳德·里根与共和党人却不是这样,他们采取了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的路线,并且还得到了新一届的产业联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众所周知,国家安全管理者们的庄严誓词正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可信性”将以某种方式得到修复。因而,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也就有了:军事扩张、美国入侵中美洲以及以美国世界霸权为象征的政治学。 221

后来,冷战的结束以及南方国家中民族解放斗争的不断回落,使得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和军事工业复合体突然丧失了它们的最重要的合法性根基。在第三世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欧洲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国家中,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胜利也都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在1989年~1990年,自由民主党、环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军工转产鼓吹者以及其他的许多改良主义者和社会运动团体开始试图去填补这一政治虚空。许多地方政府,尽管财政窘迫,但却已转而去进行

<sup>①</sup> 麦戈文,乔治·斯坦利(McGovern, George Stanley),生于1922年,美国政治家,来自南达科他州的美国参议员(1963年~1981年)。他反对越南战争,1972年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被击败。——译注。



政治改革了。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开始，孤立主义者的伤感情绪比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强烈<sup>16</sup>；而从 60 年代时起，国内改革问题首次得到认真对待。又可以听到人们谈论“（当国防经费减少时可取得的）和平时期公共事业经费”这个问题了，这实际上与“对富人征税”是同一个说法。在 1989 年～1990 年度财政预算的辩论中，自由民主党与其他一些人开始质疑许多军事计划的必要性，要求重新排定国家优先发展战略。某种非扩张主义的国内改革方案即便不是一个趋势，似乎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选择。

同时，帝国总统制和五角大楼则被褫夺了它们的主要存在理由。美国的世界霸权形象与其推行霸权的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在此情形下，严重的信任危机就始终没法排除了。然而，一场受到赞许的成功战争就能弥合这一差距，并且，这还是以一种里根式的冷战政治学、对格林纳达与巴拿马的入侵所无法企及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样一种战争能使武装力量在国内的受尊重程度大幅提高，而国内改革问题也不会再来烦心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美国经济滑入衰退期后，这种呼声更高了。也许最重要的是，乔治·布什这个中央情报局出身的二战飞行员，面对着疲软的国内经济，无疑希望为 1992 年的连任竞选给出一份“不可战胜”的计划，用一场大规模的“可以赢得的”战争来“重塑强大的美国”，并保证使自己可在美国历史上赢得一席之地。

因此，尽管有来自于各种主流强力人物的反对，布什政府政策中的战争动机仍然很强烈。手头现成就有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准备好了的高技术军事机器。格林纳达和巴拿马事件为控制媒体和战争宣传手法提供了实践机会。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则提供了机遇。五角大楼可以在海湾玩它恐怖的任天堂游戏了，可以检测它的那些新的致命玩具了，同时，这在国

内还阻挡了那些反军国主义运动和有针对性的改革要求,进而树立美国霸权及其“可信性”,并使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得以在生活中苟延残喘,而这一切都披上了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伪装。

关于海湾战争的政治理论至少同经济理论一样引人注目。而且就理解布什的战争政策的政治目的而言,这种政治理论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关于经济和政治动机之间的这种差别,人们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即觉得这种差别不是重要的。把石油和乔治·布什这个“战争总统”都撇开不谈,权力和利益其实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很久以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就称其为“军事—工业复合体”——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的基石。要说明这是如何发生的,就必须再对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进行一次回顾。 222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美国政治领导人和国家安全管理者们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暗淡的,同时,美国经济领导者所看到的也是一幅凄惨图景。世界经济停滞了。平均利润率下降了。1973 年的石油危机(随着还有 1979 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是一个原因。石油危机标志着西方世界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减弱了,它还代表着为数众多的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新的独立性。各种经济问题都浮上了水面。美国在海外和国内市场上都越来越多地遇到了来自东北亚和欧洲的竞争对手。一种称作为“滞胀”的新经济现象使经济决策者们困惑不已。在 70 年代结束时,银行和“金融财团”普遍因为恶性通货膨胀而忧心忡忡。

最重要的是,世界商品需求的增长率下降了。全世界商业圈都用一种残酷的成本削减政策来应对危机谋求利润。卡特总统呼吁能源节约和能源自主从而削减能源成本(同时美国还建立了用于保护国外石油供给者的快速反应部队)。受

过高生产率的困扰,并且为了减低危险的通货膨胀率,商家们支持在1981年~1982年实施有计划的紧缩政策。实际工资继续减少,失业继续增长。但是,那个神圣的“生产成本”终于开始走低了。

经济危机应对者们所采取的成本削减政策带来了这样一种威胁:进一步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世界需求——这是减低真实工资、失业、小企业破产以及迫在眉睫的农业危机的必然结果。里根和扩张主义者上台后,他们仍然没有考虑:实施改革政策,进行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进而增加劳动阶级的收入以提高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相反,在商家缩减生产成本帮助着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金融系统和联邦储备系统却开始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信用货币(最后还有债务)的扩张。消费者、商家和政府的信用开销助长了有效需要。同其收入相比,消费者的信用开支(以及债务)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而与其资本和收入相比,商家和联邦政府也借了太多的钱,这样,它们就一个一个地使自己越来越深地陷进了债务的泥潭。

在消费主义、投机买卖和贪欲分别驱使着消费者信用泛滥和商家借贷过度时,国家安全管理者和五角大楼的采购专家们则为联邦赤字推波助澜。一种血腥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推崇。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美国在国内外的军事和公务开支同时迅速增长了两倍。在80年代间,军事预算增加了40%还强,而除了用于失业救济等公共事业方面的开支外的所有其他预算都下降了。并且,私人的和公共的研究与发展预算也更为依赖于五角大楼的慷慨大方了。在美国军223 国军工企业和跨国企业的引导下,美国高技术的发展也主要服务于增强五角大楼及大企业的通讯、协调和控制能力。与军事有关的工业在80年代成为繁荣兴盛的工业部门,同时它

还是一个成功的出口部门。最后,这个军事—工业复合体还成了美国某种社会政策的代言人,涉及了住房、卫生和教育津贴,以及薪金和养老金等,这在被安·马库森称作“枪形地带”——指从西雅图起经过东南部和德克萨斯直到洛杉矶为止,覆盖了从佛罗里达到波士顿 128 号大道的一整片半月形地带——这一区域中尤其是这样。

这样,一个持供应经济学政策(通过减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的管理层就采用了一种以需求为取向的政策,即通过军事消费来维持有效需求,并以此来代替名副其实的国内改革和社会政策,进而在世界上恢复美国的“可信性”,在国内为军事力量与法律—秩序文化赢得尊严。美国就危险地近似于一个军事国家了。美国帝国主义和个人主义这对危险的畸形孪生子也就前所未有的活跃起来了。因此,布什自感他可以作为自哈里·杜鲁门以后第一个赢得战争的美国总统而被记入历史了,这同如下事实一样毫不足怪:普通美国公民最后还是给了布什以充分的支持。

上述分析线索有力地表明,乔治·布什有许多同伊拉克开战的动机。用结构主义的语言来说,海湾战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而用韦伯式的话语来说,体现在这场战争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相互之间有一种“选择性亲合力”。借用侦探小说的语言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在阿加莎·克里斯蒂娜设计的这个谜团中,H·波洛发现每个嫌疑人都具备谋杀动机,而且他们每个人事实上也都参与了谋杀那个彻头彻尾的坏蛋的行动。

布什的战争动机为数众多并且在结构上互相关联,而且出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需要,这场战争在政治上也得以合法化了,这些事实都鲜明地反衬出了和平运动以及其

他的一些社会运动——包括环境和劳工运动在内——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面临着的难题。那些努力阻止未来战争，发动国内彻底改革的社会运动在 90 年代所面临的障碍，同美国近代历史的任何一段时期相比，都没有任何的改观。石油和美国霸权——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本质所在——处境可危，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领导地位同样也岌岌可危。现在，可以把石油看作为经济和帝国主义目标的手段；政治学、五角大楼、军事—工业复合体以及银行系统则可看作为石油目标的手段。石油受到了威胁，国家安全体系以及美国的“可信性”也就受到了威胁；五角大楼和军事—工业复合体受到了威胁，石油也就受到了威胁。于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就坠入了一个几乎是深不可测的黑洞之中了。

因此，凡有所作为的和平运动就必须在国内改革问题上同样卓有成效，反之亦然。和平运动不能听任美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外交政策的任何重要方面原封不动；改革运动不能听任美国国内生活中的任何重要方面保持原样或免于彻底变革。这就是海湾战争带给我们们的一个清醒的教训：以个别问题为指向的运动以及运动的“纯洁性”现在已成了社会变革的障碍。在生态危机的既定国际格局中，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条件下，需要把生态学与经济以及社会正义问题联系在一起或者统一加以解决，这一点尤其重要。最后，凡想有所作为的和平—改革运动，包含激进绿色政治学在内，都必须以某种传统型的政治运动为前提——在总统政治这个战线上展开斗争。没有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力主改革的总统，要想对国家安全体系以及由它所代表的一切提出实实在在的 challenge 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

各种合理的激进绿色主义者在如何阻止未来的扩张战争以及发起国内的彻底改革的具体方式上是会有分歧的。但

是,有一个任务看来还是最基本的。这就是,这些运动必须赋予清除国家安全体系这个现在即使就其自身来看也是病态的怪物的任务以优先性。要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同美国的那些扩张主义集团及其经济的和政治的基层组织展开长期的斗争,而这是要付出极大的和一致的努力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也是一个在国内进行彻底改革的斗争,反之亦然。从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W·E·B·杜比亚斯和“信使”团起,到60年代的马尔科姆十世和马丁·路德·金,再到80年代的耶西·杰克逊,这些黑人运动领袖清晰地认识到了美国政治的这一基本内涵,即认识到了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含海外的帝国主义与国内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关联,然而,大多数的美国人现在对此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甚至许多左派人士也同样如此。这意味着,对布什战争的普遍支持或许会将国内改革的时机向后推迟若干之久。宣扬武力,把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当作不爱国者加以严惩,用消费主义来代替改革,如此一种穷兵黩武的扩张主义国家就成了一种真实而可怕的前景。但是,我们必须始终谨记:“新世界秩序”并不意味着一个由“新世界”来排序的世界,而且,“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可能还意味着,美国要对地区的和国际的政治冲突的和平解决负责,而在国内战线上则必须为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拿出平等的与理性的解决方案。

### 注 释

1. 丹尼尔·尤尔金(Daniel Yergin),“20世纪90年代的能源安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8年秋季号;“谁控制了人们的能源供应,他也就控制了他们的财富、权力以及价值体系,而且……就像



现在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那样,文明的能源基础的任何改变都必然会带来民族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强烈的社会冲突。”(马克·瑞德(Mark reader),《Aleh-Zon》,1991年2月,第2页)。石油“几乎是经济活动的所有方面的一个核心基石”(“价格提升……”,《石油与天然气日报》(Oil and Gas Journal),1990年8月13日,第2页)。尼克拉斯·乔治-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所提出的“伟大的政治学与矿物资源之间的那种不可分解的联结”,就是这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从他自己国家(罗马尼亚)为争取石油所作的斗争中所清晰地认识到了的东西(由伦纳德·希尔克(Leonard Silk)引自“经济图景”,《纽约时报》,1990年12月14日)。

2. 美国在1960年的日均进口量不到二百万桶;1970年是三百万桶;1980年几乎到了七百万桶;1990年接近八百万桶。在1983年到225 1990年间,石油进口量从开始时的刚过四百万桶翻了一番。因为“里根政府实际上竭力清除了所有的企图减少石油依赖性的政府计划”,在1970年~1990年间,美国除阿拉斯加以外的石油生产量逐年下降。含阿拉斯加的石油在内,1970年~1975年间的国内石油生产量是下降的,在1975年~1985年间是上升的,而到1985年~1990年间又下降了。“美国的能源景象与欧洲和日本越来越相似了,即都缺少廉价的国内能源资源”(克里斯托夫·弗列文(Christopher Flavin),“克服美国对石油依赖性”,《世界瞭望》,1991年1—2月期,第28页,第30—31页)。

3. 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联合体”中,这些国家分别有2550亿、940亿和980亿桶的石油储量;伊朗和伊拉克则分别有920亿和1000亿桶;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合在一起有1100亿桶强;前苏联有590亿桶,而美国只有260亿桶。

4. 弗列文(Flavin),前引书,第30页。

5. 到2000年时,还具有可供出口的石油储备的国家将缩减到几个海湾国家。“几乎世界石油全部的富余生产能力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马休·沃德(Mathew Wald),“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0年7月19日)。并且,“由英国建立并受西方世界操纵的那六个集团控制了世界石油储备的34%”(爱伦·马奇:“科威特是什么?”,《走向自由》,



第39卷,1990年10月~1991年1月,第8期,第4页)。

6. 在1990年,世界上各家银行分别欠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银行240亿美元、75亿美元和91亿美元(《左派经济观察家》(Left business observer),1991年1月28日,第43版)。

7. 据欧佩克(OPEC)的《统计报告年鉴》(1998年)。

8. 马里恩·法洛克-斯罗盖特(Marion Farouk-slugett)与彼特·斯罗盖特(peter Slugett),“1986年以来的伊拉克:萨达姆力量的增强”,《中东报告》,1990年11月~12月。根据这一资料,沙特阿拉伯在1985年~1986年间的石油出口从200万桶增加到了450万桶;路易斯·乌奇特勒(Louis Uchitelle),“海湾战争的胜利可能会提高美国在欧佩克中的影响力”,《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1年3月5日。

9. “价格提升,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的石油供应危机的恐惧”,《石油与天然气日报》(Oil and Gas Journal),1990年8月13日,第17页;法洛克-斯罗盖特与斯罗盖特,前引书。

10. 参见《时代报》(Time),1990年8月6、13与20日的文章。

11. 《知识分子时事通讯》,1990年8月29日。

12. 卡尔·古德斯坦(Carl Goldstein),“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远东经济评论》,1991年2月14日,第38页。

13. 马休·沃德(Mathew Wald),《纽约时报》,1991年2月11日。

14. 特德·威尔莱特(Ted Wheelwright)于海湾战争前夜对石油的政治经济分析进行了总结(“石油与世界经济”,《竞技场》(Arena),1991年,第95期)。这个总结是值得讨论一下的。威尔莱特(Wheelwright)强调了石油低价给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商(他们大约供应了美国需求的一半)制造了麻烦,但却给美国的两个主要的市场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带去了好处。出于这种考虑,美国积极鼓励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施加压力,要求后者降低产量以提高原油价格。在1990年6月,就在伊拉克在科威特的边境上布置军队的前夕,原油售价是14—16美元每桶。在7月份的欧佩克会议上(7月26日),伊拉克得到了将价格升到每桶21美元的承诺(比伊拉克期望的每桶25美元要低)。对科威特的入侵发生在8月2日。根据《南方》(South)杂志上由荷尔加·格雷厄姆(Helga Graham)所写的一篇文章所作的分析表明,美国的石

油政策同我所作的描述相比要更为矛盾些,即当原油价格很低时美国与伊拉克的利益是相似的,但当石油价格相对来说较高时,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

226 15. 瓦利德·卡利蒂(Walid Khalidi),“海湾危机:起源与结果”,《巴勒斯坦研究期刊》,第20卷,1991年冬季号,第2期。

16. 对美国1990年8—11月间各主流报纸的意见和社论——由托马斯·巴耐特(Thomas Barnett)策划并汇总在《远东经济评论》上——进行一番考察就可以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支持在海湾地区实行一种单边政策;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是多边主义者,而另三分之一的人是孤立主义者。很明显,至少在联合国安理会定出1月15日这个最后期限之前,在美国国内支持用武力解放科威特,尤其是摧毁作为这一地区的主导力量的伊拉克的人非常少。同样很明显的是,布什的战略是赢得多边主义者的支持,隔离孤立主义者,以创造实施一种单边主义战争政策的条件。“留出制裁时间”这一口号与制定单边主义战争政策过程中的延迟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关系非常少;实际上,制裁得不偿失。延迟是赢得“国际合作”,进而在国内得到多边主义者的支持的需要。

## 第十三章

227

## 英国在谢德兰群岛的统治

自然的理由

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们知之甚少的石油沉积带,它位于英国谢德兰群岛与挪威之间的北海底下,正处于工业化欧洲的通道口上,——如果还算不上是门口的话。自1971年发现以后,北海石油就被普遍赞誉为英国解决支付平衡问题的一个途径,对整个英国经济来说也是一个福音。矗立在谢德兰风景如画的梭伦湾上的巨大的石油平台(是英国也许还是整个欧洲最大的石油平台),是以一种“粗暴的工业化模式”建造起来的(虽然还没有完工)。预计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章的写作时间是在1979年4月之前,它曾发表在1979年4月的《每月评论》上,故作者在此处说“预计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译注),它的日均石油产量大约是140万桶,其后将上升到300万桶,除供应英国需求外还有很多富余。英国和美国的垄断企业约拥有北海储量的75%,而要开发它,到80年代早期为止,至少需要250亿美元的投资。

如果说,北海正因其石油财富而闻名于世,那么谢德兰本身却在反对石油垄断公司的斗争中赢得了大卫(杀死腓尼基巨人古里亚斯的牧羊人)般的声誉。关于石油开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谢德兰在处理其与威斯特敏斯特(即英国政府)及石油垄断公司的关系时,谢德兰群岛的议会据理力争,因此,谢德兰所赢得的声誉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认可,尤其是在国外的那些计划论者和环保主义者中更是声名鹊起。开始有来自许多国家的计划论者造访议会设于莱厄威克的那个紧靠着港口当局的小小的计划办公室,——莱厄威克是谢德兰的主要港口。这些造访者来此就是为了见识一下地方自治所创造的这一奇迹,并学习一个人口仅有2万的社区实际上是如何制服这些世界最大的能源企业的。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正在复活的地方主义和民众主义对这个最新的“谢德兰经验”表现出了日益强烈的兴趣。

早先的“经验”一般可以用许多当地居民所说的“谢德兰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而其特别之处就是康宁斯堡自治区的历史和日常生活。这一自治区由散布于起伏不平的绿色岬地上的六块居住地构成,它们在南谢德兰主岛(Shetland - South Mainland)的英国标准地图上就像是一只跳跃的羊。毛塞岛上的史前圆形石塔遗迹(一种圆形的石塔,堡垒的一种形式)孤寂地等着偶尔一现的观光客,而岛本身则涉水延伸向南方。在个别日子里,当夕阳西下时,可以看见十二英里外直插布莱塞海峡的莱厄威克。缓缓向西走高的泥灰色小山丘上满是石南花,还有碎石垒起的围栏,农场建筑和新近落成的小农舍,才用铁丝圈成的改良草地,以及刚剪过毛的羊群。康宁斯堡湾(入水口)从岬地间蜿蜒而过,在那里,一艘45英尺长的朽烂鲑鱼船骸半埋于潮水之中。从岬地断崖上俯瞰下去,只见雾锁海面,而光滑的岩石上则是嬉水的海豹群。离岬地和海豹不远,在浓

雾深处,则是那在东边向我们招手的北海石油。

在长长的夏日里,康宁斯堡人同大多数的谢德兰人一样,忙着收割干草,为冬天堆起泥炭,修剪羊毛,以及为马铃薯和芜菁地锄草这类活计。有些农民从习惯上来讲是要去打鱼的,但是同过去相比,康宁斯堡居民(也同大多数谢德兰人一样)现在更适应陆地生活了。荷兰人垄断着鲑鱼业;龙虾就更难找了;捕蟹又没有经济价值;而那个最大的鱼——海底石油——就像往昔的捕鳕和捕鲱这两大渔业一样被牢牢地控制在“外国人”的手中。

康宁斯堡人也从事一些由石油带动的筑路业和其他一些建筑业,并用所获得的工资来修缮他们的家和小农场;开运货汽车(卡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在每天都有许多石油公司包租的飞机和直升飞机起降的机场上做些维修工作(虽然最好的工作和大部分的钱都归了住在梭伦湾的临时工棚里的“外国”建筑工人)。虽然谢德兰人出于对自身“谢德兰生活方式”的珍爱而常常会单个地摆脱自己与石油的干系,但是他们中的其他大部分人还是赚了一些“石油钱”。谢德兰群岛的岛上居民以其“中庸”与“通情达理”、以及“自立”与“个人主义”而闻名,同康宁斯堡一样,大部分的定居点,尤其是靠近梭伦湾的四个小镇,现在都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新兴小城”,这意味着谢德兰人把其石油收入花费在了实际事务之中。

据谢德兰地方议会档案记载,一个多世纪前,康宁斯堡就因为当地的承租户与地主之间的斗争而出名了,这种斗争就体现出了中庸和通情达理的特征。这意味着在一个领主(大地主)用栅栏把某块公用地圈起来后,承租户们总有一天会把这个栅栏拆除的。现在谢德兰的造访者们明白了,藏在这种中庸与通情达理背后的是深埋在这些历经数世纪殖民统治的人民的意识之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态度,即“你不可与市

政当局作对”。在谢德兰,自由党议员乔·格瑞蒙德是自由党与工党达成协议会联盟的关键人物,而就是他,对于权威也有一种顺从意识。在阻止土地投机买卖、合并中小农场的过程中,农场主与佃农协会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且(在最近的几年中)还制止了土地所有者拒绝向承租户出售小块土地。然而,在石油发展问题上,尽管该岛有“驯服石油庞然大物”的名声,来访者们还是很快发现,在地方政治事务中,还是充满了对那由二十五个贸易商、小制造商、渔业从业者、农场主及其社会经济代言人组成的谢德兰群岛议会的抱怨。梭伦湾建筑工地为妇女所提供的数以百计的新就业机会,男人和妇女在石油平台上长时间的工作,不停歇的“陌生人”流,这些都给家庭和社区纽带造成了令人困惑的变迁,另外人们还普遍感觉石油最多可算是一种好坏掺半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造就了谢德兰在政治上的消极。

然而,在那些偏远的岛屿上,居民们仍坚持认为自己与其说是苏格兰人还不如说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那里,仍有很多东西“历经变迁而保持恒定”。大约一个世纪以前,英国自由主义带来了“谢德兰租地法案”,这一法案第一次使小农租赁得到了保障——这是他们的中庸、通情达理以及个人主义所无法为佃农赢得的。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工党这一中介,英国劳动阶级给谢德兰送来了福利国家政策,在康宁斯堡,这种政策就体现在大路边的那一群小型住房上,那里住着一些年老的和行动不便的人。同样是这种中庸、通情达理以及个人主义导致了该岛经济的衰落,直到60年代在“高地和岛屿发展委员会”和工党给渔业、自耕农以及编织业以大量津贴并使其现代化以后,该岛才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繁荣,——尽管这极大地动摇了谢德兰人自身的个人主义意识和独立意识。60年代在政府的鼓励下所获得的这一发展使许多谢德兰人无产阶级化了,这同

样不是偶然的,石油业的发展为雇佣劳动的快速扩张从意识形态上作了准备。然而,仍是这种中庸和通情达理即极端保守主义,使许多谢德兰劳动妇女和十几岁的少女对儿童保育、生育控制以及其他一些公益事业毫不关心,并且,这还造成了对集体行为的怀疑,例如,这些小佃农们现在基本上还是单独把他们的羊毛出售给垄断这一贸易的两大羊毛收购商,他们仍然没有把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合作制的纺纱厂,——而据一个养羊人对我讲,这正是“佃农的最大需要”。

康宁斯堡还有一个出名之处,在谢德兰(除了莱厄威克和其他一些真正的城镇),只有它有一条人行道,这一点也证实了该地区的中庸和通情达理。借此可以看出该地区其实已把地方权力让渡给了一个本地式的戴利市长<sup>①</sup>,她在议会中假惺惺地作出了地方自治的承诺,说间接源自石油的公共收入将被“公平分享”,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她实际上把自己的个人偏好强加于新议会大厦(公用住宅)上了,这个大厦横跨两个小山丘(非常像弗兰克·劳埃德·莱特<sup>②</sup>的马林郡法院大楼),而那些带小孩的年轻夫妇们却只能零散居住在岬地上的一些用汽车拖动的活动房内(这些房子得用些大石块来压重以抵挡冬季的大风)。

在大路上方,旧居民区的街对面,有一个匹克威克式<sup>③</sup>的

① 戴利,理查德·约瑟夫(Daley, Richard Joseph. 1902—1976年)美国政治家,在他担任芝加哥市长期间(1955—1976年),控制着芝加哥的政治,因其作为旧时代最后一个大城市的老板而闻名,同时他又是美国民主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译注。

② 莱特,弗兰克·劳埃德(Wright, Frank Lloyd. 1869—1959年)美国建筑师,他基于自然形式的特殊建筑风格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建筑业。他的设计包括私人住宅,在威斯康辛州的拉辛市的约翰逊制腊公司办公大楼(1939年),和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1943—1959年),译注。

③ 匹克威克(Pickwick)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译注。



小店,由于店主的宗教信仰,这个小店既不卖烟草也不卖烈性酒。他忧郁的女儿所能卖给你的东西,你能想像得出来,只会是你在一个经济滑坡地区的乡间小店所能找到的那些东西,你不要指望找到任何在新兴都市的小店里可以找到的那些东西。在议会大厦主楼旁,还有另一间小店,但它属于同一个店主。通过他对生意的垄断就可以发现,康宁斯堡式的中庸已  
230 成为该地居民的挥之不去的重负,就像该自治区的大部分其他特征一样,上述这种对生意的垄断正在从总体上对谢德兰进行着小规模的重构。

导致上述状况的原因在于,同莱厄威克以及通常所说的谢德兰一样,康宁斯堡是蒲鲁东主义者的天堂:财产全部私有,没有任何竞争。英国对地方小资产阶级——尤其是那些最为中庸和通情达理,事实上,还操纵着群岛议会的商人——的保护,英国对小产业的资助,以及最后,然而并非最不重要的,还有本地“统治阶级”的永恒神话:谢德兰人其实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谢德兰是受传统束缚的、是极为独特的等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就使得该岛的小资本在地方商贸、编织业、农场业和渔业中获得了一种垄断地位。地方垄断似乎是这些小资产阶级在将石油开发权让给国际石油垄断资本后从英国那里所取得的一种补偿。这种情形使来这里的造访者无不回忆起1873年在美国所发生的那次妥协,自那以后,美国南方有产阶级以向北方资本敞开本地资源的开发权为代价获得了地方自治。

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南方一样,除了价高质劣的商品外,谢德兰小资产阶级和地产拥有者的乌托邦还呈现出另一个冷酷的侧面。本地劳动阶级的处境一如你在自由主义的核心地带所能看到的一切:报酬极低的女店员、住在斜倚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鱼粉加工厂边上的简陋汽车活

动房里的布莱塞工人、因噪音污染而近乎失聪的编织机操作工,他们的报酬即使同英国的最低工资标准相比也是极低的,而他们的手则因在机器上的长年劳作而残废了。那些没有受雇于石油相关(因而报酬也较高)行业的劳动阶级的处境与在谢德兰居统治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兴旺发达正好呈反比关系。石油业的发展使得本地的失业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因而抑制了本地企业对其工人的过度盘剥,虽说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地方议会(一个大雇主)只须将其雇员变得无力胜任石油业就很方便地把这一供求规律化解了。

正如上文所述,这个群岛的议会现在正因其对石油垄断资本所具有的权威而变得越来越有名了。在20世纪70年代,伊恩·克拉克——年轻刚起步时是个会计师,后来当了议会的首席执行官——因扮演了那个杀死石油巨人“歌利亚”的“大卫”而得以青史留名。克拉克的三个重大“胜利”就是“逼迫”石油公司:(1) 把它们石油钻井平台集中在梭伦湾(不管怎么说这从石油公司的立场来说也是经济的);(2) 在建筑熟练工中雇佣一定数量的谢德兰人(事实上,在由谢德兰人担任的800个建筑工作中——目前这一数目总计是4000个——大部分是非熟练工或半熟练工,而且,在石油管道开通以后,将向谢德兰人开放400到1000个永久性工作,在其中,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的工作都仍然是非技术性的、非管理性的岗位);以及(3) 建立一个后备基金(约700亿美元),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普通的谢德兰人仍未从中获益。

如果造访者有幸能直接接触到谢德兰议会的官员,他们很快就会怀疑“谢德兰对石油的控制”仅仅是由本地和/或者外地利益集团神化了的另一个幻想。可以肯定地说,偏远的小佃农、货运卡车司机、渔业加工工人、商店职员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实际上什么也不能控制,甚至贸易联盟也不能,因为其

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盟。只消几个问题很快还可以表明,本地的小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也控制不了什么。实际上,那个议会只是石油资本的非常低层的合伙人。议会借钱来帮助石油平台融资;为石油资本修建道路和运输设施;因为石油资本需要建筑材料,就践踏自己的规章挖开本岛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和石油资本组成联合企业并对其所涉及的大大小小的经济事务守口如瓶,甚至不惜漠视民主原则的基本前提;将小佃农和租赁户从其土地上赶走,这不仅是为了满足钻井设施的用地需要,而且还因为未来的炼油厂可能也有这种需要,——只要有朝一日炼油的世界生产力重新出现短缺就会有这种需要;为石油钻井工人修建住房;总的来说,这是石油公司必须完成的前奏工作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就像为了防范皇室暗杀为国王雇佣一个试食侍从是国王进餐前的一个必要环节一样。

再向地方执行者们提一些问题就可以表明,所有与石油发展有关的决定,不论其对谢德兰人有多大的影响,它们事实上都是由同英国政府合伙的石油垄断资本自己作出的,这无疑也是英国的最后一次殖民主义探险经历。这次“内部殖民主义”演习采取了两种形式。首先,许多决定是由英国市政部门直接作出的,并以它们仅仅是些技术性—管理性的事务而非政治问题为名强加在谢德兰人民的身上。其次,为了维持谢德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一神话,谢德兰地方议会事实上非得批准这些石油—工业计划不可;否则的话,这些石油男爵们就会将议会决定提交苏格兰国务大臣,而他无疑仍会以英国整体利益的名义批准这些计划。这最终当然就会破坏国内自治这一珍贵的幻想。对于这种情形的实质,以及谢德兰在从社会公益事业到渔业和小农场津贴等等所有这些事项上对英国的依赖,地方议会显然是清楚的,因此,它是认可(甚

至是期望)对其石油的需求的,借此它也就维持了主管这个至关重要且日久弥新的形象。实际上,这一闹剧是有其特定的前提条件的。一是得到议会核准的首席执行官不得不同石油工业打交道,而他的目的背景就是借此使这种交易成为既成事实。这一程序愚弄了除普通谢德兰人之外的所有人,因为前者自身的无权状态在此被看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他们坚信石油发展的主要受益人往往就是议会自身。另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议会的计划工作人员必须从头至尾经历这整个磋商、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程序,在此期间他们自称对于事件的整个过程谢德兰还是有着某种独立主张的。最近一次的花招就是石油资本要求再向谢德兰输送 800 个建筑工人(石油公司原先说他们将需要 1200 多个工人),并把这些工人安顿在将停泊于梭伦湾的两艘船上。议会中的工人得到指示为议会会议准备了一份议程,“经历了整个过程”,但是他们很清楚,交易其实早已达成了,议会会议仅仅是一个橡皮图章。 232

当观光客驱车奔驰在谢德兰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盘旋于群岛纵横遍布的港湾之间时,他们最深刻的印象便是谢德兰村舍与农场的孤闭状态。谢德兰的自然地理与人们可能会想像到的美国中西部地区并不相同,但它的社会地理与分散的美国腹地农场的相似性,却要远远多过它同密集的欧洲村庄之间的相似性。它自身在地理与社会上的隔绝状态,使其不可能超越本地的炭灰色小山丘和干草地而产生太多的有组织的合作行为。实际上,这是传统的英国殖民政策的一次完美实践:佯称本地人民有自治权,借此实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白厅(英国政府)”对于北海石油从来都没有任何连贯的政策(最近,与勘探许可这个问题相关,这种状况有所改变),这种情况更是得到了强化,例如,英国议会在谢德兰地方自治的范围以及谢德兰对石油的控制权这些问题上的争论

不休、举棋不定,正是对此情形的一个印证。无论真实原因或政府官员们的意图何在,政策的缺乏就使得石油—产业政策成为英国政府事实上的政策。如果能理解英国在北海的国家利益与那些石油垄断资本的利益其实并没有多大区别,那么,我们对此可能也就不会有什么困惑了。石油垄断资本希望通过连接在梭伦湾转运油库上的两条输油管道(在苏格兰和奥克尼郡<sup>①</sup>另外还有三个转运油库)尽可能快地汲取石油,从而收回它们在勘探、建造钻探平台、钻井等等方面的投资。而英国政府则希望石油尽可能快地流入英国和欧洲,以维持其支付平衡,并通过降低燃料、煤气和石油产品的价格——或者至少使其价格不再像以往那样飞速上升——来平抑增加工资的呼声。无论是工党、国家官僚机构,还是石油资本,都不会允许2万谢德兰人(自由党和保守党最重要的选民)来阻止它们对生产和利润的最大化的追求。只需稍作想像便可知道,卡拉汉<sup>②</sup>首相去年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所作的承诺,——即在未来“第四回合”中将英国工资降低5%,与如下两点是可以联系在一起作考虑的:推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充足的石油供应唾手可得,维持英国劳动阶级取暖和交通所需的开销给资本和国家所造成的开支压力应非常小。

谢德兰在本岛石油发展问题上具有控制权这一神话是十分重要的,它与这种地方自治其实并不存在这一事实同样重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还要依赖于前者。如此,英国政府就不必为政治决策负责了,因为从形式上来讲,这种决策权是操控在谢德兰地方议会的手中的。行政机构与工党也

① Orkney, 奥克尼郡(英国苏格兰原郡名),译注。

② 卡拉汉,(伦纳德)詹姆斯(Callaghan, (Leonard) James),英国首相(1976年~1979年),生于1912年,译注。

就可以使自己摆脱由石油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干系了,这些负面影响包括本地近海渔业的凋零、社会分裂、以及对梭伦湾的污染(这已成事实了)等,更重要的是,这还带来了石油严重泄漏或输油管道破裂这种危险。还有评论说,英国可能还会借用谢德兰的这种“独特性”神话来淡化苏格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快地,这种民族主义对于“威斯敏斯特”来说就将如芒刺在背。这样一来,英国政府自己就可以不用在谢德兰的“大卫”面前扮演“歌利亚”这个角色了;整台戏的重心就会是石油公司及其地方伙伴即谢德兰议会了。一旦那终将发生的灾难到来时,你在伦敦就会听到“谢德兰人 233 只有怪他们自己不好”这样的言论了。宗主国的这一绝技在本地小资产阶级的策应下更是发挥得出神入化了,因为,“地方自治”与自主决策事关这些小资产阶级自己的切身利益。一方面,旅游手册大谈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遗产,本地小资产阶级近年来还复活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象征,并且伪称说有一种“谢德兰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同大多数谢德兰人一样,康宁斯堡人则在堆积泥炭,收割干草,讲苏格兰方言,穿苏格兰服饰,实际上还是过着苏格兰式的生活。最后,乔·格瑞蒙德(同许多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自由党人一样,他也依赖于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和选票)的政治利益使该岛的阶级结构获得了重生,并使其意识形态永恒化了。于是,康宁斯堡和谢德兰的通情达理与中庸最终就使其现状永恒化了:从政治上来说,谢德兰人对于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没有任何控制权;从经济上来说,所谓谢德兰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只是一种虚构的幻想;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谢德兰人也许会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和个人主义化的,然而,这些信念实际上只是对既存现实的一种回避,是为政治淡漠主义服务的。直至20世纪60年代开始并于70年代加速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出现以前,这种状

况似乎没有任何改变的机会,但是无产阶级化却从根本上调整了谢德兰主要由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组成的阶级构成。构成这种地方自欺的层面有很多,就像构成该岛遗迹的考古学分层一样多;同世界上许多别的地方一样,在这里,若不是由于下列事实的缘故,这种自欺欺人就不会有任何引人注目之处,——事实就在于:在北海中发生的现代石油帝国主义故事的一个部分就隐藏于这种自欺欺人的背后,对此,虽然人们的认识还很模糊,但它却很重要。



## 第十四章

可持续性发展的  
资本主义是否可能？

234

## 导 论

几乎没有别的说法像“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这个词汇那样含糊不清，其孪生词汇还有“可持续性的农业”、“可持续性的能源和资源使用”以及“可持续性的发展”等等。这种含糊如今在关于经济和环境的所有最重要的话语中都会发现：联合国以及政府的报告、学术研究、通俗期刊以及绿色政治思想等。正是这种含糊不清才导致了如此多的人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言谈和写作中提及“可持续性”；这个词几乎可以用来表示人们希望它意指的任何事，——而这些用法往往只表达了这个词的部分内涵。

“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同时具有实践和道德两个方面的限定。有哪一个思维正常

的人会反对“可持续性”呢？“持续(sustain)”这个词的最早含义是“支持”、“维护某种进程”、或“保持一种状态”。在那些担负着保存资本并扩大其积累这种重责的团体首脑、财政部长、或者国际性组织的公务员中，有哪一个不是把这一层含义奉为其自身的准则的呢？另一个含义是“提供食物和饮水，或生活必需品”。而在那些薪酬极低的城市工人或无地农民中，有哪一个不是对这一层含义甘之如饴呢？还有另一个含义即“忍受而不放弃或屈服”。有哪一个小农场主或小业主不是拒不“屈服”于大资本和政府的扩张冲动并为自己的“忍耐力”而沾沾自喜的呢？在关于国家财富的讨论中，对于如何界定和运用“可持续性的发展”或“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争论。这就意味着“可持续性”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生态的和经济的问题。

就目前来看，“持续”这个词被用在上述全部三种意义上：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起维护”作用；为这个世界上的各民族“提供生活必需品”；对于那些其生活方式正受工资和日常消费形式戕害的人来说，则是“忍受而不屈服”。因此，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对应于如下这个问题了：以所有这三种方式来定义的可持续性是否可以被达成以及能如何被达成。

235 关于“持续”还有第四种含义，即“生态可持续性”，——尽管对于这一表述的准确含义，生态学家们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例如，根据生态学以及体现于这门学科中的意识形态来说，“生态多样性”或“地球的良好状态”几乎是不成问题和无需讨论的；同样，“生态危机”这一表述也是不成问题的，这一表述现已被通俗作家们广泛使用，没有人想要赋予其一个明确的定义(第六章)。研究种群数量的生态学家和从事物种保护的

生物学家通常将下列因素看作是相互关联的：某一特定物种的种群数量的变化；严格按照此类物种的需要来定义的“环境承载能力”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些系数，这些系数一方面用来衡量所研究的物种与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们也用来衡量物种与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部分，所研究的物种也许与其有着某种间接依赖关系。所有这些关联项都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然而，这种相互决定的多重性就意味着：绝不存在着一条显而易见的途径可以使人们真实地了解，对于某一特定物种来说，它所遇到的威胁是由其自身造成的，还是由于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的变化——例如对其他物种生活的侵扰——造成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再谈论特定物种的“可持续性”可能就不够精确了，而“环境危机”这个概念也就要比它在表面看来有着更多的问题了。

当生态学家们或绿色主义者们把社会的、经济的与生物物理学的层面综合在一起，并对整个生态系统或生物区域加以讨论时，这种含糊性就变得更为突出了。例如，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利湾地区，过度抽水已造成了地下水位下降，海水倒灌，土壤盐碱化，这就威胁到了农业的生存能力。这是一种“危机”吗？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不是，只要该地区有输入水源，这就不是一种“危机”；事实上，输入水源可能还可以为该地农业输入新的生命力，甚至可能还会带来住房、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如果严格局限在某一生物区域之中来看问题，“可持续性的农业”指的是一回事；而如果拓宽视野把其他别的生物区域也包含进来，它所指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通过这一特定事例可以发现，就输入水源所展开的辩论其实是与本地农业资本和水质的“可持续性”没有多大关系的，它更多地是同某些规范性判断有关，这些判断涉及的是：该地区的人民希望有的社区和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帕加罗山谷，问题

就是：它到底是保持其目前的带有墨西哥特色的文化，还是更多地面向位于海岸山脉另一边的硅谷中的计算机人群）。

如果以这四种方式来给“持续”下定义，那么回答“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简短答案就是：不，如答案稍长一点的话那就是：“大概不”。资本主义的趋势是自我毁灭并步入危机；世界经济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饥饿、贫穷和痛苦之中；不可能指望广大的农民和工人无限期地忍耐这种危机；而且，不论给“可持续性”下什么样的定义，几乎任何地方的自然都受伤了。

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几个相关证据，揭示绿色主义者们和商人们所采用的几种不同的“可持续性”概念的线索，为严格界定了的经济可持续性（或收益性和积累）的条件提供一个简要的说明。然后，我们将讨论资本主义的那个“内部”的或“首要”的矛盾，以及备受危机折磨然而又依赖于危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并附加一个对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危机的积聚的简短评论。我们的争论意见是，全球经济调整的前景同全球环境调节的远景一样暗淡。接着，我们将讨论当今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另一个似乎不可解决的难题（“第二重”矛盾），即由资本与自然（以及其他一些生产条件）间的矛盾所导致“成本型”利润的收缩，另外，还有环保运动以及其他一些社会运动对资本所造成的负面经济效应。资本试图解决这些危机的方式也会在此加以讨论。由于自由民主国家和资本自身的本性使然，非但资本顺利解决“第一重矛盾”的能力大可怀疑，而且它成功地解决这“第二重矛盾”的能力也是不可靠的。在此，一次普遍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难以确定的政治的——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的和生态的——的后果正是我们所要强调的。最后，在对贫困国家（南部国家）环境状况作一简短评论之后，我们对激进环保主义运动或“激进绿色

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可能性作了一些判断。虽说某些“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景仍不明朗(因此争论仍在继续),但是,某种“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前景可能更遥远。

## 环境政策及可持续性话语

尽管近来关于“绿色产品”、“绿色消费”、“选择性伐木”以及“低投入农业”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比比皆是,但仍有证据表明资本主义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在1992年的美国大选中,在三个主要候选人中,不止一个人都把“环境”问题看作为一个重要议题。但自比尔·克林顿取得胜利后,新一届的美国政府自身就已在联邦牧场的使用、有成熟生态系统的森林的砍伐以及同污染作斗争等众多问题上妥协了(经常是顺从“市场决策”而放弃那些行之有效的污染控制措施)。在资本短缺的情形下,为了吸引资本,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在现有的联邦法律中,对“湿地”和“濒危物种”的定义都同样十分狭窄。关于职业健康和安全等方面的强制规定正在被削弱。国立与州立公园也日益商业化了,因为这些公园的管理者们都在盘算着如何获得利润。虽然,核能被暂时搁置了,某些产业资本如造纸业和制浆业已开始采用更为清洁的技术,生态农业也从无公害农产品这一消费浪潮中获益良多,然而,大多数产业联盟的领导者们对环保主义者的要求仍是持反对态度或无动于衷,而且,现有的环保组织(除了数得出的两三个例外)则以“经济增长”为借口,早已自甘妥协了。

在大多数国家中,绿色主义要么是很弱小,要么就是在国家与地方政治中放弃自己的立场。在欧洲,虽然在欧洲议会 237

中有绿色主义者的代表,但对于那些管理着强大的欧洲委员会的官员们来说,环境问题仍不是头等大事。关于臭氧层破坏的国际协议十分脆弱,而关于全球变暖的协议则仅仅具有象征意义。那些保护全球“共有资源”——如水域、森林、河流、湖泊、海岸、海洋以及空气质量等——的协议常常是形同虚设。捕鲸业可能会死灰复燃,几乎所有地方的捕鱼业者都在竭泽而渔。石油作为经济财富以及国家力量的一种指示器,其作用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了。从威斯康辛州的北部到西伯利亚,到处都有能源公司和采矿公司(常常是合二为一的)随时准备着进行更为大规模的采掘工程以攫取更多的矿产。而在南部国家中,许多政府借“发展”之名,——其实常常是迫于巨额外债的压力,急着要把他们天然秉承之权力出售给跨国公司;对于这些国家中的乡村和城市贫民大众来说,他们或者无地或者土地贫瘠,仅仅是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就不得不相继耗尽其资源,并听任其水源与空气受污染。东亚“老虎”、东南亚“小老虎”以及墨西哥、巴西还有其他一些拉丁美洲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记录令人难以乐观。

其实,若按“生态合理性或生态理由”这个含义来定义,要实行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对国家财政政策作一定的调整就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对原材料的输入(如煤炭、石油与氮等)和某些产品的输出(如汽油、化学建筑构件等)征收高额税金,同时对那些为数众多的对环境有害的消费品(汽车、塑料制品、易拉罐等)课以增值税,然后,还得辅以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绿色标志政策,有了这种标志,那些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所有环节上就其生态效应而言都可称得上“绿色”的真正绿色产品都将被免税。另一个步骤则是调整国家的支出政策:给太阳能和其他一些健康的替代能源以重点资助;在资源问题上,则扶持那些旨在削减有毒的化学品和其他一

些物质的技术研究；给公共交通革新、职业健康与安全条件、以及国家的、地区的和社区的强制规定以赞助；并引导重新定义与定位科学技术的基本取向。但是，这种绿色财政政策，以及在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上的相应改变，除了在一小群绿色经济学家和激进主义者的文章中可以见到外，现在在任何地方也看不到其发展的踪迹。

就“可持续性”话语的这个层面而言，那种能得到绿色主义者认可的生态合理的资本主义，似乎最多可算得上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已。除了可以在词汇上把这两者堆砌在一起外，绿色话语和资本主义话语其实有着天壤之别，这两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之一就在于，大多数的环保运动都受到了资本的资助，在其话语中，他们努力把自己装扮成绿色爱好者，或者至少使自己在公众面前获得一种绿色形象。这一话语竭力为公司企业寻求改革经济活动的途径，通过这种改革，这些公司企业就可以与各种可持续性要求——森林的生物多样性、水质、野生动物的保护、大气质量等等——保持一种协调关系了。关注焦点集中于生产过程、技术、循环利用以及能源效率等问题上，另外，消费结构、金融、市场、公司组织以及政府政策等众多问题也受到了重视。例如，有改革思想的世界资源协会最近就提出，可持续性就意味着对技术的一次“史无前例的转型”。因此，对于绿色主义的改革派来说，问题就在于以何种方式来再造资本主义才能使其与自然的可持续性相适应。

然而，在大多数企业的会议室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却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就表层而言，问题仅仅是如何才能让消费者和公众面前表现得像是绿色爱好者（例如，美国化工行业在1992年就曾打算花1千万美元把自己装扮成环保亲善者）<sup>1</sup>。这同时也是如何才能通过改革生产过程来节约能源和



原材料的问题,而这主要是受经济动机支配的。在经济缓慢增长时期,能源和原材料的效率问题由于从总体上对资本来说并不成为什么问题,因此,它不仅在经济的维度上,而且在生态的维度上也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举个例子来说,美国公司现在有 75% 的铝产量来自于循环利用铝制易拉罐和别的产品。另一个例子则是,在新式木材工业中,那些小树木不适于做成梁柱木料,因此,如果砍伐它们显然会造成浪费。而且,“循环利用”的策略以及(选择性伐木)的方法还可以使一轮的有计划的更新换代变得名正言顺,这样做还能带来环保的好名声——如此一来,既使消费至上主义合法化了,也维持了一定的利润空间。

但从更深层面上来讲,企业思考环境问题的方式与绿色主义者考虑改革问题时的典型方式正好是相对立的。对于前者而言,问题实际上是以何种方式来再造自然才能使其适应利润的可持续性和资本积累的要求。“再造自然”意味着在更深的程度上把自然界当作“水龙头”和“污水池”,这种隐喻不仅具有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而且还具有经济的和生态维度的意义,例如,它会对本土民众的生活造成危害。再造自然也意味着对自然进行重新加工或彻底改造(这一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也是十分重要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包括:美国东南部和西北部的松树和杉树林的“同龄工业化种植”——一种被看作为“与城市高楼大厦相对等”的单种栽培<sup>2</sup>;改变粮食的基因来防止农作物减产而增加土地产出<sup>3</sup>;在半导体工业中运用微生物来“吞噬”有毒废物;以及用转基因的豚草属植物来清洁受到铅和其他一些金属污染的土壤。然而,这其中的每一样都有其潜在的危险:人造林场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而粮食作物的转基因以及使用微生物来降低成本则包含着不可知的生物学危险。在此,对于我们现在所面对

的这个世界,资本不再仅仅是占有有一些自然物,然后再把它们变成商品,并将其用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的构成成分,相反,在此世界中,资本按其自身形象从生物层面和物理层面(还有政治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上再造了自然及其产物。<sup>4</sup>前资本主义的或半资本主义的自然被改造成了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自然。正如工人运动曾迫使资本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转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一样,例如从延长劳动时间转为降低工资成本,同样地,绿色运动也许就会迫使资本终止其对前资本主义自然的原始开发,转而改作以资本自身的形象来再造自然,——这同样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尤其是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或工资成本)。 239

以此来看,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自然就会变得面目全非了,或者就会变成与大多数人的经验完全不同的样子了。到那时,在经济危机的驱使下,客观自然或许就被当成了一个好像受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支配的自然了,如同生产铅笔和快餐食品一样。这样,关于可持续性这个问题,话语理论就会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和生态科学一样将有很多课题要加以研究。其中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再造自然的构想(仍处于萌芽期)也是一种按资本的形象来再造(所谓的)科学和技术的构想。这种形象是或将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自然的抗争、形象,以及社会凝聚力、合法化,还有科学和大学团体的力量等等。

## 需求危机:扩张与消费

关于“一个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完整答案是:“除非等到资本改变了自身面貌以

后,到那时,银行家、短期资本经营者、风险资本家以及 CEO (执行总裁)们在镜子中看到的将不再是他们现在的这副尊容,舍此而外,这种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绝无可能。”这一断言受到了国家政客以及大型商贾代言人的广泛抨击。要证实这一断言,就得简要说明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当它运转自如时,它为什么会运转自如;当它遇到麻烦时,它为什么会遇到麻烦。

尽管生态经济学的前驱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但它现在仍处于专业开创阶段,在其兴起以前,经济学家们一直是纯粹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讨论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例如金融资本、投资与消费、利润与工资、成本与价格等。自然的或物质的世界主要以两种样式出现在经济增长模式中:第一,以租赁理论的形式出现;第二,体现在“加速器”这个概念中,或者新生产力可预期生产出的物质产品的总量(例如,在某一既定的生产率下,要生产若干数量的电冰箱得需若干数量的机器)。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必然是一种扩张型的资本主义(并且必须被表述成这样的)。马克思称作为“简单再生产”式的或绿色主义者称作为“维持”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家庭中(不计报酬的)维修保养方面的劳动以及由国家所组织的(有报酬的)劳动除外。在维持中几乎没有利润可言;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却依赖于积累和利润。一个正数的总体利润率就意味着产品总量的增长(就如在资本主义国民收入账目中计为“国内产品总额”的那部分一样)。利润是诸如新投资和新技术等的扩张的手段。利润也是进行扩张的动机。因此,利润和增长互为手段和目的、内涵和前提,正如对于大多数的短期资本经营者来说,他们是看不到或者是不关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

虽然有很多种经济增长理论,但所有的理论都认定资本主义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都认定这一体系必须或扩张或收缩,换句话说来说,资本主义既受危机的困扰同时又依赖于危机,因此,归根到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必然是“要么进行积累要么就死亡”<sup>5</sup>。

在资本主义的这种最简单的(也是头脑最简单的)模式中,增长率或资本的积累率依赖于利润率。<sup>6</sup>(如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利润率越高,资本主义就越具备可持续性。负的利润率会招致经济困难;至少会引发经济不景气,最糟则是普遍性的危机、资本价值缩水和萧条。在这一模式中,任何人或任何事只要妨碍了利润、新投资和市场扩张,都会对这一体系的可持续性构成威胁,这也就是说,会造成一场经济危机,而这就会带来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未知的和不可知的后果。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是其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因为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存在着矛盾”,所以资本就对自身获得利润的能力构成了威胁。对于这一矛盾的一个解释就是:资本对劳动所具有的政治权力越大,对劳动的剥削程度越高(或者说剩余价值率越高),这样,生产出的潜在利润也就越多;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市场上实现这些潜在利润难度也就会越大,也就会越难以按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率的价格把这些产品卖出去。在此,我们对资本的政治权力与资本主义经济平稳运行(或者,最终能否运行下去)的能力之间的这一矛盾持认同态度。个别资本会提高劳动生产力、加快劳动速度、削减工资,并且还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来提高单位时间含量,从较少工人那里获取较多产量,而在同时给予他们的报酬却变少了,个别资本企图通过这些方法来捍卫或重建其利润。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或者说“实现”或“需求危机”)却表明,在他们

这么做的时候,反而产生了一些他们没有意料到的后果,即减少了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生产过程中的工人、技师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变少了,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却变多了,如此一来,他们的消费能力肯定会下降,而价格却未见下降。这样,如果其他一切条件都不变,生产出来的利润越多,或者对劳动的剥削程度越高,实现了的利润就越少,市场需求就越小。当然,其他一切条件绝不会保持不变的:政府预算赤字、抵押和消费信贷、商业借贷以及积极的外贸与投资政策等,还有其他一些可能性,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或许会对需求起一种支撑作用,从而继续保持“资本”的可持续性。

241 如今,任何一个可持续性的经济体都得以一个能够确认和调控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的”或“内在的”矛盾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体系为前提。在首先及最重要的维度上,这意味着拥有在全球范围内,或者最起码在西方七国工业集团之间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性的凯恩斯主义,这一类型的凯恩斯主义根植于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晚期的那些主要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如果从这一现实实践层面来进行定义,世界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或许要比大多数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要弱得多。首先,这种国家凯恩斯主义调控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时起就已弱化或自我解体了。其次,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作为世界现金出纳机——正在终结。这意味着,在从1990年~1991年经济不景气中艰难复苏过来以前,美国经济的驱动力来自于消费者、军事采购、私人和公共借贷。然而,1991年后的这轮复苏是自1876年以来第一次由对外开支拉动的,而投资开支则位居次席。德国近年来的所有复苏都是外向型的,而且德国政府还说其经济要从目前的低迷状态中复苏过来,将来还得是外向型的。一旦日本从当前的经济困境中恢复过

来,出口增长也会比国内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要快得多。最后,所有的所谓新生代工业化经济体也都是外向型的。这些事实表明,在当今时期,消费主义的美国已无力消化世界的剩余商品了,要想避免全面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一种凯恩斯主义式的全球宏观经济管理将是必需的。

实际上,某种全球性的宏观管理是存在的,西方七国集团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结算银行所担负的就是这种宏观管理的职责。然而,这种类似于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组织形式,从总的方面来说是受制于大资本、从具体的方面来说是受制于金融资本的。由此,除了西方七国集团努力地试图降低利息率以及刺激那些有出口余额的国家(尤其是日本)的需求外,其余的国家所遵循的是一种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分别迫使个体资本和整个国家削减成本,提高效率,减少政府开支。它从未考虑过这种政策对全球性的资本过度生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马克思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由此而来的各种贸易战、衍生出的种种损人利己的政策、社会腐败的滋长,政治不稳定、地区贸易壁垒以及生态灾难等等,更是这种政策根本没有注意到的。换句话说,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和保护条款的制定就没有一个“全球性的议会”去管了,也没有什么世界性的劳工部、社会福利部、环境署以及其他的合法力量来传播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见解。相反,例如,美国前任总统乔治·布什就曾说过美国将成为一个“出口超级大国”,而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班子则提出了一种“不断增强的积极性”出口政策。

就目前而言,那种真正按照合作精神组织起来的全球性调控的前景并不美妙,它就像在19世纪90年代的那次生产过剩危机中的国家调控一样糟糕无比,可以说,几近于零。在那时,倾销性的、垄断的和殖民主义的国家主义政策引发了两



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大萧条”。从表面上来看，现在可能存在两个抵消因素：一是欧洲现在是一个经济实体，例如法国在经济上同德国已是和而不是战了；另一个因素则是资本不再局限于国家范围里了，相反它越来越全球化了，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它对于全球调控是更为开放了。但是，西方七国集团迄今的宏观调控工作却拙劣异常（一年比一年差劲），而且，全球金融资本以及那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积累起巨额债券资产的食利者阶层的力量现在是非常强大，它们完全有能力阻止政府重新采取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

### 成本危机：生产条件

如今，这种经济思维方式虽说仍然有效，但却是（而且一直是）片面的和有局限性的。原因就在于它假定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条件”的供给是无限的。这种传统模式假定资本主义能够突破“供给方面”的潜在瓶颈，而增长仅仅受需求的制约。然而，如果劳动、自然、基础设施和空间的成本明显增长了，资本就遭遇到它的“第二重矛盾”了，即一种源自于成本层面的经济危机。例子有：美国内战时期英国的“棉花危机”、工资的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超过生产力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但是，我们在此所关注的却是那些更为结构性的或普遍性的现象，而不是这些仅有个案意味的孤立事例。

成本层面危机的根源有两个方面。第一，根源于个别资本在捍卫或重建其利润时所采取的策略，它们败坏了或没能维护自己生产的长期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例如，忽视劳动条件（因而增加了健康费用），破坏土壤（因而降低了土地的生



产力),或者听任其所依存的市政基础设施衰败(因此加剧了交通拥挤或增加了警察成本)等,在此我们只举这三个例子。

第二,有些社会运动要求资本更为妥善地维护和重建这些生活条件,如果仍举这三个例子的话,他们就会要求更好的医疗保健,要求保护土壤免受破坏,并要求维护城市市政设施,而这一切都会增加资本成本并降低资本的适应能力。在此,我们就涉及到了劳工和妇女运动、环保运动以及城市运动对资本主义利益的潜在的破坏性的经济效应。这种“额外成本”,——以及它对于资本主义盈利能力的威胁,使主流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倍感困惑;然而,劳工和社会运动的领袖们却很少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在现实世界中,成本层面的这两类危机相互纠缠相互掣肘,从来没人对此作过系统的理论研究(参见第8章)。例如,如果进行定量研究,没人能准确地说出,在由市政交通拥挤所造成的成本中到底有多少是源自于对汽车业的鼓励和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忽视;也没人知道,为了使高速公路不至于破坏本社区的整体外貌,社区所进行的斗争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对于波兰尼称作“土地和劳动”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有 243  
一种更为精确的理论观点。马克思的“生产条件”概念在无意之中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出发点。<sup>7</sup>正如我们已知道的,生产条件指的是这样一些东西,它们并不是按市场规律(价值规律)生产出来的商品,相反,它们只是被当作商品来看待,换句话说,它们只是具有“虚拟价格”的“虚拟的商品”。在马克思看来,有三种生产条件:第一,人类劳动力,或者马克思所说的“个体性的劳动条件”;第二,环境,或者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或外在的生产条件”;第三,市政基础设施(我们还可以加上个“空间”),或者马克思所说的“一般的、公共的

生产条件”。

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要求所有这三种生产条件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以适当的数量和质量,按合适的虚拟价格出现。众所周知,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市政基础设施及空间在供给上的严重瓶颈会危及个别资本单位的生存能力,甚至还会危及整个部门或全国的资本主义秩序。因此,总的来说,这些瓶颈因会抬高成本削弱资本的适应能力而会威胁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所以,“增长的极限”并不首先表现为劳动力、原材料、清洁水源和空气、城市空间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绝对性的短缺,而是会表现为**高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和空间**。这就对资本的盈利能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国家和资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就会努力地使劳动力市场、供给、燃料和原材料市场、城市和乡村的土地使用模式以及土地市场等合理化。<sup>8</sup>

在经济疲软、或者遇到需求危机、面临别国新一轮竞争时,供给层面上的瓶颈或缺乏会给资本主义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带来特别大的麻烦。利润的停滞或下降迫使单个资本竭力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即提高生产速度并减少出售其产品的时间。为了弥补利润的过低或下降,资本迷恋于越来越快的赚钱手段,而这却会遇到诸如被工会组织起来的劳工市场、深受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影响的石油市场、以及传统农业对土地和水源的“没有效率”的使用方法的固守等等这些因素的挑战。一方面,货币资本对自我增殖的追逐频率越来越快;另一方面,波兰尼所说的“社会”以及土地和劳动使用中的那些我们可以反讽地看作为过时的模式,还有土地和劳工市场,再加上各种劳工和社会运动对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抵制,所有这些就构成了所谓的障碍,或“有待逾越的屏障”。资本首先得对付社会的冷淡与惰性。

资本要摆脱这一困境,同它在经济上是自我解体的道理一样,至少从短期来看,有一个同样简单的方法。货币资本摒弃了“普通的资本周转”,即租借厂房、购买机器和原材料、租用土地、寻找类型合适的劳动力、组织和实施生产、为商品寻求市场以及寻找进行投机买卖的各种途径等等这样一系列漫长而繁琐的过程。以信用膨胀为基础的货币资本,或者那些在不动产和现实服务业中找不到出路的金钱,可以说是越过了社会去寻找一些更为方便的扩张途径,比如土地买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其他一些金融市场。于是,就产生了现今的这种经济怪事:账面上的盈余或利润的增长速度要比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实际价值的增长速度快得多。这会驱使糟糕的经济形势变得更糟,因为它会导致负债率的上升,还会带来金融风暴的危险。它还会促使生产的生态条件及其他一些条件的恶化;因为现在金融利益支配着生产利益,而后者常有被忽视的倾向。 244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如按其功能来定义的话,前资本主义劳动力、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空间等都很充足。事实上这是正确的,而且早期资产阶级也有这样的看法。因此,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空间的(虚拟)价格是受到控制的。(在帝国主义及国家强制力量的威慑下)环保运动或城市运动也没有提出过什么资本本身所不能逾越的政治和社会障碍。随着时间的流逝,资本设法使所有东西和所有人都资本化了,换句话说,所有的东西都潜在地列入资本成本核算中了。在千禧年幻想中,人类一直是“人性化”自然或者说他们创造了一个“第二自然”,而这常常遭受破坏。有些非常著名的例子:罗马耕作体系下的森林砍伐和旱涝循环;罗马与迦太基间的三次战争所造成的毁灭性的生态后果;玛雅文明的土壤衰竭和水源匮乏。但在资本主义的形成时期,这个第二自然却被商

品化了,而且还被加以定价了,而在这同时它也就在退化了。在那些希望资本主义在生态上是可持续的人看来,这也就是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劳动市场变得严峻起来,而北部国家不得不依赖于从南部国家进口的劳动力,——随之带来的就是所有经济的和社会的成本与问题。例如,要安置操不同语言的新来者就产生了经济成本,而种族主义的复兴则造成了社会成本。原材料和未污染的公有资源变稀少了,如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树木和板材、清洁水源的供给等,而这就抬高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要素的成本”。另外,最后还有一个并非最不重要的因素,即市政基础设施和空间也变得稀缺了,——这又提高了缓解交通拥挤的成本,抬高了地租,还增加了治理污染的成本。洛杉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墨西哥城和台北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总而言之,生产条件的资本化——尤其是环境和自然的资本化——具有提高资本成本并降低其适应能力的倾向。如上所述,一般来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个系统原因,即个别资本很少有或者说根本没有以可持续性的方式来利用生产条件的动机,特别是当其处于资本自我发展的经济困难时期时就更是如此了。其次,正是由于这第一个原因,劳工、环保以及其他一些社会运动对于资本对劳动力、环境和城市(还有越来越多的农村,——特别是在南部国家)的控制发起了挑战。例如在美国有地方反有毒物品联盟、关于职业健康与安全以及知情权等的斗争、以拯救天然河流和原始森林为目标的行动、以及反—高速公路与反—发展的运动等等。

简单说来,第二个矛盾表明,当个别资本试图通过削减或外化成本来维护或重建其利润时,就产生了一个它们所没有料及的后果,即减低了生产条件的“生产率”,因而也就提高了平均成本。对于受影响的那些个别资本、其他资本或资本

整体来说,成本也许就提高了。例如,农业中所用的化学杀虫剂起初是降低但最终还是增加了成本,因为害虫变得越来越有化学抗药性了,而且这些化学物质还破坏了土壤。在瑞典有一些产量固定的单品种森林,原本期望它可以降低成本,但是,最终还是证明:在若干年以后,由于丧失了生物多样性,这种森林的生态系统的生产力还是下降了,而且树型还变小了。在美国,也曾指望核能源会降低能源成本。但是,由于设计上的不合理、财政问题、安全措施,还有最重要的是由于大众对核能源的反对态度,其结果也是增加了成本。至于说到生产的“公共”条件,新的高速公路,原是设计用来降低交通和上下班来往通勤的成本的,但是由于它们引发了更大的交通量并导致了更多的交通拥挤,因而它们也有提高成本的趋势。而关于“个体性的”生产条件,据说可以提高潜在劳动生产力的美国教育体系所造就的学识,可以说和它所产生的愚蠢同样多,而且它还破坏了劳动者的纪律性和生产能力。

强调生产条件并不是按市场规律生产出来的这一点很重要。一旦资本获取生产条件的市场调控规则产生出来了,它们肯定也是有选择性的和局部性的,而且常常还是有缺陷的。因此,肯定存在着一些中介,这些中介的任务或者是制造生产条件,或者就是调节资本获取它们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中介就是国家。每种国家行为,几乎包括所有的国家机构和预算项目,都与帮助资本获取劳动力、自然或市政空间和基础设施等有关。例如,美国有劳工和教育部门;美国农业部;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以及一些类似的国家机构;美国土地管理局和美国土地开垦署;还有城市规划机关和交通管理当局等。下面我们用例子来分别说明上述这些国家机构同三种生产条件相关的一些特定的功能:与第一种生产条件相关的,是关于劳动力、童工法案、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法案以及劳

动安全方面的法案；与第二种生产条件相关的，是关于环境、联邦土地的拥有权以及对沿海地区的开发与污染进行规范的法律；与第三种生产条件相关的，是关于市政基础设施和空间、分区制法律、交通条例和土地使用方面的规章。几乎所有的国家行为或预算项目都以某种不同的方式与一种或多种生产条件发生关联。这也包含金融和军事机制，它们保护和帮助资本主义的矿产公司、银行、商家以及其他一些企业“合法”地获取它们所需的资源和市场。乔治·布什在海湾所发动的那场战争仅仅是一个最新的并且还是最富戏剧性的例子，它说明了军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超国家层面上）则最清晰地例证了金融机构的资本主义扩张倾向。

### 应对成本危机

解决这些成本层面的危机的办法是什么？从个别资本并且也从资本整体的观点来看，有些什么办法？

最糟糕的情况是：个别资本受到高成本和低需求的双重挤压而更为强力地去削减成本，从而更加激化了资本主义的第一重和第二重矛盾。然而，这种结果并不是惟一的可能性。如上所述，与环境问题相关，个别资本对于绿色消费要求就有各种应对方案，如对于公众减少废弃物并对其作循环利用的要求，个别资本就可以去挖掘废品的一些新的利用方式；再如，对于那些不得不减少其污染物的公司来说，它们就可以对其资本设备进行升级换代，而另一些公司则可以专业从事环境清洁工作。

而对于资本整体（不是指社会，甚至也不是指“自然”，因



为它们是以一种交互逻辑为前提的,——这并不是指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逻辑)来说,最佳解决办法是以提高其“生产率”的方式去对生产条件加以重构。因为国家或生产着或调控着这些生产条件的获取途径,所以,这种重构过程通常是由国家来组织并(或者)调节的,即是政治性地实现的。例如:在市中心禁止小汽车通行以减轻交通拥挤和污染;在农业中资助对害虫的综合治理从而降低食品和原材料的成本;把重心从治疗转移到健康预防上来(如美国对艾滋病的防治)从而降低卫生保健成本。然而,要想实实在在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得投入巨额资金来重建生产条件,以便恢复或提高其“生产率”并进而降低资本的成本。从长期来看,生产率会提高,但在短期内这却会有损于利润。新的产业会生产出对环境友善的产品、城市交通系统和教育体系,——它们(如上文所引例子)都会有效地降低资本要素的成本和消费篮的成本,还会平抑地租;同时,总的需求水平会上升,并间接地以某种非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克服第一重矛盾。(相反,如果新的森林管理系统、污染控制开销、市政规划等等对于成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那么结果就会导致有效需求和通货膨胀的上升或者利润的下降。)

关于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就到此为止;实践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多元主义的与妥协性的政治逻辑常常阻碍了那种总体性的环保、市政和社会规划的发展。国家的行政部门或官僚机构的逻辑是非民主的,因此,环保动机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源自于下层。而且,资本的自我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的与反社会的。在生产条件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在一起的这三种逻辑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因而第二重矛盾的系统 247 化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仍是遥不可及的。



换言之,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致力于生态、市政和社会的总体规划的国家机构或社团型的环境规划机制是不存在的。关于某种生态性的资本主义或某种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在理论上至今仍未得到过清晰的表述,更不必说它可以在某种制度化的基础设施中得到体现了。那种有某种合理环保规划的国家存在在哪里?城市中以及城市之间的规划在哪里?同环保与市政规划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健康与教育规划又在哪里?与之相反,有的只是一些零打碎敲式的措施,往好处说,可以说有一些地区性规划的碎片,往坏处说,可以说有的只是某些非理性的政治战利品的分配系统。

因此,在每天报纸的大标题中我们都可以不停地看到新的卫生保健危机、环境危机以及城市危机。在许多地方,我们所能看到的远景是:劳动者中的文盲越来越多,由于工资过低租金过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无家可归,惊恐不安地生活在一个满是污染的城市中,在拥塞不堪的交通面前寸步难行,而且甚至连清洁水源都不能得到。这一图景也许还不能适用于罗马或纽约,但是它同墨西哥城和新德里却是越来越像了,——这两个城市,不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它们肯定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组成部分。

### 一轮普遍经济萧条的生态效应

然而,可持续性是按生态学的观点来加以定义的,似乎应是某种相当确定无疑的事情。如果说,从国际宏观经济调控这一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是没有可持续性的,那么某种全球性的危机,资本价值的普遍贬值以及某种经济萧条就将是必然的。在此情形下,没有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个别资本、政府与

国际机构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由于资本的过度生产(或生产不足,又或者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会带来需求层面的(或成本层面的,又或者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巨大经济压力,这也许就会迫使个别资本努力将其成本更多地加以外化,并借此来重建其利润。这也就是说,资本会把更多的成本转移到环境、土地和社会中去,此时,国家和国际机构却只能坐观这一切发生而无能为力。事实上,有大量的事例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缓慢的经济增长率早已引发了这种成本转移,——跨国公司更是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有事例表明,在许多情形中,这种成本转移还有一种反作用,因为某一资本的成本转移反过来增加了其他资本的成本。而且,我们在许多事例中还可以发现:各种环保斗争和环保规定已强制个别资本将那些成本内化,若非如此,这些成本就会落到环境中去。这是一场发生在资本和环保运动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这些运动强迫资本去处理成本转移的短期负面影响,而这或许就(有意或无意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效应,即从长远来看这些运动其实拯救了资本自身。

一次真正的经济萧条可能就是环境的全面恢复规划的一个机遇,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这种可能性很小。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为两种类型的环境改造创造了政治条件。第一种类型的改造体现为努力整治大平原的退化土壤以及南部与西部地区的那些生态被破坏了的牧场。在此意义上,经济萧条就成了一个“对环境有利”的事件。第二种类型的改造则表现为一些更为壮观的成就,即开始或加快一些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如大坝和水利工程、大桥和隧道等,这些工程对于西部城市化和二战后全国各地的郊区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些工程,就不会有郊区化、消费主义以及汽车文化等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繁荣。在当前的

个人主义消费结构的产生过程中,这些工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消费结构从生态角度来说却是不合理的。

下一次的经济萧条可能会使环境条件变得更差,但也可能是个人和社会的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迁的一次机遇,例如,造就一些绿色城市、使城市与周边农业用地融为一体、出现了人们翘首以待的公共交通系统等等。抑或是,在不同的地方,程度各有不同地同时出现这两种情形。当然,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形将依赖于政治斗争的进程、制度的调整以及技术革新的类型等。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环境的破坏、环保及其他相关的社会运动、政府的政策和预算、国际性团体的政策、以及经济条件等等都是相互关联的,这就同任何一个专业的生态学家所构建的生态系统模型一样。任何一个人如想去思考这些相互关联,他都会遇到这些生态学家们在试图为某些特定物种的命运构建模型时所面对的同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即会遇到原子论和归纳主义对整体论的问题。更糟糕的是,秃鹰和微生物不会按政治方式把自己组织成为社会动物,但是,人有时却会这么做。因此,对一轮普遍经济萧条的生态效应所构建的某种系统化的精确理论到底有多少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归根到底,一切都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平衡、那些希望改变我们同自然的关系的人的洞察力、以及我们彼此间的物质关系,简而言之,都取决于环保、劳工、妇女以及其他一些社会运动的政治目标。“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个问题最终并且首先属于政治问题的范畴。

### 南部国家的条件

南部国家生产条件的危机特别严重,因此出现了关于

“可持续性的发展”的讨论,这一讨论已变成了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战场。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实际上每一个使用这一表述的人都有其不同的意图和含义。在环保主义者和生态经济学家的定义中,“可持续性”是指仅仅利用可再生性的资源而且其污染水平还是较低或者不会提高的。实际上,如果据此来看,南部国家可能要比北部国家更接近于“可持续性”;但是北部国家比南部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来作为其达到可持续性的手段。资本当然也使用这个术语,即用它来指可持续性的利润,——这是以剥削的长期计划,既使用可再生性资源也使用不可再生性资源,以及对“全球共有资源”的使用为其前提。生态学家们则根据自然生态系统、湿地、荒地保护、空气质量等等的维护和保持来定义“可持续性”,然而,这些定义也许同利润的可持续性毫无关系或关系很小。其实,生态的可持续性与短期利润呈一种反比关系。如果说20世纪晚期的历史有什么指导意义的话,它只说明:乡村和城市生存的“可持续性”、本土居民的世界、妇女的生活条件、以及安全的工作场所等同利润的可持续性也是呈一种反比关系。

对于南部国家来说,走与北部国家相同的消费主义工业化道路并不可取,它们有选择别的道路的可能性。然而,不论如何定义这一表述,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以这三个国家为例)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付出了大量贫困和众多灾难的代价,而且还破坏了生态的稳定性。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佳绩,而且有些东南亚国家更是成效显著(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来衡量),但是这些地区是否能成为工业化强国、支付较丰厚的工资并提供体面的劳动条件、制定积极的社会政策并实施有效的环境保护等还有待证实。其余的大多数的南部国家(包括北部国家和东亚国家的内陆地区)则成了经济、社

会与生态灾难的多发区。南部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有许多障碍,例如,由于财富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公平致使市场疲弱,也没有进行可使中小农场主收益的农业改革,而且对原材料的需求和供给也很不稳定。另外,还有外债和支付平衡方面的危机等问题,而且它们不用说还得应付维护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以及维持政府的稳定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外在于生态条件的状况的,一般来说,它们同生产条件也是不相关的。无需赘言,这种局面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的持续不稳定性、向北部国家的新移民、更多的经济和生态灾难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依次重蹈北部国家的覆辙。

### 政治可能性

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80年代早期直到90年代晚期,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处于中右翼势力和右派政府的统治之下,它们是没有能力带领资本主义去改善生活、劳动、城市或环境的状况的。这些政府打定主意要去拓展“自由市场”和劳动的国际分工;废除国有制并使其私有化;在南部国家强制进行经济“整顿”,并对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休克疗法”,因而使某些第三世界国家近半数的人口都边缘化了;而且它们还声称,一般来说,“市场”和新自由主义将会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总的来说,事情必然是在变好之前早已变得更糟了,——特别是在南部国家。

同时,在各国,各种各样的绿色运动以及“激进的绿色主义”运动正方兴未艾。在某些国家中,有些工会组织如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已大大提高了;而环保主义者如今倒过来也提出了一些他们在5年前或10年前还忽视或轻视的经

济和社会问题。围绕着生活条件这个普遍问题,通过劳工和女权主义运动、城市运动、环保运动以及受压迫少数民族的运动等,人们已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把自己组织起来了。虽说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的前景十分暗淡,但是某种类型的生态社会主义也许是有希望的。这种社会主义在密切关注生态问题的同时,也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一般来说,它也关注女权主义问题、反种族主义、以及社会正义与平等问题。从全球来说,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才产生了那些可根据上述资本主义矛盾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来加以解释的运动和组织、斗争和行动。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意味着劳工、女权主义、城市、环保以及其他的一些社会运动迟早必须联合成一种统一力量,即民主力量,——它既有政治生存能力,同时也有能力对经济、政治和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革。<sup>9</sup> 在全球资本的总体化力量面前,单个社会运动相对来说是软弱无力的。这就提出了三种互为关联的整体性战略的必要性。

第一个战略就是自觉发展某种共同领域或公共领域,一种政治空间,即一种双重性的力量,——在其中,少数民族、劳工、妇女、城市以及环保等组织可以在经济和政治这两方面展开工作。可以在此领域中发展起来的联盟并非是各种运动以及这些运动的领袖们在如今所达成的那种暂时性的、权宜性的联盟,而是包括选举联盟在内的战略性联盟。可持续性的社会和自然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市民社会,——可以根据它的“共同性”、团结一致性、它同资本和国家的斗争,以及体现在各种运动组织间(还有各个运动组织自身内部)的结盟和合作中的民主动力和组织形式,来表述这种市民社会的特征。第二个战略就是在这一公共领域或“新共同性”中自觉发展出另一些经济和生态途径,例如选择



绿色城市、无污染生产、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农林业等等，——我们现在对这些途径的技术层面的了解是越来越多了。第三个战略就是将工作场所和政府行政部门中的民主化斗争组织起来，以便将某种生态的、积极的实质内容灌输到自由民主的外壳中去。它规定，这些运动不仅要在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目标时采取政治手段，而且它们也必须就政治目标本身达成共识，——最重要的是，某些政府和国际性机构得民主化，而另一些机构则必须削减。

这些想法似乎同某种生态性资本主义一样是不现实的。也许，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现存的资本和国家结构除了偶尔会进行一些改良外，它们看来是不可能有什么别的作为了；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却在日益高涨。因此，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一次全面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是很有可能出现的，这么说的理由就在于：这些运动的要求与以利润为导向的现存经济和政治结构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到那时，就会出现大量的“社会病态”。有人会说，这正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社会和政治结构正处于解体之中，种族主义的复活、排外主义、对外来劳工的歧视、男权主义者和反环保主义者的反抗，以及其他一些反动倾向和趋势等等正在成为日益严重的危险。其他一些人则联想到了右翼人民党主义的复活以及政治和经济主流的右倾反动转向。对于当前的世界政治形势还有一些别的分析，而在这类分析中，有人认为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富人反对穷人的战争，这是一场由富裕者发起的叛乱，他们反对由穷人、福利国家、经济再分配政策等等所提出来的种种要求。或许上述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不论事实如何，从进步论者、激进或左派绿色主义者、以及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我们这个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党派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所谓的“正确路线”；相反，我们需要



的是批判性地审视以往所有的政治法则并开创一种世界精神,并且在“称赞我们的共性或‘新共同性’的同时,也肯定我们的差异性”。

### 注 释

1. 《纽约时报》,1992年8月12日。

2. 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等,《帝国主义世界》(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美国的大部分木材都是由工业化林场生产出来的。

3.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和蒙山特(Monsanto)公司为了提高产量已通过实验改变了小麦的基因。他们在小麦中植入了一种外来基因,这种小麦可以产生一种酶,有了这种酶,许多杀虫剂对小麦就无害了。如今,所有的主粮——玉米、稻米、大豆、以及其他一些粮食,包括一种可以通过发出某种对科罗拉多甲壳虫致命的蛋白质来自己杀死害虫的马铃薯在内——都已是转基因的了。当然,那种被植入小麦的基因是什么则是商业秘密了(《纽约时报》,1992年5月28日)。

4. 在此,资本不再是仅仅占有自然中的那些现成的物质,将它们打碎,然后再重新组合在一起,并借此而构成某种商品,问题早已变了,现在的问题却是得创造出一些以前不存在的东西来。我知道在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明确的分界线;然而,一旦我们把这两者的极端情况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在此还是存在着一种质的差别的。

5. 所有的增长理论都承认,在“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物质生产与收入、以及在投入和消费品的增长这一方面与利润和工资这另外一 252 个方面之间存在着某些确定的关系。投资/消费和利润率/工资率之间的失调会导致经济动乱(“失调性危机”)。然而,资本主义主要的内在危机却是某种“实现性的危机”。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成是“充满危机的”。但是,经济危机却迫使资本削减成本、“调整结构”、暂时停产减员,并在其他方面作某些改变,这都会使这一体系(资本主义)变得更为有效,即有了更强的盈利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体系也是“依赖于危机的”。马克思写道:“资本通过危机来积累”,他的意思就是说危机既是结束某些资本的时机,也是诞生某些新资本以及重组一些旧资本的时机,当然,一些更为“有效的”新技术(例如计算机的使用)也得以在整个体系中传播开来。

在生态经济学发展起来以前,“到底什么是增长?”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是被忽视了的。如今,已有更多的经济学家愿意承认:增长不单包括产出的某些增值量(商品、服务、耐用商品存量的增长),而且也包括“废弃物”的产出以及长效废弃物累积量的增长。这就使原本已经很复杂和变化不定的收入核算系统变得更复杂了。

6. 说这是“头脑最简单的”,部分是因为:不同行业的利润率虽有逐渐变得类似的平均趋势(通过资本从低利润部门向高利润部门的转移),但是,行业间甚至各单个资本间的利润率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造成此情形的原因有很多,而其中有一条(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大资本不仅从绝对值或总量上来看拥有比小资本更多的利润,而且前者还“赢”得了比后者更高的利润率。这是因为小资本通常是无法同大资本相竞争的,而大资本却有能力和小资本相竞争(它们也相互竞争)。

7. 之所以是在“无意之中”,是因为马克思所使用的“生产条件”这个概念,常有不同含义,前后并不连贯;他绝不会想到这个概念会有或能有我在本章中所采取的这种用法;而且在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纽约:法洛与莱茵哈特出版社,1994年)出版之前,也绝不可能会有人如此来使用这个概念。

8. 所谓“合理化”也包括“重新私有化”,即把家庭和社区中的有酬劳动改为无酬劳动,或者说,复活“自助”理论,也就是说,把劳动力的再生产、市政生活设施和环境等方面的负担再扔掉一些,即采取马丁·奥康纳所说的“自力更生”的方法。这些方法对于资本主义积累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支撑因素,但它们在危机时期的作用则更重要。这一问题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课题,例如,家庭中的无酬劳动是否包含了男人对妇女的剥削,这是否意味着对资本的某种补贴,等等,在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非常多。

9. 没人知道或能知道这种“统一的、强大的民主力量”何时会发展起来,甚至它到底会不会发展起来也无从知晓。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必须回答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例如,这种“力量”概念本身是否植根于西方政治哲学的现代主义/人本主义传统之中?这一传统实际上是难以容忍“差异性”的,但是,它至今还顽固地保留在同国家相抗衡的个人权力观之中。用马丁·奥康纳的话来说,“在如今这个历史时刻即在20世纪晚期,并存着许多声音,它们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些不协调性,就其都反对资本的统治这点来说,它们之间存在着共性,但在别的许多方面,它们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必须弄清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唯实论’的一个层面,这也就是说,事情‘在变好之前早已变得更糟了’。”有些人坚信弄清楚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笔者在同意这种观点的同时仍有所保留:完全解决这些冲突,全面充分地,按这些社会运动如今所持的立场,来听取了解存在于这些社会运动之中和之间的那些彼此对立的意见、它们各自不同的知识背景等等,这可能是来不及做到的。在政治力量对比的当前局面下,要想同资本相对抗,建设一种没有剥削的、社会公正的、生态型的社会,特别需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必须发展某种统一的政治策略,如此才能同全球性的资本和那些不断壮大的全球性准国家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相抗衡,在此容不得丝毫的迟疑。 253

## 第三部分

# 社会主义与自然

所有的哲学都存在于维持与放弃两个词中。

——爱比克泰德

无法用金钱来界定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但所有的东西仍然一文不名。

——约翰·斯塔尔莱

本书的第三部分论述提出了关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和政治社会学的思考方法，对于北部国家中的以及（在某些方面）对于南部国家中的激进生态运动来说，这些思考方法可能是很有用的。经常有人说北部国家的政治生态学同南部国家的政治生态学是非常不同的。北部国家的环境保护论是受“后稀缺社会”的休闲价值观驱动的（这也就带来了争论）；而南部国家的环境保护论却被看作为“穷人为求生存而发起的一种反叛”（借用

贾安·马蒂尼茨·艾略尔的话)。这两种意见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北部国家的环境通常被看作为是一种消遣对象,或者一种消费手段;而南部国家的环境则经常被当作为生产的一种手段和对象。这种差别反映了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关联性。对于前者来说,大多数居民生活在都市化区域;而对于后者来说,大多数的人口仍然还被束缚在土地上。但是这种“富裕生态论”和“生存生态论”(艾略尔语)在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是相互交叉并存的。一方面,北部国家中的可持续性农业运动、要求削减有毒物质的生产(节约资源)的斗争、以及绿色城市运动等,都把环境的总体或局部当作为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手段或对象。在北部国家那里,由历史所决定的“体面的生活标准”(或许还有我们的生存本身)也依赖于向“绿色生产”的全面转向;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南部国家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中赤贫人口的恶性膨胀,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就储备了庞大的劳动大军。这就意味着城市环境也正越来越被看作一种“消费手段”,或者一种消遣对象。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这些改变,奠基于世界劳动分工格局和世界的这两个部分中的生态运动的目标和战略的改变。但是,这并不可能消除北部“生态论”和南部“生态论”的巨大差别。然而,这些改变确实说明已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一个灰色地带,在其中这些目标和战略可能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织在一起了。 256

在本书第三部分所引入或提出的这些分析方法绝不是想把北部国家中不断增长的激进绿色运动以及绿色运动的激进观念和实践的能量推至极致,更不是想采取南部国家中的这些方法。而且,我还得声明,下述论述无意于去构建或倡导某种激进绿色运动所说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模式。虽然现在关于“可持续性发展”、“绿色财政”以及全面绿色生产的文

献越来越多,但是,选入第三部分的这些论述并没有着力去研究某种在社会和环境层面上公正和正义的,并且在生态上合理的社会模式。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也没有落入未来主义者的窠臼而不能自拔。未来主义者对未来可能或将是什样子作了种种预测,但这些预测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真伪难辨的。我的立论前提与他们有些不同。我认为如果生态学社会主义确实有其真实的历史可能性,那么它的精神动力、社会经济的范围和界限、政治实践的形式以及规范和价值观等等这些问题就将是通过实践来整体性地加以解决的(现在正在被解决?)。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有成百上千个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组织 and 团体在进行着实实在在的社会和生态斗争,它们现在正在各种各样的战线上进行作战,涉及面很广,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等众多问题。

本导论准备根据前苏联领导下的原来的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和生态政治学来梳理下述论文中的观念。目的是构建某种理解背景,从而更好地阐明下述论文中的观点,特别是在前苏联的生态学和不断发展的激进民主生态运动(含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生态学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

既然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对自然造成了这样大的破坏,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在谈论“社会主义与自然”时丝毫不提及它的负面影响呢?提出这种疑问是很合理的。毕竟,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社会同样迅速地(或者更快地)耗尽了它们的不可再生资源,它们对空气、水源和土地等所造成的污染即便不比其对手资本主义多,至少也同后者一样。因此,有许多环保主义者得出结论说,不应由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承担造成环境退化的责任;相反,他们把罪责归结于“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官僚机构”以及那种“不

惜一切代价进行生产”的主观倾向,而所有这一切,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来说都是共同的。<sup>1</sup>

在主流学术界和大众传媒中,还可以发现这样一种通识, 257  
即认为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前社会主义体系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体系是两种相互独立存在的模式(就像在实验室中一样)。实际上,在20世纪,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和发展过程中,它们彼此之间是存在着相互影响的,而且这种相互影响常常还是非常深刻的。在这一世纪,造成环境破坏的首要原因是战争,而那些破坏性最大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或者就是发生于帝国主义列强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或新兴国家之间。在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而且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美国(还有前苏联)仍在不停地进行着核武器试验,仍在继续破坏土地、海洋和大气。这些因素就构成了生态转折点。

二战以后,美国在越南的好战性的战争政策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20世纪80年代中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为了支持它的右翼盟友如(尼加拉瓜的)堪查斯(Contras),在农业用地上喷施了大量的杀虫剂和化肥,结果使这个地区成了一个生态重灾区。而在非洲次大陆,作为南非军事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毫不犹豫地破坏了那些处于前线的国家的农业用地,从而使解放力量失去藏身地,而且,借此还削弱了这个地区中的那些对民主目标抱同情态度的政府的力量。相比之下,由那些采取侵略扩张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如前苏联在阿富汗,同由资本主义相互间战争以及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争所造成的破坏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坦率地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态危害性事实上要比资本主义相互间的对抗以及它们的反革命行为的生态危害性小得多。尽管根据这种对抗以及革命和反革命为线索来描写20



世纪的战争生态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这样一部综合史,也从没有将战争整合进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生态学中去并对其作出某种综合性的补充说明。

虽说不应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这样的比较,即把它们看作是相互独立发展的;但是,还是可以对它们进行一些合理的比较的,因为它们是以不同的财产关系、法律关系、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权力关系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西方的一种权威性的观点认为,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导致环境破坏的原因都是“工业化”、“技术”等因素,事实上,这种观点一方面没能在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即该社会的技术基础、劳动过程和生产体制之间作出区分,另一方面也没能在该社会的财产、法律及政治关系之间作出区分。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作的所有比较分析中,作这种比较,并指出不同的财产关系和政治体系在分析环境退化的原因和后果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理论意义,是极为有益的。

258 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西方引入技术、生产系统和劳动控制(甚至还有关于技术和生产的核心观念)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环境破坏的原因同资本主义国家是类似的。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权,就此而论,自然退化的原因和后果基本上也是一样的。最后,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已把自己融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去了,所以也可以说,同一种系统化的力量在东方就像在西方一样有效。

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所以,对于它们来说,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不一样的。也可以这样讲,因为存在着两种政治体系,而且它们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也存在着一些相应的差异,所以这也会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的不同。

实际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同西方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前者通常没那么“先进”而已。但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生产关系却是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因而,在社会主义世界中所发展起来的技术的特定形式,以及农业、采矿业、工业等等所采取的独特方式,是同样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后,政治体系上的差别在生态退化过程中以及环境斗争与重建过程中都会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环境破坏的原因既相同又不同。

既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似性是众所周知的(正因为它们是相似的),那么重要的就是去关注这两种体系之间的差别。社会主义的财产/生产关系和政治体系主要导致了不同的或修正性的技术选择、工业结构、社会劳动分配、科学发展和应用的模式、消费和城市化的方式等等,它主要是以什么形式来完成这一切的?另外,社会主义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些什么区别?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及它们同生产条件的关系在形式上的变种有很多。市场关系的范围和类型、文化传统以及政治体系的变化也很大。然而,还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的。首先,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主要的生产资料虽不是社会化的但却都是国有化的,——虽然在前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对资源的某种程度的实质性的地方控制,但是对生活资料进行强烈民主控制的传统是不存在的。离开了社会化或民主化的社会控制,对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或采取国家所有制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中央计划和政党/官僚政治统治的特征。其次,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工人对于生产资料具有获得、使用和实施控制的权力,——尽管在实践中,尤其是在自由化的最后几年,它们并没有始终坚持这一条。

第三,即便不是全部那也是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过一段粗放型经济发展史,并没有走以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和高技术生产为基础的集约型的发展道路,——因为社会主义出现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落后”地区。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竭力要“赶上西方”(他们把这种努力称作“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共产党认识到这是防御西方的国家安全的需要,而且,它们还宣称,在改善劳动阶级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这个问题上它们的能力要远超过西方。非批判性地接受西方发展模式的某些方面常常使社会主义国家机械地模仿西方,——这是当今激进的绿色主义运动和政党不会犯的一个“错误”。在东—西方冲突过程中,一种有着质的区别的进步理念受到了系统化的抑制。这种进步是根据生活的质量而不是技术或消费品的数量来衡量的,或者是根据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来衡量的;这是如今的激进绿色主义者像躲避瘟疫一样来加以(或应该)防范的另一个“错误”。

进而,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冲击下崩溃了,因为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过时了,必须向某种更为集约型的发展模式转型,但这些国家却仍处于受供给所限制的经济背景下。在这种危机面前,产生了对西方的资本设备——包括污染控制与缓解技术和消费品——的巨大需求,而且这种需求还在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在西方,那些过度资本主义化的、纠缠于成本削减的主要的经济体却发现自己的资本和消费品都过剩了。这主要归因于劳动剥削率的提高以及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日益加剧,还有来自于亚洲的剧烈竞争。这一基本经济事实有助于促成东方和西方的政治变革,进而结束冷战并重新开始原社会主义世界和新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投资与贸易活动,而这就对前社会主义国家开发利用它们的环境和生产条件的一般方式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

原则上来说,国有制和中央计划可以使国家减少资源损耗、“消极的外在性”(譬如污染)以及对环境的宜人性质的破坏。科学和科学家在社会主义计划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强化了这一原则。这样,就可以通过政治法令把巨额财力配置到缓解污染的投资项目中去(如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为减轻贝加尔湖畔的工业污染所作的决策)。而且,还可以通过法令来迁移工业(如戈尔巴乔夫就谈到过拆除贝加尔湖地区的工厂),并且还可以通过法令来分散这些工业,从而把有害污染部分转化为无害废物。在长约20多年的时间里,前苏联领导人甚至曾提出生态科学是进行理性的、科学的和经济的决策的一个重要基础。

不论那些在原社会主义等级关系中处于上层地位的人有多么的开明或不开化,那些受到训练去研究和处理生态问题的工人、农民、科学家和技术员都是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政治权力的。国家所有制/计划和政党/官僚统治的结合——或大众力量“生态意识”的缺乏——就意味着某些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与别的企业中的这些人在政治上是被相互分隔开的。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倾向,即对自己这个企业对于别的企业和“下游”社区的环境影响漠不关心。就有生态意识的干部没有共同的组织这一点而言,这个问题的根源显然是政治性的。 260

从更深层次来讲,在政党/官僚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阶级在政治上的分隔状况是同内部民主的发展程度不高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就某种环境问题自主地成立组织并进行讨论的自由;缺乏对污染水平的公共信息披露;官僚机构对新投资的环境影响遮遮掩掩并进行误导;最后还有一个并非最不重要的因素,即政治犬儒主义和冷淡情绪。“消极的

外在性”或“社会成本”常常得不到恰如其分的确认,因为缺少一种自由的信息渠道,政府部门和企业也缺乏责任感,没有获得技术数据的独立途径,也没有可以用来改变现存实践的制度通道。这样,环境问题相对来说就隐而不现了,因而,对污染的种类和程度相对来说也就不甚明了了。当然,关于这一惯例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例如切尔诺贝利事件、咸海的干涸以及缺水地区的盐碱化。

然而,生态科学传统上在经济计划中还是起着某种作用的。从历史上来说,因为前苏联的环境保护主义运动是在科学家的领导下的,所以它们在该国所享有的合法性要多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在历史上所享有的合法性。而且,“生态公开化”还开启了进行抗议和组织团体的独立途径,这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就使不可见东西开始变得可见多了,使不确定的东西变得清楚多了。

中央计划本身对于环境来说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就积极方面来说,没有了那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就没有了企业之间为市场份额所展开的那种资本主义式的斗争,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实施污染的动机要比资本主义公司少得多了,后者为了能在市场中生存下来常常不得不外化其成本。就消极方面来说,中央计划鼓励进行大规模的生态上不合理的采矿、建筑和工程活动,并将能源的生产和输送集中起来。最恶劣的例子就是核能源生产,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与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军事野心、机密以及技术专家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最后可以分析一下切尔诺贝利事件,它(这个反应堆的设计是抄袭自一个美国的模型)可能既是强权国家和社会软弱的结果(即缺乏民主),同样也是缺乏质量控制和工人进取心不强的结果,而这反过来又是与政治和经济的缺乏民主和没有效率的形式分别联系在一起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充分的就业和工作保障是一种基本准则而非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是例外)。充分的就业和工作保障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限制了劳动力横向的和纵向的流动空间;限制了企业用一种灵活多样的方式来使用劳动力的能力(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即“可变资本”);而且还限制了企业从劳动力储备中吸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因为在经济中不存在任何“张弛”,空间极度“僵化”(要是不颠覆充分的就业和工作保障这个规范,这种经济特征可能是无法被消除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就像科尔奈<sup>①</sup>曾在理论上说明过的)是资源受限的。这里的“资源受限”是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来定义的,并非指某种“生态制约”。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从历史上来说是需求受限的。资源受限的经济对于环境的影响通常似乎取决于许多因素。首先,资源受限型经济中的企业因“囤积”劳动力、原材料、燃料、零部件以及其他一些原料而声名狼藉。因为“短缺”和“排队”,市场的名声也不好听,而这对于环境来说,看来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就负面影响来说,即使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他们也会去占有自然资源;而就正面来说,在转向集约型的发展模式之前,资源受限的经济增长肯定比较慢(在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对资源消耗和污染的速度肯定也比较慢。

其次,充分的就业和工作保障的强制规定削弱了通过组织技术革新来节约劳动的积极性(这也就带来了前苏联经济的相对停滞)。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旧技术对资源的损耗以及(或)它的污染是否会比新技术多是无从知晓的。一方面,

<sup>①</sup> 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匈牙利经济学家,译注。



中国为了使农业和工业一体化并推进经济发展而在农村建造的那些小型铸铁厂和其他的一些工厂就是些著名的“污染源”。另外,技术上的落后状态又与最新的污染控制手段的缺乏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东欧和前苏联在高技术部门上的相对落后状态减少了那种在西方工业化经济中十分普遍的高技术污染。一般说来,充分的就业和工作保障再加上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秩序的相对匮乏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企业不会受到不断采用各式各样新技术这种需要的驱使。这当然是一种比较性的评价。例如,前苏联曾向西方公司出口了水净化装置、鼓风机蒸发装置和其他一些新发明的生产许可证,而且在许多产业部门中还采用了很多“生态洁净的技术”。然而,如果同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前苏联在大多数方面仍处于技术落后状态中。

262 第三,充分的就业和工作保障意味着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都强烈希望,不管技术和市场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企业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运营状态。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基本上都具有“企业意识”,但没有“社会意识”,因此也就有例如通过污染来外化成本的动机。在另一方面,充分的就业和工作保障的强制规定(与中央计划一起)又限制了不平衡的与联合性的经济发展过程(因此也就限制了生态悲剧的发生),——这一发展过程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特征。有些社会主义国家试图运用中央计划来克服财富和生产能力的地区性不均衡状态,看来这对环境也是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就积极层面而言,“废物”的分散有助于防止使废物变成“污染”。就消极层面而言,一旦工业被分散了,废物处理系统的规模经济就很难实现了,这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地方污染。然而,从总体上来说,社会主义工业是集中在一起的,而且它们对环境的影响也与资本主义工业相类似。



资源受限的与需求受限的经济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差别。其一就是后者通过广告、包装、款式变化、型号变化、产品分化、产品升级换代以及信用购物等浪费了资源,但这一切却都是维持经济体系的顺利运转所必需的。这种“销售努力”不仅浪费了资源也导致了环境污染。社会主义经济在这方面的问题就要小得多了。另一个差别则在于,需求受限的经济是以劳动的工资形式以及需求满足的商品形式为基础的。相反,社会主义经济则强调集体消费,如公共交通、集体性的娱乐和休闲设施以及公寓住宅等。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经济所使用和消费的资源要比资本主义经济少,而且社会主义的个人消费所产生的污染也比较少。另外还有一个差别,即资本主义经济遵循这个原则:“积累或死亡”。增长不是经济和社会福利这种目的的手段,它就是目的本身。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增长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但是关于增长却不存在着与资本主义相同的系统化的经济必要性。勿宁说,增长是出于一种与经济发展和“赶上西方”的愿望相关的政治决策的需要。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榨取/污染的残酷性和无计划性也许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从原则上来讲,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利润,增长则被看成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虽然在实践中这显然不是事实。然而,在理论思考中重点指出如下事实却是很有意义的:社会主义企业是在某种中央计划的前提下努力完成其生产配额的,它们的运作原则与资本主义公司是有区别的,而后者则必须不断提高其利润率。

最后,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的和社会的平等准则支配着政治与经济决策,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远非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饱受贫困折磨的大众被国际资本排挤到边缘地带去了,而且他们还不得不去破坏环境,于是环境

不再是纯粹用于生存的需要了；然而，在社会主义世界中却很少会发生或根本就不会发生与之相对应的这些悲剧。把古巴同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或许多中美洲国家作个比较对于说明这种关联将是十分有益的。

263 对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共产党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落后、外围或半外围地区取得政权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粗放型的发展时期——资本扩大的投资项目、重工业、巨型能源工程、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等等，这些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早期曾经历过的。在冷战氛围下，再加上西方对前苏联的敌视，“社会主义建设”和“赶上西方”加深了粗放型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资源丰富的前苏联。所有走粗放型发展道路的重点国家都已成为污染工业的“专门生产者”了，如造纸业与制浆业、生产矿物燃料、石油提炼、重化学品、石油化工产品以及其他一些基础性的资本货物工业。于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东欧工业增长的“奇迹”，由于粗放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环境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例如，这在前东德就比在前苏联表现得就更明显，因为前东德的人口密度和资本的单位收入要比前苏联低得多。除此之外，那些环境记录好得多的小国（如丹麦）因为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处于一个对环境更为有利的地位，因而从中受益匪浅。它们可以进口石油、天然气、化学产品等东西，不必付出污染和污染防治与控制的代价，——这些代价正是工业大国的特征。

向集约化发展道路的转型——其开端以前苏联的开放和改革为象征——也就带来了不同的环境问题和机遇。首先，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很可能会更为积极地运用价格机制，这将引导企业节约自然资源，即停止对资源问题的轻视，不再过快或效率不高地利用资源或者采用种类错误的资源。其次，在

对西方产品的需求中包括了一些高技术的资本货物,目的是使生产设备和环境保护设施现代化。第三,考虑一下社会主义世界中的环保运动的目标及力量来源可能会是什么也是很有意思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环保运动的基础一般是城市/郊区工薪阶层、专业人员以及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组成的团体。这些阶层的产生根源在于集约化工业的两次发展浪潮以及随后金融服务、通讯、企业经营、研究和开发等等的迅速成长,——所有这一切都是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结果。资本主义工薪阶层的物质利益从本质上来说并不存在于重工业之中。相反,在前苏联受聘于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管理者和其他一些人员在环保运动中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同西方的那些相应人员并不一样,其利益仍系于不断的工业化过程之中,他们的能力可能仅局限于推动经济由“社会主义建设”向“社会主义重建”的转变。

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上,资源受限经济的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是否就比需求受限经济的多或少,泛泛而言,这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可以提出来的是,损耗和污染的某些基本原因在这两种经济体中是不相同的,此外,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损耗和污染更多是政治而非经济问题;这也就是说,与资本主义的 264 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尽管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表述过这种观点)。诚然,环境退化是内在于前苏联的工业进步之中的,因为它的领导人坚信他们的国家必须同美国进行竞争,以牙还牙,因此可以花费在环境保护上的资金也就少得多了,——因为前苏联经济要比美国经济弱小得多。从原则上来说,不论有无广泛的市场机制,中央计划经济一般都可以强制企业内化可能出现的各种消极外在物和社会成本。然而,只有当中央计划制定

者、企业以及政治家和人民都希望它成为现实时,这种情形才会成为现实。在前苏联,在当时报刊杂志关于经济问题的辩论中,以下观点凸显了出来:(用威廉姆·曼德尔的话来说),计划制定者的“指导原则一直是增长率,而一切其他主张都应受谴责”。对增长的强调显然是与前苏联的下述感觉联系在一起,即在冷战、反共产主义、资产阶级政权对社会主义的敌视、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还有武器竞赛的氛围下,赶上西方是十分有必要的。换句话说,正如先前所指出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环境问题的任何真正的理解都必须被置放在自20世纪早期以来主要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所发动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斗争的语境之中,同时,还必须被置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冷战的语境之中。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达到刺激经营者更加节约劳动和资源、进行更为灵活的生产等等诸如此类的目的,它们进行了一些为经济创造“宽松”环境的新“改革”。但是,现在就对这些改革是否会造成损耗/污染的程度和数量的提高或降低这个问题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这将取决于这些“改革”到底会具有何种性质、会采取何种实施方式以及民主政治形式的发展水平等。传统社会主义反对“把未开化的自然理想化”,而赞成对自然采取那种据说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态度。全球性的生态运动,尤其是(目前还很弱小和分散的)国际性的生态学社会主义运动,对于传统社会主义在自然问题上的这种态度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就下定论同样也为时过早。然而,现在却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态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所谓标准观点加以驳斥的恰当时机。

总而言之,在目前的政党/国家体制下,环保组织要发展和成长,组织抗议活动并对政府施加压力,甚至连获取必要的基本信息都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常常是不可能的。其次,这种

政党/国家体制意味着工人、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在中央计划机制中很少有或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力,在此情形下,某种超然于企业之外的生态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受到了抑制。第三,这种政党/国家体制通过允诺充分的就业和工作保障来使自己合法化,而这就降低或消除了进行那种不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技术改造的压力和可能性。从这些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是政府关于生态计划的那些粉饰之辞以及所谓的潜力,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结构的现实存在,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  
265  
条鸿沟;不论计划的高层制定者或政党的基层组织抱着何种良好意愿,这条鸿沟都会使这些意愿落空。当今生态学社会主义者得注意:学无止境。

本书的第15章“社会主义与生态学”,在劳工运动与环保运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与现代生态思维之间作了一些对照和比较,试图从中得出某些明确的观点。关于第16章“一种激进的绿色政治学存在于美国吗?”,最好把它理解为对定义广泛的美国绿色运动中的政治激进因素的一种探索。第17章“平地政治学”提出了一种以多元主义文化政治学和生态区域性政治学的综合为基础的,并按劳动阶级的思路组织起来的绿色/劳工/社群联盟。第18章“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走向一种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则批判了绿色激进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口号,并且还发出了对某种既以“地方”又以“全球”为基础的理论和实践的呼吁。第19章“生态运动与国家”,讨论了据我看来是总体上的新社会运动和具体来说的绿色运动的一个(内在的)政治目标,即为国家的民主化而斗争。题为“新全球化经济以及一种替代性方案”的第20章,考察了新全球化经济所具有的社会经济内涵,分析了当今后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缺陷,而且还讨论了因

为找不到更好的表述方法我只能称其为“保护第一!”的那种运动。最后一章的标题是“什么是生态学社会主义?”,该章对传统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与生态学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作了对比和比较,前者是某种普遍性的和定量化的批判,而后者所发展的则是某种“具体性的”和定性化的(理论和实践)批判。尽管目前的这项研究开始于一种抽象的和理论的观点,但从**实践**(praxis)和**最终目的**(telos)这两个视角来看,它(很有希望)达成某种更为具体的和实践性的结论。

#### 注 释

1. 这里所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根据工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制定出来的。虽然也提到了其他一些国家(如某些南部国家),但是,这其中的许多国家并不能完整地分别包含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构想中。

## 第十五章

# 社会主义与生态学

267

自然的理由

在我看来,如今有三种普遍的社会经济趋势可能会引发出某种激进绿色政治学。首先是经济全球化,这一趋势正在经历一个“通过危机来积累”的过程,这一过程使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日益贫穷,破坏了各种社区,使成千上万的生物区域日益退化,而且还加剧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备受危机折磨而又依赖于危机的资本主义积累正在使生产条件遭受着严重的破坏,而且,它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贫困、失业、不平等以及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边缘化;另一方面,它还(常常致命性地)危害了人类健康、城市和乡村社区以及生态系统。第二个趋势是环保、城市、劳工、农民以及其他一些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为工人和农民、妇女、社区和环境等而保护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可以用上千种方法来划分这些运动,——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这些方面包括:从宗教原教旨主义和一些民族主义……直到范围广泛的种种“新社



会运动”。第三个前提是,对生态危机的解决也就包含着对经济危机(以全球资本的普遍问题)的解决,反之亦然。激进绿色政治学的前提基于一种信念,即认为这两类解决方案都暗含着某种生态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态学的内涵。<sup>1</sup>

反过来,生态学社会主义又以某种特定的全球性阶级政治学的发展为前提,——首先,这是因为经济压迫和剥削的加剧;其次,这是因为生态退化现在越来越是一个阶级问题了(但不仅仅是一个阶级问题)。例如,北部国家中追求环境(以及经济和社会)正义的各种运动的发展,南部国家中“穷人的环境保护论”的兴起,就说明了这一观点。在这些国家中,统治集团就分别对被压迫少数民族和整个第三世界负有一种“生态债务”(因为北部国家统治集团的兴旺发达,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建立在他们对南部国家和北部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的生态伤害的基础上的)。上述观点还可以通过下述事实来得到说明:如今的各种劳工、社区和环保斗争在努力使劳动场所变成为一种对于工人和社区都更为健康与安全的场所,因而它们争取在技术、工作关系以及一般生产条件等方面取得更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劳工、社区和环保团体以各种方式(如果不是直接地也是间接地)向以市场价值和利润为基础的生产标准发起了挑战。而人类劳动力、社区组织以及环境等都是“生产条件”,因此,它们都以各种方式被国家政治化了并处于国家的调控之下。

然而,在劳工、社区以及环保运动的大多数领导人的头脑中,社会主义(不论何种类型)与生态学肯定始终是相互矛盾的。社会主义者仍被看作为“生产主义者”,绿色主义者则是“反生产主义者”。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仍然相信生态学仅仅是一种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只是一种确保中等和中上等阶层生活的舒适性的体系。大多数绿色主义者则把社会主义看成为一种无限制

地或盲目地促进增长的意识形态。结果就是：商家和其他一些团体在“工作对环境”、“土地的资本化和经济增长对社区价值”以及“经济发展对可持续性社会”等对立因素之间作了一些虚假的选择，并将其作为进行分化和征服的便利方案。

从历史上来看，西方的社会主义者找到过两种补救劳动条件的方法。第一种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某种更为平等的分配。第二种就是更高的生产率和生产水平（它们经常被看作为程度更高的平等的一个条件）。要创造更多的自由或者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就需要有更高的生产率；要把经济蛋糕做大并以此来终结不同阶级在经济蛋糕的份额上的彼此争夺，就需要进行规模更大的生产。这些补救方法与原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以及工党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在某些国家则持续到80年代）所执行的那些方案基本上是类似的。

在这种思考方式中，至少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其一，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论它如何进行“改革”），对财富和收入进行某种平等的分配几乎肯定会损伤经济积极性，而且还会加剧来自右翼的政治动荡，进而削弱生产率和生产规模。其二，生产率和生产的扩张常常预示着对劳动的一种程度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剥削，而这本身就是以程度更高（绝不是更低）的经济不平等性为其前提的。

而从绿色主义者这方面来看，他们对于退化了的自然条件同样有两种一般性的补救方法。第一种是和旧式社会主义所提倡的是一样的：对财富和收入作一种更为恰当的分配，这样一来，贫穷就不会导致生产者为了物质需要而去破坏自然。即使在北部国家，环保主义者对平等问题也已日益敏感了，因为环境改革的效应常常都具有退化的倾向：劳动场所的污染以及有毒的污染废弃物对于少数民族和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是不均衡的。第二种补救方法则是与劳工和社会主义者

的主张对立的：即慢增长、零增长或可持续性的增长（有种种不同表述）。生产的慢增长或零增长同比例地减少了对作为人类生产的水龙头和污水池的自然界的利用，因而（有人认为）这就既降低了对各种资源的损耗又减轻了所有的污染。

269 因为对财富和收入进行更为平等的分配会损害经济积极性，所以提高平等似乎就会降低生产并使经济增长率放慢。这样看来，绿色主义的观点完全是前后一致的。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采取一种慢或零增长的政策会造成经济危机，而这种危机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多的生态破坏，——因为商家会争着去以多种方式来降低成本。围绕着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在工党（和社会主义者）与绿色主义者之间形成某种联盟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样一种再分配会损害生产率和生产过程并导致经济危机，这倒过来又会对工党（和社会主义者）与绿色主义者产生影响。

很明显，在对这整个问题的通常的讨论方式下，工党（和社会主义者）与绿色主义者是无法结成一种联盟的。（例外的主要有各种反对工作场所和社区污染的劳工—社区联盟。）对于绿色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问题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种解决方法；对于工党和社会主义者来说，绿色主义也是问题的一个部分，也不是一种解决方法。工党和社会主义者把绿色主义同短缺和禁欲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把工党和社会主义等同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以及随之而来在生态上的不可持续性。摆脱这一困境的惟一出路在于，重新定义生产主义：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达到更高的生产率水平，如采用更为有效的原材料再使用、循环利用等等方法；减少能源使用并在改良了的绿色城市内使用大众交通工具来上班；通过发展有机农业来阻止“反复喷施杀虫剂”；另外，还有一些别的方法，——尤其是劳动和土地的非商品化。这样，生态学社会

主义的生产主义与生态学的合理性就不再是相互矛盾的了。

非社会主义者以及许多前社会主义者宣称“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从一开始就是没有生命力的”。在理论上,激进民主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认为他们正在完成对社会主义的终极审判。在实践上,在南部国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正在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实施税制改革,并且他们还希望通过采用其他一些方法来获得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在各地都遇到了来自右翼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理念以及来自左翼的激进民主理念的挑战。

在此期间,在世界政治学中出现了一种强大的新力量,一种生态或绿色运动,它把地球看作为第一位的,并且把保护这个星球的生态统一性看成是首要问题。自由市场和绿色运动的同时兴起以及社会主义的衰落表明,资本主义在其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有了一个新同盟军。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如果不是全部,那也是大多数的绿色主义者都抛弃了社会主义,认为自己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有些绿色主义者批评社会主义,说它是危险的。他们尤其迫不及待地对那些被他们指责为企图把生态学挪用进马克思主义之中去的人进行了抨击。<sup>2</sup>“既不左倾也不右倾,而是向前”这个著名的绿色口号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sup>3</sup>

但是,正如这个口号所表明的,大多数绿色主义者也并非 270  
是资本主义的朋友。于是问题也就来了:同绿党结盟的是谁  
或什么势力呢?对此问题的简单回答是:“小农场主和独立  
商人”,即那些过去常常被称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人;  
奢想和计划“适宜居住的城市”的人;遵循“小就是美”这种原  
则的技术统治论者;工匠、合作社以及其他一些致力于生态友  
好的生产者等。在南部国家,绿色主义者通常支持在村社政  
治学的前提下组织起来的分散性生产;在北部国家,绿色主义

被等同于各式各样的区域自治和地方政治学。

相对而言,也许可以把主流环保主义者称作为“空想绿色主义者”。<sup>4</sup> 这些环保主义者支持那些与可盈利性和全球资本的扩张具有相容性的环境限制法规,例如为了长远的盈利能力而对资源进行保护并制定一些以利润为指向的法规,或者,为此而去清除污染。他们通常都与国内的和国际的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在美国,他们是一些环境改革者、政治说客、律师以及其他一些与构成著名的“十大集团”<sup>①</sup>的那些组织有某种关系的人。

至于说生态学,它在任何地方至少都带有某种民粹主义的气息。这种民粹主义是一种不仅对大型公司、民族国家和中央计划抱有怨恨情绪,而且对主流环保主义也痛恨无比的政治学。

因此,生态学(就目前的这个用法而言)是与“地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它通常是与资本主义的中央权力相对立的。如果我们把它们两两相对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态学与地方主义丰富多彩的所有变种结合在一起,它们既是反资本主义的也是反社会主义的。地方主义以生态学为媒介,而生态学则以地方主义为载体。它们互为内容和语境。非中心主义表达的是某种特定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同自我挣得的财产以及小规模企业联系在一起的。生态学表达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这种关系强调生物多样性、地方和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等等。生态学与地方主义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如今对资本主义(以及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最明显的政治和经济学批判。

<sup>①</sup> “十大集团”(Group of Ten),主流环保运动的领导组织,译注。

除生态学和地方主义这两者都反对全球性资本和民族国家这个事实之外,关于为什么说它们似乎是某种中性联盟,还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生态学强调人类物质活动与自然之间的交换的地方特色,因此,它既反对由资本所造成的对自然的那种抽象估价,也反对关于生产的那种中央计划理念,另外,一般说来它还反对关于全球问题的中心论观点。<sup>5</sup> 生态学的地方特色概念、地方性的维生之道或半自给自足的经济、区域自治原则以及各种直接民主形式,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社会主义的“群众”概念已被解构了,并被一种新的“身份政治学”和“空间政治学”所取代了,在这种政治学中,文化的和生态的因素分别受到了重视。在某种按生态地理学原则来定义的社会劳动概念的大前提下,文化身份的特色这一理念似乎可以很容易地与生态学的地方特色概念相融合。本土居民为保护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生存方式的原生性所展开的斗争就是目前最富戏剧性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挽救地方文化和地方生态系统的斗争已成为同一场战斗的两个不同方面。 271

对于他们来讲(正如前文所述),大多数的传统左派和工会组织仍把其关注焦点集中于更高的生产率、增长率和国际竞争力,这也就是说,他们仍关注于工作和工资或更多的雇佣劳动——不是去消灭剥削而是要求少被剥削(如果他们为此曾做过些事的话)。这一部分左派人士不想再采取消极防守型的政策,——可以把这类政策等同于“经济禁欲主义”,或把它看成是在工党领袖以及其他一些人看来会危及劳动阶级在以往所创造的经济成果的那些政策。(很明显,工会和工人为工作场所内外的健康和条件所展开的斗争对于范围更广泛的生态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大多数对更迅速的增长和发展持反对态度的人都是主流环保主义者,他们来自于



城市中产阶级,衣食无忧,并且具有反对那些在生态上危险的政策和实践的时间和知识。因此,所有那些试图为劳动阶级在这一等式中寻求一席之地的努力,即任何把劳动(以及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结合在一起的尝试,从一开始看来就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然而,在世界上的各主要国家中还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左派绿色政治学。“发达”社会中的第一个勇敢的尝试是“新西兰联盟”,它成立于1991年,联合了绿色运动、毛利人自治运动、新工党以及其他一些小党派。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绿党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左派绿色团体。从总体上来看,西欧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左派绿色和绿色左派潮流。例如,荷兰的绿色左派党以及挪威的绿色社会主义党就有意识地试图通过议会道路来推动各种激进绿色政治趋势。法国的“激进绿色选择”与英国的“激进—绿色网”则是一些小团体,然而,它们还是带来了一些很有影响的理论和实践理念。可能还会有人提到加拿大新民主党的绿色核心小组会议,以及美国的那些要求减少和消除有毒物质并为环境正义而进行斗争的运动;这些运动后来受到了巴里·孔门勒尔著作的深刻影响,孔门勒尔呼吁减少资源消耗、“对技术进行社会控制”并以一种“对自然的深刻的科学理解”为基础来实施经济计划。在北部国家,也有许多坚定的左派绿色/绿色左派团体,而且工党、社会主义者以及(前)共产党也在绿色化,——即使很不情愿并对此充满疑虑。在南部国家,有数千个带绿色左派倾向的选举性或非选举性团体;乡村和城市运动(如巴西的无地乡村工人运动和墨西哥的左派萨帕塔反政府武装运动)都提出了一些生态的、社会经济的及政治的问题。在南部那些亚帝国主义的大国中(如巴西、墨西哥和印度),联合的和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最为尖锐的。在这些国家



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生态运动,这些运动吸引了许多人投身于那些与生态问题有关的传统劳动阶级运动以及某些新的“农民”运动中来。而且我们也不应忘记尼加拉瓜和古巴所进行的那些实验,它们分别通过这些实验把深刻的环境改革政策同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了。<sup>6</sup> 272

有很多理由可以坚信,不论带有怎样的尝试性质和实验性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生态学社会主义趋势都绝不会是昙花一现,它们使我们得以在讨论生态学和社会主义时把这两者看成似乎是相互间没有原则矛盾的(很明显这对于激进的城市生态运动来说尤其正确)。或者,换句话说,有充分理由可以坚信,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本身已经为一种生态学社会主义趋势创造了条件。这些理由可以归纳为两个一般性的命题。第一个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世界性的社会和生态危机有关。第二个则与基本生态问题的性质有关,这类问题从范围上来讲大多是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以及地方性的。

第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生产的社会和生态成本的大规模外化的基础上的。自20世纪中期世界经济增长减速以来,对社会主义和生态学这两者的关注要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迫。在西方经济处于缓慢增长的过去20年中,“通过危机来实现资本积累”已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后果不仅波及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社会正义的规范、少数民族的待遇等等,而且也影响了社区和环境的统一性。“(人化)自然的加速失衡”这一表述完整地概括了这一状况。从社会这方面来说,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南部国家,贫困和暴力日益泛滥;而从环境这方面来说,则是整片整片被有毒物质污染了的地区、干旱的肆虐、臭氧层的变薄、温室效应,还有对生物多样性、热

带雨林及野生动物的破坏和毁灭。社会经济的和生态的正义问题史无前例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事实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它们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市场需求的增长率处于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企业已无法像繁荣时期那样通过扩张自己的市场并销售更多的商品来维护或恢复其利润了。相反，不管是大资本还是小资本，都试图主要通过扩大出口和削减成本来把自己从这一深度危机中解救出来。为此，他们还提高了劳动剥削率，耗尽了资源，并破坏了地方社区的统一性。

这种“社会经济的重构”具有双重效应。成本一削减已导致许多资本——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更多地外化其社会与环境成本，或者说，更少考虑全球环境、污染、资源的损耗、工人的健康与安全以及产品安全（与此同时，提高工厂中能源和原材料的使用效率）等问题。于是，资本主义为了摆脱自己最近的经济危机所采取的组织方法，其结果就是现代生态危机的恶化和加深。

273 另外，财富和收入分配中新的更强烈的不平等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劳动剥削率的提高。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期间，美国国民收入同工资平均收入相比增长了三倍，后者已有 20 年的时间停滞不前了。更高剥削率的获得还取决于：滥用非法劳工、使工会组织、社会民主党以及要求普遍社会正义的那些斗争受挫，——尤其是在南部国家。世界上那些生态退化最严重的地区——如中美洲，也必然是贫困更严重，阶级斗争更尖锐的地方，这决非偶然。贫穷的女性化也是这种生态破坏趋势的一个关键因素。从世界范围来看，劳动阶级、受压迫少数民族、妇女、乡村和城市中的贫民是受害最深的群体，他们同时忍受了经济的和生态的双重盘剥。“经

济调整”和生态破坏的重负同时不合比例地落到了这些群体的头上。

备受危机折磨又依赖于危机的资本主义已把社会主义维度上的那些传统问题和生态学维度上的那些相对较新的问题(“新”是根据大众意识来说的),逼到政治议程的前台来了。资本主义已证明自己就是社会主义与生态学能达成某种婚姻关系的媒人,或者更谨慎地来讲,如果说这种婚姻关系的前景还遥不可及,那么至少可以说,某种婚约关系已开始了。

第二,大部分世界性的生态问题是不能在地方性的(生态/地理)层面上获得恰当阐述的。其中有一个原因与“地方特色”这个绿色概念有关,这个概念表示在任何一个既定地区或区域中都存在着广泛的环境多样性,因此一个生态上合理的生产单位必然是小规模;这也就是说,地方特色被(错误地)等同于“地方性”了。但是,前者并非仅仅指或主要指生产活动所涉及的运作规模,它也指(或相反是指)这一活动与其所必需条件之间的那种必然的关系,就其规模而言,这种关系也许是区域性的、国家性的、或者甚至是国际性的。例如,渔业再生产就要求:要使自己必要的生产条件(如一个清洁的海洋、不止一处的健康渔场等等)得到保证,捕鱼业就必须有能力处理因其捕鱼活动所带来的后果。要想使这里所指的这种活动的再生产能力不受危害,就不能忽视这些条件,也不能将成本外化。甚至(或尤其)在对这些地方生态系统的退化有了某些地方性的解决方法时,仍然需要用某种计划机制来把这种地方性统一进“普遍性”或“总体性”之中去。关于农业,理查德·列维斯写道:“大规模的生产本身看起来似乎是不利于保持地方对环境的生态敏感性的,而且对必要的多样性似乎也会有妨害。但这是一种错误观念。虽然生产单位的规模将会非常小,而且还会反映出各色各样、差别细微的

以及文化多元的生活方式的需要,但是,计划性的单位(如有害物控制)的规模必须足够大,这恰恰是为了能够把环境的多样性统一起来。<sup>7</sup>

大多数的生态问题以及那些既是生态问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在地方性的层面上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区域性的、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计划也是必需的。274 毕竟,生态学的核心就在于各种有特色的地方及问题间的相互依赖性,其核心还在于需要把各种地方性的对策定位于普遍性的、国家性的以及国际性的大前提下,这也就是说,要把地方性和中心论扬弃为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新形式。

在处理能源供应以及一般非再生资源的供应问题时,把国家和国际置于优先地位是必需的,这不仅仅是出于当代人的需要,更是出于未来后代的需要。虽然其他一些自然资源如水资源的可获得性主要是一个区域性问題,但是在这个星球上的许多地方,它仍是一个国家性的或国际性的问题。对于许多森林来说,问题同样如此。或者以土地衰竭问题为例,它似乎是地方性的或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旦那些粮食出口大国,如美国,遇到了土地数量和土地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那些粮食进口国同样会受到影响。进一步来讲,各种工业和农业污染都会越出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家的界限而起作用。海洋污染、酸雨、臭氧层消耗以及全球变暖就是些明显的例子。

地方主义还会带来这样一种危险,即人们会仅仅从地点的角度来为其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拒绝作辩护,——而没有同时考虑到工人及妇女的主体性、农民文化、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等因素。<sup>8</sup>

最后,还有平等或分配的问题。各地的天然资源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就必须有某些中央权威来把财富和收入从富裕地区重新分配到穷困地区。而且,“把一些资源输送给人

口中的某些特定部分,并且对这种资源流动实施严格控制,采取这种做法的一个正当理由就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以及在这些国家与北部国家之间——詹姆斯·奥康纳)常常存在高度的不平等”<sup>9</sup>。

如果我们把生态学这个概念加以扩充,将城市环境包含进来,那么城市交通和堵塞、高租金与住房以及毒品等等问题(似乎是些适宜于用地方性措施来解决的地方性问题)就会变成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关联于:金融投机、抵押市场的运作方式以及货币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状态;那些毒品生产国无法在国外市场上“合法地”获得原材料和粮食;而且对那些同人民的直接需要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区域性的、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计划。

如果我们更宽泛地扩充一下生态学这个概念,把人类健康和福利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包含在内,那么在劳动力的国内和国际流动日益增加、移民进出日益频繁以及对外贸易与投资极度膨胀的情形下,我们所谈论的就是些只能或主要通过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措施来加以解决的问题了。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到技术及其转移问题,并指出新技术与地方性的、区域性的以及全球性的生态学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主导技术及其转移或多或少都被垄断在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手中的局面下,我们就遇到另一个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问题了。

总而言之,我们有完全充分的理由相信,大多数生态问题的原因和后果,甚至它们的解决方法都是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即同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有关)。因此,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根本不是相互矛盾的,也许它们恰恰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

275

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对比之下,各种流行组织或运动则局限于社区、都市或村庄,仅凭他们本身是不可能同时有效地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生态维度上的破坏性特征的,对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的破坏性的辩证关系,他们就更是无能为力了。

如果我们假定生态学和社会主义是互为前提的,那么从逻辑上讲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们在这以前没能走到一起来呢?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还特别地被当作生态学的敌对面,并且,反过来也同样如此呢?如果换种方式来提这个问题,那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到底走错在什么地方?

标准的并且(在我看来是)正确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把自己定义为这样一种运动,它能够完成实现资本主义所作的那些许诺的历史任务。这指两类事情:第一,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关于平等、自由和博爱的形式主张中填充进实实在在的社会和政治内容。第二,社会主义将实现备受危机折磨的资本主义所无力完成的达到物质富足的许诺。第一类事情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与政治内涵,第二类则属于其经济方面的内涵。

几乎所有人很早就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两个方面都失败了。第一,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一种伦理的政治社会,——在其中国家从属于市民社会,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政党官僚国家——因此,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合法性就在于他们试图把社会正义要求同自由主义调和在一起。

第二,与第一点也有关系,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物质富足,取而代之的却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因此,后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试图把社会正义要求与自由主义调和在一起,而



且他们还试图把这两者与市场和市场激励机制调和在一起。

然而,盯着这些明显的失误会模糊我们对另外两个问题的认识:在过去的10年或20年中,这两个问题已成了政治讨论的中心话题。第一,社会主义的伦理和政治建设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借鉴的,它们将所有那些不带着某种彻底人类中心论色彩的伦理或政治实践都排除在外了,而且它们还轻视或忽视(人类与自然的)互惠性和“真理的灵活性”。第二,物质富足这个经济概念也来自于资本主义(当然,对其也作了某些修正),这个概念将所有那些不能提高生产力的物质实践活动都排除在外了,即使这是以对自然系统的漠视为代价的也在所不惜。斯大林关于绿色西伯利亚所制订的计划可能就是一个最可笑的例子,这个计划幸好从未得到实施。

这两个问题或两个方面的失败,一个同政治学和伦理学有关,另一个则同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有关。这些又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失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方法论的以及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上提出这两个问题是很必要的(参见第一章)。 276

历史唯物主义在两个重大方面是有缺陷的。马克思倾向于把他对社会劳动即劳动分工的讨论从文化和自然中抽象出来。在马克思或传统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是不可能找到将社会的文化和自然系统这两者都包含在内的某种内涵丰富的、成熟的社会劳动概念的。

第一个缺陷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忽视或轻视了这一事实,即这些生产力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的,它们包含着人们的协作模式,这些模式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之中的。

第二个缺陷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还轻视或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



特征。

恩格斯自己就曾把马克思主义称作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在此，“历史”是主词而“唯物主义”是修饰词。对于“人们彼此间的社会关系是在物质生活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这一表述，马克思主义者们是烂熟于心的；但是，他们对于另一个重要表述就知之甚少，即“人们与自然间的物质关系是在社会生活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劳动过程”是耳熟能详的，在这里人是主动因素；但是，他们对于作为农业、林业以及其他一些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的特征的“等待过程”或“培育过程”就不太熟悉了，在这里，人类则是某种更为被动的参与者，更一般地来讲，在此，自然与人类这两个方面在某种复杂的、交互性的维度上都能成为“主动的”。

人类物质活动的两面性，即某种社会关系和某种物质关系，是马克思常常深入思考的一个命题；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和再生产了一种特定的剥削方式和一种特别的阶级关系，而且也生产和再生产了社会的物质基础。但在他下决心要去说明物质生活也是社会生活的时候，马克思就倾向于轻视与此相对立的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了：社会生活也是物质生活。换种表述来说，在“物质生活决定意识”这个命题中，马克思强调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既然物质生产是社会性地组织起来的，那么，生产的社会关系就决定意识。然而，他对另一个同样真实的事实却只字不提：既然物质生活也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的一种交换活动，那么这些物质的或自然的关系就同样也决定着意识。虽然也有许多人曾或多或少地提出过这些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从来没有统一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一种修正性的版本。

也有人曾讨论过马克思为什么会抬高历史（虽然文化被

排除在外)而贬低自然。原因就在于,在他的那个时代,马克思所面临的问题是必须表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是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但是,马克思过于专注于去批判那些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竞争、世界市场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自然化进而实体化的人了,因此他没能给下述事实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自然”的人为形式的发展一点也没有削弱自然的自然性。<sup>277</sup>这就是他在把费尔巴哈消极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能动唯心主义颠倒为具有他自己品性的能动唯物主义时所付出的代价。正如凯特·索普所说的:“事实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决心要摆脱对它的生物学还原主义的指责,所以它有掉进还原主义的某种反伦理形式中去的倾向。这种还原主义在强调社会对于自然因素的决定作用的时候,实际上把生物性完全排斥在外了。”<sup>10</sup>于是,索普希望建立一种“社会生物学”。同样,我们所希望的则是一种“社会化学”、“社会水文地理学”等,即一种“社会生态学”,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生态学”。

绿色主义者正在迫使激进主义者去密切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活动,去关注生物掠夺这种普遍性的问题,——其中包括对劳动者的生物性掠夺,而且还要求他们去培养一种生态敏感性。而有些激进主义者则在努力教导绿色主义者要更为密切地去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竞争、世界市场等,他们要求绿色主义者对劳动剥削以及经济危机和社会劳动这些问题具有敏感性。而女权主义者则在教导绿色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去关注再生产和妇女劳动的理论视域。

从政治上来说,一种绿色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绿色意识会让我们“把地球摆在第一位”,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可以指你所想指的任何事情。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在大多数场合下,绿党在实践中大多就是指那种地方主义的政治学。与之相反,纯粹的激进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则优先考虑

“中央”问题。

扬弃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矛盾,首先不是指去定义一个把社会主义和生态学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包含在内但实际上又不等同于这两者的新范畴。从政治上来说,需要去克服的矛盾存于地方主义(或去中心主义)和中心论之间,即存在于自我决定与生产的全面计划、调节和控制之间。回到主题上来说,地方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而中心论则已经自我毁灭了。废除国家是行不通的;依靠那种“民主”在其中仅仅具有一种程序性的或形式的意义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同样行不通。在我看来,惟一可能行得通的政治形式,——即也许可以很好地协调好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的政治形式,应是这样一种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的。<sup>11</sup>

最后,惟一具有可行性的生态学形式是对两类生态学的扬弃,一类是有关沿海平原、高原以及地方水文循环等的“社会生物学”,另一类则是全球性的能源经济学、区域与国际“社会气候学”等。一般来说,这种生态学形式是对根据地方性、区域性与国际性来定义的自然系统的一种扬弃。换种略为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说,结论就是,我们需要“社会主义”至少是因为应该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的统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我们需要“生态学”至少是因为得使社会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止对地球的毁坏和解构。

278 注 释

1. 一般来说,生态学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在生态上合理而敏感的社

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在这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被非商品化了,而且交换价值是从属于使用价值的。“社会主义生态学”意指(也是大概来说)某种辩证的生态科学和社会政治实践,这种实践成功地扬弃了地方和中央、一时冲动和周密计划等因素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也就是摒弃了传统无政府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前提。

2. 这是绿色思想和政治学的一个原始含义,它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在其内部也有一些变化。例如在美国,马克思主义从历史上来说就对生态学持敌视态度,“左派绿党”是与无政府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3. 这一口号是由德国绿党的一个保守派创始人提出来的,并且由反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绿党成员 F·卡普拉和 C·斯普奈拉克将它在美国普及开来。不用说,它是绝不会被任何一种绿色主义的左翼变种所接受的。

4. “主流环保主义者”是用来指那些企图将资本主义从其生态上的自我毁灭趋势中拯救出来的人。许多把自己称作为“环保主义者”的个人都对全球资本主义保持着距离,而且对其充满敌意;他们也并非必然等同于“地方性的”(参见下文)。

5. 马丁·奥康纳(Martin 'Connor)写道:“关于‘环保’问题的许多论著的一个最明显的混乱,就是它们有求助于独裁主义解决办法的倾向,如以民族精英论为其基础。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1973年在《稳定—国家经济学》这部选集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令人不安的姿态就是一个例子。”

6. “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环境前景的那些社会运动整合了……这样一种环境概念,相比核心国家中的那些保守主义政治及意识形态运动的理解来说,他们所理解的环境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即使在把获取资源的民主权力,以及某种可持续性发展的生态平衡条件都考虑在内,这些环保运动的主张也并非服从于某种生态合理性的指导的。环保主义并不宣称要去重建人类在自然中的干预活动的‘自然’条件,相反,他们要把生态的和自然的条件整合进决定人类发展的社会条件的结构中去,整合进各个社区的结构中去,从而使那些由文化

所决定的愿望和需求得到满足”(恩里克·列夫(Enrique Leff),“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环保运动”,《生态学:政治/文化》,第2卷(1988年),第6期(11月),马格丽特·维兰诺瓦(Margaret Villanueva)译)。

7. 理查德·列维斯(Richard Levins),“古巴的生态农业斗争”,刊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1990年10月,第5期。

8. 例如:“那惟一有些解决问题的希望的政治观点必然是基于对场所的一种理解和深切关注,并且对它采取某种性命是从和顶礼膜拜的态度的。任何一种反抗工业化这个庞然大物及其危险性的商业游戏的斗争策略都必须从这里开始;这也正是所有重建和复兴规划所必须依据的基础”(科克帕屈克·萨尔(Kirkpatrick Sale),“哥伦布发现了什么”,刊于《国家》,1990年10月22日,第446页)。

9. 让·路登奎斯特(Jan Lundquist),“合适的粮食,合适的方法以及合适的人”,这是一篇已修改过的曾在一次讨论会上宣读过的论文,279 参见《饥饿研究与食品生产体制》,弗莱堡大学,1989年11月10—14日。

10. 引自肯·波斯特(Ken Post),“为唯物史观辩护”,参见《世界社会主义》,1989年第74—75期,第67页。

11. 我意识到这种“民主国家”的理念从原则上来说似乎是一种矛盾,或者它至少会立即引发一些十分困难的问题,如权力分散的必要性的问题,规模问题——关于实质性民主的任何一种前后边界的表述都必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另外,没有了一种普遍性的等价物去衡量成本和生产率(不管“成本”和“生产率”是如何定义的),关于国家和国际调控的社会劳动分工,如何去加以组织(比计划要弱很多)呢,这也是问题(约翰·伊利式的谦虚)。然而在另一方面,既然我们现在生活于官僚主义的民主之中,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某种民主的官僚机构呢?

## 第十六章

280

# 一种激进的绿色政治学 存在于美国吗？

站在世纪之交来展望美国的激进绿色政治运动,其短期前景是十分暗淡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断累积的经济与生态危机并没有为社会变革、社会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或社会革命提供新的契机,它们所导致的是全球资本和富裕国家的统治与剥削结构的重建。然而,仍有征兆表明,这种局面可能正在改变,或者各种类型的受压迫少数民族、绿党、女权主义者以及左派等可能是有能力来改变这种局面的。

激进绿色政治运动有两个前提。其一,对于当今世界经济的矛盾尤其是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地位的变化有一种清晰的理解,因而认识到了激进绿色政治学的可能的范围和局限。其次,对这些运动本身的构成成分及其潜力具有一种自我反思性的把握。

今天,在美国看来有五种主要的激进绿色潮

流。<sup>1</sup>前两种即社会生态学或生态无政府主义与各种生态学社会主义是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左派主义者。另外三种则是意识形态上的混合物。它们是文化多元主义与环境正义运动；深层生态学与生态地区主义；以及生态女权主义。后三种在实践中程度不等地与前两种有着某些相互重叠。而且，所有这五种倾向都被打上了其他一种或几种倾向的某些因素的烙印。为了使下面的讨论更简明一些，所有这五种潮流都是按其“理想模式”来描述的，并没有根据现实运动的真实实践来作这种描述。

281 我将首先对当今世界经济和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矛盾作一简要说明。然后，我将讨论默里·布克钦的社会生态学（或生态工联地方自治主义）和巴里·孔门勒尔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接着就是对环境正义运动、生态地区主义以及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些简短评论。我的结论是提请代表所有这五种理论和实践倾向的人放弃陈腐的政治规则，仔细考察所有这五种倾向的首要前提和基本假定，然后去重点强调每一种与其余四种所共有的那些东西，——从联盟—联合—建设的立场来看，这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根据许多尺度来衡量，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的社会和生态条件都已变得越来越糟。如果说我们这是杞人忧天并不十分准确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全球环境破坏的威胁还是相当真实的。尽管经济悲观论者有忽视飞速成长的众多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的倾向，但是在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制订者的头脑中，世界金融崩溃和经济解体，或者金融危机或金融萧条，却仍是驱散不掉的幽灵。

在经济上：当今世界同卡尔·马克思一个多世纪前在《资本论》中曾详尽描绘过的那种令人沮丧的模式（但不仅仅是那种模式）相比，甚至都没有什么区别。<sup>2</sup>政府与企业正把这个世界上的更多的平民收入囊中；更多的人沦为雇佣劳动



者；更多的雇佣工人处于失业、不充分就业或就业不充分（即有专职工作却得不到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的状态之中；需求满足型的商品形式以及消费主义更为普遍化；资本更为集中或集中化；工业资本以及金融和商业资本日益国际化；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以及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更高了；全球债务问题越发严重，而且还可能有爆发世界金融危机或金融萧条的危险；并且全球环境危机也日益恶化。

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与自我解体，大部分思想家都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就像那些误解或错误运用了这种理论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一样，已是日落西山了。由马克思最先提出，并经接下来的三代或四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精心修饰过的资本的积累和危机理论，成了那个连同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盆洗澡水被一起泼出去的小孩。就是在这个资本取得全球性胜利的时刻，关于资本的这个最伟大的理论被归类为一种固执己见的19世纪式的空想论。在有些场合下，《资本论》甚至被当作为一个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相类似的文本，它所表达的是20世纪两场最为浩大和恐怖的极权主义运动之一的邪恶创始人的愿望。这一讽刺或怪事现在十分流行，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要把黑格尔的最著名的一句名言专门拿出来。这个伟大的辩证法大师写道：“密纳发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才展开它的翅膀”，意思是说只有经过一定的历史过程或历史变化，理性才有可能理解发生了什么并且为什么会发生。这句格言如今好像得倒过来说：“这只老猫头鹰在黎明时分收起了它的翅膀”。理性就在那个它有能力瞥见未来的时刻投降了。

在恶性通货膨胀过程中，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滞胀现象达到了最高点。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资本贬值和大萧条，或者因全球性金融混乱而产生的其他大量的经济困境，

所有一切威胁在后冷战世界的头十年中尤其显得迫在眉睫。

原因就在于,由于美国经济是以扩大抵押、消费信贷和商业信用,政府借贷速度快于国内实际的生产或产出的增长率为基础的,它是一种消费驱动型的经济,所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好像是世界的一个现金出纳机。美国市场吸纳了来自国外尤其是来自日本和东北亚的剩余产品,——否则,这些产品是不可能按成本加平均利润的价格销售出去的。美国进口超过出口的差额是由其向外国借贷来支付的,这就使得这个国家得以维持一种超出其经济能力的富裕生活。

自1990年~1991年的经济衰退以来,美国已在尝试对其经济政策作一次大规模的调整。华盛顿已在试图调低消费支出,并且准备扩大出口使其成为经济复苏与扩张的主导力量。从上次经济不景气中的这轮复苏(如果过去几年经济的这种微弱增长可以称得上是“复苏”的话)首先就是由外国花费在美国产品和服务上的支出所推动的,其次才是国内消费和政府支出。也许,自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复苏以来,——那次复苏是由对欧洲的农产品销售刺激起来的,出口还不曾被赋予过如此重要的地位。

将美国经济的定位从消费主义和冷战军事支出中游离出来,并将其转向国外市场和资本出口,这些尝试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乔治·布什曾说需要将美国变成一个“出口超级大国”;为什么克林顿会把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看作为经济进一步复苏的一个必要条件;为什么克林顿(还有在他之前的布什)会对日本和亚洲施加压力要求其吸纳更多的美国出口;为什么这两位总统都害怕(并曾努力阻止)欧洲和亚洲区域贸易壁垒的滋长;还有,为什么克林顿的经济政策对出口驱动型的高技术产业具有优惠倾向。

但美国经济政策的这种“全球化”将造成的问题可能会

比它所解决的更多。原因就在于,几乎美国所有的主要竞争对手的经济早已都是出口驱动型的了。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一直希望通过出口的牵引来使其从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状态中复苏过来。虽然日本一直都在扩大国内公共建设工程的规模,但出口肯定仍将是该国经济复苏的推动因素,——如果或一旦这种复苏来临的话。东北亚的其他地方,还有东南亚和中国,通常(虽然并不总是)也偏爱出口市场。欧洲的有些国家,例如挪威的出口高达其国内产品总量的50%,而且那些亚帝国主义国家如南非和巴西对出口也同样具有依赖性。

矛盾在于,如果主要的工业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依赖于出口,那么必然就会引发全球经济的过度竞争,并且最终带来保护主义和贸易战,或者普遍的资本价值贬值,进而造成经济萧条。一方面,每个国家和跨国公司都仍迷恋于减少支出,削减成本(包括环境保护和清洁的成本),提高质量,并醉心于开发新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对于增加需求,却缺乏全球性的凯恩斯主义式的调节系统(早在20世纪70年代威利·布兰特与其他一些人就指出过这一点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七国集团”是个局部性的例外,这个组织促使日本加大对公共建设工程的投入,谴责德国降低利息率。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把世界经济向相反的方向拖。这些代理性的世界财政和公共建设工程管理机构的借贷战略,是鼓励政府更多地削减开支,支持私人企业更多地进行成本削减,而且排斥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这就使已经糟糕不堪的形势越发恶化,不仅在社会经济战线上而且在环保战线上都同样如此。 283

今天,在美国有两种左派生态理论和(弱小的)政治趋势,——“左派”指具有明确的反资本主义自我意识。第一种指像默里·布克钦所发展起来的那种社会生态学理论,它在

实践中由左派绿色网(但它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却偏离了默里·布克钦的思想)所代表,它的组织就如同美国绿党中的核心小组会议。第二种以美国左派生态学的另一创始人巴里·孔门勒尔的思想为基础。孔门勒尔最重要的影响可以在地方性的与区域性的反有毒物品联盟中找到,这些同盟同工作场所和社区中的有毒物品污染作斗争,而且,它们支持无污染技术的开发;不过,它的影响也延伸到了环境正义运动中。

布克钦的理论涉及生态学、无政府主义、社区、政治学等;孔门勒尔的理论则以生态学、社会主义、经济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等为主题。从最重要的方面来说,布克钦是一个生态政治理论家,孔门勒尔则是个政治经济生态学家。在前者的著作中,世界经济和社会劳动分工常常似乎是不存在的,而对于后者来说,似乎根本就不需要一种同绿色政治学相适应的关于自然的政治理论或哲学。

布克钦的目标是扬弃生态学和无政府主义;孔门勒尔的目标则是生态学和社会主义。<sup>3</sup> 孔门勒尔为了从源头上消除所有的污染,希望对生产力或资本主义工作场所建立起社会控制。他的论证优美而简明。他争论道,如果污染在最初就没有被制造出来,那么污染规章、污染许可证等等就都没有必要了。离开了“对生产的社会统辖”,缺少了以一种“对自然的深刻的科学理解”为基础的经济计划,一种在生态上可持续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实现这种“统辖”,孔门勒尔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传统目标。相反,布克钦为了建设一个以自治区为基本政治单位(同时建立某种自治区联邦)的生态型社会,希望把生态学和工联—社群主义(或工联—地方自治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原则是奠基于直接民主以及生态科学和生态敏感性之上的,——当然,这是以布克钦对这些术语的理解为基础的。

孔门勒尔希望建设一个按物质的或经济的观点来理解的可持续的社会。他的论据是,只有一种经济民主形式即“对工作场所的社会统辖”才能造就这种社会。布克钦也期望一种按物质的观点来理解的可持续性的社会,他还争论说,只有直接民主——政治民主的一种激进形式——才能使其产生。这两个人在思考过程中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都变成了激进民主主义者,但一个人谈的是经济的条件,另一个人谈的却是政治生活的条件。

孔门勒尔把经济学放在第一位,并为传统社会主义的物质富足目标作全面辩护,这就是他为什么强调在他看来在实践上具有无限潜力的太阳能对于现代工业经济的推动作用的原因,太阳能既不会带来污染也不用损耗矿物燃料。布克钦把政治学放在第一位,并为传统的自我管理的社区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目标进行辩护,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对技术以及生产力这些关键问题的论述同孔门勒尔相比缺少些连贯性的原因。 284

为什么孔门勒尔的追随者和布克钦的追随者从来没能在政治上走到一起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一个答案是,自从马克思与第一国际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斗争以来,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几乎一直把对方视为自己的眼中钉。在他们的斗争史上,其他重要事例还包括:托洛斯基于20世纪20年代使用“红军”打败了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克留,以及斯大林主义者于20世纪30年代背叛了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sup>4</sup>

这些插曲对为什么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仍然彼此充满敌意,而且,在最糟的时候还会展开血腥斗争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政治性的解答。但是在这些政治差异背后,它们之间还是有着一些理论上的差异的,在孔门勒尔和布克钦这个例子中,揭示和考察这些差异是十分重要的。

实际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构成了一系列的两难;对于孔门勒尔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和布克钦的生态无政府主义来说,这个判断同样适用。对于任何一个想建成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公正、平等并且民主化的生态社会的人来说,理解这些两难是什么以及它们对于激进绿色政治学具有什么意义是很重要的。

从历史上来看,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关注工作场所和劳动,然而对于第二个主题即土地和社区却谈论得很少,但是这个主题在20世纪已证明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左派思想中,土地和社区一直并且现在仍然主要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地盘。<sup>5</sup>(卡尔·波兰尼在他的《大转型》这本书中曾同时提到了土地和劳动这两个方面,但他是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提及此的。)关于土地和社区的激进思维一直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地盘,这几乎成了一种惯例,然而,对此有一个重要的例外,这就是那些生活在土著居民社区中的理论家,这些土著居民是生态帝国主义以及一种“对公有资源的全球性占有”的受害者。在这里,劳动是在土地上进行的,而且文化、劳动和自然构成了一种“有机”统一体。“精神性的”实践活动是以物质性的自然为基础的;劳动直接并且明显是社会性的,而且它是处于自然节奏的支配之下的,同时劳动也必定含有某种仪式性的因素。由此而产生的整体感也就解释了这样一个疑问:当这些土著居民的公有资源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攻击时,那些坚定地站在土著居民这一边的人对他们自己的工作为什么通常都抱有极高的热情?他们的斗争具有某种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在有些地方,如加利福尼亚州的雷奇蒙德的某个炼油厂中是看不到的,——在那里,社区是“外在的”;或者,在洛杉矶的某个地区也是看不到这种连贯性的,——在那里,工作场所也许远在高速公路两小时路程之外。在这两种地方,“自然”通常被看作为某个国家公园,甚至是指更遥远的地方。



从理论上来说,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主要对立到底是什么?在人的劳动力被商品化并且直接劳动者失去了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权以后,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就得以可能了;当土地被商品化和资本化了并且社区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以后,无政府主义就出现了。如果甘冒把复杂问题过分简单化的风险,可以这么说:社会主义偏好计划,无政府主义则强调自发性;社会主义弘扬平等这一价值观,无政府主义则强调自由(freedom);社会主义更追求“友爱”,无政府主义则更爱好“自由(liberty)”<sup>6</sup>;社会主义抬高“中央”,无政府主义则侧重“地方”。以社会民主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在自由民主国家的选举过程中,劳动阶级是他们的主要依靠力量;无政府主义则希望消除国家而实施直接民主制。(扬弃在这里也许就是指将国家或官僚机构民主化。)关于生态学社会主义与生态无政府主义之间的那种异常尖锐的冲突关系到底是指什么的问题,这些例子应该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为其提供一种很好的说明。

通过考察将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分开来的那些理论、价值观以及经验所能揭示出来的问题,远没有美国激进绿色政治学这个问题来得复杂。在过去一二十年中所发展起来的另外三个激进流派,大部分都是独立于布克钦的社会生态学理论或孔门勒尔关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论述的。它们是:文化多元主义与反对环境种族主义并寻求环境正义(在某些说法中,是环境的和社会的正义;在另一些说法中,则是环境的和经济的正义)的斗争;深层生态学与生态地区主义,——它们也是大多数激进绿色主义者所选择的世界观;还有就是生态女权主义,——有些女权主义者把它看成是所有流派中最具革命潜力的一种。根据政治身份来分类,环境正义运动和生态女权主义经常表现出“身份政治学”的形式,而



生态地区主义像某种“场所政治学”。然而,前两种趋势与这后三种又有着部分重叠。一方面,深层生态学/生态地区主义与工联—地方自治主义有某种亲和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从传统上来说一直都是反种族主义者和反性别歧视主义者,就这点而论,环境正义运动和生态女权主义则与生态学社会主义比较亲近。

反生态种族主义运动是范围更广的文化多元主义潮流的组成部分。它也是公民权利运动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支。追求环境正义的斗争是反种族主义思想的一个维度,这种斗争的范围从争取住房、就业和卫生保健等保障一直延伸到反对警察迫害。这个运动中许多的领导人和激进主义分子长期以来一直都积极投身于各种反种族主义的运动和斗争。(相比之下,生态地区主义则经常被看作为一个范围更大的深层生态运动的组成部分,——即使在其较为缺乏自我批判精神并采取环境决定论观点的时候也是如此。)不论给“文化”下什么样的定义,文化多元主义总是比较偏爱文化,而且它们组织起来的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从政治上确认“有色人种”的文化差异,然后它们还运用这些差异来同欧洲—美洲主流人种相抗衡。有色人种已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联合体和联盟来反抗许多文化多元主义者称作“盎格鲁(英国人)”的白种人(虽然在美国,德国后裔的数量要比英国后裔的数量多)。按一种“理想模式”的眼光来看,文化多元主义既反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学,同时也反对生态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政治学,它赞成某种文化民族主义或某种文化分离主义。如此一来,包含在文化多元主义之中的“小资产阶级”因素就有了浮到表面来的倾向(讲有这种“倾向”也是在理想模式的意义上说的)。当然,在环境正义运动中也有某些组织的领导人采用了某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且他们明确认识到了总体上的资

本主义以及具体来说的美国资本主义在改革方面的局限性。至于这个运动中其他人的政治观点就越来越强烈地向某种纯粹的文化多元主义方向倾斜了,其极端情况就是民族主义。社区政治学还成了大多数文化多元主义思维的显著特征,——虽然前者与社会生态学的共产主义政治学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在当前,“差异性”是主流自由主义政治学中的一个中心词汇,它是服务于那些有前途、有才能、有成就或有钱的人的。在大学、政府和企业中,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找到了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有薪职务以及政府中的中层职务(在克林顿政府中甚至可以谋到更高的职务)。他们被排斥于上层阶级之外;他们很少有人能爬上这种“显要地位”,除非,他们放弃他们自己的文化规范并使自己臣服于主导性的北方欧洲文化,——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还有权利法案等,它也带来了奴隶制、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但在社会天平的另一端,对于那些无家可归者、社会福利救济者、贫穷工人以及市中心的失业人员等等这些人来说,“差异性”并不起作用。在社会的穷人、低收入及有中等工资收入的这部分人之间一直都是存在着这种“差异性”的。

在争取“差异性”的过程中有一种十分重要的辩证法在起作用。那些被排除于“差异性运动”之外的人大多是劳动阶级(根据其地位来分,有下层和中下层阶级)。在少数民族中那些处境较好的成员即那些有野心也有才能的人爬升到上层的同时,这些劳动阶级却仍被抛在原地。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在有色人种的劳动阶层中出现一种阶级政治学。堪萨斯城的社团领导人会议向克林顿政府提出要50万个工作岗位,这种要求从任何意义上来讲都是一种激进的要求。当然,如果

某种阶级政治学确实发展起来了,那么再仅仅根据“有色人种”来定义环境正义运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假定这种运动的内部冲突已经解决了);它就得按下述方式重新来下定义了:白种人劳动阶级也可以包含在内,——不仅把这些人容纳为其成员,而且他们也可以作为领导人和代言人。

有征兆显示,上述这些问题就是这个运动中的有些人现在正在思考的事情。文化民族主义似乎正在衰弱,而环境正义运动的有些领导人和斗士对阶级政治学的公开表述却越来越多了,——尽管常常披着某种形式的伪装。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这是在尝试着“引入”阶级,同时又不放弃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深刻批判——这是这一运动的动力之一;而且与此同时,对运动内部的有色人种自己的种族主义式的态度和实践的某种批判也发展起来了。例如,在许多城市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之间,即那些已到这个国家  
287 很久的人与刚从墨西哥和中美洲来的新来者之间,就存在着对抗情绪;再比如,那些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在美国也存在着一种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此的讨论并不是很多而是非常少。阶级政治学很有可能会继续探讨仍然存在于美国少数民族中的这种抑此扬彼的文化态度和实践。

现在流传很广的第二种类型的政治同一性(identity)可以称作“场所政治学”。有许多种“场所政治学”,例如城市运动、新民粹主义以及南方的乡村政治学。生态无政府主义也是一种场所政治学,但它更多的是以政治学和幸福生活的某种模式而不是以任何特定地理环境为基础的。这里的“场所政治学”指的是这样一些绿色主义者的思想和实践:他们的未来观是建立在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地区主义的某种结合的基础上的;或者他们希望发展以特定区域的生态特征为基础的

某种物质生活与文化。<sup>7</sup> 彼特·柏格是生态地区主义最著名的倡导者,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在保持特定生物区域的整体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任何一种独特的文化或生活方式的名义下,在测绘西部地区的河流分布,计算大平原地区的原始物种数量以及保护原始森林。

在生态地区主义的话语和实践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类似于文化多元主义和环境正义运动)呢?通过这个过程或许可以形成对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某种批判,而且还会产生一种既非仅仅社会主义的,也非仅仅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通过某种方式把这两者中的某些因素同时都包含在内,但它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又都有着区别。从表面看来,答案似乎是“不存在”,因为生态地区主义理论“基本上”是中产阶级或富裕白人的话语领地,而这些人很少会谈到阶级和种族问题。讲“基本上”如此,是因为在美国西南部还有很多墨西哥裔美国人,而且几乎到处都还有些土著美洲人。这些人不论以什么尺度来衡量都是受压迫人民。他们依赖土地、水面和生态系统来维持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但这却受到了采矿公司、国家公园管理处、旅游业、(有时)还有自然保护委员会等的威胁,——自然保护委员会希望恢复“原始栖息地”,但这并没有给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劳动的人带来好处。在这里,文化与自然,还有社会劳动是通过复杂且重要的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某些运动,例如西南部地区的某些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运动,把生态地区主义和环境正义都结合在了一起。

在别的一些生态区域,例如在太平洋地区的西北部,积极劳动力量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在那里,激进的“地球第一!”论者努力把劳动和环保主义综合为一种左派政治学。在笔者自

己的后院,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利湾地区,塞里纳斯与帕加罗河流域及其冲积平原地区,原本是富裕的农业地区,但那里的水位线逐年下降而水体也日益盐碱化了。在此,生物区域性的政治学立即就会遇到这样一个事实:这里的人口不仅大部分是墨西哥人或有墨西哥的渊源,而且他们大多是无产阶级,即是些农场工人、罐头厂工人等等。因而,在此如要真正推进  
288 一种生物区域性的并对区域社会结构有敏感性的政治社区的发展,进而树立其统治地位,肯定就得主动把工人阶级问题放在议事日程的显著位置上。当然,其他一些区域会有不同的阶级构成、产业结构和社会历史。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区域是否具有发展出某种阶级政治学的潜力。<sup>8</sup>这种政治学并不抛弃生态性—生物区域性的维度,但这是根据一种能动的唯物主义,而不是那种纯粹环境决定论式的被动的唯物主义来定义的。<sup>9</sup>

激进的或左派的生态政治学的问题还要更复杂。到现在为止,妇女和女权主义尤其是生态女权主义的问题一点也没有谈到。如果有一件所有生态女权主义者都确信的事,那便是:那个促使男人开始认为他们可以统治自然——普罗米修斯计划——的历史过程,同样也是一个促使男人开始认为他们可以统治妇女的过程。这是何时、怎样、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发生的,或者是否故意使其发生的,则是生态女权主义加以争论的话题了。关于男人对自然和妇女这两者的统治——就“统治”这个词的某种确切意义而言——事实上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这个问题,同样也有争论。在此,有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即妇女是否“自然地”更为接近于自然,因而更有能力建成一个可持续性的社会;或者,把妇女与自然等同起来是否只是一种从劳动的性别分工中产生出来的惯例或习惯;或者,这是否是男人的一种阴谋,一方面把自然看成是被动的和

可利用的,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野性的并需要驯服的,然后再以同样矛盾的方式把女性和它相等同。或者,所有这三种情况都有。我们清楚地知道的事实是:妇女在和平运动中常常是主要的组织者,而且,在地方性的生态行动中她们常常都是起带头作用的斗士。从巴顿·鲁治市与新奥尔良之间的工人阶级小巷,到印度的村庄——那里有为水源、木柴、粮食和饲料而斗争的妇女,我们都可以发现她们的身影。

就像环境正义和生态地区主义运动一样,没有哪一种理论立场或哪一个著名人物是与生态女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立场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从根源上来说,布克钦和孔门勒尔来自于试图将现代主义的规划加以全面推广的老左派。环境正义运动更重要地是公民权利运动的产物,而生态地区主义则部分是生态科学本身的一种逻辑发展。但是,生态女权主义拒绝了所有总体化的理论和政治学,它在发展一种关于“差别性(difference)”的理论和政治学,其行程从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一直伸展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然而,在一个由资本和雇佣劳动构成的世界里,生态女权主义激进的、唯物主义的这一翼,很有可能或者说至少有可能,发展成这一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这只是因为当今世界妇女的物质条件要比男人差很多,而且,妇女不仅要“再生产劳动力”,雇佣劳动的负担也日益沉重地落到了她们的头上。<sup>10</sup>

上文所讨论的这五种趋势都是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真实的或潜在的批判,而且还包含了对这个世界什么地方错了、为什么错了、以及对此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这些问题的一种真实的或潜在的阶级分析。

问题在于,美国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美国保持了前资本主义的英国个人主义对美国文化所 289 造成的影响,二是因为劳动的工资形式和需求满足的商品形



式在美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与大部分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同亚帝国主义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和印度相比,还有与许多其他南部国家相比,美国现存的左派政治学传统都可以说是很微弱的。在美国,来访的激进绿色主义者会惊奇地发现,有如此众多的社会运动;实际上每一生活领域都遭受到了特定的运动或组织的深层审查和批判。然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实证主义、普遍缺乏对政治理论的尊重(和兴趣)、缺少统一的左派,还有各色各样自由主义的或者/和技术统治论的绿色组织,所有这一切都妨碍了一种激进的绿色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发展。另外,下述事实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大国,它有各种根深蒂固的区域性的文化、经济和生态样式。因而,有人这么说就毫不奇怪了:某种前后一致的激进绿色政治学的征兆最初并不是出现在美国,甚至也不是出现在德国(有争论说它是左派绿色思想和实践的故乡),而是出现在那些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链条的联系并不怎么紧密的国家,——例如新西兰联盟<sup>11</sup>、巴西工人党以及在意大利兴起的新的激进绿色女权主义<sup>12</sup>,在这些地方,民主原则是与这样一种愿望联系在一起的,即对那些在过去曾把政治引入死胡同中去的旧模式和陈腐的口号加以审查。

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生态地区主义者以及生态女权主义者应相互倾听,并去了解它们受到了怎样的关注,在如今,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没有一种趋势有能力可以单独同全球资本的总体化力量和那些准世界国家组织相对抗,所谓的准世界国家组织,其表现形式有各种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各种国际性的官僚机构。所有这些趋势都相互需要;某种局部



性的(尤其是宗派主义的)观点绝不可能会被普遍认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像关注工作场所、劳动和经济一样,对土地和社区、种族和人种以及性别和生态学这些问题给以同等的关注。这也就意味着要告别过去常常被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观点,然后转向一种文化的和生态的马克思主义。

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进行修订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已既不够历史也不够唯物了:不够历史,是因为马克思在商品和资本拜物教理论(后来发展成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之外,并没有一种社会和文化理论;不够唯物,是因为《资本论》并不包含一种自然和生态学理论。<sup>13</sup> 马克思的资本、阶级斗争以及革命理论对于文化或环境运动实际上没有任何有实际内容的评论。之所以如此,除了别的一些原因外,(相对来说)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这种类型的重大运动。马克思生活和工作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当时反对欧洲旧秩序的政治革命多少已经完成了,而经济革命还正在进行。《资本论》对于政治革命非常了解。政治革命是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290 它首先发生在英国,然后扩散到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马克思的这一名著对于经济革命即资本、雇佣劳动、技术、合股公司、世界市场等等的发展,当然也很了解。但是,直到马克思去世以后,欧洲和“新世界”的社会本身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才形成。这涉及到了两种基本变化:第一,劳动变得更像雇佣劳动了,并且需求满足型的商品形式也开始了对日常生活的统治,在20世纪末期,消费主义和这种“景观社会”达到了最高潮。第二,土地也日益商品化了,最后它变成了一种投资,“不动产”被看成与其他投资没有什么两样。与劳动在工作场所失去了它的自

治权一样,土地也变得不再是一种场所、一个家园或一个社区了,它更多地变成了一种商品,社会也变得更为个人主义化、私人化和物化了。而政治身份的形成则更多地依据于归属、文化身份和场所,而不是依据于经济的和社会的等级。在此期间,资本已日益将自然系统本身商品化了(例如对“可持续性发展”的讨论),这与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互为因果关系。就像如今的劳动经济学家所谈论的“人力资本”——这在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似乎人类只不过是资本的工具),环境经济学家也在发展关于“自然资本”的理论,而这在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自然形成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这些经济学家把这样一些问题理论化了:如何攫取和改变丰饶的自然,并使其变得可以用价值来衡量;似乎自然就只有一个用处,即有益于无休无止的资本积累。

这种状况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意义是很简单的:始终顽固地以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为基础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建立在社会的、文化的以及环境的历史的基础上的。一种独特的工业资本主义文化和自然还处在其胚胎阶段;正统马克思主义忽略了文化的和生态的因素,因为根本还没有特殊的资本主义文化和自然可以成为其理论对象。

如果根据对美国的激进绿色政治学的可能性的这种说明而得出结论说,所有的政治理念都是平等的,似乎政治学与法庭上所颁布的某项法令是一样的,那将是错误的。关于政治理论绝没有民主可言。激进绿色政治学并不像逛大型商业中心时可以随便买到的这个或那个理念,然后在有心情的时候再去使用它们。某些理念和理念的联合体要比其他的一些更为合适。这在两层含义上是正确的。第一,社会理论的一个任务是解释有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它们是何时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它们不再发生,它们又是在何时停止的。为什么美国

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对比较低？为什么可以说世界的金融危机和金融萧条正在积蓄力量？任何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于不平等、环境以及社会生活会产生那些影响？要回答这类问题，对于所有希望发现事情真相的人来说，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竞争、世界市场等等的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政府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生态地区主义以及生态女权主义全部依赖于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291

从第二层含义上来讲，对于一些规范性问题来说，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是天生平等的。这些问题有：社会应是什么样的？自然应是什么样的？我们希望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是什么样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劳动应是什么样的？人类应该如何组织他们的包括劳动分工在内的物质活动，应以什么为目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劳动——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会与自然本身的“运动规律”或有些人所说的“自然系统”共同或联合决定自然是什么样的。考虑到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对于自然以及社会的双重影响，所有想取代资本主义理性的真正尝试，都必须对当今的产业和社会劳动分工作深入的考察。<sup>14</sup>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和社会的等级（或者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个问题就必须被放到激进绿色政治议程的显要位置上来。<sup>15</sup>在此，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既避免了那种不可实现的纯粹乌托邦，也没有沦为一种空想式的思想，它完全有能力确定什么才可以被称为“内在（规律）”，即哪些社会的和生态的运动将肯定获得成长和发展，哪些则肯定会中途夭折。例如，正如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曾声称的那样（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其实并没有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理论），传统定义下的劳工运动有能力对资本进行改革，

但却没有改造社会的能力。相反,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和贫困化理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却有助于说明“贫穷的女性化”,而这正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基础;而且这种理论还表明,它能够改变我们在谈论政治学、社会变化、以及幸福生活等话题时所运用的那些术语。类似地,关于自然的资本化的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揭示出了绿色运动的唯物主义基础。

最后,什么样的社会和环境才是可取的,并且是值得为之而奋斗的,当要对这样的问题作出政治判断时,马克思主义也许并不比其他的方法、理论或规范性的理论姿态更为有力。在向一种明智而理性的,并超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努力的过程中,土地和社区也许同工作场所和劳动一样重要。<sup>16</sup>在界定一个公正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或者能是什么样的过程中,文化多元主义和女权主义也许同马克思主义一样重要,或者还更重要。当我们在考虑我们希望同自然如何相处、以及我们希望创造或改造什么样的自然、什么样的自然是我们希望恢复的、什么样的自然是我们想原样保留的等等这些十分困难的问题时,生态地区主义也许要比当今所有其他的理论和政治倾向都更为重要。在这一历史时刻,所有这些理论(与政治)潮流正在被,或者可以被,或者将如何被“扬弃”,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社会运动自身还没有进行过系统化的研究。<sup>17</sup>“接下来要做的事”并不是把本章所讨论过的这些现存的理论和政治倾向以某种武断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下面这种可以轻易达成的“扬弃”,如在既是激进主义者又是绿色主义者,既是绿色主义者又持激进立场,既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又是绿色爱好者,既是生态地区主义者又是女权主义者,既是女权主义者又持激进立场等等的这样一些人之间所达成的扬弃,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在此,只提一个困难

问题：许多女权主义者声称，激进主义者和绿色主义者这两方面都把生态学当作为一种客体而不是主体，因此带来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激进绿色运动将仍局限于科学的统治话语之中（或叫做“科学主义”，对科学的一种盲目崇拜）。因而，必须认识到，在美国如今有多种多样的激进绿色运动的趋势，所以在当前局面下，期望有一种单一的运动能够获得发展，这很可能是不现实的。但这并非必然就会使我们裹足不前，我们仍会鼓励人们为一种在社会层面和生态层面上都公正而健全的社会而展开工作，提倡人们去研究那些十分困难的问题，如我们实际上在政治的维度方面正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效果，我们所面临的障碍和限制到底具有什么性质，我们可以结成什么样的联盟等等。曾帮助建立了“新西兰联盟”的马特·麦克卡顿在他最近的一次访问中就说道，所有那些参与这一政治创举的左派劳工、绿党成员、毛利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已达成的共识仅仅在于放弃现成的答案。“我们没有任何答案，只有问题。”这种谨慎的态度以及挑战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假定的意愿，也许正是今天作为一个“进步论者”的规定性之所在。如果说，笔者是个医生，而我们的运动是那些不知道何故总是无法彻底康复的病人，那么，我上述所说的就是我能开出的药方。<sup>18</sup>

#### 注 释

1. 虽然和平运动也关注环保问题（如核军备），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并不是一种“激进绿色”运动。

2. “不仅仅是那种模式”是因为与资本和劳动间的“第一重矛盾”相平行，而且与其联系在一起还有“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资本与自然之间的那种致命的冲突。

3. “扬弃(sublate)”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aufheben(扬弃)”这个概念的通常翻译。“取代(supersession)”是另一种译法。德语这个词指否定性、肯定性和变化性在其中被结合起来或得到升华(sublimated)的任何过程。废止或消除、保存或持存以及超越或升华都是这种过程中的各种不同的因素(或者,在有些版本中也表述为同一过程的各种不同的方面)。起核心作用(马克思称作为“特定作用”)的“是这种取代行为,在其中批判(denial)和继承(preservation)——否定(denial)和肯定(affirmation)——被结合在一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61年),第161页)。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讲“扬弃(sublation)”的意思是把两个过程或方面结合在一起,使之变成一个第三者或一种新的过程,而这个第三者或新的过程包含了前两个过程,但并不是这两者。

4. 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曾(并且现在仍在)赞同对生产资料采取社会所有制或社会控制,而且在第一国际时期,这两方面都把自己叫作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分裂为两派,一派希望对生产资料加以联合控制,另一派即工联—社群主义者(地方自治主义者),他们赞同地方自治。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是政治性的;后者对于集权化的政党和选举团体来说是没有用途的。

293 俄国人纳挪得涅基(narodniki)也属于第一国际,南部国家中的许多环保主义者对他很有好感。孔门勒尔和布克钦都是一个长期传统的派生物,这一传统已经分裂了,但仍相互交叉,而且在某些问题(如批判资本主义)上,它们实质上还是相同的。

5. 在那些具有很庞大的农民阶级而雇佣工人相对较少的国家如大多数南部国家中,马克思主义者就很有必要对土地和社会展开理论说明(如荷西·卡洛斯·马利亚特盖(Jose' Carlos Mariategue)和毛泽东就是例子)。在惟一经历过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古巴,卡斯特罗就因偏好工厂而付出了社区的代价。在北部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与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就对“城市运动”和“空间的商品化”作了理论说明。那些试图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来理解社区和城市运动的理论家所面临的问题,在伊万·凯特劳森(Ira Katznelson)的《马克思主义与城



市》这本书中有精彩的分析(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

6. 就它们可以在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过去的许多辩论中被看到这个意义上来说,两难是理想型的”。然而,由于在美国,意识形态的分界线常常是十分模糊的,因而无政府主义者的“亲密团体”所指的并不是别的,就是指这种“友爱”,而社会主义者则是公民自由强有力的支持者。

7. 深层生态主义者并不总是生态地区主义者,而生态地区主义者可能也不是深层生态主义者。有些生态地区主义者(如科克帕屈克·萨尔(Kirkpatrick Sale))求助于布克钦的社会生态学。然而,在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地区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随意选择的亲合性”,这在关于这个主题的通俗著作中时常可以见到。

8. 关于意大利的例子,可参考保尔米塔流域复兴协会,“保尔米塔流域生态工程”,刊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第2卷(1991年),第3期(10月)。

9. “能动的唯物主义”是从人类物质活动出发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物质活动被价值规律和社会劳动分工、生产力维度上的协作的文化形式、以及同样是生产力维度上的“自然系统”,以非常复杂的方式而建构起来。“被动的唯物主义”最简单地说,是指那种把文化形式看成是受环境或自然条件决定的观点。

在恩格斯看来,被动的唯物主义的基础是牛顿的机械唯物主义,而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科学,——后者把“人”(人类生活)当作为问题的对象。生态地区主义者倾向于不把“人类生活”当作这样的问题对象(即他们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10. 玛丽·米勒,“生态—女权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本质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两难悖论”,刊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第3卷(1992年),第2期(6月)。

11. 维恩·琥伯(Mayne Hope)与乔丝·杰森(Joce Jesson),“新的争论领域:新西兰的激进—绿色政治学”,刊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第4卷(1993年),第2期(6月)。

12. 会议报告:“左派文化与绿色文化——对意大利环境革命的挑战”,刊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第4卷(1993年),第2期



(6月)。另可参见莱娜·萨米尔达(Lena Slachmuis),“在南非成为绿党意味着什么”,刊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第4卷(1993年),第1期(3月)。

13. 斯坦利·亚诺威茨(Stanley Aronowitz),“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政治与文化”(纽约:普来杰出版社,1981年)。《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文章,这些文章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填补这一空缺。

14. 在过去200年间的单位劳动时间产出的巨大增长可以归因于工业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分工、技术领域的相应的变革,以及被当作能源来使用的矿物燃料(根据爱默尔·奥特瓦特(Elmar Altvater)最近的研究,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的推动力量就是矿物燃料的使用)。

15.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投身于生态学本身的左派人士来说,自然也294 也必须被看作为它自身的产物,即把自然当作一个“自然系统”来对待。今天的自然中主要都是“第二自然”,那么,在那里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来回答——劳动应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例如,“生态系统的统一性”?“生物多样性”?

16.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应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享有同等地位。比如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就曾写道:“同无政府主义者的矛盾是一种两难悖论,几乎就是那个摩尼教法则……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以某些方式为其自身的超越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是不得不遵循的……”(保罗·托马斯,《卡尔·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者》,伦敦与波士顿:罗特雷杰与柯根·保罗出版社,1989年,第348页)。

17. 在减少有毒物品使用的运动与环境正义运动之间,以及在后者与生态地区主义者之间,已经有了一些尝试性的联合。

18. 用马特·麦克卡顿的话来说,做下面这些工作是十分至关重要的:“在当前这个时刻,20世纪晚期,应去探究让稍微有些不和谐的许多种声音共存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声音就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言,它们是共同的;然而,在别的许多方面,它们却难以相互协调。这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方面,是那些‘在变好之前有可能变得更糟的’的事

情的一个方面。”然而,对资本进行坚决批判的需要是十分迫切的,即便是在当今的这种力量配置局面下,也容不得对统一化的政治策略有丝毫的拖延,有了这种策略,也就有了同全球资本和不断强大的准全球化国家相抗衡的能力了。

公正地说,城市住宅委员会应该得到“平地多元文化领导者”的荣誉,它的确受之无愧。在这个事例中,“平地”这一政治概念的创始者是那些为城市住宅委员会工作的人,还有一些与这个委员会共同工作的人。他们包括许多的社区管理者、活动家以及一些研究者,我也是这众多成员中的一员。因此,我要在两个层面上感谢城市住宅委员会:首先,它使我得以参与到发展平地观念这个社会事业中来;其次,它还把我(与其他一些人)单独挑出来,专门对“我”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那么,什么是平地政治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平地政治学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我的工作中,我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式的思维(但不仅仅是这种思维),因此,我自然就是从阶级斗争观念出发的。正如你们大多数人知道的,从卡特政府的后两年起,“大商业”和“大金融”同各色政客勾结在一起,发起了一场

富人反对穷人,资本反对劳动以及郊区反对城市的阶级性的战争。商业、金融和郊区很容易地就取得了胜利。富人更富了而穷人更穷了;商业则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这部分是因为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工人的实际工资都是停滞不前的,部分是因为自大萧条以后工作的不安全感也不怎么强烈了;而郊区则从城市汲取了更多的经济盈余——“掠夺”这个词用在这里可能比较确切。

幸运的是,各种劳工运动、社区团体以及穷人正在开始反击;不幸的是,他们正在分别被击退,因为他们被分割为各种团体,如妇女、少数民族、环保主义及其他一些团体。

为什么劳工和社区反对结构严谨的阶级政治学,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按阶级线索从下到上地把他们的抗议斗争组织起来,这是有很多原因的。

其中一个原因与另外两种模式的反抗性的政治学在如今所占据的统治地位有关。一种有时被称作身份政治学,另一种我们则可以把它简称为场所政治学。这就是进步主义的政治学目前所采取的两种形式。

身份政治学的象征是彩虹般的七彩色。身份政治学是以 296 归属感和准归属感为基础的,是与人们的文化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或靠其建立起来的):人种、种族、身体残疾、性别定位以及年龄等等。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最糟的情况下,身份政治学导向文化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当前,它已导向了积极的行动,如等劳等酬、具有可比性的财产等等;在最好的情况下,身份政治学则意味着这样一种社会:这种社会不再对不同的团体作不公平的比较,它赞美差别,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团体相互尊重、彼此学习,而且因为他们的努力,他们还享受着一种更富裕的生活。

场所政治学的象征是绿色。场所政治学是以对土地、空

间和自然的控制为基础的。当你听到“拯救红木林”、“拯救我们的公园”、“拯救我们的家园”、“拯救水系”、“拯救绿色地带”以及“拯救海湾”这些口号时,你所处的就是场所政治学的语境。在最糟的情况下,场所政治学指的是被围起来的社区、“明智的利用”的运动以及洛杉矶市中心的社团。在最好的情况下,场所政治学则是指成功的社区发展、绿色城市、有机农业系统、自行车道等,甚至可能还有生态地区主义。

在我们旧金山湾地区,存在着这么一个地方,并且也只有在这个地方一种真正普遍的文化多元主义才是可能的。在那里居住有150多万的人口,那里有你所能想得到的所有的民族和种族,他们把这个地方叫做他们的家乡。这个地方就是该区域的平地区。这个平地区不仅是其居民的居住地,也是他们的工作场所和直接的休闲场所。而且,在有些时候,这个平地还是数十条小溪和河流以及数百眼泉水的排水区域或冲积平原,这些泉水有时会汇入一条大河,这条河并不融入金门河,而是融入瓦特森维尔附近的蒙特利湾;从生态上来讲,冲积平原(绿色主义者的环保视线常常对它视而不见)构成了山地生态系统与沼泽地和海湾本身的生态系统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在海湾污染的两个主要原因中,有一条就是因为平地被污染了(另一条与海运及其他航运的影响有关),我认为,这是非常明显的。

海湾地区的经济体系已把平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和商业区域,在那里聚集了大量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一方面,它是失业、贫困、低工资、以及犯罪等等的发生地。另一方面,它是拥挤、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石化工业排污以及有毒废弃物等等的容纳场地。海湾地区人们的健康和安全危险是与平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平地地区,原来的那种河岸生态系统已经越来越所剩无几了。对平地地区青年人的最近的一项

研究表明,他们惟一关注的最重要的环境问题,是他们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这得归咎于拥挤的交通、关闭的图书馆以及放学后上锁的校园等等。换句话说,某种“公共资源的封闭状态”正在使青年人受到伤害。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平地的生态完整性的状况其实也是如此;这里的平地曾经是卡斯汀龙人(奥龙人)的“公有地”,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里都是被圈起来了的,它被分割成高速公路的车道、工厂区以及过分拥挤的居民区,等等。

如果你住在山地或围绕海湾的周围那些城市里,你就有机会看到,这个平地好像只是一条交通走廊,并且它还是社会问题的藏污纳垢之所。然而,当下一次你再在高速公路上绕着海湾行驶的时候,请记住,你是在穿越一个原生水系和生态系统,而且海湾本身的生态统一性也依赖于这些生态系统的良好环境状态,依赖于来自内华达山脉的消融雪水。然后再考虑一下这一事实,即这些平地居民替你做了那些肮脏的工作,而他们还得生活在污染和拥挤之中,还得偿付由种族主义和鼠目寸光的经济学家所造成的那些社会经济代价。 297

作为一条交通走廊,这块平地其实是汽车与卡车文化的根基所在,这种文化很明显地在很多方面是反生态的,而且它暗地里还是种族主义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指,有色人种、穷人以及低薪工人即那些平地居民不合比例地承受了汽车所造成的环境后果。噪音和空气污染、事故与安全风险、交通拥挤、以及直接进入住宅区的高速公路等,仅仅是汽车的社会成本的某些方面。而且,由于房产的好坏与空气质量的污染程度成反比关系,与大容量的交通流量则成正比关系,因此汽车文化还有损于平地居民财产的价值。在另一方面,同样是由于种族主义和等级主义的原因,那些受汽车的消极影响伤害最深的那些人,又是最没有能力购买和供养一部好汽车的人。

好像这些穷苦的平地居民遭的罪还不够多似的,加利福尼亚州最近为了减少空气污染,它不是去控制工业污染源,而是去控制所谓的“初级污染源”,而这主要是针对穷人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汽车拥有者的。

如果说经济“决定”了平地居民必须面临一大堆类似的难题,那么,政治体制就决定了他们对这些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政治疆界又把平地分割成了若干小块。当商家们像盗墓贼一样在平地上狼奔豕突的时候,政客们却如井底之蛙坐井观天。政治上的割地而治与政治学的片面性已成了从政治上把平地居民组织为一个整体的障碍。即便把我所提及的那些事实考虑在内,这种局面仍然没有多大的改观。这些事实包括:反有毒物品联盟为根除他们社区的工业污染所作的努力;环境恢复团体对溪流所做的整治工作;各个社区为治理废弃工厂旧址所作的尝试,以及它们在都市农业、住房、学校重建以及适宜居住的街道等方面所展开的实验;还有各种社区团体、地方联合组织、环保团体以及平地上的其他一些人在各地所召开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对犯罪统计数据、交通流量、教育成效与就业机会等方面进行了筹划、决策和评估。然而,大多数团体完全是相互分离的。

在我看来,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平地的区域政治学,在这种政治学中身份政治学与场所政治学可以说是彼此重叠的。然而在目前,只有环境正义运动把文化多元主义理念与生态学和地方社区运动结合在了一起,除此之外,身份政治学和场所政治学对于那些身陷其中的人来说只是两条始终合不到一起来的车辙。

以往关于旧金山湾区域政治学所作的那些努力多多少少都可以说是不怎么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不论这种努力走的是海湾地区委员会的从上到下的统治阶级路线,还是拒绝



成为海湾地区委员会的附庸而走城市自治的从下到上的路线,这些努力都没有认识到平地是一种特定的和特殊的场所。这么说的理由是,一种以平地政治学为基础的区域主义将不仅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和生态学的,而且,如果要把身份政治学和场所政治学揉合为一个单一整体,它就还应发展成为某种阶级政治学,因为几乎所有平地选区的选民都是低收入与中低收入的劳动阶级。

换个说法,“七彩色”论者和“绿色”论者如果真想走向一种文化多元的生态社会,那么这两者就都必须开始认真对待平地问题。而认真对待平地问题就意味着采用某种阶级政治学的观点。

“绿色”论者如果能如其所愿地保护山地和拯救海湾,他们就必须为平地做一些事。“七彩色”论者如果能如其所愿地获得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那么,他们就必须更加注意在目前众多的平地文化之间发展一种劳动的联合和联盟。

于是,生态政治学就成了发展文化多元主义政治学一个途径,而文化多元主义政治学则成了发展生态政治学的一个途径。而前提就是它们两者又都以阶级政治学为前提。通过这种阶级政治学,平地居民即劳动者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民主化社区以及在环境和工作场所方面的管理和实践模式。毕竟,在这些劳动场所和社区中工作和生活的平地居民,对于他们自己的环境和社会生活条件比所有的官僚决策者都具有更多的实践性知识。现在需要做的是挖掘出这种知识,并为“可持续性第一!”的策略在政治上做好组织和动员工作。

这也就是说,在最终的意义上,山地人在海湾地区的统治地位以及那种妨碍真正的平地政治学出现的条块式政治结构,迟早要受到挑战。也许“最终”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是最

恰当的,因为平地政治学刚起步。而且,正由于这个原因,对于那些感谢的话我不可能也没有把它们看成为定论。如果我们的总统没有将其庸俗化了的话,那么,我会用“挑战”这个词;或者,如果大多数人不是将其看作为一个毫无希望的过时词汇的话,那么,我会用“斗争”这个词。关于某个社会生产过程,如果没有好的表述,那么最好就什么也不要说。

## 第十八章

299

# 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 走向一种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

苏联的解体以及由它的灭亡所带来的地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剧变,已经改变了全世界阶级斗争的性质。没有了苏联共产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共产党就失去了它们曾经拥有的那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以及这种领导权的合法性。虽然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基本对立仍然存在,但劳动阶级和少数民族就其悲惨处境所进行的传统的抗议方式却发生了必然的变化。一种模式与一个根据地,这可能就是前苏联给其他国家的劳动阶级所提供的两样东西。离开了这两样,那些同资本作斗争、追求经济的和社会的正义的人就必须采取新的组织和斗争形式了。

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权力的地理政治中心的这种大幅度转移是与资本平稳的全球化运动同步进行的,同时发生的还有世界经

济增长率的一个长周期的衰减过程。“真正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国际声望，“自由市场”开始成为世界的东方、西方与南部的经济学家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教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上述两种趋势得到了强化。

在资本展开全球性的重建工作并对跨国公司和银行的权力加以集中的时候，努力降低劳动、能源和原材料的成本，缩短资本周转时间，就成了它的一些很合乎逻辑的举措了。尤其重要的是，缓慢的经济增长率还引导资本管理者去加强对劳动的剥削。在过去的十年间，全世界的失业率提高了，而且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也大大加剧了。数以千万计的人被放逐于工作场所、村庄、家园甚至国家之外。

300 这种趋势的社会影响是毁灭性的。这必然会带来反抗运动的发展，但此时，却没有了传统的“红色”经验或方法。这些经验与方法的力量都根源于或取之于一个共产主义国际的存在，而这个国际又是以“超级大国”的苏联为基础的。

与此同时，那些控制大的联合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人，那些在投资、生产的对象和场所方面起决策作用的人，为了使处于下降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率和利润率得到提高，便越来越试图将其生产成本外化到环境中去。空气、土地和水源，以及由这些因素支撑的各种复杂的生活方式，受到了资本新近的全球化实践的冲击，于是，在阶级斗争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伴随着生态破坏与一种全球性环境危机的来临，地方社区和非政府组织(NGO)以绿色运动的形式浮出了水面，它们与劳动斗争并列(有时两者的意见还很一致)成为反抗资本的一股力量。

“红色主义者”采纳了越来越多的“绿色主义”的话语，而“绿色主义者”也已经更多地偏向了左派的一边。更多的工会组织、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开始讨论绿色问题，尤其是关于工作场所和社区的环境安全问题。更多的基层环保

团体开始谈论社会的与经济的正义问题。而且,在更多国家中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左派绿色政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德国绿党)。现在,不管是在北部国家还是在南部国家,一种激进绿色运动已初见端倪,它由各种组织、运动和意识形态所构成,其范围从最极端的宗派组织一直延伸到政治上最为开放和灵活的团体。<sup>1</sup>

问题在于:组织起一种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作出与全球性的资本相对称的反应,进而推动一种新的民主的、生态合理的、并且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公平的生活方式,这是否有可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且这种联系还会有助于深化对替代性的发展道路和未来观的认识,这是否有可能?资本将劳动者与环保主义者、城市工人与小农场主、男性与女性、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与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还有将北部国家与南部国家对立起来,通过这种方法,资本实现了分化与征服的策略,那么,战胜资本的这一策略是否有可能呢?

要想对这些问题给出肯定性的答案,绿色主义者(还有激进主义者)不仅要“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而且也要“地方性地思考,全球性地行动”,然后最终,“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

美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和平运动、反核运动甚至团结运动受到“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这个口号的鼓舞已经有些年头了。对于绿色主义者来说,“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意味着(还有别的意思)“思考你的所作所为对于全球环境的影响”。实际上,每一个地方都可以通过组织、实施回收再利用计划在全球资源损耗的减少上作出一些微小的贡献;可以通过强制对城市垃圾作第三次处理来减轻海洋污染并节省淡水的使用;而且可以通过资助太阳能取暖以及抑制

小汽车的使用来保护能源。在此，仅仅举这三个例子。在世界各地，生态地区主义者都在竭力争取在经济上程度更高的自给自足，要求更少地对水循环系统构成破坏；地方性的反核团体与反有毒物品运动则为资源损耗问题而展开斗争；绿色城市及乡村运动则寻求公共交通系统、密集性的住房、使用地方生物资源来满足粮食和能源需求，并提出要把水资源重新分配给小农场主。这些事例表明，绿色思想的涉及面是很广泛的，而且也有更多的地方性绿色运动已经立足于区域性的、国家性的以及国际性的视域之中。

绿色主义者的基本问题是，在把“地方性”转化为“全球性”这个问题上，他们所提供的方法如果有的话那也是非常少的。绿色运动根本没法思考地方性是以何种方式由全球性所建构起来的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问题（例如，关于“地点—特殊性”的含义，绿色主义者是根据生态系统和自然空间来下定义的，而没有从“地方性”的物质和社会存在的再生产规模的角度来下这个定义）。绿色主义者常常低估经济与政治力量集中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也就忽视了“地方环境”已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和政治的重构与变迁的牺牲品这一事实。

地方性行动的良好愿望与其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之间的鸿沟有加深的趋势。北部国家的反有毒物品斗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没有预期到的一个后果就是增加了有毒物品向南部国家及北部国家内部的殖民地地区的出口（但是，他们或许也会激励其他地方的人们，然后把自己同他们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一种全球性的维度）。地方性的回收再利用计划是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例子。报纸的回收再利用削弱了木质纸浆的市场，因此，这也许就会带来这样一个意料不到的后果，即会刺激造纸厂和纸浆厂为了削减成本而在实践中造成对森林的生态破坏，或者推迟那些有助于减少有毒物质向河

流的排放量的技术改造。回收再利用计划还是成了有关废弃物及回收再利用的资本主义话语的俘虏,在这种话语中,相对于社会的和生态的层面来说,它优先考虑经济因素(例如在美国价值含量高的铝制易拉罐就是最先被回收再利用的)。全球性地行动必须理解绿色实践的这些意料不到的后果,这就意味着必须研究生态问题与绿色实践在最初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产生的,——这也就是说,把它们理解为国家的以及国际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某种后果。

“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可以使绿色主义者对其自身以及他们自己的生活感觉良好(这既是一个伦理性的口号也是一个实践性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却可能导致自我欺骗,即用全球性地思考来代替全球性的策略。这么说的基本原因是什么?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激进主义者(红色)重视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而忽视社会与自然间的关系;绿色主义者则偏爱后者而使前者受损。可以说,“绿色”常常被简单地读作为“红色”的历史对立面。

如果把“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颠倒过来,那么,绿色主义者可能就更愿意向一种全球政治学的方向去发展他们关于环境的破坏和重建的讨论了。很多地方性都是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劳动分工的碎片,这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是如何构成地方性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这样,绿色主义者就可以不用在全球与地方之间持一种二元论的立场了,相反,他们就可以去试着把握地方性的这样一种存在方式了:地方性不仅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它也是同国际经济的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sup>2</sup>

“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这个口号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文化和环境这两个方面来看,特定的地方性在对自己下定义,或者获得某种自我定义的时候,都必须考 302



虑到它们也是由世界资本主义所构成的。热带雨林地区的生活以及绿色主义者给这些雨林所赋予的价值，都不仅取决于南部和北部国家的林业生产状况，而且也取决于世界木材和木制品的供应与需求的总体状况。进而，它们也取决于利润、利息率以及债务之间的一系列十分复杂的内在关系；取决于全球建筑业；取决于劳工斗争；取决于在北部国家发生的各种旨在拯救热带雨林和原始森林的环保行动；也取决于森林工业的技术变革。<sup>3</sup> 现在再回到报纸回收再利用这个例子上来，它的后果也取决于减少废弃物的一个整体化的过程，涉及到其他社区回收再利用的状况，还依赖于价格结构——在其中，再生纸张的成本价格与纸浆造纸厂的产品成本价格也许相同也许不相同（现在，更多“回收再利用报纸”的目的地是垃圾填埋场而不是造纸厂）。太阳能在一个特定地点的潜力也取决于地方气候，同样也取决于这个社区的阶级和种族构成，取决于矿物燃料的利用率，取决于在石油生产和石油消费国中所展开的国际帝国主义竞争的状态，取决于大企业对于太阳能的垄断程度，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即使太阳能行动主义者们也没能清晰认识到的结构和过程。<sup>4</sup>

考虑到资本、社会以及生态破坏的这种不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状况，再加上在北部国家与南部国家之间还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性，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性地行动”还有另一个意思。北部国家的资本对南部国家所采取的一直都是全球性的行动，正如南部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很早以前就已认识到的，它们的目的是榨取廉价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今天，南部国家的各种绿色运动认识到了这种不断增长的经济边缘化和社会隔离状态的危险，而且他们也越来越多地采取了针对北部国家的全球性行动。当北部国家中某些善意的非政府组织(NGO)向他们提出，应重视可持续性的社区农业模

式,复兴本土技术,偿还对自然的欠债等等这类建议时,他们更是感到上述认识是十分正确的。这些建议如果说不是故意的,那么事实上,它仍然是在为一种更好的环境而“共同奋斗”的名义下,把在北部国家与南部国家之间现存的劳动分工模式以及悲惨生活状况的分布模式加以合法化了。

例如,1991年夏天,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论坛会议上,有些北部国家的非政府组织(NGO)提出“小就是美”的观点,但有些第三世界大国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真的想帮助它们建立起安全的和可持续性工业项目,就应该进行平等的技术转让。在这种局面下,(公认的看法是)北部国家与南部国家的非政府组织(NGO)之间的隔阂被拉大了,甚至赶上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政府间的隔阂。

“全球性地行动”暗示着对于战略性思维与行动的一种清醒意识,这些思维与行动不仅反对某一特定企业或工业部门的某些具有生态和社会危害性的实践,而且也反对那种全球性的机构体制,这些机构体制的决定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人的生活。最重要的批判对象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那些新的地区性联盟(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以及日本在亚洲的非正式的金融和产业霸权)。它们关于第三世界债务、“经济调整”、基础设施投资、世界与区域贸易规则等方面的政策已造成了生态危害和人类灾难。<sup>5</sup>

“全球性地行动”的意思是要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一些不民主的国际经济团体对其政策和项目负责,并要求它们今后的政策取向应与世界人民的需要和全球脆弱的生态环境相适应,而不是相反地去适应中央银行、财政部门 and 私人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

对于德国在两年前曾组织起来的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的那种强有力的示威和抗议浪潮的复兴，绿色主义者或许可以助一臂之力。他们或许可以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一种选举性的团体，并将其作为使货币供应民主化的一个步骤，而且这对世界各大银行和各种财政部门对人和自然可能会造成的损害会起到一种限制作用。这种以世界资本主义的支柱为对象的政治斗争观念需要一种新型的环境运动的实践的配合。这会是一种激进的绿色运动。这种运动同北部国家的妇女、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和需要是相协调的，但在北部国家，这种协调性则尤其明显。

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艰巨任务。但什么叫可选择性呢？如果绿色政治学没有某种全球性的策略，那么地方性的斗争和生态选择仍将会“成功”，但与此同时，这将导致更多的人不曾意料到的消极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做法也无法触及全球资本的权力核心。一种全球性的策略不应去贬低地方性的运动和行动，相反它应对其作出政治估价。现在，生态的和人类的危机日益严峻，而且利润和权力也更加集中化和非民主化，在这种世界形势下，全球性的策略应该有自己的政治判断。

实际上，一种国际性的运动是存在的。在很多国家中，已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投身进各种社会的和生态的斗争中去了。他们面临的问题有：土地使用、交通、水源供应、空气污染、土壤退化、拥挤、卫生和贫穷等，另外还有这些问题在特定的地方性的性别和民族/种族维度上的内容——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之间的地方性联系，他们是认识到的。有成千上万的活动家把握到了全球资本和这些统治性的国际机构在引发人类和自然浩劫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另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学者已开始研究特定地方性是如何由全球资本和国际政治所建构起来的。

然而,大多数的地方性团体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类似团体几乎毫无了解。尽管这种状况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上已部分得到了扭转,但结果仍然是:不要说去抓住那些结成战略性和战术性的联盟的机会了,他们甚至都不可能去设想是不是存在着这样的机会。对于大多数的活动家来说,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机构的破坏作用,他们是了然于心的,但他们彼此之间仍然互不往来。大多数的激进学者也认识到了特定的“地方性”是“全球性”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却不会去读其他人的著作。

要在全世界的各种地方性团体、活动家以及激进绿色知识分子之间发展起某些联合,并对这些联合加以强化,需要的是一种国际性的运动,一个“第五国际”。这个新的国际对于生态学 and 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将有着深刻的理解;它的“路线”将是在“肯定差异”的同时也肯定共同性;它的目标将是发展一种国际性的视角,并努力相互协调制定出一种全球性的战略。 304

在墨西哥和美国,那些为了同新自由主义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作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劳工、妇女以及环保主义组织也许是未来的希望所在。米歇尔·德雷宁写道:“像‘地球之友’、‘卡车司机联合会’以及‘清洁水源行动’这样的团体,它们横跨于(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两类美国团体之间,而且,它们还采取积极行动,努力地去同它们的那些更为激进的同伴——如‘绿色和平主义’和‘美国电气工人联合会’(UE)<sup>①</sup>——去结

<sup>①</sup> “UE”是“United Electrical, 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 of America”的缩写,它代表了约35000名工人。其成员的从业行业十分广泛,有制造业工人,也有公共部门和私人非盈利性部门的职员等。它是个独立的工人联合组织,并不附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译注。

成一种国际性的联系。这样，这些结构性的‘桥梁’就使一种广泛的、进步的联盟的雏形之形成得以可能了。这种联盟对于我们超越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可能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这些‘桥梁’还为实现这个目的展现了一幅未来图景。这些构架工作的基本的规范性要求是：推进国际贸易关系的民主化并使市场和资本积累从属于社会的需要。”<sup>6</sup>

如要建构一种全球性的运动，就需要进一步抛弃宗派主义政治学与“正确一路线主义”，同时还得汲取近30年来在各种绿色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并且，它还依赖于对下述事实的确认：资本和国际经济机构的统治者们自己已认识到他们面临着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而且他们还知道他们的经济前景取决于对地球的生态基础的更新和再造；由此，我们正处在一个为可持续性发展（以对生产条件的强调和重建为内容）而斗争的长期过程之中。一种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的这些侧重点和重建工作，不仅努力寻找将对外贸易民主化的方法，而且（也是更重要的）还得使货币和投机资本的运动过程民主化。然后，还应发展一些批判性的和革命性的战略和战术。这些战略和战术应足以弥补世界上各种巨大的不平等现象并修复对全球生态所造成的可怕破坏。什么是要抛弃的？什么是要保留的？这些问题本身便是答案。

### 注 释

1. 参见“激进绿色政治学家”们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上所发表的论文：第2卷（1991年），第2期（6月）；第2卷（1991年），第3期（10月）；第3卷（1992年），第1期（3月）；第3卷（1992年），第2期（6月）；第3卷（1992年），第4期（12月）。

2. 例如,金融资本以及企业管理部门在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东京的集中化,是与生产资本或工业资本的分散化,以及新鲜水果与蔬菜的生产的国际化相伴相生的。在这里和其他一些“世界都市”的上流市场中都可以找到这些水果和蔬菜。另一个例子:当费德尔·卡斯特罗几年前把哈瓦那描绘成“古巴瘦弱的身躯上肿胀的大脑袋”的时候,他也许就是在说明全世界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那种构成性的相互关系。

3. 例如,可参见约翰·布莱梅·弗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不考虑阶级的环保主义的局限性:从太平洋西北部地区的原始森林的斗争中得到的经验教训”,《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第3卷(1992年),第1期(3月);哈柏·汤普森(Herb Thompson),“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森林伐木业”,《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第3卷(1992年),第3期(9月)。

4. 参见罗伯特·马洛特(Robert Marotto),“太阳能背后的潜台词:太阳能资本中的社区与保护”,《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1990年,第5期(10月)。

5. 参见盖尔·奥瓦德特(Gail Omvedt),“丰富的水源还是官僚主义的无用之物?纳尔默达河工程”,《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第3卷(1992年),第4期(12月)。

6. 米歇尔·德雷宁(Michael Dreiling),“环保主义、新加尔巴迪亚主义(Neocardenismo)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墨西哥和美国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正面意见与反面意见”,《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第8卷(1997年),第4期(12月),第16页。作者重新估价了下述两个方面之间的冲突,即以绿色和平主义、地球之友以及山岳社(Sierra Club)为一方,以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十大组织”中的“剩余”成员为另一方。另外,他还讨论了墨西哥的妇女组织、环保团体和工会组织的作用以及美国劳工团体的作用问题。

## 生态运动与国家

生态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新社会运动至少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即依据“权利”、“愿望”和“利益”来加以理论化。换种方式来讲,这也就是说,至少有三种现成的话语可以用来讨论社会运动,即合法的/自由民主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经济的话语形式。例如,许多工人主张他们对于工作场所中的危险物应该具有一种“知情权”。这种“权利”明显地就是一个法律—政治的问题。许多生态中心主义者和感情深切的生态学家有一种将社会秩序革命化的愿望,目的是以革命性的方式重新与自然达成统一。这种愿望明显地就是一个文化问题(也包含其他问题)。许多环保主义者把更为宜人的环境视为其生活标准在消费维度上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这些例子可能是无限多样而复杂的,然而应该说,它们足以表明,不论人们对权利和合法性、愿望和文化作何种考虑,对利益和政治经济



学问题进行思考都将既是有效的又是必要的。这么讲绝没有把一个复杂的世界简化为政治经济学术语的企图和用意。马克思就曾受到了这种指责——这往往是很不公正的。相反，我的意图是想说明，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以给生态的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运动带来什么样的洞察力，而目的是帮助他们在批判性方面获得提高和发展。当然，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还只是在作一种鉴别。作这种鉴别在这个充满陷阱的所谓新社会运动的理论领域中是很必要的。但是，它不仅仅是一种鉴别，它还是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辩护。

我的理论对象就一般层面而言是指那些新社会运动，就特殊层面而言则是指生态运动。我准备根据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来作这种理论分析。最后，我的意图是希望就“利益”而非“权利”或“愿望”问题，形成某种政治观点。

我的核心范畴是“生产条件”。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有三种条件：外在的或自然的、一般的或公共的、以及个体的条件。今天，我们则会提到环境、市政基础设施与空间以及社区、还有劳动力。波兰尼在《大转型》这本书中把生产条件简单称为“土地与劳动”。

可以这样来给生产条件下定义：它并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自然、城市空间与基础设施、社区以及劳动力无疑是符合这个定义的。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是通过工厂生产出来然后再被抛到世界市场上去的。自然是由地质状况和进化、或上帝、或人类，或者是由这三个方面共同创造出来的；劳动力是由以家庭、部落或者国家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人所生产出来的；城市空间是由资本主义的投资模式与国家政策有意和无意地生产出来的。然而，所有这三种条件却被看成似乎是商品似的，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们称为“虚拟的

商品”。并且,所有这三种生产条件都有一个虚拟的价格:地租是自然和城市空间的价格,而工资则是劳动力的价格。

市场并不能决定资本可以获得的生产条件的数量和质量,它也不能决定资本在什么时间和地点可以获得这些生产条件。但是,资本却习惯于市场决定。如果某个商家想得到一种商品,它常常是向其他商家下一个定单来订购它想得到的东西。于是,这种商品就按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状况,根据需求的数量和质量被供应出来了,而且还是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市场运作有效的話)。但是商家却不能给上帝下定单订购更多的自然,或者给全纽约市的所有家庭下定单订购更多的劳动力,或者向洛杉矶市政府订购一个不同种类的生态地理空间。

如果市场不能调控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分布,那么由谁来调节呢?有一个中介机构可以调控资本对自然、城市空间和土地、以及劳动的获取。这个中介机构就是国家。就其国内政策而言,国家的职能不多不少正是调控资本对生产条件的获取,而且它还经常参与到这三种生产条件的生产过程中去。例如,它可以采取湿地政策、城市分区政策以及儿童保健政策的形式来实施这种参与。

近几十年来,已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机构,而且大多数国家机构的职责也被拓宽了。因为,在一方面,生产条件的供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了,另一方面,资本却变得越来越有序化和理性化了。就生态学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我们面对是一个不再怎么富足的自然,而另一方面资本对自然的一种有序化的和理性化的需求却变得更为强烈了。

这种状况与我曾作过的一个判断是吻合的。我曾指出,如果没有国家、生产条件的供应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的理论,那么,任何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理论都具有令人遗憾的

不完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仍然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因为,虽然马克思提出了生产条件的问题,但他却没有对它进行理论说明。而且,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或那种生产条件的问题已进行了一些理论分析,但是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却始终没有考虑另外的两种生产条件。只是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被建构出来以后,所有这三种生产条件才得以在同时被加以理论分析。与此同时,资本的运动、社会运动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得到了关注。

在社会运动理论中也存在着一个缺陷。很少有人注意到 308  
这三种类型的生产条件与三种一般社会运动形式之间的那种相当惊人的类似性。换言之,各种新社会运动似乎与生产条件有着某种客观的关联:生态学与环保主义关联于自然的条件;曼纽尔·卡斯特和其他许多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所讨论的那种城市运动关联于市政基础设施和空间;而像女权主义等运动,它们关心劳动力的定义、身体政治学、家庭中儿童抚养的劳动分工以及在“生产的个体性条件”方面的其他相类似的一些问题。

用波兰尼的术语来说,新社会运动可以被界定为同生产条件(如沿海和土著美洲人的矿产权利、城镇商业设施、妇女的生育能力与性别特征等)的商品化所展开的“社会”斗争。或者,它们也可以被定义为同已经商品化了的生产条件的独特的资本主义重构方式(如生物工程与可持续性农业的社会和政治定义;高层商业楼与低收入者的现有住房;以及仅仅被当作性欲对象的妇女与妇女在商业电影中所推演的角色)所展开的“社会”斗争。

在此,我必须马上补充这样一个观点,即所有这些运动,就总的方面而言,还具有强烈的文化和政治/法律维度上的内容,这些维度也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加以理论说明。比如文

化女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深层生态学以及对“新世界城市”的文化碎片的后现代肯定。人们可以说,文化女权主义同妇女的无产阶级化、妇女的新的经济独立性等等问题有关系,但却不把这种女权主义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也可以说深层生态学同生态科学的发展有关系,而这种发展与资本在环境中新获得的利益有关,但却不把深层生态学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还可以说这种以城市为基础的新的身份政治学同劳动的新的国际分工有关系,但却不把后现代主义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但是,我认为这些文化因素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除非我们能给政治经济学以一定的关注。

最后,我极力主张,如果你想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也就是说根据利益来对这些新的社会运动进行理论说明,并且如果你还想对这种维护和增进利益的斗争进行理论分析,那么,此处所讨论的这种政治经济学就是绝对必要的。

其基本理由很简单。当妇女为儿童抚养或反对警察滥用职权而斗争的时候;当环保主义者为开阔的空间或为保护土地而斗争的时候;当城市运动为抵制高速公路和追求宽敞的居住空间而斗争的时候,他们迟早都不得不同国家的某些中介机构打交道。为维护或重新定义作为生活条件的生产条件所进行的那种典型性的斗争,他们把这种运动直接带到了国家的面前。这时,国家就以警察局、区域性权威机构、森林委员会、城市管理者的办公室等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当斗争发展到这种时刻,那些投身于社会运动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同一件事,即国家反应迟钝、压制人而且还十分官僚主义;太依赖于专家;隐瞒关键的统计数据;撒谎;几乎做不好任何事情。我们都听到过同样的抱怨和同样的要求,而且我们中的许多人自己也都作出过这类抱怨和要求。

在新社会运动的这一阶段,人们或是深思熟虑地或是想当然地会从三种策略中选择一种。第一种是无政府主义的策略,它拒斥国家并去发展地方非权威主义。默里·布克钦的社会生态学就是一个例子。第二种策略是努力去改革自由民主国家。关于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是主流环保主义的努力。第三种策略是一种激进的策略,它要求将国家民主化。我将简要讨论一下这种策略。

我想指出的是,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政治目标,在各种“进步力量”之间达成持久的统一是没有可能性的。在一个政治和权力通常被定义为实现环保或其他非政治目标的方法或手段的国家里,这也许是一个奇怪的并且令人不安的想法。难道自由民主本身不正代表着18世纪和19世纪政治革命的基本目标的实现吗?难道说自由民主从某些重要的意义上来讲不正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吗?事实上,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民主就极力维护,他们把自由民主看成为近两个世纪或历时更长的民主斗争历程的顶峰。他们和其他一些人一起首先警觉到,在如今的美国,民主正在受到攻击。许多自由主义者承认:劳动阶级已通过上千种方法被分化和解构了,劳动阶级同最近历史中任何其他时刻相比,他们现在是更为弱小了;而商业阶层如今则是前所未见的强大;技术官僚的统治地位也更为牢固了;顺应建立一个“竞争性经济”和“出口超级大国”的利益要求,工具理性在公共政策领域中取得了统治地位;甚至国家和州政府中的进步论者也都照例将环保和其他一些法规束之高阁,当那些备受工会抨击的公司在城里安顿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另寻他途,并且还主动促进那些独立小企业的衰败,——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和扩大税源”;国会则是庸庸碌碌、繁文缛节、愚昧无知和贪污腐败的发源地;负责国家安全的政府也丧失了它曾具有的所有功能,但它

却照旧变得一年比一年更强大。在这个国家中还能找到一个机构可以说它“变得比以往更民主了”吗？最高法院不是，它越来越把“个体(individual)权利”解释为财产的权力而不是个人(individual)的权利；调解机构也不是，它们曾经是为其成员而存在的，而现在却是其成员为这些机构而存在；那些庞大的环保组织同样也不是。

因此，自由主义的要求就是对民主的复兴。有一种激进观点认为，民主如果不经过一个深化过程，这种复兴也许就是不可能的。这个深化过程要求在工会、工作场所、社区中，还有，最重要的是在国家本身的管理机构中，民主必须有一种“深入的”发展。

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在利益这个层面上，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在为实现某些物质目标（包括身体的物质统一性）作斗争，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们也间接提出了以下这个同样的要求，或者“隐秘地”具有这种同样的政治目标：**使国家变得更为反应灵敏和更为富有责任心**。这一要求通常并不是在把国家民主化的维度上来加以讨论，并且我还要强调这往往是一个内含的而不是直接显现出来的目标。要使它变得清晰起来，就需要将相对于经济和社会目的的政治手段与政治目标或目的区分开来。在美国，由于其政治文化的本性，这样做很困难。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必要这么做，——尤其是，为了培养社会运动的自觉意识，使其认识到它们的共同点就存在于这样一种要求之中，即必须扬弃地方性的直接民主、自由民主的政治形式、以及官僚体制，使之升华为一种新的尚未被认识到的第三种样态；这也就是说，将民主的内涵置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的民主形式（或程序）之中去。

这正是我所提倡的政治策略。核心是不要去废除管理劳动分工的国家。因为，如果国家被废除了，那么劳动的分工也



会被废除。勿宁说,关键在于使国家民主化,尤其要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力、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差别。这些差别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再生产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代议机构行使思想的职能(制定法律),官僚机构则完成实践的任务(执行法律)。这种政治策略的核心不在于去改革自由民主制并使其“更有效”。因为,这种意义上的改革,仅仅意味着使民主的程序在其自身规范的基础上变得更为有效,而这并不能有效打击自由主义国家中非民主的或自由放任的实质内容。关键在于要把这些斗争升华为一种追求民主国家的斗争。我们在各种生态运动和其他一些新社会运动中经常能看到这种新型斗争的影子,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这些斗争的参与者对于他们的潜在政治目标却没有自我意识。紧接着,我还得加上一句:这里所谓的“国家”也指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国际性的国家组织。例如,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了一个选举性团体,那么这将会有助于我们修正或停止它的那些非常危险的反动的货币政策。

要想对这个话题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就必须对“权利”进行一番讨论,并且还得采用后现代激进民主主义者使用“权利”这个范畴时的话语体系。而且,如果考虑到与利益和权利一起发展的还有各种新的文化样式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还得讨论“愿望”问题。但是,这就把我们带入另一个更为问题丛生的领域中去了。



## 新全球化经济以及 一种替代性方案

本章的目的是对这些新社会运动的某种纲领性意义进行理论说明,为此我将对当今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作一个简要的分析,同时,还要对资本主义体系在保护或维持它自己的生产条件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内在软弱能力进行扼要的评析(并将其与资本的那种已得到检验的自我扩张或资本积累能力进行对比)。这种分析将构成我的理论说明的基础。这样做的政治目的就在于,解除同自我扩张性的资本体系的一切关联(或者说同资本的那种无休无止的财富扩张实践断绝一切关联)。然后,我将确认这种体系的一种替代性方案。这一方案曾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得到过广泛的讨论和实践。为了更好地表述这种方案,我将其称之为“保护第一!”。如果说我的讨论方式是独特的和有趣的,那么这也许是源于它的这样两个特征:第一,在讨论“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时,我是以一种全球化经济理论为构架的;第二,这种替代性方案并不是从我年迈老朽的脑瓜里蹦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对一些客观事实的解读,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解读也反映了这些社会运动本身的要求。

首先,我将对本书的前言进行一次回顾。在那里,我指出,在西方、南方和东方(前苏维埃集团),三种政治经济模式的衰落构成了20世纪的主要特征。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东方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南方的民族主义发展、以及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已被证明(或正在被证明)都过于官僚主义和僵化保守,都过于民族主义化了,而且对“自由市场”(也被读作“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也都太轻视了。另外,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还有,它们都过于看重城市人口和劳动阶级的物质利益了。当然,它们这么做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各有不同。

(除了它们自身的内在矛盾外,)瓦解这些旧模式的最重要因素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提高。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一半或更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亚洲的这种极权主义模式、出口引导型的资本主义(极权主义是指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比较,出口引导型是指与南方和东方的旧式民族主义发展模式相比较),曾是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直到1990年,当日本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直到1996年,那些亚洲“小老虎”的出口和生产的速度才发生了一次猛烈的衰减),亚洲经济的增长率是西方的三倍或四倍,是主要的东方国家的六倍或七倍,而且亚洲的货物和劳务出口的增长速度要比国内市场的生产速度快二倍或三倍。

这种“亚洲奇迹”已经被人用好多种方法加以解释过了。首先是一种否定性的原因:亚洲模式得以在其中获得发展的

社会政治格局,基本上同西方自由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并且同南部国家半自给自足式的民族主义大体上也不相干(印度是个重要的例外),同时它也没有前苏维埃模式的那种非理性特征(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其次,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遇到了利润萎缩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于是,西方的剩余资本输入到亚洲,并把它们供给货币资本,投入到许多基础设施、工厂和设备、以及商业和金融服务业中去。正是这些支撑起了亚洲的繁荣(日本也是亚洲的一个主要资本输出源)。第三,大多数的亚洲国家不仅被输入大量的国外资本,而且它们还运用国内储蓄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在商家和政府之间,他们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借助于这些关系,他们共同确定一些新的有利可图的产业和出口市场;制定扩张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其他一些货物的进口计划;发展先进的工业园区系统;运用金融体系来支持和刺激出口;组织劳动力市场;以及采取其他一些办法,来促进经济的扩张。另外,许多亚洲国家有时还人为地维持较低的汇率,从而用廉价的产品来扩张出口。

亚洲的资本成功地维持了家庭(作为劳动力供应者、学校、社会惩戒机制以及社会安全体系)的存在,这也是“亚洲奇迹”得以出现的原因之一。家庭为资本提供了令人高兴的礼物,却不要求得到任何对等的回报(这与美国的家庭/国家关系正好相反)。亚洲还对各种各样的“团体主义”极为珍视。最重要的是“儒家”,但也包括作为经济增长之意识形态的(种族)民族主义,马来西亚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种类的团体主义(包括家庭本身),有助于各种形式的忠诚意识和协作精神的形成,有助于培养资本与劳动、生产与贸易公司、银行与其他商家,尤其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依赖意识。亚洲在文化和政治经济协作上所达到的水平要比社团主

义的欧洲高得多。如果同个人主义的英国和美国以及其他一些白种人定居的国家相比,那么,这种反差就更要强烈得多了(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如此)。亚洲的文化价值观与政治经济组织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如今,主导性的生产力——科学与技术、信息、组织与管理——从特征上来讲已经是空前社会化的了。在这样一个时代,这种“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就很有必要了。

其结果就是: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较低的利息率;生产率、生产、就业、以及工业制成品(尤其是消费品)出口的快速增长;资本的深化<sup>①</sup>和资本的广化<sup>②</sup>;以及,一方面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向,另一方面也有能力为亚洲的城市工人和乡村人口供应越来越多的大众消费品。(大多数)亚洲经济的这些特征,看来似乎同1995年之前的20年间的那些最重要的技术因素一样,对亚洲的经济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这个“亚洲奇迹”,再加上西方的和日本的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积累模式从范围上来讲已变得日益全球化了。对外贸易的扩张速度远远快于世界产量的增长速度,而直接对外投资(亚洲经济的助推器)的增长速度就更快了。资本被从西方(还有从日本,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从亚洲“小老虎”)输出到了东南亚和南亚的那些“市场经济刚起步的国家(EMCs)”,另外也有选择地输出到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并且(在1990年以后)还到了中欧。因此,从某些重要的层面来讲,这种“亚

① “capital deepening”, 资本深化,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指的是资本与劳动的比率的上升。与资本广化(capital widening)相对应。——译注。

② “capital widening”, 资本广化,指实际资本的增长率与劳动力(或人力)的增长率相等,从而总资本和总劳动的比率得以保持不变。它与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相对应。——译注。

洲奇迹”依赖于西方(以及日本,这归咎于日元对自身的估价太高以及日本的制造业在资源上过分依赖于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半停滞状态。亚洲资本的高积累率造成了西方市场更为惨烈的竞争,导致了欧洲失业率的上升以及社会经济的边缘化,另外也造成了美国工资水平的下降以及一种同样类型的边缘化。

积累的全球化模式曾是(并且现在也是)一个矛盾体。在那些“小老虎”国家,市场的深化与广化带来了提升工资水平的压力(因此也提高了生产成本)。在那些“市场经济刚起步的国家(EMCs)”,也有这种问题,但程度要轻一些。投资与生产的快速扩张,使环境退化、堵塞和污染了城市、威胁到土壤和水源的供给、捞光了海里的鱼类并砍光了山上的树木。美国自己也在努力变成一个“出口超级大国”(用乔治·布什的话来讲)。因此,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国内生产能力与有效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越来越严重;资本货物和消费货物的生产能力与利润/工资率之间的不平衡也越来越严重。这就分别造成了资本实现的危机和比例失调的危机。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性、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模式的退隐、再加上货币主义越发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工具,这一切都使这两种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另外,在国内和全世界,各种货币交易和投机交易活动也迅速泛滥。因此,同生产实际产品和提供服务的部门相比,那些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部门也获得了快速的增长,于是,这就对国内和国际金融的稳定性造成了新的威胁。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也包括美国在内)谋求对其经济的重新定向并使其指向出口市场,那么这种情况下,贸易战、保护主义以及损人利己的政策就会变得更有可能(例如,可以注意到,美国在1993年~1994年间就向日本输出了失业,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压低了美元对

日元的比价)。

关于新的世界经济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神话,即认为新的世界经济是(或可以是)一部永远增长的机器。而现实却是,这一模式的矛盾已导致了西方的缓慢增长,而且(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这种趋势还扩散到了亚洲。它在亚洲的表现形式就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长期的经济衰退,还有1996年那些“小老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这种半停滞状态也是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共同体驱之不散的阴影,而且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市场经济刚起步的国家(EMCs)”还受到了金融危机(例如在墨西哥)、城市和环境成本的上升、以及股票市场的剧烈震荡(例如在智利,还有别的一些国家)等问题的周期性的困扰。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府已更为关注增长缓慢这个问题了(另外还有失业上升或工资下降等问题)。在美国,工资停滞、经济不安全性增强、社会边缘化、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加剧等等,妨碍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因此,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许愿说,同克林顿总统的计划相比,他将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 capita GDP)翻一番的时间缩短一半。也许1996年间的一个事例可以最清楚地说明,美国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加速增长被赋予了何等的重要性。当时,克林顿总统的助理安全秘书弗雷德·施密斯认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问题在于,货币政策仍然是按照与通货膨胀作斗争这个尺度来设计和调整的(而不是为了提高增长率),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也在变得更为僵硬。欧洲(以及北美)政府试图取得某种混合性的成功,即一方面降低失业率(美国还要将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加以提高),另一方面减少预算赤字。因为这些赤字的存在,在失业问题上的那种凯恩斯式的解决方

法就没办法实施,而失业(以及美国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又妨碍了赤字问题的那些新自由主义式的解决办法的明确实施。但从政治上来说,这些政府很难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取舍:是增加支出去刺激有效需求并“提高”就业和工资水平呢,还是削减开支去控制赤字。于是,失业/停滞的工资和赤字似乎都在自我强化。

有这样一种解决政策僵硬和经济增长缓慢的建议,而且,这种建议在政治和经济阶层中越来越流行。这种建议可以称其为“社会的一供应层面的经济学”,因为也没有更好的叫法了。在美国,这是比尔·克林顿以及民主党领导下的参议院的经济思想的中心特征。这种想法把视线集中在增加减税额度和增加支出上,这些增加体现在下面三个主要项目上:教育和培训、环境,包括物质性的基础设施(分别指“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以及“社区资本”)在内的城市。这种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如果有一种更为健康的、受到更好培训的、更为灵活的以及更有纪律的劳动力量;一种在经济上更为理性的环境开发;以及一些得到根本改观的并且更有“效率”的城市和社区,那么,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提高生产率和利润,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增加税源,并且还会减少赤字,同时还能提高工资水平和增强就业安全感。

315 关于停滞的工资水平、日益增强的经济不安全感和边缘化倾向、高失业率(在欧洲)、环境与社区生活以及总体性的生产条件的破坏、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还有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抬头与政治格局的根本改变,有两种颇具普遍性的反应。某些具有改革思想的工会组织和各种中左派政党,一方面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另一方面要求开发一些对于社会有益的新工作岗位。第一个要求包括每天或每周的工作时间要更少,并且每年的工作天数也应更少,同时报酬还保持原



样；第二个要求则希望扩展物质性的和社会性的基础设施（包括相关的社会服务），从而相应地增加就业量。

关于减少工作时间，加拿大贸易联合主义者与经济学家希德·施耐德写道：“西方社会目前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并日渐攀升，（是因为）在过去的40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生产率提高了，但工作时间却没有下降。”在施耐德看来，这归因于劳工组织的一个失误，即它们只关注了生产率的提高问题，而没有关注每小时的工资量的问题。“结果就是大量的工人失去工作，而不是相反地工作时间的缩短。（但这时，）充分就业以及一种较高的生活水平，以及与生活质量（能够去休息、享受闲暇时光等）联系在一起那些问题，却要求降低工作时间。”根据这一思路，存在着两种既定社会产品的生产模式：第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有些工人工作过度，而另一些工人却根本就没有工作；第二种是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所有工人的工作时间都比较短并且也都比较轻松。

那些改革派工会和中左派政党通常也支持通过发展新基础设施来提高就业和工资水平。他们强调“社区资本”（公共性的生产条件），包括城市重建、交通、通讯等；强调“人力资本”（个体性的生产条件），包括学校、再培训设施、卫生保健设施等；还强调“自然资本”（外在的、自然的生产条件），包括可带来就业机会的水利工程、土地改造等等。这些类型的社会资本的意图仅仅在于：对城市、人和环境进行“投资”。虽然建设或重建的成本很高，但这些投资希望可以最终在提高生产率、利润以及国际竞争力方面获得回报。因此，人们相信这些投资是与新的全球性经济的要求相适应的。

工党/社会民主党转向关注减少劳动时间、扩大社会性的和物质性的基础设施。这种关注在一定程度上用非商品化的

(社会的)需求满足形式取代了商品化的(个体的)满足形式。它们对改善“生活质量”的关注同样也包含了激进性的内涵。然而,它们重点强调的是社会资本对于交换价值的潜力,而并没有采取以个体和社会的直接需要为基础的使用价值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的这种转向与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社会的一供应层面的经济学”以及美国民主党的“核心重点”(1996年晚期)仍然是很类似的,因而也会妨碍甚至抑制

316 激进改革的可能性。而且,在上文提到的那种僵硬的财政状况下,这种转向也许还是不切实际的。

关于失业、社会边缘化、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一些社会病态,第二种颇具普遍性的反应就不是这样的了,他们的替代性方案就其潜在意义来讲(如果不是有意识的)是革命性的。这种替代性方案对上文所提到的工党/社会民主党的那种计划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挑战。它是那些新社会运动的(没有明确表达的)“规划”。这些新社会运动包括女权主义和其他一些“身体政治学”、以及许多种环保和社区/城市运动(包括各种职业和社区的健康和安全的运动,这些运动横跨了新社会运动的所有三种类型)。

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们可以称作为“保护第一!”的这些运动,避开了经济增长的问题,并且它们还要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生产关系这两方面都得发生激进性的变化。“保护第一!”运动不是把社区商业、合作制、混合企业、以及其他一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形式(还有公共开支、非利润预算等),看作为对人、自然以及社区“资本”的投资,相反,它们把这些看作为保持、维护与提升生活条件以及生活本身所必需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货币开支形式。这种生活条件以及生活本身指:健康的、有文化的、具有公民思想的、并且进行合理享受的人群;适宜居住的城市和社

区(与工作场所);以及绿色主义者们所说的“环境”的完整性。

那么,我所说的“保护第一!”运动的替代性方案到底是什么呢?在我准备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性进行一下回顾是恰当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核心矛盾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了资本自身的生产条件,而且还颠倒了生活条件和生活本身的关系。

这种忽视(和颠倒)有两个后果,其一与经济增长的含义有关(因此是定量的),其二与生产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含义有关(因此从本质上来讲是定性的)。

就第一方面来说,一旦我们考虑到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损耗、可再生资源的破坏、健康与安全风险、社区生活的瓦解,以及由“现存的”资本积累和增长过程(还有包含在其中的成本计算)所造成的对生产条件的其他一些破坏,那么,“经济增长”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取得长足的进展这种说法就很值得怀疑了,甚至是否取得过任何真实的进展都值得怀疑。根据最近一个估算,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 capita GDP)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翻了一番多,但“真实进步指标(GPI)”却下降了。因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增长都是由以往所犯下的一些明显错误所构成的,如寅吃卯粮、将家庭功能转移到市场上等<sup>1</sup>。根据这项研究,不平等更多了,休闲时间更少了,失业更多了,污染更严重了,耕地流失加剧了,森林和湿地的退化更厉害了,矿物燃料的使用更多了,臭氧层的损耗因而也更严重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全球变暖现象的加剧,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还有北部国家对南部国家的生态欠债在不断上升。 317

以忽视或颠覆生产条件为基础的这种资本积累模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有很多的消极后果。例如,在某

些西方国家,教育体系所生产出来的愚昧同启蒙一样多;法律与秩序体系所带来的犯罪现象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社会安宁;卫生保健体系所带来的更多的是利润而不是健康;城市规划者切断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最后一丝生态共存关系;农业部门破坏而不是维护了乡村文化的完整性;环境部门则关注于资本的“自然资源”,关注于那些相对富裕人士的环境的宜人人性,而忽视那些受压迫少数民族和穷人的生态环境。对生产条件的忽视和破坏从短期来讲也许是“成本—有效的”;但从长期来看,城市变得更为拥挤、污染更严重、毒品与犯罪现象更为猖獗,而且人们的精神也越发地萎靡不振;农村文化被“城市化”了;自然被重新定义为“自然的资本”;人本身也越来越被当作为“人力资本”。“社会生活的各种病态形式”层出不穷,而且,就像后现代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sup>①</sup>一样,坏的社会实践驱逐着好的社会实践。

这些后果,不论是从定量方面来衡量,还是从定性方面来解释,都并非仅仅是这个积累和增长体系的附属物,相反,它们是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一个基本的(但却没有引起广泛注意的)事实是:依其本性而言,资本是拙于对事物的保护的,不论这种事物是指人们的社会性福利、土地、社区价值观、城市的舒适度、乡村生活、自然,还是指私人的固定资本——包括这种资本的结构<sup>2</sup>。在当前的情境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狂热追求规模成本的降低,疯狂地开发一些新的电气产品并为其拓展市场。这两条也是全球资本目前对危

<sup>①</sup> “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经济学用语,意指“劣币驱逐良币”。本法则起源于货币具有本身的货币价值与在公开市场的商品价值。货币价值是由法律决定,并且相当固定;而商品价值则由市场供需决定,并且会随时改变。“良币”是指其商品价值高于货币价值,它会慢慢地从流通市场中消失。——译注。

机所采取的解决策略。对资源加以维护或保持,或者采取别的具体行动,以及耗费一定的财力来阻止那些糟糕事情的发生(如果不加阻止,这些事情是肯定要发生的),这些工作是无利可图的。利润只存在于以较低的成本对或新或旧的产品进行扩张、积累以及市场开拓。

当然,上述这一观点在生产条件的维度上,要比在资本自身的工厂和设备的维度上,来得更为正确。在后一种情形下,个别资本也会花钱去维护他们自己的工厂;这些费用当然是不可能产生剩余价值(利润)的,因此,它们通常都会被压缩到最小化。如今,削减成本已成为资本的座右铭;金融资本迟早都会放弃修复或重建某个工厂或某个街区;而且税法也鼓励对工厂和机器的价值进行快速折旧,在这种情形下,上述判断就显得尤其准确了。

资本不会费心去保护那些不属于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生产力,如掌握某些稀罕技艺的工人,这是一条规律。关于这个规律也有一些例外。然而,作一条普遍规律,资本倾向于较少地拥有而较多地去租赁,——不仅包括专职的劳动力(以往一直是如此),而且也包括临时工和短工;(当政府不再简单地把土地给予商家之后)还包括土地;甚至还包括工厂和设备。今天,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正越来越多地租用各种不同的资源(“投入物”):管理团队、软件工程师、研究人员、市场专家,甚至还包括董事。似乎理想的资本就是什么也不必拥有而只要去租赁所有的东西。这种资本仅仅是一个金钱(或货币资本)蓄水池,不论在哪里出现了新技术、科学技术资源、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成长中的市场,而且在那里可以取得最多的利润,它都有能力迅速转向那个地方。尤其是在如今这个过度资本主义化的世界中,货币或金融资本不会为(生产条件的)维护去做哪怕是一点点的事,但却可以为尽

可能快地实现自我增殖去做任何事。

国家自己承担起了维护生产条件的职责。例如,学校生产着未来的工人,而医院和其他一些卫生保健机构则努力使现在的、过去的、以及未来的工人都保持在一种良好的状态上。国家保养着道路和高速公路,另外,常常还养护机场、港口码头、以及其他一些交通设施。国家还得负责环境的清洁和恢复工作,另外还得去提高整体性的规划能力,从而对私人资本的短视病进行弥补。我认为,应该说国家过去常常是做这些事情的,而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一组织行为被私人化了,或者受到了私人化的威胁。而且,在全球经济规则破坏私人企业的生产条件的同时,这同一个规则还强化了国家规模小型化的趋势,并提高了国家公务员的劳动强度,并且,一般来说,这一规则还驱使国家公务员在报酬减少的情况下做更多的工作(这样就使生产条件进一步受到了破坏)。为了扭转私人企业中的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的趋势,要求减税的呼声更高了,因此,这一趋势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样,我们就遇到了所谓的“加尔布雷思状况”:大众健康、教育、交通、以及一般的城市生活都处于一种糟糕的状态下,农村和自然环境的状况也退化了。所有这一切因素又共同促进了现实存在、交互系统、太空武器、以及高技术创新的资本化。在当今世界中,更多人的工作时间延长了,工作也更繁重了,相反工资却更少了,而且世界财富和收入分配两极化的现象也在日益加剧。

“保护第一!”是指运用劳动力与原材料、技术与机器、知识与社会组织、以及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去斗争、去重建、去修复、去更新、去维持、去保存、去保护:第一,劳动力自身(人类智力的、体力的、审美的、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性的拓展;心理与生理的健康);第二,环境(生态系统、宜人性)与环保运动;



第三,社区(社会的与物质的基础设施、正义与平等、团结与公民德性)与社区权利运动。

在此,“斗争”就是有效的办法。正如“劳动者”是指缺乏劳动斗争的状态下的“生产要素”(这也就赋予了这个词第二个、然而却是矛盾的含义:“劳工(labor)运动”),同样地,“劳动力”与“社区”(包括环境社区)则是指在缺乏大众健康、反有毒物品、社会正义与平等以及其他许多相关斗争的状态下的“生产条件”(这就赋予了这个词第二个、然而却是矛盾的 319 含义:“大众健康等方面运动”与“社区运动”)。于是,保护劳动能力就是指去保护这些斗争,从而使某些必要的人类可能性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之中;保护自然,就是指保护那些维护自然的斗争;保护社区就是指保护那些社区的斗争。最后,“保护第一!”就是指(对生产条件的)保护(还不止是保护)是第一位的,然后在保留资源的前提下,在努力维持经济平等的基础上,来提高人均产量,或者说,不是把资源分配给那些资源已经有富余的人,而是用这些资源去支持那些还没有得到资源的人。

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我所说的“保护第一!”是什么意思。(必须注意:我在下面提到的组织和斗争,从政治角度来看,范围十分广泛,且是多种多样的;我所关注的仅仅是这些斗争的一种意义,即在“保护第一!”这个主题上的意义。)

劳动力方面:大众健康以及职业健康与安全运动、艾滋病预防、教育改革、以及(最重要的是)女权主义的身体政治学等,都可以被看作为“保护第一!”的例子。之所以说女权主义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女权主义所关注的那些活动从范围上来看同“再生产”(维持)相关,包括“要求家务劳动工资”这一运动。分娩和儿童抚养、照料病人和老人、家务劳动、以及情感培育等等这些劳动,都可以作为例子来说明“保



护第一!”有哪些类型。女权主义者(以及大量的对“家庭价值观”持维护态度,并对女权主义观点持有异议的妇女)提出(有多种多样的提法),“首先是再生产,然后才是生产;首先是维持,然后并且只有在这之后才能自我发展”。

“灰豹党”<sup>①</sup>已经采纳了“保护第一!”策略的某些因素。拉夫·西蒙在“灰豹党”的机关报(1996年)上写道:“自然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ism)意味着保存、或执着于那些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灰豹党’正试图去做的事……要提高普遍福利就必须为每个人提供可以负担得起的健康保健以及足够的住房、交通和教育设施,而且还必须有一个清洁安全的居住环境。”西蒙还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今后若干年里付出卓有成效的努力,进行计划和合作”。另一个例子,耶西·杰克逊的“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运动要求挽救青年(在华盛顿特区)。杰克逊在1996年说:“重建学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物质上的、安全方面的考虑、环境危害等等”。

环境方面:关于“拯救我们的耕地”、“拯救我们的绿色地带”、“拯救我们的公园”、“拯救我们的荒野”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口号的意义,还有任何疑问吗?从概念层次上来说,波兰社会科学家兹比格涅夫·维尔兹比斯基(Zbigniew Wierzbicki)提出了一种“保护(sozo)生态学”,“sozo”是古希腊语中的一个单词,意思是“保护、保存、使生存”(当然,它也适用于各种和平运动与人权运动)。事实上,美国的环保运动已成功地把污染问题的讨论基础从污染控制转向了污染预防,即转向了清洁的生产技术。由约翰·缪尔(John Muir)创立的保护主义(主张对野生动物、自然区、古迹和传统事物等

① “灰豹党”,美国的一个维护老年人权利的全国性组织——译注。

采取保护措施),在其初创时期,它的支持者大多为上层进步论者,而现在它实际上已被民主化了。“地球第一!”是一个生态与政治激进组织,而绿色和平主义者和山岳社已开始讨论公众环保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内容过去是并不包含在它们的“纲领”之中的。 320

农业的恢复/保护对于“保护第一!”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原因就在于,同其他部类相比,农业领域的成本外化更为明显。而造成这一状况的第一个原因跟农业中农用化学品和矿物燃料的使用程度有关;第二个原因则在于,农业的地理分布是极为广泛的,而且它对于经济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出现下述情形就毫不奇怪了,即同任何其他部类相比,在该部类中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保护第一!”式的话语和斗争。同样不用大惊小怪的是:“保护第一!”的农业文献同其他类似文献相比更多地反映了小商品生产者的观点。例如,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就至少间接地对“保护第一!”表示认同(公开赞成低投入的农业、害虫的综合管理、轮作等等),与此同时,他对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中自我一挣得型的财产所有制也进行了维护。在《良田的礼物》(1981年)这部著作中,贝里谴责了工业化的农业,并且提出了一种社会的一经济的一生态的一模式(就像是“sozo农业”),这种模式在农业生产与农业维持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这正是一种以自我一挣得型的财产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模式。贝里指出,人类与土地之间的协调关系应该确保“维护与生产始终被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也就是说,那种以土地、水源、以及其他一些投入物的退化为基础的(因此是在损害后人利益的前提下)生产扩张是完全不允许的。

在种植业、伐木业、渔业、以及其他一些“基础产业部门”中,存在着各种关于自然的斗争,目的是保持生物多样性;恢

复空气的清新并使含水层、河流、湖泊和海洋保持清洁；维持环境的舒适性；防止可再生性资源演变成不可再生性的资源；维护土著居民对其所珍视的资源的权利；另外，它们还为后人以及当代那些受压迫人群对各种资源所拥有的权利而进行斗争。各种绿色主义者为（资源的）保存和保护所展开的斗争（这与传统社会主义为提高生产水平所展开的斗争是截然不同的）似乎代表着对“保护第一！”的一种坚定的支持。

社区方面：各种城市和乡村社区运动同样也是对“保护第一！”实践的一种证实。在这个城市衰落、社区瓦解的时代，公共安全、住房、拥挤、污染、不平等与贫困、土地投机、无家可归、以及“乡村”文化的城市化等问题，都史无前例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不仅是核心城市中的居民，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生活在郊区和农村中的人们，都在试图把这些问题向相反的方面引，试图恢复并保护一种体面的人类生存方式，试图建立一些可持续性的社区，在这些社区中有各种能够服务于高尚的社会价值的社会与物质性基础设施。现在，各种社区都正在被卷入资本那条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轨道中去（实际上，已变成了各种社区资本），但在这个时代中，同样也广泛地存在着各种重构社区的斗争。阿米塔·艾茨昂（Amitai Etzioni）的“社群主义”则展示了“保护第一！”主旨的一个变体。在引证了社会性的衰退以后，艾茨昂呼吁通过促使人们“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伦理的、社会的、和公共的秩序”来“重建各种社区”。至于物质性的基础设施，像“加利福尼亚计划圆桌会议”这样的致力于计划之制定的团体，在假定现有的基础设施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建议采取集约型的发展计划，以此来保护绿色地带并提高住房的能源利用率。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工作场所，它本身也代表着一种“保护第一！”的实践。现在，生产日益受到金融资本规

则的支配(而且从范围上来讲它还变得日益全球化了),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工作场所中的健康与安全、工作关系、以及一般的生产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当今的美国,发展最迅速的一个工会组织即“社会服务雇员的国际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物业管理者之正义”运动,即维修工的运动——所推动的,这一事实是很重要的,至少是很有象征意味的。

澳大利亚“特德培训协会”将其称作“保育员社会(Conserver Society)”的那种平等的和社会公正的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从很多方面来讲(如果不是大多数方面的话),实际上已经准备妥当。只要父母们拥有进行实践的时间与资源,关于儿童培养其实是有一些很好的模式的。关于爱,也可这么说:如何去爱,对此人们已积累起了足够的智慧,如果这种智慧得到与职业体育运动同样的关注,那么,人类将会拥有一个多么不同的世界啊!关于青年的教育,人们也已掌握了一些颇具革新性的教育规律:例如,不要让学生盲从于权威,要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那些他们能够自己解决的问题;要使电视以及一般的大众传媒非商品化,——人们批判性的社会想像力在此还显得很有限。现在已有了数千种绿色技术,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未得到广泛运用,因为运用它们无利可图,比如:人们期望中的那种公共交通(与现今的大多数公共交通是不同的);低投入的农业,虽然这种农业的技术基础已经具备了,但关于这种农业的政治学基础还没有形成(如化学制品公司的现存力量);太阳能;区域计划能力,——这里的区域从定义上来说既指生物区域也指文化实体;劳动者关于劳动和生产条件这两方面的知识,以及农民关于土壤的知识等等。关于社会经济的那些可能的形式,人们同样也很了解了(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很少实施):许多种类型的合作社、工人集体、混合企业、国有企业、城市自治企业、非盈利性公司等等。

甚至一种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不是指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许多方面也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例如,赫尔曼·戴利(与其他人一起)就曾指出:经济增长应该以生产能力的改进为基础,而不是生产量的提高为基础,比如这种增长应根源于能源的节约、废除污染性的技术等。如果说戴利和其他一些绿色经济学家已根据定量规定解决了增长的许多细节问题,那么亨利·列费弗尔(Henri Lefebvre)、费尔南多·亨里克·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以及其他一些人则已根据定性(社会性)规定对增长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列费弗尔指出,如果需求满足的社会形式局部或完全地取代了需求满足的个体(商品)形式,那么结果就会是:对这种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定的制约,同时,这种制约既不是“粗暴地终止这种增长,也不是无限期地任其延续”。卡多索(在《资本主义的残余》这本书中)进一步补充了一个条件:生产绝对必须从属于消费。关于“绿色预算”以及一般性的社会—生态—经济的核算方面的文献之数量正在快速增多,关于好的社会关系应由什么来构成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它们的问题,社会生态学家还有其他一些人所写的文献的数量同样也在突飞猛进。最后,关于“激进民主”和一般政治理论的论著数量更是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

如果说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似乎仅仅是另一种类型的“生存第一主义”,那么人们应该记住以下两种生存第一主义之间的不同:(比如)美国民兵运动的生存第一主义是以财产私有制和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以及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而在那种可以称为“社会生存第一主义”(因为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的思潮中,社会不是仅仅被定义为其单个成员的总和,它也被定义为某种自成一体的东西(sui generis)。正如贾安·马蒂尼茨·艾略尔通过他所说的“穷人环保主

义”(在南部国家)所表明的那样,社会被定义为“是对那种受到国家和市场威胁的谋生手段以及对资源的公共分享的一种维护”。

总而言之,“保护第一!”是对劳动的深入,而不是对劳动的摒弃(就像资本主义状态下的生产一样)。它被平等主义原则和一种社会政治逻辑所决定,而不受那种纯粹的经济逻辑的支配。“劳动”不再意味着资本的增殖(即通过生产剩余价值来增加资本的价值),相反,它意味着使社区、环境以及一般社会生活保持平衡(比如,像地震后头几天重建工作中自发的、自由组织起来的劳动,或者实施了民主化管理的家务劳动)。实际上,所有的“保护第一!”的劳动也许既包含有工具性的意义,也包含有情感的和审美的意义。最后,“保护第一!”不仅改革劳动关系,而且也减少劳动时间。

毫无疑问,那些(以当前方式组合起来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阶级以及国家会反对这种“保护第一!”的替代性方案(如果它们不反对,它也就不是一种替代性方案了)。劳工、绿色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妇女、受压迫少数民族、穷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相互间有必要结成一个牢固的联盟,他们应更为密切地关注恢复和重构(从而重新界定)他们的生活世界的事业,而不应仍执着于拥有高清晰度的电视机(无论如何,这些东西最终都会在固体垃圾场找到它们的归宿)。但是,我们终究还是希望呼吸到真正的空气、喝到真正像样的水,希望城市复兴、居住区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在农村有各种各样的乡村文化和完整的农业体系、在绿色城市与乡村间有一种合理的相互交流,希望可以终止对臭氧层的危害,结束全球变暖的趋势以及其他一些不利局势。可以想像,大多数人对所有这一切还是持欢迎态度的。正如乔·维德尔所说的,我们将要“告别代价昂贵的快乐之巅,(但我们将会得到一个机会)来



修缮我们已经腐烂的社会”。

如果“增长和发展”以及“更多工作”这些词藻,对于“保护第一!”这种替代性方案的政治合法性来说是必需的(它也确实需要),那么,就让这些词汇来指称下面这些能力的增长吧:即进行恢复和保护斗争的能力、民主的自我管理的能力,维持“工作”的能力以及提高生活条件及生活本身的层次的能力。我要用一个否定性的声明来结束本章的讨论:“保护第一!”不可能在我们所知道的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中取得成功。我们应该清楚:这种替代性方案(它同样要求减少劳动时间)从其意图和后果来说都是革命性的。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同其他任何人一样也把握到了这一点:“对自然的异化状态的一种否定,其目标显然在于重构生态新陈代谢的平衡,即‘一种能够作为社会生产之管理规则的系统性的重构,它采取的是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sup>3</sup>

#### 注 释

1. 马克·布莱斯勒(Marc Breslow),“美国在进步吗?”,参见《美元与感觉》,1996年,3—4月号;布莱斯勒报告的依据是基地在旧金山的“重新定义进步”这个团体的一项研究。

2. 斯蒂芬·霍顿(Stephen Horton),“价值、废弃物以及环境建设: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刊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NS),第8卷(1997年),第2期(6月)。

3. 瓦尔特·希斯比(Walt Sheasby),“颠倒的世界:卡尔·马克思论自然与社会的异化”,手稿。



## 第二十一章

## 什么是生态学社会主义？

324

## 导 论

沿着马克思的思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者一直在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价值是从属于交换价值的,具体劳动是从属于抽象劳动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数量重于质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者的**实践**却常常是由争取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充分就业、控制租金、资助小农场主等所构成的,或者说是由对“分配性正义”的追求所构成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某种定性的理论批判,以及一种(往往是)定量性的政治实践。从逻辑上来讲,传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导向“生产性正义”。但事实上,它却导向了分配性正义的要求。社会

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批判,但后来却去致力于改革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

由此,社会主义就否认了自己的第一原理。这也许就是这个词汇为什么会从各种激进运动的字典中被删除掉的一个原因(并且再也没有在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字典中出现过)。社会主义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某些东方国家的前一现实社会主义在经济上、道德上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失败;南方国家的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民族主义发展模式(例如,印度的尼赫鲁模式)的破产;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式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合法性的丧失/政治上的缺陷(这种情况在新西兰可能最突出,在德国可能最不突出)。所有这三种模式在经济上都是自我一毁灭性的,因为它们在经济上的成功都带来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无法在这些模式各自的范围内获得合理的解决的;而且,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也都是自我一毁灭性的,因为所有这三种模式都把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等同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而且通常还将其等同于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我注意到,把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批判照搬到社会主义的身上是很方便的,而把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照搬到这种国家的身上也同样是很顺当的。

325 因此,各式各样的非国家主义与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冲进来填补这个随之而来的(巨大的)政治空缺也就不奇怪了。这些意识形态与实践包括: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社群主义、各种形式的分离主义、各种有地域局限性的种族和宗教复兴运动、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地方主义,还有一般的犯罪行为。

但问题在于:复活社会主义的理念,并且,第一,把它从对定量性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或补充进)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第二,从意识形

态上斩断它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关联,这种作法可能吗,或者说是可取的吗?我认为,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社会主义重新进行理论界定,这不仅是可能和可取的,而且还是十分必要的:在实践中,重点关注对资本主义的定性批判,这也包括对生产性正义的重视;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批判,使国家民主化;另外它明显还是国际主义的。这样一种理论和实践将同时代表着对新自由主义与现在流行的许多地方主义的变种的一种取代。我还会进一步论证道,在发达国家与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各种社会斗争中,如果不是大多数人那也有很多人,目前事实上已在一方面致力于对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包括对土地的使用以及总体上的对自然的使用)的批判,另一方面还在关注各种“公共官僚机构”以及某种国际主义实践的建构。

如今,上至“拯救我们的绿色地带/野生生物”的各种简单斗争,下至十分复杂的恢复生态多样性的各种尝试,围绕着土地(以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所展开的各种斗争,实际上都是普遍性的。围绕着具体劳动所展开的那些斗争同样也是普遍性的:受到挑战的资本主义技术从范围来讲是十分广泛的,涵盖了从核能到个人计算机的众多领域;工人在职业健康与安全等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而且专家们也对此作了广泛的讨论;工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对生产率的斗争”以及反对福特式技术的斗争,促使资本于80年代和90年代采纳了“团队工作”、“质量小组”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手段。最后,围绕着最终使用价值(消费品和服务)所展开的那些斗争也越发接近于普遍性的了:例如,卫生保健与教育的本质;汽车与汽车文化;电视、传媒与电视文化;低效能的住房;含化学成分的食物;受到女权主义者以及其他许多人批判的一系列产品。

同样地,我也很难对某种单一主题性的斗争表示认同。这种斗争并不致力于(至少潜在地)使国家民主化,并且/或者,不含有某种国际主义的因素(本章对这些问题不加讨论)。

使用价值/具体劳动—  
交换价值/抽象劳动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有商品都既有交换价值又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是指一种商品同所有别的商品(例如货币、一般等价物)的换算价值,而且它是用劳动时间来加以度量的(因此是一个量的概念)。使用价值是一个质的概念。用戈德利埃的话来说,“使用价值相关……于人的(原文如此)自然的或后天的需要,相关于一种质的关系”。使用价值有两种一般类型:第一,用来生产别的商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第二,直接用来满足个人需要和愿望的商品(再生产的资料 and 对象或消费资料)。第一种类型的使用价值的市场需求来自于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更高生产率和更多利润的需要。第二种类型的市场需求部分是以商品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物质功能为基础的。<sup>1</sup> 一定量的食物提供一定量的营养;一定量的石油或煤炭提供一定量的热量或能量;特定型号的汽车以特定速度送人们去上班;特定种类的布料使穿着它的人或温暖或凉爽;特定的书籍在特定的技术研究领域中给读者以教育。

正如每个商品都既有交换价值也有使用价值一样,每种生产过程也都既是一个劳动过程(使用价值在此被生产出来),也是一个价值创造过程(交换价值在此被生产出来)。马克思把前者称为“具体劳动”,把后者称为“抽象劳动”。并且,正如我

们可以根据一个商品的社会经济功能来定义使用价值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其生态后果来定义具体劳动。提供特定种类营养的特定食物是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譬如通过化学农业),而这些生产方式又会对土壤、水源等产生特定的影响。可产生一定量的热量和能量的一一定量的石油或煤炭,是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譬如通过露天采矿),而这些生产方式又会对植物、水流、灌溉等产生特定的影响。能够以特定速度送人们去上班的特定型号的交通工具,是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譬如铸造工艺),而这些方式又会对空气质量产生特定的影响。可使人们保持温暖或凉爽的特定的布料是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譬如通过石油化学工业),而这些方式又会对水质产生特定的影响。可以在某些特定技术领域给读者以教益的特定的书籍,是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譬如通过纸浆造纸业),而这些方式又会对大气质量和水质产生特定的影响。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上面所有这些特定的生产方式都将对工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譬如精神压力方面的疾病等)。

使用价值(最终产品)理论必须以某种需求理论为前提条件。这种需求理论并不是根据个人对某种商品的主观评价来判断需求(那往往是一种精英主义理论),而是根据使用价值再生产(或起相反作用)劳动力(以及,更普遍地,再生产整个社会)的方式来研究需求。这种理论重点研究那些非常社会性的需求,即每个人与其他人所共同具有的那些需求,而不是去研究个人主观性地定义的那些愿望。在这个意义上说,从营养角度来研究食物,从健康角度去研究工作场所,或者根据上班往返时间来考察交通运输系统,这都是合理的。对营养和交通的某种社会需求是存在的,但是社会并不要求任何特定的食物来提供(譬如说)蛋白质,也不强求任何特定的交

通运输方式。

327 上面所说的这些社会需求是非常具有社会性的,这并非因为它们的生产或得到满足是依据了某种社会计划。实际上,社会需求是在我们背后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现存的消费结构的产物(例如汽车文化;快餐文化;每年都会有的数以千计的过程创新和产品革新,包括文化创新;对外贸易的状况;以及其他的许多“自发性”(非计划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及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内部变化)。

对于一种使用价值有两种可能的批判类型。第一类型是,这种使用价值也许存在着机能障碍。在农业中使用化学物质也许会破坏土壤或水体,因此会降低而不是提高生产率。使用汽车作为运输工具去上班也许会导致交通堵塞。对生产资料和再生产资料的批判类型与商品形式可能具有的那种自我一否定(自我一取消)的本质有关。第二种批判类型认为,以(个别)商品形式来实现的需求之满足,可能会压抑以(社会)成本更低的、更为直接的社会性形式表现出来的需求满足的实现。化学农业也许不仅会降低生产率,而且还会妨碍农民通过合作途径来实现害虫的综合治理。汽车可能正在自我一否定,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了交通堵塞,而且还因为它阻碍了大众交通系统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生产用于满足需要的商品的过程,同时也是这个商品去满足的那种需要本身的生产过程(例如,汽车工人需要用汽车往返于生产汽车的工作场所之间)。然而,马克思既没有发展出一种个体与社会需求的理论,也没有把这样一种理论整合进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以及积累的理论阐述之中。他在理论上明确地分析了消费篮(广义地说,即劳动生产率)中的价值内涵;他深刻地思考了资本主义发展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关系;他极富远见地展望

了农业、城乡关系等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上获得重建的那一天；但是，他却并没有对构成他那个时代的消费篮中的特定的使用价值进行系统的理论说明。

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中，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是从属于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的。这就意味着，(1)在工作场所、土地使用活动、劳动分工等等之中，决定性的力量首先是**生产交换价值**或利润的需要。保存生态多样性、避免对其他劳动场所以及后代欠下生态债务、促进工人的智力发展等等需要是从属于利润生产的；(2)在消费(再生产)领域中，清洁的空气和水源、通畅的交通、以及其他一些社会性的和生态性的“东西”，成了在市场中**实现交换价值**这种需要的牺牲品。

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有两个一般性的前提条件，**这两个条件都具有历史性的趋势**。第一，具体劳动正在日益被纳入抽象劳动之中，这指的是如今关于“柔性”的那种普遍性话语，或者说，使劳动力变成可变资本的更为完美的形式。第二，使用价值正在日益被纳入交换价值之中，这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需要的满足(或没有得到满足)更为经常地体现在商品的(单个)形式中，而较少采取直接社会性的形式；譬如，更多的汽车，更少的公共交通；更多的治疗性健康，更少的预防性健康；更多的快餐，更少的家庭烹饪；更多由MTV制造的音乐，更少的本土音乐；更多的大型演出团体，更少的文化自我发展。 328

总而言之，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时代，劳动力更为可变(更具有柔性)了，而且更多需要的满足更为经常地采取了商品的形式。由此，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消费篮中的价值内涵)日渐减少，这是由于(譬如)工厂化制造的公寓住房、仓储式零售商店等，所有这一切的生产或运营都只需要较少的工人就行了。



最后,鉴于价值和资本(利润既是各种经济活动的手段也是其最终目的)的自我扩张本性,再结合需求满足的商品形式,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便要求市场对最终使用价值(消费品)的需求(需要)必须也是自我扩张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需要便是对越来越多的金钱的需要(这使我想起:当有人问塞缪尔·冈珀斯“工人想要什么?”时,他的回答是“更多”)。

### 定量斗争/定性斗争

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关注焦点是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sup>2</sup> 他的研究对象是这样一种“经济”: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数量方面,如工资、成本、价格和利润;就业与失业;剥削率;资本积累率等等。<sup>3</sup> 马克思所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财产/关系、竞争、世界市场等等)从本质上来说是充满着危机的(而且还依赖于危机),并因而还会打断、或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例如,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重点关注的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以及商品资本的周转过程之间及其内部(以及危机的不同形式之间)在数量上所发生的断裂或中断。它既不关注资本与劳动在阶级力量对比上的变化,也不关注作为生产性投入的那些使用价值因素(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及空间等)的稀缺性。<sup>4</sup>

如果说马克思完全只关注于抽象劳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价值(价值的实现),那也不准确。在马克思那里也有例外。最主要的例外就是他所谓的“所有固体都融化在空气中了”的说法。这是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展,个人被原子化了,变成了一些自私自利的欲望分子,而这也就摧毁了

社区(在这一点上,波兰尼所强调的是土地和劳动以及某种社区遗产的商品化)。像19世纪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多数人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计的必然性,构成了自由的最明显的形式,同时,这也是对自由的一种束缚,而且,这<sup>329</sup>还是协作性社会得以形成的主要障碍。一方面,马克思把工业化社会看成是消灭不平等和贫困的前提条件(这归根结底必须依赖于推翻资本主义与建立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工人阶级的运动是主要的依靠力量。借助于这种运动,社区将得到重建,进而资本主义在人类关系中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也将随之终结。马克思(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似乎相信,通过工人阶级的运动所实现的生产力的那种不受危机干扰的发展、那种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社区的重建是彼此相互依赖的。(杜克海姆争论道,一种合理的经济体制,即内在整体,是一回事;而把个体整合为该体制的某种功能或某种角色,即社会整合,则是另外一回事。然而,即便是杜克海姆,他在临去世前也认为,他在法国工人运动中看到了社会团结一致性或社会一体化的某些因素。)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工联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人也都相信,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既是走向一种不受危机干扰的经济发展的途径,也是社区重建的手段。工人运动本身不仅追求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以及一般的经济改革,而且也强调团结一致、组织互助社会、以及存在于劳动阶级中的其他一些重建社区(或它的某些部分)的行動的重要性。<sup>5</sup>

虽然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强调了社会关系的质的方面(工人运动、社区,互助论等),但是他们既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生产力(机器、劳动技能等),也没有研究“再生产力”(用来再生产劳动力的作为使用价值的消费品)。而且,虽然马

克思和恩格斯很有兴趣地谈到了(并且还谴责了)资本主义对土壤与森林的生产率、贫民区住房、城市污染、某些类型的具体劳动对工人身心所带来的摧残等方面的影响,但是他们对于那些起源于劳动过程的社会与政治斗争却谈得很少,——如对污染、危机的和不卫生的劳动条件等的抗议。他们对以某些特定的使用价值为对象的抗议活动同样也沉默不语,——如对劣质肉类、贫民区住房等等的抗议,而且,他们对保护社会传统遗产(譬如食谱)的那些斗争也保持沉默。

事实上,这种空缺是非常令人奇怪的。虽然马克思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也重视过“逝去了的社区”这一主题,但很少有社会主义者研究过关于社区的前提条件这方面的难题。工人因受各种具体劳动的妨碍而无力去构建的那种社区是什么样的?作为受害者的工人有自治能力吗?与此相类似的问题还很多。社会主义者合乎逻辑的步骤首先应该是争取工业的社会化(与国有化相对立),然后对劳动过程进行改革或革命,从而在工作场所中生产(再生产)出一种更为全面发展的人来。

也有些人曾试图去研究商品生产方式的消极影响,然而,330 即便是这些人,他们对于所生产出来的这些商品(使用价值)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上也都没有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如果把下文中的问题提前放到这里来讨论的话,我们会发现,譬如,关于汽车与汽车文化(极端个人主义)、或整天被束缚在计算机旁边的那些工人的身心健康(重复性压力综合症)等,这些问题在今天是十分普遍的,但是,在马克思的那个年代,对这些问题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批判相对来说还处于低级阶段(当然,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使用价值与具体劳动,与现在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

总之,虽然马克思对低工资、失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不

均、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本质原因做过很好的论述,并且还对工人的斗争、以及由低工资引发的穷人的各种抗议活动等同样也做过很好的理论分析,但是,他对围绕着具体劳动、土地使用以及使用价值所组织起来的那些斗争似乎并不怎么感兴趣。他对缩短劳动时间和反对机器提速这些斗争所进行的讨论(或参与)也许是个例外。但是,这些仍然都还是定量性的斗争(同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一样),因为这些斗争从属于量的范畴,即从属于劳动时间量和工人在劳动过程中被强迫遵循的速度量。一方面,围绕着劳动过程、技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土地利用等展开了一些斗争;另一方面,围绕着住房、食物、城市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等也展开了一些斗争。然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些方面的斗争都显然没有得到体现。

要解释这一点可以从下面这两种方法中选择一种方法。第一,这可能是因为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还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然而,社会、经济与环境史家们却认为,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在19世纪早期,关于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林业活动(它导致了土壤侵蚀和旱涝频发)就存在着一些斗争;存在着一些反对技术的斗争(劳工运动);关于住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也存在着斗争。更深一层来讲,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还研究过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这两方面的问题,也注意到了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展开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斗争。欧文主义(以及其他的一些理论)就曾对资本主义的具体劳动进行过批判,并且还凸显出了一种对更为人性化的替代方案的期望(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这种期望曾经变成现实)。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美学的和伦理学的批判(如罗斯金和工艺美术运动)。费边

主义则推动了教育改革的发展,而且还为公共性的或社会性的基础设施的配备出了力。(应该注意到,对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的批判内在地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消费结构的某种取代。)第二种解释则认为,虽然马克思指出了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特定的弊端,而且也注意到了土地与劳动使用中的许多改革斗争,但是,他贬低了它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可能会争论说)只有资本主义的数量关系才是充满危机的,因而也就为社会的和政治的激进变革带来了希望与必要性。由此,围绕着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所展开的那些斗争可能就被看成是地方性的或排他主义的了,——这也就是说,它们无法像工资和劳动时间可能会做到的那样(而且后者有时确实也做到了),使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不论问题的真相如何,一个单纯的波兰尼—马克思主义者(Polanyi - Marxist)是不可能解释清楚这些问题的;如果有人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必须既是一个马克思学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和经济史家。

331

### 什么是生态学社会主义？

虽然社会主义者很久以来一直都在说,资本主义将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了,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需要(一种定性批判),但是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却一直在追求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充分就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些定量性的实践),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我用“生态学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来界定这样一些理论和实践:它们希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这也就是说,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

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如此定义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而且也研究使用价值和需要(消费)的结构。从这个含义上来讲,生态学社会主义所寻求的正是使传统社会主义本身的批判性理想得以实现。

关于生产条件、或者借波兰尼给虚拟的商品所制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土地”与“劳动”,即那些并非作为商品而生产出来但却被看成为商品的那些东西,传统社会主义没能对其加以理论分析。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上文所提到的那个讽刺得以产生的原因。关于那些“真正的”交换价值(如薄板钢、汽车),市场所关注的是,某种特定的商品按照所需要的数量和质量被生产出来,并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分派给恰当的买主。在这里,市场就其功能来讲就好像是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一套复杂的调配系统。对利润的需求支配着对某些特定资本货物(使用价值)的需求,而对住房、交通、食品等等的社会需求则支配着对消费品(使用价值)的需求。

然而,市场在生产条件(如某种类型的劳动能力、土壤、水源、城市空间与基础设施)的供应方面却并不具有这种系统性的功能。虽然,土地(以及“自然”)和劳动力市场在某些既定供应品的调配过程中可以起到某种决定的作用,但是它们与这些供应品的生产(与再生产)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实际上,生产条件的生产所要求的前提条件是:一个涵盖私立与公立、世俗与宗教、初级与高级、技术性与非技术性教育的庞大体系;关于土地使用、农业、林业等等的复杂的环保法规体系;以及关于城市的交通计划、分区及其他事项的一套复杂的体系。

考虑到土地(自然)的地方特色以及个体劳动者的“个人特色”,——加之这两者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市场,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意味着,土地和劳动的使用价值问题是特别重



要的。例如,关于薄板钢的生产和调配,国家不必操太多的心,但它的确必须考虑合格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问题,必须去考虑土地(自然)的其他一些使用方法、空间分区方式等等问题。

传统社会主义关联于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态学社会主义则关联于生产条件的生产/再生产。因此,生态学社会主义同传统社会主义相比,其范围更为宽泛,即更为普遍化。但是,生态学社会主义同时也更为特殊化,因为,譬如它会关心某些特定工人群体的健康问题、某些特定社区的污染问题、以及某些特定行政区域的分区问题等等。

我关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念不仅在于指出具体劳动(劳动与土地)以及使用价值/需求应该受到批判,而且还在于我认为它们正在受到各种社会运动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学社会主义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规范性的主张,而是对社会经济条件和日益逼近的危机的一种实证分析。在这种观点看来,许多的(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工人、受压迫少数民族、社区、环保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人,如今都已投身到身份政治学和场所政治学的怀抱中去了,实际上,他们正在通过斗争尽力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利润导向型的生产从属于需要导向型的生产。

更明确地说,生态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影响或建构生产力(如土地、能源、原材料、技术、机器、劳动技能、劳动组织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的资料 and 对象;以及住房、交通和其他的一些再生产或消费的资料和对象)的方式的一种批判。同时,生态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则是对这些生产力和再生产力的一种批判。这种批判从各种社会运动/斗争中获得其规定性,目的是以替代性的技术、劳动关系、交通模式、抚养方式等等为基础来修缮或废除这些生产力和



再生产力。

这些“新社会运动”的评论者们还没有给这些运动的独特目标予以足够的关注,尤其是没有充分注意到它们对土地使用、劳动过程以及最终使用价值的广泛质疑。实际上,某些社会运动正在对放牧、粮食生产、原材料(如棉花)生产、森林业、以及采矿业(如露天采矿)等方面的土地使用模式发起挑战。一些相当普遍的水资源使用模式同样也受到了挑战,如工业化渔业、对地下水的污染、湖泊因酸雨而干涸等等。对于像石油化学工业、纸浆造纸业、核能源业以及其他一些资本货物行业的劳动过程,也存在着一些从实践维度上所展开的批判;对第二部类中的各种行业,如家具业、干洗业、服装业、皮革制品业、玩具业以及其他一些行业中的劳动过程的批判也是客观存在的。使用个人电脑来进行的办公室工作也因其缺乏健康性而遭到了攻击,高技术部门中的劳动因其压力太大也遭到了同样的攻击。职业健康与安全几乎得到了普遍的关注。与此相类似,众多的使用价值也遭到了绿色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的质疑,例如矿物燃料能源、汽车、以及汽车文化;大众传媒中以性和暴力为内容的文化产品;以及单调无聊的电视节目。我们还可以接着抨击食品采购与配制(不健康的饮食)中的消费行为、娱乐(很少有身体活动)、低密度的郊区住房(建筑材料、能源、道路与高速公路的浪费)、灰色城市(而不是绿色城市)、甚至还包括垃圾处理(对废弃物的当前利用状况的批判)等,当然,还可以接着抨击恶劣的水质和空气质量及其对耕地和绿色地带的威胁。

作为结论,我在附录一中组织了一系列的问题,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某些分配/数量维度上的内容,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某些生产性的/定性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和对照。读者将会发现,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差异,因此会获得这样一

333

种认识,即生态学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那么它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一种批判。

最后,我在附录二中(相当简明地)概括了我所称的“社会民主的分配性正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生产性正义”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今天,正如各种土地使用活动、劳动过程以及使用价值已极为广泛地遭受到了各种类型的社会政治批判一样,所谓正义社会这个概念也已将其关注视线从定量方面转向定性方面了,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转向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了。生态学社会主义已经来临,它们形式迥异,并且丰富多彩。在激进绿色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阐释以及它就业已存在的极度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所提出的各种替代性方案中,我们将听到更多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声音。

#### 注 释

1. 这就是使用价值的生态经济学定义。当马克思在写下面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可能就想到了这种定义(《书信选集》,第106页):“使用价值——无论是从主体上把它看成为劳动的有用性,还是从**客体**上把它看成为产品的效用……”(黑体是后加的)。这同庞巴维克(Bohm - Bawerk)的客观价值概念,或一个商品带来某种特定客观结果的能力相类似。“我们会谈论食物的营养价值、木材和煤炭的燃烧值、各种化学肥料的肥效……”(引自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闲暇阶层的经济学理论》,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第62页)。在资产阶级的定义中,使用价值是由个人根据他或她自己对幸福的理解而对商品所作出的主观评价来决定的。

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再生产不是它的一个问题,因为在这里劳动力没有被看作为一种(虚拟的)商品。据他们说,工人出卖给资本

家的是劳动服务而不是劳动力。

2. 关于劳动过程从“简单协作”到“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变化,马克思所作的描述揭示了以机器为中介的复杂的“现代”协作形式在生产率方面所引起的那种量的飞跃。

3. 虽然马克思资本理论中的所有“经济学范畴”都扮演着经济学范畴和社会学范畴的双重角色(譬如,剩余价值/可变资本既是资本与劳动的力量对比的一个指示器,同时也是用以测量潜在的实现性危机的一个尺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根据工人与资本家、工人与地主等等之间的阶级关系来发展他的理论。换句话说,马克思创造了一种杰出的研究资本主义矛盾的方法,但是,他后来进行的却是一种并没有运用这种方法的经济学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斗争”仅仅对于劳动时间的决定具有某种重要作用。

4. 在马克思对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棉花危机”的分析中,他的确也关注到了生产投入物的使用价值。但是,举例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关于经济衰退问题,有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包括我本人在内)创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工资推动”或“利润挤压”理论(在他们看来,这种“推动”或“挤压”,造成了使用价值的失衡,由此便带来了经济衰退——译注)。然而他们却受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尖锐批评,在后者对那个时代的经济困境的解释中,他们采用了一种更为系统化的关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的理论分析模式。马克思也曾指出过关于土地和劳动的资本主义实践(如农业对土壤的破坏)的不合理性和破坏性,并且他还确认过消费品(如许多劳动阶级的住房的建筑材料)的有害性。 334

5. 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与工人运动都认为他们自己所从事的是一种批判自由主义的实践活动(前者常常是在政治学的层面上,后者则常常是在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的层面上)。工人把社会主义看成为自由主义的实现,因为不受危机干扰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等将使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那种形式上(法律)允诺变成为现实。马克思以及(或许)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都相信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由自私性的动机所推动的,而且从其定义来说,它就是“传统”社区的一个破坏者。但是,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党人却都强调说,必须重建人类的社会关

系和社区。前者把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看成为这种新人本主义与社区的具体化,后者则把社会民主国家看成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异化和剥削。

## 附录一 传统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比较和对照

### I. 概论

传统社会主义	生态学社会主义
对资本主义/交换价值(有效需求、流动性等)的普遍的、定量的批判	对资本主义/使用价值(地点、劳动过程的特定任务、个体等的统一性)的特殊的、定性的批判
对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没有进行理论分析	对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进行理论分析
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一方的变化以另一方的变化为前提	具体劳动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一方的变化以另一方的变化为前提
关注资本的生产与流通(工作场所与市场)	关注生产条件(社会与国家)
335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了在各个阶级、地区、国家与大陆间富有和贫穷的两极分化(交换价值);北部国家欠南部国家的经济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生产能力(土地、具体劳动)和再生产能力(使用价值)退化;北部国家欠南部国家的生态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关系)造成了对工人的经济剥削(抽象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关系)造成了对工人的生态剥削(具体劳动)
根据工人生产率的提高来定义机器的使用价值	根据工人的安全与健康、污染来定义机器的使用价值

续表

传统社会主义	生态学社会主义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 它能生产出比再生产它自身所需的价值更多的价值(剩余价值)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 它具有某些特定种类的具体劳动能力
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 = 具有生产交换价值即利润的功能	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 = 具有生产使用价值的功能

## II. 危机理论

传统社会主义	生态学社会主义
关注资本周转的量的断裂(解决办法:赤字开支、降低利息率等)	关注资本周转和生产条件的质的断裂(解决办法:能源政策、教育政策等)
以投入物(如土地和劳动力)的可获得性为前提;以产出物的使用价值为前提	把投入物(如能源、土壤、以及按生态学来定义的劳动力)的可获得性/类型当作问题来研究;把产出物(如饮食、享受闲暇、住房模式等)的使用价值当作问题来研究
关注新的投资渠道的可获得性,即资本需求	关注土地、能源、劳动以及其他一些投入物的可获得性,即资本供应
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含着劳工运动时:危机的转移(债务危机、政府财政危机等)	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含着新社会运动时:危机的转移(政府对土地、劳动等的“过度调控”——即合法性危机)
转向出口作物,远离口粮作物,导致了南部国家的经济贫困	转向出口作物,远离口粮作物,导致了南部国家的生态贫困
绿色革命 = 经济的过度生产,在经济上对直接生产者的利益构成损害	绿色革命 = 单种栽培,能够抵御疾病的植物的消失等,即生态上的生产不足,在生态上对直接生产者的利益构成损害

336

### III. 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社会化

传统社会主义	生态学社会主义
国有化: 计划经济是与生产力的 高度社会化本性相适应的 生产关系(国家与公民间的 关系)的新社会形式	社会化: 社会主义是与生产力的 高度社会化本性相适应的 生产关系(劳动阶级与其自身 间的关系)的新社会形式
国有化成为交换价值/财富与 收入的再分配的标准;需求 满足的商品(单个的)形式	社会化成为使用价值/财富与 收入的再分配的标准;需求 满足的社会形式
国有化不以生产或具体劳动 的特定的资料或对象,或所 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为前提	社会化以特定的土地使用、 技术、劳动者的技能以及 所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为 前提
国有化: “适用”于国家 资本主义时代?	社会化: “适用”于全球 化资本主义时代?

### IV. 社会运动/社会主义

传统社会主义	生态学社会主义
轻视土地/社区问题(或者 把它们视为小资产阶级或 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	重视土地/社区问题(连同 工作场所/劳动的问题)
轻视具体劳动的问题(恩格 斯的技术决定论)	重视具体劳动的问题(对技 术决定论的新马克思主义 批判)
轻视消费者运动(把它视为 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 某些特殊群体的爱好)	重视消费者运动(对使用 价值的批判;以汉堡包、 汽车文化以及电视文化 等使用价值为靶子)
不用特别考虑产业工人的 分工/劳动者的专业化就 可以来讨论经济剥削(虽 然不是说不考虑劳动的 分工/劳动的专业化)	不讨论劳动者的分工/ 劳动者的专业化/工人的 组合方式,就无法对生态 剥削进行合理的讨论

337

第二十一章 什么是生态学社会主义?

续表

传统社会主义	生态学社会主义
在由上而下的经济计划与工人对工业的控制之间难以取得平衡	扬弃了由上而下的计划与工人(以及社区和使用用户)对工业的控制,即民主国家(把官僚机构民主化=把官僚机构大众化)
寻求一种精英统治——“尽己所能”/个人主义	批判精英统治——当它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个体性时,却再生产出了自然的不平等。
结束由经济贫困造成的饥饿	结束由生态贫困造成的饥饿
粮食安全=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加上区域性的或国家性的自给自足。并不考虑土地使用等问题	粮食安全=更为依靠自己;传统农业与科学农业的综合等。把土地使用等当作问题来研究
结束对土著居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结束对土著居民的生态剥削和政治压迫
在国家层面上展开对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的经济斗争(凯恩斯主义、最低工资等)	在国际层面上就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废止童工等问题展开经济斗争(如各种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力量)
临时就业计划:减少工作时间、创造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机会,以此来作为对资本主义以商品形式表现出来的需求满足的一个补充。对需求层面并不进行理论分析,而且不研究其原因,只追求其结果	临时就业计划:减少工作时间、创造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机会(从而遏制社会成本、社会清洁成本等),以此来作为资本主义需求满足的一种“替代”。对需求层面进行理论分析,而且还研究其“原因”
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的无危机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对土地使用、具体劳动、使用价值等进行重新定义,导向维持/恢复/保存/保护)



在资产阶级思想中，“正义”是指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指事物的平等生产，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指人人都平等地制定法律（事实上，法律是由精英制定出来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正义是“分配性正义”，不是“生产性正义”。而且，分配性正义首先关涉的是个体的权利/要求而不是社会的权利/要求。

至少有三种类型的“社会分配性正义”，或者说，有三类与团体或阶级而非个人相关的正义。这些类型的正义也许可以称作“社会民主的分配性正义”。

1. **经济的正义**。它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财富和收入（以及一般经济货物）的平等分配，另一方面则是财富和收入的生产负担的平等分配。例如，社会民主党人通常认为工人应该通过优惠政策来得到补偿，也许可以借助于某种进步的税收和福利国家制度来做到这一点，从而替那些为游手好闲的富人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减轻一些负担。

2. **生态的或环境的正义**。它也由两方面所构成：一方面是环境利益（如风景、有河流灌溉的农场土地）的平等分配，另一方面则是环境危害、风险与成本（如靠近有毒废弃物的倾倒场所；受到侵蚀的土壤）的平等分配。例如，这些有毒废弃物的生产者，以及那些从生产“意想不到的副产品”（有毒物质）的工厂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获益的人，就应该对受压迫少数民族以及靠近有毒废弃物倾倒场所的其他一些居民提供补偿。

3. **社区的或公共的正义**。它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积

累给某些特定社区所带来某些利益和损害——如财产、道德价值、调控能力等方面的利害关系——的平等分配。例如,那些居住在郊区但要到城里上班并使用城市设施和服务的人,就应该交一种“穿梭来往附加税”,从而对那些居住在城里的市民进行补偿。那些其社会组织受到新建高速公路、大型超级市场等因素损害的社区,就应该由驾驶员、到大型超级市场去消费的顾客以及其他相类似的人来对其加以补偿。

而且,在所有这三种情形中,都存在着某些团体对其他一些团体欠下社会性债务的情况,它应该被分期清偿掉。这种债务包括:(1)资本对劳动、妇女、少数民族和其他一些人所欠的,以及当代人对后代人所欠的经济债务。(2)北部国家对南部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所欠下的生态债务。(3)资本对那些在社会性和伦理性的维度上被扭曲的社区所欠下的社区债务,这些社区深受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资本对这些社区构成了很大的损害。

这三种类型的社会分配性正义是以下列观点为前提的:任何东西,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外化物),都可以用一个最小公分母即金钱来进行衡量。否则的话,分配性正义的成本就会太高了,例如,如果根据核能利用水平和支付能力,把那些危害土著美洲人的铀废料转移到贝佛利山、阿克伦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中去,这么做的成本就太高了。相反,应该以货币的形式对土著美洲人(以及其他一些人)进行补偿。这就意味着给土著美洲人的健康、寿命和安宁定一个价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定一个合理价格的惟一方法就是:计算辐射受害者遭受的收入损失,然后再加上健康受损带来的医疗账单和一般的“痛苦”。

由此,分配性正义(“生态性的社会民主”?)是以当前视域中的市场,以及根据市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濒危物种等

等的生命就更不用说了)的估价所作出的有关罚金与红利、税收与补助金的核算为前提的。在此,可以想一下关于补偿的一个传统事例,即上游污染者对下游水源使用者的补偿。如果我们假定社会生产的社会特征还没有发展起来,那么,上述这个例子倒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不过,社会客观现实与这个传统事例之间的差距越大,分配性正义这个概念就越没有适用性或者说就越无法加以实施。譬如,可以思考一下全球变暖的问题。从原则上来讲,分配性正义可以通过对汽车拥有者/汽车频繁使用者/卡车拥有者的征税来建立一些补偿基金,从而对那些没车和不经常使用汽车的人进行补偿。但这显然是一个缺乏理性并且愚蠢的想法。现在,(劳动力、自然、社区以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其特征上来讲已是非常社会化了,以至于根本没有方法来计算各个个体和团体的利益和成本。既然分子物理学家的劳动是比尔·盖茨财富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盖茨为什么不该给一代或两代的分子物理学家(还有其他一些人)支付几亿美元呢?(之所以没能这样做)那是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对资金加以公平分配的方法;科学和技术从其特征来说是如此地社会化,而且劳动的分工和功能的专业化也达到了如此难以令人置信的复杂程度,以至于根本没有一个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去计算成本和利益。

总而言之,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发展,意味着分配性正义将越来越不可能获得合理的测定和实施。这就意味着,对于平等来说,我们所说的“生产性正义”(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应该是“生态学社会主义”而不是“生态性的社会民主”)不仅变得越来越可能,而且也越来越必要了。

总之,“生态性的社会民主”关涉的是生产和积累的正面

因素和负面因素的平等分配,也就是说,关涉于社会交换关系。而“生态学社会主义”则关涉于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生产,或者说,关涉于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例如,如果某个公司致力于社区建设、工作中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对有毒废弃物的拒斥等,那么生产性正义就对其持赞成态度。生产性正义将需求最小化,或者说,彻底废止分配性正义,因为,分配性正义在一个社会化生产已达到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正义之惟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惟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

# 索引

- Abstraction of labor and nature, 劳动与自然的抽象化, 20, 87, 326 页
- Agriculture 农业, 2—3 页
- bad harvests, 坏收成, 159—160, 171—173 页注释
  - capitalist, 资本主义的 123, 159—160 页
  - degradation of soil resources, 土壤资源的退化 192—193 页
  - in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 9—10, 114
  -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labor in, 其中劳动的历史进化, 26 页
- Preservation First! principles, “保护第一!” 原则, 320 页
-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284—285, 292—293 页注释, 294 页注释, 309
- Ano Nuevo, 安纳·努弗, 25—26 页
- Anthropocentrism, 人类中心主义, 313 页
- 
- Berry, Wendell, 贝里, 温德尔, 320 页
- Bioregionalism, 生态地区主义, 285, 287—288, 293 页
- Monterey Bay, 蒙特利湾, 74—75, 77 页
- sustainability concept, 可持续性概念, 235 页
- Bookchin, Murray, 布克钦, 默里, 283—284, 285 页
- Bush, George, 布什, 乔治 136, 214, 221, 223, 241 页
- 
- Canadian forest crisis, 加拿大的森林危机, 127, 139 页
- Capital accumulation, 资本积累
- crisis theory, 危机理论, 130, 185, 252 页注释

- ecological crisis and, 与生态危机, 180—182 页
- external natural barriers to, 外在性的自然障碍, 159—160, 165, 174—175 页注释
- function of state, 国家的功能, 212—213 页
- global development patterns, 全球发展模式, 197—198 页
- history of Chicago, 芝加哥的历史, 112—113, 119 页注释
- as impairing conditions of capital, 对资本条件的损害, 165—166 页
- qualitative consequences, 质的后果, 316—317 页
- sources, 资源, 178 页
- Capital goods, 资本货物, 179—180 页
- Capitalist economies, 资本主义经济, 8 页, 另参见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
- abstract/concrete labor in, 其中的抽象/具体劳动, 327 页
- Asian, 亚洲的 311—312 页
- basis for red green politics in, 其中激进绿色政治学的基础 272—273 页
- biological resource use, 生物资源的利用, 122—123, 124 页
- capital goods/consumer good, 资本货物/消费品, 179 页
- commodification of nature in, 其中自然的商品化, 23—24 页
- compatibility of environmentalists with, 环保主义者与其的共存性, 269—270 页
- contradictions in production conditions, 生产条件中的矛盾, 150—152, 160—162 页
- control of labor in, 其中的劳动的控制, 203 页
- as crisis-dependent, 具有危机—依赖性的, 163—164, 182, 252 页注释
- as crisis-ridden systems, 充满危机的体系, 162—163, 164—167, 182 页
- current functioning, 当前的功能, 1—2 页
- as demand-constrained, 作为需求受限的, 261—262 页
-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theory, 生态理论的发展, 126—127 页
- developmental historiography, 发展的编年史, 49—51, 61, 63—65 页
- dualistic views of nature in, 其中关于自然的二元论观点, 22, 23 页

ecological effects of, 生态后果, 123—124 页  
 economic histories, 经济史, 56—57 页  
 effects on local knowledge, 对地方知识的影响, 88—89 页  
 environmental harm in, vs. socialist countries, 其中环境的受损, 与社会主义国家相对照, 258—259, 263—264 页  
 environmental history, 环境史, 59—60 页  
 first contradiction of, 其第一重矛盾, 3, 127, 176—177, 240—241 页  
 history of Los Angeles, 洛杉矶的历史, 117—119 页  
 history of Monterey Bay, 蒙特利湾的历史, 83—87 页  
 individual in, 其中的个人, 22 页  
 myth of modern growth, 现代增长的神话, 316—317 页  
 nature in, 其中的自然, 22 页  
 operations of state in, 其中国家的运作, 154—155 页  
 political histories, 政治史, 56 页  
 as political subject, 作为政治的主题, 77—78 页  
 postindustrial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生产的后工业化条件, 12—13 页  
 preservation function, 保护功能, 317—318 页  
 primacy of oil industry, 石油工业的首要性, 214—217 页  
 self - expansion, 自我—扩张, 180—181 页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社会的与文化的历史, 57—59 页  
 sources of cost crises, 成本危机的根源, 242 页  
 state regulation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生产条件的国家调控, 148—149, 164—165 页  
 structural evolution, 结构的进化, 50 页  
 technology in, 其中的技术, 201—203 页  
 use value/exchange value in, 其中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 327—328 页  
 Capitalist society, 资本主义社会, 30 页  
 Chicago, 芝加哥, 参见“自然的大都会: 芝加哥与大西部”  
 China, 中国, 29 页  
*City of Quartz*, 《石英之城》  
 accomplishments of, 它的成就, 117 页



as economic history, 作为经济史, 117—119 页

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作为环境史 117—118 页

theoretical content, 理论内涵, 117 页

Civil society, 市民社会

in determining production conditions, 决定生产条件, 152—153 页

in liberal democratic state, 在自由民主国家, 212—213 页

current environment, 当前的环境, 299 页

current significance, 当前的意义, 1—2 页

historical context, 历史语境, 34—35 页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生态政治学与文化政治学的整合, 77—78, 87—89 页

issues in production conditions, 生产条件的问题, 14—15 页

post-Marxist thought,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 12—13, 14 页

relations within classes and, 阶级内部关系, 41—42, 43 页

Clinton administration, 克林顿政府, 282, 286, 314, 315 页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65 页

Combined development, 联合的发展

definition, 定义, 188 页

pollution and, 及污染, 196—197 页

pressures for, 对它的压力, 190 页

resource depletion and, 及资源损耗 197 页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理论意义, 187 页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of labor, 劳动的, 84, 144, 155—156 页注释

of land, 土地的, 23, 58, 84, 144 页

of nature, 自然的, 107—108 页

Commoner, Barry, 孔门勒尔, 巴里, 207, 283—284, 285 页

Competitive accumulation, 竞争性积累, 58 页

Consciousness, 意识, 58 页

nature and, 与自然, 4—5 页

socially mediated, 社会中介了的, 5, 276 页

- Conservationism, 保护主义, 124—125 页  
    consumer goods, 消费品, 179—180 页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其中的技术革新, 202—203, 205—206 页
- Consumer income/spending, 消费者的收入/支出, 206—207 页
- Cooperation, 协作  
    historical change and, 历史的变化, 39—40 页  
    natural economy and, 自然系统, 45 页  
    as productive force/productive relation, 作为生产力/生产关系, 38—39, 174 页注释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aspects, 定性的/定量的方面, 40 页  
    response to crisis of capital, 对资本危机的反应, 163—164, 167 页
- Cost crises, 成本危机  
    managing, 管理, 246—247 页  
    sources of, 根源, 242—246 页
- Costs, ecological, 成本, 生态的, 128—129, 130n
- Crisis theory, 危机理论, 2, 3 页, 另参见生态危机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其中的资本积累, 130, 185 页  
    as capital underproduction, 作为资本的生产不足, 129, 166 页  
    classical Marxist,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 125, 159—160, 161, 162—164, 328 页  
    conceptualizations of crisis, 危机的概念化, 135—137 页  
    cost crises, 成本危机 242—247 页  
    current manifestations, 当前的显现, 281—282 页  
    ecological Marxism,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160—162, 164—167 页  
    ecological vs. traditional Marxism, 生态学的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334—335 页  
    economic, 经济学的, 178, 182—183 页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cago in, 其中芝加哥的经济发展, 112—113 页  
    first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 3, 127, 176—177 页

- global capitalism, 全球资本主义, 282—283 页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历史唯物主义的, 31 页  
significance of, 意义, 186 页  
social planning response, 社会计划反应, 168, 175—176 页注释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67—171 页  
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论, 58 页  
Cronon, William, 克劳纳, 威廉, 参见《自然的大都会: 芝加哥与大西部》  
Cuba, 古巴, 29, 33—34, 45 页  
Culture, 文化  
    capitalization of, in Monterey Bay, 资本化, 在蒙特利湾, 83—87 页  
    as determinant of nature, 作为自然的决定要素, 71—72, 75—77 页  
    labor as linkage with nature, 劳动作为与自然的纽结, 8, 3—84 页  
Los Angeles history, 洛杉矶的历史, 117—118 页  
    as product of nature, 作为自然的产品, 71—75 页  
    as productive force, 作为生产力, 83—84 页  
    traditional Marxist thought,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40—41 页  
    work relations and, 及劳动关系, 36—38, 40—43, 45—47 页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29 页  
  
Davis, Mike, 戴维斯, 麦克, 参见 *City of Quartz*, 《石英之城》  
    deep ecology, 深层生态学, 285, 293 页注释, 308 页  
Romantic philosophy in, 其中的浪漫主义哲学, 21—22 页  
Deforestation, 森林砍伐, 193—194 页  
Departments of capitalist reproduction,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部门, 179—180,  
    182 页  
Depression, global, 衰退, 全球性的, 247—248 页  
Distribution of wealth, 财富的分配, 116, 268—269, 273 页  
Diversity, 多样性, 286 页  
Douglas, Mary, 道格拉斯, 玛丽, 136 页  
  
Ecological crisis, 生态危机

- as cause of economic crisis, 作为经济危机的原因, 183 页
- consequences of general depression, 全面衰退的后果, 247—248 页
- as crisi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作为资本积累的危机, 166—167, 180—182 页
- current global, 当前的全球性, 281, 300 页
- economic source of, 经济根源, 183 页
- identifying material interests in, 确定其中的物质利益, 138—140 页
- ideological dimensions, 意识形态维度, 137—139 页
- North-South division, 北部国家—北部国家之间的分工 190 页
- political discourse, 政治话语, 142 页
- prospects for red green politics in, 其中激进绿色政治学的前景, 267 页
- subjectivist basis, 主观主义的基础, 135—136, 137 页
- uncertainty in, 其中的不确定性, 140—141, 142 页
- world fisheries, 世界渔业, 139—140 页
- Ecological feminism, 生态女权主义, 285, 288, 292 页
- Ecological Marxism,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concept of capital underproduction, 资本的生产不足概念, 166—167 页
  -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in, 其中的生产条件, 12—13, 307 页
  - crisis theory, 危机理论, 160—162, 164—167 页
  - criticisms of, 批评, 3—4 页
  -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必要条件, 161—163 页
  - post - Marxist thought and, 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想, 12—14 页
  - prospects, 前景, 15 页
  - rationale, 基本原理, 2—3, 7 页
  - role of, 它的地位, 7 页
  - significance for new social movements, 对于新社会运动的意义, 158—159 页
  - theory development, 理论发展, 126—127, 174 页注释
  -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61—162, 167—171 页
- Ecological science, 生态科学, 68—69 页注释
  - in ex - socialist countries,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 259—260 页

- Ecological socialism, 生态学社会主义, 另参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current indications for, 目前的征兆, 272—275 页
  - definition, 定义, 278 页注释
  - democratic form, 民主形式, 277, w79n
  -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显著的特征, 332—333, 334—337 页
  - historical obstacles, 历史性的障碍, 275—276 页
  - internal dualism, 内在的二元论, 268, 284 页
  - organizing needs for, 组织需要, 250—251 页
  - social setting for, 社会背景, 256, 267—268 页
  - theoretical basis/goals, 理论基础/目标, 290—292, 331—333 页
- Ecology, definition and scope, 生态学, 定义与范围, 25, 270, 274—275 页
- Education, 教育, 89 页
- Endangered species, 濒危物种, 135, 137 页
- Energy economy, 能源经济, 另参见矿物燃料
- capital's motivation for efficiency, 资本的效率动机, 181 页
  - Marxist thought, 马克思主义思想, 122 页
  - thermodynamic model, 热力学模型, 131 页注释
  - transparency of capitalist state, 资本主义国家的透明度, 213 页
- Enlightenment, 启蒙
- sense of nature in, 其中的自然意识, 20, 21—22, 24 页
  - view of technology, 技术的观点, 200 页
-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环境决定论, 47 页注释
- Monterey Bay history conceived as, 蒙特利湾的历史, 73—74 页
- Environmental history, 环境史, 4 页
- built environment in, 其中建构起来的环境, 67 页注释
  - in capitalist historiography, 在资本主义编年史中, 51, 59—60, 65 页
  - in development of histories, 在历史的发展中, 56 页
  - ecological science and, 与生态科学, 68—69 页注释
  - of Falls Creek watershed, 弗尔河流域, 94 页
  - goals, 目标, 25, 51—52, 66—67 页注释
  - leading historians, 主流历史学家, 65

- of Los Angeles, 洛杉矶, 117—119 页
- Marxism and, 及马克思主义, 52 页
  -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方法论挑战, 55 页
  - nature in, 其中的自然, 70 页注释
  - premature applications, 不成熟的运用, 64 页
  - prospects for, 前景, 65—66 页
  - significance of, 意义, 52—53, 54 页
  - site specificity, 地点的特殊性, 54—55 页
  - subject matter, 主旨, 52—54, 62, 94 页
- Environmental justice, 环境正义, 285, 286 页
- Environmental racism, 环境种族主义, 285, 286 页
- Exchange value, 交换价值, 另参见剩余价值
  - in capitalist economy,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 324, 327—328 页
  - definition, 定义, 325—326 页
  - ecological costs in, 其中的生态成本, 130 页注释
  - of labor, 劳动的, 144—145 页
  - of natural conditions, 自然条件的, 147 页
  - in nature, 在自然中, 122 页
  - in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在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之中, 127—128 页
- Fall Creek watershed, 弗尔河流域, 6—7 页
  - ecological impact of industry, 工业的生态影响, 105—107 页
  - economic history, 经济史, 94—95 页
  - labor history, 劳动史, 96—104 页
  - nature-culture dichotomy in, 其中自然—文化的两分, 96 页
  - purpose of narrative, 叙述的目的, 94 页
  - restoration effort, 重建的努力, 104—105 页
  - significance, 意义, 95—96, 107—108 页
- Family, 家庭, 149 页
- Feminist thought, 女权主义思想, 285, 288, 292, 308, 319 页

- Fetishism of capital, 资本拜物教, 30 页
- Feudalism, 封建主义, 26—27, 44 页
- first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 3, 127, 176—177, 240 页
- global regulation, 全球调控, 240—241 页
- Fisheries, 渔业, 139—140, 153 页
- Fossil fuels, 矿物燃料, 122, 130 页
- antecedents to Gulf War, 海湾战争的前提, 217—219 页
- estimated oil reserves, 估计的石油储量, 225 页注释
- global consumption, 全球消费, 215, 224—225 页注释
- history of oil resource exploitation, 石油资源开发的历史, 216—217 页
- North Sea reserves, 北海储量, 227 页, 另参见谢德兰群岛
- primacy of oil industry, 石油工业的首要性, 214—216 页
- uneven development, 不平衡的发展, 194 页
- Free riders, 自由骑士, 13—14 页
- Genetic science, 基因科学, 211 页注释, 238, 251 页注释
- Global capitalism, 全球资本主义, 1—2 页
- Asian capital in, 其中的亚洲资本, 311—313 页
- combined development, 联合的发展, 188 页
- ecological-cultural politics and, 生态的一文化的政治学, 77—78 页
- ecological issues, 生态问题, 274 页
- growth, 增长, 314 页
- institutions and structures, 体制与结构, 241—242, 302—303 页
- new forms of reproduction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生产条件再生产的新形式, 169 页
- patterns of ecological damage, 生态破坏的模式, 197—198, 300 页
- political functioning in, 政治的功能, 299 页
- potential for crisis, 危机的潜在性, 282—283 页
- prospects for red green movement, 激进绿色运动的前景, 300—302, 303—304 页



- regulating first contradiction, 调节第一重矛盾, 240—241 页
- strategies for red green movement, 激进绿色运动的策略, 302—303 页
- structure of labor in, 其中劳动的结构, 128 页
- uneven development, 不平衡的发展, 187—190 页
- U. S. role, 美国的地位, 281—282 页
- work relations in, 其中的劳动关系, 46 页
- Gordon, Buton, 戈登, 伯顿, 25 页
- Great man histories, 杰出人物史, 64, 69 页注释
- Green politics, 绿色政治学, 11, 197, 另参见激进绿色政治学
- Group of seven countries, 西方七国集团, 240—242, 282—283 页
- Gulf War, 海湾战争
- economic theory of, 经济理论, 213—219 页
- historical antecedents, 历史前提, 217—219, 220—221 页
- Iraqi rationale, 伊拉克的理由, 217 页
- political theory of, 政治理论, 213, 214, 219—223 页
- Haiti, 海地, 33, 34 页
- Hirsh, J., 希尔施, J., 145, 157 页注释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历史唯物主义
- centrality of labor in, 其中劳动的中心地位, 26 页
- classical account, 经典阐释, 4—6 页
- concept of cooperation in, 其中的协作概念, 39—40 页
- concept of leadership in, 其中的领导概念, 31—32 页
- function of ideas, 思想的功能, 31—34 页
- limitations of Marx's model, 马克思模式的局限, 43—44, 275—277, 289—290 页
- object of study, 研究对象, 31 页
-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in, 其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35—36 页
- progress of history in, 其中的历史进步, 34 页
- recent conceptualizations, 最近的理论分析, 27—28, 30—31 页
- revision for ecological thought, 生态思想的复活, 5—7, 290 页

- socioeconomic context, 社会经济语境, 34—35 页
- theory of culture in, 其中的文化理论, 36—38, 3—44 页
- theory of nature in, 其中的自然理论, 37—38 页
- History, 历史
- antecedents of Gulf War, 海湾战争的前提, 217—219, 220—221 页
- Cold-War era ecological harms, 冷战时代的生态危害, 257—265 页
- cumulative processes, 积累性的过程, 62 页
-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进化, 49—50, 56—60, 61, 62 页
- narrative form, 叙述形式, 48 页
- oil resource exploitation, 石油资源的开发, 216—218 页
- postmodernist view of, 后现代主义观点, 48—49 页
- specialization in writing of, 写作中的专业化, 63 页
- uneven development, 不平衡的发展, 63, 188—189 页
- Human ecology, 人类生态学, 25, 53 页
- Idealism, 唯心主义, 32—34 页
- 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学, 295—296 页
- Images, 图景, 19—20 页
- Import substitute industrialization, 进口替代工业化, 189 页
- Indigenous peoples, 土著居民, 79, 284 页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13—14, 288—289 页
- historical conceptualizations, 历史性理论分析, 22 页
-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27 页
-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 economic history of Chicago, 芝加哥的经济史, 113—114 页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历史发展, 8—10 页
- subordination of merchant capital in, 其中商业资本的臣服, 113—114 页
- uneven global development, 不平衡的全球发展, 188—190 页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信息管理, 260 页
-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 145—146, 307, 318 页
- Instrumentalist view, 工具主义的观点, 21, 24 页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41, 302—303, 310 页

- Justice, 正义, 285, 286, 338—339 页
- Labor, 劳动, 169—170 页, 另参见生产条件; 生产关系; 生产性的关系
- abstract/concrete, 抽象/具体, 326, 327—328 页
  - capitalist evolution, 资本主义的进化, 23—24 页
  - commodification of, 商品化, 58, 84, 144, 155—156 页注释
  - cooperation in, 其中的协作, 38—40 页 参见克劳纳的《自然的大都会: 芝加哥与大西部》, 115—116 页
  - as cultural practice, 作为文化实践, 36—37, 45—47 页
  - ecological socialist model, 生态学社会主义模式, 331—333 页
  - effects of combined development, 联合的发展的后果, 196—197 页
  - as fictitious commodity, 作为虚拟的商品, 144—145, 307 页
  - historical forms of, 历史形式, 26—27 页
  -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onception, 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 26 页
  - history of Fall Creek watershed, 弗尔河流域的历史, 96—104 页
  - history of nature and, 及自然史, 26, 52 页
  - methods for capital control of, 资本控制的方法, 203 页
  - place i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环境运动中的场所, 271 页
  - as political subject, 作为政治主体, 79 页
  - preservation, 保护, 318—319 页
  - preservation first! model, 保护第一! 模式 322 页
  - prospects for new social movements, 新社会运动的前景, 14—15 页
  -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社区的重建, 329 页
  - in resolving culture-nature dichotomy, 解决文化—自然的二分, 83—87 页
  - in socialist countries,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260—261 页
  - society-nature interface, 社会—经济的交汇处, 5 页
  - in stagnated global economy, 在停滞的全球经济中, 314—316 页
  - technology and, 技术, 203, 204—205 页
  - traditional socialist goals, 传统社会主义的目标, 268
- Land, 土地

- anarchist thought, 无政府主义思想, 284 页
-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23, 58, 84, 144 页
- Language, 语言, 6 页
- ecology of, 生态学, 37—38 页
- genetically determined, 受基因决定的, 47 页注释
- images and, 图景, 19—20 页
-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37—38 页
- reality and, 现实, 48—49 页
- and reification of ideas, 与理念的具体化, 32—33 页
- Lebowitz, M., 迈克尔·雷伯威茨, M., 173 页注释
- Legal relations, 法律关系, 258 页
- Liberal democratic states 自由民主国家,
- reform movements, 改革运动, 309—310 页
- two-state model, 两国模式, 212—213 页
- Local knowledge, 地方性知识, 88—89 页
- Localism, 地方主义, 270—271, 273—274, 296 页
- “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 approach, “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的方法, 300—302 页
- Los Angeles, 洛杉矶, 参见 *City of Quartz*, 《石英之城》
- Market formation, 市场形成, 112 页
- Marxist thought, 马克思主义思想
- concrete labor and use value formulations, 具体劳动与使用价值的描述, 329—330 页
- conservationist ethic, 资源保护伦理学, 124—125 页
- crisis theory, 危机理论, 159—160, 161, 162—164, 328 页
- cultural subjects, 文化主题, 40—41, 69—70 页注释
- current relevance, 当前的相关性, 1—2, 28, 281 页
- departments of capitalist reproduction,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部门, 179—180 页
- ecological content, 生态内涵, 2—4, 121, 124, 125—126 页

- ecological effects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生态后果, 123—124 页
- energy economics in, 其中的能源经济学, 122 页
-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及环境历史, 52 页
- forms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生产条件的形式, 125—126, 144—147, 160, 243, 252 页注释, 306—307 页
- functions of state, 国家的功能, 149 页
- historical context, 历史语境, 289—290 页
- idealism in, 其中的唯心主义, 32—34 页
- limitations, 局限, 43—44, 159, 276—277, 289—290, 327 页
- natural barriers to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自然障碍, 159—160 页
- nature in, 其中的自然, 2—3, 4—6, 37, 38, 121—122 页
-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and, 及《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大西部》109—110, 112, 115—116 页
-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其中的生产关系, 35—38 页
- recent developments, 最近的发展, 29—30 页
- social conflict in, 其中的社会冲突, 58 页
- structure of civil society, 市民社会的结构, 153 页
-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向社会主义过渡, 328—329 页
- within - class relations, 阶级关系内部, 41—42 页
- Mind-body dualism, 身心二元论, 22 页
- Monterey Bay, 蒙特利湾, 另参见弗尔河流域
- bioregionalism, 生态地区主义, 74—75, 77 页
- capitalization of nature and culture, 自然与文化的资本化, 83—87 页
- class politics, 阶级政治学, 77—78 页
- cultural history, 文化史, 72—73, 75—77 页
- divisions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区分, 79—83 页
- economic geography, 经济地理学, 73 页
- environmental threats, 环境威胁, 74 页
- flatlands politics, 平地政治学, 295—298 页
- greenbelt, 绿色地带, 80—81 页

- labor as informing historical principle, 作为历史原则之显现的劳动, 83—84 页
- marine resources, 海洋资源, 81—83 页
- multiculturalism, 文化多元主义, 77 页
- naturalistic view of, 自然主义的观点, 71—75 页
- obstacles to political change, 政治变化的障碍, 88—89 页
- physical landscape, 自然景观, 71, 72, 73 页
- political divisions, 政治区分, 79—83 页
- Moore, T. G., 摩尔, T. G., 140—141 页
- Multiculturalism, 文化多元主义, 285—285 页
- Nationalization, 国有化, 258, 336 页
- Natural economy, 自然系统, 44—45, 293—294 页注释
- organization of, 它的组织, 181 页
- Natural history, 自然史
- history of labor and, 劳动的历史, 26, 52 页
- human history interface, 与人类历史交汇, 25—26 页
- in revi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复兴中, 5—7 页
-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
- as capital, 作为资本, 179 页
- in capital self-expansion, 在资本的自我扩张中, 181—182 页
-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122—124 页
- capital's motivation for efficient use, 资本高效使用的动机, 181, 238 页
- combined development, 联合的发展, 197 页
- as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作为生产条件, 146—147 页
- consumer behavior linkages, 消费行为的联系, 206—207 页
- in demand-constrained vs. resource-constrained economies, 在需求受限与资源受限的经济体中, 261—262, 263—264 页
- extraction technologies, 提取技术, 202 页
- global distribution and exploitation, 全球性的分配和剥削, 8, 189—190 页

m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 in use of, 环境在使用中的改变, 24—25 页  
political modeling, 政治构建, 11—12 页  
uneven development, 不平衡的发展, 192—196 页  
use in ex—socialist countries,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运用, 256, 261, 262, 263—264 页

Nature, 自然

capitalist conceptualizations, 资本主义的概念化, 22—24 页  
in capitalist economy,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 3, 10 页  
capitalization of, 资本化, 59—60, 83—87, 185, 238 页  
classical Marxist thought,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2—3, 4—6, 37, 38, 121—122 页  
commodification of, 商品化, 107—108 页  
culture as product of, 作为其产品的文化, 71—75 页  
depictions of, 对它的描写, 19—20 页  
effects of material life, 物质生活的影响, 4—5 页  
environment and, 与环境, 24 页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在环境史中, 52, 70 页注释  
as fictitious commodity, 作为虚拟的商品, 125—126, 144, 307 页  
historical conceptualization, 历史性的理论分析, 20—22 页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onceptualization,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 37—38 页  
human separation from, 人类与其的分离, 22, 23 页  
labor as linkage with culture, 劳动作为与文化的纽带, 83—84 页  
as product of culture, 作为文化产品, 71—72, 75—77 页  
as production condition, 作为生产条件, 307 页  
as productive force, 作为生产力, 83 页  
restoration of Fall Creek, 弗尔河的恢复, 104—105 页  
work relations and, 劳动关系, 37—38, 43—45, 43—47 页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自然的大都会: 芝加哥与大西部》, 65 页

class politics in, 其中的阶级政治学, 114—115 页



- criticism of, 对它的批评, 109 页
- environmental content, 环境的内涵, 110 页
- goals of, 它的目标, 110—112 页
- market formation in, 市场在其中的形成, 112 页
- Marxist thought and, 及马克思主义思想, 109—110, 112, 115—116 页
-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其中的区域性发展, 110 页
- subordination of merchant capital by industrial capital, 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 113—114 页
- theoretical basis, 理论基础, 109, 110 页
- transportation issues in, 其中的交通问题, 110—111 页
- Needs, 需要, 326—327 页
- New Left, on class relations, 新左派, 论阶级关系, 41—42 页
- New social movements, 新社会运动, 参见社会运动
- New world order, 新世界秩序, 213, 214, 219—220
-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2, 303, 304, 305 页注释
- North-South division, 南北分工, 8 页
- ecological degradation, 生态退化, 190 页
- focus of radical movements, 激进运动的关注焦点, 255—256, 293 页注释
- meaning of political ecology, 政治生态学的意义, 255—256 页
- political functioning, 政治功能, 11—12 页
- prospects for international red green movement, 国际激进绿色运动的前景, 301, 302—304 页
- prospects for sustainable capitalism, 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前景, 248—249 页
- uneven development, 不平衡的发展, 189, 192—193 页
- Nuclear technology, 核技术, 205 页
- Obsolescence, 逐渐过时, 207 页
- Original accumulation, 原始积累, 23 页

- Ozone depletion, 臭氧层的损耗, 141 页
- Page, B., 佩奇, B., 112—113, 114 页
- Passive materialism, 消极的唯物主义, 47 页注释, 277 页
- Planning, 计划
  - basis for ecological socialism, 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基础, 274—275 页
  - crisis-induced, 危机引发的, 168, 175—175 页注释
  - ecological science in ex-socialist countries, 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生态科学, 259—260, 264—265 页
  - global ecological issues, 全球生态问题, 274 页
  - localism, 地方主义, 273—274 页
  - socialist, 社会主义的, 259 页
  - for sustainable capitalism, 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 246—247 页
- Polanyi, Karl, 波兰尼, 卡尔, 125, 144, 147, 169, 307, 308 页
- Political ecology, 政治生态学, 67 页注释
- North-South commonalities/differences, 南北共同性/差异性, 255—256, 293 页注释
- Political functioning, 政治功能
  - absence of class issues, 阶级主题的缺失, 77—78 页
  - challenges for new social movements, 新社会运动的挑战, 223—224 页
  - conflicts of Monterey Bay region, 蒙特利湾地区的冲突, 79—83 页
  - contradictions within production conditions, 生产条件之中的矛盾, 151—152 页
  - current left green political movements, 当前的左派绿色主义政治运动, 271—272 页
  - in defining ecological crisis, 定义生态危机 137—139, 142 页
  - ecological degradation in capitalist vs. socialist systems, 资本主义体系的生态退化与社会主义体系的生态退化, 257—258 页
  - energy economics, 能源经济学, 122 页
  - in ex-socialist countries,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 259—260, 264—265 页

- form of ecological socialism, 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形式, 277 页
- future orientation, 未来取向, 277 页
- in global capitalism, 在全球资本主义之中, 11—12, 15, 299 页
- goals, 目标, 12 页
- green trends, 绿色趋势, 236—237, 300—301 页
- history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历史, 56, 61 页
- idealism in, 其中的唯心主义, 34—35 页
- individual and universal demands, 个体的与普遍的需求, 13—14 页
- influence of oil industries, 石油工业的影响, 214—215 页
- leadership, 领导地位, 31—32 页
- legitimation of state and policy, 国家与政策的合法化, 212—213 页
- in liberal democratic state, 在自由民主国家中, 212—213 页
- localism, 地方主义, 270—271 页
- models of work relations, 劳动关系的模式, 42
- naturalistic vs. cultural, 自然主义的与文化的, 77, 79—80 页
- in origins of Gulf War, 在海湾战争的起源中, 213, 214, 219—223 页
- political compatibility of environmentalists, 环保主义者的政治协调性, 269—270 页
- post - Marxist conceptualization, 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 13 页
- prospects for sustainable capitalism, 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前景, 249—251 页
- state regulation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国家对生产条件的调控, 149—151 页
- Pollution, 污染
- combined development and, 联合的发展, 196—197 页
- costs, 成本, 128—129 页
- Department I industries, 第一部类产业, 182 页
- early industrial period, 工业化的早期阶段, 8—10 页
- economic conditions as determinants of, 作为其决定因素的经济条件, 209—210 页注释
- by ex - socialist countries, 前社会主义国家造成的, 256—257, 260,

- 261, 262, 263—265 页
- political modeling, 政治构形, 11—12 页
- as uncapitalized nature, 作为非资本化的自然, 185 页
- uneven development and, 不平衡的发展及, 191—192 页
- waste and, 及废弃物, 191—192 页
- Population growth/movement, 人口增长/运动, 10, 196 页
- Post—Marxist thought, 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12—15 页
- Postindustrial society, 后工业社会, 12—13 页
- Postmodernist thought, 后现代主义思想, 48—49, 49 页
- Power relations, 权力关系, 38—39 页
- Preservation First! 保护第一! 311, 316 页
- exemplary social movements, 典型的社会运动, 319—321 页
- goals, 目标, 318 页
- labor model, 劳动模式, 322 页
- rationale, 基本原理, 316—318 页
- Preservationism, 保存主义, 85 页
- Primitive accumulation, 原始积累, 23 页
- Production conditions, 生产条件
- capitalization of, 它的资本化, 244 页
- civil society as determinant of, 作为其决定因素的市民社会, 152—155 页
- class issues and, 与阶级性的主题, 14—15 页
- classical Marxist forms,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形式, 125—126, 144, 160, 243, 252 页注释, 305—307 页
-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矛盾, 128—129, 130, 161—162, 170—171 页
- contradictions within, 其中的矛盾, 151—152 页
- contradictions within capital, 资本内部的矛盾, 150—151 页
- crisis theory, 危机理论, 160—161 页
- ecological socialist model, 生态学社会主义模式, 331—332 页
- as forces of production, 作为生产力, 152 页

- general, 一般的, 145—146, 154—155 页
- natural external, 外在的自然, 146—147 页
- needs of capital, 资本的需求, 149 页
- new forms of, in global capitalism, 新的形式, 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中, 169 页
- as objec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作为社会转型的目标, 161, 308 页
- personal, 个体的, 144—145 页
- post-Marxist thought,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 12—14 页
- potential for political crisis in state regulation of, 国家调控的潜在政治危机, 150 页
-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其中的生产关系, 148 页
- regulation in capitalist state,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调控, 148—150, 164—165, 245—246, 307 页
- restructured for increased productivity, 为提高生产率所进行的重构, 246 页
- for sustainable capitalism, 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 242—246 页
- theoretical needs, 理论需要, 147—148 页
- Production relations, 生产关系
- cooperation as, 作为协作, 38—39 页
- cultural aspects, 文化方面, 36—38, 40—43 页
- definition and meaning, 定义与意义, 35 页
- ecological degradation in socialist countries,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生态退化, 258 页
- in ex-socialist vs. capitalist countries, 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 258—259 页
- natural, 自然的, 37—38, 43—45 页
- as objec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作为社会转型的目标, 160 页
- as production conditions, 作为生产条件, 148 页
- productive forces and, 及生产力, 35—36 页
- Productive forces, 生产力
- cooperation as, 作为协作的, 38—39 页

- cultural aspects, 文化方面, 36—38, 40—43 页
- definition and meaning, 定义与意义 35 页
- in ex - socialist vs. capitalist countries, 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 258—259 页
- historical materialist model, 历史唯物主义模式, 35 页
- natural, 自然的, 37—38, 45 页
- production conditions as, 作为生产条件的, 152 页
-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及生产关系, 35—36 页
- reorganization in crisis, 危机中的重构, 63—164, 167—171 页
- Productivity, 生产率, 179 页
-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及资本积累, 181 页
- red green alliance based on, 以其为基础的激进绿色联盟, 269 页
- restructuring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for, 重构生产条件, 246 页
- traditional socialist goals, 传统社会主义的目标, 268 页
- Profit, 利润, 另参见剩余价值
- for capitalist self - expansion, 为了资本主义自我扩张, 180—181, 239—240 页
- demand, 需求, 179 页
- produced, 产出的, 179 页
- realized, 实现的, 179 页
- Proletarian revolution, 无产阶级革命, 29—30 页
- Proletarianization, 无产阶级化, 58—59 页
- Property relations, 财产关系, 258 页
- Quality of life, 生活质量, 316—317 页
- Racism, 种族主义, 285—286 页
- Red green politics, 激进绿色政治学, 224 页
- basis for alliance, 联盟的基础, 269, 280—281, 289, 291—292, 295—298 页
- current global movements, 当前全球性的运动 271—272, 277, 300 页

- current U. S. thought/movements, 目前美国的思想/运动, 280, 283—288 页
- internal contradiction, 内在矛盾, 269—270 页
- internationalization, 国际化, 300—304 页
- obstacles to, in U. S., 障碍, 在美国, 288—289, 291—292 页
- presuppositions, 前提条件, 280 页
- prospects for, 其前景, 267, 280 页
- Reification, 具体化, 30, 32—33 页
- of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矛盾的, 173 页注释
- Restorations, 恢复, 104—105 页
-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21—22, 23—24 页
-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29—30 页
- Scarcity, 稀缺, 173 页注释
- Science, 科学
- critical views, 批判性的观点, 200—201 页
- ecological, 生态学的, 68—69 页注释, 259—260 页
-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及生产关系, 35—36 页
-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 cost crises arising in, 从中产生的成本危机, 245 页
- examples of, 事例, 242 页
- first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and, 及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 176—178 页
- goals of theory, 理论的目标, 158—159 页
- production conditions and, 及生产条件, 129—130 页
- social opposition arising from, 从中产生的社会对抗, 127, 128—129 页
- theory, 理论, 127—128, 242 页
- Serf labor, 农奴劳动, 26—27 页
- Shetland Islands, 谢德兰群岛
- control of oil industry, 对石油工业的控制, 230—233 页
- economy, 经济, 229—230 页
- landscape, 景观, 227—228 页



- oil resources, 石油资源, 227 页
- political environment, 政治环境, 229 页
- significance of, 其意义, 227 页
- social relations, 社会关系, 228—230 页
- Site—specificity, 地点的特殊性, 13, 14—15, 270—271, 273—274, 296 页
- Slave labor, 奴隶劳动, 9, 26, 27 页
-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社会的与文化的历史
-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进化 57—59, 61—62 页
- in Marxist thought,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 69—70 页注释
- Social conflict, 社会冲突, 58—59 页
- Social ecology, 社会生态学, 283, 309 页
- Social movements, 社会运动
- challenges for, 其挑战, 223—224 页
- cost-crisis produced by, 由其造成的成本危机, 242 页
- crisis theory, 危机理论, 160—162 页
- current left green political movements, 当前的左派绿色政治运动, 271—272, 278 页注释
- current radical green, 当前的激进绿色主义, 280, 285 页
- ecological vs. traditional Marxism, 生态学的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336—337 页
- environmental, 环境主义, 183 页
- exemplifying Preservation First! principles, 对保护第一! 原则的例证, 319—321 页
-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ories, 理论的解释能力, 291 页
- organizing needs, 组织性的需要, 250—251 页
- peace activists, 和平主义者, 223—224, 292 页注释
- political compatibility of environmentalist, 环保主义者的政治协调性, 269—270 页
- political economy as basis for, 作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 306 页
- production conditions as objectives of, 作为目标的生产条件, 332 页
- in production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在生产条件的生产中, 152—155,

- 308—309 页
- prospects for, 其前景, 14—15 页
- prospects for red green politics in, 激进绿色政治学的前景, 267—268 页
- prospects for sustainable capitalism, 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前景, 250 页
- as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作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127, 128—129 页
-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Marxism for,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158—159 页
- socialist content, 社会主义的内涵, 325 页
- for state democratization, 为了国家的民主化, 309—310 页
- state regulation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and, 及国家对生产条件的调控, 150 页
- strategic choices, 策略选择, 309 页
-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理论, 308—309 页
- in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 169—170 页
- vie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学与技术的观点, 201, 208 页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另参见生态学社会主义: 激进绿色政治学
- basis for reconceptualization, 重新进行理论说明的基础, 325 页
- criticism of, 对其的批评, 324 页
- ecological vs. traditional Marxism, 生态学的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336 页
- Soper, K., 索普, K., 227 页
- Soviet Union, 苏联, 256—265, 281 页
- Sozo ecology, 保护生态学, 319, 320 页
- Surplus value, 剩余价值
-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矛盾, 162 页
- production of, 生产, 178—179 页
- technology and, 及技术, 202 页
- Sustainable capitalism, 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
-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for, 其生产条件, 242—246 页

consequences of general depression, 普遍衰退的后果, 247—248 页  
definition and meaning, 定义与意义, 234—235 页  
demand obstacles to, 需求障碍, 239—242 页  
global requirements, 全球性的要求, 240—242 页  
growth requirements, 增长的要求, 239—240 页  
managing cost crises for, 进行成本危机管理, 246—247 页  
necessary steps to, 必要的步骤, 237, 239 页  
political possibilities, 政治可能性, 249—251 页  
prospects for, 前景, 237—238 页  
in South, 在南部国家, 248—249 页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技术决定论, 39, 42 页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技术革新, 178—179, 180 页

alternative products, 替代性产品, 208 页

in capitalist economy,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 201—203 页

consumer goods, 消费品, 202—203, 205—206 页

control of labor in, 对劳动的控制, 203, 205—206 页

critical views, 批判性的观点, 200—201 页

Enlightenment view, 启蒙的观点, 200 页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环保的规定, 204 页

environmentally sound products, 环境合理的产品, 210 页注释

market conditions in, 其中的市场条件, 201—202 页

self - destructing tendency, 自我解构的趋势, 207 页

social change and, 及社会变化, 208 页

social relations in, 其中的社会关系, 203—204 页

in socialist countries,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261 页

Tongass National Forest, 汤加斯国家森林公园, 154, 156—157 页注释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classical Marxist model, 经典马克思主义模式, 328—329 页

ecological Marxist model, 生态马克思主义模式, 167—171 页

multiple paths, 多重道路, 169—170 页

-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跨国公司, 206—207 页
- Transportation, 交通运输, 73 页
- dis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环境影响的分布, 297 页
- in history of Chicago, 在芝加哥的历史上, 110—111 页
- Underproduction, 生产不足, 160 页
- crisis theory, 危机理论 129, 166 页
- Uneven development, 不平衡的发展, 63 页
- definition, 定义, 187—188 页
- forms of, 形式, 188 页
- fossil fuels, 矿物燃料, 194 页
- global pattern, 全球模式, 188—190, 192—193 页
- historical evolution, 历史进化, 188—189 页
- pollution and, 及污染, 191—192 页
- resource depletion and, 及资源耗尽, 192—196 页
- self-negating tendency, 自我否定的趋势, 190—191 页
-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理论意义, 187 页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188—189 页
- in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 9—10 页
- production conditions in, 其中的生产条件, 161 页
- Use value, 使用价值
- in capitalist economy,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 127, 325 页
- concrete labor and, 及具体劳动, 329—330 页
- critique of, 对它的批评, 327 页
- definition, 定义, 326, 333 页注释
- in ecological socialism, 在生态学社会主义中, 331—333 页
- in nature, 在自然中, 121—122 页
-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127—128, 176 页
- social needs and, 及社会需要, 326—327 页
- types of, 类型, 326 页
- USSR, 苏联, 256—265, 281 页

- Wage labor, 雇佣劳动, 26, 27 页
- Wage stagnation, 工资停滞, 314—315 页
- Walker, R., 沃克, R., 112—113, 114 页
- Waste, 废弃物, 124 页
- income accounting, 收入核算, 252 页
  - pollution and, 及污染, 191—192 页
  - in socialist countries, 在社会主义国家, 262 页
- Wetlands, 湿地, 138 页
- White, Hayden, 怀特, 哈顿, 48—49 页
- Wilderness, 荒野, 137—138 页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302, 303 页
- Worster, D., 伍斯特, D., 56, 59—60, 66—67 页注释, 68 页注释